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上将风云录 (一)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华诞。为隆重庆祝这个盛大节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批推出《将帅风云录》系列丛书六集，即：《十元帅风云录》、《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一、二集）和《中将军风云录》（一、二集）。

这部丛书所收录的人物，除极个别走向反面之外，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过的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有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战将，也有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后勤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肩负起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又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弹精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本丛书并不是着重反映他们戎马一生的历史传记，而是针对人物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撷取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最为闪光的、富有传奇特色的轶事和风采。俗话说，“一叶知秋”、“滴水映海”。轶事和风采同样能让人们感悟到，革命前辈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感人肺腑的绚丽乐章。

革命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走过了70个春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里程，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辉煌。70年如一日昭昭于世。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们，为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概括起来，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人生情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严谨求实的作风，认真科学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不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今天一代一代革命继承者永志不忘，躬亲实践的精神准则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建军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把这部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若诚能如此，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上将风云录

王新亭将军战斗在同蒲线上

乔希章

王新亭（1908～198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坚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1908年12月23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第4军第10师政治部秘书长、第30团政治处主任，第9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31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王新亭历任第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长，第386旅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政治部主任，太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为适应抗战胜利的形势，原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担任太岳纵队（后改称第4纵队）司令员，王新亭接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后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积极配合太岳纵队作战。1947年8月起，在徐向前同志统一指挥下，王新亭在前线先后指挥了攻克运城的战役，率部参加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和解放太原的战役。之后，任第18兵团（前华北第1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周士第司令员指挥了向西北、西南大进军的作战，直至大西南战役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王新亭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4年12月11日在北京病逝。

* * * * *

王新亭将军，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期间，长期做军队政治工作；全国解放战争中，是我军一位优秀的高级军事指挥员。在同蒲线上，他参与指挥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克敌制胜。

指挥太岳军区部队参加上党战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此之前的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动员令，指出蒋介石在准备挑起内战。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这时，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大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王新亭尚未到职

工作，改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此后，他率领和指挥太岳军区的部队参加了抗战胜利后的收复失地作战和反击国民党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的上党战役等作战。

日本投降后，活动在白晋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我军部队向敌人积极地展开了攻势作战。8月28日，太岳第39团攻克邢村据点，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12挺，步枪70余支。接着，王新亭命令第20团攻击日伪军设在晋中地区同蒲线上的张兰镇据点，一举歼灭据点内的日伪军，将同蒲铁路拦腰斩断。与此同时，太岳第772团和第38团又在平遥西南之曹村地区阻击向太原挺进的阎锡山部第73师，给敌以重创。

此时，活动在同蒲铁路南端的太岳第57团、洪洞独立团、汾东支队，结合一部分地方游击武装，向临汾、洪洞南北之铁路沿线发动攻势作战，先后扫清了灵石、霍县、赵城、洪洞、翼城、绛县等县城的日伪军外围据点，破坏和切断了平遥至临汾之间的同蒲路，将敌军分割于晋中与晋南各城镇孤立的据点内。

当时，与日伪军勾结、接管太原和临汾的阎锡山，按蒋介石密令调兵遣将，由其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第19军、第61军的主力4个步兵师及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于8月中旬从临汾出动，经浮山、翼城，向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区进犯。该部在日伪军接应下进入长子、壶关、屯留和长治，收编伪军3000多人，又进而侵占我从日伪军手中夺得的襄垣和潞城。这时，阎锡山在上党区的总兵力达1.6万余人。此乃上党战役发起前的形势。

根据党中央和军委“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歼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和“阎部1.6万人占我长治周围6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的指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统一指挥，发起上党战役。在此之前，针对国民党军向解放区的进攻，晋冀鲁豫军区除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外，还组建了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直接投入上党战役的兵力包括3个野战纵队和各军区的独立团共达2.8万人。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10日，战役正式发起。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司令员陈锡联指挥下，首先向屯留之敌发起攻击。经两日激战，我军于12日攻克屯留，全歼守敌。13日夜，太岳纵队在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统一指挥下，攻击长子。16日夜，冀南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指挥下攻潞城，于17日攻克。18日，太行纵队攻壶关。19日，长子、壶关同时解放。至此，上党区的首府、古为军事战略要地的长治外围敌占城市为我军全部攻克，以史泽波为总指挥的长治敌军完全陷于孤立。

9月20日，我军开始合围长治。到24日，攻占北关等城关据点多处。在开始强攻长治时获悉，阎锡山派重兵向长治增援。其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第23军、第83军与省防军共8个师，附炮兵2个团，共2万人的兵力，由太原出动，27日抵达沁州。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12时抵达沁州东南18千米处的新店，另一股1000余敌军在沁州西南的南里村一带。两股敌军将继续前进增援被困于长治之敌。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心以攻城打援战法，于野战中消灭敌援军，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的敌军。为此，命令太行纵队全部和太

岳纵队主力兼程北上，结合原担任监视白晋线之敌的第17师（师长刘复根，政委刘成诚），共约2万人，预伏于鹿亭以南白晋线上的常隆、上村两侧待机歼敌。同时命令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回师上党战场，迎击堵截可能弃城并妄图横穿我太岳区向浮山、翼城、临汾西窜之史泽波所部。当时，为配合上党战役，王新亭正指挥军区的第17团、54团、55团、56团、58团、基干2团、洪赵支队、洪洞独立团、汾东支队等团队，于豫北及晋南至平遥、介休同蒲铁路线打击敌人，并迟滞同蒲线南段蒋军北上行动。果然，当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将阎锡山的彭毓斌来援之敌合围于老爷岭、西窰、磨盘脑至榆林地区之时，困守长治的敌军史泽波部待援无望，于10月8日向西南方向突围。陈赓奉命指挥太岳纵队各部不顾疲劳，克服一切困难，从质亭地区直出沁水之马壁，控制沁河，昼夜兼程兜击逃敌。为不让敌人逃脱，陈赓限令第386旅（旅长刘忠，政委张祖谅）3天内赶到桃川一带。此刻，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在廊壁附近和沁河沿岸堵击溃逃之敌，经数日激战，协助太岳纵队主力将由长治逃出来的史泽波部3个步兵师的主力及1个山炮营共万余人，全部围歼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卒部入侵上党区的阎军最高指挥官史泽波也当了俘虏。

晋南攻势作战时的副总指挥

上党战役后，太岳军区主力部队编组成野战军第4纵队，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指挥下辖第1、2、3、4、共4个军分区（后改称第18、19、20、21军分区）的独立团、基干团等地方武装，还直接指挥第22旅、第23旅（旅长黄定基，政委肖新春）和第24旅（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在参加了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之后，随即配合陈赓的第4纵队相继在晋南闻喜、夏县和同蒲路中段发起自卫反击作战，经过几次较大的战役，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军的气焰。

1945年10月，当晋冀鲁豫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集中第1纵队、第2纵队、第3纵队及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军区的主力举行邯郸战役的时候，王新亭率领太岳军区几个独立旅和军分区地方武装，紧密配合陈赓第4纵队在同蒲路一线独立作战。10月30日攻克赵城，全歼阎军督导第4总队等2000余人。此后，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同蒲线作战部队的命令中，都写的是“陈（赓）、谢（富治）、王（新亭）”。因此，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南战场上的副总指挥。

继上党战役之后，邯郸战役给国民党军又一次沉重打击，我军不仅歼灭了敌大批有生力量，而且阻止了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北犯。但是，集结于晋南的国民党军仍企图南北对应，而后控制华北。1946年1月5日，中央军委指示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统一指挥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迅速攻占同蒲线上的曲沃、侯马、新绛，并控制以侯马为枢纽的南北交通。在第4纵队主力直扑侯马歼灭守敌，并乘胜向同蒲路南北扩张战果之际，太岳军区部队和第4纵队一部直出蒙城、高阳，阻止临汾之敌向南增援。战役第一阶段目的达成后，打援的太岳军区部队和第4纵队一部包围了曲沃县城，随即扫清城外据点。12日晚，对曲沃城发起攻击。激战至13日23时，主攻部队突破城垣，冲入城内并向纵深发展。此时，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已经生效。攻城部队接到军委“13日24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命令，遂停止进攻，

下令攻城部队撤出战斗。

不久，蒋介石令晋南地区是同蒲、白晋线上的国民党军，违背刚刚签字生效的停战协定，继续向我军挑衅。2月间，阎锡山以赵承绶指挥10个师2.5万余人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沿白晋线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进犯。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集中太岳、太行军区部队发起白晋战役。王新亭奉命指挥太岳军区的第23旅、第24旅等部队，由晋南转移至白晋线与王宏坤指挥的太行军区部队一同作战。

时值隆冬，王新亭率领太岳军区部队由晋南向白晋线战场开进途中，不但要爬越崇山峻岭，而且日着鹅毛大雪和寒风。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部队按时抵达作战地区，随即与王宏坤指挥的太行军区部队共同对敌实施破袭战。两个军区部队密切协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歼灭国民党军4000人，控制了白晋线北关至南关段铁路，阻止了由白晋铁路线南进上党和晋东南解放区的国民党军赵承绶部，迫使赵承绶与我军谈判停战。

1946年7月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由运城地区向北进犯，以6个旅的兵力与盘踞在山西南部的阎锡山军队共7万余人南北夹攻，企图一个月之内打通同蒲路南段，然后合攻上党，寻机歼灭我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及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中央军委指示陈、谢、王，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个歼灭战。由陈赓统一指挥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于7月13日至22日进行了闻（喜）夏（县）战役，歼灭了胡宗南部1个旅又3个营，共6300人。接着，于8月14日至9月1日在同蒲路的洪洞至灵石段之间进行了一次战役。战役中，为了配合第4纵队攻打洪（洞）、赵（城）两县城，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第24旅和军分区地方部队，于灵石以南的霍县地区发动攻势。在上乐坪、青郎坪地区歼敌胜利之后，先后攻占霍县城南之辛置车站及城西南之坛底镇附近高地，扫除了城东、城北的敌人大部据点，对霍县城形成包围。8月24日夜，我军对霍县城发起攻击。攻城部队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登城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残敌不支，500余人从南门突围，向汾河西逃窜。我军随即追歼残敌于汾河两岸。攻占霍县城的战斗，全歼敌1个团。9月1日，我军进占工业重镇富家滩。

此次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配合第4纵队发起的洪（洞）、赵（城）战役，包括攻占霍县和工业重镇富家滩煤矿战斗，共歼敌1.2万余人，解放了洪洞、赵城、霍县、汾西县城，并控制了同蒲路中段的铁路270里。

随后，王新亭又指挥太岳军区部队向南开进至洪洞、赵城以东山地，寻找战机。这时，从报话机里侦听得敌人明语通话，获悉敌军整编第38师1个团正在向北开进。王新亭当即命令部队就近设下埋伏，将开进中敌人1个团全部歼灭。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积极配合野战军第4纵队晋南同蒲线作战，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得到锻炼，士气非常高涨。不久，部队又在同蒲线南北扩张战果，连续攻占了垣曲、翼城、灵石等县城。由于陈、谢、王统一指挥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同蒲线上英勇作战，取得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并攻占十几座县城和重镇的大胜利，中共中央特致电陈、谢、王嘉奖：“你们部队在自卫反击光复洪洞、赵城、霍县诸城时，纪律甚好，闻之甚为欣慰，望全军将士加以勉励。”晋冀鲁豫军区也发布通令，嘉奖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嘉奖令中称赞同蒲线攻势作战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

正当陈赓第4纵队和王新亭太岳军区部队在同蒲路沿线展开攻势作战时，胡宗南于8月中旬又将其第30师（辖3个旅）和王牌军“天下第一旅”

调来晋南前线。这次，胡宗南亲自出马来运城指挥，与阎锡山国民党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企图迫使我军主力于洪、赵地区决战。显然，这一部署是蒋介石和阎锡山事先商量好的。9月5日，胡宗南令其集结运城地区部队由南向北进至临汾、翼城地区；阎锡山集结于晋中平遥、介休地区的第34军则由义棠开始向南进攻，企图攻占灵石，以接应胡宗南军北进。

这时，陈赓、谢富治、王新亭根据中央军委“对北犯胡军，应集中主力给以坚决打击，以歼灭其1个旅为目标，对平遥、介休之阎敌应以地方部队牵制之”的指示，共同指挥，对歼灭沿同蒲线北犯之敌作出了军事部署：由陈赓指挥第4纵队主力第10、11、13旅隐蔽集结于洪洞东南地区，以集中兵力歼灭胡宗南1至2个旅；由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第24旅和第18军分区（原第1军分区）的地方武装，一面继续阻击由平遥、介休向南进犯的阎锡山第34军，一面派各军分区部队深入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活动，以迟滞、疲惫胡宗南的军队，迫使敌拉长战线，分散兵力，为我主力歼灭敌人创造战机。王新亭随即率领第24旅昼夜兼程至晋中，指挥阻击阎军进攻灵石的作战。9月13日，将进攻灵石之敌击退。

阎锡山位于北面平遥、介休一线的部队遭王新亭指挥的太岳军区部队阻击后，消极怕战，迟迟不前。而胡宗南则依仗所谓王牌军“天下第一旅”，凭借其全是美械装备，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其第30师的两个旅（27旅和167旅）由临汾以南的史村、赵曲、翼城出动，进占我浮山县城。同一天，临汾的胡宗南军第1旅第2团亦沿临（汾）屯（留）公路向东进犯，策应第30师两个旅进占浮山的行动。当敌人第1旅第2团刚刚进入我第4纵队主力部队预设的战场——官雀村一带时，我第11旅两个团和第13旅的1个团向官雀村一带急进，迅速将敌人包围，随即向敌人发起猛攻。此时，王新亭命令太岳军区部队和第19军分区（原第2军分区）部队，以及各县游击队和民兵，积极开展袭扰、游击活动，造成声势，并佯攻浮山县城，配合主力作战。这是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同蒲线开展攻势作战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在我第4纵队主力猛烈攻击被包围于官雀之敌时，临汾敌第1旅旅长黄正诚，立即率其旅直和所属部队东进前来增援解围。敌军出临汾城不久，当即遭到我第4纵第10旅的有力打击。我第10旅第30团第3营指战员，曾在一天之中激战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当晚，增援之敌也被我军包围在陈堰村一带。与此同时，进占我浮山的敌第30师的两个旅，为了解官雀之围，放弃浮山县城急忙向西增援，但遭到我军打援部队第13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及第19军分区部队的坚决阻击。我军杀伤敌人近千，迫使敌人停滞在两佐、韩村一线。23日黄昏，我军主力对官雀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击。至24日拂晓，胡宗南“天下第一旅”的第2团全部被歼灭。在陈堰遭到我军阻击包围的敌第1旅大部，也被我第10旅和太岳军区部队全部歼灭。此次战役，我军重创敌第27旅和第167旅，共毙敌2000余人，俘虏敌号称“天下第一旅”的中将旅长黄正诚以下官兵2500余人。

1946年6月20日，刘邓大军横渡黄河。7月3日，国民党军守备在晋南安邑、运城之青年军第206师第1、3两团及整编第10师师部，为急援陇海线仓惶南调。当时，敌第10师师长罗广文惧怕陈赓纵队出击堵歼，令其第248团护送师直机关南下渡黄河去陕州。

王新亭获悉敌人这一行动，决心歼灭敌第248团于返回途中，遂派人跟踪侦察敌情。9日晚获悉敌第248团返回运城的出发时间，并得知该团团长

刘松山（外号小诸葛）要求运城派部队在距城 40 里的盖灵寺附近接应。这真是一个打歼灭战的好时机！当夜，王新亭电令太岳军区第 20 军分区（原第 3 军分区）司令员王墉率第 55 团两个连和第 56 团（欠 1 个连）星夜兼程开赴盖灵寺以南庙底山地设伏。12 日 14 时，敌第 248 团团长刘松山率部回返运城途中，进入我军伏击圈内。王墉一声令下，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毫无准备的敌军兵力火器均未展开，团长刘松山急呼运城救援不及。经半小时战斗，该团即告覆灭。此次战斗，歼敌 1 个团部、两个营、1 个辎重营另两个排，毙伤敌 118 人，俘敌团长以下 1400 多人，缴获甚多。此次漂亮的歼灭战，受到晋冀鲁豫大军区通令嘉奖。

自 1946 年 7 月开始的全国解放战争进行不到一年，人民解放军以平均每月歼敌 8 个旅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 年 3 月开始，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并把其嫡系胡宗南部主力用于陕北战场。胡宗南当即集结 34 个旅共 23 万兵力，悍然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猖狂进攻。

3 月 18 日，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的同时，急电指示：第 4 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应在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统一指挥下，迅速向临汾以南的河津（禹门口）、风陵渡方向进攻，相机逐一攻取晋南三角地带一切可能夺取的地方，猛烈地扩大解放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坚决打击进攻陕北的胡宗南军侧背，有力地配合陕北我军作战。

蒋介石、胡宗南集中兵力要进占延安，却不知他们盘踞的晋南、晋西南三角地带守备空虚。当时，在 2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敌人的正规军只有胡宗南部 3 个旅另 3 个团，加上阎锡山盘踞于各县城的地方保安团队，共 3 万余人。陈、谢、王根据中央指示，决心在晋南对敌发起强大攻势。战役前，王新亭和陈赓首先召开了第 4 纵队和太岳军区及太岳区党委、行署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作了战役部署，同时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号召太岳全区军民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口号声中，奋勇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训练和准备，我军随即向晋南、晋西南之敌发起猛烈进攻。参加此次战役的有第 4 纵队全部和太岳军区第 22、23、24 共 3 个独立旅及两个军分区的地方武装部队共 5 万余人，另有 134 个民兵连、还动员了 6 万群众参战支前。至 3 月 15 日，我军连续 10 天作战，席卷汾河两岸，接连攻克绛县、新绛、稷山、河津、万泉、荣河、猗氏等 10 余座县城，歼灭敌人 2 万余，还夺得黄河隘口禹门渡，控制了同蒲铁路 200 余里，从而切断了运城和临汾两处敌人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孤城。接着，我军乘胜前进，扩张战果。至 25 日，又连克临晋、闻喜、解县、虞乡、永济、平陆、垣曲和芮城，再度攻克霍县和赵城，并在晋西南控制了黄河主要渡口风陵渡。

翼城县城，是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第 22 旅和张祖谅为司令员的第 19 军分区部队攻克的。此战全歼守敌保安第 5 团，俘敌团长张鸿德和敌县长王光宇。4 月 5 日，我第 4 纵队第 10 旅和太岳军区第 24 旅攻克高显、蒙城重镇，歼敌第 38 师第 49 团一部。

4 月 5 日，我第 4 纵队第 13 旅和太岳军区第 23 旅包围了曲沃。曲沃是历史古城，春秋时代，为晋国首府。该县城是阎锡山在晋南的重要军事据点之一，又是国民党山西省政府第 5 专员公署所在地，设防坚固。当时，晋东南 13 县反动逃亡政府官员和汉奸恶霸集聚在这里。此外，曲沃地处太岳区与

吕梁山南部东西交通要冲，又有晋南米粮仓之称。根据以上情况，我军决心攻克敌曲沃县城据点。

王新亭和陈赓共同指挥攻打曲沃。4月10日，我军以第4纵队第13旅部队夺取曲沃北关和西关，以太岳军区第23旅夺取东关和南关，然后登城歼敌。在夺关战斗中，各部队与敌多次冲杀。在突破敌前沿接近寨墙时，因梯子太短，有的部队便以人梯挖洞踏墙。经6小时激烈战斗，我军占领曲沃四关，敌退守城内。

当时，我军虽然英勇善战，但装备极差。前沿部队在扫清敌军防御布雷和登城道路上的障碍后，却难破城攻入。王新亭来前沿阵地视察，并指导部队做阵前攻城演练。但由于缺少火炮和炮弹，攻城发生困难。这时，第23旅旅长黄定基，发动群众想办法，采取挖坑道装炸药爆炸破城的古战法，在县城东南门附近，把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部队冲入城内，与敌人展开巷战。与此同时，第4纵队第13旅由城墙裂缝挖洞突入城内，连克8座碉堡，然后向纵深发展。经彻夜激战，4月15日晨结束战斗，将守城敌军3000余人全部歼灭。

在声势浩大的晋南战役中，我军解放了晋南大片土地和人民。4月26日，军委又命令陈赓、谢富治、王新亭：应乘胜夺取运城，彻底解放晋南三角地带，并以一部向吕梁地区扩张战果，协同吕梁部队解放吕梁南部广大地区，继续威胁陕北敌之翼侧。根据军委的作战命令，由陈赓指挥第4纵队主力和太岳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围攻运城（即“一打运城”）；由王新亭率领太岳军区第22旅、第23旅及第18、第19军分区各1个独立团，配合围攻运城作战，向吕梁之敌进攻。5月22日，王新亭率军围攻乡宁城。经3天激战，我军攻克乡宁，全歼守敌阎锡山部第68师第204团和第9专署保安第15团及县保警队3400余人。27日我军占领大宁，30日解放蒲城。这时，王新亭令第23旅以小部队深入吉县敌后，炸断小船窝黄河铁桥，切断敌人晋陕之间的联系；又令第23旅主力东出吕梁山，以奇袭手段攻占襄陵县城，歼灭胡宗南部第38师第17旅第19团残部及反动地方武装襄陵‘爱乡团’共800余人。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部队西出吕梁，在晋绥军区地方武装密切协同下，积极配合攻打运城作战，获得辉煌战果，使吕梁和太岳两地区联成一片。完成了军委所赋予的“协同吕梁部队解放吕梁南部广大地区，继续威胁陕北之敌翼侧”的作战任务。此后，王新亭又回到运城前线指挥作战。

攻打运城前线司令员

1947年7月中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指示，决定改变陈谢纵队使用方向，命令陈谢纵队、秦基伟纵队、第5师（原中原军区部队，这里沿用新四军第5师旧称）和第38军统由陈、谢指挥出豫西。于是，陈质统一指挥围攻运城主力部队主动撤围，集训待征；而牵制晋南运城和临汾两个敌人孤立据点的任务，就落在了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指挥的军区部队和军分区地方武装的肩上。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进入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历史转折时期。当陈赓率各纵队撤围运城后，晋南地区残留各据点的敌人反动气焰嚣张一时。太岳军区武装的作战任务既十分繁重，又十分光荣，部队战斗情绪非常高涨，随时狠狠打击出城骚扰和抢粮抓丁的小股敌军。

刘邓大军和陈谢大军先后横渡黄河南征后，在晋冀鲁豫区内线战场我军已无野战军对付敌军。而在晋南，国民党军尚据守着运城、临汾两重镇，尤其阎锡山尚有十几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晋冀鲁豫军区召开了整编会议，决定扩大野战部队，以太岳军区第22旅、第23旅和由独立2团、警卫4团、第56团新编组成的第24旅（原军区第24旅调归第4纵队建制，改称第12旅），组成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8纵队，以太岳军区领导机关的一半人员组成第8纵队领导机关。原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被任命为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仲英为副政治委员，张祖谅为参谋长，桂绍彬为政治部主任。1947年8月1日正当建军20周年，在山西襄陵县张厢村举行了第8纵队成立大会。当时编入第8纵建制的第22旅，由于担任掩护陈谢大军渡黄河、挺进豫西作战，未能参加成立大会，此后也未再回山西境内作战（1948年春，临汾战役前，为了充实第8纵队，调冀鲁豫独立第2旅归第8纵队建制，改称第22旅）。从此，王新亭第8纵队在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统一指挥下，转战于山西境内同蒲线上、担负起攻打运城、临汾等孤立据点的任务。用徐向前的话说，第8纵队在同蒲线作战中担负着攻硬核桃、啃硬骨头、打攻坚战的硬任务。除攻城作战外，部队还要打大规模运动战，以把阎锡山国民党军10余万人消灭掉，最后解放太原。

王新亭第8纵队成立后不久，9月10日，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发布命令，电示王新亭：“军委决定8纵主力即攻取运城。”22日，军委再次指示：“新亭纵队应以全力夺取运城。”

运城，位于晋西南部，是我国古代文化发达最早地区，城郊所产潞（村）盐驰名中外，交通发达，同蒲铁路横贯，公路四通八达，是晋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重要战略要地和晋、陕、豫3省交界处的军事要冲。蒋介石把运城作为向北打通同蒲路、向西支援陕北战场、向南增援陇海路作战的集结兵力和军需补给基地。因此，敌人不顾一切地死守运城。此时，据守运城的敌正规部队和土杂武装近万人，并有阎锡山的政权机构3个专署、16个县政府，还有晋南实行土改时逃到运城的地主恶霸等。我军撤围后，敌人又加固了城防工事，重新构筑了外围工事，以高碉、低碉、野战工事组成交叉火网，企图阻挡我军的再次攻击。

9月，王新亭奉命指挥第8纵队第23、24旅及太岳军区地方部队一部，第2次围攻运城（“二打运城”）。经过战前准备和政治动员之后，王新亭上报关于第2次攻打运城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称：“我纵队决以两个旅（第23、24旅）及太岳3分区两个地方团的兵力，采取四面包围，重点环攻。但由于敌火力、工事较强（惯于组织炮兵群，地堡多于高碉，城围300米均扫清射界），故我决于8日起，需要10天以上土工作业等准备时间，尔后开始布置攻击。”又说：“部队情绪甚高，且无时间、敌情顾虑。”

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给予王新亭指挥攻打运城作战计划和决心以积极支持。接到攻运作战计划的当天，他即复电王新亭，指出：只要有把握攻下运城，付出1000人乃至更多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你们对时间和敌情不可有任何顾虑，要专心致志攻城，充分进行土工作业，并激励全军奋勇战斗，为人民立功。打下运城不仅解决我区财经问题，且对第8纵队是一个重大锻炼，尤可夺取大量武器装备自己。

10月8日，王新亭率领第8纵队主力，以突然奔袭攻击歼敌的战术，出敌不意，从东、西、北3面合围运城。当日，攻占敌人据点工事多处。18日，

占领城北飞机场。第2次攻打运城外围的作战，敌我打得难分难解，战斗非常激烈。王新亭说：在关键时刻，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及时下达指示，给打运城的前线部队极大支持鼓励和具体的战术指导。徐向前当时指出：“攻下运城，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能合歼敌人，我们就不怕付出代价。”10月14日又指示：“攻克运城之重要关键：第一，充分的准备工作，扫清一切登城障碍。第二，在城外给敌有生力量以相当杀伤，而我军力量在登城前又不致有过分消耗”，“尽量利用坑道作业，强行爆破破坏敌外围工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王新亭向前线指战员传达徐向前副司令员的指示后，部队英勇作战，敌外围主要据点基本肃清。正当扫除登城障碍准备发起总攻之际，胡宗南调兵4个旅前来增援。王新亭指挥部队撤围打援。在打援敌的作战中，由于地势对我攻击极为不利，仅歼敌3700人，其中俘敌700人。

打援作战结束后，援敌一部窜入运城，运城之敌增强了防守力量，并且破坏了我军原有的攻城阵地。我攻城部队撤离运城地区休整。此次撤围运城打援敌，打成一大消耗仗。王新亭检讨了战斗失利的教训，认为在作战指导上犯了主观错误。王新亭检讨报告发出的第二天，11月22日，毛泽东、军委即发来指示电：“攻运未克，打援又未全歼，在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打不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军区负责直接指挥运城战役的徐向前副司令员也来电鼓励：第2次攻打运城虽未攻克，但对部队锻炼甚大。

部队作战中，山西人民以全力支援，仅供应修筑工事所用门板即达17万块。部队休整期间，王新亭召开纵队团以上干部会，在总结第2次攻运作战时，对战役指导又作了检讨。他要求各级向部队传达毛主席、军委和徐向前副司令员对部队的鼓励电，并进行第3次攻打运城的再动员。

11月22日，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又指示王新亭：“运城之敌经此次打击后甚恐慌，第8纵队经补充休整后，能否再行攻击运城？此时解决财政、巩固晋南作用甚大。请新亭考虑，并复。”

此时，正值王震同志率领第2纵队从山东返西北途中，在晋南作短期休整。经与晋绥军区贺龙司令员商量，徐向前指示王震协同8纵再次攻打运城。徐向前又电令王新亭、王震赴军区（冶陶）当面商讨攻运，并部署了第3次攻打运城（“三打运城”）。为达成第3次攻运战役目的，军区请示军委批准组成运城前线指挥部，任命王新亭为前指司令员，王震为前指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运城前线部队作战。12月14日，前线指挥部作出第3次攻打运城的作战部署：“以5个旅另1个团攻城，集中兵力火力，由城西、城北两面突破。采取大量使用炸药，连续爆破方法。战役决定于17日开始。第1天晚上，拟以突然袭击手段，打掉外围可能打掉之碉堡，争取7天至10天后攻城。”徐向前批准王新亭第3次攻打运城的作战部署后，指示：你们攻下运城的部署和决心很好。但必须接受上次攻打运城的经验教训。“第二次打运城，部队是英勇的，但步兵的顽强性不够。教育部队要顽强不屈，坚持最后5分钟，取得攻占运城、最后歼灭敌人的胜利。”

按计划于12月25日晚完成一切准备（运兵道路、火力阵地等）后，开始进攻。但在23日接到情报：黄河以南的胡宗南部4个旅又有北渡增援迹象。运城前线司令部又一次紧张起来，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王震立即找来参谋长张祖谅、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参谋处长晋夫商讨对策。王新亭集中大家

意见说：“我们应接受‘二打运城’的教训，抢在援敌到来之前破城，把原定在25日黄昏总攻时间提前到24日夜接敌，拂晓前突上城头。突破手段主要靠夜战，使用跳板云梯登城。第2纵队从城西突破，第8纵队从城北突破，以城北为主攻方向不变。”

由于总攻击时间提前，登城准备仓促，首先是接敌的交通道路未完全开辟出来。至25日拂晓，最深的交通壕还不到半人深。土冻地坚，又在敌人的火力下作业，部队伤亡不小。通外壕的跳板和登城的云梯短而且很重，一个班都抬不动，送到外壕里距离边沿还差一截，竖上城墙也短一截，因此突击部队都拥挤在外壕边和城墙脚下。拂晓时，因我军火力压不住敌人，敌人还敢站在城墙上用各种火器杀伤我登城部队。由于运城城西我军未进到城墙下，没有牵制住敌人，因此城北我军主攻方向上反而受到敌人集中兵力兵器的反击。这次登城失利。

25日晚，我军再次组织进攻，但以同样的不利情况而中止。在这关键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动摇决心的时刻，徐向前于26日从冶陶打来电话，下了死命令：“坚持最后5分钟，坚决拿下运城！”运城前线司令部传达命令后，给参战部队坚定了信心。在这紧张时刻，各旅在阵地前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作战办法，进行再动员。严冬时节，冰雪覆盖大地，在前沿阵地上，即使有老鹰飞翔的活动目标，从城墙上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这时，王新亭和王震的指挥所里只留下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和参谋处长晋夫，以与上下级保持联系。王震回2纵部署最后总攻运城兵力。王新亭和参谋长张祖谅冒着空中乱飞的流弹，在大白天沿着白雪复盖、蛇形弯曲的交通壕，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火力封锁，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城北距城墙不到千米的第23旅指挥所，亲自动员和部署第23旅主攻运城。第23旅是一支老部队，在晋冀鲁豫军区来说也算个劲旅，是既善打运动战、又善打攻坚战的第8纵队的骨干力量。旅长黄定基，是老红军战士，有智谋而又很勇敢的优秀指挥员。作为久经考验的军事指挥员，王新亭很自然地要把“钢刀、利箭”用在最关键的时刻。第23旅指挥所设在运城城北一座烧砖瓦的窑洞里。这里，正在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黄定基提出了挖掘强行坑道、炸开城墙、攻克运城的作战方案。

“对，前两次攻击，我们都是采用跳板越壕、云梯登城而失败了，眼下只有采用坑道战破城了！”王新亭进得窑洞来，肯定了黄定基的攻城意见。“这是攻取运城唯一的手段！”王新亭坐在黄定基身旁，再一次肯定地说。同年4月，王新亭指挥攻打曲沃县城时，黄定基就是采用坑道爆破攻下曲沃的。这次，黄定基提出的攻城战法，又与纵队司令员王新亭不谋而合了。黄定基总攻运城的作战方案，得到纵队司令员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王新亭的支持与鼓励。

“用强行坑道爆破炸开城墙办法虽好，可是挖坑道的时间只有一天啊！因为敌援兵就要来到城下了。”王新亭忧虑地说，“我想把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旅，行不行？”

看得出，在场的营团指挥员一个个都紧握拳头，憋着一口气。坐在王新亭身旁的旅长黄定基立即站起来说：“我代表全旅指战员请战，有信心，有勇气，竭力完成这个任务！”第23旅前沿指挥所里，突然发出巨雷般的掌声。

这样的一支好部队，这样的一批好同志，能在这节骨眼上挺身而出，能不让人激动吗！王新亭随即鼓励大家说：“好！有决心，有信心，再加上细致的组织指挥和战士们的勇敢精神，就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完成作战任

务！”

这时，运城前线指挥部政治委员王震赶到第23旅前沿指挥所来了。一进入这座破残的窑洞，王震就接过王新亭的话说：“23旅在坑道爆破方面已经有了经验，应该贡献更多的力量。现在，晋南人民和整个运城前线的部队，都在看着你们，等待你们爆破成功。”

参加会议的各级指挥员踏着雪地，向各自阵地走去。旅长黄定基把第69团团长张国斌和副政委蔡剑桥留住。司令员王新亭、参谋长张祖谅、第23旅旅长黄定基与张国斌、蔡剑桥共同研究最后总攻运城作战方案。黄定基首先说：“旅党委几个常委研究了一下，决定把坑道作业这个任务给你们9团（69团简称）。”

“好！坚决完成任务！”张国斌坚定地回答。

“那么，你们团长、政委考虑没有，怎样完成呢？”王新亭说话“司令员，参谋长，旅长，我们已经考虑了一个方案。”张国斌看了一下身旁的蔡剑桥说，“7连的交通壕已经接近城外壕20来米处了，有强行作业的可能。这是个捷径。从那里出发，深入到外壕去挖坑道，然后填好炸药爆破，以开辟冲击道路；但这也很有危险。”

“战争中，没有不危险的战斗。”黄定基说，“这关系到运城战役的成功与失败。走，我们一同到7连阵地上去看看！”

王新亭非常了解他的旅长黄定基。他和张祖谅一同回到指挥部，等待着黄定基的报告。

黄定基与张国斌、蔡剑桥一同来到第7连阵地前沿，看过地形。然后来到7连掩蔽部，决定以火力掩护十几个勇士通过20来米的开阔地进入外壕，实施强行坑道作业，并要求一个晚上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就交给7连吧！”张国斌命令。

第7连接受任务以后，排长刘明生和战士车元路等9勇士，主动要求担负这个艰巨任务。

当夜，风雪交加，寒气袭人。刘明生等9位同志背着门板和湿被子以防御敌人子弹，带着作业工具和同指挥所联络用的绳子，分为3个战斗小组，分头开始行动。第1战斗小组刘明生、乔永亮、郭海顺3人，在火力掩护下跃进，通过铁丝网时，刘明生负伤，乔永亮牺牲，郭海顺孤身滚进外壕，联络绳被炸断，上下失去联系。第2战斗小组崔有福、郭宪章、常豫恭下外壕后，也断了消息。第3战斗小组车元路、申士功、张有才出发时提出：“不用火力掩护，免得暴露目标；也不再背门板和湿被子防弹，轻装跃进，身子也灵便些。”张国斌同意了。车元路等3人悄悄地向外壕方向爬去，果然出敌意外，顺利地摸进了外壕，同先前进到外壕的同志会合了。

勇士们在寒风刺骨、冰水盈尺的泥浆中挖掘坑道。敌人不时地向外壕里扔手榴弹和手雷。在外壕里挖坑道的勇士们，大部分负了伤，个别人阵亡了。活着的把牺牲的战友放在一处，用门板、湿被子掩盖起来，以免敌人的枪炮再伤害他们的遗体。剩下的战士虽然有的已经负了伤，但还在艰难地、不停地进行坑道作业，携带的工具施展不开，就用双手刨，一捧一捧地把泥土捧出洞口。

战火中，鹅毛大雪又飘舞下来。

团长张国斌俯卧雪地，一动不动地观望着前方的动静。从昨夜勇士们冒着敌人的弹雨分批进入外壕，到现在已经是第2天的清晨，还没有听到联络

信号用的铃铛响。难道都牺牲在外壕里了吗？完不成任务怎么办？张国斌的心里像挂着个秤砣，沉重万分。这时，突然接到观察人员的报告说：“从外壕方向爬过来一个人！”这人正是后来的全国战斗英雄车元路。

当时的车元路身上5处负伤，但却以惊人的勇敢和毅力，忍着伤势疼痛，从外壕爬回了自己的阵地，向团长报告了英雄们在外壕里彻夜挖掘坑道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从他的报告中得知，原先伸进外壕里的联络绳子早已被敌人打断，连接的铃铛自然成了“哑巴”；而深入外壕的同志们，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地挖掘坑道，大家表示不完成任务不返回阵地。张国斌把水壶递给满身泥雪和冰茬、鲜血浸透衣裳的车元路，又叫来卫生员给他包扎伤口。车元路说：“不要紧，没有伤着骨头，我还能战斗！”多么好的战士啊！

张国斌兴奋极了，马上把车元路讲的挖坑道的情况，报告了旅长黄定基和司令员王新亭。他们部十分担心破城坑道作业的进展情况，指示张国斌再派人去外壕了解情况。因为车元路路熟，人又机灵、勇敢，只有再派他去外壕了解情况，并传达领导的意图……在这个生死线上，车元路一夜往返5次。他不愧是攻取运城战役中的特等功臣。

旭日东升，晨雾渐散。王新亭这时在张国斌第69团指挥所里，正在部署总攻运城的战斗行动。会议中间，便听到振奋人心的消息：英雄们经过彻夜努力，终于在拂晓前挖成了5.5米深的坑道和可容纳3000千克炸药的药室，还在通向我阵地的开阔地上每隔几步一个挖好了一些避弹坑，以便运送炸药。这些成果是英雄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大家都为之兴奋。

王新亭当即进行战斗动员。他对各级指挥员说：“根据情报，敌人的援兵再有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这里。是成功，是失败，就看今天晚上！攻下城来，敌人援兵不打自退；攻不下来，我们就腹背受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今晚一定要攻下运城来！”

在场的各级指挥员一致表示：“一定打好，保证完成任务！”

12月27日黄昏，爆破队仅用40分钟时间就完成了3000千克炸药的传递和装填，部队按预定时间发起了总攻。第23旅在主攻方向的正面坑道实施爆破。一声巨响，浓烟冲天，将城墙炸成20多米宽的斜坡。该旅康烈功第67团第2营和张国斌第69团第2营均为突击营。冲锋号一响，他们分别登上城墙和城北门楼。团长张国斌亲自率领第2营冲上突破口，随后迅速突入城内。他指挥突击队，一面扩大战果，一面拦截向突破口增援的敌人。但是，守城敌军仍然顽强抵抗，并用猛烈炮火轰击封锁突破口，使我攻城后续部队无法前进。同时，我登上城楼的部队又遭敌人暗堡袭击，伤亡很大。敌军投入成营的兵力，从东西两侧夹击我占领城头的部队，并沿城墙向突破口轮番反扑。因寡不敌众，突破口终于被敌人封闭，我攻城第2梯队被敌人隔绝于城墙外，张国斌带领的第69团突击队5个连则被敌人反包围在突破口内。

在这关键时刻，在突如其来的紧急情况下，王新亭和参谋长张祖谅来到了第23旅指挥部，立即命令旅长黄定基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再次打开突破口；并指示迅速采取多路攻城，以分散敌人封闭突破口的兵力。同时，王新亭命令第24旅旅长王墉调部队加入争夺突破口的战斗。黄定基立即组织部队在老北门东侧勇猛反击，王墉也调来突击部队在老北门西侧攻击。第8纵队两旅主力部队并肩作战，经过猛烈而又艰苦的战斗，突破口又为我军夺占。

突破口恢复后，第23旅和第24旅两股突击部队直攻入城内。这时，第

2 纵队的一部分部队也从西门绕道北门进入运城。由于守城敌军失去战斗力，攻打西门的第 2 纵队主力也搭云梯登城，控制了西城墙，并进入城内战斗。于是，第 8 纵队两个旅和第 2 纵队主力部队均先后攻入城里，与敌展开激烈巷战。

28 日清晨，运城城头飘扬起胜利的红旗，攻克运城的战斗宣告结束，守敌 1.3 万余人大部被消灭。由运城南门逃窜之残敌 3000 余人，逃至平陆北七里坡一带，为打援部队独立 3 旅和军分区部队全部歼灭。

王新亭将军的《回忆录》写道：“运城攻坚战，就这样经过连续艰苦的作战而获得了完全胜利。”关于攻克运城的意义，王新亭在 1948 年元旦以晋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时指出：攻克晋南重镇运城，在军事上更增强了我军的机动力量，南可控制陇海路，西可出击关中，并更好地支援豫陕鄂解放军作战；在政治上，摧毁了晋南反动势力的巢穴；在经济上，控制了可供晋豫陕 3 省大部地区人民食用的潞村盐池，增加了全区的财富。这次战役，对部队来说也是一次考验和锻炼，证明我军不但能打运动战，还能打攻坚战和阵地战。不论土工作业，还是步、炮、工协同作战，都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在临汾攻坚战中啃“硬骨头”

运城解放以后，临汾成为蒋阎敌军孤悬在晋南的唯一坚固设防城市据点。临汾守敌有 2.5 万人，其中正规部队是胡宗南的第 30 旅和阎锡山在我军攻临汾前增援的第 66 师，其余都是些土杂武装，还有逃亡在临汾的 4 个专署、14 个县政府。守军由阎锡山的第 6 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司令梁培璜为总指挥。临汾是一座古城，相传是尧帝建都的地方，故称“尧都”。城内高外低，东有东关为屏障，西临汾河，形似牛卧，俗称“卧牛城”。四周筑有高达 10 多米、顶厚 20 余米、基厚 30 多米的包砖古城墙。该城在历史上为历代重要军事要塞。日本投降后，阎锡山接管临汾，留用日本战犯为军事顾问，把城防工事进行了加固，增加了防御设施。敌军依托城墙和市内高大建筑物，修筑了防御工事，以古护城河改筑成防御外壕，并在城周突出部加修了以高碉为主的集团工事。因此，易守难攻。

1948 年 2 月，晋冀鲁豫军区设立前方指挥所，由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担任“前指”司令员，统一指挥前线我军临汾攻坚战。经受运城攻坚战锻炼与考验的王新亭第 8 纵队两个旅，自然担负起啃“硬核桃”、“硬骨头”的重担，成为临汾城市攻坚战的中坚^①。临汾战役发起前，部队干部进行了三查三整学习，并广泛进行了阶级教育，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徐向前对他指挥的第 8 纵队、第 13 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寄予很大的期望，要求部队通过临汾攻坚战锻炼造就成善打攻坚作战的兵团。战役开始前，徐向前亲自布置：于 2 月 21 日至 23 日，在翼城召开前线参战部队营以上干部的千人会议，由王新亭作报告，总结运城攻坚战作战经验。他说：“要把运城的作

^① 徐向前总结运城攻坚战作战经验时说：运城战役虽小，但是影响很大，既锻炼了部队，又解决了我们不能解决的很大困难，使我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其他部队推广临汾攻坚战经验时说：“徐向前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我以 9 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这里说的“两个旅”，即指王新亭 8 纵队攻打运城的第 23、24 旅。

战经验，运用于临汾攻坚作战的战场。”3月7日，我军发起临汾城攻坚战役。战役发起的前一天，胡宗南由西安派来10多架运输机，企图把他在临汾的第30旅部队运走，同时派兵于汾河以西骚扰。徐向前命令王新亭摸清敌人活动企图之后，决定提前（原定3月7日）发起临汾战役；并命令王新亭派出1个团先行临汾城南，进袭敌机场，以粉碎胡宗南空运其第30旅的“蝉蜕”计划。

王新亭接到命令后，当即令第24旅旅长王墉率第72团，以夜行百里的急行军抵达敌机场，于3月7日凌晨用迫击炮袭击停留机场的敌运输机。第72团当即击中敌机两架。尚未登机的敌军，抱头窜回城里。敌空运计划遭到破坏。接着，第13纵队于城东，大岳军区部队于城东北，第8纵队于城南，开始了攻击临汾的外围作战。

初春的晋南，连日来雨雪交加。徐向前在临汾前线指挥各部队冒着雨雪突袭临汾城。至3月16日，我军攻占了城外围和城东关外壕外沿的主要据点。随即通过掩盖的交通壕向城垣推进，紧缩包围圈。国民党临汾城守军布防的重点在外围，其目的在于把我军攻城主力消耗在城外，最后失去攻城能力而撤围。所以，我军此次攻打临汾，争夺外围据点的战斗几乎贯穿战役全过程，费时最长，打得最艰苦，牺牲也最大。

临汾城南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开阔地，攻城部队难于展开火力和兵力；城东和城北地势比较特殊，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亦难攻破。我军紧缩对临汾包围圈后，鉴于城北地形较高，对登城有利，徐向前接受王新亭的建议，将第8纵队主力调到城北，拟首先夺取兴隆殿，而后依托该阵地攻城。于是，第8纵队第23、24两旅立即由城南迅速转移到城北新的攻击点。

临汾的东关很长，从城东门直达火车站。东关的城墙高度和厚度及城防设施仅次于本城，不仅有外壕和明碉暗堡，工事构筑及火力网设置也十分严密。要攻克临汾，必须首先打下东关。担负主攻东关任务的是第13纵队。原设想，第13纵队攻下东关，第8纵队攻占兴隆殿，然后由东和北两面主攻破城，拿下临汾。

但是，战场情况却发生了预料不到的变化。第13纵队发起主攻东关战斗前夕，徐向前曾说，攻打东关一战成功，即可组织攻城。第二天，3月23日，战斗发起。第13纵队以两个团的兵力先后两次进攻东关，都因炮兵火力弱，不能轰开城墙为突击队开道，而最终受挫。

王新亭率8纵两个旅由城南转移来城北后，准备由第24旅在13纵打东关的同时夺取兴隆殿，然后进行攻城准备。然而，在22日准备攻击兴隆殿阵地前夕，第24旅旅长王墉不顾安危，冒着敌人火力封锁，亲自上制高点，在我军攻占的敌人残碉中观察兴隆殿地形和敌情时，不幸头部中了敌人冷枪，牺牲在前沿阵地上。当时，王墉年仅32岁，是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正当我军准备攻打和夺取东关和城北兴隆殿，为总攻临汾作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牺牲了旅长王墉。晋冀鲁豫军区“前指”司令员徐向前和第8纵队司令员王新亭，都为王墉的死悲痛万分。

徐向前在“前指”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总结了攻打临汾以来战斗经验教训。他说：我们绝不能被暂时的困难和失利吓破了胆。要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胡子打白了，也要打下临汾！

徐向前随即调整作战部署，集中第8纵队、第13纵队主力，从东北、东南两面攻击，拟一举拿下东关。同时，以“土行孙战术”——坑道爆破为主

要手段，打破敌人“铜墙铁壁”，取得经验，然后攻城。

王新亭接受攻打东关任务后，自然把打运城时立有特等战功、受到晋冀鲁豫大军区通令嘉奖的黄定基第23旅用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尤其是进行坑道战，第23旅更有实战经验。王新亭下了命令：由黄定基旅担任主攻。

从4月5日起，第23旅旅长黄定基和政治委员肖新春在前沿指挥与敌人争夺东关外壕的战斗，同时组织指挥部队进行坑道作业。为了保证所挖坑道在通过敌人外壕时不被破坏，我军必须控制外壕。

这又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夜间，战士们把碉堡修到了外壕里。敌人出不来，就从城墙上往下扔手雷轰炸。我军战士凭着机智和勇敢，终于在外壕里站住了脚。狡猾的敌人又用水管往外壕里放水，妄图淹没我军在外壕里筑起的碉堡。可是临汾东关城外壕原本是护城河，结果放下来的水顺沟流走，形成了一条潺潺的小溪。在艰难地与敌人对战之际，也有快乐之时。当时，临汾外围布满了掩盖的交通壕和掩蔽部，战士们以阵地为家，掩蔽部既是生活场所，又是俱乐部文化活动现场。四通八达的交通壕犹如蛛网，为了不致迷失方向，战士们给各交通壕起了美丽的名字，并插上路标，如“胜利大街”、“英雄胡同”等等。

攻击东关前的战斗紧张而又激烈，至4月9日拂晓，我军完全控制了外壕，并挖成4条坑道和药室。按照徐司令员预先规定的4月10日攻城时间，提前完成任务。徐向前打电话给王新亭，并向黄定基及第23旅指战员祝贺坑道作业任务的完成。4月10日黄昏，攻取东关战斗在3条坑道（另有1条备用，未装药）同时爆破成功，东关的城墙被炸开宽20余米的两个缺口。第23旅的第69团和第68团的突击队，乘着烟雾，仅1分钟就登上城头，而后迅速向纵深发展。经过巷战，第8纵队在兄弟部队协同下攻占东关，并将守备东关的阎锡山的主力第66师基本歼灭。

临汾前线人民解放军攻占东关后，总参谋长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起草并发来电报，表示祝贺。电报说：“庆祝你们歼灭阎敌第66师及肃清临汾外围和攻占东关的胜利。……你们坚持近迫作业，坑道爆破，并控制主力，决心长期夺取临汾的计划是正确的。”

临汾攻坚战，的确确是打了一场“持久战”。当时，攻城部队技术装备极差，部队基本上是陈谢野战军过黄河豫西作战后，由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建起来的，许多部队不会打阵地攻坚战，不懂战术技术。然而，徐向前硬是要把这支部队培养锻炼成既能打攻坚战、又善打野战的兵团。王新亭后来说，这对他的教育极为深刻。总攻击临汾城的战斗情况更是错综复杂，也极为残酷。

临汾攻坚战役中，坑道作业任务十分艰巨。临汾城墙以外，除了护卫城壕，就是一片开阔地，连个高大土坡塍坎也没有。因此，只好远距离深挖洞（坑道）直到城墙底下，破城坑道长达百多米。不仅作业量大，作业条件也极差。根据攻占东关的作战经验，以坑道爆炸成为当时攻取临汾本城的主要手段。徐向前司令员号召前线部队在城东，包括城东南和城东北，都钻到地下去挖坑道。仅在王新亭指挥的第8纵队地段上，就挖有12条破城坑道。而敌人这时也有了失守东关的教训，采取种种手段，极力破坏我军所挖坑道。到总攻前的5月16日，整个战线上，我军所挖包括掩护坑道在内的40多条坑道，被敌人破坏后只剩黄定基指挥的第23旅在城东北角挖的两条各长110米的坑道了。临汾重镇能否最后攻克，这付重担完全落在王新亭和他指挥的

黄定基旅的肩上了。经过极为艰苦的战斗，两条破城坑道终于挖掘成功，待装填炸药爆破。

临汾战役发起总攻前的关键时刻，王新亭和纵队参谋长张祖谅、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带几个参谋人员，在敌人飞机盘旋轰炸之下，穿过一道又一道交通沟，提前进入前沿指挥所，以组织指挥坑道爆破和第23、24旅两支突击部队最后攻打临汾城垣的作战。

5月17日下午7点30分，初夏的临汾天还没有黑下来，夕阳的余辉照进王新亭略高出地面的前沿观察所。

急待总攻发起时间的王新亭，手持望远镜，耳听两条破城坑道的起爆声。“轰隆！”一声巨响，震天动地，望远镜镜头立即显示出冲天烟尘。王新亭举起电话耳机，心情激动地向徐司令员报告：“两条坑道同时爆炸成功了！炸开了两个大口子！突击队，第23旅和24旅，各担负一个突破口的突击部队，都在1分钟时间内登上了城头！”徐司令员也按捺不住喜悦心情，当即表扬了完成坑道作业和英勇攻入临汾城的突击部队。

“但是……”王新亭接着向徐司令员报告情况说，“突破城墙的部队，在通过城内壕时受阻，我有1个连的部队误入敌地雷区伤亡殆尽。攻击部队难以向纵深发展……六号，（徐向前司令员当时的代号）我准备跟随后续部队入城指挥！”作为担任主攻任务部队的指挥员，在经过整整72个昼夜艰苦奋战夺得攻破临汾敌人坚固据点的胜利后，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徐向前司令员答道：“临汾城的守敌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突击部队突破城垣，攻克临汾胜利在握；但敌人仍依托城内工事抵抗，敌人防御地带的地雷没有扫除。你个王瞎子，瞎着个眼，这个时候还进城于什么？”王新亭高度近视，徐司令员经常和他开玩笑，称他“王瞎子”。而在这破城成功、战争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说他“瞎着个眼”，正是对王新亭这个自红四方面军以来就建立起深厚友情的部下的关怀。因为他非常了解王新亭。作为纵队司令员的王新亭，每当指挥作战的关键时刻，就冒着枪林弹雨出现在前沿阵地上。他身先士卒的精神，给下级指挥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临汾攻坚战役，自3月7日开始，5月17日胜利结束。我军歼敌2.7万人，活捉了守城敌军最高指挥官、阎军第6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梁培璜。党中央向徐向前暨临汾前线将士致电祝贺：“庆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希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全华北而奋斗！”

在艰苦卓绝的临汾攻坚战中，王新亭和他的第8纵队与国民党军拼死战斗，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经中央军委批准，授予在战役中立下战功的第23旅“临汾旅”称号。王新亭指挥的第8纵队，从此树立起一面“光荣的临汾旅”的旗帜。6月4日，第8纵队在山西省洪洞县曲亭镇召开贺功大会。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华北第1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在总结临汾战役并部署晋中战役的百忙中，出席了第8纵队的贺功大会，把一面写着“光荣的临汾旅”的大红旗授予黄定基旅。王新亭代表纵队党委会把印有“奖给：光荣的临汾砍的战士”的绗绸手帕，奖发给“临汾旅”的战斗英雄。王新亭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讲话，号召纵队全体指战员，向“临汾旅”学习。他指出，第23旅要珍惜“临汾旅”这个荣誉，“今后要继续努力，使自己成为铁拳头，要把‘临汾旅’的光荣旗帜，走到哪里，插到哪里！”

晋中决战中的第8纵队

1948年6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蒋介石的五大战略集团，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华北、中原、华东、西北和东北各战场上，被打得焦头烂额。早在临汾攻坚战尚未攻城之时，担任前线指挥的徐向前司令员就颇有预见地提出，他所指挥攻打临汾的兵团^①打下临汾后，“第二步行动计划则拟向晋中作战。兵力可集中第8纵、第13纵、太岳8个团以及晋绥吕梁八九个团，共约在6万人上下。打阎军与开展晋中局面，当较有把握”。

临汾攻坚战胜利结束后，正式编入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建制的王新亭第8纵队，稍事休息，仓促开过庆功会，未及整训补充，即行北进，参加由徐向前司令员统一指挥的晋中战役。遵照徐司令员的统一号令，6月初，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经太岳山区绕道北进，由平遥、介休之间出山，断同蒲路，伺机歼敌。第8纵队破敌东山防御阵地后，第23、24旅先头部队进至曹村时，正碰上阎锡山的“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由张兰镇沿铁路两侧向平遥开进。王新亭当机立断，命令第24旅拦腰切断由南向北多路开进之敌，第23旅于敌前堵击并实施迂回包围，第22旅从侧翼堵击防敌逃窜，以对敌形成钳形攻击之势，全部歼灭这股敌人。正以行军纵队向平遥开进之敌，遭到我军突然猛烈的攻击，乱作一团，炮未卸鞍，火力未及展开，而且背靠汾河，前后左右均遭重兵攻击，东冲西突不能透围。第8纵队勇猛冲杀，敌军被打得人仰马翻，伤员死尸积满汾河滩。太岳部队亦配合作战。激战3小时，全歼阎锡山的“亲训师”（即第72师）及“亲训炮兵团”。晋中战役，首战告捷。阎锡山刚刚装备“亲训炮兵团”崭新的24门山炮，全部被我军缴获。这些山炮用来装备我军部队，加强了我军晋中围歼战的火力。

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部队，自临汾攻坚战以来，为了不失时机地北进晋中作战，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整补充；进入晋中后又连续作战，部队十分疲劳，行军掉队的很多。但是，徐向前所想的是如何在太原城外的晋中地区更多地歼灭敌有生力量，对于部队的疲劳也并不是不了解。他认为，“我疲劳，敌人被拖着转来转去更疲劳。我军是胜利之师，士气更比敌人高得多。我定能战胜一切困难，达到围歼敌人的目的。”于是，他指挥部队继续创造战机。然而，下面的各级指挥员并未完全了解徐司令员总的作战意图。王新亭纵队的几名旅长要求他向徐司令员反映意见，要求短期休整，再继续战斗。徐司令员听了王新亭反映的意见，不仅未作采纳，反而批评他对部队姑息迁就，指挥部队作战不“狠”。徐向前说：“服从命令听指挥，错了我负责。”

徐向前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当时，阎锡山正派出以赵承经为总司令、日本人原泉福为副总司令的野战军主力开来晋中，采取攻势，欲寻机与我军决战。

根据敌人的行动企图，徐向前在榆次、太原、徐沟、祁县间的犄角地带，设置了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场。其部署是：令太岳部队昼夜兼程北进，协同太行部队断铁路，炸桥梁，筑工事，阻击已经南进的敌人，不使其北逃；令第8纵队限期攻下祁县，以消除我军主力进行大围歼战的后顾之忧；令第13纵队监视敌改道北逃行动，准备追击堵截，逼敌钻进我预设的歼敌战场。

^①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军区合并，成立华北军区。原两区部队组成华北野战军第1、2、3兵团。徐向前兼任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第8纵队正式编入第1兵团序列。

7月7日，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第23旅和第24旅（第22旅配属第13纵队作战）攻克祁县城，全歼守敌3200人，活捉守城指挥官、第37师师长雷仰汤。祁县据点的拔除，为我军后来围歼阎军主力赵承绶集团消除了后顾之忧。王新亭后来回忆说，直到整个晋中歼灭战胜利结束，他才理解徐司令员命令限期攻占祁县的意义。

遵照徐司令员的命令，我军终于将敌人团团包围在大常镇、小常村、西苑、南庄一带东西长约20里、南北宽不足10里的狭小地区之内。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攻克祁县的第二天早晨，即率领部队兼程北上，投入围歼赵承绶集团的战斗。

在围歼敌人的作战中，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担负攻击南庄的战斗任务。南庄是晋中平原的一个大村庄，房屋多为比较坚固的砖瓦建筑，村子周围有土围墙。被围退守南庄的敌人，是阎锡山以留用日军为骨干组成的第10总队，并由野战军副总司令日本人原泉福直接指挥，战斗力很强。我军以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与敌人对战。敌人依托野战防御工事和村庄里的房屋死守。我军连续多次攻击，部队伤亡很大，未能攻占。当时，王新亭的前沿指挥所距激烈交战的南庄不过二三里路。但为了直接指挥部队攻下南庄，王新亭带领参谋人员离开指挥所所在村庄，准备将指挥所移至村子前面的渠沟卫去。刚刚走出村庄，就遇敌人的战斗机在头顶上盘旋俯射。村头、大路旁，伤员和民工拥挤成一团。王新亭不顾个人安危，指挥民工疏散隐蔽，在他周围不断落下敌机扫射的子弹。

经过十多天的围歼战，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配合友邻部队作战，终于把包围的敌人全部消灭了。阎锡山的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战败自杀毙命，山西绥署副主任、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当了解放军的俘虏。晋中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我军歼敌10万，解放县城14座，晋中广大地区的人民全获解放。我军在战役中创造了大兵团作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为日后攻取太原创造了条件。

晋中战役结束后，在徐向前召开的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上，王新亭检讨了在战役进程中给徐司令员打电话，反映部队因连续作战、过度疲劳而要求休整的事。徐向前却在晋中战役总结中大大表扬了王新亭指挥的第8纵队。他说：“战役初期，我第8纵队部队动作很迅速，和太岳军区部队一部一举歼敌‘亲训师’及‘亲训炮兵团’于张兰镇附近……第8纵队于攻下祁县城后，未加休整，连夜即赶往徐沟东南地区，参加围歼战。当我军将敌赵承绶集团包围之后，太谷敌第9总队弃城北窜，被我第8纵队第23旅迅速歼灭。平遥、介休、汾阳、孝义、文水、交城之敌亦相继北窜，我晋绥军区部队主力及第8纵队第24旅又西渡汾河截击歼敌大部。”战役中，“第23旅打敌第9总队，第24旅过河西堵击，都以小的伤亡，取得很大胜利。”总结谈到作战指挥时说：“打歼灭战对敌要狠，对自己在歼灭敌人的行动上也要狠。不怕伤亡消耗疲劳，扩张战果。……这种很，为的是不失战机，减少将来麻烦。”

太原战役显身手

被围困在太原的敌人，在太原前线我军准备发起攻击之前，提前出动。10月5日，敌人9个师的兵力从汾河以东向南进犯，企图抢粮，扩张地盘，阻止我军向太原进逼，并完全控制城南武宿机场（当时我军可以炮火控制武

宿机场），以得到蒋介石的空中支援。这是一次外围歼敌的战机。根据兵团首长的命令，为诱敌深入，第8纵队撤出防守的小店镇。南犯之敌随即占领。

在太原城外的围歼战中，王新亭指挥的第8纵队担负攻歼小店镇之敌的作战任务。为达到捕捉战机、割裂包围敌人、不使漏网的目的，主力部队在10月4日夜间接隐蔽出动，实施突然攻击。5日拂晓开始战斗，第8纵队攻击小店的部队以战斗小组连续爆破的手段，攻破敌人阵地，突入小店镇，而后进行逐院逐屋争夺战。从拂晓开始，打了一个昼夜，至6日9时结束战斗。第8纵队歼灭占领小店之敌两个师的大部2000余人，俘敌师长李子法。

太原战役打得最艰苦、阵地争夺战最激烈的阶段，是攻打牛驻寨、小窑头、淖马、山头4大要点的战斗。王新亭指挥第8纵队，担当攻夺小窑头阵地的任务。小窑头要点阵地距太原小东门正东4千米，居高临下，攻取后即可控制东城壕和环城铁路。因此，敌人在小窑头大小13个山头都筑以坚固防御阵地，投入兵力多，火力也很强。经过激烈的战斗，我军付出很大代价攻占小窑头阵地。但敌人投入机动兵力实施反扑，又把阵地夺了回去。小窑头要点阵地和其他被争夺的阵地一样，地上落弹不计其数，焦土三尺，敌尸成堆。焦土难以筑垒，战士们就搬来敌尸堆起做掩体。在最后攻占敌小窑头阵地的一次战斗中，王新亭和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祖谅带几名参谋人员在前沿指挥所指挥作战。为了便于观察部队的战斗行动，这个指挥所构筑在居高临下的制高点。敌人将指挥所误以为远射程火炮阵地。当攻击部队报告已全部控制小窑头主阵地后，敌人从太原城墙上射来炮弹，炮弹顺着观察口穿入指挥所里。这时王新亭和张祖谅刚刚离开指挥所，通过一段掩盖交通壕向后方走去，因此幸免于难。

11月2日，增援太原守军的蒋军第30军军长黄樵松派遣其中校谍报处长来到第8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接洽举行武装起义事宜。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派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邯郸起义的将领高树勋一起前来第8纵队。王新亭协助耀邦同志处置第30军起义事宜。双方商定：我军攻取太原城时，黄樵松的第30军交出他防守的大小东门要点，放我军入城消灭阎锡山的顽固军，然后第30军部队撤出城外集结，进行改编。而我军亦需派一名政治上很强的军事干部与对方联络官一同入城，协助黄樵松举行起义。派谁去合适呢？王新亭当即向耀邦同志推荐政治上强、又懂军事的第8纵队参谋处长晋夫前往。晋夫作为王新亭的参谋处长，可以说是他得心应手的好助手。王新亭深知，晋夫不但熟悉参谋业务，而且有卓识，有胆量，能深刻领会上级意图，独立处置复杂情况。经王新亭向耀邦同志推荐，兵团徐向前司令员批准，便派晋夫以宣传部长的名义与第30军来人一同进入太原。

11月4日，耀邦同志和王新亭等为晋夫送行。太原东山，初冬拂晓，寒气扑面。王新亭看到晋夫着衣单薄，便脱下自己的绿色毛衣给晋夫穿上。后来，黄樵松的起义因其部属第27师师长戴炳南的出卖而失败了。晋夫一入城，就和黄樵松一起被敌人逮捕。后被押送南京入狱。晋夫在敌人的监狱中及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正气凛然，表现了共产党员和一个人民战士崇高的革命气节。晋夫英勇就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解放后，他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在以后的岁月里，王新亭时时缅怀他的部属晋夫，说晋夫是一位党性强、政治坚定、爱学习、参谋业务熟的好干部。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兵团和四野的1个炮兵师参加太原总攻作战。这次战役

也是华北军区第1兵团、第2兵团、第3兵团在解放华北最后一座军事战略重镇的大会师。为此，成立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总前委副书记，罗瑞卿任副政治委员兼总前委副书记，陈漫远任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陈、胡均为总前委常委。

当时，太原前线司令员徐向前仍在养病，他请求中央同意，派由中央返西北途经太原前线的彭德怀代他指挥总攻太原。

1949年1月，中央军委颁布全军统一番号，华北军区第1兵团改为第18兵团，第8纵队改为60军，王新亭随之改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接着，王新亭被任命为第18兵团第1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但他在总攻太原的作战中，仍作为第60军军长担任第18兵团右集团（由第60军和第一野战军的第7军组成）指挥，与第7军军长彭绍辉一起指挥右集团在城东的攻击任务。当部队加紧进行总攻准备的时候，王新亭肩负重任，带几名参谋人员到城东外壕前沿，检查部队准备情况。当他们向前沿阵地行进，通过交通壕的一段暴露地段时，城墙上的敌人发现目标，打来一排炮弹。王新亭和参谋人员匍匐跃进，敌人射来的炮弹在他们周围爆炸。一行人终于冒险来到前沿阵地。

4月24日，我军对太原发起总攻的第4天。第18、19、20兵团和第四野战军1个炮兵师密切协同作战，终于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城。上午10时半结束战斗，全歼守敌。敌高级将领孙楚、王靖国以及日本战犯岩田等，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太原解放后，经人民公审枪决了战犯戴炳南。

解放太原之战的胜利，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整个华北随之解放。此后，第18兵团编入西北野战军序列，奉命向西北、西南进军。王新亭在对前一阶段的作战作出总结后，始到兵团走马上任。

扬威大江南北的叶飞

胡兆才

叶飞（191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福建省南安县人。出生于菲律宾。1918年回国，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1935年后，任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闽东独立师政委。抗日战争初期，任新四军第6团团长。1938年冬率部从皖南到苏南。次年5月，率部东进，夜袭浒墅关，奋战黄土塘，直抵上海近郊。1940年1月，率部北上江都抗日，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委兼副司令员，后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1师第1旅旅长兼政委、第1师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参加郭村、黄桥、东桥战役。1945年春，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和粟裕一起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10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兵团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福建省省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国务院交通部部长，海军第一政委、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 * * * *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涌现出众多优秀将领。他们的高尚品德，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略，非凡的才能，犹如长夜晴空的明亮星辰，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叶飞同志就是我军众多将领中出类拔萃的一位。

在那国家多难、民族多难的艰苦岁月中，叶飞长期战斗在华东战场。他和王必成、陶勇领导的3支英雄部队，在陈毅、粟裕领导下，从苏南打到苏北，又从苏北打到山东、河南，最后回师江南，解放南京、杭州、上海、福建。那时，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与上下来往电报中，把这3位英雄的名字统称为“叶王陶”。在浩繁的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战史中，“叶王陶”的战绩比比皆是，几乎没有一次战斗不与“叶王陶”相关联。“叶王陶”并肩作战，威名卓著，成了传奇人物。他们的业绩传遍大江南北，他们的故事有口皆碑。本文写的是叶飞转战南北、驰骋沙场的几个片断。

东进抗日威震上海

1939年5月的苏南茅山，桃红柳绿，麦浪滚滚，一支新四军队伍从茅山出发，向东路地区挺进。这就是叶飞领导的第6团，民众亲切地称之为老6团。

东路地区是指常州以东的宁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这里交通便利，经济、文化发达，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侵占东北后，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以重兵占领了这东路地区。南京、上海沦陷后，东路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人民群众热切期望新四军进入东路地区，领导抗战。1938年5月4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电示新四军：“在侦察部队出动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

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并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经一年努力，新四军在茅山建立了根据地。陈毅认为，向东路发展的时机业已成熟。这天，他将叶飞叫来，神情严肃地对他说：“现在，我就将发展东路的任务交给你。你们到东路去，主要的任务有3点：一是发展队伍，二是搞武器装备自己，三是筹集款子。简而言之，就是人、枪、款。”他用信任的目光看着叶飞，继续说：“有人批评这是机会主义。我不同意！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最后，他又补充说：“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

陈毅确定叶飞的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东征，并亲自到部队进行动员。陈毅考虑得十分周到，为了对付国民党第三战区，他决定叫叶飞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昆改名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名为汪明，政治处主任刘松青改名为刘飞。

叶飞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派人到东路侦察、联络，并给部队发齐了夏装。一切准备工作就绪，部队准备第二天一早出发。当晚支队部打来电话，说陈毅叫叶飞去一趟。叶飞二话没说，放下电话，跨马就向第1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奔驰而去。相距只有10里路，马蹄声声，转眼间就到了陈毅的住房门口。叶飞将缰绳一甩手交给警卫员，大步跨进陈毅的屋内。屋里只有陈毅一个人，正在默默地抽烟。陈毅见叶飞进来，没有说话，只是指指身边的竹凳，示意叶飞坐下。叶飞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默默地坐下，两眼望着陈毅，等待他下指示。可是，陈毅始终一句话不说。叶飞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子，忍不住问：“你叫我来有什么事？”

陈毅抬头看了他一眼，依旧不说话。半晌，他才缓缓地从小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叶飞。

叶飞接过电报，急切地低头一看，原来是项英发给陈毅的电报。再看内容，原来项英在电报中坚决反对东进，他提出两条理由：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看过电报，叶飞才明白陈毅为什么不说话。他心情沉重地望着陈毅，不知说什么好。这时陈毅站起身，低着头在屋里来回地踱步，步子由小到大，节奏由慢变快。叶飞只见他的身影在自己身边晃来晃去。大约有10分钟时间，他突然在叶飞的身边停了下来，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看怎么样？”

叶飞一愣，不知他是什么意思，只是望着陈毅，不好回答。

陈毅见叶飞不作声，低头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几口，又踱了几步，在一张竹凳上坐下来，目光凝视着地面。半晌，他猛地站起身，对叶飞说：“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

叶飞一听陈毅担心的是这个，笑了起来，毫不含糊地说：“你放心吧，我有把握，我们绝不会被敌人消灭的。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得到大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陈毅重复地问一句：“你有绝对的把握？”

叶飞面色严峻地回答：“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叶飞字字句句落地有声，铿锵有力。

陈毅一甩手，果断地说：“好！你们照原计划行动。”

“那……”叶飞想起项英电报中说的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毅知道叶飞担心的是什麼，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走你们的，项英的事我来处理。如果他追究下来，由我负责！”说罢，他指着叶飞，严肃地说：“不过，部队要被消灭，由你负责！”

“是！”叶飞双脚立正，向陈毅敬了个军礼。然后返回部队，通知部队作好准备。第二天（5月5日）凌晨两点多钟，全团浩浩荡荡向东路地区挺进。一路上，他不断地向群众打听东路地区的情况。据了解，那一带日军兵力十分强大，还有很多地方武装和面目不清的杂牌部队以及反共的军统特务组织忠义救国军。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一小部分，而且很分散。因此，敌我力量悬殊。叶飞感到此去东路担子很重，肩上沉甸甸的。

拂晓，天空中点点繁星还没有完全隐去，不时地眨着眼睛。叶飞的老6团已划常州附近，越过了宁沪铁路。天色大亮时，他们与梅光迪的部队会台。随后部队进行了统一改编。梅光迪拉起的一支地方部队，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上海的党组织派何克希去担任副司令。何克希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陈毅又派第1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工作。胡发坚牺牲后，又派去了徐绪奎。叶飞这次向东作战，就是打的这个旗号。部队改编后，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任副总指挥。

为了扩大“江抗”在东路的影响，树立群众抗日信心，鼓舞士气，叶飞考虑进行一次战斗。恰巧这时，他听说有一支日军队伍到黄土塘，便和地方党组织商量，决定在黄土塘和日军打一场遭遇战。

黄土塘是个小镇，位于无锡东北部。一条大河横切，将镇一分为二。河中有座双曲拱石桥，将镇两边连结。镇外是一片水稻田，刚刚插下的秧秧随风起伏。

5月31日半夜时分，万籁俱寂，圆圆的月亮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叶飞率“江抗”急行军到达黄土塘。未到镇口，便听到镇里传来阵阵狗叫及喧闹声。叶飞立即判断镇内有敌人，便大叫一声：“有情况！”然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出所料，这时侦察员来报告，说镇河东发现日军六七百人。

叶飞立即和其他几位领导碰头，一个作战方案产生了。他们决定由吴昆带一部兵力，从镇外绕到日军背后；乔信明带一个连正面诱敌，将日军诱入镇口的低洼地；叶飞则带大部兵力，埋伏在低洼地四周，作好伏击准备。

日军见半夜来了游击队，便拼命追击。就这样，乔信明顺手牵羊，全不费工夫，就把日军牵到了低洼地。叶飞见敌人中计，一声喊打。日军如落水之犬，被四周猛烈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一个个无处藏身，全部暴露在新四军的枪口下。结果，日军死伤大半，少数逃出伏击圈的，由于人地生疏，天一放亮，一个个仍旧没有逃出新四军的手心，成为新四军的俘虏。

叶飞审问俘虏，得知这支敌军原是日军驻江阴的佐佐木联队，是奉命去太仓换防的。他们万万没想到在这里遭到新四军的伏击，全部被歼。

这股敌人被歼后，叶飞立刻叫一个俘虏从尸体和俘虏群中寻找佐佐木，却未见佐佐木的影子。叶飞一愣，难道他插翅飞了不成？吴昆不甘心，率一个连兵力四处搜索，终于抓到了藏匿在茅房里的佐佐木。

黄土塘战斗，是“江抗”东进途中一次不小收获。首战告捷，“江抗”名声大振。后来，人民群众才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高兴得个个奔走告。东路的日军、伪军却从此气焰收敛，不敢随便出动，就怕碰上新四军。

黄土塘战斗后，叶飞率部继续东进，在江阴与强学会游击队会合。此时

的“江抗”统一改编为二路：原6团为“江抗”二路，梅光迪部为“江抗”三路，强学会部为“江抗”四路。无一路番号。“江抗”继续前进至望亭、梅村附近。

此时已是6月22日。叶飞心想：“七一”迫近，何不寻机歼敌，打个大胜仗，向党的生日献礼？他将心中的想法告诉梅光迪。经研究决定，派吴昆带一个营与强学会的四路夜袭浒墅关车站。

浒墅关车站是苏州至无锡段的一个小车站。吴昆受命后，立即派周达明及女战士李贯玉化装侦察那里的敌情。

6月24日黄昏时分，叶飞集合队伍，在村外的稻田里进行了简短的动员。然后部队由周达明、李贯玉带路，从梅村出发，乘着朦胧的暮色，直奔浒墅关，白天刚下了一场雨，田间的小道上一步三滑，大家无声无息地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摸黑前进，一路上偶尔看到远处村庄的百姓家里闪烁的点点灯火。12点多钟，他们到达距目的地约半里路的地方。向前看去，四周格外寂静，没有丝毫的喧闹，只有那苍白的探照灯光无目的的闪来闪去，看来敌人已进入了梦乡。叶飞看到一面巨大的太阳旗在房顶上飘摇，感到一种羞辱和愤怒，一挥手，命令部队开始攻击。

突击队在叶飞的号令下，以隐蔽的动作迅速除掉了敌哨兵，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了敌人的兵房。敌人一个个赤身裸体，正在呼呼大睡，做梦也未想到末日在即。这时，攻击部队冲上来了，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敌人顿时乱作一团。刹那间，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残敌拼命向外逃窜。新四军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一串串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兵房起火了，日军万般恐慌。巨大的爆炸声震撼着浒墅关。几乎同时，新四军另一支队伍炸毁了铁路桥，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这时，一列轰鸣而来的敌货车脱轨翻车，滚下河去。凌晨3点多钟，战斗胜利结束。这一仗，前后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江抗”全歼日军120人，并造成铁路停车3天。

夜袭浒墅关战斗结束后，梅光迪说：“经过几个大胜仗，我们已打出了威风，鬼子听到‘江抗’就吓得发抖。群众拥护我们，我们要趁热打铁，多打几个有影响的大胜仗。”

叶飞想了想说：“上海是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城市，我们就在这里闹它个天翻地覆、鸡犬不宁怎么样？”

“好啊！”叶飞的建议博得一片赞同声。接着，几位领导干部坐在一起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

“江抗”向上海挺进。一路上，他们的队伍犹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又收编了常熟的任天石部、青浦的顾复生部。途中，小仗天天有，大仗隔三差五打。他们袭汽车，打汽艇，炸碉堡，拔据点，打得日军晕头转向。

1939年7月下旬的一天，叶飞命令吴昆和营长廖政国率特务连，在青浦观音堂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打死日军50多人。这下惹恼了日本鬼子，他们气急败坏地从上海调来800名日军，分4路围攻吴昆的特务连，欲置“江抗”于死地。特务连一时被困，敌众我寡。怎么办？吴昆决计突围。他组织几个战士向四周甩出数捆手榴弹，然后带着特务连在一片弥漫的烟雾中，杀开一条血路，迅速向东突围。

走出十几里，到了一个有洋房、围墙和大片草坪的地方，他们停了下来。一位向导说，这里是虹桥机场。吴昆一听，不由双眉向上一挑，灵机一动，对廖政国说：“我们已来到敌人心脏，而敌人却毫无察觉。我建议我们顺手

牵羊，来个突然袭击，打它几架飞机，捞个外快，你看如何？”

廖政国觉得他言之有理，表示赞同。

此时，机场周围的伪警察、伪办事员们一个个睡得像死猪。吴昆带着特务连，一枪未放，轻手轻脚地摸进机场。吴昆与廖政国商量说：“周围可能会有鬼子的流动哨，我们不能久留，要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才行。”

“你说得对，机场周围一定防范很严，如果时间长了，惊动了敌人，夜长梦多，对我不利。”廖政国点头说道。

吴昆遂命令一个排炸飞机，剩下的人则随着司务长去仓库拣食品罐头。他交代说，外表花花绿绿的、越小越重的罐头越好。战士们遵他的吩咐，拣回来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些油漆罐。事后，每提起这事，大家都捧腹大笑。

就在吴昆向大家发布命令之时，机场周围响起了机枪声。原来是周围暗堡里的日军听见他们的说话声而开了枪。战士们冒着弹雨向机群丢手榴弹。在一片爆炸声中，敌人的4架飞机起火了，冲天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浓烟滚滚。日军摸不清情况，不知来了多少人，不敢贸然出动，只是躲在暗堡里乱放枪。吴昆带领部队迅速撤离机场。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时，机场已是一片火海，连半个新四军的影子也未寻到。

第二天，租界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新闻均报道了虹桥机场被炸事件。报道中说：“万名‘江抗’夜袭虹桥机场。”这条消息，轰动了上海，茶楼酒家、大街小巷、公园里、电车上，传说纷纭，把“江抗”说得神乎其神。“江抗”的名气越来越大，威震东路。上海的进步青年纷纷赶来参加“江抗”。

驰援半塔集

1940年初，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叶飞奉陈毅命率部过江到达扬中，与管文蔚领导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由管文蔚任司令，叶飞任副司令。不久，挺进纵队开赴扬州附近的吴家桥打鬼子。这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第349旅、独立第6旅、常备第10旅、补第1旅等部，共万余兵力，向路东第5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半塔集地处苏皖5县交界处，是一个山区小镇。驻在这里的新四军第5支队教导大队6个队包括3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1个女生和少年队，约500人。附近还有第10团的两个营、第15团两个营和特务营，约2500余人。其中新战士多，武器装备较差。国民党军分3路向半塔集发起进攻，附近我军驻地均遭受猛烈攻击。

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歼灭敌人。战斗的第一天，第5支队教导大队击退敌人3次进攻，控制了半塔集周围所有制高点，打通了半塔与苏鄂的通路。当晚，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赵后明等领导开会决定：要求部队固守7天以上，以待援军。同时，部署上也作了调整，要已到古城的第10团两个营赶到西高庙，接出特务营，然后向半塔靠拢。

3月22日，敌军围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挥部陈毅给叶飞发电，命令挺进纵队火速前进，增援半塔集。救兵如救火，叶飞接电后，立即和几位领导商量，稍做准备，便于23日率挺纵第1团两个营从吴家桥出发，从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向半塔集驰援。

这段运河正好穿过邵伯湖，周围一片泽国。侦察参谋刘大观率侦察员先行出发，在湖边筹集船只。由于新四军在那一带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渔民船户大力支持，纷纷送来船只，所以部队很快赶到湖畔，上了船，于夜间穿越邵伯湖。

白天，就在部队横跨天扬公路时，正好与 100 余日伪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担任前卫的第 1 团第 1 营分两支人马直插公路，拦头截尾，手榴弹像雨点般落在敌群里。随着猛烈的爆炸声，传来鬼子伪军的哭喊声。战斗进行了约 1 小时，新四军歼日军 1 个小队及伪军 1 个连，俘获日军士兵 1 名。枪声一停，他们连战场都来不及打扫，就急速赶路了。

24 日，叶飞率部队前进到半塔集东南约 20 余里的马集附近。侦察员发现这里驻守的敌人着装不整，叶飞分析是地方部队。于是，抓了个舌头一审，不出所料，原来是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真是冤家路窄。叶飞在苏南和该敌交过手，如今狭路相逢，岂可轻易放过？于是命令部队一个猛冲，攻入集镇，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他们接连攻下三四个村庄，共消灭敌人 1000 余，突破了敌军包围半塔集东南面的缺口。

此时，部队已经两个昼夜连续战斗和急行军。叶飞见部队极度疲劳，便于 25 日命令大家在马集休息一天，并打扫战场。26 日出发，继续向半塔集前进。围攻半塔集的敌主力独立第 6 旅，此时正由竹镇方向向马集攻来。挺纵第 1 团第 6 连连长汤万益向叶飞报告说，在前面的集镇里发现大量国民党军。据抓到的俘虏供认，该部是韩德勤的独立第 6 旅第 13 团和第 16 团，不仅兵员充足，且武器精良，战斗力强，号称“梅兰芳部队”。旅长翁达，中将军衔，狂妄骄横，不可一世。叶飞想，如不消灭该敌，无法解除半塔集之围。于是命令部队展开，向敌进攻。汤万益是贝猛将，以前在战斗中伤了一只眼，人称“汤瞎子”。此时，他一听到冲锋号，立即抱起机枪，带头冲向敌阵。团参谋长廖政国也亲自抱着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发起冲锋。敌军还没弄清情况，就被猛烈的火力打得尸横遍野，四处溃逃。激战 3 小时，新四军击溃敌 1 个营。余敌向竹镇方向溃逃。这时挺纵已从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并与从路西驰援而来的陶勇苏皖支队取得联系。坚守半塔集的我军部队闻援军已到，士气大振，迅速组织反击。

27 日，张云逸、罗炳辉率主力兼程东返，先头部队也已到达半塔集西南 20 千米的张山集。韩德勤见我东、西援军已刊，部队全线动摇，溃败之势已成定局，只好令部队后撤。

29 日，我军休整 3 天后，开始分 3 路全线反击。罗炳辉任前敌指挥，叶飞任副指挥。溃逃的敌军一泻千里。我军一夜之间将敌人追至三河以北。

叶飞增援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开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新四军很快建立了大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 8 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路西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地均成立了联防司令部。

黄桥歼顽

1940 年 8 月，陈毅、粟裕率新四军攻占黄桥，并在当地进行抗日根据地建设。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为阻挠新四军在苏北立足，在东台召开作战会议，部署进攻黄桥计划。他组织了 26 个团约 3 万兵力，分 3 路向黄桥发起攻击。

当时，驻黄桥的新四军部队只有 7000 余人，敌众我寡，还要分兵防御可能援韩的泰兴等地日军，形势十分严峻。在这场抗战以来全国最大规模的反摩擦战役发起前，为对付顽固派的进攻，陈毅、粟裕精心研究了 3 个方案：一是给予韩军重大杀伤后，立即撤出黄桥，乘敌追击时，再集中兵力歼其一路。此计是红军一贯战法，可集中兵力，便于机动，诱敌深入根据地腹部歼灭之。但是，该地区北有运盐河，东有串场河，西有泰州到口岸的运粮河，南有长江，并有泰兴城、靖江城等日寇大据点，回旋余地小。而且，我军撤出黄桥，非但影响民心、士气，对中间派也必将产生极不利的影响。二是全力死守黄桥，待韩军进攻失败后再出击。黄桥西南面有日寇大据点，北面有韩进攻。此种战法，我军腹背受敌，虽可以应付敌人夹攻的严重局面，但以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困难较多。照这种方案，最多只能击溃顽军，而不能歼其主力，而已大大增加中间势力参战攻击我军的可能性。更大的缺点是，苏北问题不能速决，于我军不利。陈毅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案，也就是第三个方案。此方案不是以主要兵力守黄桥，而以少数兵力守黄桥，吸引、迟滞、消灭敌人；主要兵力则置于侧翼机动位置，当敌人遭我军大量杀伤后，择其一路歼灭之，并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全胜。对中间势力稳定其中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部队进行监视。有人担心，这样风险太大。可陈毅认为，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战。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就不可能出现。他诙谐地说：“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了，我们就可大发展；如果失败了，那就算了。”

陈毅的分析说服了众人。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第三个方案。然后，大家研究了具体部署：叶飞的第 1 纵队、王必成的第 2 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由第 2 纵队派出主力老 2 团的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由第 1 纵队派 1 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 3 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

人家决心打好这一仗。叶飞选择敌独立第 6 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是韩德勤所属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一支。一般战斗总是先打弱敌，此次却先打劲旅。叶飞认为，这可收到出奇制胜之效，而且有 3 个好处：假如首战歼灭了独立第 6 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中间立场，将起到重要作用；该旅是韩军中路中的右翼，把它消灭，就把韩军的中路打开了缺口，可实现对韩军的包围与迂回；敌主力首战被歼，必给韩军士气以沉重打击，并起到威慑其他杂牌军的作用，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叶飞认为，首歼独立第 6 旅是有把握的。他们曾在半塔集将该敌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当指战员们听说打独立第 6 旅，信心很足。独立第 6 旅兵力比敌第 89 军的两个师弱得多，首歼该敌可获速胜而不会影响下一步战斗。另外，列阵前进掩护的独立第 6 旅的两李、陈泰运部已和我方有密约，如我军埋伏在这两路之间，背李、陈而击第 6 旅，取胜在即。

10 月 4 日，韩德勤命令部队对黄桥发起进攻。第 89 军打头阵。翁达的独立第 6 旅，因曾被我军教训过而迟迟不敢上。4 日上午，我军黄桥前沿工事以东 300 米处的小焦庄失守。经一个上午的争夺，黄桥东部的发电厂在中午时分也被敌攻占。有些地方，敌已突破镇边的河沟，手榴弹都甩到了黄桥的街头。一直在观望的狡猾的翁达误认为我军败北的局面已定，这时才率领

部队前行。叶飞隐蔽在青纱帐里，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只见独立第6旅呈一路纵队前进，每人一顶笠帽，好不逍遥。叶飞不由得冷笑：翁达这只狐狸，想乘我和第89军两伤之际后发制胜。他以为新四军主力已在黄桥以东拼得两败俱伤，自己趁机直入北门，攫取头功。叶飞见敌人队伍前面是大批的卫队簇拥而行，后面则成一字长蛇阵，不由得一阵兴奋：这种队形不是正便于我军将其切断围歼吗？

叶飞见此时正是运动中歼敌的绝好机会，便立即电话报告陈毅，建议不要等翁达的部队攻到黄桥北门再打，而是立即出击，把其切成几段，一举歼灭。

陈毅回电话说：“一定要看清楚，要等他全部脱离高桥时再出击。”

叶飞举起望远镜，边观察边回答说：“从行军队形的间隔判断，后卫该出高桥了。”

陈毅果断地说：“那就出击。不过，要注意，你一定要照单全收，决不可放跑一个敌人！”

“是！”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命令第1团分3路直插独立第6旅的腹部，第4团打其前卫，第5团打其后卫。刹时间，我军把这条长蛇的躯干斩成几段。独立第6旅局部被歼后，立即收缩到土墩和独立家屋固守，其后卫团猛扑高桥，企图打开退路。此时，高桥已被我第5团先机占领。双方一场血战，敌第18团被打退。第1团团长乔信明看准顽军中有一大群挎皮包、拎箱子的军官，拥着骑马的头头奔跑，判断这是敌旅部，立即率第1营扑上去。接着，第2营也插到敌阵，和第3营配合，攻歼大股大股的顽军。全团3个营分3路插向敌军第16团。这样，独立第6旅首尾被攻，无法展开，被新四军一个猛冲，顿时队伍大乱。

翁达发现新四军向他进攻，相距只1里路，只好率领乱哄哄的旅部奔进一个村庄，慌慌张张地命令架设电台。可是摇机员却不知去向，他只好令通信军官带着卫士、传令兵向第89军军长李守维求援。这时，其他敌人也溃退到其他两个村庄。叶飞见时机成熟，命令第1纵队把这3个村庄团团围住。

8点整，陈毅打电话询问战况，叶飞兴奋地说：“我们正把独立第6旅围在3个村子里呢？”

“太好了，太好了！”电话里传来陈毅激动的声音，“你们和王必成联系上没有？”

“他已向南插，迂回过去了。”

10时左右，陈毅再一次打来电话，问叶飞12点以前能不能解决战斗。叶飞信心十足地回答说：“可以，现在已没有多少敌人了，12点以前完全可以解决。”

“那就好！”陈毅说，“解决战斗后，队伍马上集结，作为2纵队的第二梯队，向南迂回包围，消灭89军。”

午后，独立第6旅被歼，韩军主力第89军完全暴露和孤立了。叶飞率第1纵队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在距离野屋基七八里处的独立家屋设指挥所，随即与第2纵队取得联系，查明敌情。他发现第89军军部正在野屋基，便高兴地一拍大腿，命令部队向野屋基火速前进，发起攻击。

第4团从东南面，第1团从东北面，同时向野屋基进攻。随后，第5团从三里庄向东插去，向东南方向攻击。这一下把第89军军部打得晕头转向。

第89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支柱，是他在苏北最有战斗力

的主力部队，不仅兵力充足，而且武器精良。李守维突然被叶飞部攻击，一阵慌乱后，镇定下来，连忙组织火力拼命抗击。叶纵在野屋基东北的土坝上，顶住了顽军大部队的突击。李守维甚至组织一手快慢机、一手大砍刀的敢死队和时纵进行肉搏拼杀。韩军要突围，机枪子弹如急雨般向叶纵阵地倾泻。

黄昏时分，叶飞在前沿阵地召开会议，提出发起总攻。乔信明、廖政国一致同意他的意见。他们决定趁着夜幕进行近迫作业，挖壕到距离野屋基 200 米时发起攻击。

半夜了，叶飞指挥部队突进野屋基，逐屋争夺，战斗更加激烈。2 时许，李守维终于坚守不住，带着军部仓皇突围。他们溜到挖尺沟河边。这里只有一座小木桥，人马挤成一团，木桥边沿禁不住大队人马践踏而折断了，挤在桥上的人马纷纷落水。这时，担任北面警戒的第 1 团第 3 营向敌开火，敌人又向西边突去。李守维的军部躲避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窑里，一面仓促组织火力掩护，一面驱赶士兵下水，企图泅水过河。第 1 团第 3 营追到河边，向泅渡的敌人猛烈射击。李守维骑着一匹马狼狈逃窜，在人马混乱中抢先过河，因躯体太沉重，身上又带着大量银元，连人带马跌入挖尺沟河中，一命呜呼。

敌不善夜战，加上建制大乱，似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叶飞率指挥所刚从野外坟包丛中移到村头小屋，架起电台，点上蜡烛，打开地图，便听到一片杂乱的脚步声。他探头一看，黑压压的一片人头晃动。他急忙吹灭蜡烛，奔出屋外，才知道自己带着指挥人员和敌人混在了一起。叶飞面临危境而不慌乱，沉着地命令司号长把顽军引到河对面我担架连方向。

司号长心领神会，一声高喊：“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顽军一个个像听话的羊羔，乖乖地跟着他过桥。担架连一下就抓了 500 多俘虏。

李守维的部队仍在野屋基拼死抵抗。叶纵发挥白刃肉搏特长，终于将敌人压倒。溃散之敌在一片“缴枪不杀”、“新四军优待俘虏”的喊杀声中，纷纷缴枪投降。

至此，韩军主力独立第 6 旅和第 89 军被消灭殆尽，其余如保安第 10 旅、保安第 3 旅、保安第 5 旅大部也被我军消灭。

陈毅对叶飞说：“海安是个军事要冲之地，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 4 县顽军和海安以西韩军的联系。如果省主席韩德勤急调生力军来固守海安，我就不易攻克了。那么，黄桥决战就没有取得战略上的全胜。”叶飞领会陈毅的意图，和王必成、陶勇率部向海安方向追击。

10 月 10 日，八路军进抵盐城，新四军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便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胜利会师。

车桥大捷

1944 年 2 月，春节刚过，新四军苏中军区在三仓河边的一个小村里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军区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他说：“同志们，1943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意大利已宣布投降。尤其冬季以来，苏联红军展开强大攻势，德寇已基本退到苏联境外，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小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并遭到中闷敌后各战场军民的沉重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出现了根本转折，中国抗日战场出现了新局面，华中敌后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日寇连连战败，兵力不

足而战场过宽，逼其不得不放弃若干次要点，以相对优势兵力在重点地区‘清乡’、‘清剿’。我苏中3分区、4分区分别取得了反‘清乡’、反‘清剿’的胜利。”他的讲话博得一片掌声。他抬起双手向下按了按，示意大家停下鼓掌，继而话锋一转，严肃地说：“但是，斗争仍然相当艰苦，日军决不甘心失败，妄图依靠大陆作最后挣扎。特别是苏中敌人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局势仍很严峻。敌人据点连据点，斗争复杂，战事频繁，各分区被分割的局面仍没有改变。我根据地不很巩固，拉锯战时有发生。军区和区党委机关连个安身之处也没有，机关的流动给整风、训练干部、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带来很大不便。”

粟裕扫了大家一眼，口气依旧严肃地说：“同志们，乐观不得啊！怎么办？”

台下一片寂静，大家都屏声息气，目不转睛地盯着粟裕。粟裕再次扫视大家一眼，然后右手坚定而有力地一捶桌面，果断地说：“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严重局面！”

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接过他的话茬说：“粟司令说的极是。由于拉锯战，我区党校连个固定校址也没有，今日由张庄搬李庄，明日又从李庄搬到赵庄，这样天天折腾，学员如何能安心上课？”

接着是副师长兼副司令叶飞讲话，他说：“抗日的大好形势是打出来的。我认为，要改变苏中被动局面，必须瞄准战机，积极主动进攻。我建议，近期内我们要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以实际行动迎接大反攻！”

“说得对！”粟裕双眼炯炯放光，坚定地说，“我们只有多打胜仗，打大胜仗，才能扭转局势，改善环境，扩大我军机动范围。”他指着墙上的形势图，又说：“我们说干就干，大家研究一下，选择什么地点作为我们的主攻目标。”然后，他将脸转向大家说：“我建议，这一仗要震动敌人，使局势有个根本改观！”

台下的人被粟裕的情绪所感染，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各谈各的看法。经反复酝酿，最后决定攻打车桥。

车桥是淮安县城东南20千米的一个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明朝末年建镇时，因镇边菊花沟无桥，以水车代桥，故得名车桥。韩德勤于1940年2月被日寇赶到车桥安营扎寨，筑起深沟高垒。1943年春，日伪军“扫荡”，韩部不战自溃，使几十个乡镇、数十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从此，日寇盘踞车桥，又加筑据点53个。城四周的大围子，长1千米，宽0.5千米，高1.5丈。敌人曾口吐狂言：“新四军若打下车桥，我自退出华中！”可见车桥易守难攻。

叶飞在这一带活动过，对此地地形颇为熟悉。他走近挂图，用竹棒指着车桥一带说：“它位于苏中、苏北、淮南、淮北交界的战略机动位置。日伪军占据车桥，分割我苏中（1师）、苏北（3师）、淮南（2师）、淮北（4师）根据地。我们拿下车桥，这4块根据地将连成一片。”他放下竹棒，回到座位上继续说：“驻守车桥的日军是华中派遣军第65师团山泽大队的1个中队，约40余人；伪军是淮海省郝鹏举部的1个团。车桥是华北派遣军第64师团和华中派遣军第65师团的接合部，空隙较大。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两个有利条件。”粟裕接着说，“车桥敌人工事坚固，距新四军活动区远，敌人以为新四军下会攻打车桥，这是我们出其不意攻打车桥

的一利；二是车桥北有我第3师，西有我第2师，我们攻打车桥可得到兄弟师的及时支援。”说完，他低头沉思，半晌才自语道：“只是车桥敌人太少，打得不过瘾。”

“哎，这还不好办！”时飞兴奋地说，“我们何不扩大战场，利用车桥的枪声，打个大仗？”

“对对对！”粟裕恍然大悟，拍拍脑门，激动地连声说道，“我们可以用车桥吸引周围的鬼子，来它个攻点打援！”

粟裕拍拍叶飞的肩头，满意地说：“你的主意不错！”

会议继续进行，又研究了以芦家滩作为打援的地点。

第二天，他们仍继续开会，研究、部署了作战任务。粟裕说：“此仗是场硬仗。车桥的敌人认为车桥固若金汤；而我们要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攻克车桥，还要争取攻坚打援双胜利。为此，我们集中5个团兵力，组成3个纵队。1个纵队攻坚，两个纵队打援。”他抬头看大家没有意见，接着又说：“为了打好这一仗，成立车桥战役野战司令部。我要主持召开区党委扩大会。因此，野战司令部司令由叶飞担任，刘先胜任副司令，夏光为参谋长，张震东为副参谋长。”

叶飞受命后，作了具体布置。他令陶勇率第3旅第7团主攻车桥；廖政国、曾如清率第1旅第1团、第3军分区及泰州独立团负责淮安方向打援；陈挺、李干辉率第18旅第52团和江都高邮独立团负责对曹甸、宝应方向警戒；第4军分区特务团及师教导团第1营为预备队。

会上，叶飞还布置了侦察车桥地形、准备攻坚器材和加强攻坚训练的任务。各部接令后，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参战部队的训练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天色未亮，战士们已开始练习爬城、攻碉堡、巷战及近迫作业；夜晚，战士们凭借微弱的月光，进行瞄准和投弹训练。

侦察车桥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时，车桥镇街头巷尾出现了一些山东口音的商贩和手艺人，有的肩挑货郎担，有的身背棉花弓，有的摆摊吆喝：“卖狗皮膏药喽！祖传的秘方，一贴准灵！”他们在车桥日伪的碉堡周围转来转去，车桥的地形、碉堡的分布和日伪的兵力位置尽收眼底。

车桥战役野战司令部设在离车桥10千米多的收城镇。为确保胜利，叶飞仔细检查各方面准备情况。

淮安县委书记许亚和宝应县委书记曾涛3天前接到第1师打车桥的通知，要求他们做好后勤支前工作。他们立即研究部署，成立了后勤班子，动员群众。他们的口号是：“新四军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他俩来向叶飞汇报准备工作的情况。

许亚在叶飞面前将胸脯拍得咚咚响。他说：“首长放心吧。我们动员了两万民兵，为部队挖掩体，平坟头；1000民工送弹药；还准备了登城云梯100副，船1000只。”

曾涛说：“我们准备了10万斤大米，5万斤蔬菜，200万斤柴草。”

叶飞听后，连声称赞：“了不起，了不起！短短3天，你们做了这么多工作。我代表全体指战员，谢谢父老乡亲们支持。”

许亚连忙笑着说：“不要感谢我们。乡亲们说，新四军来了，帮助我们减租减息，日子好过多了。现在新四军打鬼子，我们老百姓出点人、出点力

是应该的。”

曾涛也说：“是啊，首长如感谢我们，此话就见外了。打车桥是新四军的任务，也是我们的任务。敌人横行霸道，烧杀抢掠，老百姓恨透了日伪军。他们一听打车桥，那情绪不知有多高，纷纷保证，要人出人，要粮出粮！”

叶飞感动得直点头。

3月4日夜晚，月明星稀，叶飞指挥参战部队全部抵达车桥以东的蒋营。从蒋营到车桥，有水、陆两道可行。因为蒋营与车桥中间隔着方圆几十里的马家荡与绿草荡，与陆路相比，水路近约十几里地，所以老百姓一般抄近走水路。叶飞决定取水道而行。战士们披星戴月，纷纷跃上小船。月光下，千帆百柯，静悄悄如离弦之箭，向车桥疾驶。部队很快秘密到达车桥。

战后，日军俘虏石川芳男曾说：“新四军用兵真如神，白天我连一个新四军的影子也没见到，夜间却枪声大作，四面八方尽是新四军，犹如从天而降的大兵天将。”他竖着大拇指说：“神兵，神兵！”

3月5日凌晨1点5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车桥的上空。担任主攻的第7团，在陶勇、彭德清的率领下，兵分两路，泅过宽1.5丈、深七八尺的外壕。沟水结着薄冰，冰冷刺骨。冰块划破了战士们的皮肤，他们全然不顾。转眼间，他们爬上了云梯，翻过了围墙。接着，手榴弹从他们手中飞出，轰隆隆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敌碉堡不是塌顶，就是飞上了半空中。战士们迅速跃身向前冲去。突然从东北角射来一排子弹，几个战士倒下了。冲锋受阻，急坏了团长彭德清。只听他一声吼叫：“飞将军快上！”话音未落，一个腰间挂满手榴弹的战士一跃而起，背着梯子，冒着弹雨，直扑大碉堡。

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飞将军”——第3连战士陈福田。只见他架起云梯，飞身登上大碉堡顶，抡起十字镐，挖开一个小窟窿，8颗手榴弹随之而下。轰隆隆几声巨响过后，碉堡内浓烟翻滚，火光冲天，残存的日军叽哩哇啦一阵乱叫，纷纷外逃。战士们一枪一个，将敌人全部击毙。

西北角的第1连也遇到了麻烦。从大碉堡射出的火舌无情地乱窜，我军冲锋受阻。战士蔡心田不待命令，发挥他“百步穿杨”的神技，随着右手挥动3下，3颗手榴弹已从敌人的枪眼里飞了进去。顿时，机枪哑了，战士们高呼着冲进碉堡，全歼了敌人。

告捷的信号弹此起彼伏。拂晓时刻，陶勇已发射出42颗信号弹。叶飞仰望天空，高兴地说：“打得好，敌人42座碉堡已飞上了天！”

战斗持续到下午2时，车桥只剩下日军的两个小围子。叶飞见我军已稳操胜券，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这时，第7团政治处主任蒋新生匆匆轻步来到叶飞身边，脸上呈现出无限的痛苦与悲伤。他沉痛地报告说：“叶司令，松野党不幸身亡！”

“你说什么？”叶飞瞪大了眼睛，一惊非小。他抓着蒋新生的胳膊，摇晃着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蒋新生低下头，重复一遍说：“松野党牺牲了。”

这时，两个民兵抬着一副担架走来。叶飞急步上前，掀开被子，松野党苍白的面孔出现在叶飞眼前。叶飞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紧握着松野党冰冷的手，心中默默地说：“好兄弟，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他脱下军帽，默送松野党的遗体远会。

松野觉是日本人，生于广岛县宇品。战前是机械厂工人。1940年被骗入

伍，为丸山旅团平间大队押川中队上等兵，在苏中丰利战斗中被我新四军生俘。

当了俘虏的松野党，满脑子日本军国主义，对新四军持敌对态度，用不吃不喝、自杀等行为进行反抗。然而，一件小事，却使顽石般的松野党开了窍，真正了解了新四军，并坚决要求参加新四军。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那是在他被俘后不久，叶飞专程来看望他。当有人介绍这位布衣打扮、笑容可掬的人是副师长时，他不禁愣住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午，叶飞、陶勇邀请他共进午餐。叶飞频频为他挟菜，嘱咐他要多吃一点。松野党真是受宠若惊，一反常态，立起身，向叶飞、陶勇深深地鞠了3个躬，恳切地说：“长官，新四军官兵平等，就凭这点，我要参加新四军！”是啊，在日本军队内，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虐待士兵是家常便饭。松野党当兵3年，哪见过师长、旅长的面？更不要说同桌吃饭了。新四军真诚所至，俘虏兵金石为开。松野党终于找到了真理，走上了为正义而战的道路。此后，他好学上进，积极肯干，严格要求自己，不久便加入了苏中反战联盟支部。每次战斗，他都活跃在最前方。他散发自己编写的文章传单，对碉堡内的日军喊话，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号召日军摆脱武士道精神，放下武器。他积极宣传新四军的俘虏政策。经过他的努力，苏中新四军部队中的日本同志日益增多，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对敌斗争力量。

车桥战役前夕，松野党正身患疾病。敌工部长陈超环劝他不要参战，他却坚决不从。叶飞得知后，下死命令要他养病。松野党无奈，只得怏怏不乐地答应。谁知，在部队出发的晚上，他又出现在队伍中。陈超环半路把他从队伍中“揪”出来。他缠着陈部长苦苦哀求：“为了拯救我的同胞，我无论如何也要上前线。陈部长，你就答应我吧！”

陈超环被他炽热的战斗精神所感动，望着他那张消瘦的脸，无可奈何地同意了他的请求。

松野党到了前线，面对碉堡中的同胞，一遍又一遍地喊话，宣传政策，指明出路。然而，垂死挣扎的敌人回报他的却是密集的子弹。松野党虽爱同胞，热切地希望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可是，他岂能容忍那些杀害新四军的反动分子？他见一个个战士倒在血泊中，怒从心中起，愤怒地从战友手中夺过一支枪，忘记了个人的安危，立起身，“啪啪啪”3枪击中了两个日军。正当他兴奋地推上第四颗子弹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松野党倒下了，他的手中还紧紧地握住那杆枪。

叶飞听完松野党牺牲的经过，大声疾呼：“为松野党报仇！”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负隅顽抗的敌军小土围冲去。

这时，又有3人匆匆而来，他们是第3师参谋长洪学智、第7旅旅长彭明治和政委郭成柱。

原来，第3师师长黄克诚闻讯第1师发动车桥战役，考虑到车桥枪声一响，四周敌据点必定出援。为确保兄弟部队的胜利，他便派参谋长洪学智率第7旅，在车桥北面的沭阳至淮阴公路上，枕戈待旦，监视淮阴、沭阳敌之动静。

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之后，洪学智率第7旅一夜之间攻克朱圩子，拔掉王集据点，牵制了敌人，确保了第1师北面的安全。次日，他们又风尘仆仆，在弥漫的硝烟中，快马加鞭赶到叶飞的指挥部，询问要不要兵力支援。

叶飞被兄弟师的精神所打动，紧紧地握住洪学智的手说：“谢谢你们的支援。请放心，打车桥，打增援，我们还有两个团的机动兵力没用呢！”

洪学智听罢，放下心来。此时，传来一阵阵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洪学智听到这战地“交响乐”，兴冲冲地对叶飞说：“我们3人想去前沿阵地观战，你不反对吧？”

“不行，不行！”叶飞连连摆手说，“那里不安全！”

洪学智笑嘻嘻地说：“前线指挥官同志，我们远道而来，难道参观一下都不行吗？你是不是太小气了！”他打趣地说：“枪声一响，我的心直痒，你不让我过过瘾可不行！再说，什么安全不安全？兴许前线最安全呢！”

叶飞拗不过他，只得叫陶勇陪同他们到车桥镇。

洪学智仔细地观察外壕、围墙、碉堡群后，感叹地说：“敌防御体系如此坚固。这块骨头不好啃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陪同在旁的陶勇脸刷地羞红了。他想起自己以往打仗，历来是速战速决，快刀斩乱麻，一般战斗个把小时就解决了；可是，这一仗已打了十几个小时，车桥仍在敌人手中。他心中本来就不是滋味，再听洪学智这么一说，更感到难为情。他把洪学智一行带到较安全的地方，匆匆找来团长彭德清，如此这般交代一番。彭德清点头应道：“旅长放心！”转身就跑。转眼间，嘹亮的冲锋号响彻上空，战士们端起刺刀，潮水般地冲向敌阵。

车桥战役发起后的当日下午，芦家滩打援战斗也打响了。芦家滩地处车桥以西6000米，南岸有漳河，宽20多米，水流湍急，河岸陡峭；北面是一片草滩，宽约500米，长约1000米，芦苇密布，淤泥过膝；中间为狭窄的口袋形地域。这里是淮安至车桥的必经之地。3月5日拂晓，担任打援的第1旅第1团和第3军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第1营已由第1旅参谋长兼第1团团长廖政国率领，埋伏在此，只等敌援军到来。

廖政国，人称“独臂将军”。1930年参加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战初，任“江抗”二路支队长，挺进上海近郊，夜袭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血战黄土塘。在黄桥战斗中，他失去了右臂。在战场上，他临危不惧，沉着应战，往往化险为夷。每次战斗结束，他总是——探望伤员，通过询问伤情，分析自己指挥的优劣。由于他每战必胜，获得粟裕、叶飞的高度信任。因此，“独臂将军”的后面又加了个“放心将军”的美称。

廖政国率部来到芦家滩，便与政委曾如清研究打援方案。

20分钟后，他们侦察完地形，作战方案也就随之而出。他们分析敌人只能沿公路来援，便指挥战士在韩庄以东的公路上挖了4道工事，并在坟包、公路侧坡、土埂处埋好地雷。直等到下午3点钟，才见远处黄乎乎的一片人马，同时隐约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声

由于电话线被民兵剪断，山泽大佐刚刚得知新四军攻打车桥的消息。他立即将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的日伪军集结于淮安，乘车赶往车桥。第一批7辆卡车行至离芦家滩不远处，山泽大佐在望远镜中窥见公路两侧的新四军工事，便令部队下车隐蔽。日伪军听说有新四军，便纷纷寻找有利地形。他们趴在坟包斜坡上，以为是安全之处，谁知却踩响了新四军埋设的地雷。随着轰隆隆一阵爆炸声，日伪军的残肢断臂飞上半空。敌人伤亡大半，山泽大佐大呼上当。

第二批日军到了，山泽狡诈地眨着小眼，指挥部队下车，向韩庄的新四

军工事冲锋。当他们冲到工事前时，连一个新四军的影子也没看到，只好爬上车继续前进。

不远处，山泽在望远镜中又看到一道工事。他瞅了半天瞅不出什么名堂，便率军小心翼翼地摸索到工事前，仍未见到一个新四

山泽心里一阵嘀咕，胆子大了。于是率领卡车火速前进，向车桥飞驰。当他看到第三道工事时，不再理睬，仍命令部队加速前进。谁知卡车队刚接近工事，轰的一声，车轮飞上了天，车上的日军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日军刚想撤退，两侧新四军的机枪开火了。

山泽这时才知上了新四军“空城计”的当，可是悔之晚矣！来援的日伪军一批批被歼。第二天拂晓，山泽腹部受伤，头发都烧焦了。他被俘后，躺在担架上又气又急，疼痛难忍，一阵声嘶力竭的狂叫之后便断了气。

车桥战役，新四军歼灭日军 460 名，俘虏 24 名；歼灭伪军 800 名。

第二天，叶飞、刘先胜率指挥所进驻凤谷村，粟裕也骑马赶到了。粟裕一下马，机要员就呈上一份电报，原来是陈毅军长从延安发来的贺电。下午，热烈而隆重的祝捷大会在凤谷村召开，军民群情激奋，喜气洋洋。

几天后，新华社从延安发布消息：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攻入涟水。高度赞扬粟裕、叶飞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八路军总部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战史上，是 1944 年以前我军在一次战役中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日本东京大本营却垂头丧气地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当车桥战役获大捷后，在新四军军部里，饶漱石却在生闷气。他腆着肚子在屋里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粟裕、叶飞太目中无人，无组织无纪律，擅自作主，太不像话……”

原来，粟裕、叶飞在发动车桥大战前没向军部请示报告，饶漱石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胜利后，他们才向饶漱石发告捷电报。饶漱石手持电报，气呼呼地说：“粟裕、叶飞发动车桥大战，过早地暴露我军力量，刺激敌人，将会招致敌人的反扑。粟裕、叶飞要负一切责任！”他越想越怕，愤然发电给粟裕、叶飞，严厉指责他们无组织无纪律，要他们作出深刻书面检查。

粟裕接到电报，双眉微微一皱，随之坦然一笑。他将电报递给叶飞等人传阅，叶飞轻松地笑笑说：“乖乖，好大的火气。幸亏事前没汇报，要不然，这一仗是别想打了。”

原来，在发动车桥战役前，当讨论要不要向饶漱石请示时，粟裕与叶飞俩人分析饶漱石的思想状况，认为他绝不会同意打这一仗，因此，他们从抗日的利益出发，向大家解释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了打好这一仗，我们就来个先斩后奏吧。”

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赞扬声中，中央及各地贺电纷纷飞来，饶漱石的指责自然烟消云散了，检讨也不了了之。

车桥战役震动了苏北大地及整个华中敌后地区，敌人闻风丧胆。淮海地区的日军纷纷放弃次要据点，向大据点靠拢，这给新四军歼灭日伪军创造了战机。继车桥战役后，粟裕、叶飞又指挥部队，取得了一系列大小战斗的胜利，收复了曹甸、泾口、泾河镇、周庄、塔儿头、望直港等十余处敌伪重要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大片地区。

苦战宿北

1946年11月，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妄图在军事上取得一次胜利，占领我苏北解放区，割断苏北和山东的联系，遂调集20多个旅的兵力，分4路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精锐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会同整编第69师，共6个半旅兵力，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自宿迁向沐阳、新安进犯；整编第74师、第28师共5个旅兵力，由淮阴向涟水进犯；整编第65师、第25师、第83师共5个旅兵力，由第1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指挥，自东台向盐城、阜宁进犯；第59师及整编第26师、第51师共9个旅的兵力，由峰县、枣庄地区向临沂、郯城进犯。对此，陈毅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5个团），打宿迁来犯之敌，另外3路敌人分别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牵制。

这一仗的第一个关键，是要迅速抢占峰山，控制制高点。峰山标高百余米，为全战场的制高点。敌预第3旅占领后，利用日军原有的壕沟、碉堡，又加筑了地堡，设置了鹿砦。山前是宿新公路，南达晓店子6千米，北距峰山4千米。只有占领峰山，才可控制整个战场。陈毅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山东野战军的第8师。这一仗的第二个关键，是要向敌纵深穿插迂回，实行分割围歼。宿迁进攻之敌是两个整编师，如不能迅速分割这两个师，我军就难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只有实行纵深穿插迂回，分割整编第11师与整编第69师，才可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陈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叶飞。

12月13日，敌整编第11师第118旅沿宿沭公路进占来龙庵，整编第69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子、嶂山镇、峰山、晓店子等地区。

野司下达命令，要求各部采取长距离突然急袭和南北对进策略，右翼部队围歼蔡庄、宋营、刘圩子、罗庄、人和圩地区之敌；左翼首先歼灭进占新店子的敌预第3旅与进占嶂山镇的敌第41旅，得手后乘胜歼灭晓店子的敌整编第69师师部及第60旅，然后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11师。

12月15日，叶飞奉命率第1纵队各部抵达集结地新店子附近。南北对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也基本上进入战役集结地。黄昏，山东野战军突然给叶飞打来电话说，宿迁北犯之敌已向南全线溃退，命令第1纵队迅即向井儿头、曹家集出击，由西向东与第2纵队会合，将敌人在撤退中歼灭，勿让敌退至宿迁城内。

叶飞火速率队出击。他指挥3个旅实行3路穿插。第1旅迅速抢占井儿头，第2旅攻击晓店子，第3旅直插曹家集。叶飞随第2旅行动。这时，第2旅攻击受阻；第1旅到达井儿头、许庄一线，却没发现敌人有溃逃迹象；第3旅以第9团为前卫，越过骆马湖洼地，进至曹家集以西。叶飞仔细观察，觉得情况有异，借着敌人在村中点燃的一堆堆照明柴的火光，他看到敌人正在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叶飞判断，敌人并不是撤退，而是侦察到我军企图后，向后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他看看手表，已是半夜两点钟了，遂果断决定撤回原集结位置。

拂晓时分，叶飞令第1旅、第2旅均撤到指定地点。这时，第3旅在最南面已进入敌军纵深。事关重大，纵队副司令员何克希亲自去传达撤退命令。当他赶到第3旅旅部，才得知第3旅的前卫第8团、第9团由于靠徒步通信，接到命令已是上午8时，无法撤回。叶飞听到这一消息，顿时急出一身冷汗。两个团钻进了敌主力纵深心脏，命运危在旦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叶飞悬着一颗不安的心为这两个团担忧时，他们却在向敌纵深挺进途中俘虏了几个电话架线兵。从俘虏口中得知，曹家集敌军是整编第11师师部及其直属队，第18旅位于曹家集东北，整编第11师师部正向宿迁运动，刚好被他们碰上。他们认为战机难遇，立即由第8团第1营向王圩发起攻击，其余部队占领冯庄、郭庄，阻击来自东北方向之敌。第9团参谋长俞慕耕率部，一举突入曹家集，歼敌工兵营、骑兵营大部，俘敌600余名，并将敌炮兵团击溃；随后又占领了运河桥梁，距敌师指挥所仅二三百米。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摸不清我方情况，不敢妄动。待到天亮敌人发现我军是孤军深入时，调第18旅全力反扑，企图对我反包围。这时，我方的撤退命令已到达。第8团一部迅速占领三台山南侧的许庄，向宿迁、晓店子方向警戒，以控制后撤道路。下午3时，第8团、第9团全部撤出战斗，进入新店子地区集。

16日下午，野司作出歼灭敌整编第69师的总攻部署，要求叶飞率第1纵队由峰山以南、晓店子以北地域楔入敌纵深，在敌整编第69师后方占领阵地，向南向北构筑工事，割裂敌整编第69师和整编第11师的联系，达成战役上的分割包围态势。

能否完成分隔任务，是歼灭敌整编第69师的关键。叶飞以第1旅在前，第2旅在后，打开老虎洞后，直插傅家湖；以第3旅第7团1个营攻占许庄，保障纵队翼侧安全，两个营向南直插，控制三台山高地及以东的张林、蔡林一线阵地。

16日晚，叶飞率第1旅、第2旅借着浓浓夜色和敌人照明柴的火光，在敌占领的村庄间隙中隐蔽穿插。第1旅第2团攻占老虎洞，第1团攻占高庄，打开缺口，楔入敌阵，前锋直指傅家湖。第2旅第4团包围了罗庄之敌，第6团控制了老虎洞阵地。第3旅第7团从老虎洞西南地区楔入，攻占了店子以北的许庄，随后以第3营转入防御，第1营、第2营利用拂晓前的浓雾作掩护，继续隐蔽猛插，攻占了张林、蔡林、三台山、高家洼。至此，叶飞的第1纵队经一夜穿插，完成了对敌整编第11师和整编第69师的战役分割任务，也完成了对敌预第3旅与第60旅、第41旅的战术分割任务。

此时，第2纵队向西进占苗庄、李圩；第9纵队攻占了人和圩东北李庄；8师进至仇庄，准备对晓店子之敌发动攻击。

叶飞的第1纵队楔入敌纵深，夺取了十几个村庄，控制了一块长约六七千米，宽约一二千米的三角地带，构成了向北、向西、向东南的三面防御，给敌以严重威胁。但是，第1纵队因此而三面受敌，西有晓店子的敌预第3旅，北有敌第60旅、第41旅，南有整编第11师的3个旅。第1纵队面临着阻敌预第3旅与第60旅东西相靠或南逃以及堵敌整编第11师北援的艰巨任务。

这时，野司令他们撤出阵地。叶飞想，面临敌三面夹击，白天是无论如何也撤不出去的，只有坚持到夜幕降临再作打算。在这情况危急之时，他召集3个旅的领导开会，进行部署。他看看手表，离天黑还有4个小时。他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我们要坚持4个小时，就必须确保高家洼、沈庄这个阵地。如果做不到，我们将全部被敌夹击，撼动全局。”为确保高家洼、沈庄这两个最后阵地，他急调第6团第3营驰援高家洼的第7团。然后又令各部除留少数人警戒外，一律在战壕里睡觉，养精蓄锐，准备黄昏时冲出包围。

第7团固守的最后阵地是座小山，东西只有1千米，南北不足2千米。第3旅参谋长谢忠良指挥该团。叶飞下令，要他无论如何必须死守。他表示：“人在阵地在。”

敌整编第11师第118旅步兵在12架飞机和榴弹炮团火力掩护下，向我军张林、高家洼阵地发起多次猛烈的集团冲锋，致使阵地上的工事大部被摧毁。同时，敌又以1个营自张林、高家洼之间楔入，猛攻我沈庄阵地，企图打通与晓店子的联系。北面的敌军第6旅企图与北援的整编第11师打通联系。晓店子敌预第3旅也数次北犯我许庄阵地，企图封锁老虎洞缺口，断我通路，陷我于绝境。第1纵队三面受敌，战斗引向最后阵地。叶飞在望远镜里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15时30分，第7团只剩下最后的阵地了，但离突围时间还差两个小时，局势十分严峻。叶飞当机立断，决定提前1个小时出击。命令一下，第1旅、第2旅排成连方队，端起刺刀，向敌翼侧猛烈冲击。突击部队以锐不可挡之势，以一当十，杀入敌阵。敌整编第11师在第1纵队突然猛烈的反击下，全线溃退。叶飞乘胜指挥部队奋勇追击，直到唐湖地域，逼近宿迁运河边。

谁知，北面敌整编第69师乘此机南窜。叶飞见状，立即命令第1旅和第2旅停止追击整编第11师，迂回包围整编第69师一部。我军把敌人全部兜住，歼于田野。

叶飞将这个意外的胜利消息报告给野司时，大家十分高兴。陈毅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17日午夜，友邻第8师攻占了晓店子，全歼守敌预第3旅。敌整编第69师残部集结于人和圩、罗庄、苗庄各地。18日，叶飞的第1纵队和其他部队密切协作，全歼敌第69师，完成了原定的任务。敌第69师师长戴之奇自杀。宿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3万余人。

宿北之役，开创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全歼敌1个整编师的战例。陈毅为此赋诗一首：

敌到运河曲，试看峰山下。
聚歼夫何疑？埋了戴之奇。

虎口拔牙

1947年2月莱芜战役结束后，叶飞率第1纵队在张店、周村、淄川各地之间休整。

蒋介石在莱芜战役失败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而且在兵力部署和战术上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山东战场，敌人用于进攻华东野战军的兵力60个旅，共45万余人，组成第1兵团、第2兵团、第3兵团，采取密集队形，齐头并进，从南面、西南面扑向沂蒙山区。在兵力部署上，敌人将13个一二等的主力部队都摆在第一线。一等主力部队第5军、第11师、第74师都摆在第一线的中央位置，右翼为第7军和第48师，左翼为第75师和第85师。尤其第74师，更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其右翼有第83师，左翼有第25师。据说，这个部署，蒋介石和陈诚都十分满意，被称作为“硬胡桃”、“烂葡萄”战术。所谓“硬胡桃”，指的是第5军、第11师、第74师，都配置在中央位置，排成一线，互相靠近，守望相助，万无一失。“烂葡萄”指的是摆在翼侧的次等部队，一旦受到我军攻击，他们便把这些

“烂葡萄”塞上去打一阵，然后将“硬胡桃”拉出来，以图一举获胜。这是蒋、陈惯用的“舍杂牌，保嫡系”的把戏。

陈毅、粟裕根据敌人的这一兵力部署，决定将主力后退一步，佯装惧怕，尔后集中兵力歼其一路。这一着果然使敌上当。敌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以为我军后撤是无力作战。他求胜心切，一反常态，改变了稳扎稳打的部署，不等其他兵团进入预定位置，于5月11日急不可待地令其第74师、第25师从垛庄、桃墟地区向坦埠前进。他限令第74师于12日攻占坦埠；令第83师向马牧池方向进攻，掩护第74师右翼；令第65师担任蒙阴的防守任务，其主力集结于青驼寺，担任第1兵团的预备队。这样，敌第1兵团的几个一线部队，已全面向北推进，位置比较突出，形成了第1兵团与我华东野战军单独作战的姿态。

5月16日，敌第25师1个旅占领黄斗山顶；第74师占重山、艾山一线，其一部渡过汶河攻击我第9纵队杨家寨、孤山阵地，被我第9纵队击退；第83师攻占孙祖；第7军一部向沂水方向前进。11日晚，华野司令部查明敌第74师最为突出，认为首先将其歼灭更为有利，于是立即命令各部停止执行原定先打第7军和第48师的计划。正在向东调动的各部队遂停止行动，返回原地待命。

在部署围歼第74师的作战会议上，陈毅把华野歼灭第74师的部署概括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他说，要取这颗“上将首级”，就要把这个“上将”从百万军中剝割出来，然后再攻上去；另一方面还要挡住外围敌人的增援。的确，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必须经过一番苦战。要把敌整编第74师剝割出来，就需要一支部队楔入敌人纵深，切断敌整编第74师和敌整编第25师的联系，开始，他们打算使用第8纵队，后考虑再三，担心第8纵队路程远，难以进入预期攻击位置，而且第8纵队很少担任这种任务。于是，谭震林提出由叶飞的第1纵队承担此任。陈毅和粟裕也觉得这个意见好。当时，叶飞没参加这次会议，只好由第1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副司令何克希表态受领任务。可是，他俩却不敢表态，理由是原部署没有第1纵队的任务，因而没有准备。会后，陈毅只好叫他俩向叶飞汇报，请叶飞来指挥部。

此时，虽是战云密布，但因为没有了第1纵队的任务，叶飞的确感觉轻松，正在和别人下围棋。听了谭、何的汇报，他将围棋一推，跨上战马，直奔华野指挥部。指挥部里，陈、粟、谭都在。谭震林一见到叶飞便笑着说：“啊呀，你这个‘梅兰芳’不登台，我们这个戏还不好开场嘞！”

粟裕向叶飞招招手，站在地图前向他讲了整个部署：第1纵队为右翼迂回攻击部队，主力自旧寨以西楔入，割裂敌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25师之联系，然后配合友邻部队围歼敌整编第74师；另以一部阻截蒙阴敌整编第65师东援。第8纵队为左翼攻击部队。第9纵队为左翼迂回攻击部队，与第8纵队会师于垛庄，后继续向孟良崮攻击。第6纵队自鲁南进入垛庄、青驼寺之线，断敌后路。第4纵队于正面先阻敌北犯，待其他纵队完成对敌迂回分割后，合力向南出击。其余部队分别阻击和拖住增援之敌。

这时陈毅插话，讲了使用第1纵队的原因。他问叶飞：“你看怎么样啊？”

叶飞想了一下，回答说：“既然如此，我们就承担这个任务。但是，我们打宿北、鲁南、莱芜后，确实太疲劳，也没有思想准备。”

陈毅严肃地说：“总之，任务十分艰苦，责任非常重大，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你们完不成这个任务，整个战役部署就完了。我们已把独立师加强

你们1纵，你就有4个师的兵力了。你们的战斗作风是好的，是可以信赖的。”

独立师是指由中原突围到华中的原中原军区第13旅（皮定均旅），莱芜战役后列入第1纵队建制。

叶飞听了陈毅和粟裕的讲话，感到此役关系到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局胜败，第1纵队责无旁贷，便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回到第1纵队，叶飞见4个师的领导都在等着他。他们听到有仗打，二话没说，只等具体命令。独立师的方升普师长，是个久经征战的战将，听说有重要任务，急得跃跃欲试，要求立新功。叶飞和大家交换意见后，用红铅笔沿沂蒙公路一划，地图上出现了一条弧线。叶飞指着这条线说：“同志们，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一定要分割敌整编第74师和整编第25师，并从中间穿插过去。具体部署是：以第1师攻取塔山、尧山，打掉敌整编第25师的牙齿，割断他们和敌整编第74师的联系，并阻击敌整编第65师东援；以第3师为第2梯队；第2师、独立师归第2师师长刘飞指挥，从这个口子向纵深穿插，与友邻会师后，全力攻击孟良崮。”叶飞看了看何克希和谭启龙，然后宣布说：“我带领第1、3师，何副司令员、谭副政委随第2师、独立师行动。”说罢，他扫视一下大家，大声地问道：“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大家异口同声。

5月13日，叶飞命令纵队政治部印发了野司首长来电和自行拟订的动员口号。他又亲临部队，了解部队情况。见战士们个个斗志昂扬，走起路来脚步声都是那么铿锵有力，他十分高兴。

13日黄昏，战斗打响了。叶飞赶到老鼠峪子，督促第2师、独立师前进。就在第1纵队向前开进时，敌整编第74师也正向孟良崮开进。两军靠得很近，双方几乎都能看到对方在运动。敌人在山岗，第1纵队在山坡。第1纵队知道对方是谁；而对方却不知道山坡上是第1纵队，还以为他们的友邻整编第25师。因此，敌人不吆喝口令，也不向第1纵队打枪。当时，暮霭浓重，能见度很低。但是，叶飞知道，这时决不能掉以轻心，让敌发现是我军，我们的处境就十分危险了。所以，第1纵队必须保持快速行进，决不能停下来。这时，谭启龙从第2师打来电话，报告说第2师师长刘飞把第6团的1个营带进了山口，其余部队在重山山口遭到宫庄敌人和空中炮火的阻击，前进不得。

叶飞一听，立即下了一道死命令：“不要理会敌人，继续前进！”

不久，刘飞向叶飞报告说，把敌整编第25师的阻击部队打垮了，第4团、第5团和独立师都穿插带进来了。

这时，第1师攻占了塔山、尧山，第1纵队遂完成了穿插分割任务。14日2时，独立师攻占天马山和界牌。但第8纵队因路远未能赶到与第1纵队会师。天色放亮时，叶飞从报话机上侦听到敌整编第74师各部都在行动，估计他们可能想恢复与整编第25师的联系，也可能是想迅速撤向孟良崮。上午9时，野司指挥部指示，要第1纵队独立师和第2师不顾一切猛攻孟良崮，除1个团在正面阻击敌整编第25师外，其他5个团全力攻击。当时，敌整编第74师已后撤，我第8纵、第9纵队不可能赶到，而第6纵队也要第二天才能赶到。我军只有攻占孟良崮才能阻住敌人。因此，叶飞命令第1师留下1个次要团守备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其余两个团和第3师攻击前进。下午3时，从报话机侦听到敌整编第74师率3个旅已到达孟良崮。这样，攻占孟良崮已

不是1个纵队所能完成的任务了。叶飞立即向陈毅发电报建议：敌已占孟良崮，且我大量部队已攻占界牌及垛庄并向西前进，情况已起变化，宜采取围攻。

野战军指挥部电示第1纵队：暂停对孟良崮的攻击。

14日一整天，战斗十分激烈。塔山、尧山我阵地被敌重占，后又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亦不时告急。蒋介石得战报后，亲自指挥督战。敌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狂妄至极，提出要坚守孟良崮，以他为“磨心”拖住我军四面围攻，企图“碾”碎叶飞的第1纵队。于是，蒋介石严令敌整编第25师、整编第65师、整编第83师和第5军等部，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第1纵队遭到敌军迭次进攻，血战竟日，阵地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15日拂晓，独立师第1团和第2师第6团夺回了230高地和285高地，重占围攻孟良崮的有利阵地。此时，好消息接踵而来，其他友邻部队亦进逼孟良崮：第9纵队攻占孟良崮高地一处，第8纵队正围攻卢山，第6纵队已进抵垛庄，第4纵队前锋直逼520高地。但是，敌各路部队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也不断向我军进逼，情况又趋于紧急。敌整编第74师被我各路大军压缩于孟良崮荒山后，在各路进援部队的呼应下，企图以第58旅掩护其向西南突围。叶飞获悉后，即令第1师第1团进抵北庄，第2师第4团进抵石王河集结，以截敌突围之路。张灵甫发觉后路已被我切断，遂改为固守孟良崮及其以西的600、540、520高地，坚守待援。

这时，陈毅给叶飞打来电话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敌整编第74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10个整编师已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敌整编第74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就没有指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边作战。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

叶飞将陈毅的指示传达给大家后，纵队的几位领导都感到身上担子太重，也感到两面作战兵力不够。叶飞下决心说：“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一面挡住‘百万大军’，一面取‘上将首级’！我们一定要做到！”

叶飞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接着，他们研究了具体部署。叶飞抓起电话，亲自向各师交代任务，并将第1师师长廖政国找来。叶飞对他说：“我把主力部队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只留给你从地方上刚升级的3团、9团，加上你师2团，扼守60多公里的阵地，挡住敌人两个整编师，保证主力拿下孟良崮。你看行么？”

廖政国用坚定的口气回答了叶飞的询问，去执行任务了。

敌人不顾遍地遗尸，继续成群结队地往我阵地上拥，炮火猛烈。中午，三山店、交界墩我阻击部队伤亡殆尽，阵地被敌人强占。下午4时，界牌又被敌人占领。随后，我军天马山、覆浮山、蛤蟆崮全线告急，敌人已攻上天马山的山腰。接着，部队与指挥所失去了联系。

叶飞见部队伤亡很大，手中的预备队都打光了，临时调部队又来不及，急得团团转。怎么办呢？就在他手足无措之时，接到了廖政国的电话：“我们已将敌人击退，天马山阵地稳定。”他告诉叶飞，就在天马山危急之时，第4纵队第28团的1个营正奉命往孟良崮飞驰，他命令该营营长服从自己指挥，急援天马山。他指着硝烟弥漫的天马山说，天马山阵地的得失，关系全局的胜败，如果敌人打通了联系，我军全盘皆输。那个营长听到此话，点头

说：“好吧，为了整体利益，我执行你的命令！”随即率部队赶到天马山，和守军一起将敌击退，巩固了大马山阵地。

15日晚10时左右，陈毅接通了叶飞的电话，他说：“敌整编第9师、整编第11师已靠近蒙阴，第5军已到新泰，整编第64师到了青驼寺。如果明天拂晓前不能全歼敌整编第74师，我军将陷入敌人的重围。”接着是较长时间的沉默。形势严峻，叶飞心急如焚。陈毅接着又说：“叶飞啊！这场战斗是虎口里拔牙，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编第74师，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陈毅在电话中授权叶飞统一指挥第1、4、6、9纵队，总攻孟良崮。他命令叶飞，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粟裕从陈毅手中拿过电话，问叶飞说：“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好总攻？”

叶飞想了一下，回答说：“需要两个小时，下半夜1点钟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4纵、6纵接通了电话，只是9纵一时还没有联系上，请总部通知他们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1时，总攻开始，各纵配合默契。2时，第1师第1团，第2师第4、6团，独立师第1、3团与友邻第4纵队所部，攻占了520、540一线高地；第6团又配合出击，拂晓时分占领了附近山头。

总攻开始不久，野战军首长十分关注，几乎每隔5分钟就打一次电话，询问战况。战斗激烈空前，情况瞬息万变，叶飞指挥所的电话铃声不断。

在我强大攻势下，敌整编第74师频频告急。西面之敌整编第65师、整编第25师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冒死支援。敌我双方呈拉锯式反复争夺。最后，我军终于挡住了敌人的进攻。

5月16日拂晓，各路大军云集前线，在叶飞的统一指挥下，万众一心，直取孟良崮。强大的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就像是火山爆发。下午4时，敌整编第74师终被全歼，山谷里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顽固而狂妄至极的国民党军中将张灵甫终于惨败在我军手中，陈毅取“上将”首级的心愿也达到了。

鲁南突围

孟良崮战役后，进犯鲁中的国民党军全线溃退。6月25日，敌人整整休整了40天之后，稍稍恢复了元气，便以32个旅，共24万余人，向我沂蒙山区进犯。陈毅、粟裕根据敌人动向，立即决定采取正面阻击、两翼出击的战法。由野司直接率4个纵队阻敌前进；右路兵团3个纵队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出击鲁西敌后；左路兵团第1、4纵队由叶飞统一指挥，出击鲁南敌后。

6月28日，叶飞率第1、4纵队浩浩荡荡向鲁南开进。时值雨季，一阵阵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河水暴涨。经500里急行军抵达鲁南时，这里已是一片泽国。这一带老百姓十分贫困，每每敲开门后，见到的总是空荡荡的破屋。部队找不到粮食，只好饿着肚子，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部队仍积极寻机歼敌。7月1日，第4纵队攻击费县；7日，第1纵队攻克峄县、枣庄，威胁徐州、台儿庄之敌。这时，敌人弄不清华野的所在地，见鲁南枪声不断，误以为华野主力到了鲁南，于是急忙调第5军、第7军、整编第57师等7个师兵力，回援鲁南。华野首长原打算将第1、4纵调往鲁南，而主力放在北线的南麻、临朐进攻，一旦得手，便南北夹击。谁知由于连日暴雨，北线部队在反击敌整编第11师、整编第8师时打得不理想；

而此时的鲁南也是连降大雨，大小河沟水位暴涨，兰陵以南地势低洼，一片汪洋，交通断绝，北进困难。这样，不仅没有达到南北夹击的战役意图，反被敌人抓住我华野两个主力纵队孤悬鲁南敌后这一弱点。敌人在电报中称我第1纵队为“面包”，称第4纵队为“西瓜”。他们认为，前击第1、4纵队的是5个整编师，后续欧震兵团的3个整编师也即将赶到，南面的台儿庄、运河一线又有冯治安部两个军，新四军要想突出他们的重围是天方夜谭，这“面包”和“西瓜”他们是稳吃了。蒋介石更是手舞足蹈，要亲自指挥，报孟良崮“王牌军”被歼之仇。

陈毅和粟裕也为第1、4纵队的安危担忧，他们在电文中指示说：“以插回蒙山争取东返会师为行动方针。”如果在枣庄地区或兰陵地区，“应有决心在鲁西地区机动转移一时期，打一两胜仗，不过早暴露东返企图”；如果在峰枣地区，则可派1个师“引敌人向西北，你们才能迅速向东”。并问：“能否分出1个到两个师协同鲁南地方武装开展局面，使主力隐蔽在适当地点，然后于适当时机突然向东或东北经费县以西地区回蒙山。”他们为叶飞设想了东返会师的不同方案，同时又指出：“总之，靠你们机断处理。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均诸考虑实施，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

叶飞手捧陈毅和粟裕的电报，站在地图前，脑子里飞快地思考着。他认为，向北、向南突围行不通，那里有敌重兵把守；向西则是津浦线，敌人正在调动，准备对我拦截。最后，他考虑只有向东北渡沂河，然后跃入沂蒙山。但是，当时山洪暴发，沂河水位猛涨，河上没有桥，如何渡河呢？虽说沂河水暴涨暴落，但一时也难以退尽。时间就是生命，战场瞬息万变，一分之差，也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叶飞和陶勇商量，决定向鲁西南突围。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就可与我第3、8、10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会合。可是，向鲁西南突围谈何容易？

第1、4纵队陷入困境的消息，惊动了延安总部，他们及时给叶飞发来情报，为叶飞提供敌情。总部并不知道，由于叶飞的电台主任秦基及时准确地破译了敌军的电文，他们发来的情报叶飞早一天就已掌握。

叶飞根据敌情判断，国民党军全力防第1、4纵队向东突围，因此兵力主要集中在鲁南地区。于是，他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以一部向东佯动，给敌人造成错觉，引敌东去。这样，第1、4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就可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要达到这一目的，引敌向东的部队必须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这支部队在敌人的重围之中，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派谁担任这个艰巨的任务呢？陶勇建议派第4纵队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彭德清师即第10师，是第4纵队的主力。叶飞考虑到该师只有两个团，兵力不足，便派第1师参谋长余光茂率第3团加强该师。

7月24日，叶飞指挥部队故意向东行动，直逼向城，与敌整编第7师、整编第48师激战终日。敌人果然中计，立即调整部署。26日，敌伞兵纵队自台儿庄进占峰县，敌第33军一部进占齐村，一齐向东压来。彭德清师与敌纠缠后，乘天还没黑，就有意大张旗鼓地向东行动，向沂河前进。敌人上当了，对彭德清师穷追不舍。叶飞立即率主力西进，以第1师为前卫，在距敌军5千米外疾速前进，进占齐村西北7千米的要隘山下，掩护全军通过。28日晚，第1、4纵队于滕县以南冒着倾盆大雨，跨越津浦铁路。此时，我军已与追击的敌人拉开了整整一天的路程。

天色放亮后，敌人才发现中计，遂放弃彭德清师不迫，掉头去追第1、4纵队主力。可是，谈何容易？我军6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由于敌人改变部署，放弃追击彭德清师，该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第1、4纵队跨越津浦铁路，到达独山湖。这里是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无遮无挡，全部暴露在敌机之下，任由敌机疯狂扫射。由于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指战员们赤脚在水荡和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我军粮秣无着。还到处散布着地主还乡团的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飞来流弹。部队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也遭到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有一次过河，水流湍急，谭后龙骑的马力气小，加上过度疲劳，一个浪头打来，连人带马都给冲走了。刚巧叶飞在一边，顺手一把拉住，否则他就可能“去见马克思”了。部队十分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劳程度是难以形容的。战士们倒在路边的泥坑里就可能呼呼大睡，炮弹和炸弹都震不醒他们。女同志的艰苦就更无法说了。政治部、后勤部、野政文工团的女同志们，徒涉滕县以西的沙河和独山湖边水荡时，个子矮小的就遭了殃。幸有随军的胶东民工担架团的大汉们把她们挟着背着，她们虽然免不了喝几口水，但终于到达彼岸。只见一个个憔悴不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令人目不忍睹。但她们仍勇往直前。

7月28日晚，第1、4纵队冒着大雨，跨越津浦铁路。29日，因沙河水位暴涨，北上受阻。30日，敌欧震兵团的整编第75师、85师、57师自滕县西犯，堵我北上之路，企图将我军压缩于独山湖以东狭小地区后，加以围歼。叶飞命令第2师先抢占休城东北的战家河，其余部队于白天冒着敌机的轮番扫射和轰炸，分路徒涉沙何等3条急流。此时，敌已抵沙河东岸，与我第2师隔河对战。当晚，叶飞率部队开进，敌仍尾随追击。第4纵队第12师抢占大古村一线高地，掩护其余部队向西北挺进。我后卫第1师接替该高地时，敌整编57师趁隙占领，经第1师猛烈攻击后夺回。31日，第1师阵地整天为敌猛攻，虽数度告急，但敌未能得逞。入晚，叶飞率领部队继续北上。第1师扼守郭里集东北的王山、卧牛山一线，以掩护全军通过郭里集至马坡一段水阔8里、深及胸部的泛滥地带。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机会，攻击更为猛烈。第1纵队扼守王山的第1团第9连的1个排，英勇奋战，伤亡殆尽。8月1日，叶飞率部队白天行进，通过泗河，终于在我军建军纪念日与右路陈、唐兵团胜利会师。

策划起义

济南战役后，叶飞因患黑热病不得不到济南治疗，因此未能参加淮海战役。为此，他心里一直觉得很遗憾。淮海战役后，叶飞病愈归队。这时，华东野战军正在进行统一整编，叶飞被任命为第10兵团司令员，肩负指挥3个军横渡长江的重任。

第10兵团指挥所设在泰州。1949年4月的泰州，正是春暖花开季节，乡间小路边芳草葱茏，黄莺的啼叫声悦耳动人。肩负重任的叶飞却无心观赏这大自然的美景。此时此刻，他满头满脑想的全是渡江。渡江作战的最大困难是战线长，江面宽。叶飞考虑，渡江点选东面，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选在西面，又靠南京太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江阴要塞掌握在敌人手里，对我军渡江极为不利；而一旦我军

掌握这个要塞，则对整个渡江战役都起积极作用。

江阴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宽仅 1500 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这里又是向南、向东发展的有利地区，倚江据险，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防守重镇。宋朝南渡后置营寨于城北，设军州，为战守要地。明代是防歼倭寇的战场。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德国克虏伯工厂购置大炮，建立炮台。日军侵华时，因从正面夺取江阴比较困难，是由无锡从陆地迂回夺取的。如今，这里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1949 年初，国民党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前来视察。4 月 17 日，李延年还陪同美军顾问团的头目来此出谋划策，以加强防守。

江阴要塞虽是我军最理想的登陆点，但国民党对这里统治也很严。怎么办？如果能在江阴要塞组织起义，这对夺取要塞，打开国民党和长江防线能起很大作用。叶飞的想法和上级领导不谋而合。华野首长立即把江阴要塞我地下组织的关系交给叶飞。1947 年初，华中工委就通过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部长唐君照，与他在江阴要塞国民党军中任职的两个弟弟（一个是江阴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另一个是工兵营长唐秉煜）及其表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党小组，并在江阴城内建立了联络站，工作很有基础。要塞各部门已被我地下党掌握，要塞司令戴戎光实际上已被架空。叶飞将掌握这一关系的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科长王澄明接到兵团部，和韦国清政委一起听取了他的汇报。王澄明有丰富的敌工工作经验，在济南战役中策划吴化文起义的工作就做得相当出色。叶飞严肃地说：“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 60 里防区，控制三至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知道了。”王澄明认真地点点头。

叶飞又向他强调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他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可跟这些人讲：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在领导关系上，通知要塞地下党同志，起义工作由你管，你对兵团党委负责。”

王澄明说：“司令员，是否派些干部去，把要塞的关键部门直接掌握起来？”

叶飞和韦国清研究后决定，由第 29 军派团长李干及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 4 位同志去江阴，由政治交通员吴铭带路，由唐秉琳等作具体安排。

4 月 15 日，王澄明来信报告了安排情况，并请求下一步行动。叶飞复信写道：

澄明同志，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 20 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以后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是要在行动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无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

此致

敬礼

叶飞 1949 年 4 月 15 日

4月18日晚，王澄明由江南工委护送到江阴要塞，作好了起义的准备。21日零时刚过，渡江先头部队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在接应同志的带领下，迅速击溃了敌第21军一部，控制了长山；另一路先头部队也在肖山顺利登陆。2时，要塞地下党组织逮捕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晚上，八圩港敌第21军与要塞敌人争吵不休，八圩港之敌骂要塞炮兵不打我军，反打他们连联络的电话线杆都打断了。叶飞得知这一情况，会心地笑了，脸上充满胜利的自信，心想：“行了！”果然，江阴要塞在总台长唐秉琳、流动炮团工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和吴广文率领下宣布起义，调转炮口配合我军作战。我大军胜利渡过长江。

解放上海

1949年4月，叶飞指挥第10兵团渡过长江，解放了苏南大片土地，主力直逼上海。兵团司令部设在武进，准备解放上海。华野司令部很快下达了解放上海的作战方案。方案确定，我军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先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其具体部署是：第10兵团指挥第26、29、33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由常熟、苏州地区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攻击前进，歼灭该区守军，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截断敌海上通路，尔后由西北向市区进攻。第9兵团指挥第20、27、30、31军及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首先以两个军由南汇、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10兵团封锁吴淞口；其余两个军集结于松江以南和嘉兴及其以东地区，待机攻占吴淞口、青浦；尔后该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10兵团会攻上海市区，战前，各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组织部队整训，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制定具体规定，要求在市区作战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急调了5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拟订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并筹集了大量粮食和煤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秘密组织大批纠察队护厂护校，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各部按战役计划分别向上海外围守军发起攻击。至14日，第9兵团先后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及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守军侧背。汤恩伯被迫由市区抽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加强防御。第10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守军发动猛攻。国民党军依托钢骨水泥碉堡群，在海军舰炮和空军的支援下，实施连续反冲击。15日，敌又将第21军及第99师自市区调至月浦、杨行、刘行加强防御，使我军进攻受阻。

叶飞根据总前委指示，打电话给各军，叫他们不要性急，应立于主动地位，作好充分准备，以战胜钢骨水泥工事。他还下达战术指示，要求部队吸取教训，总结攻克钢骨水泥地堡群的经验，加强阵前侦察，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施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碉堡，从而加速了战斗进程。至19日，第10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和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地区的国民党军。第9兵团攻占川沙、周浦，并割断了敌人与浦东市区第37军的联系，与第10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该军依托高桥濒江依海、三面环水、地域狭

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配合下，频繁反击，与我军展开激烈争夺战。23日，第三野战军特纵的远射程炮兵配合第10兵团，对高桥东北海面的国民党军舰进行炮击。敌舰被击中7艘，其余逃窜。至此，我军封锁了高桥以东海面，将守军主力压缩在吴淞口两侧地区，为攻取市区、歼灭守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10兵团进攻速度很快，但随着接近市区困难越来越多。首先是地域狭窄，部队展不开，每攻一点，费时较大。其次是守军战线缩短，兵力集中。因此，部队暂与敌人形成对峙状态。

叶飞深入到部队，与干部战士座谈讨论。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从正面发起攻击较好。但是，正面发起攻击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敌人锐气过盛，增加我攻击难度；太迟，敌人将破坏城市。因此，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而尚未对城市实施破坏之时。

5月23日上午，汤恩伯集中5个团在金家桥反击失败后，心灰意冷，下令总撤退。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把指挥所迁到吴淞要塞炮台上；汤恩伯也把其司令部搬上军舰，随时准备逃跑。

华野司令部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时飞。叶飞于23日晚命令第10兵团发起进攻。不久，第29军攻占月浦南郊高地，第28军逼近吴淞口，第31军逼近高桥，24日，第10兵团潮水般向宝山、吴淞口方向涌去。25日，第10兵团又攻克高桥，攻占吴淞、宝山；第9兵团强渡苏州河，占领河北市区。此时，守军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部投诚，上海全部解放。

提前入闽

解放上海的枪声一停，陈毅便派人将叶飞召去，对他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来电报，要我们准备提早入闽，争取在6、7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夺取厦门。”

叶飞睁大眼睛问道：“原来中央不是说好解放福州是1950年的任务吗？怎么提早了一年？”

陈毅笑了起来，双手叉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然后停在叶飞面前说：“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啊！”接着，他回答了叶飞的疑问。提早入闽的方针，是毛泽东的最新决策。毛泽东对于解放全中国早有通盘考虑。原定由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协力解放东南一带，于1949年秋冬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地区，1950年再解放福建全省。但淮海战役后，形势的发展比预想的快，百万雄师突破长江防线，全歼南京守敌，国民党主力汤恩伯集团抵挡不住我军猛烈的攻势，在黄浦江丢下15万残兵败将，余部5万人登舰逃跑。上海解放，杭州垂手可得。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展开了一场“逃跑竞赛活动”。美国陈兵于东南沿海，本试图进行武装干涉，但看到蒋介石政权已成朽木，不可雕矣，便不敢贸然动手。形势的急转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果断地作出决定：“提早入闽”，“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陈毅说完提早入闽的原由，拍拍时飞的肩膀说：“你老家不是在福建吗？现在中央决定提前解放你的家乡，使你的老乡们早日得解放，这是好事，你怎么犹豫起来了呢？”

叶飞解释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考虑第10兵团解放上海时伤亡太大，需要补充兵员，需要休整一段时间。还有，福建地方大，解放福建需要一大批地方干部的配合。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啊！”

陈毅点点头，没有说话，然后拨了个电话。转眼的工夫，从门外进来 3 个人，叶飞抬头一看，都是老熟人。他们是张鼎丞、韦国清、方毅。

陈毅笑着指指这 3 个人，对叶飞说：“不要担心，他们是来协助你解放福建的。张鼎丞是福建人。我和毛泽东、朱德率部从井冈山到闽西时，张鼎丞就是闽西军委书记了。他在闽西有很大的影响力，闽西的老百姓称他为土地爷呢！他这次到福建，职务是省委书记。”陈毅又将身子转向韦国清，继续向叶飞介绍说：“他是广西人，红军时期在福建工作过，这次去福建是担任福州市委书记。”陈毅又指着方毅说：“他是厦门人，担任过厦门市委书记，这次去福建，职务是副省长，负责支前工作。”介绍完毕，他对张、韦、方 3 人严肃他说：“你们都是老福建了，这次是故地重返，情况熟悉。叶飞负责军事指挥，你们 3 人负责支前和接收地方工作。我希望你们 4 人相互支持，一个月内出发，有什么困难吗？”

“一个月？”张鼎丞惊讶地说，“我估计，接管福建全省工作需要 4000 多干部，现在 40 个都还没凑到，一个月时间太少了把？”

陈毅仰面大笑，指指叶飞和张鼎丞说：“好啊，你们两个福建佬一唱一和，老乡情味重，好像早就商量好的，都叫时间紧。”

叶飞和张鼎丞异口同声地说：“不是商量好的，本来就时间太紧嘛。”

陈毅摇摇手说：“我知道，你们的困难我也考虑过了。可是，我考虑更多的是你们的聪明智慧，你们是有决心有能力在一个月后出发的。同时，我也要照顾你们归心似箭的心情，一个月时间我还怕你们嫌太长了呢！”

叶飞等 4 人不由得相视苦笑。陈毅的玩笑话的确说到了他们心坎上。

叶飞原名叶启亨，出生在菲律宾。5 岁时父亲叶孙卫把他带回老家福建南安。在厦门第 13 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革命，从事地下党工作。曾担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代书记、独立师长。如今离开家乡近 20 年了。20 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家乡的变化有多大？叶飞是非常关注的。特别是 20 年来，从未与父母联系。现在，他们二老的身体如何？他们在干些什么？叶飞时时挂在心上。陈毅说的不错，他真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到父母的身边。

回到兵团司令部，叶飞立即着手筹划解放福建的准备工作。他决定先派第 29 军参谋长梁灵光带先遣队先行一步，与地下党取得联络，筹集粮食蔬菜。

梁灵光肩负重任，心情十分激动，准备了 3 天后，于 6 月 7 日清晨带着 18 辆大卡车、400 名先遣队员及军需物资，从苏州南行。

梁灵光走后，叶飞和张鼎丞、韦国清、方毅抽调了 6000 名地方干部，成立长江支队和华东支队，随军行动。

7 月 2 日，叶飞率第 10 兵团由苏州冒暑南进。7 月 26 日，抵达福建的建阳、建瓯、南平。先行的梁灵光向叶飞汇报了福州的敌情。当时，福建全境敌军共有 15 万之众。其中龟缩在福州地区的有：福州绥靖公署第 6 兵团朱绍良、李延年所辖的第 25 军、第 96 军（位于城西北闽江西侧地区）、第 73 军（位于福清及平潭岛）、第 74 军（位于连江、官头一线）、第 106 军（防守福州市区）等 5 个军，共 14 个师 6 万余人。蒋介石企图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他的战略意图是想将美国拖下水。也有人说，他想保住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反扑。朱绍良自知兵力有限，不仅士气低落，而且多是些残兵败将，战斗力特别差。因此，他主张放弃福州，力保海上的退路。敌方对守不守福州发生分歧。朱绍良虽不想坚守福州，可也不敢违抗老

蒋命令。

根据上述情况，叶飞考虑了两个方案。一是采取大迂回战术，断敌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割断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可是，要实行这一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从尤溪出发，要翻越百余千米的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是 200 多千米，且都是高山和山间小径，无公路、大路可走，大炮、山炮无法携带。这是一着险棋，险在部队在酷暑天气，经 5 天长途跋涉，到达福清、宏路时已是疲惫之师，如再遭敌人南北夹击，危险性很大。

叶飞考虑的第二个方案是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这样，部队只需 2 大路程。这是个比较稳妥的方案。可是，叶飞和其他领导分析，这个方案虽有优点，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就不能断敌陆上退路。我军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达不到全歼敌人的目的，使福州之敌漏网由陆路沿福厦公路向南逃窜。权衡再三，他们决定采取第一方案，以求全歼敌人。

接着，叶飞发布战斗命令：第 31 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攻占马尾，断敌海上之路，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第 29 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与厦门方向汤恩伯部的联系，断敌陆上南逃之路；第 28 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进攻任务。

各路大军受命后，立即出击。左路军于 8 月 13 日晨向丹阳守敌施行攻击，10 时占领丹阳；继而向连江方向攻击，16 日攻取连江城，歼敌第 74 军一部、第 15 军大部；继而攻下闽安、马尾，歼敌第 23 师、第 201 师一部，完全控制了闽江北岸，以炮火封锁闽江，断敌水上逃路，并立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陆路，并向南构筑工事，实施警戒。中路军 16 日下午攻取福州外围的徐家村，勇猛迫近市区，由西郊西洪门向市区攻击。3 路大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打得敌人无路可逃。福州战役我军共歼敌 1 个兵团部、5 个军部、14 个师，计 5 万余人；自己伤亡不足 500 人。叶飞率部于 8 月 17 日占领福州。这就是后来将福州市大街命名力“八一七路”的由来。遗憾的是，只差半个小时，让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溜了。

事实证明，叶飞果断采取第一方案是正确的。福州战役的胜利，使我军控制了福建中部，打开了局面，然后可乘胜南下，继续歼灭泉州、漳州、厦门之敌，从而为迅速解放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部队进入福州，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拟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后，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福州失败后，蒋介石重新调整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靖公署和第 6 兵团建制，以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第 8 兵团、胡璉第 12 兵团、李良荣第 22 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企图凭借厦门海岛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抵抗我军进攻，以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叶飞率第 10 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州。

时飞令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令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南下。由海上走的目的是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叶飞的意图是，部队虽经历过渡江作战，但渡海和渡江毕竟不是一回事，部队没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适应海上作战。第28军奉命后，在福建党组织和福建人民的支援下，筹集了船只，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又攻占平潭岛，俘敌第74军、第73军六七千人。接着，他们又乘胜于17日攻下大小庠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的战斗任务。

第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我军共歼敌2.3万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的三面包围形势。

厦门面积118平方千米，自然形成南北两半部。西、南、北三面临大陆，最近处只相距500米。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西南的鼓浪屿，面积只有1.9平方千米，距厦门岛约700米，距大陆最近约1千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的地段很少。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第55军全部和第166师及第68军从漳州逃窜而来的余部，总兵力约3万余人。守军具体分布是：齐装满员的第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第181师守东南；第29师1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第68军残部守厦门市；第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轮换着来“巡视”，还由台湾派人来劳军。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都吹嘘厦门“固若金汤”，拍胸保证“守三五年没问题”。

叶飞顺利完成福州、泉州、漳州战役后，对攻取厦门要塞并元丝毫麻痹大意。他知道，厦门的防范虽不像敌夸张的那样固若金汤，却也是我军从未遇到过的严密防守之地；况且，厦门离台湾又近，敌人海陆空军齐备，我们却没有海空掩护。要想攻克厦门，不是易事，任务相当艰巨。当时首要的准备工作是筹集船只，这对叶飞来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因为，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可观，筹集十分困难。为此，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迟了3次。

9月26日，时飞在泉州作战会议上提出了金厦同取、先金后厦、先厦后金3种方案。古往今来，军事上一直是金厦并称。因为两岛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

会上大家对3种方案一一作了分析。

第一是金厦同取。其利端是可造成国民党军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十分困难。

第二是完全后厦。这可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我乘隙攻击；但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如先攻金门，厦门之敌极有可能逃跑而达不到全歼目的。

第三是先厦后金。其利端是当面之敌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之敌也可能逃跑，同样达不到全歼。

叶飞分析说：“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心理。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到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种种

迹象表明，汤恩伯口硬却心虚，并无坚守的信心和决心。”他挥动着拳头，坚定地说：“我们应趁敌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金厦两岛。”

与会者点头称是。于是决定由第 28 军担任攻取金门，第 29 军和第 31 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会后，叶飞立即深入部队，却发现第 29 军只有 3 个团用的船只，第 31 军和第 29 军差不多，而第 28 军只有 1 个多团用的船只。看到这种情况，叶飞的双眉紧紧地皱在一起。时不可待，怎么办？他经一番深思，决定改变原方案，而采取先厦后金的第三方案。10 月 7 日，他将这一方案报告野司。野司首长复电：“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载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叶飞下达作战命令：第 31 军及第 29 军攻取厦门。第 28 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 月 10 日，第 28 军及第 29 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 3 个多团。15 日黄昏，厦门战斗打响了。

叶飞命令第 31 军的第 91 师及第 93 师的 1 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第 29 军的第 85 师，第 86 师和第 31 军的第 92 师在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多路渡海，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 30 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第 28 军配置在大、小嶝岛及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鼓浪屿这个弹丸之地风景怡人，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誉。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此瓜分土地，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成了“万国租界”。

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了帷幕。这天下午 4 时 30 分，天气突变，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瞬间东北风呼啸，乌云随风而至。炮兵依令提早 30 分钟开始破坏性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 时，第 31 军两个主攻团及第 91 师第 281 团和第 93 师第 277 团 4 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顿时海面上波涛汹涌。惊涛骇浪中，战士们和船工搏风击浪，一会儿被抛向波峰，一会儿被甩进浪谷。不一会儿，缆绳被拉断了，桅杆被打折了。他们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 200 米左右时，被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发现。对岸立即发射出猛烈的火力。勇士们冒着弹雨，奋勇向前。左翼 1 个团在石湖山、薛厝地段登陆成功，他们击退守军数次反击后，向园山方向扩大登陆场。

16 日中午，第 31 军攻占湖里、塘边，第 29 军攻占园山、枝湖地区。这时，叶飞发现守军溃逃情况，立即令各登陆部队大胆穿插分割，追歼逃敌。第 29 军直插云顶岩、曾厝寮、黄厝地区，第 31 军直插厦门市区。17 日晨，第 31 军 1 个营再次攻击鼓浪屿，登陆成功，守军投降。当日 11 时，厦门全岛解放，我军歼守敌 2.7 万余人。守敌第 166 师逃往小金门。

金门岛（含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位于厦门以东海域，距厦门岛 1.8 海里。厦门守军被歼，汤恩伯调兵增防金门，金门守军兵力加强。敌第 25 军第 45 师驻守西半岛，第 40 师及刚由潮汕地区增援的第 11 师驻守东半岛，第 18 军在料罗湾附近地区。

叶飞以第 28 军及第 29 军各一部共 7 个团兵力，在第 28 军统一指挥下，

担任攻取大金门岛的任务；以第 31 军夺取小金门岛。此时，已筹集到可运载 3 个团的民船。预计第一拨运送 3 个主力团上岛，船只当夜返回；第二拨再运送两个团上岛，乘敌援军未到或虽到但立足未稳之际发起攻击。决定集中使用船只，先夺取大金门岛，后夺取小金门岛。

24 日 23 时，第 1 梯队 3 个团起渡。25 日，部队分别在古宁头、垵口、湖尾登陆成功，除古宁头留有一部兵力外，余均未派部队巩固滩头阵地，即向纵深猛插，输送船只因落潮搁浅未能返航。25 日晨，守军在海空军火力和坦克掩护下，向我登陆部队发起连续反扑，并以空军、炮兵火力将滩头船只全部摧毁，封闭了突破口。登陆部队苦战一昼夜，于 26 日晨先后攻占林厝、埔头、双乳山，歼守军一部，但因兵力不足，缺乏统一指挥，被敌各个击破。叶飞紧急动员船只，运送 4 个连，于 26 日 3 时分别在古宁头、湖尾附近登陆，但又陷入守军重围。登陆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临危不惧，英勇战斗，激战至 28 日，终因寡不敌众，后援不继，弹尽粮绝，难以挽回局面。两批登陆部队共 7000 余人，一部牺牲，一部被俘。

此役，第 10 兵团尽管在金门登陆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歼国民党军近 5 万人，解放了福建省南部和厦门岛。

金门失利，全军震动。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给我处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1950 年，美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中央、毛泽东来电，解除了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令我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这样，我失去了再攻金门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我再次请求中央处分时，毛主席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1958 年，机会终于等到了，叶飞奉命指挥炮击金门，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受到了党中央和广大指战员的一致赞扬。

平津战役中的刘亚楼

杨万青

齐春元

刘亚楼（1910～196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人民空军主要创建者和第一任司令员。1910年4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桃澜区湘店乡大洋泉村月形下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6岁入本村私塾学习。1926年因无力缴纳学费从长汀七中辍学回乡，受聘为小学教师。在学校，他受到了党的革命思想的熏陶。不久，被中共桃澜党组织派往店下建立地下联络站。1929年春，加入当地青年会和农民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了小澜暴动，加入了中共领导的武平游击队。不久被送往红4军随营学校学习。1930年，刘亚楼先后任红13军第3纵队连长、营长兼营政治委员、支队政治委员。10月，任红4军第12师第35团政委。1930年12月至1931年8月，率部参加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1933年2月至3月，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藤田整编”后任红1军团第2师第5团政治委员。不久在红2师政治部主任。10月，任红2师政治委员并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央红军长征时，与师长陈光率领红2师，连续突破敌军4道封锁线，接着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挺进松坎地区，与红1师组成北部防线，保卫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刘亚楼率部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1935年7月，调任红1师师长。他支持中央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哈达铺改编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协助彭雪枫司令员、丰富春政委率部胜利到达陕北。11月，任红2师师长，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斗。不久，随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渡河东征。1936年6月，入“红大”学习。12月，任“抗大”训练部部长。1938年1月，任“抗大”教育长。1938年4月，刘亚楼受中央军委派遣，与卢冬生、李天佑、谭家述、钟赤兵、杨至诚等离开延安，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9月，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3年夏，在苏军实习，并对抗联教导旅的工作给予了指导。1945年8月，随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刘亚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军委会东北分会委员，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了东北的解放战争。他参加了剿灭土匪、整军备战的指挥工作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部署。他参与了1947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夏、秋、冬三季攻势的指挥和部署，迫使东北国民党守军困守于几座孤城。他参与了辽沈战役的指挥和部署，支持罗荣桓坚持攻打锦州的决心。平津战役中，他担任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为平津战役的胜利进行作出了贡献。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1949年10月，任空军司令员。1950年7月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成立，任空军党委委员、常委、书记。抗美援朝战争中，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1954年8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出席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65年5月7日，因患肝癌病逝，享年55岁。

* * * * *

刘亚楼是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幼年时生母病故，由养父母收养，才保全了生命。后来他有幸进入小学，考入初中，使他在参加革命前便具有了

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当教员、作店员的经历。参加工农红军以后，他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战勇敢，长于谋略，在革命熔炉里迅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卓越指挥员。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协助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东北全境的事迹享誉全军，他呕心沥血建设人民空军的历程世人皆知。本文叙述的是他在平津前线，主要是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时指挥 34 万大军解放天津的斗争片段。

紧急入关

1948 年深冬，祖国东北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我东北人民解放军攻锦州，战辽西，克沈阳，仅仅 52 天，国民党东北“剿总”及其所属的 4 个兵团、11 个军、36 个师和地方保安部队 47.2 万人全部被歼，东北全境获得解放。“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群众扭着秧歌，唱着二人转，并尽其所有，慰问子弟兵。年轻的战士们，押送着俘虏，清点着战利品，嘴角上挂着胜利的微笑。

东北解放，使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新的转折。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东北人民解放军是胜利之师，然而也是疲惫之师。中央军委考虑到东北我军的情况和全国战场的状况，早在 10 月 31 日，即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的前夜，便电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东北主力除 4 纵、11 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约于 12 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的第三年下半年，即明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收到电报，罗荣桓面带微笑说：“看来中央要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任务可以提前完成。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刘亚楼也兴奋地说：“军委的战略部署真是振奋人心！毛主席已向我们发出进关的预备令啦！”

林彪不露声色，静静地听着罗荣桓、刘亚楼的议论，最后拿起电报在面前抖了抖说：“军委给了 1 个月的休整时间，时机难得。机关要赶紧搞出个方案来，抓紧休整，解决些问题。”

刘亚楼立即与政治部主任谭政商议，很快拟订出了部队休整方案，提出休整期间主要进行如下工作：①开祝捷会、战术评论会、英模功臣大会及党的支部大会、政治工作总结会；②补充新兵，争取俘虏，调整武器，配备干部；③进行战术教育；④改善连队管理与连队政治工作，巩固部队，防止逃亡。沈阳解放的第二天，发布了部队休整的命令，规定从 5 日起开始休整，时间为 1 个月。

东北大地上，处处充满了欢腾的场面。各部队祝捷会、战术评论会、英模功臣会、战斗总结会开得热火朝天。

就在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的第二天——11 月 6 日，淮海战役打响了。不几天，便传来了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和黄百韬兵团被歼的消息。这无疑是一个特大的喜讯，然而兔死狐悲，蒋介石、傅作义却为此受到极大震动。

国民党东北守军全军覆没之后，已经使蒋介石坐卧不安，如今刘峙、杜聿明部陷入重围，更令他忧心如焚，如坐针毡。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看到继东北屏障失去之后，今又徐州告急，预感到自己将腹背受敌，十分不安。于是蒋介石急召傅作义到南京商量对策，想抓住傅部力量挽救残局。傅作义一下飞机，蒋介石优礼有加，派儿子蒋经国和国防部长何应钦到机场迎接。

第二天，蒋介石请傅作义到他的官邸商谈。蒋介石为应付淮海战役，加强长江防线，提出放弃平津，以委任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则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技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归绥。但他又想，此时采取断然拒绝南撤的态度，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于是，他对蒋介石说：“总统委以重任，作义实感惶恐。不过，事关战局，我私下里的一点见解，也不隐瞒。在我看来，固守平津是全策，退据江南为偏安，非万不得已，不能将华北部队南撤。若是平津有失，东北共军长驱直下，徐蚌方面就将有共军的3个野战军了。”

蒋介石忧郁地说：“是啊！林彪部队已达百万之众，加之华北聂荣臻部，这个压力，要哪一个单独承受都不是轻松的事咧！”

傅作义却装着轻松的样子说：“我估计东北共军最少需要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平津方面大的战事当是在明年开春之后。这期间，我可以再扩充20至50万部队，可以加固津塘60公里弧形阵地，完善北平碉堡群系统。对付林彪、聂荣臻虽不说多么宽裕，也不至于让总统过多忧虑。”

蒋对傅坚守平津、支撑华北，亦表赞赏。两个人经过一番商讨，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塘，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

傅作义匆匆返回北平，完全按自己的心思调整兵力部署：将60万军队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沿着长达500千米的铁路线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他的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蒋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一旦形势不利，他的部队向西退缩回归绥，蒋系部队向东从塘沽上船逃跑。

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分析，认为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地区，对整个战局最为有利，一则淮海战场可以放手歼敌，无后顾之忧；二则没有傅作义的几十万人，蒋介石很难组织江南防线，直接加速了蒋家王朝的崩溃。如果傅作义放弃平津，或南逃，或西撤，平津虽可不战而得，但对尔后作战不利，很有可能会大大延缓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

为了把傅作义集团抑留于平津地区，就地歼灭，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以第4纵队和第11纵队组成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于11月8日、11日到达北平附近集结待命之外，又令华北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撤围归绥，将其3个纵队置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归绥撤退。还令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停攻太原。然而，这却仍不能阻止住华北敌军从海上逃窜。11月16日，毛泽东开始考虑让东北野战军早日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断敌海上逃路；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征询意见，让他们考虑提早入关为好，还是按原计划休整，然后入关为好？

接到中央军委征询意见的电报，东野的几个领导干部都陷入了紧张的沉思。

林彪看一看手中的电文，又看一看墙上的地图，在房间里不紧不慢地踱着步子。突然，他停来说：“参谋长，你的意见呢？”刘亚楼对部队情况熟悉，便直述己见：“两个月来，部队连续征战，已经极度疲劳，一些部队

伤亡减员较多，需要补充；时值严冬，有的部队冬装还未来得及发下；部队还出现一些享受情绪和怕离开东北老家的思想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特别是有大量的俘虏战士刚刚加入解放军行列，需要做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第4纵队打塔山阻击战胜利之后，补充了大量的俘虏和新兵，既没有休整，也来不及进行思想教育，就奉命为粉碎傅作义偷袭西柏坡和石家庄的计划向关内开进，结果5天中逃亡了500人。由于同样原因，第11纵队7天就逃亡了600人。解决以上问题，都要用一定的时间。因此我认为，应如实向军委报告情况，东北主力提早入关确实很困难，请军委慎重决策。”

罗荣桓、谭政听了刘亚楼的意见表示赞同。

林彪坐在椅子上，慢声慢气地说：“还有一点，也要向军委报告：敌军如果从平津撤退，必将选择在我东北军主力尚未入关而又发觉我主力开始入关的时机，因此建议关内部队在东北主力入关前，包围一股较大敌军以拖住敌人为好。”

最后，罗荣桓说：“就以林总和亚楼同志的意见为共识，以我们4个人的名义向军委发报。”

正当中央军委冷静地观察徐蚌战局，慎重地思考东北野战军的入关问题时，收到了北平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报告：傅作义有率部起义的意向，并委派民主人士符定一到中央驻地联系。

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

周恩来高兴地说：“傅作义如果率部起义，平津唐地区可望和平解放，是利国利民的义举。我们要表示极大的欢迎并争取这一结果的实现。”

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要争取他，就要稳住他。机会难得，丧失时机，我们就要犯历史错误。”

毛泽东果断决定：“东野立即结束休整，提前行动！”

11月18日18时，中央军委紧急电令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其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深夜，接到这份紧急电令，罗荣桓、刘亚楼立即起床来到林彪的办公室，3人坐在一起进行研究，面色都很严峻。

罗荣桓首先开口说：“我们必须服从战略全局，立即停止休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遵令入关。”

林彪沉思了一会儿说：“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现在是看铺开的这个摊子如何迅速收拢？”

刘亚楼马上提议说：“休整计划立即停止执行，没有来得及补充的新兵一概暂不补充，计划调出受训的学员停止调出，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武器装备也暂不调整了，两个伤亡最大的师暂时留下，这样可以争取按时出发。”

罗荣桓又补充说：“政工会议也立即结束，我明天作个动员，让各纵队领导听完就立即赶回去。只是部队的思想动员没有时间搞了，只能放在途中去进行了。”

林彪点了一下头说：“就这样，马上报告军委，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如何部署几十万大军迅速而秘密地入关呢？一个问号闪进了刘亚楼的脑海。他看看林彪，只见林彪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在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前停下了。

林彪问：“现在部队的确切位置？”

刘亚楼如数家珍，指着地图说：“1纵在新民以东的巨流河，2纵在沈阳西南的杨士屯，3纵在锦州，4纵、11纵已先期入关，5纵在义县，6纵在大虎山、黑山一带，7纵在鞍山、海城一线，9纵在宫口以东，10纵在北镇，12纵在沙河堡，特种兵纵队在芳山镇。”

林彪说：“这次行动，迅速隐蔽十分重要。可以考虑兵分两路：锦州附近的部队为南路，经冷口越过长城，挺进冀东；沈阳附近的部队为北路，经喜峰口越过长城，挺进冀东。取捷径，夜行晓宿，尽量不被敌人发觉。”

罗荣桓说：“为隐蔽行军，迷惑敌人，请谭主任召集政治部宣传部门和新华社的同志开个会，广播电台在部队行动后两周内，多广播沈阳、新民、锦州等地我军开会、练兵的消息，报纸要刊登林总在沈阳活动的新闻。”

3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研究出个大体框架后，已是后半夜了。刘亚楼回办公室起草电报。罗荣桓用毛巾擦把脸，就开始写动员讲话提纲。写完提纲，他匆匆吃了几口早饭，准时走进会场。

东野总部正在沈阳召开有各纵队首长参加的讨论休整期间政治工作的会议。会议随即变成了紧急入关动员会。罗荣桓作了很有针对性、很生动的动员讲话。会后，各纵队首长心急如火地立即赶回部队进行传达动员，全军上下紧急行动起来。

21日，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于23日出发。

刘亚楼依据东总百万人马分两路梯次向关内秘密开进的行动方案，有条不紊地将一道道命令传到各纵队：

“第5、6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为北路，经义县、沈家台、汤道河，从喜峰口入关；第3、10、9、8、7纵队为南路，经锦州、江家屯、双山子、青龙，从冷口入关；第2、1、12纵队随后跟进。第一步以河北玉田及东西地区为集结地。”

11月23日，刘亚楼和他的战友们征鞍未卸又披战尘，告别白山黑水，开始了有历史意义的进军。

80万大军，15万随军民工，10万匹战马拉着各种大炮、辎重，成千上万辆汽车、大车载着弹药、物资，汇成两股钢铁巨流，浩浩荡荡，奔涌向前。

遵照中央军委“隐蔽入关”的命令和东野司令部的部署，部队夜行晓宿。步兵、骑兵、工兵、汽车、坦克部队、野战医院和民工，在夜色的笼罩下，越过风沙漫卷的漠北地区，秘密向华北挺进。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按照东野政治部的部署，天天发表东北野战军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区庆功况捷、练兵、开会的消息，造成东北部队仍在休整的假象，以迷惑敌人。

刘亚楼于11月30日随林彪、罗荣桓率东野指挥机关由沈阳乘火车出发，到锦州换乘吉普车、卡车，也是夜行晓宿，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

来到喜峰口前，蜿蜒曲折地耸立在群峰之巅的古老长城映入刘亚楼的眼帘，一望无际的部队如滚滚洪流从他身边奔腾而过，他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3年前自己刚从苏联回到东北时，国民党军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抢占东北是何等气势汹汹，不可一世；而我军在东北却只有十几万人，处境又是何等艰难啊！3年时间过去了，这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东北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气势汹汹的47万国民党军被消灭净光，我东北野

战军则已发展到雄师百万。眼前，我军坦克隆隆，大炮赫赫，这支威武雄壮的队伍又向关内挺进了！长城，你将再次为历史作证：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正义是不可战胜的。一切反动势力可以猖狂于一时，但终将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碎！

行军途中，每到一地，刘亚楼总是顾不得一夜的颠簸疲劳，迅速与各纵队联系，了解部队行军情况和到达的位置，鼓励部队“要不怕疲劳，不怕挨饿受冻，拿咱们脚上的水泡，去换敌人的大炮”，“我们跑得快，敌人就跑不悼”。

一路上，罗荣桓组织各级政治机关，把行军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搞得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沿途设立宣传站、鼓动棚，宣传队员唱歌、说快板，路旁、村口张贴宣传鼓动口号：“华北不解放，东北不稳当！”“打到关内去，解放全中国！”部队斗志高昂，纪律严明。

沿途各地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为部队修路架桥，保证人马车辆通行无阻。路旁的男女老少，捧着一碗碗茶水送到战士嘴边，一个劲地把柿子、红枣、白梨、花生、栗子、熟鸡蛋往战士的衣袋、挎包里塞。部队每到宿营地，住房和粮食都已准备妥贴，家家户户把炕烧得暖烘烘让战士们休息。人民群众热爱子弟兵的炽热深情，使战士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精神更加饱满，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更大了。

12月7日，东野指挥机关超过先头部队到达目的地——河北蓟县孟家楼村。

孟家楼村位于蓟县城以南10千米，距北平、天津、唐山各90千米。东野司令部设在村中一家大院内。

这天早晨，刘亚楼带十几名参谋人员风尘仆仆在林彪、罗荣桓前一步到达司令部。刘亚楼顾不上洗把脸喝口水，就站在院子中翻阅各纵队发来的电报。参谋人员忙着打扫屋子，摆桌子，挂地图。尚未布置就绪，满屋仍尘土飞扬，林彪、罗荣桓已赶到司令部。他们一进门就直奔挂着地图的西墙，刘亚楼也赶紧走过去。

林彪第一句话就向刘亚楼问道：“各纵今天到达什么位置？”

刘亚楼拿起指示棒，指着地图，一口气报告说：“5纵进蓟县，3纵至丰润，10纵抵迁安，9纵到建昌营，6纵入喜峰口，8纵达建昌，特种兵纵至绥中，7纵到锦州，1纵、2纵、12纵分别到达朝阳、黑山、新民。”

林彪沉默片刻，从刘亚楼手中接过指示棒，在地图上划出一道直线说：“随后跟进的第1、2、12纵队不必再绕行冷口，可以取捷径走山海关，直插天津、塘沽。”

刘亚楼怔了一下，提醒说：“林总，军委要求我们秘密入关。”

“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很难隐蔽；这么多的部队长途行军，敌人日夜有飞机侦察；我先头部队正在敌前展开，现已无秘密可言了。”林彪说完，用目光征询罗荣桓的意见。

罗荣桓点了点头说：“正是这样，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接着又补充一句：“但要向军委报告一下。”

刘亚楼也点头同意，随即起草了电报，向中央军委报告他们已到达的指挥位置——孟家楼村，并报告最后3个纵队改由山海关入关的理由。

毛泽东在东北野战军开始行动之后，估计百万人马千里南下，不可能保密太久，傅作义一旦发现，很可能不顾一切从塘沽海运南撤。于是，决定从

西线开刀，包围张家口，引敌西援，尔后切断平张线，使两援之敌有去无回，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11月29日，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率3个纵队奉命迅速向张家口地区发起进攻，对张家口之敌形成了包围态势，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帷幕。

毛泽东知己知彼，料敌如神。被围的张家口守敌向傅作义紧急求援。傅作义判断，东北共军尚未入关，华北共军对张家口的包围只不过是一次局部性行动。于是，他即令丰台的第35军火速驰援。

待敌西援，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华北第2兵团、东北先遣兵团分别向涿鹿、怀来疾进，切断平张线。

此时，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一部入关，直接威胁北平，大惊失色，急令第35军昼夜返回北平，并令第104军和第16军向西接应，同时收缩兵力加强北平的防守。

12月6日，敌第35军乘汽车沿平张线向北平回返。第35军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素有“王牌”之称。抓住该军，就能抓住整个傅系。

毛泽东连续电令华北第2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务必全军行动，阻击该敌，不得违误。

杨、罗、耿率部克服了天寒地冻、路少河阻的困难，于8日拂晓赶到新保安地区，一面抗击东来的接应之敌，一面阻击西来的突围之敌。激战竟日，使东西之敌相距仅4千米而未能会合，把敌第35军紧紧包围在新保安城内。

在西线军事行动的掩护下，东北野战军主力于12月10日大部到达遵化、玉田、薊县等地。这时，傅作义集团的西退之路虽已堵死，但平津路、津塘路尚未切断，敌仍有经天津、塘沽从海上南逃的条件。

12月11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来长电，提出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

毛泽东指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我军“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12月11日至12月25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幸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有可能或很少可能的。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绝不料你们在12月25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为着在12月25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攻击的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

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刘亚楼认真地逐字逐句地读着毛泽东的指示电，越读越激动。“辽沈战役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战略计划，只 52 天时间就取得那么大的胜利。现在，毛主席又及时为平津战役制定了这样英明的作战方针！”刘亚楼神采飞扬，连声说道，“毛主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战略意图和作战思想，而且已估计到战役的发展趋势，对作战任务的规定是这样清楚，对作战步骤的安排是这样明确，对作战方法的运用是这样巧妙，敌人无论怎样狡猾也无法逃脱全部被歼的命运喽！”说完，爽朗地大笑起来。

罗荣桓也一反平日的严肃，笑逐颜开地说：“这就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嘛！我们好好体会一下主席提出的这个‘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真是太有味道了。”

当天，中央军委还致电华北军区、华北局和东野，指示说：平津战役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华北、东北野战军应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冀中 7 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由他们统一指挥。据此，平津前线司令部即告正式成立。

平津前线司令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东北野战军以迅速奔袭行动，大胆插入北平、天津、塘沽、唐山地区。接着，对华北野战军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的具体任务也作了部署。

从 12 月 12 日起，我各路大军经过简短政治动员，马不停蹄，先后向预定目标急进。至 12 月 14 日，由司令员程子华、副司令员彭明治、参谋长黄志勇指挥的东野第 2 兵团（即东北先遣兵团）第 4、11 纵队占领南口，包围石景山，第 5 纵队攻占宛平、丰台；由东野第 1 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唐天际、参谋长解方指挥的东野第 3、4、10 纵队和华北第 7 纵队占领通州、黄村、采育镇等地，切断了平津间的联系，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17 日，第 11 纵队攻占石景山，第 3 纵队攻占南苑机场。至 12 月 20 日，担任分割包围天津、塘沽任务的东野第 9、8、7 纵队，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断绝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在进击中，我军神速穿插于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之间，敌军竟未觉察。有些向北平集结的傅作义部队，曾在夜间与我迂回包围北平的部队混在一起，同在同一条路上齐头并进。我军指战员发觉后来一个突然行动，敌人糊里糊涂地就当了俘虏。

自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0 日，我军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 5 地，实现了将敌抑留华北的战役预期目的。

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里，东北野战军百万人马不仅千里进军入关到了华北，而且与华北野战军携手把傅作义集团的 60 万军队全部紧紧包围起来，胜利完成了华北决战第一阶段的任务。在西柏坡的战略指挥者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朱德总司令戴着老花镜趴在桌子前，指着地图上的北平，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傅作义集团由惊弓之鸟变为笼中之鸟喽！”周恩来也笑了。毛泽东坐在椅子上，有滋有味地抽着香烟。

平津前线的战役指挥者们一个月来都是在极度紧张状态中度过的，今天可以暂时轻松一会儿了。

刘亚楼走进司令部，一改昔日严肃的面容，主动和工作人员打着招呼。司令部的参谋们见参谋长今天的兴致不错，围上来说：“好久没有听参谋长给我们摆龙门阵了。”

刘亚楼笑呵呵地说：“你们见我今天高兴，又来缠我了。我高兴，是想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啊！你们看，我们向关内进军的时候，毛主席担心傅作义跑了，在西边把张家口一围，傅作义调兵解围，一下子便陷进了笼子里；毛主席又担心敌人从海上逃走，将天津、塘沽一堵，又切断了敌人的海上逃路。如今傅作义这几十万人马想跑也跑不掉了。毛主席非常了解敌人，他要傅作义的35军出来，敌军就出来了。现在好啦！傅作义集团已是欲战不得，欲守不能，欲逃无路，完全成了‘瓮中之鳖’。小伙子们，从现在开始，就要准备伸手捉鳖喽！”参谋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雪夜议兵

东野部队紧急入关，将傅作义集团60万军队分割包围后，刘亚楼预感到一场大的歼灭战即将来临。不久，中央军委下达了“掐头去尾，先拿下塘沽、新保安，后取中间，逐个歼灭”的作战命令，前线不断传来敌军被歼的胜利喜讯。

12月21日，华北第2兵团3个纵队共6.7万人向新保安发起攻击，激战10个小时，全歼新保安守敌1.6万人。被围之后吓得神经错乱的敌第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毙命。

第35军被歼后，傅作义寝食不安，懊悔指挥失策，遂令守张家口的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赶快“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

孙兰峰得令立即率6万守军弃城逃跑，刚刚逃出城门，就被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华北第3兵团和东野第4纵队共10万大军干净利索地歼灭了，张家口不攻自破。

与此同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计划，正在紧张地进行攻击塘沽和大沽的部署，确定以第7、2、9纵队共10个师的兵力，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统一指挥夺取两沽。

3个纵队接受任务后，立即侦察敌情，勘察地形，拟订具体作战方案，进行攻击准备。

塘沽，位于渤海湾西岸，距天津约45千米，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平津国民党军出海的唯一通道。为了确保塘沽、天津，傅作义将两地划为一个守备区——津塘守备区，以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组成了统一指挥津塘地区国民党守军的指挥机构。12月中旬，侯镜如正准备由塘沽赴天津任职时，解放军攻占军粮城，他便以津塘交通已断为借口，留在塘沽，把防守天津的责任推给了陈长捷。

侯镜如根据塘沽的特殊地形，将5万兵力重点布守在塘沽、大沽间纵深地区及塘沽北侧、西北侧地区。另有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

司令马纪壮率主力舰“重庆号”及其他舰船数十艘在海面上游戈。水陆协同防守，既可增强机动兵力，又可在必要时掩护撤退。

这些天，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一直在为塘沽之战而焦思苦虑。战场形势需要打塘沽，中央军委电令也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而且要快。但足，负责攻塘作战的指挥员报告说：“塘沽地区为水网地带，兵力很难展开，而且侯镜如把指挥部设在军舰上，很难全歼。”要求推迟攻击时间。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都感到遇上了一道难题，压力很大，通宵达旦开会研究。

冀东大地的子夜，寒风呼啸，黑沉沉的天空飘落着大雪。平津前线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在那张几乎占去整面墙的地图上，两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尾巴指向塘沽、天津。

林彪一直紧锁着眉头，站在地图旁观看。站累了，他索性把桌前的藤椅搬过来，坐着看，半天沉默不语。

罗荣桓和刘亚楼一会儿轻轻地翻阅着已看过多遍的中央军委及塘沽前线发来的一大摞电报，一会儿掩卷沉思，两人还不时低声讨论几句。

林彪离开藤椅，踱着方步，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罗、刘说道：“塘沽、天津两地之敌，都要在很短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推迟攻击时间，军委不一定同意，就是同意了，可塘沽的地形是变不了的，也还是很难把敌人全部歼灭嘛！”

罗荣桓合拢手中的电文本，抬起头说：“是啊！打塘沽是我们入关后的第一个大仗，如果打不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战役。”

刘亚楼站起来提议说：“看来，应该去一趟塘沽前线，看一看地形，与邓华、吴富善同志进一步研究一下，看看用什么办法打好这一仗。”

指挥员深入前线，亲自调查研究，定下作战决心，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刘亚楼的话音刚落，林、罗同时点了点头。

刘亚楼紧接着说：“我带两个人马上出发。”

林彪说：“让萧华也一起去看看。”

罗荣桓走近刘亚楼，关切地说：“天还未亮，又下这么大的雪，根本找不到路，怎么走？让值班参谋通知随行的人起床作好准备，你抓紧时间打个盹，等无亮了再动身。”

天刚刚亮的时候，刘亚楼、萧华带作战处长、参谋人员一行，乘车离开孟家楼，向塘沽前线奔去。大地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耕地哪里是路，只能认准向正南偏东一点的方向前进。吉普车跌跌撞撞，一路上颠簸得很厉害。12月26日，刘亚楼一行到达塘沽前线的东野第7纵队指挥部。

邓华、吴富善两位战将，不知指挥过多少次战斗，硬仗、难仗也遇到过不少，但是像塘沽这样令人挠头的不利地形真还从未遇到过。这些天，他们心急如焚，反复看地形，反复研究，眼睛都熬红了。听说刘亚楼参谋长今天到塘沽，他们早早就在指挥部等待着。

刘亚楼一下车立即召开会议，听取第7纵队指挥人员关于塘沽敌情、地形的汇报和对打塘沽得失利弊的分析。

邓华指着摆在面前的地图说：“塘沽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们无法四面包围，炮火也很难封锁海口，敌人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除渤海、海河之外，周围河内很多，虽宽一丈左右，但水深及腰，潮来更深。除铁路与路东一条小道有桥以外，其余何沟不易通过，而敌人则可凭河沟据守。西南、北面直到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草地潮湿泥泞，挖有水沟；盐田冬不结冰，不便徒涉。因此，部队难以展开攻击。”

刘亚楼静静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下几笔。

邓华喝了一口水继续说：“敌人以塘沽外面盐滩地为防御前沿，从正面向纵深层层设防，并有陆上和海上炮火作掩护。我攻击部队虽可利用盐堤作为冲击出发地，但发起冲击后就进入平坦的盐田，完全暴露在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代价太大了。”

刘亚楼点了点头，问道：“你们试攻的情况怎么样？”

吴富善回答说：“我们用少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虽占领了几个村镇和一些盐滩地，但伤亡较大。第20师攻击侮滩车站，歼敌700余人，自己伤亡400余人。我们只好命令部队暂停攻击。这样的地形实在难打，正如一些干部战士说的：‘不怕敌人多，不怕敌人硬，就怕有劲使不上’。”

刘亚楼停下手中的笔又问道：“9纵在大沽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邓华介绍说：“昨天，我们和2纵刘震司令员、9纵詹才芳司令员会了面，一起勘察了地形，作了分析。詹才芳同志说，他们趁海水退潮后筑了一些工事，潮水一来，前功尽弃。前天，他们75团向大沽守敌试攻，由于敌人火力非常密集，又遭海上敌人舰炮拦阻轰击，加之部队没有任何工事屏障，无法接近敌人，两次突击均未成功，伤亡也较大。”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刘亚楼问。

吴富善说：“我们反复研究，一致认为，打塘沽不能匆忙，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所以，向东野总部报告，请求推迟攻击时间。”

刘亚楼、萧华听完邓华、吴富善的汇报后，又一起走出指挥所，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积雪，察看地形。

展现在刘亚楼等人面前的是无遮无挡的平坦开阔地和纵横交错的沟渠以及未结冻的绵延盐田。刘亚楼将望远镜放在眼前，隐隐约约看到远远的海面上停泊的敌舰。

看完地形，刘亚楼、萧华、邓华、吴富善等都紧锁眉头，迈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

刘亚楼默默地走着，一个大胆的设想逐渐形成。

回到第7纵队指挥部，天色已晚，空中又飘起了雪花。吃过晚饭，他们几个人又继续开会研究。

刘亚楼首先说道：“下午听了你们的介绍并看了地形，心里有一些底了。军委要我们先打塘沽，一是为了控制海口，防止平津守敌从海上逃跑；二是歼灭小的，孤立大的，做出个样子，迫使平、津守敌放下武器。但是，现在看来，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用3个纵队打塘沽和大沽，不仅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难以速决；况且敌指挥部已搬上军舰，我们不能对敌形成包围。如果坚持打下去，攻占塘沽有把握，但全歼守敌则不可能。最大可能是歼灭一部，而大部逃窜，结果是得失不合算。更重要的是费力费时，将拖延解放平津、解放整个华北的时间。”

萧华插话说：“我还担心，在我们打塘沽时，天津守敌乘机突围逃跑。”

刘亚楼点了点头说：“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停顿片刻，以很慎重的语气向邓华、吴富善问道：“如果我们把先打塘沽改变为先打天津，你们看怎么样？”邓华、吴富善顿时面露喜色。

邓华一拍大腿，嗓门也大了：“要是这样，我们就想到一起啦！先打塘沽得不偿失，先取天津是有把握的！”

吴富善也急忙说：“昨天，我们俩和刘震、詹才芳同志一起也议论过，都认为如果先打天津，可以争取时间，不仅天津守敌跑不了，对切断北平之敌东逃的去路也更为有利。只是这塘沽的5万敌人就抓不住了，让他们从眼皮底下溜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刘亚楼说：“先打天津，同时也不放弃对塘沽的包围，即使这5万敌人跑了，也无关大局，扭转不了傅作义集团覆灭的命运。”

接着，他们又进一步商议了一阵子，统一了认识，便连夜共同签署了给

林彪的电报（罗荣桓应党中央电召，已启程去西柏坡参加会议），详细陈述了塘沽的地形和敌守备情况，正式提出将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的建议。

第二天清晨，刘亚楼、萧华一行匆匆启程赶回孟家楼。

自从刘亚楼、罗荣桓先后离开平津前线司令部后，林彪根据华北军区参谋长赵尔陈报告说平津地区之敌有突围的可能以及前几天邓华、吴富善反映塘沽地形、敌情的电报，于12月26日给中央军委去电：“平津敌突围征象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有何指示，盼告。”中央军委回电，同意推迟攻击两沽，并指示要严防平、津两地敌人突围。

林彪收到刘亚楼等从塘沽前线发来的电报后，大概是想起打锦州时会给中央军委去电要求改变部署的教训，所以这一次变得谨慎了。他一直等着刘亚楼回来，打算两人当面仔细商议后，再作定夺。

刘亚楼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后，详细向林彪报告了在塘沽前线实地勘察的情况和与邓华、吴富善等对地形、敌情的分析以及建议缓攻塘沽、先取天津的理由。

林彪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沉思良久说：“向军委发报，说明塘沽附近的地形，提出准备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先取天津，断敌东退之路的设想。”

刘亚楼以《拟以5个纵队夺取天津致中央军委电》为题，起草了向军委的请示报告。电报在详细报告了塘沽、大沽的地形和敌守备情况后说：“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攻两沽不合算……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5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时，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刘亚楼以对战场的透彻了解和敢作敢为的胆识，积极建议中央军委调整重大作战部署。他深信，对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只要是理由充分，对全局有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总是很重视的。但当这封电报真的发出去之后，他心里也还是有些惴惴不安，急切地等待着……

当日（12月29日）中央军委就来了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5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接此复电，刘亚楼心里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林彪也如释重负，松了口气。

平津前线司令部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决定成立天津前线指挥部，刘亚楼任总指挥。

刘亚楼担当起总攻天津的指挥重任，指挥东北野战军第1、2、7、8、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大部及第6、12纵队各1个师，共22个师34万人，迅速包围天津。此时，他带领着精干的指挥机关乘车驰往天津西的杨柳青镇。

津门布阵

杨柳青是天津城西10千米处的一个小镇。每到阳春、仲夏和金秋时节，这里颇有几分江南水乡的风光，而在这深冬，却显得有些荒凉。一条小河贯穿街心，两岸排列着高低不一的房舍。小镇西边有一个普普通通的院落，几

间瓦房依坡就势而建。院子很宽敞，中间有一口水井，水井旁边有一棵落尽叶子的枣树。天津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刘亚楼一到杨柳青，立即下达命令：第 1 纵队和第 6 纵队 17 师向杨柳青挺进；第 2 纵队向王庆蛇挺进；第 7 纵队向欢蛇挺进；第 8 纵队向汉沟挺进；第 9 纵队和第 12 纵队第 34 师向大任庄、大寺挺进；特种兵纵队向杨村挺进；第 12 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之敌。

从 1948 年 12 月 30 日至 1949 年 1 月 2 日的 4 天之内，刘亚楼指挥 34 万大军将天津困了个水泄不通。

天津，东距塘沽 45 千米，西距北平 120 千米。市周围是广阔的沿海洼地，多为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对大兵团多兵种的战斗行动十分不利。天津市区地形复杂，北运河、子牙河、南运河、金钟河、新开河、墙子河把市区分割成许多片断。市区狭长，东西宽 5 千米，南北长 13 千米。

早在日军占领时期，天津就修有水备工事。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从 1947 年秋又大力增修城防，抓夫 10 万，环市挖了一条护城河。河长 45 千米，宽 10 米，深 4.5 米，水深经常保持 3 米左右。护城河内侧筑有土墙，墙高 5 米，上设有电网，每隔 20~30 米有一碉堡。上墙内有环市公路，便于调动部队。市内的重要街道和路口均修有碉堡。护城河外有碉堡群（其中大型碉堡 380 多个，连同市内和纵深的碉堡并约 1000 多个）、几道铁丝网、鹿砦、梅花桩，并埋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敌人还将城周围 5 千米以内的村庄焚毁，制造无人区和开阔区。

辽沈决战期间，蒋介石亲自去沈阳、葫芦岛指挥时，曾两度路过天津。他视察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对陈长捷大加赞赏，并再三叮嘱“工事设计和运用要自己掌握，要特别注重军事机密”。

陈长捷凭借着复杂地形、坚固工事和 13 万兵力，自夸“大天津堡垒化”，“固若金汤”，有固守“绝对之保证”。

夺取天津，将是一场极其艰巨的攻坚战。中央军委限定天津战役的准备工作必须在 10 天以内完成，因为天津攻克以后还要解放北平，如果时间推迟，冰冻融解，就不利于北平的作战。

任务如此艰巨，时间如此紧迫，对于第一次独自组织指挥这么多部队、这样大的战役的刘亚楼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他深知天津攻坚战在平津战役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决心以优秀的战果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在指挥各纵队向天津周围开进的同时，刘亚楼在考虑天津攻坚战中应有一支坚强部队作为总预备队。这支部队应守如泰山，攻如猛虎，必要时冲上去，给敌人以致命的一击。调哪支部队作总预备队合适呢？这时，参加攻城的 6 个纵队以外的几支部队，像电影镜头一样一一从他的脑中闪过：第 17 师，第 6 纵队的第 17 师，这是一支攻如猛虎的铁拳头。1947 年 6 月四平攻坚战时，第 17 师是总预备队，关键时刻冲了上去，出色地完成了扩大突破范围、攻占敌核心守备区、瘫痪敌军指挥系统的艰巨任务。1948 年 9 月锦州攻坚战时，第 17 师又是总预备队，关键时刻又冲了上去，大胆突入，进展迅速，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被东野总部授予“攻坚老虎”的称号。想到这里，刘亚楼毫不犹豫地向前线建议：调第 6 纵队的第 17 师作天津攻坚战中的总预备队。1 月 3 日，平津前线总部正式下达了调第 17 师参加天津攻坚战命令。当晚，刘亚楼接到第 6 纵司令员洪学智打来的电话：“刘参谋长，你把 17

师调走了，我们打北平怎么办？”

刘亚楼听到洪学智的声音笑着说：“调17师有点痛，舍不得？”

洪学智对着电话筒也笑着说：“不是舍不得，是高兴啊！6纵队有17师这样的队伍被您看中，我们能不高兴吗？”

刘亚楼爽朗地说：“高兴也罢，舍不得也罢，先打天津，打下天津，再还给你！”

第6纵队政委赖传珠和第17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带第17师从北平郊外出发，按时进至天津西郊待命。

在各纵队向天津周围开进的过程中，刘亚楼昼夜不停地东奔西跑，亲自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勇敢的侦察员冒着敌人的枪弹，在齐膝深的雪泥浆里爬着、滚着，抵近敌人的阵地，仔细侦察，将天津外围的明碉暗堡、火力支撑点、布雷区等一一绘在图上。中共天津市地下组织派人冒着生命危险送来了详尽的敌情资料，连市内每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都交代得清清楚楚。

刘亚楼很快掌握了天津的地形情况和敌人的守备部署，下定了决心，制定了作战计划。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将各纵队和师的指挥员召集到杨柳青，召开作战会议。

指挥部里，墙上挂着天津市政区域图。图上被刘亚楼用粗红铅笔划了许多圈圈、箭头，已完全成了一张天津战役图。其旁还挂有一幅天津敌城防、兵力部署图。

刘亚楼首先简短地介绍了华北战场的形势，接着讲道：“现在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显而易见，天津之战在华北决战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此战绝非平常啊！天津这一战役打得如何，对能否彻底粉碎华北敌军南逃和从海上逃跑的企图至关重要。天津一旦攻下，北平将成为一座孤城，就会从根本上动摇傅作义集团，就为顺利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艰巨性。”

讲到这里，刘亚楼站起身，拿起指示棒，指着墙上的作战地图，开始讲述天津的地形和敌人的城防情况。他说：“陈长捷在市内的防御部署是这样的：整个阵地分为三线，第一线是金汤桥、金刚桥、21号桥以北地区，包括北洋大学；第二线是海光寺、胜利桥、中正桥的以北地区；第三线是胜利桥、中正桥以南地区。核心工事区在海光寺以东，墙子河以北，胜利桥以南地区。陈长捷的司令部在海光寺。”

紧接着，他提高声调，一字一句他讲道：“天津地形的特点是，东西窄，南北长。守敌部署的特点是，北部兵力强，中部工事强，南部较平常。因此，我们的作战部署是：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第1、2纵队，并配属相应的炮兵、坦克，组成西集团，由西向东攻击，为第一主攻方向。从天津西北、和平门南北地区突破，第一步在金汤桥与由东向西攻击的东集团会师；第二步会同南集团，先歼南半城之敌，尔后视情况歼灭北半城敌人。”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委吴富善，指挥第7、8纵队，并配属相应的炮兵、坦克，组成东集团，由东向西攻击，为第二主攻方向。从天津东王串场、民权门一线突破，第一步指向金汤桥，与西集团会师；第二步以第7纵队歼灭南半城敌人，以第8纵队歼灭北半城敌人。第9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

中权，统一指挥第9纵队、第12纵队第34师，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攻击，为助攻方向。从天津南尖山子地区突破，配合东西两集团，围歼南半城之敌。第8纵队独4师主力、第2纵队独7师一部及野司警卫团大部，在城北积极佯动，迷惑敌人，以求在主攻方向上出敌不意。以第6纵队第17师为预备队。”

刘亚楼停顿了一会儿，等大家记录之后又强调说：“这个作战部署，概括地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

刘亚楼话音未落，会场里的气氛活跃起来，许多人发出了轻快的笑声。这时，刘亚楼把目光转向第2纵队司令员说：“刘震同志，你们的对手是林伟俦的62军，可是块难啃的骨头啊！”

邓华大声插话：“他呀，牙口好，没问题！”

刘震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说：“嘿！虽然硬骨头不如肥肉可口，但嚼起来另有一番味道哟！”

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在笑声中，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萧华站起来说：“刘总指挥，我想就天津攻坚战中特种兵部队的使用问题谈点意见。”

刘亚楼说：“很好，请讲。”

萧华说：“我赞成刘总指挥提出的‘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和贯彻这一方针的兵力部署。至于特种兵的使用，我考虑应以三分之二的火炮和坦克配属西面的第一主攻方向，以三分之一的火炮和坦克配属东面的第二主攻方向，另以部分炮火和装甲车配属南面助攻方向。鉴于此次作战是特种兵出动最多的一次攻坚战，因此建议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有关指挥员参加的协同会议。”

刘亚楼同意萧华的意见，并强调此次作战搞好各兵种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至于如何搞好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他说：“指挥部将专门进行部署。”

最后，刘亚楼对战前准备工作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攻津部队自到达天津前线之日起就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进行政治动员，演练战术技术，筹备物资器材，扫除天津外围据点……

1月5日，刘亚楼专门召开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会上，刘亚楼在介绍了天津敌军的守备情况和我军的攻击部署之后说：“此次天津作战，政治、战术、器材三方面准备工作十分重要，要充分调动广大指战员参战的积极性、战斗中的勇猛顽强性和完成任务中的创造性。在政治工作方面，第一步要保证作战准备的完成；第二步要保证作战任务的完成和城市纪律的‘原封不动’……罗政委前往河北参加中央会议，谭主任抽不出身来，派组织部部长杜平同志参加会议。”

接着，杜平转达了谭主任关于天津攻坚战中的政治工作提出的几个问题：①打天津是东北部队入关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1949年的第一个大仗，要打好这一仗，争取胜利和荣誉。②政治工作除一般动员外，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工作。③天津是个商业城市，又有外国租借地，外侨多，部队要严守城市纪律和外侨政策。④各纵队要组织政治宣传工作队，帮助军管会工作。

末了，刘亚楼还要求，要把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战前动员的重要内容。

会后，部队上下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同时纷纷

召开大会，进行思想发动工作，号召开展战场杀敌立功竞赛，创造“打得好，执行政策纪律好，团结好”的“三好”连队。广大指战员的求战热情犹如烈火越烧越旺。各师还发动当地群众向战士诉说国民党军为制造无人区而惨无人道焚村烧房、屠杀百姓的罪行，激起了战士们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活捉陈长捷，替天津人民报仇除害”成为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在参战部队即将展开之际，刘亚楼又召集各纵队司令员及主攻师师长和待种兵团长在杨柳青前线指挥部开会，重点研究备兵种的协同问题。刘亚楼说：“参战的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12个团。第一主攻方向，配以特种兵纵队所属地炮89门，高炮15门，中、轻型坦克19辆，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共273门；第二主攻方向，配以特种兵纵队所属的地炮67门，高炮8门，中、轻型坦克10辆，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迫击炮共169门；助攻方向，配以特种兵部队所属地炮24门，装甲车14辆，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迫击炮共96门。另外的16辆装甲车由前指掌握，主要用于战场侦察、指挥和运输。此次我军参战的榴弹炮、加农炮、野炮和迫击炮共计538门，而天津守敌只有50余门。我军火炮数量是敌军的10倍。”说到这里，他面向担任两个主攻方向的纵队和师的指挥员们说：“给你们这么多的火炮，满足了吧？”

李天佑说：“满足了，满足了，您就等着攻城喜报吧！”

刘亚楼说：“天津攻坚战，克服护城河障碍是一个重要特点。为此，我炮兵射击时，大体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破坏射击时，第二阶段为压制射击时，第三阶段为克服护城河障碍射击时，第四阶段为向纵深发展射击时。”接着，他详细讲述了4个阶段中步、炮、坦、工各兵种具体的动作顺序，并要求各部队指挥员牢牢掌握，反复演练。

1月8日，天津前线指挥部正式下发了《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文件。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敌55万的喜讯传到天津前线。参战部队沸腾了，人人摩拳擦掌，个个急不可耐，战斗员及各班、排、连、营、团、师纷纷递交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快下命令，早日打进天津城。

天津市是拥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商业城市，文化也较发达，商店、工厂、学校、医院都很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天津市人民生命财产十分关心，指示攻城部队在战斗中要设法保护上述设施和场所，使其免受和少受炮火的破坏。刘亚楼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战术技术演练，炮火射击要准确，步兵穿插要熟练，特别强调加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严令部队入城后要做到“对人民财产秋毫无犯，缴获物资原封不动”。

在战前准备中，一些纵队、师、团指挥员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天津市内住有不少外国人，他们均在自己门口插着外国旗，而敌人据守在一些外国人房子内，怎么打？

刘亚楼经再三考虑，提出了3条意见，并请示中央军委：①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是不是租界，不管这个房子是中国人的还是外国人的，不管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②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在外国人房屋里，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③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挂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有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中央军委当即来电表示赞同：刘亚楼所提3条是正确的。人民群众是革命战争最伟大最深厚之根源。华北人民群众和东北15万随军入关的民工，对天津前线子弟兵给予了无比的关怀和热烈的支援，支前场面震撼人心，拥军壮举催人泪下。通向天津前线的条条河道里，连绵不断的冰床运输队飞速滑行前进，冰床上插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子，满载着粮食、生猪、大白菜……

沿着封冻的大清河，4万多男女老少自告奋勇冒着严寒开凿冰道。支前的船只载着弹药、蔬菜、柴草迎着寒风顺流而下，船上挂着“打下天津卫，活捉陈长捷”的巨幅标语。

铁路上，公路上，百万民工挥动着铲锹，扛的扛，抬的抬，抢修桥梁、路基，填坑垫沟。虽是数九隆冬，人们仍汗流满面。屡遭破坏的北宁铁路和战区公路始终畅通无阻，部队打到哪里，支援前线的运输大动脉就在哪里跳动着。

轰轰烈烈而又深入扎实的政治动员和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行动，激励着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战前练兵的热潮。从机关到连队，从军事干部到政工干部，从师、团领导到炊事员，无一例外。他们练捆炸药包，练爆破技术，练送炸药；他们利用驻地村镇街道，练习巷战，攀登楼房……休息时，指战员们高唱自编的练兵歌：“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明日大闹天津城！”

敌人非常重视护城河的作用，千方百计提高河水水位，并且每日以数千人在河上打冰以防结冻。所以，一旦开始攻城，护城河将是我军首先遇到的一大障碍。刘亚楼和各纵队、师领导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发扬军事民主，开展“想办法运动”。指战员们争先恐后，献计献策。坦克兵纷纷要求说：“把坦克开到护城河底，在坦克顶上搭门板桥、木头桥，这样最快。”并坚决表示：“淹死自己一人，让几个战友冲过去，这样的牺牲也是光荣的！”刘亚楼和纵队指挥员被可爱的战士们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动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坚决不批准这一要求。

第1纵队首先创造了一种芦苇桥，取材方便，浮力大，容易架设，3分钟就可通过1个连。刘亚楼立即在该纵队驻地召开制作、架设芦苇桥现场表演会，让其他纵队、师、团指挥员来学习、观摩、仿效、推广。结果，仅仅3天时间，各部队就创造出了芦苇桥、汽油桶桥、活页桥、梯子桥等十几种渡河办法。

攻城部队白天紧张练兵，夜里更加繁忙。夜幕降临，敌人阵地上死一样沉寂；而我军指战员则在夜色的掩护下，争分夺秒，挥动锹镐，进行迫近作业。指战员们不顾寒风呼啸，不怕冻土坚硬，一锹锹，一镐镐，一寸寸向前掘进。用了近10个夜晚，仅第1、2、9纵队就挖了总长达40多千米的壕沟。深1.5米、宽1.2米的交通沟，弯弯曲曲，纵横交错，直抵敌人阵地前沿，有的地方离敌只有30米。

总攻之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扫除天津外围据点。敌人知道失去外围据点就失去了屏障，所以拼命死守。我围城各部队夺取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得相当激烈。1月3日克曾新窑、万新庄，5日克灰堆、张八坟，7日克东局子、营盘、李七庄、赵兴坝、凌家庄，8日克三元村、丁字沽、王串场、四合窑、范家堡，9日克王家坝、北新庄，10日克吴家咀，12日克姜家窑、浙江公墓、广东义地等。至此，外围据点基本扫清，共歼敌4800余人。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3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林彪为书记，

由总前委“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3个月）管理平、津、唐及其附近区域的一切工作”。总前委驻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机关也由孟家楼村移至宋庄。

当天，刘亚楼来到宋庄，向总前委汇报攻击天津的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林、罗、聂听后，均十分满意，并决定14日上午10时发起总攻。

林彪说：“好，就这样上报军委。”

这时，罗荣桓侧身向坐在身边的刘亚楼问道：“军委限令3天拿下天津，你需要几天？”

刘亚楼回答说：“我不好讲，3位首长定。”

“48小时怎么样？”林彪以目光征求罗、聂的意见。罗荣桓、聂荣臻都点头说：“好！”

这时，刘亚楼满有把握地说：“要我说，30个小时就够了。”林、罗、聂听后为之一愣。

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解释道：“我和陈长捷的兵力是三比一，我手里还有他最详细的布防图。”

林彪说：“那好噢，我们就上报军委只需30个小时。”刘亚楼立刻说：“别别别，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

罗荣桓、聂荣臻两人相视一笑。

林彪说：“好吧，上报3天。”

在我军兵临天津城下的日子里，中央军委指示不要放松政治攻势，力争陈长捷放下武装，以使大津免遭炮火。林彪、罗荣桓于1月6日亲自签署了一封给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自动放下武器。刘亚楼派一名通信员摸到敌人阵地前喊话，将信送到敌

第62军军部，然后转送到了陈长捷手里。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心腹，两人都曾是晋军阎锡山手下的将领，彼此有多年的袍泽之交。陈长捷接信后，向北平打电话请示傅作义，傅的参谋长李世杰回答说：“坚决守住天津，就有办法。”陈长捷便复信拒绝放下武器，但表示可以派代表商谈。

陈长捷两次派代表出城。第一次，刘亚楼在城南我军的一个驻地会见了他们，并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表明了我方态度。过了几天，陈长捷第二次派出4名天津参议会代表出城，打着白旗乘着吉普车来到杨柳青，提出可以进一步谈判，双方再议条件。其实，陈长捷派代表来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便来个将计就计，待我军前沿阵地的两名战士护送这4名代表进入杨柳青时，他派通信员把他们带到平津前线指挥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休息，并让联络参谋通知他们说：“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25分钟后才能赶到，请你们稍等片刻。”

刘亚楼在指挥部里等了20分钟后，穿上大衣，从后门出去，坐上一辆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道一圈再回来，而且有意让他们看到车从城北开来，车轮上沾满泥巴。刘亚楼也假装风尘仆仆的样子，一进门就连声道歉：“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4名代表站起来说：“刘将军辛苦，请不要客气。”

一阵寒暄过后，刘亚楼严肃地说：“请诸位先生转告陈长捷，我方态度

早已表明，今天再次重申：①天津为华北主要工业城市，人民解放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遭受战火破坏。②一切天津国民党军队应自动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保证这些军队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去留自便。③人民解放军停战 24 小时，等候天津守军的答复。④如果天津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则人民解放军将发动进攻，天津守军的首领们应担负令天津遭受战争破坏的责任而受到严厉惩罚。”

刘亚楼最后又加重了语气说：“上述限 24 小时内答复，天津守军至迟应于 1 月 13 日 12 时前放下武器；否则，我军将于 14 日开始攻城。”

这 4 名代表点头哈腰地表示，回去一定向陈长捷如实报告。

待 4 名代表离开杨柳青，刘亚楼立即调几十门重炮到天津北面，不断轰击敌人在城北的工事。

陈长捷听了 4 名代表的报告，见刘亚楼已发了“最后通牒”，又急忙给北平打电话，请示怎么办。李世杰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最后才下决心“哪怕战到房无完瓦，地无净土，也要死守天津，以对得起傅总司令”。他还向守军官兵发布了 6 条军律，其中一条规定：谁临阵脱逃，其直接上司可当即将其枪毙。

陈长捷根据 4 名代表见到的情况和城北不断有解放军重炮轰击判断：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刘亚楼的指挥部肯定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宜兴埠。敌第 62 军军长林伟俦提醒他：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共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南面。

陈长捷不以为然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当即下令将他的“王牌”部队第 151 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到城北，以加强那里的防守。

陈长捷自以为得计，却不知正中刘亚楼的“将计就计”。

军威旗红

1949 年 1 月 13 日，华北大地显得格外宁静。国民党北平守军突围无望，坐以待变；国民党天津守军怀疑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妄想在固守天津的战斗中显显身手。参加天津攻坚战的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则养精蓄锐，盘弓待发。

这天深夜，疏星淡月，天气格外寒冷。刘亚楼带领两名警卫员，顶着西北风，朝和平门方向的“真空地段”走去。这里将是明日的主要突破口。他站在一个土堆上，久久地眺望着对面早已熟知的外围工事、护城河、碉堡群，从对面传出的模糊不清的声音里，从移动的灯光中，判断城内敌人有什么变化，想象着在明天的战斗中可能会出现什么还未预想到的情况……他忘了严寒和危险，目不转睛地观察着。市区北面，灯光闪闪，人声嘈杂，汽车的轰鸣声、喇叭声隐约不断。

“看来，城里地下党组织送来的说陈长捷认为我军主攻方向在城北的情报是准确的，对手真的中计啦！”刘亚楼心里泛起一阵快慰和欣喜，这些天高度的紧张和劳累顿时缓解了许多。刘亚楼正在高兴之际，突然前面不远处闪出一队人，强烈的手电筒光束扫来扫去。

“什么人？”对方色厉内荏地发问。

刘亚楼立即明白遭遇上了敌人的搜索队。他和警卫员们在黑暗中非常默契，迅即回答了敌人一阵驳壳枪声。与此同时，敌人的子弹也嗖嗖地从他们

头顶、身边飞过。刘亚楼和警卫员迅速离开了险区。

回到指挥部，警卫员仍捏着一把汗，一脸的不高兴：“本来我们不让首长去，首长却非要去不可，真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交代呢！”

刘亚楼却哈哈地笑了起来，边洗脸边说：“小伙子们，这倒是个好兆头，仗未打响主帅险些被擒；说不定啦，仗一打响，他们的主帅被我们生擒呢！”

已到后半夜了，刘亚楼仍毫无睡意。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种几十万大军决战前夕的冲动和历史的巨大责任感，使这位 38 岁的总指挥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14 日清晨，天津上空浓雾弥漫。趁浓雾的掩护，攻城各部队都已进入阵地。9 时左右，浓雾渐渐散去，红日照白雪，敌人的外围工事清晰可辨。我军炮群掀掉了伪装，炮筒昂头挺立。

在天津前线指挥部里，刘亚楼右手拿着已接通各纵队指挥所的电话，双眼紧盯着左手腕上的手表。10 点整，刘亚楼一声令下：“总攻击开始！”

随着 3 颗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顷刻间，500 多门大炮一齐怒吼，开始了“破坏射击”。千万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天津城垣，城墙上下顿时硝烟滚滚，砖石横飞，一个个碉堡上了天，一座座炮楼着了火，一道道铁丝网和鹿告被摧毁。大地在颤抖，城墙被撕开了一个个口子。

突然，敌人两架 P—51“野马式”战斗机从东南方向我阵地飞来。高炮 1 营迅速一阵“集火射击”，两架敌机便拖着浓烟坠落下来。以后，敌机就没有再敢接近战区。

在炮火的掩护下，工兵、爆破组冒着枪林弹雨，排除地雷，炸毁铁丝网和鹿砦，前赴后继，开辟通道。架桥队、突击队进入冲击阵地。

“压制射击”开始，所有火炮向护城河对岸敌前沿阵地、突破口两侧的敌人猛轰。坦克迎着战火，隆隆出动，跨越弹坑，冲上护城河堤岸。架桥队抬着架桥器材，冲入护城河，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迅速架桥。敌人的一排排炮弹落下，勇士们的鲜血染红了河水，染红了浮桥……

此刻，城西、东、南三面，各路突击队冲出战壕，踏着战友们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和架起的桥梁，高喊着为牺牲的战友报仇的口号，不顾一切地越过护城河，向各个突破口猛冲过去。炮兵进行“拦阻射击”，轰击向突破口反击的敌群。

各个突破口都展开了恶战。敌人从残破的地堡群里，从地下工事里，从楼房里，一窝蜂似地向所有的突破口凶猛反扑。敌坦克也出动了，炮火拼命封锁被我炮兵轰开的城墙豁口。

突破口硝烟弥漫，弹片横飞，刺刀闪动，杀声震天，敌人的反扑一次又一次被击退。

11 时，第 2 纵队第 4 师突击队首先突破成功。刘亚楼在前线指挥部里立即通报各纵队：“4 师首先突破西面城垣！”

紧接着，城西第 1 纵队的第 2 师、第 1 师和第 2 纵队的第 6 师，城东第 7 纵队第 19 师、第 21 师和第 8 纵队第 24 师，也突破成功。第 8 纵队第 22 师连续突击未成，改由第 24 师突破口入城。

第 24 师第 70 团尖刀 1 连协同动作做得最好，仅 3 分钟就突破民权门。英雄旗手钟银根为护卫插上城头的红旗，身上连中数弹，躺在血泊里，双手仍举着旗杆。红旗不倒，雄风就在！尖刀 1 连的战士们就是在这面血迹斑斑、弹痕累累的战旗下连续打退了敌人 20 多次反扑，杀进民权门。

城西和平门一侧的突破口，战斗最为惨烈。第1纵队第2师第4团尖刀连——“红三连”的战士们，见我军炮火已把城墙轰塌，又见左邻突击队在已排除障碍的地段插上了小红旗，由于求胜心切，提前发起了冲锋，拥向突破口。李天佑司令员、梁必业政委立即果断命令向这个突破口进行拦阻射击的炮火向前延伸，以免误伤“红三连”。“红三连”在突破口内外、城墙上下与数倍于己的敌人展开了肉搏，伤亡过半，英雄连长史德红壮烈牺牲。正当危急之时，“钢八连”杀了上来，才巩固住了突破口。

东、西两面城垒被我军突破后，担任主攻的后续大部队如潮水般涌进突破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天津拦腰杀去。

主攻方向的8个突破口，有7个一举突破成功。刘亚楼立即令总预备队投入战斗。早就憋得心急火燎的第6纵队第17师如离弦之箭，从第1纵队突破地段飞速冲进城内。

在城北佯攻的部队也正打得激烈，把敌第151师紧紧地吸在那里。

在城南担任助攻的第9纵队和第12纵队第34师的将士们也不甘示弱，于下午1时打开两个突破口，向北推进。

刘亚楼原来担心的是东、西两面突破后，敌人从城南突围。按计划，只要城南部队能顶住，不止敌人突围，待东西主攻部队会师后再向南压过去，那时助攻部队能突破进城，围歼城南的敌人，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他们这么快就突破了城南那样坚固的工事。刘亚楼欣喜万分，在电话里对詹才芳司令员、李中权政委说：“你们这么快也打进城了，太好啦！说明第9纵和第34师是过得硬的。”李中权笑着回答说：“参谋长，在这样的大战面前谁甘落后呀！”

此时，在敌指挥部地下室里，陈长捷如梦初醒，捶打着自己的脑袋，连连呼喊：“我上了刘亚楼的当啦！上了刘亚楼的当啦！共军主攻方向是在东西两面，这是要来一个拦腰斩断呀！”

敌副司令秋宗鼎急忙说：“是不是把151师调回金汤桥？”

陈长捷哭丧着脸说：“晚啦！已经晚啦！”

但是，陈长捷仍要作垂死挣扎。敌军依靠市内坚固工事和有利地形、地物进行顽抗，不断出动坦克、装甲车反扑，气势汹汹，妄图阻止我军深入，梦想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军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街垒战。战士们大胆灵活地运用分割穿插战术，打洞穿墙，攀壁越顶，直插猛进。

部队向纵深推进很快，各纵队、师的指挥所移到城内。第1纵队副司令员曹里怀和师长贺东生乘着坦克奔向第一线指挥。坦克开到一幢大楼跟前，楼里的敌人凭着坚实的钢筋水泥墙壁死守，我军战士们用炸药包连续爆炸均未成功。曹里怀对坦克驾驶员说：“来！我们替战士们开路，给敌人一点厉害！”坦克立即向大楼冲去，几个回合的冲撞，终于撞开了一个大窟窿。战士们不知道坦克里坐着他们的副司令员和师长，只顾欢呼着随坦克冲进了大楼，有的爬在坦克上，朝舱内亲切地喊：“同志，你们是哪个连的？我们请求你们指导员给你们记一功！”

我军从上午打到黄昏，从黄昏打到午夜，已连续厮杀了14个小时。刘亚楼在指挥部里不断地询问战斗进展情况，了解部队的战斗情绪。各纵队指挥员都回答：“部队情绪好极了，斗志旺盛！”“争先恐后，冲得猛，插得快！”

天津街道狭窄，弯曲复杂，到了午夜更不易辨认方向，部队在纵深展开

后位置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指战员们发扬孤胆作战精神，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枪声激烈就往哪里冲，按照大的方向迅速穿插，猛打猛冲。

15日2时，东西主攻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天津被拦腰斩断，敌人的整个防御体系被打乱，陷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中。

刘亚楼命令会师部队按预定计划，一鼓作气，彻底消灭敌人，尽早结束战斗。15日8时，第1纵队的第3团、第8团和第6纵队第17师的第49团攻克敌人核心区的最坚固支撑点海光寺。第1纵队第7团攻占法租界的敌第86军军部，该军中将军长刘云瀚俯首就擒，敌第62军中将军长林伟涛也在这里当了俘虏。从城南攻进来的第9纵队攻入敌市政府，第25师活捉了国民党天津市市长、中将军杜建时，并与第7纵队和第2纵队第6师在耀华中学胜利会师。

第1纵队第1师从15日5时开始向敌核心工事天津警备司令部发起攻击，激战5个小时，先后拿下东西两侧制高点。第1团的战士们敏捷地冲进敌司令部大门，由楼下打到楼上，占领了大楼，歼灭和俘敌千余人。第2营第6连副排长邢春福从俘虏中了解到陈长捷在警备司令部大院的忠烈祠地下室，马上带领战士傅泽国、王义凤冲进去，先缴了20多个参谋人员的枪支。正在作战室里给傅作义打电话求救的陈长捷及中将副司令秋宗鼎、少将高参杨威和蒋介石派来的视察官程子践等7名将领，都被他们3人俘虏。这时，副营长朱绪清赶到，用枪顶着陈长捷的脑袋，逼迫他下令全线投降。陈长捷垂头丧气地说：“早就乱套了，上午8时，就与各部联系不上了。”

15时，在天津城北部的敌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51师，在我第2纵队和第8纵队的重重包围之下，宣布投降。

至此，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共用29个小时。守敌13万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我军缴获各种火炮1163门，轻重机枪5719挺，长短枪52469支，汽车879辆，子弹640多万发及其他大量作战物资。

在天津战役中，我军有4106名指战员把生命献给了天津市人民的解放事业，有19214名指战员光荣负伤。

当天津战役快结束时，塘沽守敌见大势已去，慌忙上船，狼狈逃窜。刘亚楼即令第12纵队主力追击，歼灭其后尾3400余人。我军于1月17日占领塘沽。

天津战斗一结束，刘亚楼和各纵队指挥员立即进入市区检查天津战后情况和部队执行纪律情况。他们看到，市内除东西主攻方向的建筑物及个别工厂被炮火毁坏外，其他无大的破坏；部队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了缴获归公、原封不动，堪称楷模。刘亚楼向中央军委发了报告电。中央军委立即向各中央局和各野战军作了通报，并指出：“所有攻击天津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天津解放了，天津市人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

天津市人民是具有英勇斗争光荣传统的人民。当我军进军华北时，广大工人、学生在天津市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就开始了护厂、护校斗争。当我军攻进天津，进行巷战时，工人们自告奋勇前来带路。战士们在前面攻击，市民们拥在后面拍掌欢呼，送茶送水。战斗结束后，南开等大、中学校3000多名学生立即上街游行，庆祝解放军取得天津战役的胜利，庆祝天津解放。

天津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和战略方针的胜利，是中央军

委正确决策、指挥的胜利，是我军在人民群众热烈支援下英勇作战的胜利，也是我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共同斗争的胜利。

天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由于我军准备充分，部署正确，兵力、炮火集中，战术熟练，仅 29 小时激战，即一举攻克天津，全歼守敌。战斗过程如此之短，实力这次战役的最大特点。

天津战役，还是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等诸兵种的一次精彩的协同作战。在这次战役中参战的炮兵、坦克兵之多，是东北野战军过去进行的任何一次战役所没有的；工兵则是首次大批直接参加攻坚突破。而这样大规模的协同作战，竟如此默契，如此成功。34 万大军熟练的、合拍的协同动作和无比的英雄气概相结合，构成了这次战役中最壮观的场面。

天津一战，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于弹指一挥间，充分展示了军威。

天津战役的胜利，也检验出刘亚楼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体会精深，运用灵活，充分表现出刘亚楼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毛泽东对天津战役的胜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造了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方式”起了直接的、关键的作用，彻底打破了傅作义的幻想，迫使其不得不以“北平方式”作出历史的交代，从而加速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傅作义成为“笼中之鸟”后，一直在“战”、“走”、“和”三叉路口上犹豫不定。要战，以士气低落的 60 万军队抵挡斗志昂扬的百万解放军，谈何容易？要走，东西退路都已被切断，怎么走？要和，又顾虑重重。

傅作义曾于 1948 年 12 月 19 日派代表出城与我军谈判。刘亚楼在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八里庄会见了其代表。由于傅作义这时的打算是想成立华北联合政府，并保留军队；我方则要他解除武装，也不同意成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双方条件相距太大，谈判未获结果。当我军消灭了新保安、张家口之敌，且中共中央在宣布 43 名战犯的名单中点了傅作义的名以后，傅作义于 1 月 6 日第二次派代表出城。林彪、聂荣臻与他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认为“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不肯明确表态。1 月 13 日，傅作义得知我军即将向天津发起总攻，才急忙派他的副司令邓宝珊、少将处长周北峰出城与我方第三次谈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他们。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说：“是，我们已下命令了。”

邓宝珊又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多久？”

林彪说：“3 天。”

邓宝珊说：“恐怕 30 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30 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年，非打下来不可。”

15 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解放军攻克天津如此迅速，大出他们的意料。

战后，刘亚楼奉毛泽东的指示，将陈长捷用汽车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

见面。陈长捷一见到邓宝珊就说：“赶快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呀！”

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之下，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做了许多艰苦的争取工作之后，又受到天津大战的震撼，傅作义于1月21日终于下决心接受我方提出的一切条件，脱离蒋介石，顺应人民的意旨，宣布起义。

国民党北平守军8个军、25个师25万人，从1月22日至31日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

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于1月31日进入北平接管防务。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驻北平的盛大仪式。北平人民拥上街头，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烈欢呼北平获得新生。

在人民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刘亚楼仍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这天夜里，他摊开电文稿纸，起草关于天津作战经验教训的报告。他认为，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引的结果，是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得来的；而战斗中有些纵队协同动作不足，第二梯队使用不当，由此造成不应有的伤亡，则应认真记取教训。他向军委建议，今后作战要将反对打官僚主义仗和反对冒失行为同时着重提出。

当这篇报告写完的时候，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刘亚楼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精神也为之一振。新的战斗的一天又开始了。

鏖战在抗美援朝前线的空军司令员刘震

白矛

刘震（1915～199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刘幼安。1915年3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刘家咀。1931年10月参加县游击大队。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后，任连指导员、营政委，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1935年9月到达陕北后，任红15军团第75师第225团、第223团政委，师政委，参加劳山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8团政治处主任、政委和独立团团长。1941年任新四军第4师第10旅旅长，第3师第10旅旅长兼淮海军区司令员。1945年任中共淮海地委书记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新四军第3师副师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进军东北。1946年3月起任中共吉江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临江战役。后任第14、13兵团副司令员兼第39军军长，进军华中，参加衡宝、广西战役。1950年先后任中南军区和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1951年3月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指挥初建的志愿军空军同美国空军作战，首次取得使用喷气式飞机进行大规模空战的经验。1954年3月任空军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同年10月入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9月起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坚决斗争，遭到严重迫害。1973年起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兼自治区党委第三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至1985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8月20日于北京病逝。著有《刘震回忆录》（1990）。

* * * * *

1951年9月至1952年6月，朝鲜战场上空连续展开了大规模的空中战斗。只见一架架银鹰盘旋格斗，一道道长烟缠绕长空，一阵阵枪炮震耳欲聋，一团团火光坠落大地。在几个月的空中激烈厮杀中，首次参加大规模空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狠狠地打击了当时号称“世界第一流”的美国空军，在兄弟部队和朝鲜军民的共同努力下，粉碎了美军的“绞杀战”。

在这些不寻常的空战中，我方空军最高指挥员就是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将军。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中年轻的一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过不少次战役和战斗，从指挥单一的步兵到指挥步兵、炮兵、坦克兵协同作战，一贯英勇善战，指挥精明。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受命于艰苦危难之际，毅然承担了组织指挥志愿军空军参战的使命，迅速完成从指挥地面战斗到指挥空中战斗的转变，更加展现了他的卓越的指挥才能。本文只扼要记述刘震指挥志愿军空军作战的光辉业绩和风采。

勇于探索空战指挥的新课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接着，美帝国主义出兵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并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10月，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入朝参战。这时，美国用于朝鲜的空中力量增至15个联队，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等国的空军部队，共有作战飞机1200余架。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空军活动十分猖狂。为了掩护交通线，保卫重要目标和协同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部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志愿参加志愿军空军，在苏联防空空军的密切配合下，同朝鲜人民空军一道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

刘震于1950年10月被任命为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刚刚走马上任，又奉召进京。11月4日，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刘震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

刘亚楼说：“中央军委决定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任务是准备组织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你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刘震当即提出：“搞陆军建设和作战指挥我还有点办法，而搞空军的作战指挥却毫无经验，还是让我回中南空军组织部队的战斗训练，待日后空军进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我可以随时去学习。”

刘亚楼连忙解释：“人民空军是刚刚从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技术军种，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去干。困难肯定是会有的，但也要看到有利的条件。国家向苏联请了一批顾问，帮助我们训练机关和部队；苏联还派了一些空军部队配合我们作战。他们建军早，又有作战经验，我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这是一条捷径。”

接着，刘亚楼又对刘震说：“我们同在四野工作过，我了解你会打仗。这次调动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点你的将，经毛主席批准的。”谈话到这种程度，刘震表示只有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先试试看，不行请另调人。

刘震接受任务以后，心想：近20年来，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打了不少仗，指挥过步兵、炮兵和坦克兵，但从未指挥过航空兵作战。空中战斗是什么样子？怎样组织指挥？这对自己来说还是个“谜”。何况在陆军基础上新建的毫无空战经验的空军，要和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空军作战，这更是一个严重问题。搞得不好，对年轻的空军建设很不利，甚至有损军威国威。他为此而反复思量着，但心中有一个信念是坚定的：革命的事业从来就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赤手空拳艰难困苦中拼搏出来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如今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吗？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想到志愿军地面部队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朝鲜战场上从一开始就打了大胜仗，从而增强了信心。他想，只要在空中战斗中正确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很好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并注意学习苏联空军的经验，年轻的志愿军空军是能够在战斗中胜利成长的。

11月5日，刘震启程去沈阳，随即全力以赴地投入繁忙的工作之中。他抓紧进行机构筹建，同时为准备作战指挥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业务学习。

关于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问题，他已和刘亚楼商定一条原则，最好是抽调整套的比较成熟的建制机构来组建。但由于当时空军尚处在初建阶段，各军区空军领导机构不健全，不具备由一个单位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条件，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来解决。于是确定以空军领导机关抽调

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为主，以东北军区空军抽调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为辅，再从其他军区空军抽调部分干部及工作人员组成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奉调人员到齐以后，刘震立即组织他们分别在东北军区空军相应业务部门进行专业对口学习。

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在辽宁安东（今丹东）正式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刘震被任命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并担任党委书记。领导机构成立后，不论是机关还是部队，都以临战姿态投入战前的指挥准备和突击训练。

指挥机关抓紧熟悉即将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情况，了解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的活动，拟订作战方案；并将指挥系统的各类人员、各种电台迅速组织起来，进行严密分工，明确职责范围，进行图上作业训练。

志愿军空军部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陆续组建起来的，训练进度参差不齐，多数部队连一些战斗需要的课目还没有飞过，尚不具备作战的能力。为了加速部队的技术战术训练，争取在短期内达到参战水平，必须抓住参战必要的重点课目进行突击训练。歼击机部队重点进行特技、编队、航行和双机、四机空战训练，并练习战术协同；轰炸机部队在完成大队基本战斗训练以后，进行团编队轰炸训练，并选择部分技术好的飞行员，进行夜间单机轰炸训练；强击机部队在完成大队基本训练之后，重点进行中、大队的中低空编队、航行和对地面战术目标的攻击训练。为了进一步适应作战任务的要求，4月8日刘震又召开了参战各师领导干部会议，根据各机种的使命、性能、数量以及朝鲜战场的情况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研究制定了以战术训练为重点的战斗训练计划。4月底，各部队基本上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

4月25日至28日，志愿军空军在沈阳东陵组织了一次由参战部队飞行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飞行战术演习，共出动飞机16架。因缺乏经验，演习效果不好。总结经验后，再次进行准备，于5月28日至6月16日在沈阳、安东、辽阳之间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各机种联合飞行战术演习，共出动飞机307架次。这次演习比前次演习有了巨大进步。通过演习，研究了朝鲜战场情况，了解了各级司令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作战水平，初步摸到了组织部队在紧急情况下飞行转场和组织协同作战的方法，使各级指挥机关和部队得到了一定锻炼，战术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在演习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演习结束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初步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和各级人员的职责，对建设指挥机构、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起了一定作用。

在上述机关训练、业务学习和战术演习过程中，刘震和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听课、讨论、指挥演习，及时总结经验，细心探索空中战斗这一崭新的课题。他感到，空军的组织指挥同陆军的组织指挥大不相同，在指挥作战中既有空中指挥员对所率编队或机群实施的空中指挥，又有地面指挥员通过空中指挥员实施的对空指挥。对空指挥是空军地面指挥的主要组成部分，只有全面掌握战斗各阶段的情况，进行全过程指挥，并与空中指挥密切配合，善于发挥空中指挥员的主动性，才能形成统一的整体，保证空战的胜利。面对瞬息万变的空战情况，要求指挥员在非常短促的时间内作出迅速的判断和处置，这对于一个没有空中指挥实践的地面指挥员来说，开始是很困难的。只有虚心学习，不断探索，才能较快地完成从陆军指挥到空军指挥的转变。正如前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所长沈甸之1994年11月在一篇回忆刘震的文章中所

说：“在这长达3个多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几乎天天都和他在一起，再加上以前的经常接触，他给我最突出、最深刻的印象可以用‘谦虚谨慎、勤奋好学’这8个字来概括……在多次战斗演习过程中，他总是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同我们一起听专家们的讲课。来到安东之后，他除了常请专家们给他讲解有关的问题之外，更是抓紧一切空隙时间去友军指挥所参观学习，听取友军军长、副军长和苏联战斗英雄、空军师长阔日杜布的作战经验介绍，同他们建立了很深厚的战斗友谊。这不仅为他后来能够很快地掌握同敌人大机群作战的指挥艺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

大机群空战挫敌锐气

志愿军空军的指挥机关和部队经过短期的突击训练，即开始参加实战锻炼，以便尽快在实战中摸索一套适合自己情况的空战战术原则和组织指挥的方法。

当时，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仅在米格—15歼击机上飞了20多个小时，而面对的美国空军却是飞了上千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训练有素的飞行员。与美国空军相比较，志愿军空军在技术战术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了保障交通运输和在可能条件下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力争夺取平壤以北地区的制空权，毅然决定开赴前线，尽快投入战斗。

根据毛主席1960年12月4日批示“采取稳当办法为好”的精神，志愿军空军在大批部队投入战斗之前，先以大队和团为单位开赴前线，在苏联防空空军帮助下进行实战练习。最先承担实战练习任务的是空第4师第10团第28大队。出战前，朱总司令亲临辽宁辽阳机场检阅空第4师，观看了部队的飞行表演，勉励大家说：“你们飞得很好。你们的任务很光荣，即将开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前方的部队正盼望着你们。希望你们在政治思想上和技术战术上不断提高，成为战无不胜的空中英雄……”陪同的刘亚楼和刘震都讲了话。刘震说：“总司令来看望大家意义非常重大。空第4师是空军第一个组建起来的部队，现在又准备第一个去朝鲜战场参战。中央首长对我们寄托极大的希望。我们决不辜负首长的期望，要认真搞好战前训练和参战准备，争取首战必胜。”朱总司令的亲切关怀，极大地鼓舞了空第4师及其他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大家纷纷上书毛主席、朱总司令和领导机关，请求战斗任务，并表示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不怕任何困难，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第28大队由辽阳开赴安东浪头机场后，经过充分的战前准备和几次战斗出动，于1951年1月21日与美国空军打了第一仗，大队长李汉击伤敌F—84飞机1架，首创战功。接着他又在1月29日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初战的胜利证明，年轻的志愿军空军虽然飞行技术水平很低，毫无空战经验，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具有英勇无敌的光辉传统和陆战的经验，在经过短期实战训练后，就能同美国空军交锋，而且能够击信它。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各参战部队的战斗意志，为后来大批部队成团成师进行较大规模实战锻炼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8月，美军为了夺取军事上和停战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在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其空军发动了以摧毁朝鲜北部铁路、公路系统，切断中朝人民军队运输补给线为目标的“绞杀战”。当时，侵朝美国空军增至19个联（大）队，作战飞机1400余架，空中活动十分猖狂。为了粉碎美空军的

“绞杀战”计划，志愿军空军从9月开始采取轮番进入，以师为单位陆续参战。

面对这样的任务，刘震考虑敌我空战必将越打越激烈，必须充分动员参战部队做好迎击敌大机群作战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战斗间隙加紧飞行技术战术训练。他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认真组织参战部队轮番进入，把朝鲜空中战场当作一个大学校，不失时机地锻炼大批部队。

大批部队锻炼和大规模空战的飞机起降，就产生了作战基地问题。当初，刘震同苏联顾问在这个问题上就有过争论。1951年9月22日，他在志愿军司令部向彭老总汇报时，首先就敌我兵力和技术条件的优劣作了对比。他认为，志愿军空军进驻朝鲜北部基地有许多不利之处：一是昼间敌战斗掩护轰炸机来轰炸我方机场时，我歼击机起飞迎战，如机场被破坏，只有飞回安东等地的机场着陆，有时油料不够就成问题；二是夜间敌机若来轰炸，我机限于技术条件不可能起飞迎战，坐守待毙，损失就更大了；三是机场跑道一旦被炸坏，抢修时将影响飞机起降，如遭连续轰炸就更难抢修。事实上，当时朝鲜北部的新机场一直修不起来，往往上午修好，下午就被炸坏，晚上修好了，翌早又被破坏。在修建过程中，6个新建机场共被炸72次，中弹6800余颗，其中落在跑道、滑行道附近的占33%，严重影响了机场的使用。空军没有机场，怎么起飞作战？因此，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条件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认为志愿军空军仍以安东一线作基地是切合实际的。彭老总同意他的建议。后来军委决定志愿军空军不进驻朝鲜机场作战。

为了适应大机群作战的需要，志愿军空军逐步健全了指挥系统，及时调整了雷达部署和通讯网络，重新划定作战空域，进一步明确了组织指挥的有关问题。指挥机构的建立，是以志愿军空军指挥所为核心，包括各师、团指挥所，前方指挥所和辅助指挥所，以及各雷达站、地面对空观察哨和情报站等保证设施在内的一个完整统一的指挥体系。指挥关系的确定，是根据我军的指挥原则和空中作战的特点，由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实施集中指挥；每次战斗行动所有起飞作战的飞机，均由刘震及其助手直接进行指挥和控制。各参战部队的指挥所，一般担负本部队起飞着陆的指挥任务。前方辅助指挥所和对空观察引导站，负责协助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的指挥引导。基本的指挥方法是：部队的战斗出动按计划实施。头一天由志愿军空军指挥所确定出动兵力和顺序，规定好任务；第二天起飞前再作必要的调整。机群（编队）起飞时机，是根据当时空中敌情决定的。起飞后要把机群（编队）引导到作战空域，指挥空中机群（编队）占据有利位置，搜索发现并攻击目标。发现目标和退出攻击之间这一段，主要由空中指挥员指挥；但地面指挥员仍给空中必要的提醒和通报情况，并指挥退出空战和返航。在特殊情况下，刘震还直接指挥机群（编队）的某个空中指挥员。

9月25日，大规模的激烈空战进入高潮。15时许，敌机出动5批112架，其中战斗截击机和战斗轰炸机102架，轰炸机10架。敌机活动于顺川、安州、平壤等地上空，企图破坏铁路和公路运输线。志愿军空军和友军共出动飞机144架，直奔战区。空第4师第12团第1大队长李永泰很快发现敌机，率先带领本大队冲向左下方8架F—84战斗轰炸机，美机见势不妙，慌忙四散逃去。这时，有两批8架F—86战斗截击机从左、右方袭来，李永泰迅速左转上升，爬高占位准备反击，不料飞机突然中弹。此时另4架F—86敌机

也从后上方俯冲过来，处境十分危急，僚机权太万马上冲过来将美机驱散。在李永泰、权太万与美机格斗时，僚机组陈恒、刘涌新奋不顾身地进行掩护。激战中队形分散，刘涌新发扬孤胆作战精神，与6架F—86展开格斗，死死咬住1架敌机穷追不放，一阵猛射，将其击落，首创击落美机最先进的F—86的战绩。他后遭5架美机围攻，不幸被敌击落，壮烈牺牲。李永泰机智勇敢地与美机格斗，终于驾驶着负伤五六处的飞机安全返回基地。他后来被同志们称为“空中坦克”。

继9月25日空战后，26日、27日两天，志愿军空军又连续出动，同美国空军展开大机群空战，3天内共击落美机26架，击伤8架。志愿军空军与友军协同作战行动，使美国空军连日受挫。他们

因此大为震动，宣称：“这3天战斗是历史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喷气机战役，而且也显示了共产党的飞机与飞行技术已经改进

了”，不得不承认我方空军“严重地阻碍着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铁路线的活动”。10月2日，毛主席看到战报后，当即写了“空4师奋

勇作战，甚好甚慰”的批语，给予志愿军空军极大鼓舞。

10月上、中旬，志愿军空军又连续进行了8次大机群空战，一

次比一次打得漂亮，尤其是10月5日和10日两次战斗更为出色。5日上午，刘震命令空第4师出动42架歼击机，飞至清川江地区上空迎战美机，掩护地面部队渡江。空战中，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基本保持双机、4机攻击，长僚机协同密切，击落敌F—86飞机3架，击伤2架；我被击落1架。10日下午，我军分两个梯队出战，第4师第10团18架飞机为第一梯队，至安州上空，发现敌机群。空战中，第2大队将10架敌机误认为我机，因而陷入敌阵。经奋力拼搏，将敌机驱散，大队长李宪刚击落敌机1架，2号机胡树和击伤敌机1架。第二梯队第4师第12团起飞20架歼击机到清川江一带，掩护一梯队退出战斗。在空战中，第2大队长华龙毅击落敌机2架，3号机击落敌机1架。这天的战斗打得干净利落，共击落敌机4架，击伤1架，我无损失。

在这个月里，我方空军和高炮部队积极配合，英勇作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敌人不得不承认我方空军“在朝鲜的活动达到高潮，而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陷入危险境地”。敌B—29轰炸机被迫改在夜间活动。

空第3师参战后，从11月2日至10日，连续与美国空军分散活动的小机群空战5次，击落击伤美机8架，而自己仅轻伤1架。刘震及时召集部队指挥员、飞行员研究总结打小机群活动的经验，确定把陆军打游击的战法用于空战，即根据敌机的活动规律一出动时间、批次、架次以及活动空域等，我机提前起飞，隐蔽待机，突然攻击。在大机群空战的同时，我方组织精干的小编队插到敌大机群侧后，对我冲散的敌单机、双机和四机进行大胆攻击。

11月18日，刘震指挥空第3师打了一个漂亮仗。当天14时许，敌机数批侵入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轰炸扫射。14时24分，第3师第9团16架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美国空军F—84战斗轰炸机20余架正沿西海岸线北进。刘震急令空中指挥员林虎以突然猛烈的动作冲向敌机群，打乱敌机队形，造成有利于我各个击破的态势。这时，第1大队长王海忽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余架F—84袭击清川江大桥，他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率本大队冲了上去。我机的出现完全出敌不意，敌编队慌

乱，仓促应战。王海乘势发挥我机优越的垂直机动优势，令编队作了几次疾速爬高和俯冲，使敌机队形大乱。王海和僚机焦景文抓住战机，频频瞄准开炮，各击落2架敌机。4号机孙生禄发扬“刺刀见红”的精神，在300米距离用猛烈的炮火将敌机打得凌空开花。志愿军空军越战越强，越打越精，11月23日又取得了8：1的战果。当日12时45分，美国空军F—86、F—84、F—80型飞机数批向北窜犯，企图袭击肃川、清川江铁路运输线。刘震令空第3师第7团迎战。副团长孟进率领20架歼击机起飞，当飞至肃川上空时，发现北窜的20架F—84战斗轰炸机，经激烈空战打退了敌机的进袭。空战中，孟进能够区分战斗任务，大部分飞行员保持了双机攻击。第1大队大队长刘玉堤率领第2中队猛追向海面逃窜的2架F—84。敌机迅速下降企图摆脱，刘玉堤紧追不放，并令其僚机打击敌僚机，自己则乘敌长机刚一拉起时将其击落。此时敌僚机已从他右前方左转弯，在约距130米处掠过。刘玉堤疾速开炮，又将其击落。当刘玉堤由海上飞抵永柔以北上空时，发现正下方敌机1架。正当敌机左转弯绕山头时，他很快切半径，瞄准攻击，再击落1架。刘玉堤在退出攻击跃升至5000米时，又发现清川江口上空有50余架敌机。在几十倍于己的敌阵面前，他毫不畏惧，坚决向敌机群冲击。当他隐蔽接敌至200米时，突然被敌机发觉。敌分路而逃，刘跟随右转攻击，又击落敌机1架。此时第2、3大队亦相继击落敌机3架，击伤1架。这次空战我空军打出了高水平，取得了击落敌机7架、击伤1架的辉煌战果，自己仅伤1架。刘玉堤创一次空战击落敌机4架的记录。

侵朝美国空军改装F—86E型战斗截击机后，妄图凭借装备的优势，组织100至200架大型混合机群对我侵袭。此时刘震认为，年轻的志愿军空军经过一年的空战锻炼，已迅速壮大起来，指挥机构和参战部队都取得了一些经验。在战术技术上，我们不仅能打F—84、F—80战斗轰炸机，也敢打敌最先进的F—86战斗截击机；不仅能打敌小机群，也敢打敌大机群。在12月2日、5日、8日的空战中，空第3师参加了敌我双方达300架飞机的大规模空战。飞行员作战勇敢，越打越强，取得了击落F—86飞机9架、F—84飞机4架，击伤F—86飞机2架的战果。1952年2月1日，毛主席看到空第3师的战报后，欣然写下“向空军第3师致祝贺”的批语，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空军部队。他们决心继续杀敌立功，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空第4师、空第3师先后参加大规模空战取得初步经验后，刘震同其他领导同志商定，由这两个师带领新部队参战，加速各部队的轮战锻炼。

12月13日下午，空第14师第40团出动18架歼击机，在空第3师第9团18架飞机掩护下，迎战在平壤东北方向活动的美国空军F—84战斗轰炸机编队。当我机飞到博川西南上空时，遭到敌F—86战斗截击机的偷袭。在激战中，第40团击落击伤美机3架，自己也遭受了较大损失。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编队协同不好，尤其是攻击队的编队距离拉得太长，不仅本身不能集中兵力反击敌人，而且使担任掩护的部队顾此失彼。

15日上午，第14师第42团出动18架歼击机，由第3师第9团16架飞机担任掩护，仍是在平壤地区上空打击敌战斗轰炸机。空战中，整个空中编队保持着良好队形，以大速度接敌，很快发现了敌机。为保证第42团攻击的安全，第9团在掩护的同时主动支援，积极驱逐和消灭来袭之敌。战斗结果，第42团击落敌机2架；第9团不但完成了掩护任务，而且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9架的战绩。刘震非常重视这两次空战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

1952年3月24日上午，第15师第43团起飞12架飞机，在第4师第10团12架飞机的配合下，迎击清川江上空8架F—80美机。当我空中编队发现并判明敌机是F—80后迅速报告指挥所时，刘震果断命令：“就这一批，要狠狠地打！”空战中，第43团第1大队飞行员韩德彩随长机攻击4架敌机时，机警地反击威胁我机的另4架敌机，将敌长机击落。尔后他继续攻击，又击落敌机1架。对于韩德彩在空战紧急情况下机智勇敢的表现，刘震极为赞扬。当天下午，他在指挥所会见了韩德彩，当面了解情况，共同总结经验。1995年1月，韩德彩在一篇回忆刘震的文章中这样说：“那次召见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非常深刻。在此之前，我听到兄弟部队参战的飞行员说过，刘司令指挥果断，还善于听取飞行员的意见，每次空战后都耐心地倾听飞行员讲的每个细节，询问敌人在空战中的长处和短处。通过这次召见，我深切体会到刘司令指挥的认真细致和对部属的热情和蔼。”

截至1952年5月底，志愿军空军有歼击航空兵9个师（即空4、3、14、2、6、15、12、17、18师）共18个团按计划进行了轮战。部队每次空战之后，志愿军空军都要求他们发扬军事民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打一仗进一步，吃一堑长一智。许许多多的战例反复说明：凡是我机能够保持编队作战，指挥协同得好，几乎每次都取得了胜利；反之，就会失利。随着空战规模的增大和美国空军战术的改变，刘震逐步认识到编队协同在空战中的重要性，以及探求空战战术原则的迫切性。

志愿军空军参战之初，根据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和我军传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大胆细心”、“周密准备”、“以多胜少”、“机动灵活”、“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等一般的原则和要求。当时，志愿军空军部队刚刚学习空战，作战对象是F—80、F—84战斗轰炸机，而且又多是中小机群。虽然从上到下都很重视作战方法的研究和作战经验的总结，但因参战时间短，实战机会少，系统地解决空战战术的条件还不成熟。到1951年9月至11月间，志愿军空军在与美国空军F—86、F—84的混合机群打了几次大规模空战之后，解决空战战术问题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美国空军在朝鲜战争初期，主要活动是轰炸朝、中方面的地面目标和支援其地面军队作战。志愿军空军参战后，双方才展开了空战。开始，美国空军基本上是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塞式飞机使用的大编队的作战方法，对喷气式飞机的使用还处于摸索阶段。当志愿军空军日益壮大，美机不断遭到严重打击，从而丧失了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的“空中优势”之后，便将更多的F—86战斗截击机用于空战，并加紧研究改进空战战术。他们根据喷气式飞机快速灵活的特点，很快放弃了不利于机动的大编队作战，而采取“流动4机”的作战方法，即用若干个流动4机小队，按不同间隔和不同高度梯次配置，进入战区巡逻。美国空军还重视采用由两个16机组成的大纵深、多层次机群，相互支援进行活动。当发现志愿军空军的飞机后，各个4机、8机、16机等不同编队，就一齐奔向目标进行攻击和偷袭，或者诱使我机分散，尔后进行攻击。美国空军运用这些新的作战方法，一时在空战中取得了主动。

刘震在安东曾多次同刘亚楼谈过敌我空中斗争的具体情况及其战斗特点，说明我方在参战初期多以小编队、多梯队和多层次配置作战，这种打法比较灵活机动，战果也比较好。后来采取大编队、大机群出战，就显得不灵活，敌我双方一接触即被打散。美机被打散后尚能保持4机或双机作战；而我机保持4机作战有困难，一般只能保持双机作战，有时还形成单机，造成被动

挨打的不利局面，被击落击伤的飞机多半是单机，因此，我军宜采取多批小编队、分梯次进入战区，集中兵力于一个空域，并力求保持4机或双机协同作战，这样就灵活得多，也容易争取主动权。这些意见，刘震也曾多次征求过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和广大飞行员的意见，并发动各机关、部队广泛开展战术研究活动，让大家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刘震在空战指挥上的实践体会和部队的战术研究，为1952年4月以后空军党委逐步形成和完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起了重要作用。

“一域多层四四制”的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和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最少配置两层），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联系或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具体说来，“一域”，是指同批升空作战的部队在一个空中区域内进行战斗，始终保持在以领队长机为核心的目视联系或战术联系的距离之内，空域的转移以领队长机的位置为转移；“多层”，是指升空作战的部队，在队形配备上至少分为高低两层，以便前后上下相互支援和掩护；“四四制”，是指在战斗中最好能经常保持每4架飞机为一个基本战斗单位，投入攻击或与敌缠斗，以便双机互相交替攻击掩护，避免敌机偷袭。可见，“一域”是这条战术原则的核心。能否保持在一个空域作战，是关系到集中力量和分散力量的问题。“四四制”是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实行双机攻击双机掩护的有效战法。

随着志愿军空军部队的战斗力逐步加强，战术思想逐步提高，美国空军遭受的打击也越来越重。美军在清川江以北的空中优势受到很大的削弱，被迫放弃对新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区”的封锁。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美方不得不承认：“米格曾把战斗轰炸机逐回清川江以南”，“对铁路线进行历时10个月的全面空中封锁，并没有将共军挫伤到足以迫使其接受联合国军等方面的停战条件的地步”，“绞杀战是失败了”。

支援地面军队的尝试

志愿军空军在进行反“绞杀战”的同时，还协同地面部队攻占了朝鲜北部西海域岛屿。

楸岛和大、小和岛位于鸭绿江口外的朝鲜西海域，是美军和南朝鲜军的重要前哨阵地，驻有南朝鲜军队的“白马部队”及美国和南朝鲜情报机关人员1200余人，部署有雷达、对空情报台和窃听设施，专门搜集朝、中两国的军事情报，特别是我空军活动情况，引导作战飞机袭击我方地面目标和空战。为消灭岛上之敌，摧毁敌情报机构，解除我侧后威胁，配合板门店谈判，志愿军总部决心以志愿军空军协同志愿军第50军夺取这些岛屿。空军的具体任务是：掩护第50军登陆部队集结地域；对大和岛、小和岛进行航空照相侦察，并摧毁敌情报指挥机构；轰炸大和岛、小和岛附近海域的敌舰。

受领任务后，刘震于1951年10月29日同第50军首长一起商定了协同作战计划，并向参战空军部队作了部署，要求严格按照陆空协同计划执行，很好地为地面部队服务。

11月2日10时11分，空第3师第7团第2大队副大队长汪永楼率米格—15歼击机4架，到楸岛、大和岛、小和岛进行照相侦察；另一个中队担任

掩护。12时13分，由空第2师第4团副团长张华率拉—11歼击机4架，对上述地区进行了第二次照相侦察。经过两次照相侦察，查明了岛上敌人的部署和工事情况，为地面部队登陆作战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11月5日夜，第50军按预定计划攻占了椴岛。为了巩固登陆战果，11月6日，空第8师第22团第2大队出动图—2轰炸机9架，携带爆破杀伤弹72颗、燃烧弹9颗，由大队长韩明阳率领，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组成大队品字队形出航，对大和岛进行轰炸；空第2师第4团出动拉—11歼击机16架，由副团长张华率领，从凤城机场起飞，与轰炸机会合后担任直接护航；空第3师第7团出动米格—15歼击机24架，从安东浪头机场起飞，在宣川西南身弥岛上空负责警戒，掩护轰炸机执行任务。轰炸机编队在歼击机编队掩护下，于15时39分飞抵大和岛上空。一声令下，顿时全部炸弹倾泻敌阵，岛上一片火海。

这次作战，由于行动突然，组织严密，各机种配合默契，未遭敌机拦阻，取得了较大的战果。我机共投弹81颗，命中72颗，命中率为89%。此战彻底摧毁了目标，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登陆部队完成了巩固椴岛的任务。

大和岛遭我机轰炸后，残存之敌加强了戒备，继续搜集侦听我空军活动情况，并每天派遣3艘军舰到大和岛、小和岛附近海域炮击我椴岛守卫部队。

经过紧张的战斗准备，第50军决定于11月30日23时攻占大、小和岛。为扫清外围，11月29日23时15分，空第10师第28团出动图—2轰炸机10架，携带炸弹54颗、照明弹33颗，在大队长姚长川率领下从辽阳机场起飞，采用单机连续跟进队形，对大、小和岛和敌舰进行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轰炸机首次夜间执行任务。因缺乏经验，投弹未中，但把在那里活动的几艘敌舰吓跑了，为我登部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1月30日下午，担任主攻的地面部队在前沿岛屿上做好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只待配合作战的轰炸机群采取行动后发起总攻。14时20分，空第8师第24团出动图—2轰炸机9架，携带爆破杀伤弹63颗、燃烧弹18颗，由第1大队大队长高月明率领，从沈阳于洪屯机场起飞。机群以大队纵队队形经奉集堡出航，在凤城空域与担任护航的空第2师第4团16架拉—11歼击机会合，组成联合机群，随即向大和岛上空飞去。另外，空第3师第7团出动米格—15歼击机24架，至身弥岛上空巡逻掩护。

当我联合机群经龙岩浦刚飞入海面上空时，突然发现美空军F—86战斗截击机30多架正冲向我机群。这时，因空第3师第7团担任巡逻掩护的歼击机编队高得太远，已来不及截击突袭的敌机，形势十分险恶。顷刻间，轰炸机的枪炮向敌机猛烈开火，护航的歼击机也和敌机展开了英勇搏斗。长空中，海面上，炮声隆隆，火光闪闪。

敌机气势汹汹，全力向我联合机群发起进攻。敌人以主要兵力从左、右后上方俯冲穿插攻击我轰炸机群的中间中队，另以部分兵力箝制和吸引我护航歼击机离开轰炸机，妄图打乱我联合机群的战斗队形，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根据空中的敌我态势，按照陆空协同的作战计划，刘震当即命令：“坚决前进，完成任务！”

我联合机群在领队长机高月明的率领下，一面指挥保持并及时调整队形，展开激烈空战，一面冲破敌机拦阻，继续飞向目标。第2中队长张孚琰

驾驶的僚机被敌机击中起火，仍然顽强地跟上编队，但终因飞机失去操纵坠入海中，壮烈牺牲。

敌人见我机且战且进，勇往直前，无法拦阻，便集中兵力攻击我轰炸机编队后尾的第3中队。第3中队的处境更加困难，但他们没有被敌人疯狂袭击所吓倒，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宋凤声驾驶的左僚机两台发动机被敌机击中起火，烈火和浓烟钻入座舱，机毁人亡的危险威胁着机组的每个成员。宋凤声慷慨激昂地发出命令：“你们赶快跳伞，我留下完成任务！”

“机长，我不跳！”领航员斩钉截铁地说。

“要活我们一起活，要死我们一起死！”后舱射击员和通信员急切地回答机长。

“不！不能作无谓的牺牲。赶快执行命令！”

战友们强忍着心痛和泪水，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跳伞了。宋凤声驾驶战鹰向大和岛的敌人老巢冲去，壮烈牺牲。

此时，梁志坚驾驶的右僚机也被美机击落了，只剩下中队长邢高科驾驶的长机。敌人仗着优势，轮番地俯冲攻击。邢高科叮嘱机组同志：“要坚持住，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支援前面机组去完成任务！”他沉着地驾驶着飞机作机动飞行，使敌人难以瞄准射击，只能胡乱开炮。邢高科镇定后如，一面前进，一面开炮还击。通信长刘绍基头部负伤，鲜血直流，仍然抱着机枪对准敌机猛射，击落敌机1架，开创了以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先例。

我轰炸机编队已被击落3架，其余6架也有5架负伤，但在领队长机高月明坚定沉着的指挥下，始终保持队形，继续前进。此时，敌机又扑了过来。第1中队右僚机毕武斌驾驶的飞机多处负伤，在接近目标时，又被击中起火。他抱定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驾驶冒着熊熊烈火的飞机，直向大和岛冲去，但因飞机负伤过重而坠海，机组成员光荣牺牲。

誓为战友复仇的勇士们，在高月明的率领下击退了敌人三四十次攻击，终于冲破了敌机的层层拦阻，顽强地飞到大和岛上空，把复仇的炸弹全部倾泻下去。大和岛上，弹片横飞，浓烟翻滚，火光冲天，美国 and 南朝鲜军巢穴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在轰炸机的勇士们顽强抗击敌机一次又一次凶猛攻击的同时，直接护航的拉—11歼击机飞行员也进行了激烈空战。他们充分发挥拉—11活塞式歼击机灵活机动的性能和火炮的威力，在我轰炸机周围1000米范围内与敌人反复纠缠格斗。副大队长王天保眼明手快，瞄准敌机频频开炮，击落敌F—84飞机1架，击伤3架。大队长徐怀堂和他的战友又击落击伤敌机3架。美国空军大肆吹嘘的F—86喷气式飞机，却被我拉—11活塞式歼击机击落击伤，这是空战史上的创举。

地面攻岛部队于当晚乘船疾驶，迅速登岸，一举攻占大、小和岛，彻底捣毁了美国 and 南朝鲜特务部队的巢穴。

这次战斗，我空军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坚定沉着地和敌人展开激烈的空战。尤其是轰炸机编队打得非常顽强，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志愿军空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空第8师追悼烈士的大会上，同志们敬献了不少挽词和挽联，寄托了大家的哀思。其中有这样的语句：“大和岛上神鹰坠，空军出现董存瑞。”烈士们的高大形象深刻教育了大家，更加激发了部队的斗志。

在这次支援地面军队的战斗任务中，由于轰炸机始终保持编队，在拉—11 歼击机的掩护下，且战且进，直抵目标上空进行轰炸，完成了任务，得到了锻炼，初步摸到了联合机群协同作战的经验，并且开创了世界空战史上以活塞式歼击机和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光辉范例。但由于缺乏经验，组织不周密，轰炸机编队提前 5 分钟出航，未向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报告，担任护航的空第 3 师歼击机与轰炸机编队之间的协同没有搞好，以致联合机群遭到美机袭击时得不到歼击机编队的有利支援，使我空军遭受了较严重的损失。

打掉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

1952 年春，美国空军为了加强其空战力量，增调一批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校级飞行员和“王牌”飞行员到朝鲜作战。但是，在经过实战锻炼一年多的志愿军空军面前，美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也不会有好下场。

2 月 9 日晚，刘震召集他的助手及有关人员在志愿军空军指挥所开会分析敌情，研究作战方案。根据敌机活动的规律，他们发现敌人每天早晨总要出动 30 多架飞机到鸭绿江以南侦察天气，而志愿军空军前一段时期从未在早晨打过空战。因此，刘震决定出敌不意打一仗。遂令作战部队的飞行员明天不吃早饭，只吃些点心和牛奶，于 4 时 30 分以前作好一等战备，听令出动。制定好作战预案，会议到半夜才结束。刘震稍休息一下，于翌日 3 时进入指挥所，检查作战部队的战斗准备，了解天气情况，并作了周密部署。

10 日 5 时，空中布满薄云。我雷达发现敌机数批先后侵入平壤、沙里院和价川地区，其中 F—84、F—80 战斗轰炸机 16 架，在 18 架 F—86 战斗截击机的掩护下直向铁山半岛飞来。按作战顶案，刘震命令空第 4 师起飞两个团，空第 3 师作好二等准备。空第 4 师依令起飞米格—15 歼击机 34 架，其中第 10 团 16 架为攻击队，第 12 团 18 架为掩护队。我空军编队急速飞往战区。

当时气象条件比较复杂，刘震在指挥所密切注视空中情况，并不时向空中通报敌情，发出命令：“加强戒备，注意搜索敌机！”飞行员们聚精会神，高度戒备，一双双犀利的眼睛严密地监视着四周。他们知道，在空战中谁能先发现目标，谁就能夺取主动权。

在搜索中，第 12 团第 3 大队大队长张积慧隐约地发现在远方海面上空有一道道白烟。“是敌机！”他立即将情况向刘震和带队长机报告。刘震果断地命令：“这批敌人是‘狗熊’（美空军主力之一的第 4 联队），你们要狠狠地打！”张积慧仔细观察敌机的动向后，和僚机单子玉同时猛拉操纵杆，爬高占位，准备攻击。当他们抢占到高度优势时，敌机却不见了，反而使自己脱离了编队。一时找不到敌机，他们只好加大油门，追赶编队，继续搜索目标。突然，张积慧从右后方云层间隙中发现 8 架敌机直窜下来，为首的 2 架敌机已经猛扑到他们飞机的后尾。张积慧赶紧把敌情报告给刘震和带队长机。刘震即令张积慧冲散敌机，各个歼灭。

敌机同张积慧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快就要到开炮的距离。张积慧提醒单子玉：“注意保持双机！”然后猛然来了一个右侧上升。敌双机冷不防扑了个空，从我机腹下面冲到了前头。张积慧顺势咬住了敌长机。敌机见势不妙，拼命摆脱，先是急俯冲，迅即又向太阳方向作剧烈垂直上升。我双机因对着太阳不便跟踪，遂一面急跃升，一面向左侧开，避开了刺眼的阳光，迅速跟

了上去。敌机仍见我机尾追其后，又俯冲逃脱。我双机也立即冲了下去，紧追不舍。眼看到了开炮距离，张积慧一按炮钮，一串串炮弹射出，可惜由于角度不对未打中。敌机吓得魂飞魄散，仓惶逃跑。张积慧在单子玉的掩护下，仍紧追不放。在 600 米的距离上，他瞄准射击，三炮齐发。敌机立即冒出一股浓烟，坠毁在朝鲜博川郡青尤面三光里北面的山坡上。

张积慧击落敌长机后，迅速拉起，稍抬机头，又瞄准了敌僚机。敌僚机看到自己的长机被击落，惊慌地做着不规则的飞行动作，极力摆脱我机。当张积慧向其逼近正准备开炮时，敌机突然来了个上升转弯，扭头就跑。张积慧也敏捷地作上升转弯，并从内圈切半径追了上去。在 400 米的距离上，他瞄准射击，一炮就打得敌机凌空开花，七零八落地向下坠去。

空战快结束时，气象员突然向刘震报告：“司令员，海上云层急速向大陆上空飘移，再过 15 分钟，沿海各机场将被云层封闭，我机不能着陆。”此时，敌机二梯队正向战区增援。情况紧急，如何处置？刘震考虑，如今空第 4 师返航，敌机二梯队势必向我机追击，可能遭受大的损失；如第 4 师不及时退出战斗，就不能安全着陆。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震果断下定决心，命令二梯队出航，在鸭绿江对岸上空阻拦敌机，以掩护第 4 师退出战斗；并令第 4 师以大队为单位分别在青椅山、浪头、大东沟、大孤山等机场抢时间着陆，如果还有一部分不能着陆，油料够用时，可到辽阳、沈阳等二线机场着陆。空第 4 师飞行员听从指挥，有几个机场在最后几架飞机着陆时能见度不到 1000 米。他们特别沉着、细心，全部安全着陆。当时刘震十分担心，万一有些飞机不能安全着陆，就只有让飞行员跳伞，由他自己向上级承担责任。这一天紧张的空战指挥，使刘震疲劳不已，不得不由工作人员扶他走出指挥所。

这次空战结束后，当地的志愿军陆军从敌机残骸中找到一枚飞行员的不锈钢证章，上面刻着美国空军第 4 联队第 334 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少校的名字。这个戴维斯有着约 3000 小时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参加战斗飞行 266 次，被美国空军吹嘘为“百战不倦”的“特别勇敢善战”的“空中英雄”、“成绩最高的喷气机王牌驾驶员”。他到朝鲜后异常疯狂，到被击落时已进行了 59 次战斗飞行，两手沾满了朝鲜人民的鲜血，最后落了个可耻可悲的下场。

打掉戴维斯，使这次空战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1952 年 2 月 13 日，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是一个悲惨的损失”。美国空军是在“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美国国会也因此大为震惊，参议员、共和党领袖勃里奇在国会会议上大发雷霆说：以目前这样方式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绝望的战争”，“战场上的士兵们大为丧气”。

展示军政领导的全面才华

侵朝美军在其“绞杀战”失败后，从 1952 年夏季开始，将空中突击的重点转向工业设施与城镇，企图通过“从空中施加压力”，迫使朝中方面接受其停战条件。6 月 23 日，敌方突然以 350 架飞机的密集突击袭击了水丰发电站。此后，志愿军空军开始了以保卫重要目标为重点的作战，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刘震部署了作战任务，区分一、二线兵力配

置，共以7个师14个团的歼击机部队投入战斗。这个阶段的初期，他除以主要精力组织指挥部队实施保卫重要目标的作战外，还为空军师、校以上机关到志愿军空军指挥机构轮番见习做了许多工作。他经常亲自介绍作战情况，交谈自己在空战指挥中的经验体会，尽可能地使见习人员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直到当年秋末，他才逐步将自己的指挥任务移交给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代理。

刘震在志愿军空军工作期间，身为军事指挥员，又担任党委书记，除以主要精力抓作战指挥外，还要考虑和部署各方面的工作。

由于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组建初期没有政治委员，后来兼任的政委又不能在前线，加之志愿军空军政治部长期没有主任，仅由一位副主任主持工作，因而兼任党委书记的刘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责任更为重大。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他一直担任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事指挥员的同时，他又多次兼任过政治委员或党委书记的职务，全面负责组织指挥部队的战斗行动，十分重视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的结合，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渗透到军事指挥工作中去。根据陆军的经验，结合空军的具体情况，当时志愿军空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包括：从深入、及时的思想教育入手，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发扬军事民主，保证战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培养和树立一切为空战胜利服务的思想，加强地面保障工作；开展战时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政治干部钻研战术技术，改进领导作风，等等。

抗美援朝时的空中作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使用喷气式飞机的作战。在当时敌强我弱、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贯彻“在战斗中成长”的思想，充分发挥政治上、思想上的优势，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是参战部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对部队普遍进行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教育的同时，还针对各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的不同情况，及时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引导部队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另外，还反复教育飞行人员学习陆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把陆军那种敢于打硬仗、打恶仗，敢于近战歼敌、刺刀见红的精神运用到空战中去，激励大家正视困难，敢于战斗，善于战斗。这些工作都为空战胜利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才在空军中出现了“空中坦克”和“空军董存瑞”等英雄人物。被称为“中国的无脚飞将军”的第15师飞行员孙忠国，在一次空战中跳伞负重伤，右腿折断。在住院治疗中，他忍受极大痛苦，钢条穿骨3次才接上骨头。他边治疗边锻炼，经过8个月的努力，终于恢复健康，重返蓝天。

发扬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现代化的空中作战，必须群策群力才能使战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志愿军空军在发扬军事民主中，广泛采用的方式是，开展战前“出情况，想办法，定方案”和战后“评指挥，评动作，评纪律”的活动。这是一种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战术学习方法，也是发动群众总结战术经验、提高作战能力的有效途径。两者彼此衔接，形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战前“出情况”，就是打什么样的仗出什么样的情况，根据敌我情况和战术规律的变化摆出可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然后运用开“诸葛亮会”的形式，让大家针对所出的情况想办法，找出具体对策。最后将大家提出的许多办法（一种情况允许有几种处置办法）加以归纳总结，作出明确的结论，这就是“定方案”。战后“评指挥”，就是

全体参战飞行员、空中和地面指挥员民主评议空地指挥的优缺点，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改进指挥的意见和办法，帮助指挥员总结经验，发现并纠正指挥上的缺点和错误。“评动作”，就是互相评判每个人在空战中的具体动作是否合乎战术要求，交流推广成功的动作与经验，提出改进错误动作的方法。“评纪律”，就是在评动作的基础上，表扬听从指挥、遵守纪律、密切协同、英勇顽强、支援战友的好人好事，批评违反战场纪律、破坏战斗集体的行为，以加强部队组织纪律观念，培养优良的战斗作风。

空战胜利的取得是依靠飞行员之间、空地勤之间的密切配合与共同奋斗。长机和僚机是一个基本战斗单位。因此，要教育歼击机飞行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保持双机作战，纠正有些僚机飞行员认为“当僚机不容易直接取得战果，没有出息”的错误思想，使他们真正懂得“掩护好长机是僚机的光荣职责”、“长机击落敌机也有僚机的功劳”、“援救一个战友是高尚的革命品质的表现，比击落一架敌机更重要”等等道理。僚机飞行员焦景文在一次空战中不顾敌机正向自己攻击的危险，坚决保护长机，直扑正向长机攻击的敌机，开炮将其击落。在他的掩护下，长机也击落了敌机。僚机飞行员杨振玉在一次空战后返航途中，见敌机偷袭我另一编队，就勇猛地攻入敌机群，支援了战友，消灭并驱逐了敌人。志愿军空军政治部及时表彰并宣传了这些团结奋斗、主动支援的典型事迹。后来，志愿军空军还实行了评定长僚机直接或间接战果的制度。即无论长机或僚机，凡在空战中直接向敌机开炮击落击伤敌机者，称直接战果；凡在僚机位置上掩护长机安全攻击，因而使长机击落击伤敌机者，长机的直接战果称击落或击伤敌机几架，僚机的间接战果称间接击落击伤敌机几架。这些做法，起到了教育部队、鼓舞斗志的作用。

在志愿军空军部队中，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胜利的表现空中，胜利的保证在地面”。这个口号生动地说明了地面的保障工作是决定空战胜利的重要因素。战时地面保障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战斗力的强弱与战斗的胜负。如果机务、供应工作保障不良，一架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实际上就减少了双机甚至4机的战斗力；如果一个空中指挥员的飞机不能按时安全起飞，更会影响到空中编队或机群的指挥。因此，对地面工作人员要反复进行“一切为空战胜利，一切为飞行服务”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一丝不苟地做好各项战勤保障工作，自觉地、及时而细致地准备好飞机，做到“故障不过夜，故障不上天”，保证飞机按时出勤，保证作战指挥的顺畅无阻，保证供应、通讯、雷达工作的及时、准确。

当时野战机场设备简陋，没有专门的厂房，也缺乏先进的检测工具和维修手段。要保证飞机能在白天全部投入战斗，就必须把维护和抢修等各项工作都在夜间疏散的情况下完成。为了防止敌人空袭，必须严格实行灯火管制，要有人负责对空监视，有人传递工具，有人用手电筒或工具灯提供局部照明。但因光线不足，气温低，湿度大，联络不便，人员极易疲劳，工作效率不高，本来白天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夜间则需要好几个人协同配合才能完成。外场机务人员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尤其是在冬季的冰天雪地里，深夜寒风凛冽，气温经常降到摄氏零下30度左右。为了排除飞机故障，机务人员要脱掉棉衣，钻进气道，有时被冻得失去知觉；为了定期清洗煤油滤，机务人员要仰面躺在机身下，任凭冰冷刺骨的煤油顺着高举的双手流入袖内，其滋味确实难以忍受。凌晨检查副油箱增压管路密封性时，由于当时没有更好的检测手段，只好一人用嘴贴着加油口吹气，另一人用耳朵贴着油

箱听。这样的工作条件，使许多外场工作人员冻坏了身体，有的还留下残疾。尽管如此，志愿军空军的机务人员从不叫苦，始终以高昂的斗志积极完成任务，以自身的苦和累来保证空勤战友及时升空，去夺取空战的胜利。

团结奋战，众志成城。空地勤人员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机场上经常可以看到空勤人员帮地勤人员推飞机，地勤人员帮空勤人员熟悉机械使用知识的情景。每当深夜，飞行员和各级领导常常来到机场，看望和慰问还在加班的机务人员，给机务人员带来水果、点心和御寒的酒，更带来对机务人员的关切之情。有时，窜入机场上空的敌机突然对起飞线上尚未起飞的我机进行扫射，严重危及在座舱内待命的飞行员的安全。此时，机械师会毫不犹豫地扑在座舱盖上掩护战友。飞行员喊着：“快离开！”机械师却回答：“你比我更重要！”这种深厚的战斗情谊十分感人。

刘震不仅严格要求和督促政治干部深入细致地做好各类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自身也善于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帮助干部及时解决组织指挥和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次，他在部队考察战斗训练时，发现一个飞行指挥员有时对飞行员大喊大叫。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待训练一结束，他语重心长地对这位飞行指挥员说：“你指挥的时候要少批评，多帮助；要冷静沉着，不要大喊大叫。指挥员的声音是一种精神力量，可以坚定飞行员的信心；但指挥员是代替不了飞行员操纵飞机的。”事后，这位飞行指挥员把刘震的话记在日记上，铭刻在心，几十年来仍作为指导自己和教育别人的箴言。

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组建时，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带来各种不同的思想问题。指挥所所长刚从陆军调来，仅在航校学习了几个月的航空知识，不了解空军指挥业务，对能否搞好本职工作有顾虑。在这种情况下，他来到后头一天就受到苏联专家、参谋长顾问的奚落：“没当过指挥所长，来干什么？”因此，他思想负担更重。第二天上午，刘震同他谈了话。当了解到他以往的工作经历和当前的顾虑时，便笑着对他说：“你没有当过指挥所长，我也没有当过这个司令员呀！但我们可以学习。你从班、排、连长直到当团、师参谋长，还专门受过参谋训练。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学好空军指挥业务，也能把这个指挥所长当好！”刘震的谈话，深深感动了这位指挥所长和有类似想法的其他干部。

临险境而不惊慌

刘震作战一贯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早在长征时，他就以“只身追歼逃敌”而扬名于红25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常常亲自带领师、团指挥员到前沿勘察地形，实施靠前指挥。抗美援朝的空战指挥虽与上述情况不同，但他在空中遇到的两次险情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

1952年12月8日，刘震在沈阳接到军委空军领导同志的电话说：“苏联空军阔日杜布英雄师奉命回国，今晚8时在安东设宴欢送他们。此事本应由上级派人代表毛主席宴请并授奖，但现在北京正下鹅毛大雪，飞机不能起飞。经请示毛主席批准，由你代表毛主席主持欢送宴会，并给该师授奖。”

此时已是下午4时，离宴会时间只有4个小时，无论是乘火车或汽车都不能赶到；而且沈阳也正在下大雪，按当时里—2运输机飞行员的技术条件

和天气条件是不能飞行的。但事关重大，刘震非去不可，而且一定要准时赶到。于是，他同运输机机组全体人员商量，并提出先通知安东浪头机场把导航台打开，飞机起飞后对准导航台直飞浪头机场。机长说可以，只要着陆场天气好就行。就这样决定起飞了。

不料，飞机升到 300 米高度时，能见度很差，什么也看不见。机长报告说：“现在天气很坏，没有把握。”刘震告诉机长，先飞到辽阳上空看看。到辽阳后，从云隙中看清了地面。他又提醒机长进山看看，但飞行高度必须高于山头 500 米，才不至于撞山。

飞了 1 个小时，刘震觉得还没到安东，就怀疑是迷航了。又飞了半个小时，仍未到安东。此时，机长从前舱走来对刘震说：“我们一直没有调到安东导航台的频率，无法定向。无线电也联络不通，无法精确判断飞机现在的位置。这条航线都在山区，也不敢盲目下降高度寻找地标复航。现在只好在原位盘旋，争取与地面沟通联络，请求引导。”刘震听了说：“别着急，就按你说的试试吧。”

机长走后，刘震对身边同乘的一位歼击机部队飞行干部说：“飞行员同志，你看要是和地面联络不上，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位飞行干部回答：“最安全的办法是飞回沈阳。”刘震说：“那不行，今晚我一定要到安东，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

接着，这位飞行干部建议：“不回沈阳则要飞一条冒险的航线，就是继续向西南飞行。当估计已飞出国境线，到了北朝鲜上空后，再向正西飞。到了黄海上空再下降到云下找海岸线。找到海岸线就能找到鸭绿江口，安东机场也就在眼前了。但这要冒在北朝鲜上空可能被敌机发现，或者在降低高度时撞到山上的危险。”刘震听了后说：“好！就冒这个险，没有什么了不起。你去同机长商量吧！”

这位飞行干部同运输机长商量确定上述办法后，又对刘震提出：“为了预防万一，我想把携带的降落伞交给首长使用。”刘震听后，哈哈大笑着说：“你干什么？想让我当伞兵啊！真的到了那一步，你们应该跳下去，回部队还可以驾飞机打仗。我跳下去干什么？叫人家当笑话说！”

在继续飞行中，刘震泰然自若，谈笑风生。当飞机飞到西海岸时，看到了地标，但飞机又误入了禁区——拉古哨。地面防空部队以为是美军轰炸机，已进入一等战备。幸好部队指挥慎重，立即向志愿军空军指挥所报告了情况，请示处置。作战值班人员立即答复，那架飞机是刘震乘坐的运输机，由沈阳起飞迷航了，你们千万不能打。就这样，刘震和运输机的同志们避免了危险。

飞行员由迷航到复航，心情比较兴奋，当飞机对准浪头机场着陆时，忘记放下起落架。幸亏机场的信号员发觉，迅速打出红色信号弹，禁止着陆。经过复飞处置后，才安全着陆。

飞机落地后，苏联空军的军长和师长阔日杜布同志迎上前去与刘震热烈拥抱，表示对他们安全着陆感到庆幸。那位军长说：“这次太冒险了！”刘震说：“这不能怪飞行员，是我决定冒险飞行的。因为我奉命代表毛主席来欢送你们归国，而且我们在协同作战中有着良好的战斗友谊，这次冒险飞行是有意义的。”

刘震另一次空中遇险是在 1953 年 6 月或 7 月的一天。那天，他和苏联专家去吉林郑家屯靶场考察飞行部队的实弹射击演习。当时，由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的飞行技术检查主任林虎驾驶一架雅克—12 担任运送任务。这是一种

小型螺旋桨式的运输机，连飞行员在内只能乘 4 人，而且速度很低，也飞不高。

开始，飞行一切正常，刘震和苏联专家一面观赏风景，一面谈话，游兴颇浓。不料，就在要飞越铁岭到四平之间的山区时，林虎发现发动机的汽缸头和滑油温度表在缓慢地上升，很快到了最大的允许限度。这时，他收小油门，让飞机转入小角度下滑，以使发动机降温。当发动机温度略有降低时，他赶紧把飞机改平，并想用小角度再恢复一点高度。因为机下是 1000 米左右的高山，可供他进行处置的空间很小。但维持了不久，发动机温度又升高，飞机又必须下降。眼看高度越来越低，距山头越来越近。此时，苏联专家着了急，不断用俄语和汉语向飞行员喊叫，要他这样那样，使飞行员精神更加紧张。

刘震看到这种情况，立即通过翻译向专家说：“林虎是个优秀的飞行员，我们要相信他，让他自己处理。一切都会好的，你放心吧！”几句话说得苏联专家不喊叫了。这时，飞行员的头脑清醒了，精神也振奋了。他决定不沿直线飞行，避开山头，沿着辽河河谷，采用阶梯式的下滑方法艰难地向前飞行。这样，飞机消耗完了原有的 2000 米高度，变成了超低空飞行。当他正考虑迫降之时，幸好也看到郑家屯靶场的简易机场了。

飞机安全落地后，飞行员已是汗透衣衫，全身无力。此时，苏联专家高呼：“万岁！……”刘震亲切地拍着飞行员的肩膀，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谢谢你啊，林虎同志！这一关又闯过来了。胜利总是我们的！”林虎看到刘震坚毅的面孔和真诚机智的眼光，心里十分激动，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点了点头。

机场上，部队列队迎接首长到来。林虎望着刘震昂扬走去的背影，联想到这位司令员前一时期在前线指挥大机群空战时那种沉着冷静、机智果敢的情景，心中肃然起敬。

许世友济南“宰牛”

胡居成

郑美珍

许世友（1906～198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6年2月2日生于湖北省麻城县许家洼（今河南省新县许洼）。1926年，在武昌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任连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33年，参加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后，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25师师长。后任第4军军长。长征中，曾任第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1938年，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副旅长。1940年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兼任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1949年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1954年回国后，任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后历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司令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第九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82年被进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10月22日于南京病逝。著有《许世友回忆录》（1986）。

* * * * *

许世友是我军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卓越的军事指挥员。在他近60年的戎马生涯中，充满硝烟、艰险和曲折，更充满英勇、刚直和传奇。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打了数不清的恶仗、硬仗、巧仗，百死一生，为党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里记述的是许世友任攻城总指挥的济南战役。济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战场规模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也是我军解放山东全境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

毛泽东亲自点将

1948年9月初旬末，胶东大地秋高气爽，风和日丽，高粱吐红，玉米泛黄，沉甸甸的谷穗随风摇摆，发出沙沙的响声。成群的麻雀不时在谷子地里腾空而起，又像下雹子似地纷纷散落在玉米地里或满是尘土的道路上。

一辆美国军用吉普车，扬起长长的烟尘，风驰电掣般地由东向西疾驶。副驾驶的位置上，端坐着一位身着土黄色粗布军装的中年军人。尽管车速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年军人似乎还嫌慢。他右手抓着车扶手，目视前方，焦急的表情告诉人们他恨不得马上就到达目的地。

这位中年军人，就是胶东人民家喻户晓的解放军山东兵团司令员、现任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的许世友。

一个月前，许世友、谭震林率山东兵团部队攻克兖州后，许世友腿伤复发，行动困难。华东野战军首长依据中央军委“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的电报指示，批准许世友去胶东蓬莱县艾山汤治疗。因此，作为济南战役攻城部队总指挥的许世友，在济南战役的谋划阶段实际上不在“现场”。也就是说，从济南战役的作战构想、作战方针、兵

力部署、突击重点到物资筹措等等，都是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下，经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等领导人反复研究后，一项项具体部署的。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责成华东野战军并山东兵团拟定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26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孔府召开了济南战役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以及各纵队和军区首长。会议期间，大家认真学习了7月以来毛泽东、中央军委接连向华东局、中原局、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发出的关于济南战役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结合敌我双方情况，深入讨论和研究了“攻济”与“打援”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8月26日，会议开始当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来电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3种可能情况：①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②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③在援敌距离济南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要求“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28日，毛泽东再次来电，强调此役关系甚大，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他指出：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3种，即20天、1个月、两个月。要争取第一种情况，其次是第三种情况。但能否实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因此，在兵力部署上，要求以一部主力攻击济南，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毛泽东的这两份极为重要的指示电，为华东野战军前委开好作战会议，制定切实可行的战役方案，夺取攻济打援的胜利，指明了方向。

8月31日，华东野战军有关领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呈报前委作战会议贯彻毛泽东来电指示精神情况。电文说：“关于组织济南战役，我们召集东、西兵团纵队级以上干部经数天讨论，遵照军委前数电指示原则，尽力争取第一种可能（利用敌尚远即攻克济南），其次是第二种可能（援敌迫近攻克济南），避免第三种可能（援敌迫近尚未攻克济南）。”同时将前委会议讨论结果，拟成作战方案报告军委。具体兵力部署是：济南战役我军投入总兵力为32万人。其中，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外线兵团大部，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攻城兵团分东、西两个集团：以第3纵队、第10纵队、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及野司警卫团组成攻城西线集团，担任对济南的主攻任务，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以第9纵队、渤海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组成东线集团，担任助攻任务，由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第13纵为攻城兵团总预备队。特纵炮兵、工兵各一部和坦克分队，分别配属东、西线集团。整个战役首先置主力于西面，夺取机场，断敌空运；尔后根据战况发展使用主力于最利发展的方向。电报提出，“攻城战斗拟于9月16日开始发起”。中央军委旋即复电：“完全同意”。不久，中央军委又来电指示：“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来电还查问许世友在哪里。

当时许世友腿伤复发，华东野战军一开始向军委推荐的济南战役攻城总指挥不是许世友。毛泽东得知后，直接出面进行干预，亲自点将，明确提出必须由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

当毛泽东批阅华东野战军关于济南战役作战方案的电报时，发现没有许世友的签名，很是生气，专门发电询问许世友在哪里。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许世友。

毛泽东第一次“点将”许世友，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世友当时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半耕半读”。他向毛泽东提出，要去抗日前线杀敌建功，“宁愿死在战场上，不愿再窝在学校里”。毛泽东欣然同意，派他去给曾是许世友上级的陈赓当助手——八路军第120师第386旅当副旅长。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参加指挥了一些战斗，有胜有败，有得有失。因为他不是主要指挥，在军事上并无多少建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打了些硬仗，有时应该转移没有转移，一打上就到天黑，部队伤亡较大。”

尽管许世友在前方杀敌不多，建功不大，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毛泽东在延安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时，脑海里不时浮现出前线那个黑脸结实的“许和尚”。为了在山东发展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刺向日军腹部的一把尖刀，毛泽东先后派去了罗荣桓、徐向前。但光有握刀的帅才还不够，尖刀上还需要有锋利的刀尖——先锋大将。毛泽东点将了：许世友。

《许世友的晚年岁月》一书中说：对于让许世友握兵权而据一方，延安上层中有一些非议，其中有许世友到前方后“战绩平平”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抗大事件”^①的影响。毛泽东坚持己见：“还是许和尚吧。”于是任命许世友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旅旅长，后来又任命他为胶东军区司令员，并赋予巩固和开辟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毛泽东为什么对许世友这样信任和重用呢？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率红军右路军走出草地前就知道许世友，说他曾7次参加敢死队，5次担任敢死队队长，6次负伤。在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他指挥3个团保卫四川省万源城，打退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坚守3个月之久，为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走出草地时，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包座“堵剿”，毛泽东亲自指挥许世友，率领红四方面军第4军和红30军一道，与敌鏖战两天两夜，将来攻之敌全歼，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在过草地和包座之战期间，曾传出毛泽东为许世友改名的佳话。许世友的“世”字原为“仕”。他曾为这个“出官纳仕，结交官友”的美名而感到心满意足。可是，当他投身革命，把自己的身心与革命融为一体的时候，才渐渐感到“出官纳仕”是出于封建的人生观，与共产党要革封建的命、为穷人打天下的信念格格不入。于是，许世友在红四方面军的时候，便把“仕宦”的“仕”改为“战士”的“士”，决心做个名副其实的红军战士，做士兵的朋友。毛泽东和许世友长谈中谈到许世友的名字时，同他商量：可将“士”改为“世”，“世友者，全世界劳动人民之友也”。许世友很高兴，人生观又得到进一步升华，决心做世界革命人民的朋友，为世界革命到底。

许世友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他冒雪走马上任。从1941年春到胶东，直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4年多时间里，他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与日伪军浴血奋战。牙山首战，扭转了我军在胶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攻海阳，战榆山，困发城，他率军消灭了以赵保原为首的二十多个大

^① 1937年3月，“抗大”批判张国焘时有扩大化现象。许世友想不通，组织20多名参加“抗大”学习的原红四方面军的军、师、团干部，准备私自离开“抗大”，去四川打游击闹革命。事情暴露后，许世友被判死刑。毛泽东出来干预，最后作为党内矛盾处理。许世友被开除党籍8个月。

大小投降派司令，粉碎了日伪军多次拉网式大“扫荡”和频繁的“蚕食”。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民兵武装，开展地雷战，大量杀伤敌人。仅1944年一个秋季作战，他领导的部队就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攻克与迫退敌伪据点138处，解放人口140余万，扩大根据地5000平方千米。到日本投降前，胶东抗日武装迅猛发展，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并沟通了与鲁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这不平凡的胜利，不仅在胶东、而且在延安，为许世友重新赢得了声誉。原来对他去胶东持有异议的人，承认自己有些“杞人忧天”，说“毛主席看人看得准，点将点得对”。

毛泽东第二次“点将”许世友，结果将如何呢？

华东野战军接到毛泽东查问许世友下落的电报后，一面立即给毛泽东回电，报告许世友在蓬莱艾山汤治疗腿伤的情况；一面给许世友发电报，说毛泽东点名叫他指挥攻打济南，要他立即赶往济南前线。许世友真有点“受宠若惊”，领袖的信任使他欣喜若狂。虽说腿伤还没养好，走起路来既疼且瘸；但他全然不顾，连晚饭也没吃，坐上3月份在周村战役中缴获的美国军用吉普车，迎着夕阳，日夜兼程，向千里之遥的山东兵团司令部驻地泰安飞驰。

许世友来到泰安，已经是第二天（9月9日）的晌午。这时，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谢有法等军政首长，早在门前迎候。他们一起吃过午饭后，即谈起了济南战役攻城准备情况。谭震林介绍说：从8月2日到9月6日，兵团召开了3次重要会议。一次是8月2日至16日，在曲阜召开了鲁中南各地委书记、专员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联席会议，部署济南战役支前的准备工作，提出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围绕战争”。为了实现这个口号，党政军民各级领导都必须以战争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要求各个军分区，对于战役发起以后的粮弹供给、兵员补充、俘虏管理、公路修筑、伤员运送等各项支前任务，都要逐一制定计划，抓好落实。会议确定由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统一领导支前工作。

许世友插话说：“这项工作是我们攻下济南城的保障，一定要动员广大军民，切实加强战备。”

谭震林说的第二次会议，是8月26日至29日，华东野战军前委在曲阜孔府召开的济南战役作战会议。会议已作出总结，并有电报报中央军委。由于时间关系，谭震林请许世友看总结和电报。

第三次会议是山东兵团在驻地莱芜召开的，时间共两天（9月5日至6日），参加人员主要是兵团师以上干部。谭震林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华野前委会议精神和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济南战役的整个部署，并向参战部队提出要求。谭震林笑着说：“我特别强调了攻济打援的特点。此次作战，我军主力是华野3个兵团15个纵队和冀鲁豫、渤海军区地方部队。双方兵力共100万，敌我各半。我们动员人民1000万。任何国家的内战，都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许世友说：“我国人口四万万，是世界第一嘛！”

“哈哈！”对两位兵团首长风趣的言谈，参加汇报的处长、参谋们都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谭震林继续说：“我告诫大家，济南是蒋介石固守中原的堡垒，蒋军必然死守待援，逼我撤围。济南是近代化的都市，每一所洋房都可以独立抵抗。

我们必须很小心，很细心，充分准备连续战斗，保证迅速地打下来。对敌人要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又要有充分的信心。既不能骄傲，又不能鲁莽。遇有突变，就要猛冲猛打，迅速解决。中央给我们 20 天、30 天、60 天时间，我们自己应该要求在 10 天或半个月中打下来。”

谭震林是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又是华野前委成员，应是许世友的上级。他主动向许世友介绍济南战役的准备情况，令许世友既高兴，又心怀感激之情，于是坚定地表示：“好！就照谭政委说的办，10 天半个月，打下济南城，活捉王耀武！”

在司、政、后机关有关领导汇报了“攻济”与“打援”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以及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后，天已经黑下来了。吃过晚饭，许世友来到办公室兼宿舍的两间套房里。参谋们按照首长的习惯，在套房里间早已摆好“三大件”：1 张桌子、1 盏马灯和军用地图。外间是参谋人员值班室。许世友走进里间，见方桌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件，大部分是中央军委 7 月以来发给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兵团领导人的关于济南战役的电报以及华野、山东兵团的工作计划和命令。这些文件，有的他在养伤前和养伤期间已经看过。现在，他又一份一份地全神贯注地阅读起来。他边读边想，进一步加深了对攻克济南重大意义的认识。

济南处于津浦、胶济铁路的连接点，北濒黄河，南倚泰山，是国民党山东省会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是国民党军“固守中原”体系的重要支柱，也是卫护国民党首都南京门户徐州的主要堡垒。国民党决策人士称：“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蒋介石对济南志在必守。他两次当面交待王耀武：“济南是战略要地，必须固守！”“济南是山东的省会和华东战略要地，无论华东战况如何变化，济南决不可放弃！”王耀武是黄埔军校的高才生，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堪称佼佼者。他把济南的防御体系在日伪原有的基础上又精心改建并加固，以内城为核心，外城，商埠为基本防御地带，设置 5 道防线，修筑密集的鹿砦、铁丝网、地雷区、交通壕、护城河、碉堡群、夹壁墙等，构成总面积达 600 余平方千米的永久性防御体系。在城内，还屯集了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王耀武预言：“济南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 1 个月。”

蒋介石为了确保济南，特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会战计划”：以济南绥靖区 11 万人固守济南；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 3 个兵团的精锐约 17 万人，随时北援。叫嚣“内外夹击，打败共军”。

在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解放全国的战略计划中，攻克济南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部署东北野战军组织大规模辽沈战役的同时，命令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拔除山东腹地敌所盘踞的这个顽固堡垒。迅速打下济南，解放山东全省，不但从战略上直接配合了辽沈战役，而且可以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除华东野战军后顾之忧，使其集中力量会同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徐、蚌地区展开新的战略决战。

身经百战的许世友深知责任重大，认为这是一场只能打赢不能打输的大仗。

怎样才能打赢？许世友反复考虑济南战役的指导方针。从兵力对比上看，攻城兵团 14 万人，守敌 11 万人，我军虽然占有优势，

但作为大规模攻坚战的进攻一方，这点优势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济南城防工事坚固，外围防御纵深大，兵力雄厚，火力凶猛。部队如何打进去呢？

许世友手提马灯，瘸着腿走到挂满山墙的济南城防图前，把敌人整个守备情况、工事设置与我军的攻坚计划、兵力部署对照研究。一天两夜，他除了出来吃两次饭，几乎没有离开过办公室，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到9月11日早晨，他才叫值班参谋进屋去，交给其一份电报稿，让立即发出去。

这份电报，是许世友亲自拟稿，直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首先报告他已到达济南前线，接着谈了对攻击济南部署上的一些个人看法。电报说：“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从部署上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第一步就这样，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毛泽东收到许世友的电报后，非常高兴，立刻送给朱德看，兴奋地说：“许大将军终于出山了！”当日，他亲笔写了一份给许世友的电报，内容如下：“真电^①悉。你已到前方，甚慰。你所说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因以1、4、6、7、8、11、韦吉^②等8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这种部署，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备予以改变的，即：①在阻援与打援出乎意料地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②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以从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根据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1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3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

毛泽东这份长达近700字的电报，可以说是对7月中旬以来中央军委关于济南战役给华野20多份电报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将战役的目的、方法，攻坚与打援的关系，兵力的部署、使用，攻城阶段，指挥系统和完成战役的时间，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下一步，就看许世友的具体指挥实施了。

牛刀子战术

对济南战役的作战构想、作战方针、兵力部署等等，许世友虽然没有参

^① 11日电。

^② 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纵队。

与其谋，但作为革命家和卓越军事指挥员，他在半年前就做了攻打济南的准备工作。1948年3月，周、张战役^①中，他听说第9纵队俘虏了一名刚从济南调来的国民党军旅级军官，对济南城防情况很熟悉，便立即给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叫那个俘虏军官把济南情况写下来，再画一张草图。聂凤智说：“两天前我们就叫他写了，可是等了几天，他一个字也没有写。他说，‘我愿意写。一者天天玉米饼、窝窝头，实难下咽，拿白面馍馍来；二者笔用不惯，换毛笔、砚台。’担任看守的战士气得直骂：‘到这地步了，还摆臭架子！’”

“那就不要他写啦？”许世友在电话里有些着急地问。

“没有。”聂凤智接着说，“我对负责看守的人员说，这有什么难的？照办。他的毛笔字写得很漂亮。几天下来，写成厚厚一大叠，详详细细叙述了济南城防工事、兵力部署、各部队特点及内部情况等等。我正在看。”

许世友说：“你看吧，看完送给我。”

后来，许世友又让敌工和侦察人员，多次与济南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由他们逐一介绍济南守敌的武器、弹药、粮秣、运输、治安等情况，并将各段城防及外围工事画成草图。他把两张草图挂在墙上，一空下来，就把敌军官交代的济南守敌情况和我地下党侦察到的情况对照起来看，细细琢磨。许世友文化不高，看图要比别人多费几倍的脑子。他一个人呆在房间里，坐着看，站着看，有时还会跳到桌子上看，一看就是半天。他看图特别仔细，记图也特别准确。凡是在许世友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许司令对地图特别熟悉，是出了名的“活地图”。打起仗来，上上下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别人接电话，要一边看地图，一边做记录；他却不要，好像作战地图全装在他的脑子里，什么地方，什么方位，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作战参谋和一个向导在前面给部队带路，走了一段，许世友说：“路走错了。”作战参谋有点疑惑，赶快催马到队列前面去问，果然走错了，提前转弯了。许世友批评说：“地图不能光挂在墙上，还要装进脑子里。”

敌人的济南城防情况，许世友早已“装进脑子里”了。他还命令各部队结合实战和练兵活动，模拟济南城防工事设施，进行近似实战的军事演练。周、张战役后不久，第9纵队、渤海纵队等又奉命参加攻打潍县双城。许世友考虑，潍县的城防工事与济南很相似，历经日、伪、国民党军的长期增修构筑，城外围附防工事深，遍地地雷，城防工事坚固且复杂，早已成为一个难啃的“硬核桃”。他对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说：“这次打潍县，是锻炼部队攻坚能力的好机会，也是探索攻打高大城墙经验的好机会。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也为了更有效地通过攻打潍县来锻炼部队，并为攻打济南作准备，仗打完后再次实弹演习一次。”

经过25天的艰苦战斗，潍县东西两城被攻克，4.6万多守敌被全歼。部队在战斗结束略作休息后，即开始实弹演习。当时战场尚未清理完毕，敌人的尸体有些还暴露在野地上，地雷还有成千上万未挖出来，我军部队的缺员还没有补充，干部也没有调整，部队还相当疲劳。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演习开始的红色信号弹一升起，霎时枪声大作，硝烟四起，其激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攻击潍县的实战。演习分扫外围、过壕沟、登城、扩大突破口、下城等

^① 1948年3月，山东兵团9纵、7纵，长途奔袭国民党军整编第32师驻防的周村、张店，一举歼敌3万余人。

步骤进行。部队根据实战的经验和体会，以熟练的攻击动作，很快登上了城头。

许世友在聂凤智的陪同下，自始至终观看了这次演习。他们随部队登上城头后，也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一起，握着下城的布带子，练了一次下城的动作。演习结束，许世友指示部队要把实战攻城和演习攻城的经验一起总结，总结出一套有效的攻打高大城墙的经验来。

许世友对攻打济南虽然作了充分准备，但济南城比潍县城毕竟大得多，附防和城防工事要坚固、复杂得多，守敌多近 7 万人；况且司令官王耀武是国民党军中屈指可数的名将，指挥作战的能力比坚守潍县的总指挥陈金城不知要高多少倍。因此，许世友对用多长时间能够攻克济南，心里仍然没有多少把握。他听说攻城部队都在结合自己的预定任务筑地堡，挖壕沟，修高墙，模拟敌人的工事设施，进行近似实战的战前大练兵。于是，决定到攻城各纵队去走走。

许世友乘坐吉普车，首先来到第 9 纵队驻地泰安县范家镇。只见村头古老的圩墙上，又用门板和泥土筑成了一道 4 丈多高的“城墙”，圩墙外的大水塘也被改造成护城河的模样，城墙下的石块和大木头组成了鹿砦和铁丝网。这是第 25 师第 73 团指战员搞的一个作为练兵用的济南内城地形和守敌工事的模拟设施。只见在灼热的秋阳下，战士们个个像小老虎，有板有眼地在练习摸、爬、滚、打的战术动作。许世友让车子停下，走过去观看。

“6 班长！带爆破组上！”“常胜连”7 连连长肖锡谦果断地下达命令。

只见个头不高但挺墩实的 6 班长孙高亭，扛起 50 余斤重的炸药包，猫着腰，迅速左转右进，涉过“护城河”，飞快地到达“城墙”根下。另两名战士（许世友后来知道他们叫张云青、曲传海）扛着 12 米长的炸药包撑杆，紧紧跟上。班长和小曲将撑杆顶着炸药包沿着墙壁向上推，小张则在后面紧握炸药杆用力往上竖。刚要竖起来，连长按实战要求突然喊：“张云青，你的腿负伤了。杆子竖歪了，炸药包倒下来了。”

小张随即故意打了个趔趄，跌倒在地；但炸药包并没有离手，仍顶在肩上。

班长和小曲又把撑杆竖起来了。张云青正准备拉弦。连长又喊：“绳子被拉断了。”小张心里“咯噔”一下，没了主意。这时，孙高亭一步抢了土去，两手握着撑杆，用脚一蹬，嗖嗖地爬上去 9 米多高，抓着绳子的“断头”向下一拉，然后迅速滑下来，与小张、小曲往后撤。

“好！好！”许世友禁不住连声说，“在敌人网下，就要这么机灵。”

许世友还看了“常胜连”7 连指导员彭超组织 2 班战士架梯子登城的演练。

“李永江！登城！”彭超大声下达命令。只见身材魁梧的 2 班长李永江倒背着冲锋枪，腰里挂满手榴弹，噔噔噔地爬上了梯顶。另两名战士（许世友后来知道他们叫滕元兴、于洪铎）也一步不拉地跟上。他们登上“城头”，便迅速端起冲锋枪，与“敌人”进行对射，还左一枪右一刀地格斗，随后又连续投弹。李永江投弹很准，几乎弹弹命中“目标”。

不一会儿，运输组也上来了。卫生员背着急救包和夹板，把“伤员”从梯子上背下来。炊事班长背着一筐馒头、包子，手提菜桶，奋力爬上梯子……

“走吧，白天登城演习基本结束了。”许世友转身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聂凤智站在他的身后。

“常胜连”7连连氏肖锡谦将队伍整理好，跑步前来报告，请首长指示。许世友走到战士们中间，大声问候：“同志们辛苦了！”

“不辛苦。”战士们齐声回答。

“你们练得很好！不过，我要给你们提一个问题：炸药杆是直的，第一包炸药炸开一个口子后，你们怎样才能将第二包炸药准确地送进第一个爆破口呢？”

战士们互相望着，议论起来：“对呀，这可得想想办法！”

聂凤智对肖锡谦和彭超说：“你们组织战士开动脑筋好好想想办法，要注意苦练加巧练，保护好战士的体力。”

攻城前夕，许世友去各纵队走走，首先到第9纵队，那是因为他和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有着深厚的、特殊的战斗情谊。早在红军时期，许世友和聂凤智就在一个团战斗过。延安时期，他们又同在“抗大”学习。到了山东，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许世友任胶东军区司令员时，聂凤智先后任胶东军区所属的第13团团长、中海军分区司令员、第5师师长。

许世友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时，聂凤智先后任第9纵队所属的第25师师长，第9纵队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来许世友任山东兵团司令员，聂凤智又接任第9纵队司令员。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许世友与聂凤智关系的发展，可以用8个字来概括：相熟，看重，器重，倚重。

河源西沟战役，许世友让聂凤智率第13团担任主攻。

周、张战役，许世友同意聂凤智提出的“挖心战术”。部队长途奔袭，大胆穿插，一举砸烂敌人的指挥中枢。

潍县战役，许世友批准聂凤智“挖壕接敌”的打法。聂凤智指挥第9纵队一鼓作气拿下双城，打出了个“潍县团”。

攻打济南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是一项艰巨的作战任务。临阵上任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想亲耳听听他向来倚重的老战友聂凤智的意见。

中午的饭菜，全是许世友偏爱的：一碗红烧猪蹄子，一碗土豆烧猪肉，一碗炸猪排，一碗辣子爆鸡块，外加一瓶山东老白干。许世友一句客气的话也不说，端起杯子喝酒，提起筷子吃菜，接过一碗面条就吃。吃饱，将饭碗一丢才谈打济南。

“我看了你们7连攻坚演习，战斗情绪很高，战斗动作和指挥都很熟练。兵练到这种程度，还有攻不破的夹壁墙和地堡？”聂凤智明白，这是许司令员考验他是否满足现有的训练成绩。他机警地说：“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还要多出难题，多练几手才行。”许世友笑了笑，接着说：“毛主席给攻克济南的时间规定了3种，听说你在曲阜前委作战会议上发表了不同凡响的意见？”

聂凤智笑着说：“哪里是什么不同凡响，只是谈点个人看法。许司令想听，我就汇报汇报。”于是，聂凤智讲起了前委作战会议的情况。

8月26日，华东野战军召集各纵队领导人讨论攻济打援作战方案。大家全无顾忌，放开嗓门，各抒己见，会场气氛极为活跃。议到攻城时间，大家七嘴八舌，纷纷议论：有人说，攻取济南这样坚固设防的战略要地，1个月打完不可能；最积极的看法是至少1个半月；一般人的看法是准备两个月，

更有点把握是3个月。有的纵队司令员说：“战场上是来不得半点虚夸和侥幸的。每一寸土地都要靠一滴滴鲜血换取，每一条胜利道路都要用一个个生命铺成。从看到济南城头，到登上济南城头，这中间的遥远和艰难，决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因此，军委给我们3个月时间，是很有道理的。”

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却突然唱出与众不同的调子。他说：“依我个人看法，不一定非拖得那么久。三两个月拖下来，给打援部队压力太大了。”

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忙问：“老聂，那你认为需要多少时间呢？”

聂凤智把手中的美国“红圈儿”香烟掐灭，十分自信地回答道：“凭我军现在的实力，有15到20天，就能把济南拿下来。”

这可是一语惊四座。对聂凤智的大胆预测，一些同志觉得他有点“狂”。他的一位挚友、第8纵队副司令员郭化若倒了杯开水端到聂凤智眼前，不无取笑、调侃地说：“聂老兄高见，敬你一杯！”

听到这里，许世友虎下脸来，很不高兴地说：“这个郭化若，就仗他多喝几天墨水！”

郭化若是我军较有名气的军事理论家之一。在延安“抗大”时期，聂凤智、许世友连一份电报都写不全的时候，郭化若就是他们的军事理论教员了。他的脑子里，可以一点不夸张地说，什么六韬三略、五戎百战，都早已背得烂熟。聂凤智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他这一带头，几个平时和聂凤智交往最深、最会取闹的“大小伙子”们，忘记了他们都是身经百战、功勋显赫的高级将领，肆无忌惮地跟着应和：“聂老兄高见！老聂高见！”

聂凤智笑着喝了一口郭化若倒的开水，说：“不管‘高见’‘低见’，讲出来大家评论嘛！”

嬉笑归嬉笑，真的讨论起来，大家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郭化若以满腹经纶，有条有理、有根有据地论证了半个月时间打下济南是脱离实际的，是不可能的。其他纵队领导干部，也都表示对聂凤智的大胆预测心里没有底。他们认为：“济南重兵密集，城防坚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攻克，不大可能。”“还是要慎重。这个敌我势必争夺的战略要点，对今后的战局发展影响很大。”“这是我军第一次攻打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作较长时间的准备，否则将造成极大的被动。”

许世友对这些意见已经听得不耐烦，打断聂凤智的话说：“你的理由呢？为什么不摆出来，光听他们说？”

聂凤智说：“我当然要摆啊，不摆怎么讨论嘛！我说，敌人在济南有11万重兵，城防异常坚固，粮弹贮存丰足，的确易守难攻。但真攻起来，争取速克，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理由主要有5条：一是从整个华东战局来看，济南之敌已呈孤立之势，坚守意志必然涣散和动摇；二是从我军实力来看，既有过硬的攻城部队，又有强大的打援兵团；三是从敌人增兵渠道来看，其水陆交通均告断绝，仅靠空运，数量有限，即使突击抢运一批，也是杯水车薪，而且兵力越密集，指挥越紊乱；四是从华野主力部队攻坚作战能力来看，已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城市攻坚作战办法，我们对济南之敌守备情况也有了相当的了解；五是从山东现状来看，人民群众将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攻打济南作战。”

从许世友满脸由不悦到突起几条笑纹来看，他对聂凤智的5条理由是赞同和满意的。他说：“嗯，还有人反对吗？”

聂凤智说：“谈不上什么反对。又经过几天的反复思考、推敲，大家的

意见渐渐趋向一致。最后，华野首长确定：攻济兵团，要立足于快打，尽力争取在援敌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以实现军委提出的第一种也是最好的预测结果。打援兵团，根本出发点应是能对付最坏情况，即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一定要避免‘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的被动局面。”

许世友深沉而凝重地说：“这一点，会议总结和给军委的报告中都说到了，我们必须时时警惕，尽力避免。攻城部队14万人，守敌11万人，攻城部队仅超过守敌27%，多3万人，远远没有达到3倍、5倍。作为大规模攻坚战，处于进攻的我方，这点优势就显得太小了。”

聂凤智郑重地点了点头。

许世友继续说：“所以，这几天我在想，牛在我们放牛娃看来（聂凤智也是放牛娃出身），是个庞大的家伙。可是，宰牛师傅只一切，就能置一条健壮牯牛于死地。设防坚固的济南城，正好比一头硕大健壮的牛。我们要速克济南，就要采用‘牛刀子战术’。”

下午，第9纵队召开攻克济南誓师大会。许世友在大会上说：“我从胶东赶来，就是要带你们去攻济南的。为了速克济南，我给大家提出一个易懂好记的口号，叫做‘牛刀子战术’。为什么要叫‘牛刀子战术’呢？同志们都知道，牛很庞大，又有蛮劲，要放倒它，必须一下子击中它的要害。济南城防工事坚固，纵深又长，明碉暗堡成千上万，像一团不好啃的刺猬。我们要拿下它，必须准确地抓住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钻进去打，像一把锋利的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再搅乱敌人的五脏六腑，致敌于死地。”

“我是‘宰牛师傅’，你们就是我手里的‘宰牛尖刀’！”

9月11日毛泽东给许世友的电报中肯定他提出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的方案，其实就是许世友形象比喻的“牛刀子战术”。

第9纵队誓师大会结束后，许世友又马不停蹄，夜以继日，视察了第3、第10、第13纵队及渤海纵队、两广纵队等攻城部队，观看了他们的攻坚演习，向干部们进一步讲明攻打济南的指导方针。

“主攻”与“助攻”

9月16日24时前，许世友的“牛刀”已经准备好了，攻济部队各就各位。战炮脱掉了炮衣，标定射击诸元；步兵进入冲击出发阵地，轻、重机枪瞄准敌人工事的射击孔；负责爆破的班组已扛着炸药包进入位置，有的就隐蔽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有线通信兵静静地守在电话机旁，并作好了延伸架线的准备。各级干部和各级机关在检查各部队的准备情况，等待着攻城总指挥许世友的命令。

许世友早已来到驻西营的山东兵团攻城指挥所作战室。他身着黄军装，腰挂左轮手枪，像一座大钟，坐在标有攻城部署的地图旁，手拿怀表，双眼盯着指针。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表好像走得特别慢。

突然，许世友抬起头来，放大嗓门，庄重地宣布：“24时到，攻击开始！”

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参谋们，向各自负责的单位传达许世友的命令。各部队接令后，立即行动起来。顷刻间，布置在济南城方圆百里范围内的成千门榴弹炮、山炮、迫击炮急速齐射，炮弹像冰雹似地砸向敌人阵地。顿时，

火光映红了黑夜，炮声震撼着大地。敌人阵地上烈火团团，浓烟滚滚，高碉矮堡、夹壁墙工事、鹿砦、铁丝网等附防御物被炸得七零八落。

30分钟急袭之后，炮火开始延伸。我东、西攻城集团部队密切配合，像两把锋利的钢刀，勇猛地向着王耀武的老巢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捅去。

许世友发出攻击开始的命令之后，态度更加严肃，在作战室里背着手踱着脚走来走去，设想着前线的情形，想象着我军英勇杀敌的场景，等待着各单位的报告。

果然，战报一个接着一个飞来。

西线集团的第10纵队和第3纵队，在开进途中先期与国民党的正规军整编第83师之第19旅、整编第32师之第57旅遭遇。许世友得到西集团指挥所的报告后，一时弄不明白：这两个旅是王耀武总预备队的主力，怎么刚接火就用上了？原来，西线我军先于15日扫清长清县县城南面土匪，生俘1700余人；继而挥戈东进，攻占长清县县城以东之杨家台、赵庄、鲁庄、琵琶山、杜家庙等敌人据点，直扑守敌济南外围第一道防线，威逼敌飞机场。这时，王耀武判断，济南西郊我军云集，是想先集中力量取下飞机场，以截断守军的空运接济。于是认定我军主力在西。为了掩护整编第74师空运来济南加强守备，他认为必须在长清等地阻止我军前进。16日24时，我军发起全面进攻，长清告急。王耀武一面令西守备区各部队加强防守，一面即令整编第2师师长晏子风，连夜带领第19旅、第57旅和刚空运来一天的第74师7个连，向古城以西增援，策应长清一线（第一道防线）作战。

敌人困守济南的西守备区第一道防线，是沿距济南30里外的玉符河堤筑成的防御工事。堤内堤外，均密布石垒地堡；河西则以深可撑船的河水为屏障。在这样一道长达30余里的坚固防线上，敌人集中着六七个团的兵力，正好堵住了南自泰山区、北至黄河的狭窄走廊地带，紧紧包裹着济南城。

当地群众告诉我军侦察员说：“你们要过玉符河，必须先打下常圪屯。”

常圪屯位于玉符河东岸，左有以周王庄、古城为中心的守备据点，右有密布地堡的玉符河长堤，由敌整编第2师第633团1个营据守。我第10纵队某团第7连担任主攻任务，第3排担任突击队。排长张宪臣向全排提出一个响亮口号：“坚决打响攻济第一炮！”突击排战士在排长带领下，举着枪，顶着手榴弹、子弹袋，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水深至胸的玉符河。当全排运动到常圪屯西南角时，排长张宪臣负伤跌倒，但他仍勇猛地爬起来喊：“冲啊！”顿时，20多名勇士应声向敌冲去。他们像一股旋风似地冲进敌人设置的鹿砦，然后冒着敌人炮火，强行爬堤，占领了两个敌人前沿地堡。敌人退至堤上的交通沟向我突击队反扑，但被负了伤的3排长接连打出的4颗手榴弹给炸了回去。于是，敌我在河堤上展开了激烈的手榴弹战。3排长不幸二次负伤，已不能行动。他大声喊：“坚决守住阵地！同志们，快报仇啊！”战士们齐声回答：“坚决不丢阵地！”大家抓起手榴弹，连珠炮般地往堤上的交通沟里猛扔。阵地前沿浓烟直冒，爆炸声震耳欲聋，敌人的凶焰消失了。已经负伤的第7连连长，乘机指挥第1排占领了常圪屯西北角，并顺着缺口将阵地扩大到百米左右。这时，第10纵队某团另1个连也从常圪屯正南面突破敌阵地。两支利剑直插敌人胸膛，逼敌全营举手缴枪，我军完全占领常圪屯。

至此，敌人30里长的外围坚固防线，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接着，我第10纵队千军万马，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玉符河。河防全线的守敌整编第2师第211旅、保第8旅以及先期赶来增援的王耀武的老部队第74师7个连，

近 10 个团的兵力，丢下累累尸体，慌乱溃退。许世友命令第 10、第 3 纵队乘胜向礮山桥、双庙屯、杜家庙、匡李庄等地敌人第二道防线压过去，以控制敌庞大工事阵地和飞机场，消灭王耀武的增援部队第 57 旅和第 19 旅。

可是，攻城开始的第二天上午（18 日），许世友接到攻城东集团指挥所报告，说发现敌预备队第 57 旅和第 19 旅配合曹振铎的第 73 师向茂岭山、砚池山反攻，战斗十分激烈。

一向把作战地图记在脑子里的许世友，来到作战室，问参谋人员：“怎么回事？昨天下午（17 日）敌人预备队 57、19 两个旅增援西面古城作战，今天上午（18 日）怎么又到东面茂岭山、砚池山打起来了？”参谋人员一时也搞不清楚，无法回答。

其实，这是许世友在指挥调动敌人。

本来，在济南战役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攻城东集团的任务是助攻，攻城西集团的任务是主攻。华东野战军领导人和谭震林心里都清楚：西线便于突破，也便于切断王耀武与外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争取济南西守备区指挥官吴化文起义的工作已基本就绪。因此，在兵力配备和部署上都是以西线为主。“主攻”和“助攻”，虽是一字之差，意义却大不一样。在攻击行动中，根据己方的攻击目标，一座城池也好，一道防线也好，一个阵地也好，选择好主攻方向，把己方最主要的力量用到主攻方向上，有主有次，有虚有实，突破一点，乘势展开，早已是被多次证明的决胜要诀。相对地说，担任助攻任务的部队则要“轻松”一点，不那么“责任重大”。可是，第 9 纵队司令员聂凤智似乎不要轻松，却愿意承担责任。他“别出心裁”，在纵队给各师重新下达的命令中，悄悄把“助攻”改成了“主攻”，把攻打济南最苦最难的任务不声不响地揽到了自己的肩上。

这一改，可把 3 位师长“改”急了。从当时东线集团的兵力和济南城防的实际情况看，第 9 纵队要想充当主攻，那是不自量力，何况兵团还有那个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的命令。战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命令，严重违反战纪，是不能容许的。尤其正当大兵团开战的前夕。

聂凤智手下的 3 位师长——第 25 师师长肖镜海、第 26 师师长张■秀、第 27 师师长孙端夫，都是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将。他们接到纵队命令后，一个接一个打电话询问纵队作战科：“是不是写错了？”聂凤智告诉他们“不错”，并给他们阐释自己的想法：

王耀武不是一般的对手，而是国民党军队中胆识、谋略都过人的“上将军”。他不但经略济南多年，防务体系严密坚固，而且对我军的战略战术也了如指掌。如果我们不在胆识上压倒他，谋略上超过他，依然墨守成规地一边主攻、强攻，一边助攻、佯攻，既在他的意料之中，他也就有可能应付自如。要知道，我们攻城兵团才 14 万人，王耀武手下却有 11 万完全称得上是精兵强将的防守力量。我之所以改“助攻”为“主攻”，就是要让大家放开手脚打，硬攻，狠攻，强攻，造成真正东西夹击的有力态势，争取一开始就把王耀武的阵脚打乱，使他判断失误，既难集中兵力，又难调整部署，先在精神上把他搅乱、动摇乃至摧毁。“助攻”改“主攻”，实质是为了更好地助攻；我们既不增兵，也不添枪，改的只是大家的精神状态。只要我们部按主攻的要求去打，那么，王耀武再有胆识，再冷静沉着，再神机妙算，也肯定不能有章有法地同我军抗衡。其心先乱，城必破。

第 9 纵队的师长们在孟良崮、南麻、临朐、周村、潍县战役中，都是“吃

硬”抢重担的英雄好汉，经聂凤智这么诚恳、透彻地一点拨，个个心领神会，都雄心勃勃地真的要第9纵队唱“主角”了。

聂凤智是个明白人，他清楚，尽管理由再充足，私改上级的作战命令，终究不是儿戏。他把第9纵队改命令的事，向攻城总指挥许世友作了汇报。许世友不听他的阐释，即刻回答说：“就这样打！西面一把刀子，东面一把刀子，两把刀子朝里戳，戳烂它的五脏六腑！”他放下电话对政委谭震林说：“两面都是‘主攻’好。他王耀武把部队调到西边，我东边打得凶；他把部队调到东边，我西边打得凶。敌人机动兵力无固定阵地，无喘息之机，左防右堵，疲于奔命，被我军打得完全摸不着头。等他们摸着头，已经昏了头。哈哈！”

战役发起后，正像聂凤智和许世友所希望的那样，第9纵队按主攻去打，预期攻下了济南的东大门茂岭山和砚池山。

茂岭山位于济南东南10里，山北一片平原，为直达济南市的天然大门。潍县战役后，王耀武曾用炸药将山上原来的旧工事轰毁，强拉民夫，每天以七八百人力，用钢筋、水泥、石头、粗木等材料，在山顶构筑主碉堡，围绕主碉堡又构筑夹壁墙工事，山腰筑有多个钢筋水泥侧防堡，周围的小山上则筑成触角集团工事。据说，工事修成后，王耀武曾特地组织炮兵在山下试射，夹壁墙工事安然无恙。敌东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73师师长曹振铎曾得意地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坚固的工事。不怕共军来，就怕共军不敢来。”

负责攻打茂岭山的第9纵队第25师第74团，战前曾组织营、连干部七进七出，对茂岭山的工事、敌情及周围地形进行实地侦察，可以说早摸透了。17日零时15分，团长王景昆、政委孙子宇命令特务连插到敌人侧后，切断电话线，陷敌于孤立绝境。第1营和第2营的3、4连，在炮火掩护下，像猛虎一样向敌发起突击，对敌形成四面包围。第4连的6挺轻机枪和机枪连的6挺重机枪一齐开火，封锁了敌人东南角碉堡和附近的射击孔。第4连第3排第9班在副排长法云培带领下，奋勇当先，夺取了东南山角下的地堡，扫清了通向主峰的障碍。3排长孙高立迅速带领第8班，对主峰东南角夹壁墙实施连续爆破，炸开了一个大口子。副指导员张建中（后牺牲）、指导员李炳章、连长刘文，不顾身体多处负伤，指挥全连和敌人争夺突破口，进行激烈的肉搏战。

与此同时，第1营第1连连续7次爆破，将东北角山腰地堡旁1米多厚的夹壁墙炸开一个大豁口。连长柳从起（后牺牲）带领全连在突破口与敌人拼命厮杀。

1时30分，王团长见敌我双方仍僵持在突破口附近，主峰的敌人仍很猖狂，于是命令第2营营长杨年伦亲自到第4连突破口组织攻击。此时，第4连只剩下20余名战士。杨营长果断地将战士们分成3个班，由他和几名共产党员带领，很快摧毁了封锁我东南角突破口的一个大碉堡。凌晨2时，第4连和第1连攻占了茂岭山主峰，将“首战茂岭山，打开胜利门”的战旗插在高高的山顶上。

在第74团首战茂岭山的时候，第25师第75团也像一把利剑直刺茂岭山南边的砚池山。

砚池山地势险要，仅有一条小路可通山顶，并有姚家庄、窑头据点相呼应。山前地形开阔，山势高陡，四周密布侧防堡；山下则筑有坚固的子母堡4座，并以夹壁墙连串构成可独立抵抗的阵地。砚池山守敌是整编第73师第

15 旋第 45 团第 5 连，是王耀武的所谓“尖刀”连之一。

我方炮火急袭之后，第 3 营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砚池山和茂岭山之间的敌联络据点姚家庄，并扫除了山脚和山腰处敌明碉暗堡。

尔后，我军又集中山炮和迫击炮轰击夹壁墙工事及子母堡，但效果不大，突破口未能炸开。

主攻连第 8 连连长张克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和指导员王金亭商量后，向营长建议：停止炮击，实施爆破。

团长张文和、政委丁锐同意他们的建议。

炮击一停，张克信就命令火力组掩护，由爆破组实施爆破。

经过连续两次爆破，夹壁墙被炸开，突破口形成。张克信随即命令突击组向里突击。副连长肖正模和 2 排长迟元兴率第 4 班首先冲了进去，乘着手榴弹的硝烟，向夹壁墙纵深发展，与守敌展开激烈的白刃拼杀。

张连长随即率领后续的第 1、2 排攻进突破口。敌人发起猖狂的反扑，以三面火力封锁突破口。张克信一面组织反击，一面指挥部队向纵深发展，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这时，连预备队第 3 排在排长白东生带领下，于关键时刻无一伤亡地冲了上去。他们在向主峰挺进中，突遇敌第二道火力封锁。白东生指挥战士向敌火力点扔手榴弹，并派爆破组把敌工事炸毁。经过 50 分钟的激战，守敌斗志大减。敌连长在我凌厉攻势面前，率残部 60 余人放下武器。我第 8 连速克砚池山。

17 日黎明，王耀武听说东郊茂岭山、砚池山失守，惊得目瞪口呆，一身冷汗。当初西郊机场告急时，他并不惊慌，认为这早在意料之中：“共军主攻在西，妄图控制机场，断我空运”。他早有这个准备，马上把作为预备队的两个主力旅调往西线。可是，他无论如何也未想到，这两个主力旅刚和我军接上火，东郊的大门就一夜之间被打破了。茂岭山、砚池山上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可是他多次亲临现场指挥修的呀！他不能理解。于是 17 日上午，他视察东守备区，站在第 73 师指挥部里，用望远镜观察二里外的茂岭、砚池二山，仍弄不明白这两个阵地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换帜易主。他训斥了一番第 73 师少将师长曹振铎，要他组织师预备队向我军反扑，企图夺回茂岭、砚池山阵地。

王耀武回司令部后，进行自我反省，感到唯一的解释是自己判断失误。他心想，惯于反常用兵、出奇制胜的共军，这回的主攻方向不在西边，而是在东边。于是，他命令由整编第 2 师师长晏子风指挥的预备队第 57 旅和第 19 旅立即撤出战斗，迅速返回城里，稍作准备后，于 18 日上午配合第 73 师向茂岭山、砚池山反击，要不惜血本夺回二山阵地。

然而就在此时，西郊又频频告急。原来其预备队撤离后，我军进展神速，飞机场已置于我军炮火控制之下，第 74 师空运中断。这样一来，王耀武又怀疑自己判断失误，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完全摸不着头”。等他“摸着头”时，我大军已兵临城下了。

不打不成交

济南战役发起的第三天，即 9 月 18 日晚，许世友被国民党军第 96 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动摇不定的态度激怒了。他对谭震林说：“吴化文已经妨碍了

我军攻城的作战行动。不打不成交。打，敲他一下子，他就老实了。”许、谭首长毅然下令，攻击吴部簸箕山阵地。

争取吴化文起义的工作是在华东局直接关心下进行的。潍县攻克之初，许、谭就对刚来山东兵团报到的张恺帆布置任务说：“你来得正好，你要代我们给王耀武、吴化文各写一封信，劝说他们起义。”随着战役日益迫近，争取工作也加紧进行。谭震林曾与王建安、张恺帆等领导人一起，于9月2日认真听取中共济南市委副书记蒋方宇关于争取吴化文工作的汇报，详细地询问了有关细节，研究了存在的问题和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然后，谭震林对做好争取吴化文的工作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第一，吴化文系军阀出身，但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或配合我军行动是有可能的。第二，要设法转告吴化文，济南一定要打，而且一定能打开。要求打入吴化文身边活动的共产党员李昌言，利用亲戚关系抓紧做好吴化文的工作，争取他早日行动。第二，对吴化文的要求，能高就高，如扣住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就叫他为我军攻城让出一条路，也是我们做争取工作的一个胜利。第四，要讲明政策，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对其所属部队，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待遇实行改编。最后，谭震林强调说：“目前，对吴化文的要求不能太高。在我们兵临城下时，他让出一条路，也算是立了大功嘛！”第二天，谭震林签发了由蒋方宇起草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争取吴化文起义的电报。争取吴化文起义工作的发展情况，确如谭震林所预料的那样。他提到的李昌言，是吴化文的妻子林世英的表弟，1947年由胶东区党委西海地委派住济南，打入吴化文身边。李昌言在接到谭震林指示后，想方设法对吴化文规劝开导，但均未能奏效。直到我大军压境，攻城战役打响，吴化文才作出一些实际姿态和行动。

16日，他向我西线进攻部队发出一电，内称：“请16日开始向内攻迫，17日解决问题。”17日拂晓，吴化文通过电台主动向我进攻部队提供了国民党整编第2师师长晏子风率两个旅又7个连增援的重要情报，使我军及时消灭了敌增援部队一部。同日，他还将起义的意图透露给第155旅旅长杨友柏、161旅旅长赵广兴，并密商起义的准备工作。

不料，17日下午，吴化文突然接到南京一位亲属的电报，得悉“国防部已决定派兵援济”的消息。这又勾起了他对蒋介石集团的一丝幻想，对起义又开始动摇，重新采取消极拖延、静观发展的态度。

许、谭首长为了迅速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是不允许吴化文在起义问题上如此动摇、拖延的。17日，攻城西集团部队在消灭济南西侧长清、古城一线敌人后，第3纵队第8师第23团已经接近吴化文部阵地前沿。为减少误会，避免冲突，许、谭立即电令吴部“迅速后撤集结”。吴化文接电后，向攻城部队指挥部回一电，宠统地提出：“本军一方面集结，一方面在19日召集官兵阐明起义宗旨，举行起义。”这封电报，不仅与吴化文16日答应我方“17日晚解决问题”的承诺相矛盾，而且回避了许、谭让他的部队后撤的实质性问题。为督促吴化文履行诺言，17日夜，许、谭指示攻城西集团指挥、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派交通员穿越火线，再次向吴化文传达攻城指挥部要其部队“迅速撤退集结”的命令。虽经我军两次严厉催促和内部工作同志据理力争，吴化文仍然坚持不撤出阵地，只答应让出阵地北翼由饮马庄、匡山至飞机场的一条公路。其真实意图在于控制飞机场南部有利地形，以便坐观胜败，保存实力。吴化文提出这个方案后，立即遭到李昌言等我内部工作同志

的坚决反对。他们指出，我攻城部队绝不会同意这一方案而冒险孤军深入。经过反复斗争仍无效果。18日上午9时，吴化文还背着内部工作同志，单独去“绥区”参加王耀武召开的研究夺回茂岭、砚池二山问题的会议，进一步探听南京派援兵的虚实。

尽管吴化文在撤离阵地问题上费尽心机，借口拖延，许、谭为了战役的全局，始终不为吴的动摇态度所左右，继续坚持吴部必须撤离阵地的原则立场。由于在“绥区”开会未探听到援军到达的消息，吴化文回西守备区后，又要“应付”手段，派其妻弟林世勋作为代表，由我方交通员李如刚陪同，带着给我军绘制的进攻路线示意图和联络信号，赴我攻城兵团西集团指挥部交涉。待林世勋动身后，吴化文又向我攻城部队发出电报，故作诚恳地表示：“本军在原地集结，请转向商埠进攻，此间已派人向贵军就地联络。”许、谭阅此电报后，十分不悦，立即指示宋时轮，让林世勋立即返回，要吴化文另派他的参谋长并携带电台，由我军给吴部确定撤军路线和集结地域。下午5时，许世友、谭震林以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名义，发电报给吴化文，令他撤兵集结。电报指出：“请贵军将团以上的驻地告我，我军到达后即将阵地转交我军。贵军主力即退入火车站以北官扎营；另一部控制纬十路以西地区，准备接应我军进入市区，并设法打通与洛口桥之联系。”直到晚10时，吴化文仍然置之不理。

吴化文在敌我双方交战的关键时刻失信于我军，拒不撤出阵地，已妨碍我军作战，影响了战役进程。许、谭首长认为，对于军阀出身的吴化文来说，不对他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是难以推动其最终走向革命道路的。于是决定，对吴化文部实行有限度的军事打击。

18日晚11时，攻城兵团西线集团第3纵队第8师首长命令第23团主攻簸箕山。该山是由吴化文第96军的1个营防守。前一天下午，第23团团团长石一宸带干部到前面侦察地形，不用望远镜对此山的防御工事就看得很清楚，山脚、山腰和山顶修了3层工事。山顶上有座石头围子，围子的边角修了很多碉堡，都是石头垒成，看样子很坚固。防御最强的还是山的脚部，工事很多，防守的兵力也多。因此，突破前沿，占领山脚，是攻打簸箕山的头一关。虽是外围战斗，但任务还是相当艰巨。

团长石一宸带干部看了地形之后，立即分配任务，组织战斗。为了更有把握，决定第1营攻打簸箕山。第1营是在洛阳战役中获得荣誉称号的“洛阳营”。这个营在宿北战役中，攻打过敌重要阵地峰山；在泰安战役中，攻打过嵒里山，涌现出“嵒里山三勇士”。第1营接受任务以后，决定以第1、3连分两路突击簸箕山，第2连为预备队。在加强的重迫击炮、山炮和团属步兵炮、迫击炮的掩护下，两个连各选一个突破口同时突击。突击前，山炮负责摧毁山顶上的石头围子及附近的高堡；步兵炮采取抵近射击办法，负责摧毁山脚的低堡。任务明确后，重迫击炮先打了几发燃烧弹，把敌人的阵地照得通亮。在燃烧弹的照射下，炮兵借着燃烧弹的光亮进行破坏射击。这样不仅炮打得准，燃烧弹的强光还会干扰敌人的观察。突击队在强光下重新查看了自己的运动路线和突击目标，以防战斗发起后走错路，摸错点。

由于吴化文部在一线修筑的工事低凹隐蔽，直射炮射击有些困难，我军部队有些伤亡。但由于步兵冲得猛，充分发挥了手中武器的作用，部队在短促火力掩护下，一鼓作气，打到山腰。第1连依托山腰，在营火力的掩护下攻击山顶。由于山很陡，仰角很大，直射炮命中率低，我军主要靠爆破组在

机枪的掩护下顽强地进行爆破。第一次爆破虽然成功，但指挥爆破的班长马华山牺牲了。由于马华山战前想得周到，组织严密，9个爆破员对自己的任务和执行任务的方法都非常明确；加之所有爆破员都非常勇敢，自觉性很高，责任心很强，前仆后继，连续爆破5次，终于把山顶上的明碉暗堡彻底摧毁。爆破员蔡周太，按计划是用40斤炸药炸碉堡；但冲上去以后，发现碉堡外还有一道铁丝网。他考虑炸铁丝网用不了40斤炸药，如果用这些炸药炸铁丝网，就会影响炸碉堡。于是，他不顾生命危险，在敌火力下迅速跑了回来，换上小包炸药把铁丝网炸开，接着又勇敢地跑上前去用大包炸药把敌人大碉堡炸上了无。“洛阳营”经过两次突击，把石围子打了下来，全歼守敌。簸箕山被我军占领。

吴化文原以为我军不会对他诉诸武力，缺乏精神准备。当得悉我军进攻簸箕山后，他甚为恼火，怒吼道：“打！只有打才有饭吃。”遂令炮兵向我开火，并调兵遣将，要坚守簸箕山。其部属亦有人建议将我内部工作人员杀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内部工作人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团结一致，坚定沉着，义正辞严地向吴化文展开说理斗争。他们向吴化文严正指出：“如果军长按计划撤退，也下会引起误会。如果真撕破面皮，解放军必集中火力进攻。请军长考虑，速作计划。”

吴化文军阀出身，把他的部队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认为有了兵权就有了一切，时时不忘保存实力。当他听说守备簸箕山的那个加强营被我军彻底消灭，顿时瘫坐在地上。他害怕我军再攻击其他阵地，使他失去讨价的资本，只好要求我军停止进攻，并要求会见我军“最高司令员”。许、谭首长当即指示第3纵队司令员孙继先：“迅速架通与吴化文之间的电话，转告我们对吴化文的要求：一，不能再犹豫了，我军即要发起总攻了；二，限吴于19日20时起义，撤出阵地。”许、谭的指示坚决果断。电文很快传到吴化文那里。面对局势，吴化文终于接受了起义条件。19日上午，他派参谋处长李章携带电台，到我攻城西线集团指挥部移交防地，同时向我军发出一电：“今晚8时后，请贵军逐次前进，接收本部防地，主力沿铁道及任家山口向济南前进，由辛庄及大槐树两路进入商埠。刻下两路口由本部控制，以便掩护贵军进入。本部8时后，开始向张庄、孔庄两营房集合。口令、符号仍照原命令执行，免生误会。”随后，吴化文又发出一电，向我攻城指挥部报告了王耀武部队的师、旅部队位置。

当晚8时后，第10、第3纵队按许、谭首长命令，向任家山口、白马山营房及大槐树、段店、辛庄一带挺进，与吴化文部在辛庄、孔庄的部队混驻在一起。10时许，吴部各山头守军纷纷撤退集结。

吴化文部的起义，在军事上给予蒋介石反动派以沉重打击。一个军部和一个整编师两万余人战场起义，从规模和力量上说，在当时是最大的。从军事影响来讲，两万余人猝然哗变，严重地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王耀武得知吴化文起义的消息后，张皇失措，拉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妄图混出北门，一走了之；但在我军重重围困之下，四处布满了明亮的眼睛和警惕的枪口，他插翅难飞，不得不缩回城内。他一面匆忙调兵遣将，加强绥靖司令部的警卫；一面急电蒋介石，再次请求准其放弃济南，率部突围。蒋介石未等到天亮，迫不及待地电告王耀武，再三声称济南万不可失，严令其“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参谋总长顾祝同、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也都来电要王耀武固守待援。王耀武被俘后著文说：

“这是国民党一贯作风，不管部下有无完成任务的条件，只顾硬下命令。”在这种情况下，王耀武只得匆忙变更部署，把以商埠为核心的防御计划改为以内城为主，固守城垣，等待援军。

久经沙场的许世友，当然不会失去攻击敌人的大好时机。他命令攻城西线集团各部乘虚东进。我军一部肃清机场残敌后，完全控制了飞机场，缴获飞机3架；其余各部纷纷向商埠逼近，加强了攻取商埠的突击力量。同时，许、谭决定将攻城兵团总预备队第13纵队主力投入西线集团作战。

当日黄昏，夕阳的余晖透过云层，把晚霞映照得一片血红。西线集团第3、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同时对商埠发起攻击。我军以猛烈的炮火和连续的爆破，炸得敌人城防工事土崩瓦解，前后仅用40分钟，即多路突破敌人防卫阵地。商埠守敌凭借高大建筑物构筑的各种明碉暗堡，在街道上交织成密集的火网。一股股敌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恶狠狠地反扑过来。我各部指战员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穿墙过街，分割包围，摧垮敌人的顽抗。第10纵队攻占北门火车站后，大胆楔入商埠东部，抢占东天桥，截断商埠之敌逃往外城的通道。22日中午，商埠之敌大部就歼，我兵临敌外城。

东线集团在一夜之间拔除了王耀武的两颗硬钉子之后，再接再厉，连克鳌子山、燕翅山、红山、窑头、马家庄等敌人一批主阵地和村庄据点。我军有进无退，愈战愈勇，于20日直逼到东城墙下，随即向外城区域展开近迫作业。

连续作战

由于东、西线攻城集团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战斗，正确使用了许世友提出的“牛刀子战术”，仅用6天6夜时间，便迅速突破并占领了济南敌外围防御和商埠等3道防线阵地。9月22日，我军攻击锋芒直指外城。

面对我军的凌厉攻势，王耀武已预感到济南城会丢在他的手里。虽然蒋介石、刘峙一日数电，命令“坚守待援”；但他心里清楚，援兵是决不会待到的。对莱芜被围的李仙洲，孟良崮被困的张灵甫，周村和潍县被歼的周庆祥、陈金城，他不也同样是一次次电话、电报，要他们“坚守待援”吗？结果如何呢？援兵还在路上，他们就一个个被吃掉了。蒋介石虽然在徐州地区配置了3个兵团，共17万人，随时北援；但对方在徐州与济南之间，也配置了8个纵队，18万人在阻援、打援。那可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啊！可是，王耀武又觉得他是“国军”中有胆有谋的“上将军”，济南决不能像周村、潍坊、兖州丢得那样快，那样熊。他估计，对方已经连续激战6昼夜，伤亡消耗肯定不小，许世友动作再快，也需要三五天才能完成攻城准备。再说，城南马鞍山、城东千佛山、城北药山等地还在“国军”手里。许世友也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他会置敌于背后而不顾，冒险攻外城吗？王耀武认为有坚守的时间。于是，他接连下命令调整部署，缩短阵地，将城外一些据点的部队调入外城市区，将城墙附近的建筑物全部拆掉或烧毁，以扫清射界，阻止我军接近城垣。

但是，正如王耀武没有想到许世友会把东、西线部队都作“主攻”一样，他又没有想到许世友会再次打破“成规”，连续猛攻，不给他调整部署的时间。

许世友在西线部队攻占商埠，东线部队打垮反击之敌、跟踪追击逼近外

城时，审时度势，为了不让敌人获得喘息的时机，号召攻城部队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立即做好攻击外城的准备。

当时有人担心，商埠之敌尚未肃清，城郊千佛山、腊山、药山等地各有敌1个营盘踞，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攻击外城，部队在守敌的瞰制之下，腹背受敌，极为不利。因此，主张先把商埠残敌和各山守敌解决之后，再攻外城。

许世友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说，这些敌人都孤立无援，成了瓮中之鳖，估计不敢轻举妄动；再说，我攻城部队逼近外城，如果这些山上的守敌朝我打炮，也会同时打到外城守敌。因此，我们以主要力量攻取外城时，只需派一部兵力对这些敌人实施监视，围而不打。许世友又对谭震林说：“工耀武鬼得很哩！他把不少部队都调入市区，唯独留下千佛山、四里山、齐鲁大学等少数敌人‘固守待援’，其用心就是要牵制我攻城，拖延时间。我们可不能中他的奸计啊！”

谭震林斩钉截铁地说：“对！命令部队加紧做好准备，以东、西线集团钳形合击，会攻外城。”

9月22日下午，东、西线集团各纵队报告攻城部署和准备情况，许世友非常满意，说：“好，今晚就攻外城，对敌要害要狠打！”

济南外城城墙高七八米，厚四五米至七八米不等，内外壁以石块砌成，分设3层火力：城门楼和城墙上部设有高堡，城中部没有射击孔，城脚下筑有地堡。城外挖有壕沟，宽5~7米，深三四米。敌人为了阻挡我军攻势，将壕外几十米之内民房尽行拆除、炸毁，使壕外的广阔地带完全暴露于其火力之下，妄图在我攻城部队向突击地域跃进之时，轻重火器一齐开火，并使用毒气弹和火焰喷射器，使阵地前沿变成一片火海，阻止和杀伤我军。

攻击外城的战斗，于22日18时30分发起。许世友首先命令配属山东兵团的华东野战军特纵炮兵和攻城各纵队炮兵集中炮火，抵近射击。随着许世友一声令下，众炮猛轰，火光冲天而起，敌城防工事应声倾颓。敌俘供称：“过去兗、潍之战仅闻共军炮火厉害，但未知如此准确。此役被共军炮火杀伤人员占伤亡之数的十分之七。”

各攻城部队遵照许世友“对敌要害要打狠”的命令，各选择外城敌人的要害部位，集中力量突击强攻。西线集团第10纵队攻永镇门，第3纵队攻普利门，鲁中南纵队攻林祥门，第13纵队攻击永绥门。第10纵队第29师第85团第2营受命担当永镇门主攻任务后，以机枪连和第4连第3排组成爆破队，担负爆破任务；以第5连为主攻突击队。爆破队情绪十分高涨，不顾连续6昼夜战斗的疲劳，通宵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当时，除缴获敌人一部分炸药外，其他爆破器材相当缺乏，尤其拉火把非常缺少。经研究，决走卸下手榴弹柄做成拉火把，捆成大量炸药包。在解决爆破器材的同时，爆破队侦察了永镇门的地形，研究了连续爆破的具体方法。

22日晚10时，上级决定对永镇门强行爆破。爆破队分成7个组，由队长王兆范带领，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以爆破掩护爆破，打开通路。第二组以第一组爆破桥外鹿砦形成的烟雾为掩护，炸掉了桥头堡；第三组接着炸毁桥里的地堡；第四组则乘机把炸药包送上城门。由于城墙坚固，一包40多斤重的炸药只炸开一个小洞。这时，敌人拼命挣扎，各种火器疯狂地射击，妄图阻止爆破。我爆破队英勇顽强，义连续爆破5次，使洞口逐渐扩大。最后，第4连第3排排长苟德光拉响了足足装有300斤炸药的超级炸药包。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3丈多高的永镇门城楼被炸倒了。

爆破队轰塌城楼后，第5连突击队立即发起冲锋。第3排排长李振恒带领第9班，在敌人封锁火力下首先突上城墙，发出了胜利登城的信号。他随即指挥一个战斗小组沿城墙向北发展，把一股来援的敌人逼入工事，全部消灭。另一个小组由战士朱金安带领，乘胜向南扩展，并阻击敌人1个连的增援。第二梯队上来后，抢占了城内化工厂一角，我方形成“丁”字形阵地。

这时，城内敌人妄图夺回永镇门，集中1个营的兵力进行反扑。占领化工厂一角的第2排第6班一个战斗小组，由副班长陈万才带领，在无依托的平地上顽强抗击敌人的两次冲锋。后来，他们在本连第3排和兄弟连队的火力支援下，又打垮了敌人整连整营的数次反扑，终于巩固了突破口。此时，第10纵队攻城部队整营整营地从永镇门拥入城内，向战斗纵深发展。

与第10纵队相比，第3纵队在攻普利门时没有费太大的劲。某团第2营于22日夜突击到普利门外靠近城墙时，被敌人发觉。敌出动3辆坦克，经二大马路插过来。待突击在前的第6连第2排排长祝砚田发现，最前面的一辆坦克离他只有3米远。他立即把怀里的一包炸药放在坦克车头上，但没有将其炸毁。坦克掉头想逃。这时，兖州战役解放过来的战士刘金德迅速拿起另一包炸药放在坦克履带上，才把它炸瘫痪。后面两辆坦克见前面一辆已被炸毁，就拼命向城门方向逃跑。城门刚一打开，就被向城里撤退的蒋军塞满了。两辆坦克只好停在普利门外，乖乖当了俘虏。普利门内还有7辆坦克、10辆装甲车在怪叫，无法出来。

第2排占领了普利门前的一块阵地，并打退了东、西两面200多敌人的反扑。班长郑素春带领10名战士越过障碍，炸毁城门前的大地堡，突进了普利门。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都成了他们的战利品。第13纵队进攻永绥门，似乎更为顺利。荣获“把胜利的红旗插在兖州城上”锦旗的某团第7连爆破手张智忠，在我炮火开始轰击后，冒着可能被自己炮火击中的危险，抱着几十斤重的一颗大型爆破弹，钻出杆石桥洞口，跳下护城壕沟，爬上对岸，然后趁我方炮弹爆炸浓烟腾起之机，跑到城墙下，拉响爆破弹，顺势滚下壕沟。随着一声巨响，两丈高的城墙立刻倾倒下来。蹲在桥洞口观察爆破的副连长王成彬，立刻命令突击班第9班架梯突击。此时，负责爆破的第3排排长李天助、第8班班长蔡萼，没等突击班上来，迅速抓住战机，率第8班爆破员在20秒钟内首先登城，自己无一伤亡；同时还抢占突破口左侧一个地堡。此时，王成彬和第9班也登上了城墙。在登城信号发出后，我军炮火向两侧伸展。敌人发觉我军登城，进行疯狂反击。3排长头部、肩膀3处负重伤，仍坚持用牙齿拉断手榴弹弦打击敌人。副连长王成彬边给3排长包扎，边把身上携带的手榴弹接连扔出16枚，将城下的几十个敌人炸散。这时，第二梯队从距城墙30多米远的地方，冒着枪林弹雨向城门冲锋，配合城上的爆破班、突击班，很快消灭了城门楼里的敌人。据俘虏说，守这里的是敌第73师第15旅1个营，营长早已逃跑。

在西线集团攻击外城的同时，东线集团也发起了对外城永固门的猛烈攻击。22日18时整，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在茂岭山指挥所接到许世友攻城命令。30分钟后，他命令东线各部队所有炮火，对各攻击点实施轰击。

19时，第9纵队、渤海纵队各主攻团同时由各个突破口外发起连续爆破和突击。第80团第3连在总攻发起后仅数分钟，即突破敌人防御前沿，登上外城城头。第57团第2营和第73团第1营，由永固门一线突入。第81团也在七家村南北突出部附近登城。特纵坦克部队派赵之一队长指挥4辆坦克配

合第9纵队攻城作战。王仁坤驾驶的“毛泽东”号、万剑峰驾驶的“朱德”号及万刚、姚应古驾驶的“钢铁战车”号，作扇形阵势摆开，以准确的炮火向敌永固门外300米正面的地堡群和城墙、城腰上的工事进行毁灭性射击。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敌人，以为自己的坦克打错了目标，连续从地堡里发出信号：“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们是保安第6旅。是自己人。”

“轰！轰！轰！”我军坦克碾倒鹿砦，猛烈射击，炮弹在敌堡中开了花。随坦克冲锋的第73团第2连战士们，先是紧紧跟在坦克后面。后来，排长于安见敌人的火力点有的被坦克摧毁，有的被打成了哑巴，遂带领部队越过坦克，与坦克竞赛起来。他们连续炸毁3个地堡，继续向前冲锋。

永固门外，敌人的地堡被扫清了。消息传到第73团指挥所，团长张慕韩立刻命令炮兵向永固门开炮。顿时，我军强大的炮火，暴风骤雨般地吞没了永固门的城墙。部队像潮水一样向永固门涌去。

零点25分，第73团第1营在东关巷战中，与友邻第75团第2营一道攻占了敌保安第6旅旅部，全团随即分多路向两侧及内城方向发展进攻。第75团第2营营长徐永进率全营下城后，首先命令第4连控制一段街巷，取得了立足点；随后指挥第6连攻夺华丰针织厂一带房屋，并以此为依托，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与顽敌展开了逐屋逐巷的反复激烈争夺。

“3营长，你们要迅速靠近老城护城河，扫清攻老城路上的一切障碍！炮兵马上就要到城根，今晚开始攻老城。”张慕韩给第3营营长王玉芝打电话。

“部队已经靠近护城河了，只剩下一座小红楼还没打下来。”王玉芝报告说。

“什么样的小红楼这样难打？”

“是在河岸上，9连爆破了12次，都没有成功。”

“我马上就到。”

张慕韩火速来到第9连，向第2班班长王其鹏当面询问敌情。王其鹏汇报说：“阵地对面的小红楼由钢筋水泥筑成，紧靠护城河，下半截遮在河岸下，只露着第二层平台，台上有用麻袋筑成的工事。小红楼的这一边有一座房子，已被炸毁，只剩下一堵残墙。”

这时，连长迟念佳领着一个敌人逃兵来到张慕韩面前。张慕韩问敌逃兵小红楼里有多少人。他回答说：“有五六十人，大部分是当官的。你们送炸药时，他们就躲进地下室；等你们冲击时，他们又都出来了。”

“徐振中在里面吗？”张慕韩问。

“在，在！他要不在，谁还愿打？他给我们训话，要我们为党国效忠尽职，可他自己贪生怕死，早就穿上了便衣。”

迟念佳一听说保安第6旅旅长徐振中在小红楼里，怒不可遏地说：“团长，让我带人换上40斤重的大炸药包，非把徐振中那狗杂种炸得粉身碎骨不可！”

王其鹏等几名战士也齐声说：“团长，你下命令吧。”

张慕韩说：“先不要冲动，咱们还是再研究一下吧。”

研究结果，决定由王其鹏带领爆破组实施爆破。

拂晓，天降小雨。敌人出动飞机对我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地面敌我火力互相射击，爆破组前进受阻。

迟念佳眼都急红了，夺过李发的轻机枪，说：“我掩护，你快往平台扔

手榴弹！”说着，轻机枪嗒嗒地吼起来。

王其鹏乘李发投手榴弹的时候，扛起炸药杆冲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小红楼在烟雾中削去了一半。突击部队开始冲锋了。

王其鹏冲进小红楼，没看见敌人的踪影。他仔细搜索，发现墙角有个地洞口。原来这是敌人躲藏的地下室。王其鹏通过智取，抓获了1个排的俘虏，包括敌保安第6旅旅长徐振中。

26日中午，太阳透过硝烟照射着战火中的济南城，街巷的一些建筑物上冒着或浓或淡的黑色烟尘，用钢筋水泥浇筑而成的明碉暗堡、夹壁墙已被炸成累累黑洞，处处是断壁残垣。我东、西线集团攻城部队，在许世友“牛刀子战术”思想指导下，采取“集中兵力、重点进攻、重点突破、层层剥笋”式的攻击，仅用7天7夜的时间，便迅速突破并占领了济南敌外围防御阵地的160余个支撑点和基本防御阵地的商埠、外城等4道防线阵地。此时，攻城兵团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压向内城（也称老城）。“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雄壮口号声，震撼着王耀武负隅顽抗的最后一道防线。

决战之夜

攻取内城，是对攻城兵团最严峻的考验。

内城，是济南守敌的最后一道核心阵地。城墙高12米，厚10~12米。明碉暗堡密布，除同外城一样设置3层火力外，在墙头上每隔10米修一子堡，隔30米修一母堡，70~100米修一炮台。护城河宽五六米至二三十米不等。敌人堵住黑虎泉之水，引入护城河，水深2~5米。王耀武把被我军打击过但仍有战斗力的第15旅、77旅、19旅、57旅、213旅、特务旅等全部撤至内城，妄图依赖坚固的城墙工事、地面防御设施和所谓精锐主力作最后的顽抗。

9月23日午后，王耀武在内城南门城楼上召开决战会议。他对部下说：“济南之役的决战阶段已经到了。前几天，共军虽然攻势凌厉，进展迅速，但主要是与我弱旅交战。而我主力部队不但没有伤筋动骨，却大量消耗了共军有生力量。”他扫了一眼部下，又接着说：“各位都是我所倚重的爱将。现在我们据守济南最坚固的防线，应精诚团结，决死固守，争得时间，以待援军，再创四平街奇迹^①，实现蒋总统的‘会战计划’。”

王耀武嘴硬心虚，心里十分清楚，“会战计划”是肯定实现不了的。4道防线已被我军攻破3道，只剩下最后1道了。此时，邱清泉兵团仍然一步三顾，离济南尚有数百里；黄百韬、李弥两个兵团仍在“集结”的幌子下，于徐州一带未动。不过，王耀武根据他的实战经验判断我军连战疲惫，不经三五天休整，不可能发起对内城的攻击。另外，23日上午，蒋介石派徐州“剿总”刘峙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临济南上空，用无线电对王耀武说：“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到达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这使王耀武产生了一丝侥幸心理。他重新调整部署，加修巷战工事，召开决战会议，妄想取得“坚守待援”胜利的奇迹。

决战会议结束后，王耀武又率将校们在内城城墙上巡视了一大圈。所到

^① 1947年6月11至7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围攻国民党军战略要地四平。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没有集中主力于四平这个主要战略方向上，故经半个月作战仍未攻克该城。在国民党军南北两路援军迫近的情况下，我军主动撤出战斗。

之处，王耀武不断向部下传授守城经验，并调整防御部署。他命令其骨干部队第 15 旅守内城东南角，第 77 旅守坤顺门，第 57 旅作预备队。王耀武打算用血本跟我军拚到底。

其实，王耀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蒙骗部属。巡视完后，他立即率干戟、张介人等一部分幕僚秘密转移到大明湖边的北极阁，随时准备潜逃，只留下参谋长罗辛理等在指挥部坚持指挥。

为了粉碎王耀武的侥幸心理，乘胜迅速彻底全歼济南守敌，许世友要求各攻城部队发扬勇敢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当晚直取内城。他命令：东线集团第 9 纵队对新东门以北实施突击；西线集团第 13 纵队攻打西南角坤顺门，第 3 纵队进攻西门，第 10 纵队继续扫清外城残余之敌；其余各部积极配合攻城。

东、西线集团各部按照命令，迅速逼近内城城墙。23 日午后，第 13 纵队司令员周志坚向许世友报告说：“13 纵已经完成攻城的准备工作。”许世友说：“好得很！晚上配合 9 纵攻内城，继续给敌人以猛烈的打击，使敌措手不及！”

当天下午，许世友打电话询问第 9 纵队的准备情况。司令员聂凤智作了详细汇报：纵队党委讨论决定，把攻击内城的主要突破口选在东南角。其理由如下：这里是整个内城城墙的最高点，城头还有一座高大的气象台，登上可以去瞰制市区和城墙两侧守敌，对攻城全局有重要影响；城墙上比较宽阔，便于我登城部队展开，扩大突破口；城墙内侧有一缓坡，从而为攻击部队下城提供了条件；在城墙拐角处攻击，可以减少两侧敌人火力威胁；护城河虽深，但有一座石桥，有利于部队运动；城外房屋鳞次栉比，便于炮兵抵近射击和攻城部队隐蔽接敌；敌人估计这里难以攻取，我们偏偏选在这里，正是出其不意。

向攻城总指挥报告，本不需要讲得如此详细。但聂凤智知道，许司令大关心攻城战斗了。济南战役成功与否，在此一举啊！许世友不厌其烦地认真听毕，夸奖第 9 纵队全局在胸，眼光敏锐，并问主攻任务准备交给哪个团。聂凤智说：交给第 25 师第 73 团。许世友知道，73 团是 9 纵的刀尖子。他高兴地说：“我相信你们，相信 73 团！山东人民赠送攻城兵团一面红旗，上绣 10 个金字：‘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现把旗转赠给你们 9 纵，马上派人送去。”聂凤智高兴地说：“我们授予 73 团。”许世友大声说：“好！就让 73 团扛红旗，打先锋！”

23 日 18 时，我军全线发起对内城的总攻击。首先进行炮火轰击，远射程炮负责摧毁皇亭体育场、警察局、旧省政府等处新发现的敌人炮兵群，各种抵近射击的直射炮和曲射炮也瞄准各自的目标进行射击。在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城垣上下的敌人火力点一时都被打成了哑巴，守城敌军都钻进了地洞内。

长达一个小时的火炮轰击后，天空突然升起 3 颗红色信号弹，我军炮火开始延伸射击，各攻城突击分队跃过护城河，迅猛冲向城根。第 9 纵队第 25 师第 73 团“常胜连”第 7 连冲锋在先。第 6 班班长孙高亭率爆破组，先用 50 斤重炸药包将城头炸开一个大缺口，王硕文随即用炸药将缺口扩大。在雷鸣般的爆炸声中，梯子组 4 名战士抬着 4 丈多高、300 多斤重的云梯过河，靠上城墙。但在突击组准备登城之时，城头上敌人投下大量集束手榴弹，许多战士负伤或牺牲，云梯柱架被炸断。第一次突击失利。

连长肖锡谦、指导员彭超立即组织第二次攻城。副班长孙景龙带领爆破组冲进硝烟后一分钟未见爆炸。这时，孙高亭主动请战。他跑到爆破点，只见孙景龙等3人全躺在血泊中，拉火绳也被敌人侧射火力打断。他迅速跃起，爬上几米高的炸药撑杆，然后拉燃火绳，飞快下滑。迎着爆破的硝烟，第3排5名战士抬着云梯冲到城墙根下，但还未来得及向城墙靠梯子，敌人的机枪、冲锋枪、步枪火力和手榴弹就像刮风似地倾泻下来。梯子组、突击组战士大部分伤亡在城根下，第二、三次突击又失利了。

除第73团攻击受挫外，第79团突击队也遭敌重兵猛烈射击，云梯被打断，后续部队受阻；登城部队在突破口和敌人拼杀，全部壮烈牺牲。第76团因突破口选择不当，遭敌火力侧射夹击，攻城亦告失利。第80团在新东门攻击，因桥被炸毁，护城河河宽水深，难以通过，攻击也未得手。

许世友询问西线第13纵队攻击情况。周志坚报告说：第37师第109团第8连和第110团第2连同时向坤顺门及其北侧突出部攻击，先后攻上城头。敌人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从东、南、北三面疯狂地压向突破口。这两个连的指战员毫不畏惧，打光了子弹，就用刺刀、枪托、十字镐、铁锹、砖头、石头等在城头上与敌人拼。我军除少数人突进城内，据守房屋坚持战斗外，其余指战员大部伤亡。坤顺门突破口重新落入敌人手中。

其他各纵队也都在自己的进攻正面反复突击，虽给敌人以大量杀伤，但亦未能打开突破口。

在此期间，蒋介石频频调动飞机，昼夜不停地对我军占领的商埠、外城等地狂轰滥炸。敌机还扔下大量燃烧弹和照明弹，城里城外如同白昼，我军突击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网之下。

我突击部队全线受挫，被阻在内城城下。一场恶战之后，整个战场出现少有的沉寂。

夜深了，月光如水，繁星闪烁，黑虎泉水静静地流淌着。内城城墙像一条黑色的巨蟒，依然亘卧蜷缩在那里。

兵团指挥所里鸦雀无声。许世友心中很清楚，全线千军万马下一步如何行动，全决走于他和谭震林的决断与指挥。作为战役指挥员，许世友这时更加深切感到肩负责任的重重大。他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锁起双眉，紧张地思考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激战关头的每一秒钟，对于指挥员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失其一着，就会给整个战局带来莫大损失。

当时，有的指挥员认为，参战部队鏖战7天7夜未得到休整补充，有些部队建制打乱，伤亡很大，继续攻下去难以奏效。如果拖到天明，部队完全暴露于敌人飞机和炮火之下，将会造成更大的被动。根据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还有充裕的时间。因此，他们主张将攻城部队连夜撤出，进行休整，然后重新组织攻击。

许世友狠狠地把半截烟头丢在地上，用脚踏灭。

“怎么办？是继续攻击，还是休整后改日再攻？”

许世友抓起电话，直接征求第9纵队聂风智、第13纵队周志坚的意见。这两支部队是攻城的两把锐利的钢刀。

聂风智说：“兵团指挥机关来了两次电话，让我们准备将部队撤下去。我说，都打到这地步了，往哪里撤？再考虑一下吧。”

许世友说：“那好，你们快研究，有什么方案马上报来。”

周志坚回答得很干脆：“撤不得！只有继续拼，杀开一条血路，才能通向胜利。城内有我们的人，我们正在研究第二次攻城。”

“好。你们快些研究报来。”许世友放下电话，心想：在这节骨眼上，攻城的决心不可动摇！从战场的情况看，敌人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内城之中，慌乱不堪，败局已定。我军虽伤亡六七千人，但不少团、营建制尚较完整，仍具有一定的突击力量。如果我们撤下来休整，外围阵地得而复失，将前功尽弃。还要估计到，王耀武很有可能趁我部队后撤之机来个反冲锋，使我们欲攻不克，欲撤不能，大大增加部队的伤亡。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打，不能撤！另外，从战役全局着眼，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中央军委前两天来电，指出邱清泉兵团已行至成武、曹县一带，黄百韬、李弥两兵团也有行动的可能。攻克济南争取的时间越多，我军就越主动，既能彻底打消徐州之敌北援的企图，又能早日为我军南下作战开辟通道。

许世友把自己的想法说给谭震林听，谭震林完全同意。这时，聂凤智来电话说，第9纵队还有比较完整的5个团，指战员们求战情绪很高，正在认真总结受挫的教训，重新研究打法，再攻一次不会有什么问题。周志坚也来电，向兵团建议再攻一次。许世友问他们内城敌人有什么动静。他们说，我们不打，敌人也不打。

许世友兴奋地说：“好呀！我们的困难大，敌人的困难比我们更大。现在就看谁的决心硬过谁。我们要跟敌人比毅力，比顽强，比后劲。胜利往往就是在最后5分钟取得的！”

许世友遂于深夜命令攻城部队再次组织攻击，由东、西线集团两面对攻，一定要把内城拿下来。

命令下到第9纵队第25师第73团第7连。团长张慕韩问第7连连长肖锡谦，还有没有力量再组织一次攻击。肖锡谦说：“有。我连虽有不少伤亡，但还有一个完整的排。我们已总结出失利的原因，研究了新的办法，继续执行更艰巨的任务还是有相当把握的。请首长放心，保证夺下气象台！”

凌晨1时30分，第7连第4次发起突击。改变战术后的我方炮火尤为猛烈。聂凤智命令全纵队的大炮一律指向城东南角气象台及其周围地域，将成千上万颗炮弹倾泻到这一点，非把坚固的城墙打开一个口子不可。14米高的城墙，经受不住这狠命的打击，砖头瓦块被炸成■粉。敌上层火力点和防御工事也飞上了天。不到5分钟，东南角城墙已被炸开一个大缺口。

在炮弹仍在呼啸的时候，连长肖锡谦已命令梯子组李光臣等4名战士，扛着近4丈高的云梯冲到城墙下。他们不顾城上纷纷下落的砖块、石头，奋力架梯子。伏在城下的第一突击班，有几名战士刚爬上梯子，就被敌人的侧射火力打了下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第2班班长李永江和战士滕元兴、于洪泽等第二突击班，不到10秒钟，就爬到了梯顶；但离炸开的缺口还有1米多。这时，我方的炮火已经延伸，没炸死的敌人一面从城垛处的掩体、工事里向外爬，一面惊慌地乱叫：“八路要上来了，快打……”

李永江焦急万分。他摸着陡陡的城壁，想扒住被炸开的裂缝向上跃，但因太高，跃不上去。就在此时，滕元兴从底下顶了上来，让李永江踩着自己的肩膀上。李永江终于登上城头。他顾不得摘冲锋枪，迅速从腰间拔出两颗手榴弹，投向敌群。接着，他把冲锋枪转到胸前，朝敌人扫去，并乘机闪到气象台一段短墙内，左右开弓，打退了一股想炸断云梯的敌人。

这时，滕元兴、于洪泽、王会也上来了。李永江指挥他们向左右两面和

正面冲来的敌人射击，坚守阵地，以便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登上来。

冲过来的敌人除被他们打死打伤外，其余的人又缩了回去，躲进了气象台内。这时，连长肖锡谦带着部分战士也冲上来了。他头部被弹片和砖头击伤，缠着绷带，但仍虎劲十足，挥着匣子枪喊道：“同志们！杀呀！坚决打垮敌人的反扑，守住气象台阵地！”

这时，王耀武的“敢死队”从气象台两面反扑过来。肖锡谦带着10余名突击队员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城根下，梯子组的战士们虽被登城人员蹬下的砖头、石头砸得头破血流，但仍牢牢抱住梯子，以保证后续部队顺利登城。

指导员彭超在准备上梯时，被弹片炸伤了右腿，仍忍着剧痛，爬上了城头。此时，全连仅剩20余人。

王耀武的“敢死队”拼命往突破口拥，妄图重新占领突破口，堵住我后续部队登城。肖锡谦看透了敌人的意图，沉着机智地指挥大家与占优势的敌人顽强搏斗。

机枪手王会的子弹打光了，就到敌人的尸体上搜。轻机枪很快又嗒嗒嗒地吼起来。

李永江一个人连续打出70颗手榴弹。战士宋炳科嫌步枪不过瘾，从阵地上捡来一支冲锋枪，和敌人对射。

经过几十次激烈的拉锯式冲杀，“常胜连”20余名勇士终于打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巩固并扩大了气象台阵地；但也有许多同志倒在了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中。

晨曦初露，指导员彭超在战斗间隙亲手把“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红旗插上了气象台。

黎明时分，第8连上来了，第9连上来了，第2营和团指挥所也登上了城头。团长张慕韩命令第2营营长崔玉法：“立即组织部队下城，进行巷战。”

与此同时，西线集团第13纵队也集中所有炮火，再次猛轰坤顺门。该纵队第37师第109团随即向被敌人重新封死的缺口连续攻击。早先攻进去的两个连部分人员，看到坤顺门突破口处火光冲天，杀声阵阵，知道我军又对内城发起了攻击。第2连副指导员曹汉喜立即指挥大家趁天将破晓之际杀了个“回马枪”，与城外第109团第3营第9连里应外合，重新撕开突破口。第9连突击队登上城头，与敌人“敢死队”展开激烈的肉搏战。

许世友立即命令各纵队后续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巩固和扩大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

天亮了，红彤彤的太阳跃出山岭，阳光穿过缕缕云霞照耀着大地。许世友虽说几天几夜没合眼，却一点不感到困乏，心情特别振奋。他下意识地用手抓一下头，结果抓下一把头发，再抓，又是一把头发……

随着东线集团第73团和西线集团第109团突入内城，东线集团第9纵队第75团、第76团和西线集团第10纵队第83团、第84团等后续部队连成一条长龙，冒着未散的硝烟拥入城内。开始是一路开进，继而两路、三路，直到六路并进。守敌节节败退，纷纷就擒。我军指战员追歼残敌，愈战愈勇。9月24日，太阳还未落山，济南内城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据守千佛山、马鞍山、药山、历城等外围据点的敌人，在第10纵队的围困下，也纷纷缴械投降。耀武扬威一时的济南守敌11万重兵，在8天8夜之中就全军覆灭了。但是，当天并没有捉到王耀武。当某部3排搜索到王耀武的“主席办公室”时，发现

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支漂亮的银色手枪，枪把上刻着“王耀武将军阁下，美军中将麦克鲁赠”。王耀武逃高时竟把心爱之物丢了，可见当时是多么仓皇和狼狈。

据王耀武的参谋长罗辛理交待，王耀武是23日深夜在我军炮火打得最凶时，从内城东北角地下室里逃出城外的。许世友立即下令各部队和城郊各县民兵严密盘查，以防王耀武潜逃。王耀武带着4名卫士，先化装成商人，后又假装成病人，逃到寿光县境弥河张剑桥时，被我哨兵查出抓获。

正在北上的敌邱清泉兵团，听说济南被克，未及与我打援部队接触，即仓皇南窜。黄百韬、李弥两兵团，仍在“集结”，一直未敢轻举妄动。

我军8天8夜攻克济南，实现了“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誓言。中央军委颁发嘉奖令，特授予第9纵队第73团以“济南第一团”、第13纵队第109团以“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8天8夜攻克济南，是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本以为可以固守半年或3个月的蒋介石，接到急报后还不相信，派飞机在济南上空绕飞一圈之后，才不得不相信济南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由中共中央军委派出的济南战役观察组才到石家庄，就听说济南已经解放，当时也十分怀疑，后来看到国民党报纸，才知道大功已经合成。毛泽东亲笔改定的新华社社论欣喜地称：“这个伟大的胜利”来得“意外的迅速”，“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

是的，这是一个奇迹，一个罕见的奇迹。这个奇迹，就这样从许世友的手中产生了。

在庆功大会上，许世友刚宣读完中央军委的嘉奖令，伤腿的剧痛向他袭来，使他无法再在前线坚持指挥，不得不请假重回胶东艾山汤休息治疗。

济南战役的胜利，为我军长驱南进开辟了通道，为淮海大战揭开了胜利的序幕。

从穷孩子到红军师长的李天佑

郝生章

李天佑（1914～197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广西临桂县人。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7 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 3 军团第 68 团副团长、团长，红 3 军团第 5 师第 13 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 10 团团长，红 1 军团第 2 师副师长、第 4 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3 旅第 686 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1939 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区代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 1 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 38 军军长，第 13 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 * * * *

踏上革命征途

李天佑出生于广西临桂县一个贫农家庭。父母带着他们兄弟姐妹 5 人住在用杉树皮盖起的老屋里，家中除租种地主土地外，别无长物。他只读过两年家馆，很小就参加生产劳动，跟着母亲上山砍柴、割草、挖野菜。11 岁时就背上母亲编织的草席，翻山越岭去几十里外赶圩卖席。那时，穷人多富人少，好不容易卖一张席，也只能换二三斤米。一家老小常常靠野菜充饥。12 岁时，他随全家搬到龙胜县（今永福县）金竹坳，进山砍柴烧炭，终日劳累，卖柴卖炭，仍然维持不了一家的生计。1927 年春，13 岁的李天佑又随父母搬到桂林。在这里，他沿街叫卖过柴草、扁担、豆腐和蔬菜，还在米粉店里当过童工，吃尽了苦头，还是不得温饱。

家庭的居无定所，超负荷的劳动，艰苦的生活，在李天佑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于是萌生了离家出走另谋生路的念头。

1928 年，正是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中国革命形势处在低潮时期，新军阀开始混战。这时，北伐军颇负盛名的将领、国民革命军第 7 师师长李明瑞的独立旅在桂林扩军。年仅 14 岁的李天佑与一个同乡一起报名当了兵。不久，他随军开赴汉口，后经南京、上海、广州返回广西，驻扎桂平。所到之处，尽是军阀混战，百姓遭殃，饿殍遍地，满目凄凉。这给李天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创痛。

1929 年春，蒋桂战争爆发。桂军前线代总指挥李明瑞，为了实现“先倒桂，后反蒋”的策略，突然在前线倒戈，致使桂军完全失败。同年 5 月，李明瑞率部回到广西。在此期间，李天佑训练刻苦，作战英勇、机智、顽强。一次深夜，他所在的连队被敌人包围，连长听到激烈的枪声，没有顾上穿鞋就跑出了村。李天佑冒着生命危险摸黑把连长的马抢了出来，还把自己的鞋脱下来送给连长穿。连长很受感动，对他十分赏识，提他为上等兵，并推荐他到广西南宁教导总队当了学兵。

南宁教导总队是中国共产党人建议李明瑞为培养军队初级军官而创办的。李明瑞在蒋桂战争前线倒桂成功后，旋即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广

西省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整编第 15 师师长，成为广西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当时，俞作柏任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李明瑞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表示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我们党利用这个机会，特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他的化名叫邓斌。到广西不久，他就向俞作柏和李明瑞推荐由曾任国民革命军第 25 师参谋长的张云逸主办广西教导总队，并兼任广西第 4 警备大队的大队长。

在教导总队学习的学员，大约有 1000 名，大多是从李明瑞部队调来的班排长和优秀士兵。总队的各级负责人多是共产党员。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又秘密地发展了 300 多名共产党员，在各连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连长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排长多由思想进步或靠近党的学员担任。与此同时，还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把总队中一些反动军官调去搞军事训练，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这样，教导总队的领导权就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手中，教导总队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培养和储存干部的场所。张云逸和共产党员、第 5 警备大队大队长俞作豫还用同样的办法，把第 4 和第 5 警备大队很快变成了我党控制的武装力量，并为尔后开辟左右江红色根据地，建立红 7、红 8 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李天佑来到教导总队学习，从一开始就感到这里的气氛与原来的连队大不相同。在总队驻地四周的院墙上，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鲜明的政治标语。晚上集合点名，学员们还要高呼这些口号。每天上课、讨论或参加其他活动，也离不开这些口号内容。特别是在每星期一举行的孙中山纪念周的会上，主持人总强调孙中山的遗愿，是要唤醒全国工农大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联合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来共同奋斗，以实现国民革命之目的。

有一天，张云逸来到第 8 连讲课。他站在洒满阳光的草坪上，个头不高，但体魄结实，脸上露着笑容，用手捻着胡须，显得异常和蔼可亲。在开讲前，他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学员兄弟们，在我国社会中，哪种社会成分的人最多？”

李天佑想了一下，立即举手回答：“工人、农民最多。”

张云逸笑眯眯地望着他，继续问全连学员：“你们同意吗？赞成工人、农民成分多的请举手！”

顿时，全连学员都把手高高地举起来了。

张云逸赞许地点点头。然后他给学员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现状，强调国民革命必须唤起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进行斗争，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李天佑感到张云逸的讲课内容非常新鲜，下课后仍不想走，若有所思地望着这位讲课的长官。张云逸见他是刚才回答提问的学员，便亲切地走过去同他攀谈，问他是哪里人，家庭怎么样，鼓励他好好学习，练好本领，并且要在场的政训教官以后多关心和照顾他。

这个教官叫李朴，也是中国共产党派来工作的。他听到张云逸的叮嘱，立即点头答应：“是！”同时用热切的眼光望着李天佑说：“咱们以后多聊聊！”

从此以后，李朴经常找李天佑聊天，或邀他出去散步。开始李天佑很少讲话，显得有些拘谨。但李朴仍不断找他，经常问长问短，问寒问暖，关怀得无微不至。李天佑深为感动，心想：当兵一年多，还从来没有一个当官的

像李朴那样关心过自己。这里的官兵关系真是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啊！

一次晚饭后，李朴邀李天佑出去散步，在闲谈中突然问他：“你这么小小的年纪，为什么要出来当兵？”李天佑一时不知从何谈起，只好将他无法忍受当学徒的痛苦而离家当兵的经过如实地讲了一遍。

李朴趁此机会向他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问题，问他是否知道穷人为什么那么穷，工人、农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

李天佑低头沉思，一时说不清楚。

李朴告诉他，有人说这是自己的“命”不好，其实穷困、受压迫的根源不在这里，而是由于社会上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剥削。工农大众虽然人数很多，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全被少数地主和资本家占有了，所以永远处于贫困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这位从苦水里泡出来的战士，听了李朴的一番讲解，犹如大梦初醒，恍然大悟，心里为之豁然。

那么怎样才能挖掉工农大众的穷根呢？李天佑立即向李朴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为了启发李天佑，李朴向他讲述了俄国工人、农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号召和领导下，炮轰冬宫，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摧毁了沙俄反动统治政权，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过。

李朴还给李天佑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北伐战争，蒋介石、汪精卫如何叛变革命，江西红色苏区正在开展的斗争……

李朴讲起来滔滔不绝，李天佑听得声声入耳，油然神往。他虽然还不能完全吃透李朴所说的革命道理，但从切身经历中开始悟出工农大众怎样才能挖掉穷根的答案：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团结一心，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才能彻底改变穷苦、受压迫的命运。

他下定决心，要紧握枪杆，为改变工农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而英勇奋斗。

1929年，是全国革命风暴风起云涌的一年，在广西则是政治风云急剧变化的一年。

邓小平在广西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基础上，于1929年9月在南宁的津头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广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广泛发动群众，武装农工，准备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会后，得悉俞作柏和李明瑞与张发奎联合出兵反蒋的消息。此时，国民党内汪精卫与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等正联合起来对抗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张发奎从宜昌、沙市率第4军沿湘桂线南下，想与俞作柏、李明瑞联合出兵进攻广州。薛岳衔命亲至南宁，游说俞作柏和李明瑞联合出兵反蒋。邓小平、俞作豫得知这个消息后，曾向俞作柏和李明瑞陈述利害关系，指出他们主政广西不久，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不牢，军力单薄，仅有3个主力师，而且内部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出兵，不易成功，且风险很大，后果严重。因此，力劝他们不要仓促出兵。但是，俞作柏和李明瑞见冯、阎联合反蒋，认为蒋必集中兵力对付北方，无暇南顾，正是反蒋大好时机，机不可失，便未听邓小平和俞作豫的劝说。结果，俞作柏和李明瑞于10月1日在南宁誓师，通电反蒋，出兵江西，进攻广州，很快遭到惨败。其3个主力师行至桂平，便被同

蒋方勾结的师长带去投蒋。接着，蒋军进逼南宁，形势万分危急。

邓小平等见劝说俞作柏和李明瑞无效，料定他们此时反蒋必将失败，党的任务也必然受到严重干扰，于是当机立断，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首先，他们以教导总队和第4、第5警备大队还未训练好，不能迅速拉出配合主力作战为由，要求留下来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同时，建议由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了省军械仓库的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以作应变之用。与此同时，又抽调两个营分赴左、右江地区做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准备工作。他们在组织上和物质上做好应变准备之后，决定在俞作柏和李明瑞反蒋一旦失败，立即在南宁发动兵变，把教导总队和第4、第5警备大队拉到左、右江地区改编为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当邓小平等获得俞作柏和李明瑞失败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决定于当晚发动南宁兵变。由邓小平亲自率领装运大批军用物资的船只前去桂西重镇百色；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4警备大队一同前往，以确保船只安全；俞作豫则率领第5警备大队直奔左江地区的龙州。

这天深夜12时，教导总队驻地突然传出一阵阵哨子声。李天佑正在酣睡，一听到紧急集合的号令，立即翻身起床，拿起武器就往室外跑。外面人声嘈杂，学员们纷纷跑往校场。

霎时，电灯熄灭了，到处一片漆黑。只听李朴高喊：“怎么搞的？”接着便听到“砰砰”、“咣咣”的枪声。李天佑大吃一惊。他担心李朴的安全，想迅速赶过去保护李朴，但在一片漆黑和混乱中，一时难以赶到李朴身边。他心中异常纳闷和焦急，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意外事件。

原来在教导总队内部潜伏着一个反动军官，他利用俞作柏、李明瑞在前线反蒋失败的消息，蓄意进行捣乱和破坏，以实现其策反倒戈的图谋。他串通少数几个反动分子，拉断电闸，利用黑暗和混乱先发制人，煽动不明真相的学员跟他们一起去投奔敌军。总队的学员大都来自俞作柏、李明瑞部队的3个主力师，当他们听到前线倒戈的消息，纷纷要求回到原来部队去。据此，总队领导便大力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李朴首先站出来，揭露反动军官的欺骗和煽动，高喊：“学员兄弟们！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欺骗宣传。他们是反动军官，要抓住他们！”

许多党员和进步学员也愤怒地跟着喊：“抓住他们！”“枪毙他们！”

李天佑一听李朴叫抓反革命，恨不得立即上去把他们抓住；但苦于当时没有灯光，看不清他们躲藏在哪里，只能摩拳擦掌，心里干着急。

这时，有人接通了电线，电灯立即大亮。那个反动军官见势不妙，迅速爬上围墙缺口，趁乱溜跑了。

深夜，总队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对策。决定各连在第二天召开会议，由党员率先发言，揭露反动分子的阴谋，坚决反对可耻的叛变投敌行为；明确宣布教导总队从南宁开往右江地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尽力争取更多的学员站到革命一边。

在会议上，李天佑争先发言，对投敌分子的可耻行径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谴责，表示坚决拥护总队领导关于撤往右江的决定。经过大半天的激烈讨论，大多数学员明辨了是非，表示愿去右江地区，继续开展斗争；只有少数人坚决要走。

就在这天下午，教导总队召开了全体学员大会。张云逸站在台前，目不转睛地向大家看了很久，嘴唇紧闭，习惯性地用手捻着胡须，显出一副庄重

威严的神态。他用缓慢而又沉重的声调对学员们说：“前线失败，蒋军进逼南宁，教导总队誓不投降，决定撤到左、右江地区去坚持革命斗争，有些学员兄弟要走，这也可以，干革命不能强迫嘛！……我们干革命，要靠自觉自愿。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觉悟的人组成的。”他转身做了一个手势，接着说：“现在就站队，愿意继续革命，去左、右江地区的，站到我的左边；坚持要走的，站到我的右边！”

张云逸话音一落，队伍立即散开，分成左右两边。李天佑迅速持枪跑步，站到革命队伍一边；其他很多人也跟着站了过来。只有数量不多的一些反动军官、兵痞等站到了另一边。另有少数学员从中观望，犹豫不决。李天佑和共产党员及思想进步的学员一起，逐个叫着尚在犹豫的学员的名字说：“快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会成千古恨！”“认清前途，别去替反动派卖命！”

许多平时跟李天佑要好的学员，见他兴高采烈地站在革命一边，也就跟着站了过来。有些一时拿不定主意的学员，甚至已经走到另一边去的学员，经过李天佑等人的召唤，又陆续走到革命的一边来了。经查点人数，除已派往前线的300多人以外，现有学员中，站到革命队伍一边的共有500多人；不愿去右江，坚决要求离队的约有100人。党组织决定，凡是坚持离队的，将枪留下，发给路费，开会欢送。

以此为转折点，李天佑正式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革命队伍的光荣一员。

参加百色起义

教导总队兵变后的第二天，晴空万里，天高气爽。教导总队和广西第4警备大队在张云逸等率领下，高举红旗，迈着矫健的步伐，沿着右江河岸，从陆路向百色方向疾速前进。

右江两岸，绿树成荫，芭蕉、竹林郁郁葱葱。李天佑扛着步枪，背着背包，雄赳赳地走在队列中。他看着浩浩荡荡的行军队伍，由衷地感到高兴。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城镇，都可以看到年轻的农民自卫队员们，手举红旗，背着大刀、鸟枪，列队迎候。无数群众端茶递水，塞给战士们鸡蛋、香蕉和花生，向他们热烈鼓掌。有些老爷爷、老奶奶背着孙子、孙女，妇女抱着婴儿，也赶来欢迎他们。这是李天佑自当兵以来，从未遇到过的热烈而动人的情景。他由此想到，不久前李朴向他讲的列宁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现。他顿时感到胸襟开阔，心明眼亮，浑身是劲，于是迈着有力的步伐，昂首向百色方向前进。

百色距南宁约210多千米，是广西西部的一座山城，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四周丘陵蜿蜒起伏，两边突起的凤凰山像一幅屏障，把山城衬托得秀丽多姿。东面的澄碧河，南面的寒江，绕着城墙滔滔而过。江上白帆点点，岸边芦竹繁茂，四郊绿树成荫，一片富饶景象。这里又是鸦片、洋纱贩运的集散地，地痞、流氓、盗匪和走私商人的安乐窝。尤为重要的是，它位于右江航运的终点，是广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交通枢纽，在军事上具有重要价值，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在大革命时期，韦拔群就在该地区的东兰、凤山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建立了农民革命武装。在这里，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也从未停息过。韦拔群和他的战友们在右江地区打下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革命武装的到来，提供了极为有

利的条件。

百色城守备薄弱，当1929年10月下旬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领部队抵达百色前，守敌已逃之夭夭。

部队抵达百色后，邓小平、张云逸立即召开党的会议，研究当前形势和工作部署。鉴于军阀混战尚在继续，蒋军在广西立足未稳，我军初来乍到，群众对我不了解，因此会议认为，当前应乘敌人无暇西顾的大好时机，首先在军队内部和群众中广泛公开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号召和发动群众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积极准备百色起义，宣布成立工农红军和红色革命政权，创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根据会议决定，教导总队改编为教导营。教导营除坚持军事训练及开展革命的政治教育之外，每天都派出工作组，深入城乡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农民群众一起打土豪、分田地，把收缴地主武装的枪支用来武装群众。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右江两岸的广大地区，迅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

李天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身这一轰轰烈烈的斗争，同时经受了深刻教育和严峻的革命锻炼，政治觉悟提高了，对党的认识更深刻了。他亲眼看到日益高涨的农民革命运动，新型的人民革命军队，如鱼似水的军民关系。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才出现的。他深深感到，穷人要彻底翻身解放，必须坚决拥护和依靠中国共产党。他多么渴望自己早点加入这个伟大的党，成为这个党的光荣一员啊！

本来，李天佑在教导总队学习期间，李朴一直在关心他，培养他。在南宁兵变中，李天佑坚决站在革命队伍一边，在紧急关头，勇敢地同敌对分子进行坚决斗争。根据这些表现，李朴曾准备吸收他入党；但由于当时忙于应变工作，这事就暂时放下来了。到百色之后，李朴调任新的职务，来不及亲自解决李天佑的入党问题，只好在临走前向营的新任教导员详细介绍了他的情况，并希望尽早解决他的入党问题。

新任教导员姓何，有一天找李天佑谈话，问他：“你来教导队很久了，感觉怎么样？你认为共产党好吗？”

“很好！”李天佑脱口而出。

“为什么好？”

“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为工农大众谋利益，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没有共产党的启发教育，我们就不会懂得干革命的道理，就会永远做牛做马做奴隶。”

李天佑一反过去沉默寡言的常态，犹如开了闸的流水，一口气把心里憋了很久的话完全倾吐了出来。他两眼凝视前方，脸上显得异常兴奋，声调沉稳、缓慢而坚定有力。他掏出了自己的一片诚心，表明自己对党的热爱和崇敬。

何教导员满意地点点头，立即问他：“你想加入共产党吗？”

“想！连做梦都想着入党！但不知我够不够条件？”

何教导员高兴地对李天佑说：“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李天佑焦急地等待着，期盼着，终于盼来这个光荣的时刻。一天，何教导员笑容满面地特意来告诉他：党组织根据你在教导总队和教导营的全面表现，决定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几天以后，李天佑和几个新入党的战友一起，被找去参加入党宣誓仪式。在一间临时布置的小屋里，墙的正面挂着一面绣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红旗把他们的脸膛映得通红，把他们的心烧得火热。何教导员领着他们向党庄严宣誓。

李天佑心情十分激动，紧握拳头，高举右手，面向红旗，庄严地宣誓：“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此时此刻，李天佑感到无尚光荣，无比幸福，眼眶内闪烁着晶莹的泪花。这个饱受生活煎熬的15岁少年，在艰苦的岁月里都能抑制自己，很少流泪，如今却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他心潮翻滚，热血沸腾，决心迎着一切艰难险阻，为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奋斗不息，战斗不止。

李天佑入党不久，被任命为教导营机枪连排长。10月28日晚，他跟随教导营两个连的同志们，全副武装，乘着汽船，从百色出发，沿右江顺流而下，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参加野营演习！”

夜色朦胧，右江两岸山色全被隐藏在黑幕里，只有江面上点点渔火闪烁。小汽艇发出“突突”的有节奏的响声。在船舱的甲板上，士兵们安静地躺着休息。这时连长把李天佑等共产党员召集在船舱里开会，告诉他们：这次行动不是野营演习，而是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要求共产党员英勇作战，起模范带头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同时，要掌握好部队的情绪，及时做好思想工作，切实保证战斗的胜利。

连长说：“你们知道是去打谁吗？是去消灭反动的广西第3警备大队，活捉‘狗熊’！”

所谓“狗熊”，就是广西第3警备大队大队长熊镐。在教导总队和警备第4大队开赴右江，进驻百色时，熊镐随即奉命率部占领右江地区的平马和那坡等市镇。不久，他与地主豪绅勾结，串通各县警备队、民团、土匪，欺压群众，镇压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桂系军阀还密令他，尽快发动突然袭击，吃掉第4警备大队。

面对严峻的事态，如果不迅速消灭这支反动武装，让其图谋得逞，不但百色起义计划要落空，而且右江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也将遭到严重摧残。为此，邓小平和张云逸设下“鸿门宴”，引诱熊镐“上钩”。同时，以“演习”为名，派部队去平马和那坡两地，消灭第3大队两个营的驻军。

“狗熊”果然上了圈套，我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宴席上将他擒获。但第3大队驻平马镇那个营的敌人却戒备较严，当遭到我突然袭击时，仍拼命挣扎，负隅顽抗。张云逸遂下令教导营两个连，星夜从百色乘船直奔那坡镇增援。

那坡镇位于谷地小平原，背靠土山，西临右江。镇上约有数百家店铺。李天佑等到达时，正是拂晓。他立即向全排动员，说明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接着，检查了武器弹药，身先士卒，站在全排最前面。他摩拳擦掌，决心要打好入党后的第一仗，为革命立功。他们迅猛突入镇中，跟兄弟连队一起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敌我双方本来势均力敌，相持不下。此时，我方突然增加两连生力军，火力又特别猛烈，敌人顿时难于招架，争相溃逃。我方乘胜追击，守敌除一个连狼狈逃窜外，其余全部被歼灭。

这次消灭熊镐大队的战斗，共俘虏敌人1000多名，缴获各种枪700多支。

那坡战斗结束返回百色途中，李天佑又与兄弟连队一起乘胜扩大战果，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收缴了田东、田西两县警备队和警察局与民团的全部枪

支，并将其分给当地的农民队伍。

这是李天佑入党后参加的第一次胜利的战斗。接着，他参加了著名的百色起义。

邓小平、张云逸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和物质准备之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他们在左、右江武装起义的计划，决定成立红7军和红8军，由张云逸、俞作豫分别担任军长，李明瑞被任命为两个军的总指挥，邓小平为两个军总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

百色起义按计划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隆重召开大会时宣布。

1929年12月10日，即百色起义的前一天，李天佑奉命同兄弟部队一起，搜缴百色城里警察局的枪械，清除隐患。

是日深夜，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通告并布置第二天举行起义事宜，要求党员回到各自所在的班排做好思想和组织工作，以积极姿态迎接这一光荣任务。连里买了一批红布，让每个人各扯一条，作为起义时佩戴的红袖带。还用各色彩纸做成彩旗，书写了各种标语口号，准备在驻区内外张贴。这一夜，李天佑忙上忙下，心情无比兴奋。他同全连战友们一夜未合眼，盼着起义时刻的到来。

12月11日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整个百色城张灯结彩，热气腾腾。李天佑和战友们把驻区清扫得干干净净，换上清一色的灰色军装，迎着朝阳，挺起胸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五彩缤纷、彩旗飘扬的百色广场，欢庆起义盛会。

上午9时许，阳光灿烂，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的人群拥入广场。会议主持人^①正式宣布大会开始。喧腾的会场，顿时寂静下来。大会主持人郑重宣告：“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从即日起正式诞生了！”

主持人接着宣布：按照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司令员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2纵队司令员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3纵队司令员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主持人话音刚落，掌声、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四起，彩旗招展，会场一片欢腾。

继红7军成立之后，1930年2月1日，李明瑞和俞作豫在距离南宁约150千米的西南边城龙州宣布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8军。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犹如一声惊雷，震撼着祖国华南大地。广西左、右江20个县、100多万人口的地区，成了当时全国瞩目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之一。广大革命者和人民群众为之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而反动派则大惊失色，丧魂落魄，伺机反扑，妄图卷土重来。

百色起义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拂晓，正值红7军主力分兵出击百色附近残余反动武装的时候，隐蔽在百色西部的地主武装2000余人突然向百色发动袭击。这些地主武装的成员大多是当地人，地形熟悉，不到20分钟就冲进城内。他们横冲直闯，四处抢掠，杀人放火。霎时间，百色城里枪声四起。

此时，我留守部队只有1个机枪连和半个特务连，加上军直属队的机关干部和勤务分队，总共不到500人。

^① 百色起义前几天，邓小平接上海党中央发来电报，要他去上海报告工作；李明瑞、俞作豫到龙州筹集军饷，整理部队；张云逸到平马、那坡等地处理军务。以上同志均未到会，由他们指定人主持这次会议。

尽管城防守备力量薄弱，敌众我寡，形势异常危急，但守城的指战员斗志昂扬，面对强敌毫无惧色。他们很自然地组成战斗小组，分头进行抵抗。有的依托城市外围建筑物，同敌人展开激战；有的利用街垒，同敌进行巷战，狠狠打击土匪的猖狂气焰。

年仅 15 岁的李天佑，在百色起义后已被任命为特务连副连长。当他听到枪声后，毅然率领半个特务连投入战斗。

队伍集合后，李天佑手握驳壳枪，沉着而又冷静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大家要镇静，不要惊慌！前几天就听说土匪要来进攻，现在果然来了。不过，他们都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现在是我们立功的时候了，要狠狠打击敌人！”

李天佑带着特务连，向城内枪声激烈的地方奔去。这时，匪众正在街区店铺抢劫财物，指挥不灵，队伍十分混乱。李天佑指挥战士们向这伙匪徒猛烈射击。土匪拔腿就跑，只有少数躲在屋角打冷枪。战士们不断地喊话：“缴枪不杀！”“工农红军宽待俘虏！”同时利用地物，向前冲击。土匪乱作一团，四处奔逃，有的俯首就擒，有的跪地求饶。李天佑根据各处传来的枪声，判断只有城外占据山头制高点的土匪尚有一点实力。他想，只要消灭山头之敌，断其后路，城内的土匪便会土崩瓦解，不攻自破。于是，立即命令战士们避开大街，绕道冲出城门，奔向城外战斗最激烈的山头。战士们紧紧跟在李天佑身后，向山头冲击。

李天佑向山头一望，只见在凤凰山的树丛里，穿着各种杂色衣服的土匪，手持步枪、鸟枪和大刀，嘴里不时发出嗷嗷的怪叫，在那里虚张声势。李天佑乘其不备，带头向土匪发起猛烈冲击。当土匪发现进攻的队伍都是装备精良的正规部队时，便慌了手脚，一边胡乱开枪，一边后撤。子弹在头顶呼啸，手榴弹在树丛中炸响。李天佑和战士们冒着硝烟，跟踪追击。此时，机枪连在冯达飞连长率领下，也冲上了山头。两个兄弟连队紧密配合，很快将这群乌合之众打得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军部参谋莫文骅、黄奇等带领机关的一部分同志，把守城门，阻击后续敌人进城，相机歼灭溃逃之敌。军部经理处的张逸秋、云广英等则组织一部分同志在军部门口堆起沙包，用门板、桌子、椅子架起路障，紧急迎敌。

张云逸军长在平马前线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立即调 1 个营的兵力增援百色。但是，不等援兵到达，留守百色的特务连、机枪连和勤务分队及机关干部经过三四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已将土匪击溃，并消灭了大部分土匪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组织的土匪武装，企图乘虚抢占红 7 军起义城市的阴谋，在红军战士铁拳的有力回击下，遭到失败。

少年英俊的副连长李天佑，带领战士们押着垂头丧气的俘虏，昂首挺胸，从城外胜利归来。平乱后的百色街区，行人川流不息，商店恢复营业，市民恢复了正常生活。

但是，桂系军阀不甘心失败，继土匪武装进袭百色之后，他们又调集大批军队前未镇压，妄图消灭刚刚诞生的红色根据地和红 7 军。

1930 年 2 月 4 日，桂系军阀嫡系师长李琪率 3 个团及 1 个特编营，共约 4000 余兵力，首先向红 7 军的前哨阵地隆安发起攻击。

隆安地处右江水陆交通要道，依山傍水，是右江苏区防御前线的一个重要县城。敌人攻占隆安，目的是进一步袭扰右江根据地后方的东兰，同时夺取百色，进而截断左、右江两地区的联系。

当时，红7军驻隆安县城的部队仅有500人左右，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300人。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情况十分紧急。

4日和5日，敌军向红军连续发起多次冲锋，妄图以优势兵力攻克隆安；但红军英勇顽强抗击，坚守住了阵地。李明瑞闻讯后，立即从左江率领700多人，由果化赶来参战；张三逸军长也从平马镇率领4个营的部队赶来参战。两支增援部队与守城部队紧密配合，向敌军实施反击。经3昼夜激战，双方形成胶着状态。敌军陈尸遍野，伤亡500多人。隆安战斗，年轻的红军以不足两个团的兵力，抗击4000多敌人的反复进攻，充分显示了红军不畏强敌、顽强战斗的英雄气概。

李天佑在隆安作战中，参加了夺取一个制高点的战斗。7日拂晓，敌军覃兴团攻占了隆安城西制高点——猴子翻筋头岭。敌人居高临下，对红军构成极大威胁。在紧急时刻，李天佑受命率领特务连攻占制高点。当他们冲至山顶近处时，由于地势不利，敌人炮火猛烈，李天佑连未能攻克制高点，不得不从山上逐步后撤。

在此次战斗中，李天佑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从容指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表现了红军指挥员英勇无畏的精神。不幸的是，他左脚板被子弹击穿，疼痛难忍，站立不住，被送上担架，由军医叶统林护送去东兰县武篆野战医院治伤。

榕江城头显神威

李天佑在武篆野战医院治伤，未及痊愈，就悄悄地离开医院回到连队。当他回到特务连时，正逢连长武禄调任营长，他遂被任命为连长，年仅16岁。

1930年3月，中共红7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为了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充兵员，筹措给养，增强战斗力，前委决定不向敌人加强兵力的南宁方面运动，而由总指挥李明瑞和军长张云逸率领红7军第1、2纵队3000多人向河池方向前进，利用黔桂两省交界的复杂地形，特别是利用当时各派军阀混战的时机，前往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区开展军事活动。第3纵队由韦拔群率领，继续巩固右江革命根据地。

李天佑连长带领军部特务连随军部出发，担负军领导和军机关的警卫安全工作。

红7军指战员自百色起义后，斗志旺盛，士气高昂，听说要去黔桂边区打仗，个个兴高采烈，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争取杀敌立功。部队浩浩荡荡向前开进，军威雄壮，一路上披荆斩棘，所向无敌。3月底占领河池，4月初攻占怀远、四把和思恩等圩镇，4月下旬到达黔桂交界的大苗山区。战士们爬山越岭，穿越苗寨，很快进到距贵州榕江县城只有12里的一个村落。

榕江县城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基地，城内贮备大量军用物资。红军侦察分队很快在附近抓到两个敌军便衣侦探。经过审讯得知，贵州军阀与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交战正急，榕江城防守备薄弱，只有一名副师长率1个团防守，兵力不多，另有百来名警察维持治安。红7军领导研究后，立即决定第二天攻占榕江县城。

时值梅雨季节，白雾迷茫，几十米外就难辨人影。清晨，部队在浓雾中

沿着崎岖小路，向榕江县城急进。4月30日，红军抵达目的地。

李天佑细心察看，只见一条河水由北南流，榕江县城位于河流西岸，城门紧闭。高高的城墙用大青石砌成，几处坍塌的城垛堆起了沙包。城西北有一座土岭。整个县城依山傍水，地势险峻，对红军攻城十分不利。

红军人马的喧闹声很快惊动了守城敌人。一个猴子模样的小军官，带领一个士兵爬上城头，操着一副公鸡嗓子发问：“你们是哪来的部队？”

前卫战士答称：“从广西来的！”

公鸡嗓子嬉皮笑脸地说：“我们是邻居，请不要误会。你们需要多少油盐柴米和猪肉，我们如数送你们。”

战士们猜出这是敌人的诡计，便虚应几句了事。

上午10时许，李明瑞、张云逸决定对县城实施突击，先打开一个突破口；同时命令第1纵队第2营党代表黄一平带领全营，立即涉水抢占城后山头，以掩护攻城部队进攻。

李明瑞左手握烟斗，右手一挥，司号员立即吹响了雄壮嘹亮的冲锋号。红7军主力部队的指战员们高呼：“冲呀！”很快冲到了城墙边。

霎时，榕江城内城外，枪声四起，喊杀声、呼叫声响成一片。

此时，李天佑得知，榕江城守敌不是1个团而是两个团的兵力。敌人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进行顽抗。红军虽然士气旺盛，作战勇猛，却没有攻城的器械，弹药也不充足。从上午10时到下午4时，足足攻了6个小时，城池仍没有攻下。

在榕江城外的阵地上，紧紧跟随军领导和军机关行动的特务连战士们，心急如火，早已按捺不住，纷纷要求连长李天佑向军领导请战。

他们喊道：“向李总指挥请战！”“让我们上！”

李天佑虽然内心也很焦急，但表面却显得很平静。他深知李明瑞的脾气，不到关键时刻决不动用特务连。一旦时机到来，他就会亲自率领特务连出击，克敌制胜。这时，张军长和李总指挥正在观察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李天佑静静地站在一旁，不敢上前打扰。他尽管知道特务连战士们求战心切，但也只能要求他们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此时此刻，他本人何尝不想立即向敌人冲去。

城他久攻不下，是继续攻，还是立刻撤？围绕这个问题，红7军领导在阵地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进行讨论。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人认为敌人预有准备，如果继续攻城，不及时撤退，敌援军一到，我军就会蒙受更大损失；另一些人主张继续攻城，认为如撤出战斗，眼下已经消耗的弹药无法补充，今后作战会遇到严重困难，何况还有一二百名伤员无法安排。战情紧急，必须当机立断。总指挥李明瑞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发言。他经过深思，已成竹在胸，坚决主张攻下县城。他沉着坚定地说：“守敌虽然弹药充足，但他们惊恐不安，只能固守待援。敌人主力远在湘黔前线，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的攻城火力和器械虽然不足，但部队斗志旺盛，继续攻城一定可以拿下。”接着，他指着城外的地形说：“榕江城东北面是开阔地带，不宜重点强攻；西南面有水环抱，不宜背水作战；南面为丘陵地，可作屏障，对我军进攻有利。我们只要用少量兵力在东北门佯攻，在南面重点进攻，趁着黄昏强攻猛打，一定能攻破县城！”

张云逸军长听了李总指挥的分析，捻着小胡须频频地点头，表示完全赞同。

于是，会议决定：攻城决心不变，力争在敌援军未到之前，攻下榕江县城。同时果断地调整兵力：第1纵队在南面担任主攻，紧急准备好攻城器械，集中迫击炮火力，对准攻击点；第2纵队在东北门担当佯攻。

李天佑率领军部特务连，跟随军首长和第1纵队进到南面丘陵地，作攻城准备。全连战士重新检查了自己携带的武器弹药，隐蔽待命。

下午5时，红军按照预先号令，向城头连发3发迫击炮弹，作为发起冲锋信号。接着，机枪、步枪、迫击炮一齐向城头开火，主攻部队如同猛虎般跃出掩体，带着云梯、大竹钉等向城墙缺口猛扑过去。敌人的子弹像暴雨一般倾泻过来，形成一道火力墙。

李明瑞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把烟斗放入衣袋里，转身喊道：“特务连跟我来！”

“总指挥，让我上！”李天佑一边拦阻总指挥，一边抢着说。

原来，李天佑根据李明端的指示精神，早已从连里指定了12名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组成了突击队，准备了攻城的竹梯和大竹钉，随时待命出击。李明瑞深知李天佑作战勇猛果敢，于是果断他说：“好！你带领突击队先上，一定要设法突入城内！”

此时，敌人加强了火力封锁。李明瑞命令主攻部队用火药反击，掩护突击队登城。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只见16岁的连长李天佑身轻如燕，跃出掩体，带领12名突击队员，肩扛竹梯，身带大竹钉，奋不顾身地冲破敌人的火力网，抵近城墙边。他们躬着身子，紧贴墙根，往缺口处靠近。有的架竹梯，有的把大竹钉一层一层往墙缝中钉，以此当阶梯往上攀登。

李天佑仰望城头，只见敌人正利用城垛射孔向正在竹梯、竹钉上攀登的战士们射击或投掷手榴弹。子弹在半空呼啸，手榴弹在城根爆炸。李天佑腰上挂着几颗手榴弹，一手紧握驳壳枪，一手抓住竹梯，两脚交替往上攀登。他的头顶上是前面战士的脚，他的脚下面则是往上攀登的战士的头。大家一个紧挨一个，节节往上升。

一级，二级……五级……

李天佑穿的草鞋早在跃出掩体时被乱石绊脱了。他面对城墙，前胸紧靠竹梯，用双手和光脚迅速往上攀登。人们只能看到他的背影。枪弹横飞，硝烟弥漫，爆炸声震耳。留在掩体里的战士们瞪大眼睛，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盼着他们快快登上城头。

十一级，十二级……

李天佑爬在竹梯上，感到浑身发热。初夏的夕阳照在城墙上，热气袭人，眼前一缕强光，妨碍他向城头仰视。身上冒汗，军衣湿透，但他顾不得去擦。他屏住呼吸，鼓足气力，猛力攀登，恨不得一眨眼就能到达城头。他越爬越高，竹梯摇晃不止，仿佛要折断似的，猛地一脚踩了个空，心里为之一惊。他连忙抓紧竹梯，胳膊和脚部顿感发酸发胀。他仰脸向上观望，只看到头顶上战士的脚，看不到高高的城垛。

二十级，二十一……

伴着战友们的喊杀声，他勇气倍增。此时此刻，涌在他心坎中的唯一希望，就是快点占领城头，让红旗在山城上空高高飘扬，让胜利的号角响彻云霄。

当他爬到最后一级竹梯时，仍到达不了城垛，只好放出插在腰间的大竹钉往墙缝里插。他左插一个，右插一个，然后离开云梯，左手抓住一个竹钉，

右脚踩住一个竹钉，奋力向上攀登。前面的战士刚登上城垛，就遭到敌人的反击，有的被敌人用枪托击下城墙，有的在城垛上光荣牺牲。这时，城墙上子弹呼啸，尘土石块飞扬，火药味呛得人难以呼吸。城楼里，敌人的一挺机枪喷射出一串火舌。趁着敌人换弹夹而枪声稍停的瞬间，李天佑从竹钉上来了一个鲤鱼翻身，迅速跃上城垛，用驳壳枪对准城楼里的敌机枪手猛射。敌人的机枪立时成了哑巴。

李明瑞和众多战友们远远地望着，不约而同地高喊：“小连长，好样的！”

突然，敌人一串子弹射来，李天佑感到大腿一阵麻木，裤脚渗出了滴滴鲜血。此刻，他知道自己的大腿负伤了，但强忍着疼痛，迅速趴在城垛间，隐蔽在敌人尸体背后。当他观察到敌人火力点时，一连掷出几颗手榴弹，敌人的火力点又哑巴了。与此同时，后面的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地攀上城头，集中火力回击反扑的敌人，并同敌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战，杀得敌人抱头鼠窜。敌人纷纷退向市区。这时，城门被打开，红军主力部队犹如洪水一般涌入城内。

又经1小时激战，城内守敌全部被歼。

榕江城之战，是红7军成立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共歼敌500多人，俘虏600多人；缴获山炮2门，步枪600多支，子弹10多万发，无线电台1部，骡马500多匹；其他军用品一大批，筹措军饷数万元。

红7军军旗飘扬在榕江城头，与夕阳相辉映，显得格外庄严和鲜艳。指战员们在为胜利而尽情欢呼。

李天佑负伤倒在城头，卫生员迅速赶来包扎，将他背下来，抬上担架。李明瑞总指挥看见抬他的担架从身边走过，立即俯身对李天佑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他和特务连全体官兵在攻城时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精神，并且嘱咐他要好好养伤，争取早日伤愈归队。

李天佑脸色苍白，听到总指挥的热情安慰和鼓励，心里暖融融的。他振起精神，露出微笑说：“请总指挥放心！没关系，只伤了皮肉，没伤骨头，很快会好的！”

打下榕江县城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清晨，一轮红日把山城榕江照耀得分外妖娆。红7军政治部在城中召开庆祝大会，全城数千名男女老幼踊跃参加这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张云逸军长在会上讲话，反复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号召人民群众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打土豪分田地，积极参军参战。会上，还把没收来的反动政府和地主官僚的粮食、衣服、被褥等分给广大贫苦群众。榕江人民群众纷纷称赞红军是“‘乾人’（穷人）的队伍”。

5月4日，红7军告别榕江城，回师右江。几十只大小帆船满载战利品，浩浩荡荡，顺流而下。这时，王家烈亲自率领5个主力团从后面赶来。红7军正沿河南岸行进，敌人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隔河鸣枪，为红7军“送行”。

李天佑随军回师右江后，先后参加了收复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的战斗。不久，军阀战争全面爆发，桂军倾巢而出，企图攻占武汉，与冯玉祥、阎锡山会师中原。此时，进攻右江根据地之敌，纷纷撤离。为适应新形势和迎接新的战斗，红7军进行了3个月的休整和整训。这期间，李天佑一面组织特务连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值勤，一面协助党代表组织全连官兵学习党的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法令。与此同时，还派出干部、战士下乡开展宣传，帮助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参加土改工作。

转战桂湘粤赣

1930年10月，红7军奉命北上，李天佑带领特务连随军部行动。北上途中，部队穿越人地生疏的白区，李天佑先后参加了四把遭遇战和强攻长安镇战斗。10月底，在攻打湖南省武冈县的战斗中，敌人突然增兵8个团，红7军连续攻击5昼夜未果，伤亡惨重。部队被迫撤离时，李天佑奉命指挥1个排顶住了追击的敌人，保证了军首长和军部机关安全转移。

在李立三“左”倾路线的指导下，红7军遭到一连串失利，到1931年1月攻下全州后，部队减员三分之一以上。面对极端困难的处境，李天佑毫无颓丧情绪，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坚信革命一定能成功。

在这紧要的关头，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毅然抛弃“左”倾路线指导者要红7军先打柳州、桂林等大城市，然后再去广东北江建立新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后夺取广州，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定，改为相机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时值严冬，大雪纷飞。在奔袭湖南道县、江华时，李天佑和他的战友们仍穿着单衣、单裤，顶风冒雪，忍饥挨冻，胜利地完成了奔袭任务。在江华，他们没收了反动政府的财产，征用了大商户的布匹、棉花，缝制了御寒的衣被。

1931年2月，红7军进至广东省乳源县梅花一带，与前来围攻的敌4个团激战一天，杀伤敌人1000余人，自己伤1700余人，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一。敌众我寡，为保存实力，红军突出重围，撤离梅花村。

在这次战斗中，连长李天佑和党代表吴西带领特务连，为掩护军首长和机关、部队突围，哪里危险就冲到哪里，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两天后，部队到达乐昌河，正在抢渡，从韶关和乐昌来的敌人同时猛扑过来，把红7军一下截成两段。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率领第55团率先过了河，张云逸军长和第58团的少数连队与军机关人员则未能过河。未过河人员由张云逸率领，在特务连掩护下，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山中暂时隐蔽，后由乐昌地区党的负责人谷子元带路，在坪石东南夜渡武水，进入湘南革命根据地。

1931年3月初，张云逸军长带着红7军临时整编的6个连（仍称第58团），跋山涉水，绕道向江西前进，3月14日，他们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黄泥潭地区，在酃县同前来接应的湘赣红军独立师第3团会师。不久，敌人1个团前来“围剿”。在张云逸指挥下，李天佑率领特务连首先攻占将军山，接着参加了永阳镇战斗。在危难时刻，他率领全连插入敌阵，直抵城下，打退了敌人，使被包围的红军部队得以解围。永阳战斗胜利后，李天佑把缴获的部分战利品分送给配合作战的赤卫队和人民群众，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从此，红7军的威名开始在湘赣革命根据地传扬开来。

4月初，正是春暖花开时节。李明瑞率领的红7军一部到达永新县，同张云逸带领的红7军另一部分实现了会合。此后，李天佑率领特务连随主力参加了永安、宜黄、莲花等战斗，配合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在莲花战斗中，城外一个山头被敌人占领，对红军攻城部队威胁很大。红军多次向山头发动攻击，都未能攻下。这时，李

天佑奉命率领特务连改用佯攻、迂回、强火力掩护等多种手法，一举打垮了敌人，攻占了山头。在莲花激战之后，李天佑率领特务连又参加了收复攸县、安仁、遂川等战斗。7月，李天佑随红7军到达兴国县。稍事休整，又移师干部桥头镇。部队在这里补充了人员和武器弹药，将红7军原来的两个团扩编为第19、20两个师。此后，红7军归属红3军团建制，在军团长彭德怀的指挥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

从1930年10月至1931年7月，红7军在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领导下，转战于桂、黔、粤、湘、赣5省边境，历时10个月，饱经艰辛，行程1.2万里，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终于实现了北上中央革命根据地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李天佑领导军部特务连，从始至终跟随军首长行动，不仅胜利完成了保卫军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的任务，而且带领全连冲锋陷阵，攻城夺地，多次在危急关头掩护兄弟部队摆脱险境。因此，红7军的很多同志都赞誉他是“红7军年轻的小老虎连长”。

打赣州部队受挫

红7军划归红3军团建制后不久，就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李天佑率领特务连先后参加了莲塘、良村、东固、方石岭等战斗。1932年1月，他随军部到信丰、会昌、寻坞农村，参加了肃清民团、筹款筹粮、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和红军等活动。

2月上旬，红7军奉命参加攻打赣州的战斗。

赣州战役是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坚持进行的一次军事行动。他们对红军胜利粉碎蒋介石第三次反“围剿”以后的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革命势力正在急速发展，反革命统治日益崩溃，出现了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景，要求红军不停顿地进攻。以王明为首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9日提出，当前的任务是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并指示中央红军“首取赣州”。

此主张一提出，立即遭到了毛泽东的极力反对。他认为，这是夺取中心城市的李立三冒险路线的重演。红3军团领导对此也不赞同。但是，苏区的中央局坚决执行这一方针。红军于是被迫攻打赣州。

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革军委发出了攻取赣州的训令，并组成主作战军、支作战军和机动部队，分别负责攻城、打援和发展苏区的工作。红3军团和红7军为主作战军，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

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赣州城三面环水，河宽流急；城高墙厚，工事坚固，易守难攻。守敌有金汉鼎第12师马昆旅约3000人，另有反动地主武装、保安团等万余人。

为打赣州，红军各团、营、连普遍进行了战斗动员。当时，广大指战员不知道毛泽东等反对打赣州，也不知道打赣州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大家只有一个心眼，消灭赣州守敌。同志们摩拳擦掌，战斗情绪很高。李天佑利用战前间隙，不顾天寒地冻，带领全连同志加紧练兵。他们练习攀登、爆破、投弹、刺杀等基本技能，并进行巷战演练。大家表示：“上级指到哪里，就坚决打到哪里！”

2月的赣南，朔风阵阵，水寒刺骨。彭德怀军团长率领部队官兵，冒着严寒，日夜兼程，兵临赣州城下。他命令，红3军团主力攻打南门，红7军

负责攻打东门。

红7军领受任务后，把东门外街道两旁的房屋全部打通，在街道中间用沙袋垒起工事，封锁住东城门，以掩护挖坑道爆破城墙的部队。

坑道口选择在街道前的一个土坎后面，距城墙约四五十米。红3军团指挥部还特意派工兵科长来作技术指导，爆破队刚开始挖通道口，就被城楼上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疯狂地向爆破队射击、投弹，向城下投掷汽油火球烧城外房屋。坑道作业面临严重威胁，但爆破队的勇士们不畏艰险，冒着纷飞的弹雨，分组轮流作业，昼夜不停。当坑道快要挖到城墙根时，敌人两架轰炸机轮番在作业点上空盘旋，妄图炸毁坑道。为了保护坑道，保证爆破队作业，李天佑指挥特务连战士向城头上的敌人射击，并朝低空盘旋的敌机开火，以使其不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在特务连和其他连队有力掩护下，爆破队经过十多天苦战，终于挖通了延伸到城墙底层的坑道，并挖好了炸药室。

炸药室挖好后，为了迷惑敌人，保障部队准备了3口棺材，在里面装满炸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它抬进了炸药室。守城敌人还以为是红军死了什么大人物呢。

爆破准备工作就绪后，只听一声令下，爆破队的同志迅速进入坑道，点燃了导火索，然后迅速隐蔽。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顿时，硝烟滚滚，尘土弥漫，火光冲天，城墙被炸开一道几十米宽的缺口。城墙上的敌人随着烟尘腾空而起，有的摔落在屋顶上，有的摔死在马路上。

此时，等待攻城的红7军两个团的官兵，争相向城墙冲去。敌人也以密集的火力封锁突破口，拦阻我进攻部队前进。第55团第6连连长兼指导员莫文骅带头冲锋，负伤倒在城脚下；第56团营教导员陈漫远负了伤，被救出；第56团战士覃应机冲在前头，也负了伤，被倒塌的泥土砖瓦埋了一大一夜，才被战友救出来……

敌人的严密封锁，使红军进攻部队受阻而前进不得。这时，特务连连长李天佑正在军指挥部附近警戒。他耳闻攻城部队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早已按捺不住战斗的激情；但没有接到命令，自己不能盲动。不一会儿，军部传来命令要攻城部队重新组织攻城，并令李天佑组织一支敢死队，准备突击。

领受命令后，李天佑立即集合全连，逐个检查战士的健康情况和武器装备，从中挑出70多名政治觉悟高、身体素质好、有一套过硬作战本领的战士，组成一支敢死队。然后，从军指挥部附近进入东门外街道，从街道旁被打通的房屋穿过，顺利进入前沿阵地。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爆破队再次对城墙实施了爆破。

李天佑两眼紧盯着爆破口，乘着滚滚的浓烟，一跃而起，然后冒着纷纷降落的沙石，敏捷地向城墙缺口冲去。他一边冲，一边大喊：“同志们，跟我来！”

敢死队员们跟着连长向前冲去，被震昏了头的敌人这时才清醒过来。他们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射击，一面组织反击。敌人数量多，武器好。李天佑率领敢死队冲了上去，又被守在城墙上的敌人反击回来。敢死队员死的死，伤的伤，幸存的仍在城头跟敌人肉搏。李天佑向反击的敌人冲去，却遭到背后敌人的射击，右手和背部3处负伤，伤势很重。他从高高的城墙上摔下来，掉在牺牲的战友尸体上昏迷过去。当时，大家以为他牺牲了。他被抬出阵地后，又苏醒过来，马上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

李天佑负伤后，攻城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由于大批敌军赶来增援，第

3 军团指挥部命令部队撤退。

东征首战告捷

1932 年 5 月，李天佑伤愈后归队，被任命为红 7 军第 58 团副团长。不久，他被调到瑞金中央红军学校上干队学习。经过半年训练，军事、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33 年学习结业归队，升任第 58 团团长，随即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黄陂、草台冈等战斗中，他率领全团作战勇猛顽强，表现出色。他指挥的第 58 团，坚决执行了在运动战中伏击敌人的作战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地形和优越的群众条件，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展开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歼灭国民党军 3 个师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5 月，红 3 军团在宁都大湖坪按三三制整编，李天佑被任命为第 5 师第 13 团团长。第 13 团是红 7 军的老底子，大部分战斗骨干都是广西人，被戏称为“猴子兵”，打仗精明，英勇剽悍，行动敏捷，善于爬山越岭，具有较强的战斗力。7 月初，中央军委命令红 3 军团和红 7 军第 19 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指挥部队入闽作战。

此次入闽作战，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作出的决定。他们提出了一个“分离作战”的方针，将中央红军和部分地方武装分成两部分：红 1、红 5 军团在抚河流域牵制敌人，防守中央的北大门；红 3 军团和红 19 师组成东方军，入闽对国民党第 19 路军作战。此方针提出后，一度遭到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人的抵制。他们认为，这是用“两个拳头打人”，分散兵力；与第 19 路军硬拼，对我不利。但是，“左”倾冒险主义者却认为，蒋介石当时与闽军有矛盾，目前不可能联合“围剿”红军，他们将在中央苏区采取守势，不会很快发动进攻。这些人由此得出第 19 路军“对目前形势居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结论，顽固坚持“分离作战”的错误方针。东方军被迫执行东征福建的计划。

东征福建的第一仗，是围攻宁化县的泉上堡。泉上堡，墙高 2.5 丈，厚约 2 丈，守敌是福建地方军阀卢兴邦师第 307 团和周围 4 个县的地主武装，共 4000 余人。泉上堡东面的归化城有敌军 1 个营，对红军攻城部队进行土工作业、实施爆破威胁很大。战斗打响后，李天佑奉师长寻淮洲之命，率领第 13 团勇猛东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攻占了归化城，将守敌 1 个营全部歼灭，为攻克泉上堡扫除了障碍。接着，他又奉命带领全团在朋口东面消灭由连城出援之敌。

在连城驻扎的是国民党第 19 路军的 1 个师部和两个步兵团，装备精良，能攻善守，当年在淞沪抗战中曾赫赫有名。第 13 团的指战员们一听说要打连城，个个精神抖擞，都盼着早点去啃这块硬骨头。

李天佑和毛贲虎政委刚吃完饭，正在商量怎样攻打连城。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李天佑接过耳机一听，是师长寻淮洲的声音。

寻师长在电话中问道：“是李团长吗？”

“是！”

“部队安顿好了吗？”

“安顿好了。”

寻师长接着说：“军团命令你们，明天出发打朋口！”

李天佑大吃一惊：“什么？打朋口？”

“是，打朋口！”寻师长加重语气说。

一听打朋口，李天佑略略沉思了一下。他知道，朋口是位于连城西南80多里的一个小镇，在那里驻有个把团的敌人。为什么不让第13团去打连城，而去打朋口呢？李天佑一时不明白上级的意图。寻师长好像猜中了他的心思，随即解释说：“军团首长的意图是来个调虎离山。我们一打朋口，连城的敌人一定会出来支援。这时候，你们在半路上敲它一下，一口吞掉它，这不是既吃肉又啃了骨头吗？”

“是啊！”经师长一点拨，李天佑心里为之一亮。原来，连城城高墙固，敌人凭险固守，强攻对我军是不利的。于是，军团部决定，把城内敌人引出来，然后再将其吃掉。这是一着高棋。李天佑从心眼里佩服军团长彭德怀的英明，他灵活地运用了毛泽东的作战思想。不但指挥自己的部队，而且还要“指挥”敌人。

李天佑把这一精神向部队传达，号召全团指战员一定要打好入闽第一仗。干部战士们一致表示：“上级要我们调虎离山，是看重我们。决不辜负上级的期望，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连城在东北方，朋口在西南方，二地成犄角之势。当时，第3军团只留独立师在连城佯攻，主力第4师和第5师转到连城西南面打朋口。为了不让敌军察觉红军的意图，李天佑和政委毛贲虎率领第13团在一天内行军百里，迂回到朋口的外围隐蔽待机。

李天佑一边安顿部队休息，一边观察当地地形。他拿起望远镜，仔细察看朋口。只见这个小圩镇的许多灰白色屋顶隐现在茂密的树丛之中，一条浅水河蜿蜒穿过镇子，露出一片片沙滩。河的两岸和镇子周围，遍布有稻草和树木伪装的碉堡和地堡。

突然，从朋口方向传来阵阵枪炮声。一打听，原来是红4师与敌人打响了。李天佑站在路旁的山坡上，连连挥动手臂，高声命令道：“快！向后传，快速跑步前进！”

在急行军的队伍里，战士们一个个往后传达命令：“快！往后传，快速跑步前进！”

第13团的官兵们全部轻装，跑步前进。天很热，大家跑得气喘吁吁，汗如雨下，军衣全湿透了。队伍流星一般地从李天佑身旁闪过，但他仍觉得速度不快，一个劲儿地大声地喊着：“快速前进！”

这时，一个骑兵通信员赶来报告：“李团长，师长命令你们团就地宿营！”

“什么？”李天佑一惊。

“就地宿营！”骑兵通信员又重复了一遍。

“你没有传达错命令吧？”李天佑怀疑地问。

“没有错！师长还说，部队要抓紧时间休息！”通信员斩钉截铁地说。

红13团在朋口以西宿营后，李天佑派人与友邻部队联系，详细了解朋口的情况，以便与他们配合战斗。

使李天佑感到不解的是，既然要我们调虎离山去打朋口，为什么又要我们停下来休息？为什么现在又不打朋口了？正在这时，传来了师首长的指令，要他们于第二天清晨过河，打击从连城赶来朋口增援之敌。

夜色沉沉，烛光摇曳。李天佑、毛贲虎和参谋人员伏在老乡家的八仙桌上看地图。从地图上看，朋口东面有一座大山，居高临下，完全控制了朋口，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他们认为，要打援，必须占领这座山。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部队快速涉过浅水河，准备迎敌。这时侦察连来人报告：“发现敌人！”果然，连城敌人1个团，按照彭德怀军团长的“指挥”，向朋口增援来了。

李天佑命令部队火速抢占山头。

突然，山路上几匹战马飞奔而来，第一个跳下马的竟是军团长彭德怀。

李天佑急速上前敬礼，说：“报告首长，部队正在渡河！”

彭德怀刚毅的脸上，显得严肃而镇静。他点点头，用望远镜察看山头，不吭一声，然后指着山沟中前来增援的敌人和东面的大山，对李天佑说：“你看，敌人马上就会抢占这座山头。我们迟到一步就要占下风！”

李天佑说：“我们一定抢在敌人前面！”

说罢，他告别军团长，同毛政委一起徒步带着部队过河。同时，他派出前卫连，抢占山头；又令第1营营长赵璧率领全营，从右翼抄小路，插到东面大山后面，阻击敌人。赵璧原是军部参谋，办事机智果断，作战十分英勇。他得到命令后，立即带领全营，沿着右侧山坡急速奔去。

李天佑和毛贲虎把团指挥所设在大山前几百米处的山坡上。李天佑举着望远镜，密切关注着抢占山头的前卫连的战士们。只见他们分成多路，沿着山谷和山脊，攀着树枝，扒着岩石，飞快地爬到半山腰。毛政委看着勇猛攀登的战士们，高兴地说：“上去了，前卫连上去了！”李天佑虽然为自己的战士们勇往直前的精神感到欣慰自豪，但心里仍很着急，放心不下。他料想，敌人这时也许正从另一侧的山坡向上爬。兵贵神速，谁首先占领山头，控制制高点，谁就处于主动地位。在这场夺取战机的比赛中，前卫连能不能赶在前头呢？李天佑目不转睛地望着前卫连的战士们。他们向山顶一步步靠近，50米，30米……不到20米了。

“轰！”

从山头松林里突然抛出几颗手榴弹，接着奔出几十名敌兵，握着闪闪发光的刺刀冲了过来。敌人的机枪也吐出了火舌。由于地形对我不利，兵力相差悬殊，敌人火力又猛，前卫排很快退了下来。

“糟了！敌人真狡猾，早已抢占山头，却一声不响地埋伏在山顶！”李天佑自言自语地说。

他紧皱眉头，心想：如果不能迅速吃掉这股敌人，军团首长调虎离山、围城打援的计划就会落空。他转身对毛政委说：“我们一定要毫不迟延地尽快吃掉这股敌人，抢占山头，一定要咬住前来增援的敌人不放！”毛政委点头表示赞同。

李天佑立即命令身边的司号员：“快吹冲锋号！”

前卫连的同志们听到号音，奋不顾身地向山头扑去。

紧接着，李天佑又命令通信参谋通知第2营硬攻，从正面支援前卫连抢占山头；命令作战参谋速到第1营，协助赵璧指挥第1营从背后夹击敌人。毛贲虎政委也要政治机关干部深入现场，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冲啊！把敌人消灭在山顶上！”

阳光映着刀光，战士们用机关枪、迫击炮朝山顶猛打。枪声、炮弹声和厮杀声混成一片，战斗十分激烈。

李天佑、毛贲虎率团指挥所向前移动，紧跟着担任主攻的第2营来到大山的山腰。山顶上的敌人拼命往下压，李天佑严令第2营：“坚决顶住，组织反击！”

这时，李天佑命令担任预备队任务的第3营加入战斗，向山顶反击，支援第2营。

与此同时，赵壁带领的第1营也在敌人后面打响了。

山前山后都是枪声，敌人腹背受击。当敌人犹豫不定时，第2营一个反冲击，冲上了山顶，只见山顶上浓烟滚滚，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人。敌人被迫向山坡溃退。李天佑带着团指挥所人员迅速登上山顶。

李天佑俯视山下，只见敌人连滚带爬，争相向连城方向逃命。溃逃的敌人迎面碰上第1营，又遭到我兄弟部队的阻击。经过激战，敌军1个团除少数逃窜外，绝大部分被歼。据守朋口的敌人，也被另一支红军部队全歼。

第二天，李天佑接师部命令：连城敌人师部和另1个团，弃城向小陶逃去，你们应不失时机乘胜追击。

李天佑、毛贲虎遵照师首长的命令，随即带领部队分两路向小陶方向追击敌人。经过一昼夜行程180里的奔袭追击战斗，国民党第19路军主力第78师除师长和一部分散兵外，大部被我军歼灭。

这是东方军入闽的第一仗，也是红军东征的第一个胜利。

芹山之战立功

朋口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稍事休整，军团部命令第4、5两师主力开赴南平县境的西芹和沙溪口，待机消灭沙县增援南平之敌。

8月下旬，李天佑、毛贲虎按照师的部署，越山过岭，渡过沙溪河，到达西芹。电话刚刚接通，李天佑就接到师长寻淮洲的命令：“沙县敌人已经出动，朝西芹方向来了。军团命令所有部队连夜出发。你们第13团担任前卫，经过芹山，和沿着沙溪河走的4师先头部队平行前进！”

李天佑向毛政委转述了师长的命令，高兴地说：“老毛，你看敌人真听指挥呀，不但从福州调来了援兵，而且沙县的援兵也来了！”

毛政委听他这么一说，也会心地笑了起来。

他们把地图铺在桌上，根据师长通报的敌情和军团部的命令，用红兰铅笔画上标志，仔细研究部队的作战部署。

李天佑和毛贲虎并肩战斗虽然只有三四个月，但在这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团部，团长、政委、参谋长3人共住一间房，吃睡在一起，战斗在一块儿，随时分析、掌握敌情和我情，研究各种情况下的对策。

现在，他们知道，敌人在沙县的驻军是第19路军的1个精锐师，该师装备好，战斗力强，且骄横傲慢，不可一世。来南平增援的就是这个师的部队。因此，他们已有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

他们根据敌我距离、行军速度、敌军特点以及几次与第19路军作战的经验，在认真分析后断定，明天一定会在距西芹30里左右的芹山主峰一带与敌遭遇。然后，毛政委立即向各营教导员打电话，要求深入做好战斗动员，做好打恶仗的准备。李天佑和参谋长则召集各营营长开紧急会议，部署具体作战任务。部队指战员听说要打大仗，个个乐滋滋的。有的开“诸葛亮”会，发扬军事民主，研究地形，探讨战法；有的准备干粮，检查武器弹药；有的演练战场勤务和医务保障工作……

深夜1点钟，第13团指战员怀着必胜的信心，沿着芹山脚下的小山坡出

发了。

天黑得像锅底。山越爬越陡，越爬越高。一会儿有人摔倒了，一会儿又有人滚下了山坡。后面的人瞪大眼睛望着前面同志手臂上裹着的白毛巾标志，一步一步地往前赶。部队艰难地走了4个多小时，还没有爬到主峰附近。这时，天不作美，突然下起暴雨来。指战员们个个成了落汤鸡，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凉风飕飕，道路泥泞，行军速度缓慢，1小时只能走几里路。但是，战斗还没有打响，任务还没有完成，大家心里仍是火辣辣的，不管跌多少跤，仍互相催促着，鼓励着：“快！跟上去！”

拂晓，雨渐渐小了下来。

8时许，第13团的同志们刚爬到芹山主峰的半山腰，突然与敌人遭遇。原来，侦察排遇到一位割草的老乡，了解到前面有八九个戴着钢盔、穿着草绿色军装的人，正沿着小路向山上走来。于是，急忙向团长报告。李天佑心头为之一惊。他想，这可能是敌人1个尖兵班，其主力很快就会上来。两军相遇勇者胜。他当机立断，命令机枪排马上占领前面的山坡，阻挡敌人前进。同时，他从被雨打湿的皮包里取出地图，边看边环顾四周的地形，决定迅速抢占地势最高的大山头——芹山主峰。

他命令：“抢占芹山主峰！”

全团指战员尽管经过一夜行军，十分疲劳，但一听说有敌情，要抢占主峰，谁也不甘心落后。先头连的战士举着战斗红旗，一直跑在最前头。大家紧随其后，向山顶冲去。

前面传来了稀疏的枪声。

李天佑随着第1营前进。这时，只见第1营营长赵壁那矮小的身躯一闪穿过树丛，攀着岩石，随着先头连向山顶跑去。

红旗插上山顶，迎风飘展。雨后天晴，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军旗，显得分外鲜艳夺目。

随后，毛政委跟随第2营也上来了。

先头连刚到达山顶，发现敌人正分成两路向山上爬，距离山顶仅有几十米了。先头连随即开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震撼着山谷。尽管树丛挡住了视线，望不到山顶，但李天佑从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判断，先头连与敌人展开了近战。第1营的另外两个连听到枪声，也急忙抢上了山头。这时，第2营紧贴着第1营的左翼，向敌人背后迂回过去。

李天佑和毛贲虎蹲在山腰的土坡上，发现侧翼有约两个连的敌人，正分两路增援主峰。战斗越来越激烈，硝烟遮住了芹山主峰。毛政委一按膝盖站起来说：“我到前面看看去！”他拨开身边杂草，向主峰奔去。

李天佑以大树作掩护，密切关注着敌我动向。过了约莫半个小时，他看到敌人像潮水般向第1营压过去。第1营抵挡不住，先头连被迫退下来。李天佑明白，只要红军占稳了山头，就可以把敌人压制在山沟里；一旦敌人占稳了山头，就有把红军压下山沟的危险。他正着急，毛政委满头大汗从山上向他跑来，问道：“怎么办？”

李天佑知道，毛政委在战斗中向来坚定勇敢，只是没有直接指挥过战斗，缺乏作战经验。他对毛政委说：“沉着点，没关系。我们一定能坚持！”

他来不及解释，回头望了望身边的通讯员说：“你快下山，速调3营上来！”

通讯员飞一般地跑下去。

李天佑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

嘹亮的号角，激励着指战员们的斗志。

李天佑从身旁折下一个树枝，在土地上比划着向毛政委解释战斗的态势。他用树枝指着敌人的右翼，说第2营正在迂回还没有展开；又用树枝指指山下，说第3营正准备出击。李天佑满有信心地说：“这两个拳头一击出，敌人定会头破血流！”

毛政委点点头，但仍有点担心。敌人是1个精锐团，我军也只是1个团。此时与军团部、师部尚未联系上，兄弟团还远在后面，不能及时支援，第13团孤军对敌，的确不轻松。

李天佑也感到担子确实很重，不禁想起了寻师长、彭军团长。他想，如果他们在跟前，哪怕是指点一下，讲一两句话，自己的担子也会减轻。

冲锋号响彻云霄。李天佑朝主峰望去，只见赵壁营长从山石后面一跃而起，挥枪大喊：“人在阵地在，冲呀！”经他这一喊，原被敌人火力压住的战士们，忽地振奋起来，冲了上去。退下来的先头连，稳住了脚跟，也跟随营主力冲去。李天佑心情十分激动，心想：这个年轻能干的指挥员，不仅能指挥1个营，将来也能指挥1个团，1个师哩！李天佑决定，在战斗结束后给他记功请赏。他正想着，通信员突然匆匆跑来报告：“赵营长牺牲了！”

原来，赵壁刚冲出不远，就遭到敌人射击，腹部中弹，肠子外流，倒在地上。他咬紧牙关，把肠子塞进肚子里，用最后的一点气力，以嘶哑低微的声音指挥部队：“向前进攻，夺回山顶！”

亲密战友的牺牲，点燃了李天佑心中的怒火。他挥动拳头，高声宣布：“副营长代理营长，为赵营长报仇！”

战士们愤怒的呼声，响彻了芹山山谷。

李天佑向山顶走去，边走边喊：“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跟我上！”

李天佑带头冲向主峰，大大鼓舞了部队士气。正在主峰激战的第1营继续压向敌人，第2营从第1营左翼出击，第3营也抢上了山头。全团奋力战斗，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主峰上刺刀寒光闪闪，刀枪的碰击声和喊杀声代替了枪炮声。

尽管敌人是精锐部队，但遇到敢打硬拼的红军指战员，也招架不住，只能节节败退。

李天佑乘机跳上战马，率领第13团官兵紧追过去，一直追出180里，把敌人压到一条山沟里。我军立即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要他们认清形势，缴械投降。开始，敌人怕红军打红了眼会杀他们，不敢投降；后来，看到红军果然不打、不杀俘虏，才一批批放下武器。敌团长见势不妙，急忙带领几个卫士骑马向高砂逃去。李天佑挥动马鞭，带领队伍，跟踪追击，追到高砂，将残敌一网打尽。

就这样，国民党第19路军最精锐、最有战斗力、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第61师第366团，在芹山之战中被红13团全部消灭了。李天佑的第13团创造了红军1个团在运动中歼敌1个主力团的光辉战绩。

在高砂总结会上，师政委乐少华特地来到第13团，代表师党委、师首长祝贺胜利。军团首长也表扬他们芹山之战打得好。在军团召开的表彰会上，特授予李天佑三等红星奖章，授予第13团“英雄模范团”光荣称号和锦旗一面。从来不轻易表扬人的彭德怀司令员，兴高采烈地拉着19岁的团长李天佑坐在自己身旁，指着他的肩膀说：“小鬼，你年龄不大，指挥打仗还真有本

领哩！”

拼消耗红军吃苦果

1933年9月，李天佑随第3军团回师黎川，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率领第13团先后参加了洵口、硝石、团村等战斗。在洵口，李天佑、毛贲虎率领的第13团配合兄弟部队，同敌军打了一个激烈的遭遇战，歼灭蒋介石军队1个师，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序幕战的胜利，也是中央苏区对敌作战的最后一次胜利。

1934年1月，20岁的李天佑荣升红5师师长。他在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的领导下，率领红5师参加了第二次入闽作战中攻克沙县的战斗。这一仗，红军全歼敌人两个团及其师部直属队，并乘胜推进，攻占了龙溪县，缴获了敌人1个兵工厂和大批武器弹药。

4月，李天佑奉命率红5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发动的这次“围剿”，在军事上一改过去长驱直入的战法，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新战略；在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实行诱骗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在经济上对苏区实行更加严密的封锁。他接受前4次“围剿”失败的教训，不让军队轻进，而是以飞机、大炮轰开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占领广昌城，然后用重兵沿广昌和石城向红军腹地推进。

蒋军一进入红色区域，就战战兢兢，好像每寸土地都喷射着仇恨的火焰。他们一面前进，一面构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推进二三里。

这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被洵口一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否定中央苏区红军过去在毛泽东领导和影响下连续粉碎敌人4次“围剿”的成功经验，反对采取诱敌深入、待机而动、在内线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方针，而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全线出击”、“不丧失寸土”的极端错误的方针，采取“分兵把口”和“短促突击”的错误战术原则，实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要求部队死守阵地，跟敌人拼消耗。

中央红军第5军团经与敌人反复激战后，被迫撤出广昌，退到高虎脑、万年亭一线坚守阵地。第3军团第4、5、6师防守头陂以南、石城以北的广大地区。

李天佑率领第5师驻守在第5军团与第4师之间的地区，由第13团负责防卫石城的高虎脑和王土寨一带。这里是敌人从广昌去石城的必经之地。为了保卫红色根据地，红军战士们要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跟敌人进行殊死搏斗。

敌人的飞机不断来袭扰，爆炸声不绝于耳。农民们打着枪，抬着伤兵和粮食，来往如梭。到处都在坚壁清野。人们的眼睛射出仇恨的怒火，恨不得将进犯的敌人一下子消灭干净。

战前，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等曾亲临第5师前沿阵地视察。他们指出，高虎脑地势险要，是构成整个防御地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敌人一定会拼死争夺。同时指出，敌人的困难也不小。苏区人民已坚壁清野，上山打游击。敌人越是深入我们的腹地，就像进入沼泽地里，会越陷越深。如今，我们占据着有利地形，正好打他一个下马威。

当时，各级指挥员最担心的是敌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这次“围剿”调

动大批空军，飞机数量之多前所未见。敌机欺红军没有高射武器，常常飞得很低，滥施轰炸。继飞机扫射轰炸之后，接着实施炮击，掩护步兵进攻。炸弹爆炸声、炮弹呼啸声震耳欲聋，给红军战士、特别是新战士精神上造成威慑。

为了解除部队对敌机的恐惧心理，李天佑与陈阿全政委研究对策，要求政治机关和各级干部积极做稳定部队情绪的工作。李天佑对干部们说：“别看敌人的飞机张牙舞爪，挺吓人的，但是在战场上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人，而不是飞机、大炮。大家想想看，敌机能不能到地面捉俘虏？”

“不能！”干部们回答。

“敌机能不能占领阵地？”

“不能！”

“解决战斗靠什么？”

“归根到底，要靠步兵！”

“对！一方面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要过于担心天上的敌机，另一方面还要教他们掌握防护知识，密切注意地面的敌人。要让他们懂得，真正的威胁是地面上的敌人。只有我们奋勇作战，坚决消灭地面上的敌人，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

为了对付地面上的敌人，李天佑要求部队多层次严密布防，周密地布置火力。最前沿的战壕前，要设拉雷、竹尖、鹿砦、铁丝网；战壕后面，每人要挖一个避弹坑。当敌机轰炸或炮击时，除留少数哨兵监视敌人外，其他人都要进入避弹坑，以避免过多伤亡；当敌人运动到雷区时，要立即拉响地雷。

彭军团长听到第5师井井有条的布置后，满意地说：“好！就照你们说的办！”

根据军团长和师长的指示，各团积极构筑工事。无论是掩体或机枪工事，都做得像碉堡那样结实。工事里储备了清水和炒熟的大米，阵地进行了伪装。工事的四周还挖了深深的外壕和避弹坑，设置了拉雷、鹿砦等。

师指挥所设在离高虎脑不远的万年亭。指挥所的碉堡顶上覆盖了厚厚的木头、石块和泥土。碉堡四周有瞭望孔，可以观察到各个前沿阵地。参谋人员正紧张地作战前准备。

战斗准备工作刚刚就绪的第二天上午，李天佑发现敌人驻地后面的帐篷拆除了，有许多穿着蓝色便服和戴着草帽的人不断向红军阵地窥视，敌机不断在阵地上空低空盘旋。种种迹象表明，敌人的行动即将开始了。下午，第13团阵地上骤然响起了炮弹爆炸声——敌人炮兵在试射。

第13团团长黄珍给师长李天佑来电话说：“敌人惧怕夜战，可能于明天拂晓进攻。我团后半夜4点钟进入阵地。”

“你们判断正确。同意你们的行动方案。”李天佑对黄团长说。

天刚拂晓，10多架敌机向阵地上空飞来，投下一串串炸弹。阵地上掀起冲天的浓烟。之后，对面山上开始炮击，红军前沿阵地霎时变成一片火海，前沿工事很快成为废墟。

黄珍焦急地在工事里走来走去，嘴巴不时地咕嘟着：“部队摆在这里被动挨打，真晦气！”

参谋长卢绍武正在轮流与各营通电话，喊得脸红脖子粗。他不时地拍打电话机，用嘴吹，用手摇，最后叹口气说：“电话线被炸断了！”

政委苏振华连忙钻出工事，向中断联系的第2营走去。

在前沿阵地上，炮弹不停地爆炸，土块、石头纷飞，树木被掀倒。红军工事里一片沉寂，战士们紧贴着炸塌的土壁，手中紧握枪和手榴弹。他们头上、脸上落满了尘土，一双双眼睛怒视着前方。

敌机的轰炸和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后，弹着点开始后移，预示着地面进攻就要开始了。

“进入射击位置！”第13团第2营营长梁纪生命令。

战士们好像从恶梦中惊醒，站起身，拍打着头上和身上的泥上，拿起武器瞄准敌人。

李天佑通过瞭望孔看到：在高虎脑阵地前面，敌人队形密集，估计有两个师的兵力；王土寨前面大约有1个师的兵力。为了夺取高虎脑这个制高点，敌人不惜投入3个师的兵力。在大队伍前面，还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兰衣社队员，他们一个个歪戴草帽，手提“二十响”，摇摇摆摆地向上爬。

此时，红5师第13、15团的前沿阵地，仍是一片沉寂；第14团作为预备队，在师指挥所后面待命。为了节省弹药，战前规定了各种武器射击的距离。现在，不管敌人怎样狂叫，红军战士还是默默地等待着。

敌人以为飞机、大炮将红军炸光了，愈加疯狂起来，嚎叫着，争先往山上攀登。当敌人进入红军射击距离时，红军阵地上立刻沸腾起来、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步枪一齐开火，一发发愤怒的子弹射向敌人。

红军的短兵火力虽很猛烈，但不能完全压制住敌人。敌人尽管死伤不少，但活着的还是一股劲地朝前拥，很快到了鹿砦跟前。冲在最前面的兰衣社队员，冷不防踏上了钉板，脚被竹钉刺穿，痛得哇哇乱叫。嚣张的冲杀声，立即变成了阵阵凄厉的嚎叫声。这时，在高虎脑阵地前面突然升起一团团黑烟，接着就是千百枚手榴弹和地雷的爆炸声。敌人的叫声停息了，许多人随之倒下了。敌人第一次密集风形的冲锋，以丢下无数的尸体而告结束。

然而，敌人并不甘心攻击失利，他们以更猛烈的炮火袭击红军第一线阵地，派一批又一批的飞机向红军阵地俯冲投弹。红军损失增大。第13团团长黄珍向李天佑报告：前沿阵地的第2、3营电话中断，情况不明；作为预备队的第1营，还未加入战斗就伤亡了大半，全营只剩下90多人。他心情沉重而焦躁地说：“团里只剩下这么一点预备队，怎能守到天黑？这样倒霉的阵地防御战，真是害死人！”他请求师长，快调预备队来。

听了黄团长的报告，李天佑同样感到难过。他想：面对强敌进逼，红军在数量和装备、物资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在这种形势下，“左”倾路线的指导者却顽固坚持要打阵地防御战，同敌人拼消耗，简直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更出人意料的是，敌人火力这么猛，手段这么毒！他很理解黄珍的抱怨，却无回天之力，只好用安慰的口吻对黄珍说：“要沉着，镇静！我马上派预备队去！”

他立即给各团打电话，要求他们迅速整理部队，尽量疏散隐蔽，利用敌进攻的间隙，修补工事，稳定部队情绪，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他感叹地说：“这是血的教训啊！”

一个满身烟火的战士，这时突然滚进了第13团指挥所。他是因电话中断而被派来联系的第3营通信班长。他一边喘着大气，一边扑火，说：“报……报告，韦……韦营长（韦在纪）牺牲了……要弹药！”

的确，坚守前沿经过血战的第3营，已是弹尽粮绝了！

李天佑得知后，心情越发沉重。他命令作战参谋迅速组织人力向前沿送

弹药，送水，送饭。同时，要各团密切注视敌人动静。

炮弹袭来，师指挥所棚顶泥土沙沙落下。这时，军团首长来了电话。李天佑接过话筒，听到熟悉的军团长彭德怀的声音，依然是那么坚定、沉着、浑厚。他那洪钟般的声音，令李天佑的心情无比激动。

军团长劈头就说：“你们部队打得顽强，打得好！你知道吗，你们面前的敌人是敌人的精锐部队啊！在你们的铁拳有力打击下，他们碰壁了！”稍缓了一口气，他又用关怀的语调问李天佑：“你们有什么困难吗？要不要支援？”

李天佑沉思了一下说：“困难是有的，我们能克服。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守住阵地！”

这天上午，彭军团长还越过第5师直接给第13团打了3次电话，表扬他们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精神，并组织人员给他们抢运弹药。

在遇到困难的时刻，军团首长这样关心部队，使李天佑十分感动。他从拂晓4时进入师指挥所，不管天上飞机轰炸，地上炮火袭击，始终坚守在指挥岗位上，掌握战况，调整兵力，调拨弹药，一连站立了七八个小时。他脸色苍白，仍不肯坐下来休息；嗓子哑了，还不时地大声命令部队：“抓住时机，组织小部队反冲锋！”“要节约子弹！”“准备拼刺刀！”“弹药不足，准备用石头砸！”

敌人开始发动第三次攻击，在高虎脑、王土寨第5师第13、15团的每一块前沿阵地上，都承受着敌机轰炸、炮火袭击的强大压力。战士们全神贯注，每当敌军冲到工事前，就组织一次反冲击。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就从敌人尸体上取来再打，或同敌人肉搏拼刺刀。在第13团第3营阵地前，敌人1个营死伤大半；在第15团第3营阵地前，敌人冲来1个连，百多人只有20几个逃回。在20里长的红军前沿阵地上，敌人尸骨累累。当然，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这次血战，前后持续了两个小时。

中午时分，骄阳似火，战场稍稍安静了一些。师指挥所里，满身泥土的炊事员挑着伙食担子钻了进来。只见饭桶的盖布被撕破了，染着血迹；汤桶被穿了个窟窿，汤只剩下一半。政委陈阿全看到伙食担子，高兴地说：“炊事班同志不简单！大家都来吃吧！”李天佑因长期患疟疾，胃口不好，加之挂念着前沿部队，只吃了几口红米饭。他对政委说：“你留在这里，我到前面看看！”

他与警卫员伏着身子，沿着堑壕来到第13团指挥所，见到了团长黄珍、政委苏振华、参谋长卢绍武，听取了他们关于战斗情况的汇报。苏政委随手交给李天佑一张被揉皱了的纸，上面染着几块鲜红的血迹，墨水有些已被汗水浸透，但仍可以辨认出那匆忙写出的字迹：“团首长：我们3营有信心坚守阵地。只要补充些弹药，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跨过高虎脑一步！1营你们好自掌握，可以不要派来。”

为了送这封信，第3营通信班牺牲了3个同志。原来团里打算派预备队第1营支援第3营；第3营为顾全整体安危，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要团里派援兵。几天来，第3营已先后牺牲了两位营长，信是第三位营长写的。

看了这封钢铁誓言般的短信，团领导深受感动，李天佑更是激动得连手指也止不住地微微发抖。

随后，李天佑来到前沿阵地。他发现，半数以上的工事已被敌人摧毁，

连用木头和石块砌成的3米厚的顶盖也被炸塌了，有些战士被压死或压伤在工事里，没有倒塌的工事也是东倒西歪。战士们正在利用战斗间隙，争分夺秒地加紧修补工事。他们又渴又饿，急需吃的、喝的。李天佑决心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不间断地给前线送水，送饭，送弹药。

突然，几发炮弹在附近爆炸。指战员们立即停止修补工事，端起武器，准备战斗。

李天佑正在观察前沿，警卫员不容分说推着他就走，并连声叫道：“危险！”他们时而卧倒，时而贴着交通壕走，越过一个弹坑又一个弹坑。李天佑边走边向部队交代如何隐蔽自己进行战斗。突然，一发炮弹飞来，弹片炸伤了他的左手腕。这是他第五次在战场负伤了。警卫员大吃一惊：“师长，你负伤了！”

李天佑摇摇头：“轻伤，不要紧！”

警卫员边给他包扎边说：“什么不要紧，再偏一点就崩到脑袋了！”

李天佑一回到师指挥所，就与师政委陈阿全一起指挥全师部队进行反击，打退了敌人第9次冲锋，保住了阵地。

这次战斗，敌人开始是以几个营进行集团冲锋，尔后发展为几个团的集团冲锋。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指战员很多人的头发、眉毛被烧焦了，个个满脸污垢，衣衫褴褛。战斗了一天，他们没有吃上一口饭，没有喝上一口水，面色疲劳而憔悴；但他们不叫苦，不怕死，像钉子一样守在阵地上。

夜幕降临，战场上静寂下来。李天佑不顾疲劳和伤痛，询问各团情况，反复叮嘱部队不能松懈麻痹。他说：“明天战斗将会更激烈，更残酷，必须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资准备！”

为了克服枪支、弹药的不足，李天佑指示部队利用夜暗到敌人尸体中去搜集。

果不出所料，敌人第二天的进攻更加猖狂。在飞机和强大炮火掩护下，兰衣社队员和整营整团的敌人气势汹汹地朝红军阵地扑来。敌人前有红军阻击，后有敌军官的强行威逼，既退不得也进不得，只得用尸体筑成工事作掩护，推着死人往前冲。

红5师第15团团长白志文和第3营营长杨如华带领第3营战斗了一天，到下午6时全营只剩下100多人；而敌人的3个师仍在不停地进攻。

李天佑从师指挥所观察发现，在第15团前沿阵地上，敌进攻兵力强大，火力充足；而我方兵力单薄，火力稀疏。他立即给团长白志文打电话，命令他迅速组织队伍撤退。

精疲力竭的白团长用布满血丝的眼望了望阵地前蜂拥而来的敌人，声音嘶哑地说：“我们撤不出来了！”

李天佑大喊：“你放心，我已派部队掩护你们！”

白志文刚放下电话，就看到第14团第6连已赶到第15团第3营的阵地，并立即投入了战斗。原来，李天佑在作战指挥上，不论怎样艰苦，牺牲多么惨重，都保证手里有足够的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把预备队拿出去的。现在，第13、15团全线告急，他才肯把第14团投入战斗，以挽救危局。

白志文团长率领剩下的人员从阵地上撤下来，他自己则顺着架电话线的一条路摸到万年亭的师指挥所。他望着20岁的师长李天佑，心想：如不是师

长及时派出援兵，此时自己也许不在人世了！他禁不住眼含热泪，无比激动地抬起颤动的右手，向师领导敬了一个军礼，同时喊了声“报告”，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李天佑看他两眼充满血丝，蓬头垢发，衣服破烂，疲惫不堪，便立即给他倒了一杯开水，关切地说：“你们辛苦了！喝口水，休息一下！”

白志文接过水杯，一口气喝了个精光，便伏在弹药箱上睡着

战斗连续打了3天4夜，李天佑几乎没有合过眼。这时，他的最大愿望是能安稳地睡几个小时觉。

夜里，敌人后撤了。月亮从东方升起，发出幽灵般的蓝光。李天佑和几位师、团干部沿着绵延的阵地巡视。但见敌人尸横遍野，密得甚至难于插足。在我方阵地上，许多来不及掩埋的烈士尸体仍保持着战斗时的各种姿态：有的正用力向前冲杀；有的握着手榴弹准备投掷；有的跟敌人扭打在一起，双手还紧紧掐着敌人的脖子。他们牺牲了，但他们的容貌、声音、业绩却永远留在活着的战友们心中。李天佑凝视着这些为了革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的遗体，不胜悲痛。对反动派仇恨的烈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他决心为阶级兄弟报仇，为完成烈士的遗愿而战斗到底。

高虎脑之战，中央红军共杀伤敌人五六千人。红军撤出阵地后，敌人离石城只有40多里，但一个多月仍不敢进攻石城。由于当时中央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红军损失也很惨重。高虎脑战斗后，红3军团第5师又接连打了数次防御战。该师到瑞金集结时，有的营只剩下十几个人。师政委陈阿全在万年亭防御战中光荣牺牲。其他兄弟部队也遭重创。红军力量受到很大削弱，最后只好匆匆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

鏖战湘江畔

铁流滚滚，人马浩荡。李天佑随着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迎接新的血与火的搏斗。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相继占领了中央苏区的大片土地，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退出了江西省兴国县。10月6日傍晚，中央机关、中央红军仓促启程，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李天佑师长、钟赤兵政委率红5师担任红3军团前卫，从车头出发，渡过于都河，经新陂、牛岭，袭占古陂，负责掩护军团主力突破敌第一道封锁线。中央红军8万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上缓缓行进，拥挤不堪，走又走不快，停又停不得，吃不饱，睡不好，非常疲劳。敌人走的却是大路，速度很快。因此，红军怎么也摆脱不掉敌人的追击。

李天佑率部参加了围攻湖南汝城守敌的战斗，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初，他又率红5师攻占良田、宜章，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急调何键、薛岳、白崇禧等26个师共30万兵力，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兵三路，前堵后追，沿湘江两岸构筑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利用天然屏障一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广西全县以南和湘江以东地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只知命令红军硬攻硬打，使用主力两侧掩护，以便夺路突围。他们要求各部队采取“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

11月25日，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从湖南进入广西。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虽然有些减员，但建制和序列仍是完整的。除中央机关编成第1、第2纵队外，还有第1、3、5、8、9共5个军团。第1、3军团担负两翼掩护。李天佑师长和钟赤兵政委率领第3军团第5师在中央机关纵队左翼担任掩护

任务。

11月27日，右翼第1军团前锋第2师占领了从屏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由于湘军先我到达，红军遂在桂林至黄沙河公路之上脚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左翼第3军团前锋第4师也前出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县城的桂军。同日，第5师行至文市附近，经过半小时休息之后，正在夜行军向湘江岸边前进。突然，译电员飞奔过来，递给李天佑一份电报。电报是军团部发来的，内容是命令第5师的第14、15两团（第13团已调归军团直接指挥）立即行动，赶赴灌阳、新圩，阻击桂军，保证整个红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纵队抢渡湘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

李天佑将电文交给钟政委看，钟政委嘘了一口气说：“任务实在艰巨啊！”

夜色朦胧，部队匆匆往西，向湘江岸边急行军。

李天佑、钟赤兵和参谋长胡浚、政治部主任唐天际跳下马来，就在队伍行军路边打开地图，借着手电的亮光，找到了师的阻击位置新圩。此时，师的行动方向必须由西改向西南。但是，第5师的先头部队已经走出很远，通信联络困难。时间紧迫，如果要部队停下来再下达命令，再层层进行开会、动员，必将延误战机。如果派通信兵骑马赶住先头部队传达命令，因道路狭窄，部队拥挤，也不容易通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为了迅速传达命令，该怎么办？李天佑急中生智。他想，先头部队可能已到达新圩，正在向湘江渡口前进，于是满怀信心地说：“有办法！”

他迅速叫住夜行军队伍中最后一个连队的最后一名战士，要他往前传达他的命令：“快往前传！师长命令：部队原地停止，就地构筑工事！”

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向前传达师长的命令，很快传给了前卫团团长白志文。白团长接到命令，正好已走出新圩十二三里路。他连夜带3个营长上山看地形，同时命令各连派人到老乡那里借镐、锹等构筑工事的工具。不一会儿，李天佑、钟赤兵、胡浚3人骑马奔驰而来。李天佑一见白志文就说：“我们比敌人先到这里，明天一早就要打仗了。你们今晚连夜构筑工事，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你们团3个营要布置好，马路以左归你们，马路以右属第14团防地。我的位置在第14团指挥所附近。”

白志文看着这位精明强干的20岁的师长，感到由衷地钦佩。他想：如果是下达书面命令，就会耽误很多时间，甚至延误大事；而师长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口头传达命令的办法，很快就把兵力、任务布置妥了。

李天佑急匆匆地向白志文团长交代完任务之后，又迅速转到第14团阵地。这时，第14团也已接到口头命令，在公路右侧修筑工事。

第14团团长黄冕昌原是李天佑的老战友、老上级。他与李天佑都是参加百色起义的老战士。当李天佑身为军部特务连连长登上赣州城头的时候，黄冕昌已是红7军第55团团长，并担任攻城前线指挥。现在，李天佑虽然是黄冕昌的直接上级，但对黄团长仍然十分尊重，像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遇事同他商量。他对黄团长说：“军团要我们师在新圩前面阻击从恭城前来的桂军，你们团的任务是防守公路右侧。不知有什么困难没有？”

黄冕昌的回答很干脆：“没有困难，坚决执行命令，保卫党中央！”

28日凌晨，天色微明。桂北初冬的早晨，寒气袭人。李天佑、钟赤兵、胡浚、白志文、黄冕昌来到阵地前沿观察敌情。此时，唐天际等政工干部正向部队传达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命令，要求全体红军官兵发扬顽强的战斗精

神，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5师的前沿阵地背靠新圩，距新圩十二三里。新圩则距湘江七八十里。一条通往灌阳的公路经过第5师阵地前面，这是敌人进逼江岸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丘陵背后则是一片平川。这种地形表明，除了这些丘陵可以利用之外，其背后就无险可守了。

初冬季节，公路两侧稻田的庄稼已经收割，但树叶还未脱落。丘陵上的松树和一簇簇的灌木丛，成为部队的天然隐蔽物。第14、15团的战士们，在公路两侧的山丘上连夜匆匆地挖了很多简易工事，正在紧张地进行修整。归属李天佑指挥的军委“红星”炮兵营，也已占领阵地。师指挥所设在高前沿二三里路的杨柳井村。这个村面临公路，背靠青山，绿荫深处散落着星星点点的民房。

李天佑、钟赤兵、胡浚巡视完阵地后，来到师指挥所。他们一分钟也不耽搁，马上围在桌子旁看地图，看命令，打电话，发电报，并不时派通信兵去传达各项指令。李天佑觉得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但又觉得都没有安排好，好像缺点什么似的。他什么话也没有说，慢慢地抬起头，用一种忧郁、严肃的目光看看门外，等待着前沿阵地的消息。这时，侦察员匆匆跑进师指挥所报告说，敌人是广西军队第7军的两个师另1个团，由夏威率领，已高这里不远了。

李天佑不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李天佑知道，桂系第7军是李宗仁、白崇禧的王牌军。李明瑞北伐时曾任该军师长和副军长，在湖北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时曾跟叶挺独立团并肩作战，打出了声威。李天佑心想，敌人是精锐的桂系第7军，而红5师以两个团来对付敌人的两个师另1个团的进攻，敌我兵力悬殊。红5师在高虎脑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之后，虽然在中央苏区得到补充，但经过最近一个多月的长途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减员很大，且很疲劳。特别是这里背靠新圩，又没有坚固工事作依托。在这样的情况下，估计坚持两三天有把握，4天以上就有困难。但是，部队的情绪还是高昂的，值得信赖的。

钟赤兵政委听了李天佑对敌情、战情、地形和任务的分析，赞同地点点头说：“任务是艰巨而又光荣的。为了保障党中央和兄弟部队的安全，相信指战员们是会创造出奇迹来的！”

参谋长胡浚正对着地图出神，听了李师长的分析和钟政委的坚定态度，使劲把拳头往桌上一砸，斩钉截铁地说：“让他们来吧，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就不让他们到新圩！”

钟政委、胡参谋长的决心和信心，有力地感染了李天佑。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发了一个字句铮铮的电报：“保证完成任务！”

28日，战斗打响了。第一天仗就打得十分激烈。敌机不停地在阵地前沿盘旋，扫射，投弹。从长征一开始，敌人的飞机就尾随而来，沿途捣乱。部队走上几里路，敌机就来转上一圈，丢几颗炸弹，扫射一阵，或者撒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不准生火做饭，饿了啃上几口红薯或吃上几粒生米，渴了就从水田里、河沟里舀几杯水喝。眼前，敌机又在师指挥所上空和前沿阵地扫射和投弹，给红军部队造成伤亡；敌步兵则在猛烈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向红军前沿阵地猛扑过来。

李天佑走出师指挥所，冒着硝烟站在山头上向前沿阵地瞭望。这里离前沿不过3里路，在望远镜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的排炮向红军前沿猛

轰，卧在临时工事里的战士们全被烟尘遮住。敌人无遮挡地向红军阵地冲击，越走越近。红军前沿阵地鸦雀无声。当敌人离红军只有几十米时，阵地上突然腾起一阵烟尘，成排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战士们从掩体中钻出来，追着溃退的敌人射击。“红星”炮兵营的炮弹也在敌群中爆炸开来。敌人的冲击垮下去了。这种情景，使李天佑想起不久前进行的高虎脑战斗，其激烈的场面是如此相似。从敌人的溃退情况看，红军杀伤敌人不少。但是，红军匆匆修筑的简易工事也抵挡不住敌人炮火的轰击，红军同样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这一天，也就是敌人向红5师发起进攻的第一天，蒋介石严令桂、湘两军，按照预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江的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红军未过江的部队实施堵击。但是由于蒋桂矛盾，桂军既不愿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要防止蒋军入桂，于是对红军采取“只能追击，不能堵击”的方针。因此，红军此时的处境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有利的一面是：红1、3军团前卫已占领从界首到屏山渡30千米湘江的所有渡口和徒涉点，中央红军已到达文市、桂岩一带，前距湘江最近的渡河点只有55千米。红军只要加速行军，就可以摆脱桂军的纠缠。不利的一面是：部队拉得很长，前锋已到湘江，而后卫尚未进入广西，前后相距达100千米。更糟的是，中央纵队非常庞大，约有3万人的机关人员，还要派专门部队掩护。结果，所有战斗部队都几乎成了掩护部队。另外，辎重压力很大，部队抬着从中央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行动异常迟缓，按常规行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以致担任两翼掩护的第1、3军团不得不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29日拂晓起，红5师阵地的战斗更趋激烈。敌人加大了兵力和火力，轮番实施进攻，并以小部队迂回，向第14、15团侧背进攻。情况越来越危急，前沿几个小山头相继失守。李天佑明白，这不是因为红军战士不勇敢，而是守卫在山头上的红军战士已经全部伤亡。只见一批批伤员被人抬着他身旁经过。令人感动的是，新圩附近龙桥村的20多位贫苦农民，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送饭送水，还从阵地前沿抢救伤员，然后送往安全地带。

在阵阵激烈的枪炮声中，在浓浓的烈火硝烟中，前线不断传来伤亡重大的消息。这消息一阵急似一阵，敲打着师指挥所每个指挥员的心。

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第14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伤。不一会儿，第15团参谋长何德全来电话：团长白志文、政治委员罗元发负伤，3个营长有两个阵亡，全团伤亡500多人。李天佑的心里如灌了铅，无比沉重。以他多年的战斗经历，他清楚地知道，团营指挥员有这么多伤亡，部队战士的伤亡之大更可想而知。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1个团伤亡五六百人，说明红军付出的代价相当之大。尽管如此，他仍从电话中中断断续续地听到前线指挥员坚定的誓言：“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誓死保卫中央纵队顺利渡过湘江！”他知道，部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地坚持着。他在焦急地自问：中央纵队何时渡江？部队是打还是撤？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中央纵队的情况：“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

几乎每份电报都要求李天佑“继续坚持”。

李天佑深深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他知道，稍有不慎，让敌人进到新圩，后果就不堪设想。但是，他也感到红军的后方机关实在太庞大了。从第五次反“围剿”防御战惨败后，红军仓促转入长征，因中央机关队伍庞大，

致使部队行动迟缓，有些本来能够摆脱的困境也摆脱不了，不但不能主动歼敌，还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来掩护中央机关。他暗自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因为那里慢上一步，就意味着红军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战火纷飞，在第5师坚守的阵地上，每座山头都在战火中颤栗，每片土地都留下斑斑血迹。战斗越来越激烈，战况越来越危急。前线指战员伤亡惨重，第15团几乎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李天佑感到每分每秒都难以熬过。他和钟政委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意见，便步履沉重地走到参谋长胡浚身边，说明当前部队处境险恶，要他立即赶赴第15团组织指挥战斗。他望着胡浚年轻、英俊、坚毅的脸庞，目光凝滞，神色严峻，以无比信赖的语调轻轻地叮嘱说：“要坚决顶住。在黄昏以前，一个阵地也不能丢！”

胡浚早已知道前线危急的战况。他的两道浓眉紧锁，两眼炯炯发亮。他挺直胸脯，扎紧腰带，按住腰间的驳壳枪，严肃地答道：“是！”然后拔腿就走。李天佑急忙走上前，紧紧地握了一下胡浚的手。千言万语，满腔激情，无私的战斗友谊，共同的革命理想，殷殷的期待和希望，都凝聚在这紧紧的一握之间。李天佑默默地送胡浚走出师指挥所的掩体，望着他矫健的身影冒着敌人的炮火消失在硝烟里。

拂晓时，红14团的阵地也被敌人打得稀巴烂。第一道工事连影子也没有了，山上的松树只剩下烟熏火燎的残枝断干。从早晨到中午，在团政委负伤后，只有团长黄冕昌在那里坚持指挥。他们连续打垮了敌人十多次进攻，但自己的伤亡也越来越大。不久，第二道防御工事又被敌人的炮火摧垮了。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李天佑抓起电话找黄冕昌团长，要他尽快收缩一下兵力，并把团指挥所移到师指挥所来。这时，敌人的机枪、炮火已经打到师指挥所旁边。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师指挥所。他身穿褪了色的灰军装，脚上一双草鞋，腰间挎着手枪和搪瓷缸子。他那黝黑、消瘦的脸庞，显示出军事指挥员特有的既劳累又易被人察党的坚毅神色。他来师指挥所，原想得到师预备队的支援，但从师部的紧张情况来看，从前沿团、营报来的伤亡数字来看，从上级要求的艰巨任务来看，他感到无法开口。他对师长李天佑的困境表示谅解。他知道，李天佑一贯是很重视掌握预备队的，现在两个团的兵力全部放在前沿，师指挥所也贴近前沿，的确是再也没有机动兵力了。黄冕昌不忍心打扰正在忙碌的师长，一句话也不说，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出，转身又回到了前沿阵地。

第14团黄团长刚到师指挥所，第15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浚牺牲了。他是在指挥部队反击敌人时壮烈牺牲的。

李天佑眼眶湿润，手握着电话机愣了好大一会儿，好久没有吭声。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刚刚还握过胡浚的手，刚刚才送他离开师指挥所。他虽然知道胡浚此次去前沿十分危险，也知道今后相逢不易再见难，但绝没有想到这一握别竟成了生死离别。胡浚到第5师虽然不久，但与李天佑相识已很久了。在瑞金红军学校学习期间，他们就在一起。他年轻、聪明、勇敢，指挥上也有一套办法。久经沙场的李天佑想起胡浚的音容笑貌，想起痛失这位精明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心口阵阵作痛。

李天佑强压着内心的悲痛，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钟政委，也告诉了黄团长。3个人同时缓缓地脱下军帽，朝着胡浚牺牲的阵地方向默默地表示哀悼。李天佑永远忘不了胡浚在战斗前夜用拳头砸桌子时说的一句话：“只要

我们还有一个人，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圩！”

黄冕昌团长默默地离开师指挥所后，师指挥所也开始转移位置。

黄团长没有直接回到团指挥所，而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径直来到了前沿阵地。

他看到连指导员何诚，第一句话就关切地问：“同志们现在怎么样啦？情况紧急吗？”

“全连还剩下 60 多个人，其中还有 10 多个彩号；但大家的情绪很高，都有决心守住阵地。”何诚简要地报告。

黄冕昌扫视了一下阵地，略微考虑了一会儿，严肃地说：“我们背后就是湘江。现在离黄昏还有 5 个小时，中央纵队能不能顺利渡过湘江，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守住最后一道工事！”

“我们一定要坚决顶住！”何诚声音洪亮地回答。

连队调整部署完毕，通信员拿来一袋炒米给团长、指导员吃。他们已有两天没有吃饭了，但却舍不得吃，让通信员送给战士们吃。战士们也推来推去，谁也不肯吃。通信员只好把米袋往地上一放说：“指导员，你处理吧！”最后，指导员只好把米分开，让每个人都能吃上一口。

刚吃完炒米，1000 多敌人又逼近了阵地前沿。在黄冕昌团长的组织指挥下，由连长亲自带领两个机枪班向敌人侧后迂回过去，指导员带领其余几十名战士一声不响地埋伏在工事里。当敌人距离工事二三十米时，红军战士甩出了一颗颗手榴弹，轻重机枪也一齐怒吼。顷刻间，敌人一个个滚下了山坡。连长带领的两个机枪班，又突然从敌人背后一阵猛扫。敌人再次被击退。红军除有几个战士牺牲外，连长也在战斗中阵亡。

团长黄冕昌从重机枪掩体中走出来，要指导员组织战士从死伤的敌人手中捡取枪支、弹药，补充自己，准备再战。他自己则到最前面的工事里去看望战士。不料，他刚走到轻机枪阵地，就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腿部。战士们替他包扎后，说这里不安全，请他马上回团指挥所去。他却说：“不，不要紧。我在这里更便于指挥！”

这时黄团长判断：敌人从正面冲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左侧有友邻第 15 团的火力支援；唯有右侧，因把一些自动火器调去加强中间地带，这里火力较弱，可能成为敌人的攻击重点。于是，他命令部队迅速把大部分轻武器调到右侧，左侧只留一个排长带两个班坚守。

果然不出黄团长所料，5 时左右，敌军 2000 多人蜂拥着从右侧冲了过来。敌人刚翻过一个小山坡，立刻遭到红军密集的火力封锁，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敌人也非常狡猾，当发现左侧阵地兵力薄弱后，便另派一股兵力从左侧冲了上来。黄团长立即命令指导员何诚带领部队反冲锋，并用火力支援左侧。排长钟彬也带领左侧的战士发起反击。敌人的进攻再一次被打垮。

但是，团长黄冕昌却在阵地前牺牲了。

团长躺在血泊里，战士们围上去呼唤他，禁不住失声痛哭。

他们怒不可遏，一面组织人运走团长的遗体，一面端起刺刀，冲进敌群，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李天佑刚听到师参谋长胡浚牺牲的消息，接着又听到黄冕昌团长牺牲的报告，犹如五雷轰顶，禁不住泪水直流。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前，他参加过多少次战斗，只有流血，而不会流泪。但是，这一回，李天佑怎么也禁不住泪水流淌。

红5师抗击敌人整整两天，中央纵队还没有全部渡过湘江。眼前，团、营、连的指挥员剩得屈指可数，成百上千负伤的指战员满身血迹，不断地从李天佑身边抬下去。但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一支铁军，是打不散、攻不垮的，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立即顶上来。

11月30日晨，也就是新圩之战的第三天早晨，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天空飘着几片浮云。一连几天的晴朗天气，给敌人飞机以极好的机会。从早到晚，几十架敌机得意洋洋地在红军前沿阵地和湘江上空盘旋，轮番轰炸、扫射。这时，中央纵队才全部从东山里走到湘江边。那些在浮桥上行进或在江水中涉渡的红军战士，遭敌机轰炸而无力自卫，不少人倒在江水里，尸体漂浮在江面上。湘江宽阔而碧绿的江水，今天却被红军的鲜血染红，惨不忍睹。

几经折腾，几经磨难，中央纵队终于从界首渡过了湘江。

担任掩护任务的红军英雄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敌人如狼似虎的进攻，谱写了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红5师在新圩的阵地，经过无数次的恶战，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占绝对优势的凶残敌人，被阻在这小小的山丘面前，不能前进。

下午4点多钟，李天佑接到军团部的电报：30日晨，中央第1纵队已渡过湘江，第2纵队即将渡江。军团命令李天佑把防务交给第6师，率第5师迅速渡江。

李天佑把来电仔细地看了两遍，轻轻地吐了一口气，紧紧地握住钟赤兵政委的手说：“中央纵队总算安全地渡过江去了。上级赋予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他们当即召开紧急碰头会议，布置向第6师交防事宜，并安排撤离和渡江工作。

经3天两夜的激战，第5师上自师参谋长，下至团、营、连干部，几乎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名官兵，损失达2000多人。他们以劣势的兵力和装备，挡住了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逐个山头地争夺，逐个山头地死守，充分表现了红军气壮山河、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是夜，第5师官兵以急行军从新圩撤到渠口。天气晴朗，满天星斗。这一段江面宽约百米，水流湍急，浪花在星光下熠熠发光。第5师在兴安县的界首镇踩着用油桶和木板搭成的浮桥过了湘江，随即前往界首附近的桂黄公路阻击敌人。

12月1日1时30分，军委下达紧急作战命令，要求后续部队务必于2日早晨通过湘江。同日凌晨3时半，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联合给第1、3军团下达命令，要求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到各连进行战斗鼓动。电报指出：

“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12月1日晚，红军部队除少数被打散、被切断外，其余均过了湘江。历时9天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

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万多人；这一仗下来，只剩下3万余人。仅从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4天中，红军就损失近两万人。后卫第5军团第34师被围，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敌人的强大和残忍，给红军以巨大的杀伤；而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指导，也给红军作战造成极大的被动和灾难。这一仗，红军几万人马的损失，成了令人痛心的千古悲剧。

湘江之滨，北风呼啸，寒冷刺骨。万千烈士捐躯沙场，血流成河，墓满青山。一年又一年，多少岁月，在白色恐怖下，乡亲们仍悄悄地为红军烈士立碑，扫墓，进行凭吊。

湘江之水，日夜奔流不息，高唱着悲壮的战歌，永远悼念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正是他们用血肉筑成的长城，挡住了优势敌人兵力的围歼堵追，掩护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

李天佑率领的红 5 师，经过湘江战役血的洗礼，继续以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踏向新的艰难征途。

从井冈山到长征中的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

乔希章

李聚奎（1904～199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4年12月31日生于湖南省安化（今涟源）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9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后在唐生智部任士兵、班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7月，李聚奎参加了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起义，任班长、排长。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红军第5军任中队长、大队长。1930年调任红3军大队长，后在红9师任团长。1931年任红8师师长。1933年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8月调任红四方面军第31军参谋长，后任第9军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李聚奎任第129师第386旅参谋长。1938年春，任第129师青年纵队政治委员，后任鲁西北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1年春，调任决死第1纵队副司令员。1942年决死第1纵队改称第1旅，他任旅长兼第1军分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1946年12月，李聚奎被调赴东北。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他任参谋长。1948年4月，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天津解放后，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2部长，后任四野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李聚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负责筹措抗美援朝物资，有力地保障了志愿军前线作战。1952年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55年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李聚奎被周恩来总理选中，出任石油工业部长。1958年2月，回军队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1966年4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1977年12月，任重建后的后勤学院政治委员。1981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李聚奎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 * * *

由平江起义到井冈山

李聚奎上将是一位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平江起义的老红军，是由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大队长（营长）、团长、师长逐级成长起来的。平江起义前，他在国民革命军担任班长，是在彭德怀任团长的第1团第3营第9连里，因此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

起义成功后，起义军改编成立红5军，李聚奎所在的第3营改编为第7团，他被推选为排长。在反动军队向起义军进行疯狂反扑之时，在残酷的武装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湘鄂赣3省“会剿”时，敌军先后集中10多个师的兵力，会同江西、湖北的反动军队，步步为营，多次向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的红军进行堵截“围剿”。战争非常残酷。红5军每天都与敌人血战数次，最多时一日恶战8次。在与敌人进行血肉拼搏的激战中，李聚奎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作战指挥能力大大提高，遂毅然跟随彭德怀走上井冈山。一天，彭德怀来到李聚奎所在的第9连，对士兵进行政治动员说：“我们举旗起义是为了革命。干革命不能怕吃苦，不能怕流血牺牲。如果谁想走，可以走。但就我个人来说，我认定的道路就一定要走到底，就是剩下我彭德怀一个人，也要举青红旗，爬山越岭于下去。”

彭德怀在第9连的讲话，更坚定了李聚奎的革命胜利信心。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红5军将原来的3个团编为5个大队，李聚奎在贺国中的第3大队担任中队长。

红5军上井冈山之前，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原红5军与地方游击队混编为5个纵队，每个纵队约400人。李聚奎改在第9大队当中队长。他带领中队，跟随红5军主力，昼夜兼程向井冈山前进。上井冈山的道路，崎岖艰难。部队行军作战1个月，经过了平江、修水、万载、萍乡等六七个县，翻越了幕阜、九岭、武功等崇山峻岭，跨过了修水、锦江、袁水等激流。李聚奎指挥的红军中队，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参加了击退比红军多20倍的敌军的围追堵截作战。他回忆说：当时情况复杂，道路艰险，几乎三天两头与敌人作战。但是，红军部队士气高昂，进军途中势如破竹，军威大震。部队在渣津消灭了敌军朱培德的1个整营；途经万载城时，又消灭了驻该城的地主武装数百人，缴获甚多。为了多带一些生活必需品，部队把缴获来的布匹发给每人一卷，大家像少数民族包头巾一样将布缠在头上，带上井冈山。

在守卫井冈山的激战中磨炼

1928年12月11日，红5军部队穿过敌人层层封锁，从永新三湾来到新城，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4军主力会师。在井冈山上，两军官兵和数万群众一片欢腾。第二天上午，在新城西門外的广场上，召开了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会场正面搭起个台子。台子的上方，是用松枝野花扎成的彩楼。台子两旁的对联，上联写的是“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下联写的是“辞旧岁，逢旧友，叙旧情，推翻旧世界”。

偏巧事不顺利，当朱德、毛泽东等红4军领导迎彭德怀、滕代远红5军领导刚刚走上主席台时，台子就垮了。用老百姓的说法，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台子又很快搭起来了，朱德首先走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同志们，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因为没有捆好，所以垮了。但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

会上，毛泽东讲了话，他说：“今天我们红4军、红5军胜利会师了，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加强大了。将来，我们会有更多的红军，更多的根据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朱德、毛泽东的讲话，给参加大会的红军指战员以莫大鼓舞，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两军会师不久，迎来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的“会剿”。根据前委决定，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军下山，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打向“会剿”敌军的后方，以解井冈山之围；由彭德怀指挥红5军留守井冈山。

这时，李聚奎仍在红5军第2纵队第9大队第3中队担任中队长，但已经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了。在守卫井冈山的战斗中，他带兵不多，但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战斗中，指挥部队顶住了众多敌人的进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

红4军离开井冈山不久，山下就响起了敌军进攻的枪声。

敌军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白泥湖。当时分别坚守这3个哨口的是第1大队、第10大队和第8大队。敌人的攻势很紧。红军以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据险扼守，经受着数十倍敌军的疯狂进攻。

李聚奎所在的第9大队扼守在黎坪哨口。这里不是敌人主攻方向，但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到第8大队坚守的白泥湖阵地，并听到那边机关枪“嗒嗒嗒”地响个不停。敌人白天猛攻，晚上偷袭。红军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当时红军装备极差，部队在前沿阵地构筑了简易工事，并埋上了用竹子削成的竹钉等障碍物，以阻止敌人进攻。战斗中，红军等敌人接近阵地时才开枪射击，给进攻之敌以杀伤。敌人从正面攻不破红军阵地，就从黄洋界侧面的山沟里绕到红军阵地的后面，截断了红军的后路。守八面山阵地的第10大队，仗打得也很苦。阵地的工事是就地砍树做成的。敌人用机枪打了4天4夜，把工事里的木头都打碎了，再用炮一轰，工事被打垮了。坚守阵地的红军战士大多数被塌下来的工事埋没，只跑出来十几个人。

李聚奎坚守的黎坪哨口阵地因不是敌人主攻方向，只来了1个营的敌军试探性地攻了1天。红军以一部兵力阻击敌人进攻，并在山上插了许多小红旗。敌人搞不清红军兵力虚实，打了一天便主动撤走了。

十冬腊月，天空不停地飘着雨加雪。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李聚奎和战士们在工事里坚持了4天4夜。第五天一早，军指挥部传来消息：黄洋界告急，敌军未能从正面攻破黄洋界哨口，遂收买了当地一个乡民带路，从红军阵地背后插上来了！

指挥守卫井冈山作战的彭德怀，立即带领警卫排向黄洋界跑去，还未到哨口就遇上了敌人。他立即指挥部队向哨口方向反击，准备与李灿指挥的第1大队会合，两面策应把敌人打下去。但战斗刚刚打响，又接到报告：攻八面山的敌人打进来了，守白泥湖的红军部队伤亡很大，阵地即将失守，情况危急。这时，彭德怀带领警卫排赶回茨坪。他考虑到，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况且已有两个哨口敌人打进来了，我孤军无援，如果不突围出去，死守到底，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经与党代表滕代远商议，决定马上收拢队伍准备突围，待把敌人引下山再与其打游击战。

李聚奎得知这一万万火急消息，立即集合第3中队，在第9大队队长黄云桥的带领下，匆忙奔赴彭德怀军指挥部的集结地——茨坪。

这时，守卫井冈山的红5军只剩下500人。红军在彭军长指挥下开始突围。大路都被敌人封锁了，只好由群众带路，在没有路可走的峭壁陡崖上爬行。天下着雪，突围出山的红军步履艰难。随身带的一点点干粮，大家相互谦让着吃。没有水喝，就吃几口雪。部队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在山上爬了两天。越过荆竹山，渡过江，到达大汾圩，大家以为总算是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谁知又遭到敌人的三面伏击。

彭德怀沉着指挥，集合队伍给同志们作动员。他大声地说：“前面大汾圩有敌人1个营，这是我们突围出去的最后一道难关。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打过去，只要坚决、勇敢，就一定能够冲过去！冲过了这个难关，本军长是有办法的。”随即命令第8大队长贺国中带领第9大队的李聚奎第3中队担任尖兵。然后，彭德怀和贺国中分别指挥第8、9大队从两边打，很快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时，李聚奎带领他的中队迅速占领了一个山头，架起机枪，用交叉火力压制两侧敌人，掩护主力通过，离开敌人的伏击区。李聚奎指挥部队与敌人英勇奋战，为红5军部队突出重围立下战功。但是，突围红军最后面一部分非战斗人员还是被敌人截住，一些同志光荣牺牲了，一些同志又返回井冈山坚持斗争。

残酷的武装斗争，既锻炼了李聚奎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

才能。1929年，红5军进入湘鄂赣边区，坚持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李聚奎由第9大队中队长升任第8大队大队长。1930年初，红6军成立，李聚奎调任红6军第3纵队第4大队大队长。6月，红军又一次整编，红4军、红6军（一个月后改称红3军）和红12军组成红1军团，李聚奎改任支队长。从此，李聚奎就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作战了。李聚奎支队归属红1军团建制后，他指挥部队参加的重要的一仗是“二打长沙”。正当全军根据总前委的命令，准备于9月2日向长沙发起全线总攻击时，红军从敌人一个传令兵身上获得一份关于敌军拟集中10个团的兵力从猴子石方向向红军出击的命令。据此，方面军领导当即重新部署兵力，以第3军团监视正面之敌，第1军团3个军布置在敌出击线侧面，准备消灭由猴子石出击之敌。

猴子石位于长沙城南，濒临湘江，是长沙至株洲铁路线上的第一站，也是守备长沙的敌人为运输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口子。李聚奎所在的红3军就部署在这里。他带领第9支队在猴子石东侧阵地上，密切注视着敌军行动。

第3天，又等了半天，敌军仍无动静。

下午3时许，李聚奎突然发现猴子石口子处有一队敌军，在长官威逼下，猫着腰，鱼贯而出。

“敌人来了！”李聚奎下达了准备迎击敌人的命令。

敌军陶广师之第1、2旅及补充第6团、特务营、工兵营等，从狭窄的口子出击，一边前进，一边砍倒地上的树木，以作向红军射击的掩蔽物。敌人虽然很谨慎小心，但架不住李聚奎带领的第9支队猛烈冲杀，被堵在出口处。李聚奎指挥部队凭借有利地形，与敌激战数小时，子弹全部打光了，只好命令部队边打边退了几里地。这时，红3军军长黄公略向全军发出反攻的号令，英勇善战的广大指战员随着响彻云霄的冲锋号音，喊着“杀！杀！杀！”从山上一齐压了下来。李聚奎当即指挥第9支队掉头加入反攻的队伍，端着空枪打冲锋。

敌军在红军的强大攻击下，措手不及，乱成一团，被打死打伤很多。原来敌军进攻时在猴子石狭窄的口子处用砍倒的树木所做的掩体，这时反成了他们后退的路障。大批敌人欲进不得，欲退不能，除了伤亡倒下来的，一部分只好跳进湘江，更多的当了红军的俘虏。

此役，红3军击毙敌人七八百，俘虏敌官兵千人以上，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李聚奎站在山坡上，望着第9支队的战士们每人身上都背了两三支枪和大批子弹回来，心中十分高兴。战斗中打光了子弹，现在又有充足的子弹消灭敌人了。

反击敌军大“围剿”

1930年10月，在吉安，红1军团部队进行整编，原来的纵队、支队、大队、中队相应改为师、团、连、排，团直接指挥连，不设营一级。李聚奎所在红3军第3纵队改为红3军第9师，第9支队改为第27团，李聚奎任团长。同年12月，蒋介石集中7个师约10万兵力，对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在反击敌人重兵“围剿”的斗争中，既有胜利的战斗，也有伤亡惨重的受挫与失败。

12月29日，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亲自率领第18师师部及两个旅窜到龙岗。红军估计张师可能向君埠开进。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

部抓住张辉瓒部孤军冒进之机，决心在敌人开进中予以歼灭。

29日晚，红27团团长李聚奎接到围攻张辉瓒部于龙冈地区的命令。他当即率领部队由小布出发，黑夜秘密行军15里，于30日凌晨赶到距龙冈只有几里路的山上潜伏起来。此时，龙冈的丛山峻岭正淹没在蒙蒙雨雾之中。红军战士忍着寒冷，冒风雨埋伏在树丛中，等待攻击敌人的号令。

是日晨，朝阳从东方升起，浓雾渐渐消散。李聚奎隐蔽在山岗，居高临下注视前方。他清晰地看到，在山径上，敌军队伍由西向东，正朝五门岭方向蠕动。

“敌人来了！”李聚奎发出了战斗号令。顿时，潜伏等待的战士们弹上膛，刀出鞘，手榴弹拉出线准备投向敌群。就在敌人先头部队的尖兵连刚刚进入五竹岭附近时，李聚奎高声喊道：“打！”

红军第27团各战斗连队一阵排子枪扫过去，一顿饭功夫，就把进入伏击目的敌尖兵连全部消灭了。

坐镇龙冈指挥的敌军首领张辉瓒，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部队仍远在黄陂、小布一带，袭击尖兵连的不过是当地游击队，遂强令戴岳旅继续攻击前进。

多么好的战机！红3军第8、9师分别从左、右两翼发起猛烈攻击。第9师第25团从左侧山梁发起攻击，李聚奎的第27团从两山之间的山沟里攻击敌人。此战，打得非常苦。第25团团长王洪身负重伤，被抬了下去。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向敌人出击的第27团和第25团混在一起，第25团王团长又负了伤，部队一时有些混乱。第25团政委汤平急忙找到李聚奎，对他说：“李团长，我们两个团走到一起了，老王负了伤，部队有点乱，你就两个团统一指挥吧！”

“好！”李聚奎答应一声，随即指挥第25、27两团部队与敌人肉搏血战。不久，红军吃掉了戴岳旅全部和张辉瓒派来增援的1个团，而后一鼓作气直奔龙冈敌总指挥部。

张辉瓒已在红军的团团包围之中，成了瓮中鳖。他集中火力向红9师方向猛烈冲击，妄图打开一个缺口突围。李聚奎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敌人。就在这时，敌人的子弹从李聚奎的右大腿射进，从臀部穿出，伤口鲜血直流。

李聚奎被背下战场。担架员抬着李聚奎向后方转移，经过小别山红军指挥部时，突然传来一声湖南口音很重的问话声：“担架上抬着的是哪个？”

“27团团长。”担架员回答。

“啊！是湖南老乡！”问话人迎上前来。

虽说红5军和红4军井冈山会师以后，李聚奎在胜利会师大会上聆听过毛泽东的讲话，李聚奎被调入红1军团后，也见到过毛泽东的身影，但是两个湖南老乡还没有谈过话。尽管如此，毛泽东一听说“27团团长”，即使知是他的“老乡”李聚奎。毛泽东边说边走过来，亲切地询问李聚奎的伤情：“伤着筋骨没有？”

“没有。”李聚奎回答。

毛泽东说：“那就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接着，毛泽东又询问：“战况怎样？”

李聚奎说：“马上就要结束战斗了，我下来时红军部队已经打到敌人指挥部了。”

毛泽东高兴他说：“好！胜利在握！”

这是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的第一个大胜仗，全歼敌第18师两个旅及师部，共9000余人。敌前线总指挥、师长张辉瓒和第53旅旅长王捷俊也被活捉。

战争是残酷的。为了战胜敌人，为了战争的胜利，红军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李聚奎负伤了，第9师的另外两位团长王玉洪、李介思也都负了伤，第27团团政委贺水光也挂了彩。李聚奎的第27团除第2连连长逃跑投敌外，全团干部大都或伤或亡。

1931年5月敌人第二次大“围剿”遭惨败后，很快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李聚奎在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斗争中，升任红5军团第8师师长。1932年4月第8师撤销后，李聚奎调任第7师师长。第四次反“围剿”中，李聚奎在红1军团第3军任第9师师长。

1933年1月底，敌人的第四次大“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任命何应钦为“剿共”总司令，分左、中、右3路对我中央根据地进行围攻。

敌军左路总指挥蔡廷锴，率第19路军的6个师又1个旅，向我闽西根据地进攻。右路总指挥余汉谋，率驻粤军6个多师，由南面向我中央根据地进攻。中路总指挥为蒋介石嫡系陈诚，率12个师，另有散布在我中央根据地周围的13个师配合。中路军为进攻我中央根据地的突击力量，左、右两路军为其策应。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可谓十分周密。

2月26日，敌主力由西北向东南齐头并进。敌第1纵队代指挥官李明接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后，立即率领部队从乐安出发，同时命令第59师从崇仁出发，杀气腾腾地向广昌、宁都扑来。

又一个歼灭敌人的战机。红军军委命令红5军团和第22军组成右翼队，红1军团和红3军团及第21军编为左翼队，左翼队由红1军团首长统一指挥。

红1军团首长分析了敌情，命令部队隐蔽待敌，伺机以大兵团伏击的方式，歼敌第52师和第59师于黄陂大龙圩地区。

黄陂地区，崇山峻岭绵延几十里，在古木参天的群山之中有一条长约30里的狭谷，是从宜黄、乐安到宁都的必经之路。这里是打歼灭战的好战场。红军主力就在这狭谷地带的登仙桥、大尤圩、胶湖、黄陂、霍源等两侧山上埋伏下来，以突然猛烈的攻势，消灭敌人两个主力师。

李聚奎接到命令后，率领第9师部队连夜向大龙圩方向急进。

为了不暴露目标，李聚奎率领第9师部队只能走小路。这几天正逢连阴雨，山野昏暗，道路泥泞，部队沿着山间小路向战地开进，是何等艰难啊！在行进路上，李聚奎派出尖兵排，披荆斩棘，开路穿行，终于在27日拂晓前到达伏击阵地。

就在这日的下午1时许，从胶湖方向传来枪炮声。李聚奎判断，第7师已经与敌先头部队打响了。他当即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此时，上级派人传达命令说，与敌前卫旅接人的第7师部队捉到敌人一个连长，该连长供出敌李明第52师师部和1个旅正在大龙圩。为此，军团首长指示，李聚奎的第9师火速直插大龙圩，袭击敌人师部指挥中心，活捉敌师长。

李聚奎接受任务，立即带领第9师向大龙圩奔袭。至距大龙圩约1里路处，李聚奎暗示部队停止前进。他趁云雾散开之隙，用望远镜向敌方向瞭望。只见大龙圩村边的小河桥上有一个敌军指挥官，穿着雨衣，正拿着望远镜向有枪声的胶湖方向张望，他的身后有一匹高头大马和牵着马的马夫，再后有

十多名提兜带包的军官。

李聚奎判断，这肯定是敌人的指挥机关，那个拿望远镜观察的家伙，不是李明也是个较高级的指挥官。李聚奎果敢地命令部队一线摆开，以突袭战法向大龙圩包抄猛攻。通常，机枪连只做人力掩护，不打冲锋。这次，为了增强火力，达到战斗突击的效果，李聚奎命令机枪连也一起上去。

仅仅 40 分钟，李聚奎指挥的这场漂亮的歼灭战就结束了。

李聚奎满怀胜利地喜悦，站在大龙圩小街的一个高台上，指挥部队打扫战场，检阅似的看着第 9 师的战士们押送一队队丢盔卸甲的敌军俘虏向后方走去。战士们扛着、抬着缴获来的武器，从他的指挥台前经过，准备装车运往后方。

“报告师长，我们抓来了敌人的一个师长！”报告人是第 9 师第 25 团机枪连的一个班长。

李聚奎抬眼望去，只见战士们押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敌军官走来。这人胖得出奇，鼓鼓的肚皮上不停地淌着血。李聚奎问：“他伤在什么地方？”

“胸部。”机枪班长回答说。

李聚奎遂问敌军官：“你就是李明吧？”

被打伤的敌军官摇摇头说：“不是。我是书记官。”

这时，俘虏中有人说：“他就是李明。”

李聚奎严肃地说：“李明，共产党的政策你可能早就听说了吧！”

李明连忙点头说：“是，是！”

李聚奎见他胸部不停地淌着血，脸色苍白，估计伤势很重，便交代侦察参谋彭治明亲自押送，由 4 个俘虏兵抬着，将他送后方医院去了。

打扫战场后，李聚奎集合队伍清点人数。根据各团报告，此次战斗第 9 师共伤亡 46 人，歼敌军第 52 师直属队及 1 个旅全部，俘虏敌师长李明以下官兵 3000 余人。

红一师师长

红军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后，经过“藤田编队”，把原属红 1 军团的第 7、9、10、11 师和罗炳辉的红 22 军，改编为第 1、第 2 两个师，每师 3 个团。原红 3 军的第 7、9 两师，改为第 1 军团第 1 师的第 1、2 两团；原第 22 军的第 66 师，改为第 1 军团第 1 师的第 3 团；原第 22 军直属队，改为第 1 师直属队。开始，由罗炳辉任第 1 师师长。一个多月后，罗炳辉调任新成立的第 9 军团军团长，李聚奎由第 2 团团长调任第 1 师师长。这期间，方面军在藤田召开大会，军委对作战有功人员颁发金质红星奖章，第 1 师师长李聚奎被授予二等奖章。

1933 年 10 月，蒋介石又调集了百万大军，以 50 万兵力从 4 个方向进攻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李聚奎指挥红 1 师部队打了不少硬仗、恶仗和苦仗。在此前的 4 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红军发挥了自己的战略战术特长，打了一连串的歼灭战，因而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却与已往不同，由于蒋介石吸取了过去失败的教训，在军事上一改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新战略；加之红军在作战指导上犯了一系列“左”的错误。因此，这次反“围剿”红军

与敌人整整打了一年的时间，大小战斗打了上百次，没有打过一次痛快的歼灭战。在与敌人的对战中，红1师师长李聚奎、代政治委员谭政正式签署上报的战斗总结有《五都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2月11日）、《丁毛山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3年12月）、《鸡公山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4年2月10日）、《凤翔峰附近战斗经过详报》（1934年2月15日）等。这几份保存在档案馆的原始战斗情况报告，详细记载了师长李聚奎和师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谭政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指挥第1师部队英勇作战的战斗历程。

《五都附近战斗经过详报》中说：红1师与红2师在五都附近与敌吴奇伟第90师一战，给蒋介石进剿军主力之一、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以歼灭性打击。吴奇伟的所谓“铁军”伤亡数百，军心动摇。此时正当广州暴动6周年，给6年前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吴奇伟以严厉打击，不啻是献给广州暴动烈士们的一份祭礼。

三岬嶂战斗（即凤翔峰附近战斗）是第五次反“围剿”第二阶段在福建省建宁县的三岬嶂与敌人进行的一场战斗。当时，敌人3个师的兵力向三岬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岬嶂，对建宁方向红军的作战威胁非常大。因此，军团首长命令李聚奎率红1师先敌占领三岬嶂，并且坚决守住。

李聚奎接受任务后，当即命令第1团团长杨得志带领全团跑步前进，迅速占领三岬嶂，从正面顶住敌人，守住阵地。

同时，李聚奎命令第3团从侧后佯攻，第2团从右翼出击，打击敌人。

任务下达后，各团分路出发。杨得志率领红1团连夜急行军前进。指战员冒着毛毛雨，不顾道路泥泞，摔倒了再爬起来，带着满身泥水拼命往前赶，终于抢先占领了三岬嶂。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杨得志命令部队连夜构筑好工事，准备迎战第二天敌人争夺三岬嶂要点的进攻。

战斗开始后，敌人连续进攻第1团坚守的一个四五百米高的山头。他们用飞机轰炸，用火炮轰击，以配合步兵猛攻。杨得志在前沿指挥。由于红军作战英勇顽强，敌人的一次次冲锋都被打了下去，阵地前敌人尸横遍地。敌人在夜晚又攻击几次之后，于第二天白天更加疯狂地向三岬嶂进攻。敌机成群地在三岬嶂这个长不足千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第2团从侧翼攻击的力量不足，致使敌人一下子冲到红军阵地前沿。这时，第1团团长杨得志给李聚奎师长打来电话说：“我们子弹打完了，战士们正在用石头打击敌人！”

李聚奎命令说：“你们团一定要顶住！”又说：“军团首长答应派4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

“请放心吧！坚决守住三岬嶂！”杨得志坚定地回答。

由于第4团距三岬嶂较远，援军两个小时以后方才赶到。在这段时间里，第1团的战士硬是用石头打退了敌人多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

第4团部队赶到了三岬嶂。李聚奎命令第2、4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第1团从正面压下来，第3团从侧后攻击敌人。很快，红军把敌人打退了，还将敌人追出好几里地。

当时的第1师代政治委员谭政，晚年谈到第1师三岬嶂阵地阻击战时说：“红1师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坚守阵地，击退了3个师敌人的进攻，三岬嶂始终在红军手里。当然，红1师自己伤亡损失也不小。战斗结束后，红1团受到军团的表彰，总政治部的报纸上登了红1团的战绩。”

反“围剿”斗争的最后一仗

1934年10月，红1师在李聚奎和谭政统一指挥下，在江西兴国县的高兴圩、狮子岭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也是红1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打的最后一仗。这一仗时间比较长，红军坚守阵地一个月左右。

高兴圩、狮子岭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起伏地。红1师部队担任这里的守卫任务，仗打得很艰苦，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于1934年10月6日在高兴区之石子队前线写的《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写出了这一仗的壮烈场景。当时，红1师部队接受军委交予的保卫兴国苏区的任务，赶到高兴圩。经过10天的战备，修工事，筑堡垒，准备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敌军进行一场血战。

9月30日，敌军以3个师的兵力，集中数十门大炮，出动十余架飞机，向狮子岭杨得志红1团守备的阵地发动猛烈攻击。落在红1团阵地上的炮弹和炸弹有数千颗，满山尘土飞扬，烟雾弥漫，令人睁不开眼。隆隆的炮声震动山谷，即使对面谈话也听不见。红军阵地上的支撑点和工事大部分被毁。高兴圩敌我对战的激烈程度，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绝无仅有。

李聚奎指挥的红1师，在五次反“围剿”中打了一场接一场的恶仗、苦仗，虽然牺牲了许多好同志，但是锻炼了部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指挥员和军队政治工作者。李聚奎回忆说，战斗中，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指挥下，打得非常出色，部队英勇作战，能攻能守，不怕牺牲，屡屡立下战功。杨得志领兵打仗的指挥才能，在长征中，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得到充分的发挥。红1团的营连干部，如孙继先、陈正湘、尹先炳等，后来都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当然，红2团、红3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红3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高兴圩阵地防御战斗中发挥了巨大威力。谭政在《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中说：战前，以团为单位召集连以上干部会，以营为单位召开活动分子会，进行政治动员。在“誓死保卫兴国苏区，消灭敌军周浑元纵队”的口号下，号召部队发扬顽强战斗精神，不怕敌人飞机大炮，不放弃一个支撑点，不让敌人占领高兴圩一寸土地。师政治部星夜派人到阵地开展政治工作。正因为战时政治工作充分，思想政治动员深入，战斗中出现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红1团第8连代指导员孙光有，在阵地上连排干部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挺身而出领导抗击敌人，没有丝毫动摇。后来该阵地被敌人包围，孙光有和坚守阵地的战士们壮烈牺牲。该团4连连长在猛烈炮火轰击下，沉着指挥，毫不慌乱，在敌人攻上阵地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带领战士和敌人拼刺刀。该团第6连第2排排长吴生辉，曾被敌人捉获，他一枪将敌人打死逃了出来。后来，有3个敌人追来，他回转头打伤打死追来之敌而脱险。此外，红1团青年干事，第4连第7班班长和第6班副班长，第8连战士杨相福，都被敌人捉获，最后是用拳头与敌人搏斗逃回来的。

战斗中，红军干部战士都会做政治工作。红3团第6连第2班班长，在敌人的炮火将守备的村庄摧毁、坚守的战士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沉着地向活着的凡名战士进行政治工作，鼓动大家顽强抗敌。后来，敌人围攻上来，阵地实难支持，他带领几名战士有秩序地撤退。该团第8连班长邹式南，带

领一班人执行掩护全团人撤退的任务。当时敌人在火炮轰击掩护下猛烈攻击，他沉着地进行鼓动工作，动员全班坚决顶住敌人。邹式南负了伤，就把指挥权交给副班长，自己仍不下火线，大声鼓励大家：“不要怕，我在这里！飞机大炮是不能解决战斗的。我们死也要掩护全团人安全撤退……”

由于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和战地鼓动工作有力，战斗中出现了许多英雄集体。例如：红1团第4连接连3次打垮敌人的冲锋，在敌人冲击接近我防守阵地时，他们又用手榴弹杀伤许多敌人。该团第5连、第6连和第8连的工事全被敌人摧毁，但部队仍然顽强地坚持战斗，和敌人拼刺刀，拼拳头。

长征中的急先锋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开始突围长征，实施战略转移。参加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有第1、3、5、8、9军团，还有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红一方面军是这次战略转移的主力军，而李聚奎等指挥的红1师则是突破敌人重围、掩护中革军委机关长征的急先锋。

对整个战略行动，李聚奎等红1师领导并不十分了解。10月15日，红1师部队刚刚收拢集结于兴国的东南地区，红1军团司令部即派机要参谋给红1师送来林彪、聂荣臻写给师长、政委亲收的绝密信，随信还附有中革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和行军路线图。信中指定红1师附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在红1师长征起步的同一天，上级给1师补充了几百名新兵和一批子弹，还有500块大洋。当日黄昏，李聚奎奉命带领红1师出发了。

红军撤出中央苏区的行动是极秘密的。然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还是看出红军部队要大行动了。因此，部队出发时，苏区群众男女老幼，妇女会、赤少队、儿童团，都自动地从四面八方聚拢来了。老太太提着篮子，将里面装的鸡蛋、亲手做的糯米团子和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柑桔，一个劲儿地往红军战士们口袋里塞。老人们一个个热泪满腮，嘱咐着：“娃儿们，你们打败了老蒋，打败了敌人，可再回来呀！”他们一面哭，一面总是重复着这句话。赤少队、儿童团在路边高喊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退敌人的进攻，活捉大老蒋！”妇女会的青年妇女结队唱山歌，欢送红军。部队出发了，红1师部队一时成了军民汇集在一起的人流。真是十里相送，十里悲歌！夕阳相伴，天慢慢黑了下来。送出很远的乡亲们仍不肯返回，在都河的对岸点起了火把。李聚奎本来走在队伍的前头，这时他停下脚步，看着部队从他眼前走过。隔岸望着晃动的火把，他抱定战败中国反动派的信念，禁不住热泪滴湿胸襟，心中默念道：“老乡们，请回吧！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最终一定会被打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定能推翻！”

李聚奎虽然心中自勉，但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好在部队出发前，师的几位领导已有明确的分工：李聚奎带领部队出发后，由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几名干部留下来，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赔偿群众的损失，并尽可能向苏区群众做一些解释工作。

李聚奎振奋精神，快马加鞭，赶到部队的前头，带领红1师部队担负起红1军团打前锋的任务。

突破敌人封锁线

第五次“围剿”前，蒋介石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心要把中央红军消灭在井冈山根据地。1933年4月，蒋介石从南京乘军舰到江西，在南昌、临川等地召集将领总结前4次“围剿”失败的教训，提出第五次“围剿”方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使政治与军事相辅而行”。提出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才是我们的任务和出路”。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并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军事上，改变原来“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战法，代之以在苏区周围构筑多层次的纵横交错碉堡的四道封锁线。

李聚奎接受命令后，于10月16日黄昏离开苏区，起步长征，其作战任务首先是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零都（干部）西南方向为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新田则是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1个重要阵地。守新田阵地的是国民党广东部队的一个团。10月21日，李聚奎接到命令，要红1师袭占新田。

红1师是第1军团的主力师，是能攻能守战斗力比较强的部队。李聚奎担任第1师师长以来，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多次硬仗、恶战，差不多都是由红1师担当主力。这次，中央红军长征要从王母渡、新田之间首先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在这个关键时刻，军团首长又把这一决定全军命运的战斗任务，交给了红1师。新田据点是敌人称之为坚如盘石的堡垒，而红军要由此通过必须将其攻破。多么严峻的任务啊！李聚奎和师的其他领导都在默默思考着。的确，红1师担负的攻击新田敌人阵地的战斗任务，是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开始长征要走的第一步棋。新田战斗打得好，整个中央红军就能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迈出胜利的第一步。如果这一仗打败了，不仅会暴露红军统帅部总的战略意图，敌人也会加紧“围剿”行动，中央红军则有在苏区毁灭的危险。

“好！就这么打！”李聚奎经过深思熟虑，下定决心。为了出敌不意，红1师决定采取夜间急袭战法。

一声令下，部队开始行动。杨得志带领红1团为前梯队，红2团、红3团随后，向攻击目标——敌人严密防守的新田阵地前进。部队从苏区北头向南头开进，攻击通向湘西广东方向的新田，要经过整个苏区，而且行程不止一日，密是保不住的。同时，为了麻痹边境敌人，突出重围长征，红军必须在苏区境内浩浩荡荡开进，以制造声势。于是，师长率聚奎部署战斗任务后，师政治部主任谭政立即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会，布置部队开进时的政治工作。师政治部还先行派出政工组，于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又通过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把各村的革命群众组织起来，在各宣传点进行宣传鼓动。全副武装的赤少队以及儿童团、妇女会，列队在路旁呼口号，唱歌子，还进行化装表演。苏维埃政府的代表向部队讲话，鼓励红军战士与敌人拼搏。每隔十里八里，都有欢送红军的群众在村头路旁等候红军部队到来，他们把好吃的东西、茶水、慰问品、纪念品等送到红军战士的手里。红1师部队就是在这样的精神鼓舞下，进入战斗状态，去奇袭新田敌人固守的阵地。

经过长途急行军，红1师部队隐蔽集结在攻击新田的地域。杨得志率红1团打先锋，趁夜黑天暗，向敌人阵地发起攻击。憋足了劲的红军战士勇猛

冲杀，守阵地的敌军顿时阵脚大乱。不到3个小时，基本解决战斗。残敌被迫挤到阵地一角，于当天晚上逃跑了。与此同时，红2师第6团袭占金鸡，红3军团袭占固陂，均旗开得胜。接着，红军又进攻版石圩，将敌击溃，追歼逃敌至安西。

红1师夜袭新田战斗成功，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给打开了。全军由王母渡、新田之间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又于25日渡过信丰河（桃江），继续西进。

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守备的敌人不是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分是民团、保安队。11月2日晚，红1军团第2师第6团袭占城口。11月8日，中央红军大部队在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城口间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红军继续前进，抵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摆在面前的是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中央红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8万多人的队伍，携带大量笨重物资器材，沿山路行军，拥挤不堪，行进缓慢，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

中央红军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又是大部队行动，致使蒋介石判明了中央红军总的意图。于是，他一方面加强设置郴县、良田、宜章、乐昌这第三道封锁线上的兵力，另一方面派国民党军主力部队从江西、福建向突围出苏区的中央红军追来。当李聚奎率领红1师进至粤汉铁路以东地区时，粤军已经赶到，并向红军发起了进攻。

进攻红军的敌人由三面紧逼，情况十分危险。李聚奎指挥若走，当即命令部队展开，顶住敌人的进攻。战斗正在进行中，军团首长打来电话，命令李聚奎带1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整个部队通过粤汉路，而且动作要快，不得延误。李聚奎当即命令红1团、红2团现地继续抗击敌人进攻，自己带领红3团撤出阵地，跑步到全军的前头，担任开路先锋。

当李聚奎奉命带1个团的部队，不顾一切地向中央纵队前头赶的途中，发现在一个小山坳的路旁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仔细一看，正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见李聚奎带着红3团赶来了，没等他开口报告情况，周恩来就说：“你们来得好快呀！”

李聚奎一听，听出点味道来了。暗想道：“我们是第1师，自然应当担负开路任务。只见周恩来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向李聚奎打了个手势，要他走过来。周恩来指着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1个排，哪里要放1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周恩来特意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这句话，说得特别有力量。

李聚奎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之间，聆听首长的谈话，领会首长的意图，同时考虑队伍如何前进。随着周恩来手中的红铅笔在地图上一个一个作标记，他计算着一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又琢磨着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

周恩来一眼看出了李聚奎的顾虑，不禁哈哈一笑，解释道：“你不用担心，后续部队一上来，就会去接替你师的，你们就可以收拢部队，继续前进了！”

周恩来布置完任务，问毛泽东还有什么话对第1师师长李聚奎说。

毛泽东说：“你们师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蓝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领这两个县城或其中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后面就跟着你们走。”稍稍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强调说：“大路能走就走大路，

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由你们决定，不要等指示，以免耽误时间。

毛泽东话音刚落，周恩来和朱德连声说：“对！对！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办！”

这时，红2师第4团占领了乐昌附近制高点——九峰山，红3军团从右翼占领了良田，从而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了中央及军委纵队，也使担任开路先锋任务的李聚奎率领的红3团和中央及军委纵队安全通过粤汉线。

李聚奎率领红3团通过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占宜章县城。这时，红1团、红2团也都先后赶上来了。红1师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

李聚奎率领红1师为前锋，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向湘江挺进。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在湘江两岸部署了20个师的兵力，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令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和湖南军阀何健部集结于零陵、东安、全州，沿湘江布防；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部，布防于兴安、灌阳一带。中央红军的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湖南军阀李云杰部尾随追击。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红军与蒋介石湘江之战已成走局。关键时刻，李聚奎奉命带领红1师赶到了觉山。这时，敌人以两个师的兵力向红1师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李聚奎令红2团、红3团正面担任阻击。当时，红1师部队已昼夜兼程急行军两天两夜，十分疲劳；但枪声一响，红军战士们又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他们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阵地前敌人尸横遍野。

然而，敌人不甘心失败，又投入更多的兵力，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轮番向红1师阵地猛炸、猛攻。第1师第3团在下坡田附近阻击敌人，先后击退敌人五六次冲锋。第三天，敌人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战术，一面继续加强正面兵力、火力压制，另以众多部队迂回红1师整个阵地后方和侧翼。守阵地的红军战士与敌人浴血奋战，不少阵地是在战士全部阵亡之后才被敌人夺去的。

湘江一仗，红军打得很难，损失也很大，许多指战员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红军的生存，英勇牺牲，热血洒在湘江两岸。中央红军终于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

长征路上打冲锋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占领了湖南的通道。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李德^①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会上，毛泽东从敌人重兵后追前堵阻止红军主力北上这一情况出发，力主西进，向敌军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领导人的赞成；而秦邦宪（博古）和李德仍主张北上。

12月中旬，红1军团先头部队向贵州黎平前进。黎平由贵州军阀王家烈部周芳仁旅1个团驻守。14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1师第3团和第2师第6团向黎平疾进。黎平守敌闻风弃城而逃，红军乘势占领。中共中央政治局

^① 李德，原名翼托·布劳恩，德国人。秦邦宪在上海得知他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聘他为军事顾问。

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会上，博古、李德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 2、6 军团会合，然后创建新的根据地。18 日，毛泽东发言，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经过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19 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 12 月 18 日决议的决议》，具体规定中央红军的行动计划，并要求红 2、6 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湖南、贵州和四川之敌。

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和决议精神，红 1 师领导李聚奎等人是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口中得知的。李聚奎回忆说，那是我们离开黎平以后的行军途中。一天，我们第 1 师正在一个小镇上休息，恰遇中央纵队的前梯队从这里通过。听说我们 1 师师部在这里，前梯队也停了下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还有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一起来到我们师部。那天，师部炊事班刚好宰了一口猪。师的几个领导一面让炊事班准备饭，一面向中央领导汇报情况。在我们汇报的过程中，几位领导同志互相插话，笑声不断。其间，毛泽东同志说话最多，他关切地询问我们部队吃得怎么样，病号多不多，休息得好不好，恢复疲劳没有。

中央领导谈话后，接着就是吃饭。那时，招待领导同志吃饭，只要有点肉就算是好饭了。他们见炊事班一下子端上来好几盘肉，高兴得很。记不清是谁了，见上来了肉，竟喊起来：“嗨，还有这么多肉呢！”饭桌上，他们边吃边谈。

中央领导同志吃完饭正出门时，碰上李德进来。毛泽东用手往后一指，告诉李德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

毛泽东对李德说的这一句话，本来是一句很平常的话，可是后来人们把它变成了“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

李聚奎等红 1 师领导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的指示，从而明确了实施长征的战略方针和方向。部队的情绪也极为高涨。12 月底，中央红军逼近乌江南岸。

乌江是贵州省境内最大的河流，江面宽 200 多米，水深流急，滔滔江水翻起白浪，发出吼声。乌江两岸悬崖绝壁，素有天险之称。

强渡乌江的先锋部队仍是李聚奎指挥的红 1 师。1935 年 1 月 1 日，李聚奎率红 1 师进抵回龙场渡口。时值新年，部队指战员无暇举行联欢，大家围绕如何完成突破乌江、拿下遵义的战斗任务而进行讨论。

防守乌江的贵州军阀的军队，在沿江各渡口构筑江防工事，妄图凭借乌江天险阻拦红军于乌江南岸。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也尾追红军进入贵州，已达黄平、三穗、镇远一带。任务紧迫，红军必须在蒋介石没有完成军事部署之前，强渡乌江。

红 1 师在回龙场渡口强渡乌江，由第 1 团担任前卫。2 日，指战员不顾风雨交加，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的带领下，于当日下午，以 8 名水性好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在火力掩护下乘竹筏偷渡失败。接着，又乘夜暗，在乌江下游水势较缓的地方，由第 1 营营长孙继先带领突击队，跳上事先准备好的竹筏，冒雪再次强渡。3 日上午，强渡乌江成功。全师及后续部队安全渡过。与此同时，红 2 师也在江界方向与敌人激战，渡过乌江，随后占领遵义城。

红“师进入遵义后，驻城北关。正在安排驻扎的时候，突然接到上级命

令，立即出发开往桐梓、松坎，担任遵义城的警戒。

15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了。

遵义会议之后，蒋介石纠集了湘、川、桂、黔各军阀部队和国民党军薛岳兵团共150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方向遵义疾进，妄图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的狭窄地区。

又一场被敌人堵截追击的大战开始了。

1月19日，第一方面军奉命分兵三路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预定北渡长江的渡江地点为宜宾至泸州一线。

随后，李聚奎接军团命令，带领红1师为全军开路，经猿猴（元厚）场向旺隆场方向疾进。长征路上，时刻可能遇到风险。1月26日，开路先锋师在离赤水县约30里的黄陂洞，与由赤水县向土城开来的敌川军章安平旅遭遇。敌先我占领右侧高地，并凭借左边的工事对红1师施行火力封锁。

李聚奎师陷入敌人三面包围之中，部队浴血苦战，英勇抗击敌人多次进攻。红2团的领导见情况危急，曾建议撤出战斗。李聚奎斩钉截铁他说：“不能撤！我们这里多坚持一个小时，中央纵队和第3、5、9军团在土城与四川军阀部队的决战就多一分胜利把握。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撤。”这样，李聚奎指挥红1师在敌人包围圈内坚持战斗到第二天的黄昏，才撤出战斗。

红军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后有“四渡赤水”之战。1935年1月28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鉴于红军上城麇战竟日，虽然歼敌一部，但敌人的援军即将赶到，原定进占赤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为敌军所阻而不能实现，久战对我不利。于是当机立断，下令撤出战斗。当晚从敌人包围中撤出战斗的红1师，与整个红军部队于1月29日拂晓前从猿猴场、土城西渡赤水，向古蔺开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渡赤水”。

当红1师在猿猴场渡口准备渡河时，毛泽东派总司令部一位参谋来找第1师领导，要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参谋长耿飏、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那里去。这是红1师领导长征路上第三次与毛泽东相见。这第三次相见，因当时师参谋长耿飏正指挥部队过赤水河，只李聚奎、黄甦、谭政一同前来。

毛泽东见第1师的3位领导人从前线赶来，亲热地招呼他们坐下来，和他们谈话。李聚奎回忆说：毛泽东同他们谈了3个问题。第一，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毛泽东告诉李聚奎、黄甦、谭政，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并说“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二，通报军委关于部队缩编的决定。第三，谈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毛泽东说：“你们1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当红一方面军各部队于2月8、9日到达滇东北扎西时，蒋介石急调滇军3个旅到镇雄地区堵击，又令川军10多个旅由北向南压了下来，中央军周浑元部也向扎西地区扑来。

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纵观全局，审时度势，鉴于各路敌军奔集而至，而黔北敌军薄弱，决定利用敌人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的错觉，出其不意挥戈东指，返回川南，然后再入贵州。

根据这一决策，第一方面军各部队于2月20日二渡赤水。李聚奎指挥红1师经古蔺以南的太平渡渡过赤水，以红1团为先头，昼夜兼程向东前进。24日晚，部队抵达桐梓，趁夜暗攻城。不到两个小时，守敌黔军第4团蒋德

铭部两个连向娄山关溃逃。红军再占桐梓。

娄山关地当大娄山主峰，系川黔之间隘口，地势险要，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守敌为黔军刘鹤鸣的第6团。与红1师占领桐梓的同时，红3军团一部在军团有力配合下，经半天时间激战，便攻下了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娄山关。

夺得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据了。红1、3军团乘胜向遵义方向展开追击战。27日，彭德怀指挥第3军团再占遵义。李聚奎率红1师进抵遵义时没有进城，而是从城东门外打到南门外，配合第3军团作战。他们先打垮了敌人的增援部队，随后又同第3军团一起猛追逃敌，直到乌江边。

遵义战役胜利后，蒋介石飞抵四川重庆亲自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进行新的围攻。红军主动放弃遵义，于3月16日在茅台三渡赤水，然后向古蔺方向前进，再入川南。

红军三渡赤水，给敌人以错觉。蒋介石误认为中央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赶紧改变部署。李聚奎回忆说，正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尚未对红军形成包围之际，毛泽东指挥红军掉头向东，于3月21日从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然后，又掉头南下，从而把北线的敌人远远地甩开。

李聚奎担任红1师师长指挥的最后一仗，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0日，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和军委纵队，指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24日，红1师师长李聚奎和师政治委员谭政率领部队，一天一夜冒雨行军140多里，来到距安顺场仅10多里路的马鞍山顶。浪涛滚滚的大渡河呈现在红1师部队眼前。

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河水从崇山峻岭间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深莫测，并有无数险滩造成巨大漩涡。红1师经过一场战斗，消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这一段河面，宽200余米，流速每秒4米。由于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没有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能过河。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大军西征到这里（安顺场），北渡未成，陷入清军重围而全军覆灭。红军到此，蒋介石曾疯狂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5月25日，李聚奎指挥红1团开始强渡大渡河。由于战前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部队战斗情绪非常高。该团1营营长孙继先刚把先遣队渡河任务交给第2连，战士们就围住孙继先争先恐后报名要求参加奋勇队。当时，红1团团长杨得志又是高兴又是焦急，高兴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个个勇敢，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会拖延时间。最后决定由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才把奋勇队组织起来。奋勇队有连长1名，排长1名，正副班长4名，战士11名。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每个勇士装备1支驳壳枪、1支冲锋枪、1把马刀，还有8颗手榴弹以及作业工具。

第二天一早，奋勇队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登上了渡河第一船。与此同时，团长杨得志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向对岸射击！”对岸敌人从工事里对红军的渡船进行火力封锁，但由于我方火力打得猛，射得准，密集度高，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勇士们乘坐的小船，冲过了敌人重重火网，战胜惊涛骇浪，终于登上对岸，占领了滩头阵地。

强渡大渡河成功了。占领滩头阵地的勇士们，掩护后续部队一船一船地渡河。先是第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带领全营部队过了河，接着是第2营、第3营。李聚奎是渡过1个团部队之后过河的。他一面指挥部队巩固阵地，

扩大战果，一面命令第 2 团、第 3 团加紧渡河。

红 1 师渡过了大渡河，中央红军渡过了大渡河。蒋介石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梦想破灭了。

杨至成回国前后的风风雨雨

窦孝鹏

杨至成（1903～1967）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3年11月30日生于贵州省三穗县木界村。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20军任连指导员。先后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1928年4月，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连长，后兼井冈山留守主任。1930年起，任红4军副官长、工农红军学校校务部部长、红军总兵站站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任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黄河两延（延长、延川）卫戍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部长。1938年秋去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后，任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务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2月3日病逝于北京。

* * * * *

远去莫斯科

红军时期，杨至成在作战中几次负伤，身体受到很大损害。长征到延安后，虽然环境稳定了，但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工作一直很忙，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所以身体状况很差，高血压、肺结核、羊角风时而发作。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更没有条件养病了，他一直咬紧牙关带病坚持工作。到1938年初，时任“抗大”校务部长的杨至成有时病得连床都爬不起来了。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找他去谈工作，从驻地到毛主席住处凤凰山路不算太远，他却走不动，只好叫人抬着担架送他去。

正好这时党中央与共产国际达成协议，决定从“抗大”、党校和部队中挑一批身体较差的领导干部去苏联莫斯科，一边养病，一边学习，为未来的持久战争储备指挥人才和骨干力量。杨至成的名字被列入了赴苏的名单之中。

杨至成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接受了组织的关怀。说负疚，他感到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剩下的人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了，现在一个人应该干十个人、几十个人的工作，才能对得起那些倒在长征途中的战友。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正欲振奋精神、冲锋向前时，不争气的身体却要把自己拖下来，他感到内心十分不安。

周恩来副主席也许看出了他的心思，找他谈话时说：“至成同志，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到国外去看看病，把身体养好；再学习些新东西，开阔一下眼界，提高提高，以便将来挑更繁重的担子嘛！”

这样，杨至成只好告别首长，告别战友，告别妻儿。与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谭家述等一批同志踏上了赴苏的道路。

据杨至成的侄子杨德中回忆，杨至成是1938年6月离开延安的。杨德中同志（杨至成哥哥的孩子）是1934年参加红军到延安的。他说：“1938年5月份，叔叔曾向我告别，说他马上要到苏联去养病和学习。那时，他女儿出生不到半年。他女儿是1938年2月出生的。不久，他便离开延安启程了。”

据林利同志回忆，杨至成他们是1938年8月到达莫斯科，9月份正式开始学习的。

林利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同志的女儿，也是杨至成同志在莫斯科学习时的同班小学友。林利回忆说：“1938年我17岁，跟着蔡畅（我党妇女工作的领袖，李富春同志的夫人）、刘英（张闻天同志的夫人）等，一行10人，来到莫斯科治病并学习。我们是6月份到达的。两个月后即1938年8月份，杨至成等一批军队的领导干部也到达这里。我们都住在一起。9月份正式开始学习。”

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他们又是秘密出国，沿途要躲过国民党的盘查，所以途中耽搁了一个多月。

他们走的路线是先从延安坐汽车经西安到兰州，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伍修权的安排下，扮装成商人或别的什么身份，然后想办法搞到了去新疆的飞机票。飞到新疆后要越过边界很麻烦，只有等到苏联给新疆送货的汽车返回时，偷偷藏在车厢里，乘夜开出边界。他们就这样乘坐汽车来到苏联的阿拉木图，一颗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但阿拉木图离莫斯科还相当遥远，从这里到莫斯科和到北京差不多。好在这里已有火车，也不用再受盘查，他们几个人坐上火车直奔莫斯科而去。

杨至成他们到莫斯科后，被安排住在郊区一个叫孔策沃的地方。这里是共产国际的附属党校，是一座别墅式建筑。高高的围墙内，有一座米黄色的二层大楼，周围还有几座小楼，餐厅、教室等设备一应俱全。院内绿草成茵，花木葱茏。门外是一片森林，环境非常优美。此处离市中心不到40千米，是一个疗养和学习的好地方。据苏联同志讲，这里过去曾是一个贵族的庄园，十月革命成功后，被收为公有。以后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了党校。现在，则成了专门接待从中国来的同志的地方。

果然，杨至成住下不久，就发现住在这座别墅里的20多个人，全是从中国来的，更确切一点说大多数是从延安来的，不少都是他的熟人，如蔡畅、刘英、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及他们的孩子李敏，还有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卢冬生、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麦先任、贺诚等。贺诚是红军的总卫生部长，是护送第五次反“围剿”中被敌人飞机炸伤的王稼祥同志来苏联治伤时留下学习的。在平型关战役后负伤的林彪，在其妻的陪同下，也住在这里疗养。

从贫穷的陕北和战乱的环境中，来到这充满和平气氛和舒适、温馨的大家庭里，杨至成感到了国际友谊和党组织给予的温暖。在这里，他们每人住一间房子，房内桌、椅、床具、沙发俱全，有在延安看不到的电灯，还可以经常洗个热水澡。

吃饭了，杨至成走进明亮宽敞的餐厅，面对的是陌生的在延安绝对不可能享用的西餐。

第一道是汤，好像玉米粥里放了些糖，甜丝丝、稠糊糊的，很好喝。杨至成两口就灌进了肚里。过去吃饭，他总是最后才喝汤，现在却要颠倒过来，要先喝汤了。

第二道是肉菜，有时是一只鸡腿，有时是一块牛排，有时是两个肉丸子。杨至成等着用菜下饭吃，但饭总是不来。他悄悄问老熟人贺诚：“喂，怎么还不给我们盛饭来呀？”贺诚告诉他：“这就是饭，快动刀叉吃吧！”

第三道是素菜，送来的却是米饭，原来这里把米饭当菜吃。杨至成是贵州人，爱吃米饭，这一点米饭两口就扒光了，很不解馋。

主食是什么呢？面包。面包可以放开吃。

最后一道菜是干果或果脯之类的东西。

每天晚上，大家都集中在俱乐部里，由翻译给大家读当天的报纸，主要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以便让大家了解当前的时事。读完报纸后，每人喝一杯牛奶，就开始就寝了。

开始，杨至成对这种西餐有点吃不惯，他对刘亚楼讲：“伙计，我感到真不如南瓜、辣椒、红米饭吃着得劲！”

贺诚说他：“土包子，你学着开开洋荤吧，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果然，半年过后，杨至成完全习惯了吃西餐，而且越吃越爱吃。由于营养跟上了，他的体质逐渐恢复起来。来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伤病。苏联方面对他们很关心，每周专门安排他们去克里姆林医院看一次病。克里姆林医院是莫斯科的高级医院，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一流的。杨至成的病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也基本得到控制。1939年春，他们又搬到了一个叫库契诺的庄园式建筑里。这里的环境同样很优雅。杨至成抓紧分分秒秒努力学习。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

住在孔策沃和库契诺的这二十几个中国人，除几个小孩子外，正式参加学习的只有十几名同志。他们打乱地方和部队的界限，编成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陕北来的马明方同志担任，受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同志领导。

学习分两个班进行，一个政治班，一个军事班。地方工作的同志大部分参加政治班学习，部队来的同志基本上都参加军事班学习。教员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派来的。以苏联卓越的党务活动家和军队的创建者伏龙芝的名字命名的这个高等军事学院，是苏联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最高学府。这所学院特地为中国同志开设了一个特别班。

杨至成不愿放弃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所以既参加军事班的学习，也参加政治班的学习。既然到了苏联，学俄语是少不了的。但由于时间有限，每周只安排一次俄语课。由于基础差，时间短，他们这些“大兵”学得特别吃力，但都特别用功。苏联教员上课，从头到尾都靠翻译。学员一边听翻译，一边记笔记，因此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有关组织和领导对他们的学习抓得很紧，要求也很严，基本上是按正规军事学院的样子来安排每日的作息制度：早晨出操跑步，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复习或操练，晚上集体读报；每隔一段时间搞一次测验或考试；平时外出要请假，只有星期天才可以放假休息。杨至成因曾参加黄埔军校的学习，对这种学习生活并不陌生，只是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开始一下子很难适应。但他强迫自己认真照上面的要求去做，绝不打折扣。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回忆说：“在莫斯科时，‘杨老太爷’的学习十分刻苦。‘杨老太爷’，是那时我们对杨至成同志的称呼。毛岸英、毛岸青以及不少他的朋友、同志都这么称呼他。这倒不是因为他的年纪有多大，那时他也不过三十五六岁，还不如蔡畅、贺诚等同志年龄大。但他这人特别和蔼，忠厚可亲，成天乐呵呵的，又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他的这些性格特点不知被谁抓住并概括成‘杨老太爷’这凡个字，很快便被人们传开了。”

在杨至成同志保存的照片中，我们发现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分别送给他的自己的照片，照片的背面都有两人的亲笔题字。

毛岸青的题字，前面为俄文，后面为中文，写的是：

给亲爱的老太爷作永远的纪念，您的小孩子永寿（毛岸青）。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

毛岸英的题字是：

亲爱的至成同志：

决不要忘记我们在莫斯科的同居，谨以此留念。

字里行间透露着杨至成与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间深厚的交情。

林利继续回忆说：“那时我也参加了政治班的学习。按说，像我们这些小孩子是不应该参加学习的，但因为我在国内时已上完了中学，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所以也就和大人们一起参加了学习，成为‘杨老太爷’的小同学。”

“当时政治课的内容很多，主要有联共党史、欧洲近现代史、政治经济学、苏联宪法等等。这些课本来就比较难懂，加上我们大部分不懂俄语，经翻译的口译出来后，又多少有点走样，所以听起来很费劲。杨至成只好采取课堂上先拼命记笔记，课后再慢慢消化的办法来学习。我那时年轻，手头快，笔记记得比较全，课后“杨老太爷，经常找我对笔记。他没记全的就一一补上，从不放弃每一个主要问题。再加上他有在黄埔军校政治科打下的底子，理解能力比较强，所以每次测验和考试，成绩都是很不错的。”

已年过七旬，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林利同志，回忆起当年的杨至成，总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苏兆征的儿子苏和清同志回忆说：“30年代末期，我在莫斯科上中学。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学的是俄文，对中文反而不太熟悉。当时我们住在市内，那里的中国同志不太多，所以每当周末我都坐车去郊外的库契诺，找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同志玩。很快我便与杨至成成为忘年交的好朋友，晚上就住在他们那里。他们每人一间屋子，很宽敞，我往沙发上一睡就行了。我在杨至成和李天佑同志那里住的次数最多。杨至成同志学习很认真，经常向我这个小孩子请教俄语，学习俄语对话。他有时把舍不得吃的好东西留给我。我有时带他去市内医院看牙齿，因为他的牙齿不太好。杨至成同志的脾气、性格很好，高兴起来经常爱唱两句京戏。他也爱写诗歌，还摇头晃脑地朗读给我听，经常惹得我们哈哈大笑。那时我们之间就好像小学校的好朋友，根本看不出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

学政治也好，学俄语也好，对军事干部出身的杨至成来说，却始终把学军事、学后勤放在首位来安排。他通过自己参加红军以来的战斗经历，特别注意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功夫。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杨至成将军的书箱中，发现了他当年在苏联学习军事时的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是由解放前我们常看到的那种大红格信笺裁成两半，上下夹着硬纸壳作封面封底，自己钉成的。里面用钢笔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记着听课内容。由于天长日久，笔记本的纸已经发黄，有些地方还有被烟火烧的痕迹。

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

近代军事艺术的基础

什么叫战术？战术就是关于在战地上使用军队的一种科学。战术单位最低级的从步兵排起，最高级的到步兵军。

什么叫战略？战略是关于为了整个战争利益而使用的一个国家全部武装力量的一种科学（陆、海、空军的科学）。

什么叫作战艺术？作战艺术就是在战场上和作战方面使用军队的科学（方面军与集团军）……。

但战争不属于艺术，也不属于科学的领域，而是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

战争是重大利害的冲突，政治是战争发展的母体，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包括在它的胚胎中一样，战争的外貌在政治中潜伏着。

战争艺术对政治不是起决定的因素，政治产生战争。政治是理性，战争仅是它的手段。指导战争而成为战争主要方针的最高观点，就是政治观点。因而战争艺术从其最高观点来说就是政治。

……

关于集团军防御作战问题

近代战争要求集团军既要准备进攻作战，又要准备防御作战，更要搞好进攻中的防御。

工事的发展和炮兵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加了进攻者突破防御阵地的困难。为此，要求大大增加炮兵的数量和质量。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为防御协约国的进攻，每一公里宽的正面，部署了 120 门炮。协约国方面的英法联军使用了大量的坦克，还配合以飞机的轰炸，才动摇了德军的防御阵地。战后有人说，协约国打败德军，不是靠将军们指挥的艺术好，而是靠坦克、飞机，才发挥了突破性的作用。

所以集团军要搞好防御作战，不但要有步兵防御，而且要有反坦克防御和对空防御……

近代防御一般由三个地带组成：

第一是保证地带，第二是军队防御地带，第三是作战地带。

防御地带前沿地一般为 15~20 公里。保证地带纵深一般也为 15~20 公里。防御地带一般分为两个：主阵地带纵深为 6~8 公里，后方地带为 3~4 公里。防御地带后面到集团军作战地带为 20~25 公里，总共集团军防御地带为 60~75 公里。

……

在这个小笔记本里，记载的内容还有集团军作战与航空兵，集团军作战与工兵，集团军作战与炮兵及进攻作战的摩托机械化等，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战例的证明。可见杨至成是下了不少功夫的。

杨至成在军事班学习的内容有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有进攻战、防御战作战指挥的原则与艺术，有诸兵种、大兵团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有战争的后方勤务学等等，光笔记本就记了几十本。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上面一个笔记本里的片段摘录，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红军的总供给部长，为全面提高自己的军事素质，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是怎样在军事艺术的学海中顽强搏击的。

1939 年冬，周恩来副主席因惊马而摔伤右臂，由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在邓颖超同志和他们的义女孙维世的陪同下，来莫斯科治伤，特地到库契诺

来看望中国同志。他听了杨至成的汇报，检查了他的学习情况后，夸他学得认真，成绩不错，鼓励他继续努力，取得养病、学习双丰收。临别时，周副主席特地把他与邓颖超同志的合影照，签上他们两人的名字，送给杨至成作留念。

在异国他乡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杨至成心情很激动，他暗暗下决心：拿出百倍的努力，争取早点学成，早点回国，投入反法西斯的战斗，以实际行动报效祖国。

批判洋顾问季德

在苏联学习期间，杨至成还走出课堂，参加了一些其他有益的活动。

一个活动是参观苏军的各类院校。他出国前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务部长，怎样搞好院校工作，对他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当他参观苏军步兵学校、炮兵学校、空军学院及军医卫生学校时，总是看得很细，并不断发出感叹和提出设想。

“嘿，老刘，你看人家这飞机一大溜一大溜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空军呢！”参观苏军空军学院时，杨至成看着一排排各式各样的教练机，不由得对身旁的刘亚楼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刘亚楼大大咧咧地和他开着玩笑：“放心吧‘杨老太爷’，将来我要是当了咱们的空军司令，一定要搞得比这还好！”杨至成当年在红12军当副官长的时候，刘亚楼也在12军担任连长、营长，两人也算老熟人了。谁知一句玩笑的话，十几年后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现实，刘亚楼果真成了新中国人民空军的第一任司令员。

看见苏军军医卫生学校优美的校舍和良好的设备，杨至成想起延安窑洞里的红军卫生学校，忙对自己的老战友、红军的总卫生部长贺诚说：“老贺，你是我军卫生界的元老，将来回国后一定得建几个像样的军医大学，培养出一批我们自己的专家来。这样，我们有了病，有了伤，也就不用再跑到外国来看了。我主张，在这方面宁可多花一些钱也没关系嘛！”

他俩在苏区时一个是总供给部长，一个是总卫生部长，在办供给学校、卫生学校中，都备尝了各种艰辛，所以这时贺诚对杨至成说：“老杨，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要提高医疗技术，不办好医学院校，就别无选择！”这位1926年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红军最高医务领导干部，解放后曾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总后卫生部部长和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将军，对办好医学院校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通过参观，杨至成加深了这么一个认识：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通过院校培养高素质的指挥人才和技术人才必不可少。这个观念在他的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回国后，在担任后勤领导工作中，亲自主持办了不少后勤学院，并先后在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的岗位上，为培养我军的高级人才贡献了力量。

除了参观苏联的军事院校外，杨至成还参观访问了苏联一些有名的大型工厂和集体农庄，如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列宁国家农场等。他看到了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伟大成就，看到了发展工业生产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作用。他在自己的笔记中写道：“我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革命胜利后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进的、有规模的工业，是

绝对不行的。”他把眼前看到的苏联人民生活的情况和国内人民的生活作着对比，深深感到要把祖国人民从灾难深重的苦海中解放出来，自己这一辈人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满怀信心地憧憬着祖国的美好明天。

杨至成在中央苏区时，主管过军事工业。那时，作为军委总供给部长的他，把不少心思放在了兵工厂、被服厂的管理和生产上。现在，虽然到了国外，但他凭着一种职业的敏感性，觉得将来自己仍离不开抓军事工业。所以他对参观苏联的工厂企业兴趣特别大，问得也特别细。李天佑开他的玩笑说：“我们的大管家，一看见人家的工厂，就羡慕得走不动路了！”

杨至成在国外全力吸收着他认为有用的东西。十几年后，杨至成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第四野故军军需生产部部长、中南军区后勤部部长时，先后在东北三省、中南六省筹建了几十个军工厂；在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轻工业部部长的几年中，又帮助地方筹建了几十家工厂。这 100 多家工厂企业的诞生和建立，无一不折射出杨至成的深谋远虑和创业精神。这里边，也包含着他在莫斯科学到的东西。

大约是 1940 年下半年的一天，杨至成突然接到党支部的通知，请他到莫斯科市内的共产国际总部去开会。同去的还有林彪和刘亚楼。共产国际总部派车来接他们。

到那里以后，他们受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亲切接见。

对于这位著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杨至成早在国内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只是直接见面还是第一次。他看上去已不年轻，约有 60 岁上下，面露慈祥，眼光却很严厉，浑身透露着一股精明强干的气派。

季米特洛夫是保加利亚人，1882 年生于一个工匠家庭。印刷工人出身。1902 年参加革命活动，先后在工会和党内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21 年他参加创建红色国际工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局成员。1923 年 9 月领导武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参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工作。1933 年 3 月，在德国被法西斯以“焚烧国会”的罪名逮捕。在莱比锡法庭上，他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揭露了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的阴谋。在世界人民的声援下，他于 1934 年 2 月获得释放。同年来到苏联。第二年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季米特洛夫回国，担任了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他写的《国会纵火案》一书曾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

这次，季米特洛夫找几位中国军队同志想了解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壮大的情况，还问了李德在中国的有关情况以及大家对李德的反映。最后，他充满信心地对几位中国同志说：“你们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共产党是从错误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党了。你们要紧紧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加强全党的战斗力，夺取最后的胜利！”

季米特洛夫的讲话，杨至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时隔不久，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的错误问题，邀请杨至成等一批中国同志参加。

李德随中央红军到陕北延安后，于 1939 年夏回到了苏联。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错误进行批判。

一提起李德，杨至成不由得怒气满腔，太阳穴上的青筋蹦蹦直跳。这个

洋顾问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造成的损失太大了。杨至成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要求进行批判发言。一开始有点语无伦次：“李德同志来到中国后，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不了解实际情况，却发号施令，乱加指挥，断送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多少人的无谓牺牲……他先搞‘左’倾教条主义，后来又成了右倾逃跑主义……”

杨至成感到自己太紧张、太激动了，说得有点乱，便调整了一下情绪，接着往下讲：“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调集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巧妙运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指挥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时，李德同志来到了苏区。在博古同志的支持下，他们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并剥夺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权，使李德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成为实际上的红军总司令。他冒险指挥弱小的红军去同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战，拼消耗，搞什么‘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完全是一条消极防御的方针。结果使本来可以打破的第五次‘围剿’不但没打破，反而连我们经营了六七年的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无法站脚了……”

说到这里，杨至成的声音变得有点哽咽了。会议主持人忙给他递去一杯水，杨至成润了一下喉咙，接着讲下去：“要撤出根据地了，李德又成了右倾逃跑主义者，慌里慌张地来了个大搬家。他被敌人吓破了胆，不是在主动进攻敌人中寻求有序的战略转移，而是利用几个军团在两边护着，中间形成一个甬道。部队硬顶着敌人的进攻，掩护着首脑机关前进。说白了，仍然是用广大红军战士的生命同敌人硬拼。结果出发不久，湘江一战，使8万名红军损失过半。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的长流水呀！我不知道，将来见了马克思，李德这个号称军事家的共产党员，怎么去向‘老祖宗’交代，怎么去向无数的英魂交代！”

“当然，李德同志的这些错误，是与我们党内当时‘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分不开的。这些，我们党在遵义会议上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我相信，我们的党和广大党员会从这些正、反面的教训中吸取力量，变得更加坚强！”

杨至成的发言，通过翻译传向每一个与会者的耳朵里。不少人边听边点头，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

开完会往回走的路上，刘亚楼和杨至成开玩笑说：“‘杨老太爷’今天可算大出了一下风头，给我们也解了一下气！”

吃晚饭时，不少同志端着啤酒来与他干杯，表示祝贺。杨至成也故作谦虚，笑笑说：“谢谢，谢谢！这是本人完全应该做的事！”

滞留在归国途中

1941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不断蔓延，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向苏联的进攻。随着侵略者铁蹄的疾进，苏联大片领土被鲸吞。不到3个月，战火便烧到了莫斯科城外。在这种情况下，在库契诺的中国同志只好结束学业。

9月份，在苏联人民组织莫斯科保卫战的前夕，共产国际把中国同志集中在莫斯科，暂住在消息报社对面的莫斯科旅馆，着手安排他们返回祖国。

杨至成和同伴们住下不久，防空警报便不断传来，随即德寇的飞机便一批接一批地飞临莫斯科上空，投下一串串炸弹。不少房屋被炸得起火，消息报社的大楼被炸得墙倒屋塌，成了一片瓦砾。杨至成他们住的旅馆大楼也被

震得玻璃破碎，烟尘飞扬。看来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匆匆来见大家，讲了讲当前的战争形势，然后指派苏联的乔尔诺夫少校护送大家回国。杨至成等十几个人在林彪的带领下，从莫斯科坐火车，然后倒汽车，一路向东奔驰。1941年10月，他们到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准备从这里通过边界，到达内蒙的大青山，然后转回延安。大家都抱着急切的心情，想早点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战争。过去，从蒙古国边界骑上快马，一昼夜即可到达内蒙的大青山游击区。大青山有我党建立的交通站，也有我们的骑兵部队活动，可以护送大家到达解放区。所以在不少人的心里，都认为安全回到延安毫无问题。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杨至成他们万万没想到，当他们来到乌兰巴托后，这条交通线路已遭到破坏，日本侵略者的军队严严地封锁了边界，他们无法通过。十几个人，前进不能，后退不得，被困在了外蒙古。眼看到了家门口，却不能进大门，个个心急如焚。

经与有关方面紧急联系，一个多月后，有关方面同意林彪坐飞机回国。因为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115师师长，可以公开回去。其他人因为是秘密出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设法秘密回国。

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最初住在苏联大使馆安排的地方。时间一长，供应发生困难。共产国际派来的乔尔诺夫少校也无法管他们的生活了，便要他们去自谋生路，但不能暴露真实身份。这一点作为纪律要求很严。

杨至成等人感到抑郁难耐，就去找苏联少校质问：“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既不懂俄语，更不懂蒙语，一说话就暴露，叫我们怎么保持秘密身份去找工作谋生路？”

少校答应请示上级。过了几天，他回答说：“只能委屈大家了。你们只能对外讲，是被俘的中国国民党军人，现在坐完一年监狱，被放出来了，暂时回不了国，要找饭吃……”

大家一听感到非常气愤，几个人张口骂了起来：

“他娘的，这简直是对我们的侮辱！”

“是谁出的这个馊主意！”

但是，细想一下，不这样做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革命的利益，他们只得委屈自己，忍辱负重。于是，杨至成去一家农场干苦力，给庄稼锄草；钟赤兵去剧院当卖票人；李天佑和李世英去帮人养兔子；周碧泉去造纸厂当临时工；刘亚楼、卢冬生由于俄语水平高，参加苏联红军当了侦察参谋。贺诚因为懂医，去一家医院当了护士。后来这家医院的内科主任发现他技术娴熟，医疗知识丰富，又提拔他当了医师。当时，贺诚在同伴之中，是挣钱最多的一个。他经常拿出多余的一些钱来周济杨至成等生活困难的同志。当时他们用的都是化名。

过了3个月，李天佑、李世英等人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算骑马越过沙漠，通过中蒙边界，进入内蒙的乌兰察布盟，再跨过黄河，回到陕北去。他们经过一番准备后，在一个交通员的带领下，冒着呼啸的寒风，便骑马上路了。其他人也都怀着急切的心情，企盼着他们的消息。

但十几天后，他们又疲惫不堪地返回来了，说边界上日本鬼子的骑兵巡查甚严，无法通过。看着他们沙尘满身、面容憔悴的样子，大家的心里又压上了一块石头。

北方的严冬早已来到蒙古草原。西伯利亚的寒流，随着漫天的雪花横扫

过来，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四十度。这对于这伙寄人篱下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更增加了他们为生存而奔波的艰难。

冬天农场无活可干，不干活就无饭吃。为了不至于饿肚子，挣得那少得可怜的■口钱，杨至成又给饭店当过跑堂的，干抹桌扫地之类的粗活；也去给人家放过马，在草摊上任凭风吹雨淋……他在苏联恢复好的身体，又很快垮了下来。他形容枯槁，衣衫褴褛，与叫花子差不多。此时，谁也无法把他与中国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总供给部长的职位联系起来。

回祖国，无路可走，连个信也通不了，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返回莫斯科吧，那里打得正紧，苏联人民正全力投入卫国战争，根本无法顾及他们。

杨至成一伙人好像一群被爹娘忘记的孩子，在无依无靠中苦苦挣扎。他们在度日如年的痛苦煎熬中，度完了 1942 年。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在乌兰巴托讨饭行乞

1943 年 3 月，共产国际又派一个叫谢妙恩的 50 多岁的苏联少校，来到乌兰巴托负责处理滞留的中国同志的问题。谢老头把中国同志召集在一起，传达上面的精神说：现在是战争期间，要靠政府供养有困难。中国同志应尽量设法回国去，可以采取多种办法。妇女、文化人和身体不好不能骑马的，可以送到新疆去；实在走不了的，设法找工作，自己找饭吃。

这样，会后一些文化人如搞音乐的冼星海、搞电影的袁牧之以及身体不好的谭家述等同志，就被送到新疆去。但到了边境，因新疆形势恶化，不能过去，也滞留在当地。

为了找饭吃，杨至成经人介绍，到乌兰巴托市的一家中国饭店去干临时工。按上面要求，仍然得用假身份。结果，周围的人一听说他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吓得都不敢接近他，谁见了他都像见了杀人犯一样侧目相视。杨至成感到气愤而无奈，却又不能说明，只好默默地离开这家饭店。

可是，到哪里去吃饭呢？他的肚子正饿得咕咕叫。

他管过红军的总财务、总给养，亲手经管过上百万元银币，上百万石的粮秣。可是现在，身上却一文不名，连买个烧饼的钱都没有了。自古道“民以食为天”，如今没“食”了，“天”塌了。他在街上踽踽徘徊，一趟，两趟……饿得都快走不动路了。

街道两旁的饭馆和小吃摊上，不断飘来阵阵诱人的香味。杨至成开始还流着口水瞅几眼，最后连瞅也不敢瞅了，他怕自己经受不住这馋人的诱惑。唉，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啊！

隋唐时威名盖世的英雄好汉秦琼在穷困潦倒时，卖了心爱的黄骠马，当了手中的双铜锏，才渡过了难关。可是杨至成手头却连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如今饥肠辘辘，饿魔缠身，怎么办？讨饭！他的脑子里突然跳出了这个字眼。

既然“监狱释放犯”都当了，再当一次讨饭花子又何妨！讨饭丢人么？不能那样下结论。

试看天下多少劳苦人民，付出了牛马力，流下了成河的汗，却仍难得一温饱。为了活命，不少人不得不拿起了讨饭棍。他们丢人么？

几年前，当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进军甘新一带时，被马步芳、马鸿逵

的军队打散，不少红军抛尸沙漠；幸存的一些将领和战士，为了回到党中央的怀抱，也是一路讨饭，一路赶脚。他们丢人么？不！不！

为生命讨饭，为革命讨饭，没啥丢人的！

杨至成这么想过以后，心里似乎平静了许多。

他拐进一个华人聚居的小巷，在一家门口，看见一位老大娘在择菜，就开口叫道：“大娘，我是一个过路的，能给一口剩饭吃吗？”慈祥的老大娘，看见眼前这个操着汉话的中年男人，饿得都快站不住了，忙说：“有，有，你等着，我给你去拿！”她进屋去，很快拿出两个乌黑的青稞面馒头，端来一碗水说：“穷家贫户的，没啥好吃的，你就填填肚子吧！怪可怜的！”杨至成接过两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了嘴里，然后一仰头，把一碗水也灌了进去。

此时，他脑子里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些遥远的影子，似乎是在中央苏区，红军打完仗来到一个村庄，老大爷、老大娘拿出吃的喝的来慰问……

世界上好人到处都有。杨至成千恩万谢地向大娘道别后，又走向另一家……

从此一连几天，杨至成一边讨饭吃，一边找活干；但遭了不少白眼，听了不少刺耳的话，也没有找到一份工作。

有一天，他在一家餐馆门前要饭，一个肥头大耳的伙计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不但不给一口吃的，还唾了他一口，吼道：“滚！不要到这里来搅我们的生意，扫客人们的兴！”接着“呸！”一声，又一口唾沫吐在了他的身上。

杨至成心头的怒火直往上升，他后悔不该到这种地方来要饭，受小人们的侮辱。但他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左手一把揪住那个伙计的衣襟，右手提起餐桌旁的一把方凳，一字一句地说道：“给我把你那脏水擦掉！”

伙计鄙夷地看了看地说：“嗨，穷要饭的，还神气起来了！”

杨至成说：“我现在是穷，但人穷志不短，绝不允许你侮辱我，你擦不擦？”

“我没那工夫！”

杨至成不再和他啰嗦，左手狠狠一揪，右手举起凳子朝他腰上顶去。杨至成虽然身体不好，但在黄埔军校和部队的军事训练中练就的功底，依然存在。那伙计虽然长得肥头大耳，却是个■包，一下子被杨至成顶倒在地上。杨至成一脚踩在他的肚子上，一手高高举起凳子，骂道：“你这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今天不把你的脏水擦净，老子就砸碎你的狗头！”

当然，杨至成只是教训教训他，绝不会把凳子砸下去的。

那个伙计吓坏了，忙说：“好，好，我擦我擦！”

这时，那口唾沫其实早就干了，但他还是用衣袖在杨至成的衣服上擦了擦。

杨至成这才放走了他。

杨至成回过身走了几步，突然一个声音喊住了他：“这位大哥，你且慢走，我有话说。”杨至成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他并不认识的人。此人30多岁，穿戴颇为整齐，眼睛大大的，满脸洋溢着热情与坦荡。“你是叫我吗？”杨至成问。

“对，是叫你。你刚才在那家餐馆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了，使兄弟颇为敬佩。”

“不敢，不敢。请问老弟叫我作何贵干？”

“咱们边走边说吧！”

那人把杨至成带到前面不远的一个饭店里，要了两碗羊肉泡大饼，说：“边吃边聊。”

杨至成见那人满慷慨，自己肚子正饿，就不客气地吃起来。心想，不管你是什么人，我吃饱肚子再对付。

那人告诉杨至成，他是山西人，是来这里作生意的。在国外难得见到杨至成这样正直有志的同乡，愿意帮他渡过难关。杨至成当然不会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来这里投亲不遇，没有盘费了。

那人大方地掏出一沓钞票给杨至成说：“亲不亲，故乡人。我看你讨饭也太可怜了，这钱你先拿着用吧！”

杨至成却没有接。他不了解对方，怕对方耍什么花招。那人见他不要钱，笑了笑把钱收起来，随即找到饭店掌柜的，指着杨至成交代说：“老掌柜，这位是我的一个好友，以后他在你这里吃饭，你先记着帐，最后由我结算！”

老掌柜显然与那人是老交情，满口答应说：“你放心吧，保你们满意！”

“另外，你也帮他打听打听，哪里有什么工作，给他找一个。我将来一定重谢！”

“好，好，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从此，杨至成便暂时吃住在这家饭店里。

半个月后的一天早晨，那位山西老乡突然不见了。问饭店掌柜的，说那人已经走了。他的饭钱那位山西客人已给结了帐。杨至成正感到莫名其妙，当天上午一位叫张罕的人来找他，约他出去谈话。

张罕是中国湖北人，在当地一家机关工作。不久前，苏联来的谢妙恩曾介绍杨至成与他认识。杨至成不知他找自己有何事。

张罕把杨至成带到一间办公室，问了问他的情况，接着告诉他：“受朋友的委托，帮你找了个工作，是到中国工人报社去作编辑，怎么样？”

《中国工人报》是在乌兰巴托出版的一张中文报纸。杨至成有点担心地问：“当编辑？我……行吗？”

张罕热情地说，“没问题，我找一个熟人带带你。你有文化，一定可以胜任的！”

论起文化，杨至成自信还是可以的：当兵前，上过中学；当兵后，上过黄埔军校，学的是政治科；最近又在苏联学了两年多，各科知识灌了不少。于是他便满怀信心地随张罕来到了中国工人报社。

张罕把杨至成介绍给报社一个负责人王西。杨至成一看，这是位30多岁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待人热情，没有一点架子。

王西给了杨至成一些钱，让他上街买些衣服和日用品，以后就吃住在报社里。

杨至成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这身破旧的衣服，与知识圈里的编辑形象相距甚远，是得打扮打扮、换换装了。

杨至成上了一趟街，买了一套符合编辑身份的服装穿了起来，然后住进报社大院，总算结束了讨饭、流浪的生活。

正式工作了。王西先让杨至成试着编了几篇稿子。他审阅后，肯定了杨至成的文字基础不错，但在编辑技巧上还要下一番功夫。接着，他就告诉杨至成，怎么根据当前形势选稿、组稿，怎么根据主题需要改稿、编稿，怎么制作醒目的标题，怎么定眉题、副题等等。他边讲边举例。杨至成听得津津

有味，脑子大为开窍。

报社人手不多，杨至成既要当编辑，又要做记者，下到工人当中去采访。

这时，王西又告诉他采访应该注意哪些事项；新闻消息怎么写，什么是新闻的导语、主体和结尾；通讯应该怎么写，什么是人物通讯和工作通讯；评论应该怎么写，怎么确立论点、论据等等。

总之，杨至成感到王西这个人很不错，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虽然报社每月只发给他 200 元的薪水，生活仍然紧紧巴巴，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杨至成怀着感激的心情，总想探听王西的身世和来历，但王西总是笑而不答。直到全国解放后，王西以吉雅泰的名字被任命为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时，杨至成才明白了这其中的一切。

杨至成的工作生活虽然安顿下来了，但这里毕竟非久留之地。每当夜深人静，他仰望长空明月，常常自叹：何日才能返回祖国，参加到轰轰烈烈的战斗中去呢！

打更守夜在乌兰乌德

时间老人不管你着急不着急，它总是按自己的章法，不紧不慢地走着。眨眼间，杨至成到报社工作已半年了。这期间，他几次去找谢妙恩，探听回国的事宜，总是没有消息。

1944 年的元旦刚过不久，谢老头找到杨至成说：“莫斯科来电报了，要你返回苏联去，你准备准备走吧！”

原来滞留乌兰巴托的十几个中国人，有的已送往新疆，有的已返回苏联，有的被安排在苏军工作，几乎都走光了。李天佑和李世英二人实在等不及，也于去年 8 月第二次冒险，骑着骆驼向西越过沙漠无人区，再过宁夏大草原，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线，绕道几千里，返回祖国去了。他们在途中九死一生，经过将近 9 个月的跋涉，经历了无数风险，于 1944 年 3 月 28 日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延安。

这时，留在蒙古还没有着落的就剩下杨至成了。他想，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让他返回苏联是可能的。因为这时，苏联的卫国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德国法西斯已经处于败退之中。

杨至成正发愁自己不会俄语一个人怎么走，谢妙恩这时大概也想返回莫斯科去，自告奋勇要亲自护送和陪同杨至成返苏。杨至成自然十分高兴。

当时乌兰巴托与莫斯科尚未直通火车，需要坐汽车一直向北，经过两天的行程，到达苏联的乌兰乌德市，再从这里坐通往莫斯科的火车。

真是好事多磨。2 月份，当谢妙恩与杨至成坐汽车经过两天颠簸来到乌兰乌德时，又接到了莫斯科来的电报，说战争还未结束，不让他们回莫斯科。

杨至成气得和谢妙恩吵了一顿，但也没有办法。处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他只好在此又住了下来。

人每天要吃饭，生活问题怎么解决？

好在这里已是苏联地面，谢老头出面与当地赤色互助救济会联系，由他们把杨至成接收下来，每月发 300 个卢布，供他生活用。

互济会是苏联内务部管辖下的一个公益性和救济性组织，每年的救济金都由上级拨款，主要资助国外或兄弟党来苏联学习、治病而无生活来源的同志。

300 个卢布，要在平时还勉强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但战争时期，物资困难，住在城市开销大，杨至成的生活过得很紧巴。

陪他来的谢妙恩，把他托给互济会后就离开了，是回莫斯科了还是回乌兰巴托了，杨至成不清楚。

一天，内务部门的一个官员找到杨至成说：“住在城市，物价高，生活困难，我们想送你到城外一个集体农庄去住，那里生产的东西多，生活可能会好一些，你看怎么样？”

在莫斯科学习时，杨至成参观过集体农庄，农庄农民们幸福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曾把苏联集体农庄的今天看成中国农民的明天。于是，他痛快地答应了。

这样，杨至成就从乌兰乌德互济会的宿舍里搬到市郊的一个集体农庄住了下来。庄员们以农民特有的淳朴来欢迎这位中国客人。在这里，杨至成不必再以“监狱释放犯”的身份出现；但当地领导对他的真实身份也不清楚，只知道他是位中国同志，对他的接待还是不错的。

但离开了祖国，离开了组织，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战友，他心里难得一日平静，却积存了越来越多的焦虑与烦躁。夜里，他常常梦见延安，梦见战友和亲人。他常把农庄轰隆隆的机器声，当成抗日前线的枪炮声；把牧场奔腾的马群，当成战场上驰骋杀敌的勇士……他思啊，想啊，焦躁，抑郁，精神恍惚。终于有一天，多年未犯的羊角风发作了。他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浑身痉挛，不省人事。住在隔壁的一个苏联老头发现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急忙去喊农庄的医生。

农庄卫生所的一位女医生匆匆赶来了。她又是揪耳朵，又是掐鼻子，经过一番救治，杨至成才慢慢苏醒过来。

因怕这位中国客人再发病，农庄主席便找了辆车，把杨至成送回了乌兰乌德市，交给互济会，让他住在这里治病。

过了一段时间，杨至成的病情平稳了，他不想再回集体农庄去。这时，互济会的人开始对他冷淡起来，并告诉他，尽量找个工作干，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互济会的经费很困难，不能长期供他吃和住。

杨至成再一次被逼上了困境。他看着自己羸弱的身体，不知能干什么工作。

后来，有人介绍杨至成到一家贸易公司去守夜看仓库。这个工作虽然要熬夜，比较辛苦，但可以在那里住宿，不用再租房子了，能节省一些费用。杨至成已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因不懂俄语，别的工作干不了，只好去给贸易公司看仓库。

晚上，杨至成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仓库的一间屋子里，还必须时常出去巡逻一番。看着眼前的情景，他想起了过去看过的一出戏《玉堂春》。《玉堂春》里的那个王三公子王景隆，在未中状元之前，因与烟花女苏三交好，致使他银钱用尽，穷困潦倒，最后只好去给礼部衙门巡更守夜。如今，自己虽然不是王三公子，也绝非胡乱挥霍导致穷困，但一个红军的总供给部长来给一个贸易公司巡更守夜，也是够为难他的了。

他有点自嘲地说：“巡更守夜人，但愿你早点能有出头之日吧！”

这个仓库里，存放着贸易公司的不少货物和商品。杨至成知道自己责任重大，所以每天夜里都要起来巡查几次。他还专门向公司要了一支猎枪放在身边，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两个多月过去了，一切平安无事，他心里也踏实

了许多。

10月份的一天早晨，杨至成住的小屋门突然被撞开了。接着，拥进3个警察，带着1只警犬，围着他嗅了好几遍，又在他的屋里翻找了半天，最后把他看守了起来。

杨至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又听不懂他们的话。当然，他的愤怒责问人家也听不懂。吵了半天。找来个翻译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仓库失盗，一批货物被人偷走了。人家怀疑是他合伙作案。

杨至成一听，脑袋一下木了。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他算倒霉透了。

喊冤，辩解，没有用。

警察通过翻译告诉他：在没有查清案情之前，不能放他。

杨至成欲哭无泪，痛苦不堪。他感到自己的精神快要崩溃了。

过了两天，贸易公司的一位副经理（是个40多岁的女人）找到警察替杨至成开脱说：“这是一位中国同志，他不懂我们的话。仓库失盗的责任，我看不一定在他。你们先不要抓他，等案情查清后再说。”

这样，杨至成才被解脱看守。后来，真正的盗贼查到了，杨至成的冤情才被洗掉。

杨至成不想再看仓库了，要求互济会另给换个工作，但一直没有结果。

这里的冬季，气温降到零下40多度，夜里更是寒气刺骨，滴水成冰。杨至成打更守夜，受尽凄苦。日子一久，身体瘦成了一把骨头。不久，又犯了羊角风，折腾了好几个钟头才苏醒过来。晚上，睡在冰冷的床上，杨至成心里十分难过。他想，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送自己来苏联疗养和学习。好不容易把身体恢复好了，谁知在归国途中却遇到一个又一个劫难，养好的身体又给弄垮了。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组织的关怀与领导的期望！应该想个办法，赶快解脱目前的困境。最后，杨至成终于想出了个办法。

第二天，他把自己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工作职务，写了个履历表式的简介，请人翻译成俄文，然后找到乌兰乌德党委机关管外事联络的负责同志努斯卡娅，把材料交给了她。

努斯卡娅是位60多岁的女同志。她看了杨至成的材料后，才知道面前这位又矮又瘦的中国同志是红军的高级领导人。然后，她用那浅蓝色的眼睛打量着杨至成，慈祥地笑着问了一些情况，并表示了歉意。当她知道杨至成是共产国际请来在苏联学习、养病的客人时，对他更加敬重，决定让他搬到一家残疾人疗养院去休养，并答应立即同莫斯科联系，让他尽快返回到莫斯科去。

真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努斯卡娅同志的关怀下，杨至成住进了生活条件不错的疗养院，并在这里度过了1945年的元旦。

杨至成掐指一算，他从蒙古来乌兰乌德，又近1年时间了。他日夜盼望着返回莫斯科去。

努斯卡娅老太太真是个好人，她很理解杨至成的心情。2月初的一天，她委托疗养院给杨至成买了一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把他送上了火车。

杨至成含泪向他们告别，向乌兰乌德告别。

他遇上了两个“女菩萨”

这一段路程好遥远哟！杨至成在火车上经过了4天多时间的颠簸。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火车终于停在了莫斯科。

这时，苏联红军已把德国法西斯军队赶出了国境，战争正在东欧一带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杨至成走出车站，看到战后的莫斯科正在恢复，尽管有些地方还留有炸塌的建筑物和毁坏的道路和树木，但人民的生活基本上是平静的。

该到哪里去呢？此时，这个问题占据了他脑海的全部空间。尽管在火车上他对这个问题已想过无数遍。但总是自己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等到了以后再说吧！如今，他已经站在莫斯科街头了。

他踟蹰街头，苦思冥想，理不出个头绪来。按说他应该回原来学习养病的库契诺去；但他在乌兰乌德时听苏联同志说，共产国际已于前年解散了。现在那个机关肯定已不存在，也不会有中国人住在那里了。

但不去那里，又去何处呢？碰碰运气吧，说不定在那里能找个歇脚吃饭的地方呢。

于是，他摸索着向库契诺赶去。过去从库契诺来市内看病时，有车送，有人陪，所以路线不用发愁。现在要他一个人找到那个地方去，他真不知道该怎么走，也不知道该坐哪一路车。问人吧，他不懂俄语。几年前每周一次的俄语课，学的一些单词早忘光了。是他的脑子笨吗？不全是，那时他们这些老干部总感到时间有限，认为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军事课上；而俄语即使学得再好，回国后不一定能用得上。所以，在苏联待了几年，连几句俄语的日常用语也应付不了。现在真有点后悔莫及了。

杨至成一边打听，一边摸索，坐一会儿车，走一会儿路，从早晨下火车不久一直折腾到下午，总算摸到了库契诺——这个他曾经生活过两年多的地方。但是，这里却没有了往日的欢乐和温馨，一把大铁锁牢牢地锁着两扇大门。

杨至成感到一瓢凉水迎面浇来。他比划着向附近的一户居民打听这里的人都到哪里去了。人家只是摇头，表示不知道。

此时，杨至成又累又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这才想起自己已有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本来，从乌兰乌德出发前，努斯卡娅给了他一些零用钱，叫他在火车上买面包吃。上车后一问，才知道火车上的东西太贵。他舍不得多花钱，所以坐火车的4天中基本上每天只吃1顿饭。他本想到莫斯科以后再好好吃一顿，但下车后忙着找住宿地，吃饭的事又耽误了。

他看见那户居民在吃晚餐，面包的香味强烈地刺激着他的味觉。由于附近没有商店和餐馆，他准备用卢布向那户居民买两块面包吃。他往衣兜里一掏，大吃一惊，装在那里的50个卢布没有了。他又仔细搜寻了一遍，仍然空空如也。要知道，那是他目前全部的钱财呀！

他回忆起，上午来这里的途中搭过一段公共汽车，当时车上人很挤，钱肯定是在车上被人偷走了。真可谓“麻绳偏从细处断”。他心里暗骂那个小偷，为什么偏偷我这缺钱之人！

肚子在咕咕叫着，他本想厚着脸皮去向那户居民讨点吃的。但他知道，战争使苏联经济遭到破坏，现在每人每天的粮食都是定量配给的，谁也没有多余的。

饥饿难耐，他双手在身上乱摸，突然手在裤兜里触到一个什么东西。他

掏出一看：啊，卢布，一个半卢布！他想起来了，这是上午买公共汽车票时售票员找的零钱，被他随手装在了右边裤兜里。钱与手绢裹在一起，所以刚才没有找到。

这微不足道的一个半卢布，平时连1包次等烟都买不到，现在却成了他的救命钱。

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那户居民门前，连说带比划，终于用这一个半卢布从他们那里买来1个黑面包，外带1碗土豆片汤。他狼吞虎咽地把这些东西填进了肚子里。

天色已晚，不能赶路了。杨至成便在那户居民堆放杂物的偏屋里抖抖瑟瑟地住了一晚。天气太冷，他冻得一夜没有伸开腿。

第二天天刚亮，杨至成便饿着肚子，向莫斯科市内赶去。他没有钱，不能坐车，只有走路了。

40千米路，对一个几天没吃饱饭、浑身软弱无力的人来说，要一步一步走完，得付出多少力气啊！但杨至成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现在的困难比起那时来，算得了啥！他在心里暗暗地鼓励着自己。

下一步该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一边行路，一边在脑海里搜寻着自己熟悉的或者有关的单位：国防部，外交部，联络部……他一一摇头否定了。那些机关太大，自己这么一副模样，人家不会接待的。那么，还有哪些熟悉的单位呢？

他想呀，想呀，脑子里突然迸出一个单位的名字来：留克斯！

对，留克斯！几年前在莫斯科学习时，同志们嘴里经常提起这个地方。他去市里看病时，也常从那里经过，只是没有进去过。

留克斯是个什么单位呢？原来是高尔基大街一个旅馆的名字，后来共产国际把它租赁过来，作为宿舍用，不少外国党的代表团来后也都住在那里。当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及其他一些人如陈潭秋、王明等都在那里居住过，说不定那里能找到中国同志呢！

心里有了目标，杨至成多少感到一点轻松；虽然这个目标不一定能有用。

大约中午时分，杨至成气喘吁吁、满脸虚汗地赶到了莫斯科市内。这40千米路，几乎把他的力气耗尽了。只有消耗，却没有补充，因为他没有钱买饭吃。

偌大的莫斯科，留克斯在哪条路、哪条街，他并不熟悉。问人吧，他不会俄语，问不清。好在“留克斯”3个字的音他是知道的，问路时只要一说“留克斯”，有人便会给他往前指一指。走了一段后，他又比划着问“留克斯”，有人又给他往左指一指；再走一段后，当他问起“留克斯”时，有人又给他向右指一指……他相信，不会有人骗他，但由于不熟悉路径，他便在莫斯科市内推磨似地打起转转来。

当他走得头昏脑胀、一步也迈不动时，终于找到了留克斯所在地——高尔基大街10号。

杨至成艰难地迈进传达室的门坎，往一张破椅子上坐，便一滩稀泥似地瘫在了那里。

传达室的苏联同志被他弄得莫名其妙。问话吧，他说不清，看样子也没有气力说。但他们看出这是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同志，便拿起电话给住在这里的林利同志打了个电话，说来了个中国人，讲不清话，请她下来看一看。

下面,是1994年11月10日,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那时,共产国际解散了,我们留在苏联的同志归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当时,我同孙维世同志住在留克斯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义女,1939年陪同周恩来来苏联治病时留在苏联学习,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文化大革命’中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接到传达室的电话后,我下楼一看,原来是‘杨老太爷’——杨至成。当时他整个人瘦得都变了形,满脸灰白,话都讲不出来了,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坐在椅子上的身子往下直溜,看样子是虚脱了。我看他没力气说话,就说:‘你等着,我给你去拿面包吃!’,当时我们的面包很少。战争期间供应是配给制的,而且得干工作才给吃的。当时我在电台帮助搞翻译,女同志饭量小,宿舍里还留有两个面包。

“当我拿来面包赶到传达室时,却找不到杨至成了。我想,他刚才昏昏沉沉的,也许没有听清我的话,见我走了,以为不愿接待他,所以又离开了。

“我着急地四处去找。好一会儿,他又转回来了。他说他昏倒在街上,走不动了。我忙扶他坐下,把面包一点点喂在他的嘴里,又倒了些开水让他喝下去。等他有了些力气,才扶他来到我们宿舍。

“我拿起电话,向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管我们的一个同志汇报了杨至成同志的情况。他很不错,当即安排杨至成同志在留克斯住了下来。当时,住在留克斯的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青是一个人一大间房子,他们便安排杨至成同毛岸青住在一起,一切生活问题由联共对外联络部管。杨至成住下后,与毛岸青很合得来,他还经常帮助岸青料理生活,两人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为了治好杨至成同志的病,使他的身体很快恢复,我和孙维世两人轮流陪同他去医院看病,给他带路,作翻译。几个月后,杨至成同志的身体便明显地好了起来,脸上气色也红润了……”

是的,杨至成很庆幸自己在这里碰到了好人,遇到了两个“女菩萨”。多年以后,他还常常对子女们提起林利、孙维世对自己的救命之恩。

1945年下半年,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德国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都先后战败投降。

杨至成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联系回国,都未成功。当时国内的交通要道都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抗战一胜利,他们便纷纷出动军队,与共产党抢“桃子”吃。我们党和军队的势力正在向各地发展。党中央从延安和各地派出大批干部和部队,去开辟东北解放区,可望很快打通与苏联的边境通道。

这样,直到1946年1月16日,杨至成才同在莫斯科学习的李立三、袁牧之等同志一起搭乘苏联的一架军用飞机回到了东北,回到了阔别8年的祖国。

就任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

1946年1月,杨至成从苏联回到了阔别8年之久的祖国。在哈尔滨一下飞机,双脚踏在祖国土地上时,他激动得难以自持,真想趴在地上,用脸紧贴着机场旁边的草地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在哈尔滨稍事休息后,2月初他便匆匆南下辽宁,去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及党的东北局所在地抚顺市报到。那时,部队刚在秀水河子打了一仗,毙伤俘敌1600余人。这是我军在东北反击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个歼灭战。战后总部

移驻抚顺市。

杨至成没想到，进门第一个碰到的是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同志。真是太巧了，1938年他出国赴苏路过兰州时，伍修权是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是伍修权把他们几个人送走的；如今回来第一个碰上的又是伍修权。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长久地握着。

接着，杨至成又见到了民主联军的副总司令萧劲光、政治部主任陈正人、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和副部长兼卫生部长贺诚等一批老同志。他们都是中央苏区时的老战友，现在又重逢于战火四起的东北大地，他心中真有说不出的激动。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是林彪，政治委员是彭真，副总司令还有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副政委是罗荣桓、高岗、陈云。

中共中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基本上一起行动。东北局书记是彭真，副书记是林彪。

杨至成被安排住下后，伍修权又带他去见了东北局和总部的几位领导同志，领导同志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当天晚上，伍修权又到杨至成的住处，向他谈了目前东北地区的局势和我军的战斗情况。杨至成这才了解到：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为了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成立了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并由美国军舰海运第13军、第52军等部队到东北，迅速向各个大城市进军，占领军事要地，为发动全面内战做准备。

我党中央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狂妄野心，将东北建成我党我军的主要战略基地，以便支持关内解放区的斗争，于1945年9月15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并由各解放区迅速派出部队海陆并进，兼程向东北进发，与国民党争夺应该归于人民的胜利果实。

目前，中共中央先后派到东北来的党政军负责人已有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林彪、李富春、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吕正操、萧劲光、万毅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李立三等。还有其他干部2万余人。从各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队达11万人。初来时，进军东北的部队通称东北人民自卫军。今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卫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

现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虽已发展到了20几万人，但与已运达东北的30多万敌军相比，仍处于弱势。首先，许多部队从南方和关内初到东北，没有后方依托，缺乏群众基础；其次，近一半人员是新成分，缺乏必要的训练和锻炼。此外，当前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多为伪军和地主土匪武装所盘踞，许多群众对我党缺乏了解，而对国民党却存在幻想。因此，我军在当前还不可能阻止国民党军队对铁路干线和大城市的控制与占领。鉴于这些情况，党中央要求东北我军“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中央指出：“我党在东北的重心是群众工作……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目前，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正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以主力的大部在地方部队的协助下，在广大地区清剿伪匪，发动群众，

建立根据地；以主力的另一部分编为机动作战部队，打击分散孤立之敌，收复一些中小城镇。

以上，便是杨至成回到东北后，面对的形势和我党我军当前的任务。

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报请中央军委同意后，决定任命杨至成成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叶季壮，副部长是贺诚，参谋长是孙然。总后勤部下属的机构有：供给部，由高志洁任部长，王锡元、高文智任副部长；卫生部，由贺诚兼部长，孙仪之、张汝光任副部长；兵站部，由李长伟任部长；军工部，由王逢源任部长；铁路管理局，由郭洪涛任局长；东北银行总行，由叶季壮兼行长。

1946年2月底，东北局又成立了东北财政经济办事处，与总后勤部合署办公。办事处主任由萧劲光担任，副主任由叶季壮、杨至成担任，统一领导对部队的供给工作和后方的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及敌伪军装备物资的没收管理和分配工作。

民主联军总部的领导同志抽空接见了杨至成。1941年林彪同杨至成从苏联回国途中，曾一同滞留于蒙古。后来林彪得以先期回国，一晃已过去4年多。这次见面，林彪对杨至成说：“你在苏联学习过，算是留洋了。要把学到的东西用到做好后勤工作上来。过去在战斗中，有的做后勤工作的人员只晓得单抓后勤工作，与战斗脱节；而有的指挥人员也只晓得打仗，与后勤脱节。两方面结合不好，在战斗中吃亏不少。在这方面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杨至成点头称是。他在苏联学习军事课——兵团指挥时，曾专门研究过作战中军事指挥与后勤保障的关系问题。

当杨至成问及当前后勤工作应抓什么时，总部的领导告诉他说：“目前，我们的困难很多，蒋介石把他的五大主力中的两大主力——新编第1军和新编第6军都调到东北来了。另外，除了已到的第13军、第52军外，第60军和第71军也开始往这里移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当前后勤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南满的弹药、武器、装备等物资和医院向北满转移，在延吉、牡丹江、佳木斯方向建立我们的大后方。那里铁路多，交通方便，容易与前方联系。

“另外，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日本投降后，还有很多弹药、物资埋藏在秘密的地下仓库，你们应该想办法把它寻找出来，为我所用！”

几年来身处国外境遇坎坷的杨至成，好久没有听领导同志直接谈话了。现在一踏进国门，就从总部领导那里了解到目前的形势和工作重点，他心情十分激动。

就这样，一个多月前还寄人篱下的杨至成，今天又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曾几何时，不名一文的他，现在又成为经管几十万军队后勤大家业的管家人了！

对搞好自己的工作，杨至成充满了足够的信心。

惊闻婚变

1946年杨至成从苏联回到祖国时，已经43岁了。他多么想早点见到自己的妻儿啊！

出国前的1937年初，担任军委总兵站站长的杨至成，在延安组成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是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的一位女红军钱家华。

钱家华是一位四川姑娘。她上有3个哥哥，两个姐姐。3个哥哥中一个参加了国民党军队；两个参加了红军，先后都为革命牺牲了。

1933年，不到16岁的钱家华，由于受当红军的两个哥哥的影响，参加了活动在家乡一带的红军。她在部队里当宣传队员，唱歌跳舞是她的拿手好戏。当然那时她唱的歌主要是家乡的山歌和民歌，跳的舞也是民间舞蹈。她嗓音响亮，人们都说她唱起歌来，声音能传几里远。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钱家华又担负起看护员的工作，给打仗负伤的同志换药，端屎端尿，有时还要抬担架。这些工作她都干得很出色。红军长征时，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她和四方面军的不少红军一样，一连过了3次草地，吃尽了苦头；但她咬牙挺过来了。她对革命一直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态度。

说起杨至成与钱家华的相识，也是很有戏剧性的。1936年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会师。年底，钱家华跟随部队来到陕北。部队进行工作总结时，各单位评选出了先进模范人物。钱家华因工作积极，能吃苦耐劳，服务热情周到，被评上了先进分子。

一天，杨至成作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后勤部长和总兵站站长，与总卫生部长贺诚及时季壮等领导，一同来医院看望工作人员与伤病员，并接见评上先进分子的同志。

钱家华和被评上先进分子的其他同志，胸前戴着大红花，站成一排，等着首长们接见。那年，钱家华已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长得比一般四川女同志高出半头。长征完后，经过一个月的调养，她脸色变得红润而俏丽，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杨至成握着她的手，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这事被跟在后边的贺诚瞧见了。往回走的路上，贺诚便开起了杨至成的玩笑：“怎么样杨部长，我们卫生战线人才济济呀！你是不是对那位大个子姑娘有点意思了，要不要我给你当当红娘？”

他俩自在瑞金时，就一个是总供给部长，一个是总卫生部长，是后勤战线的老搭档，说话一般不拐弯子。

杨至成脸红红的地说：“再了解一下人家女方的情况嘛……”

在旁边的时季壮打趣地说：“都老大不小了，还羞羞答答干什么，痛快点嘛！”

钱家华没有想到，暗中她已被人“私订终身”了。过年不久，院领导便找她谈话，说要给她介绍一位领导同志作丈夫。

钱家华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心里有点慌。她去向本院的一位老大姐请教，看应该怎么办。老大姐告诉她：“这事要由你本人拿主意。”钱家华说：“其他倒没有啥，就是他的年龄有点大，已经30多岁了！”

但是，最终她还是同意了。

于是，在1937年初春的一天，在陕北的一个窑洞里，杨至成和钱家华把各自的行李搬在一起，度过了洞房花烛之夜。那时生活艰苦，想奢侈一点也没条件。

两人都是长征过来的同志，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婚后，杨至成十分珍惜自己这新组成的家庭。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有空，他总是陪伴着妻子，或在油灯下教她认字，或在延河畔边散步边憧憬未来的生活。钱家华没上过什么学，杨至成决心帮她补上这一课。

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钱家华悄悄告诉杨至成：“我……我有了！”她

是搞医务的，懂得这一点。

“是吗？呀，太好了！”杨至成高兴得嘿嘿直笑。他已30多岁了，需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时，红军的生活很清苦，营养品很缺。为了使妻子怀孕的身体壮实一点，杨至成哪怕自己吃糠咽菜，也要把好一点的东西留给妻子吃。

钱家华过意不去，说：“你工作繁重，要注意身体才行。我身子骨壮实，长征那么苦都挺过来了，不需要吃那么好的东西！”

杨至成说：“情况不同嘛，那时你是一个人，现在加上肚子里的，是两个人了！要为我们的孩子着想哟！”

1938年2月，钱家华生下一个女孩。杨至成高兴得抱着孩子又看又亲，说：“像我！像我！”他们给女儿起名叫玉明，愿她像一块玉那样纯洁明净。

4个月后，杨至成因身体状况不好，被中央派去苏联疗养并学习。尽管他不放心刚刚降生的孩子，但他深知这是组织上的关怀，机会来之不易。革命的路程还长，没有好身体这个本钱，工作是不能持久的。所以他愉快地答应去苏联疗养。

为了安慰自己的妻子，杨至成告诉钱家华：“我会很快回来的。虽然组织上没有定下要去多长时间，但我想快则多半年，慢则一年多，不会太长的！”

杨至成看到钱家华有点心慌，又去找了自己的好友、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以及郭天民同志，委托他们帮忙照管一下自己的妻儿。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

临走时，杨至成抱起长得胖胖乎乎的女儿，吻了又吻，说：“好孩子，等着爸爸吧，爸爸会很快回来的！”

孩子的嫩脸蛋被他的胡子扎得哇地一声哭了。

到苏联后，浮在杨至成脑子里，总是女儿那挂满泪珠的可爱的小脸。他想，等自己再回到祖国时，女儿一定会用一张甜甜的笑脸迎接自己的。

但他到苏联以后，情况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在国外的时间不是多半年，也不是一年多，而是漫长的8年。他落难在国外，根本无法与家人通信联络。在国外的2700多个日日夜夜里，杨至成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延安，怀念着国内的妻儿。多少次，他在梦里与妻子女儿相会，醒来后只能面对窗外异国的天空摇头叹气。

当他将要踏上祖国的土地，回到同志们中间时，他曾一次次设想着和妻子女儿相会的场面，想象着已长成8岁的女儿会是个什么样子，以及第一次叫自己“爸爸”时，自己心头洋溢的那甜蜜的滋味……

当杨至成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见到叶季壮同志时，寒暄过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自己妻儿的情况。因为他从延安去苏联时会委托叶季壮照管她们。

没想到叶季壮却有点闪烁其词：“这……你先休息休息吧，有话以后再说……”

杨至成能休息得了吗！他更着急了：“老叶，你……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告诉我，她们究竟怎么样了？”

“她们都很好，不过……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情况是这样的……”叶季壮终于告诉杨至成，“由于你一去毫无音讯，后来又听说你从新疆回国途中被敌人杀害了……所以钱家华同志便带着孩子改嫁了。我们也劝过她，但终于未能扭转过来……”

如五雷轰顶，杨至成感到眼前发黑，几乎跌倒在地。

叶季壮急忙扶他坐下，劝他想开一些，告诉他：“孩子的继父也是部队一位搞军工生产的老同志，对孩子是不错的。”

杨至成呆呆地坐在那里，这个打击对他太大了。他内心暗暗自语：“我的命运为什么这么悲苦！家庭又一次破裂了……四次了……我真有点受不了……”

是的，这已是杨至成第四次失败的婚姻。

被枪声击破的家庭

杨至成的第一次婚姻，是他在贵州三穗县老家完成的。那是在他还不满18岁时，母亲为了拴住他不安定的心，替他包办下的一桩他根本不同意的婚姻。女方是比他大1岁多的陈春兰。

这桩婚姻随着杨至成的离家出走，就宣告完结了。

杨至成的第二次婚姻，是1928年秋在井冈山上完成的。这年1月底，杨至成随朱德同志领导的在南昌起义中失败的部队，在湖南的宜章县举行了湘南起义，宣布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杨至成在师部当副官长。

如火如荼的革命火焰，不久便燃遍了附近的郴州和耒阳等县，各地群众纷纷起来闹革命。几个县相继建立了工农政权，广大男女青年纷纷要求参加革命军。当时耒阳县有一批先后从衡阳市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其中包括伍若兰、伍道清等，也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伍若兰和伍道清既是同学，又是同村老乡，一起在革命队伍里搞宣传工作。

不久，伍若兰和朱德师长结了婚。作为师部副官长的杨至成参与操办了他们的婚事，同时也就认识了伍若兰的好友伍道清。

1928年4月，朱德率领部队与毛泽东会师于井冈山。同时到井冈山的还有宜章、郴州、耒阳等地起义的农军。伍道清也上了井冈山。她比伍若兰小两三岁，显得小巧玲珑，活泼泼辣。有时她们随部队一起行动，一手提石灰桶，一手拿大毛笔，在墙壁上刷标语，还在广场演节目；有时她们跟着工作组到农村去，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农民分田分粮，建立基层政权。连毛泽东、朱德都夸她们是一伙厉害的湖南妹子。

杨至成在井冈山担任留守处主任时，与伍道清接触更多了，两人慢慢产生了感情。那时，随着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一次又一次的“进剿”，战斗任务十分频繁。两人虽然没有时间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但彼此心里都装着对方。

伍若兰看出了两个人的意思，便在旁边给他们添火加油：“你们都主动点嘛！革命战士在战场上能冲锋陷阵，这事上何必扭扭捏捏！”

在一个月明星朗的晚上，在茨坪北山根的一片竹林旁，杨至成约伍道清来这里会面。

两人都坐在石头上，作为男方杨至成首先开言道：“道清，你……你对我有意见吗？”

“有，当然有！”

杨至成吃了一惊，忙问：“那……哪方面的？”

“你，你为什么……”

杨至成急得直喘粗气：“你倒是快说呀！”

“你……你为什么主动找我！”

杨至成一听，扑哧一笑，把心放在肚子里，忙说：“我检讨，今后一定主动！还有什么吗？”

“当然有。”

“那就请讲，我洗耳恭听。”

伍道清靠上前来，抓住杨至成的手，柔声问道：“至成，你身上的伤怎么样了？今后打仗，可一定要注意哟！”

杨至成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也紧紧抓住伍道清的手说：“谢谢！你放心，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我看你最近又瘦了，要注意休息！”

“你也瘦了！现在要安心休息不可能，等将来打败敌人后，我们再好好安逸地休息它3天吧。不，休息它1个星期！”

“至成，你说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呢？”

“这……我可说不准。不过，不论经过多少曲折，我相信总有一天革命会在我们手中取得胜利的！”

“对，我也相信！”

两个年轻人共同憧憬着胜利的明天。

9月的一天，在朱德、伍若兰夫妇的关怀下，24岁的杨至成与19岁的伍道清结为夫妻。一间简陋的茅草屋成了他们的洞房。伍若兰领着宣传队的姐妹们还来闹了一阵新房呢！

井冈山生活的艰苦是人所共知的，但艰苦中也有甜蜜。两个多月后，伍道清告诉自己的丈夫，她怀孕了。杨至成一听，自然十分高兴，但高兴中也带着一点忧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随时可能打仗，有了孩子，会带来多大的拖累呀！

年底，湘赣两省的敌人开始发起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1929年1月1日，国民党军队的“会剿”总指挥部在江西萍乡成立，以何健为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指挥6个旅18个团的兵力，分5路向井冈山杀来。一时间，井冈山四周炮声隆隆，战云密布，紧张的气氛攫住了每个人的心。

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研究对敌方略，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即由朱德、毛泽东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到外线去打击敌人，以便把敌人引开；留彭德怀、滕代远率红5军留守井冈山，保卫根据地。

1月上旬，确定走、留人员名单时，杨至成不用说是属于走的人；而伍道清因为已经怀孕，所以被确定留在井冈山。被留在井冈山的还有后方医院、工厂、红军家属及伤病员等一大批同志。按前委设想，只要把敌人引开，粉碎他们的第三次“会剿”后，红4军主力会很快打回来的，分开只是暂时的。

杨至成也是用这个话来安慰伍道清的，他看着妻子眼泪汪汪的样子，劝说道：“我们不会分离很久的，你没看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进剿，都被我们粉碎了吗！”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

“我们这是出去牵引敌人，随时准备打仗，要求队伍要精干、利落，你带着身孕怎么行呢？”

“才刚刚两个多月，不会成为拖累的……”

“可是，这是组织的决定，谁也不能违反呀！”

是的，谁走谁留，这是组织决定的。伍道清是一名共产党员，在组织决定面前她无话可说了。

1月14日，杨至成跟随红4军，在毛泽东、朱德的率领下，离开井冈山南下了。伍道清站在路旁摇着手向战友、向丈夫送别。她盼望着红4军主力早日打回井冈山。

谁知红4军这次下山却出师不利，第一仗在大余县遭敌袭击，杨至成就负了伤。接下去几仗，也连连失利，以至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负伤被俘，惨遭敌人杀害，献出了她年仅23岁的生命。

“围魏救赵”的计划眼看难以实现，红4军只好向闽西发展，越过赣闽边界，来到了福建长汀一带。

在这一段时间里，杨至成时时挂牵着留在井冈山的妻子。但因战事匆匆，又无任何通讯工具，对红5军留守井冈山的情况他一概不知。

直到当年4月，红4军和红5军在江西瑞金会师后，杨至成才从红5军那里了解到：

红4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3天，敌人即以近3万人的兵力开始向井冈山进攻。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实际上只有七八百人。他率领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三天三夜。1月19日，湘敌利用夜晚偷袭并占领了黄洋界哨口。彭德怀率教导队一部急奔黄洋界救援，力图恢复哨口阵地，但未能奏效。1月20日，八面山、桐木岭等几大哨口相继失守，敌人截断了红军的退路。

为了避免全军覆灭，彭德怀、滕代远集合剩下的500多人，加上能行走的轻伤员和红军家属及留守的后方人员，通过井冈山主峰腹部荆竹山一处不易被敌人发觉的悬崖峭壁，然后沿着一条小道整整攀行了一天一夜，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时值严冬，天降大雪，路上积雪盈尺。当饥寒交迫的突围部队来到遂川县境内时，又遭到40倍于我的敌人三面包围，红5军又一次面临覆灭的危险。

“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彭德怀把剩下的部队集中起来，朝敌人的一点突去。部队最后总算冲出来了，但跟随他们的伤员及家属等却全部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对俘虏的红军和家属进行了疯狂的杀害。小井医院的130名红军伤员被赶到一块稻地里，在机枪扫射下没剩下一个人。

杨至成从红5军同志那里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仍不知道妻子伍道清究竟怎么样了；但他清楚，肯定是凶多吉少。

红军再次占领井冈山后，杨至成曾托人打听伍道清的下落，但仍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一年多后，杨至成担任了军委总供给部部长。他工作繁忙，需要人照顾，于是经人介绍，又与纺织厂一位19岁的女工彭慧媛结了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彭慧媛漂亮、贤惠，很能照顾人，两人感情甚笃。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对带家属中央有严格规定：除了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外，其他人不准带家属。因工作需要随军的女同志，需经过严格的身体检查和政治审查。当时，有的领导同志的爱人因体重重差1斤，也被刷了下来。那时，杨至成刚被“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撤职不久，成了一般干部，就更无权带家属了。于是，他只好和彭慧媛挥泪告别。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

时，随军的女同志只有 32 位，而被留下的却有成百上千。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告别即意味着婚姻的结束，家庭的破裂。不少人从此便再未相见。杨至成和彭慧媛的婚姻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于是，他才有了在延安的再次结婚。

可是，谁知这桩婚姻也是短命的。他精神上又一次遭到残酷的创伤。

几位首长和好友知道他的遭遇后，都来安慰他，请他想开一点，并答应以后碰到合适的对象帮助他另组一个新家庭。

再结良缘

1946 年 7 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委的杨至成，奉命陪同副总司令萧劲光去满洲里接收苏军交给的一批物资。这批物资是苏军接收的战败国日本军队的军用品，要在边境城市满洲里交给我方。路途远，时间长，又值炎炎夏季节，天气闷热，所以卫生部长贺诚便从医院挑了一名护士，随同萧劲光、杨至成一起出发，负责他们的保健工作。

这位女护士名叫唐慧文，19 岁年纪，白皙的脸庞上长着一双明亮和善的眼睛，一身单军装罩着她适中的身材，脑后垂着一对粗粗的黑辫子，一说话就带笑，嘴里吐出的是浓厚的东北口音。她细心地关照着萧劲光和杨至成，要他们注意防感冒，防中暑，注意休息。她说话轻声细语，态度可亲；手脚勤快，忙个不停。忙完工作，她就拿起一本书，低头细细地读起来。

唐慧文的这股腼腆劲引起了杨至成的注意，就随口问她：“姑娘是哪人呀？”

“抚顺市。”

“噢，不久前我们总部曾在那里住过呀！”

“对，我家就在那里。”

“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呀？”

“不长时间，去年年底！”

“噢，那我看你的医疗技术相当娴熟，不像新兵嘛！”“我当兵前就是护士了，在抚顺市一家医院工作。”“噢，这么说是老资格了！”

“不敢说老。我 15 岁初中毕业后，考入护士学校，两年后毕业，参加工作已经两三年了！”

“难得！难得！”杨至成不由得夸赞起来。又问：“那么，为什么要来当兵呢？”

他感到自己有点像查户口的，不好意思起来。姑娘倒满认真地回答着这位首长的问话：“当时，部队后方机关驻在我们那里，我看到医院有许多女兵，很羡慕。特别有位周越华大姐，待人十分和蔼。我问她能不能当女兵，她说向领导汇报汇报，后来就同意我当兵了……”

“周越华！”杨至成心里一下亮堂起来。他知道她是自己的老战友贺诚的夫人，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同志，在部队卫生部门搞政治工作。

那时，杨至成因为刚从战后的苏联回国，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对唐慧文说：“好！我们就算认识了，今后免不了总要麻烦你！”

“首长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唐慧文回答得很得体。杨至成说：“小唐，今后我们在一起工作了，不要老‘首长首长’的！”

“那……我称呼你什么呢？对了，我就叫你杨政委吧！”“行，这样好

一些。”

以上，便是杨至成与唐慧文第一次认识的经过。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唐慧文吃苦耐劳，工作热情，认真仔细，深得几位领导同志的好感，杨至成更是不例外。

完成任务回到驻地后，贺诚笑眯眯地问杨至成：“老杨，给你们派的保健护士怎么样？”

“不错，不错！这姑娘工作真棒。我看应该给她记一功！”杨至成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贺诚诡谲地一笑，说：“这么说，你看上她了！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拉拉线？”

杨至成猛地醒悟过来，红着脸说：“看你这个老贺，人家姑娘那么年轻……”

贺诚说：“年轻还不好？有个外国的诗人说过，真正的爱情是没有年龄界限的。你40多了，不能再拖了！”

“最好……最好找个年龄相差不多的……”

“你想得好！现在哪有40岁的老姑娘等着嫁你！”贺诚一下把杨至成顶了回去，“告诉你，帮你成家不但是我们这些老战友的关心，也是总部领导关照过的事，你应该感激才是！”“可是……”

“小唐那里你不用管了，由周越华去做工作，你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贺诚的夫人周越华是唐慧文当兵的引荐人，又是一位老红军，唐慧文对她十分尊重。当她把红线的另一头牵给唐慧文时，姑娘有点不知所措，说：“杨政委……是首长，我怕不行……”“首长，更需要有人照顾嘛！”周越华开导她。

“再说，我年龄还小，杨政委年龄大……”

“唉，你不知道，杨政委在家庭问题上遭到过许多不幸，不能怪他呀……”

周越华把杨至成过去家庭的不幸，简单地向唐慧文说了一遍。还没说完，唐慧文就深深被感动了，答应好好想一想。接下来，唐慧文的心就再也不能平静了。一是她老想着这件事，二是不断有人在她耳边“吹风”。

“我们的首长待人可好啦，对人特关心！”杨至成的小勤务员对唐慧文说。

“我们的首长可是老革命啦，黄埔军校毕业的，还参加过南昌起义，并去苏联留过洋呢！”杨至成的秘书对唐慧文说。

医院领导也找唐慧文谈话说：“小唐，杨政委是咱们的直接领导，工作那么忙，身边没个人确实不行，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尽管大家的意向很明显，但共产党是反对包办婚姻的，所以谁也不能强迫唐慧文去嫁给杨至成。倒是唐慧文自己是个心肠非常软的姑娘，经不住大家你一言、他一语，心里就同意了。

贺诚、周越华夫妇急忙把这个信息告诉给杨至成。杨至成一听，心里自然十分高兴，甚至有点感动——多少人都在热情地关怀着自己啊！

贺诚见杨至成没有异议，就说：“老杨，现在大家事情都很多，工作都很忙，我看你们也就不要打持久战了，来个速战速决，抽空把事情办了算啦！”

“一切筹备工作由我来操持，你就不用管了；倒是你得找一间洞房啊，不能再住办公室了！”周越华热情相帮。

“好，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吧！”杨至成十分感激老战友的一片赤诚。

1946年10月中旬，杨至成和唐慧文在佳木斯组成了新的家庭。

杨至成很爱自己的妻子，非常珍惜第五次组成的这个家。他相信这个家将是持久的、牢固的，将伴随他走完人生的道路。

结婚以后，杨至成告诉唐慧文：“我过去在延安时有个孩子，算起来也有八九岁了，现在随她母亲住在继父家，我们一直还没有相认和见面呢！”

唐慧文很理解丈夫的心情，就说：“我们把孩子接来养吧。孩子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会给她以父爱和母爱的！”

杨至成很感激妻子的通情达理。不久，便去大连接来自己的女儿杨玉明，全家人生活在了一起。杨玉明在父亲身边读书上学，直到参加工作以后。

如今，在湖北大冶有色金属公司纪检委工作的杨玉明已年近花甲，有了自己的第三代。她谈起父亲对自己的慈爱，心中仍充满激动，深深地怀念着他。

又起微波

时间又过去了8年。

1954年8月，时任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的杨至成，因身体不好，高血压、心脏病经常发作，正携带妻儿在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这时，他们已有了两儿两女。8月2日这天，秘书连艺君突然来报告说：从湖南来了一位名叫伍道清的女同志要找他。

“伍道清！”杨至成心里一震，这不是他在井冈山失散25年之久的妻子吗？难道她还活着！

霎时间，他呼吸急促，血压升高，身子摇摇晃晃似要倒下。连秘书忙扶他躺下，问他究竟怎么了。

杨至成心中的苦楚难用语言表达，遂指示连秘书：找个招待所安置她住下，问问她在井冈山分别后的经历，这次来这里有什么要求。

秘书安排伍道清在招待所住下后，请她谈谈有关情况。伍道清先是不肯，她想直接面见杨至成，当面向他谈。连秘书告诉她：“杨副参谋长的心脏病很重，不能激动。你们猛一见面怕发生问题。我是他的秘书，你有什么话，先给我说，我再转告他。”

身体显得很虚弱、面目显得很憔悴的伍道清，这才谈了她们分别后的苦情：

1929年1月，井冈山被敌人攻占后，她在随部队突围途中，于江西遂川县长岗坪身负重伤，被捕入狱。当时敌人杀人杀红了眼，不少红军伤员及家属惨遭杀害。长岗坪七岭村有个40多岁的农民，叫张飞怀，孤身无子，见她是个孕妇，便通过反动的挨户团团长想要她。因挨户团长与张飞怀有点亲戚关怀，便把她许给了张飞怀为妻。她到张家几个月后，生下一子，取名冬伢。从此她便张家一面抚养孩子，一面苦熬。她也多方打听杨至成的下落，但终无消息。

1936年，天旱无雨，庄稼歉收，家里断了炊烟，张飞怀便把已经8岁的冬伢留下，把她赶出了门。她无处可去，只好边讨饭，边回湖南娘家去。途中又遭敌人逮捕，因无充分证据，不久就被释放了。她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湖南耒阳县南门外白羊乔坊的娘家。不久，她被坏人告密，被说成“赤匪”，结果第三次被捕入狱。坐牢几个月后，经胞弟出钱保释出狱。此后

她一直在家劳动。但由于备受摧残，体弱多病，生活非常困难，实难度日，遂于 1943 年经人介绍与一个名叫黄南华的人结婚。黄家也非常贫穷，加之黄的脾气特别暴躁，所以两人合不来，她仍常住娘家。与黄结婚后，11 年来她未生一子。

全国解放后，她在村里做了一个时期的妇女工作。后来因身体多病，难以支撑，只好在家休息。

今年春天，在北京工作的伍云甫同志回来阳探亲，碰见了她，才知道她还在人世。伍云甫告诉她杨至成还健在，现在中南军区工作。她听后即写信与中南军区联系。军区回信说杨至成因病已去杭州疗养，她便赶到杭州去探望。到杭州后，又听说杨至成已由杭州转到青岛，她便又转车来到青岛。

伍道清提到的伍云甫，与她是同村同宗人，1928 年与她一同参加过湘南暴动，曾在红军中搞无线电通讯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全国救济总会秘书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等职。他是 90 年代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同志的父亲。正是他，把杨至成与伍道清这根断了 25 年的线又接了起来。

可是，25 年过去，如今两人都各自成了家，她千里迢迢赶来，又能怎么样呢？

经连秘书询问，伍道清谈了她来的目的：一是倾诉别后 25 年的苦楚；二是商量寻找他们的儿子冬伢的事；三是请杨至成证明她参加红军和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四是解决一下个人生活方面的困难；五是想与杨至成见见面，以解思念之情。

对伍道清提出的要求，杨至成都尽量给予满足。

第三天，杨至成在夫人唐慧文、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医生的陪护下和伍道清见了面。常言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这对在井冈山艰苦时期仅一起生活了 100 多天的患难夫妻，这对经过了生离死别如今已成陌路之人的革命伴侣，相见之后，只有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此情此景，真可谓欲说无语，滴滴泪珠藏隐痛，谁看了都感到伤心。

医生看到杨至成脸色惨白，嘴唇发青，怕他发生危险，急忙把他搀走了。

杨至成看到伍道清身体不好，生活困难，叫秘书买了些药品和衣物送给她。对此，伍道清都写了收条。40 年后的今天，当我在当年杨至成同志的秘书保存的一个笔记本中发现伍道清写的两张收条时，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伍道清的收条是用钢笔在一张小纸上竖写而成的，字迹非常娟秀。其中一张收条原文如下：

今收到

胶鞋一双，币叁万玖千叁百元

学生男布，一丈二尺，币伍万叁千玖百元

男卡机布，一丈三尺八寸，币捌万玖千捌百元

白卡机布，一丈二尺八寸，币伍万伍千捌百元

袜子一双，币伍千玖百元

合计人民币贰拾肆万柒千捌百元

一九五四年八月四日伍道清条

名字下面盖着她篆字体的红印章。另外，在条子上凡有数目字的地方（如尺寸数、钱数）也都盖上了她的名章，足见她是很认真的。

需要说明的是，条子上的钱数是指的旧币，即 1 万元相当于现在的 1 元，

1 千元相当于现在的 1 角钱，1 百元相当于现在的 1 分钱。

伍道清走后，杨至成成为寻找他们的儿子冬伢，写信给江西省政府副主席方志纯（他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学），委托他派人到遂川县等地代为寻访。但 20 多年了，时过境迁，沧桑变幻，加之这里曾经敌人多次“清剿”，当年的张飞怀已不知去向，孩子始终没有下落。后来，虽有人自称为冬伢或冬伢的后代找上门来或写信来，但情况都有出入，对不上号，也不排除有人想冒充。

为了证明伍道清的革命斗争历史和解决她的生活困难问题，杨至成写信给湖南军区司令员文年生和副司令员杨梅生，请他们转湖南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证明伍道清同志 1928 年曾参加湘南起义，在耒阳县革命委员会做过妇女工作，那时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信中说，她因突围受伤被捕，受尽摧残和折磨，现在身体很差。还说，由于他们分别 20 多年，希望组织上能派人伍道清后一段的情况调查了解。如果没问题，请将情况转告耒阳县委和县政府，以便在政治上、生活上给伍道清以适当安置和照顾，使她能够生活下去。

以后，杨至成又让秘书督促有关部门，使这些问题逐步得以落实。

唐慧文始终把伍道清当作一位老革命、老大姐看待，全力支持杨至成热情对待伍道清，尽力帮助她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杨至成非常感激妻子对自己的理解。

杨勇在抗日战场叱咤风云

何念选

杨勇（1913～1983）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3年9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大家市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杨世峻。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杨勇。先后在红3军团第4师任连副政委、政委。1931年调红2师安远独立营任营长兼政委。1933年任红4师第10团政治委员。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10月，率第10团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8月，任陕甘支队第1纵队第10大队政治委员，11月参加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参加东征、西征，后任第4师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副团长，于1937年9月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同年12月，任第686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939年7月，任第115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1940年5月后，任第343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第115师教导3旅旅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41年7月，奉命赴延安，先后入军事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期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司令员。1948年，参加宛东、郑州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阻击国民党军第12兵团和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司令员，后兼贵州军区司令员。1950年底，入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任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从朝鲜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从1972年起，先后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和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在北京病故。

* * * * *

杨勇投身革命后，在艰苦的环境下驰骋沙场，出生入死，指挥部队英勇作战，立下赫赫战功。担任高级领导职务后，仍严于律己。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刚正不阿，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质。此文记述的是杨勇上将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战斗历程。

平型关首战告捷

1937年8月，杨勇所在的红4师被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6团，李天佑为团长，杨勇为副团长。

第115师奉命向灵丘开进，阻击日军的进犯。在部队开进途中，杨勇见到许多国民党第33军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官兵。他叫住一个士兵，想了解一下日军的情况，只听这个国民党兵一个劲儿地说日军太厉害；但细问他日本兵怎么厉害，他却说不出一句。原来这个士兵不过是听别人说的，他自己竟然连日军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再问其他士兵，同样是这种情况。由于国民党军不战自退，第115师尚未赶到灵丘，灵丘已被日军占领。师领导林彪、聂荣臻决心利用平型关的有利地形，进行一次伏击日军的战斗，以激励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振奋抗日军队的士气。

师部命令李天佑、杨勇率第 686 团在老爷庙附近设伏。

9 月 23 日黄昏，在李天佑和杨勇的率领下，部队出发了。经过急行军，部队于当夜赶到距平型关大约 15 千米的冉庄，随后驻扎下来，在这里进行战前准备。经过深入的思想动员，广大指战员明白了打好这与日军交锋第一仗的重要意义。大家准备认真，情绪高昂，都表示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要给日本鬼子一点厉害看看。

师部命令各团于 25 日零时向预定设伏地段开进。

离出发前还有八九个小时，杨勇和团长李天佑安排部队休息后，也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下。他们已经两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可是躺在铺上怎么也睡不着。

杨勇看了一眼辗转反侧的团长，开玩笑地说：“都身经百战了，怎么还这么紧张！”他话虽然这么说，心里很清楚，自己的心情何尝不一样。

“不是紧张”，李天佑翻过身子面对杨勇说，“咱们这头一回与日本鬼子交手，别哪儿想得不够周全，误了事。”这倒是李天佑的心里话。

“是啊，这第一次交手很重要，我们的胜利会对全国产生影响，千万不能出任何纰漏！”

李天佑和杨勇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想到了一些要注意的事。也许是太累了，杨勇说着说着已听到李天佑的鼾声，自己也禁不住入睡了。

夜深更深，月白风清。部队按时出发了。为了行动隐蔽，行进路线是很难走的羊肠小道。走着走着，月黑风起，不久便下起了瓢泼大雨。部队没有雨具，战士们穿的灰军装被雨淋湿了。在崎岖、滑溜的山道上，大家不顾一切地疾进。

前面的一条山溪，此时成了湍急咆哮的河流。为了安全过河，杨勇要求大家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趟过河去。

经过艰难的行军，部队按时赶到了设伏地。这时天刚蒙蒙亮，雨也停了。部队进入一条山沟里隐蔽。

潜师远袭，利在隐蔽。为了隐蔽好，既不能走动，也不能生火。战士身上湿淋淋的衣服全靠自身的热量来烘干。为了战斗的胜利，大家咬牙忍耐着一切困难。

部队严阵以待，指挥员在观察了解各种情况。

李天佑和杨勇伏在一个土坡上，向四处观望。李天佑举着望远镜观察了一会儿，将望远镜递给杨勇。杨勇观察了一阵后，对李天佑说：“部队隐蔽得很好。要想捕住狡猾的野兽，就要善于隐蔽。”他望了一下周围，接着说：“这里真是伏击敌人的好地方。山谷地势狭长，公路对面山高坡陡，人很难爬上去；我们这边山低坡小，便于隐蔽，有利于出击。真是天赐我歼敌战场！”

“现在我们拉好了网，张好了口袋。第 687 团在东侧，第 685 团在西边，只等敌人来了。到时候，攻击令一下，他们斩头砍尾，我们拦腰狠切，鬼子算是死定了。令人遗憾的是老爷庙目标太明显，不能在那边山头上埋伏我们的人，只能在战斗打响后再快速去抢占。”李天佑早已把问题想全了，对歼敌信心十足。

杨勇趁机利用刚架通的电话，了解各营的情况。各营报来的情况都是一句话：“一切都准备好了！”

上午，太阳升上山头丈把高的时候，山沟里传来了马达声。马达声响越来越大。只听有人小声地说：“快看，来了！”往远处一望，隐约看到百余

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两百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在后，接着而来的是骑兵。车鸣马嘶，敌人忘乎所以，如入无人之境。随着车队越来越近，已能看清日本兵的身影。日军身披大衣，头戴钢盔，斜背着枪，叽里呱啦地说话，显得十分骄横。

杨勇观察了一下自己的部队，周围很平静。战士们紧握手中武器，睁大眼睛。蹲在沟里的战士们仰着头，等待攻击的口令。

在战士们急切等待中，位于石灰沟南山头的师指挥部终于发出了冲击敌军的信号。

顿时，部队埋伏的半边山岭吼声四起，杀声震天，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开火。因为处在最佳距离射击，命中率很高。在敌人死伤一片后，八路军向敌人发起冲锋。勇士们个个如小老虎，从山坡上、公路旁杀向公路，杀向敌阵。其势如山洪暴发，如泰山压顶。敌人遭突然打击，吓得东奔西跑，人慌马惊。

日军坂垣师团是经过严格训练的部队，知道中了埋伏后，立即组织反击。敌人一面利用汽车与沟坎顽抗，一面派一部分人抢占老爷庙的高地。

敌人这一手，李天佑早已想到。他立即命令第3营：“不要怕伤亡，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保证完成任务！”第3营周海宾营长坚定地回答。他随即率领部队向老爷庙冲去。

“老李，你负责这里，我跟3营一起去！”杨勇没等团长回答，拔腿就随第3营跑去。

山沟里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第3营官兵迅速穿行在枪林弹雨中，越过山沟，冲上了公路。他们不与公路上的敌人纠缠，只顾往老爷庙冲。第3营一到老爷庙附近，就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战士们与敌人扭打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刀光闪闪，杀声阵阵。八路军战士第一次与日军交手，面对强敌毫不畏惧，都以一当十，奋勇厮杀。这是血与肉的搏击，死与活的较量。

在第3营向敌冲击的同时，李天佑命令第12连副连长王培根带领1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一座土地庙，以控制有利地形，阻击后面跟进的敌大车队。王培根率部先敌赶到，截住了敌人80多辆大车。他们将两头的大车打瘫痪，使中间的大车卡在那里不能动。

杨勇指挥部队捅死、击毙一大批敌人。余敌被迫退回停放汽车处，有的凭借汽车掩护顽抗，有的躲在车下保命。

第3营占领了老爷庙，利用有利地形打击敌人。

杨勇在指挥作战中，突然被敌人击中，倒在地上。他奋力想爬起来，可是左臂怎么也使不上劲。

“副团长，你受伤了！”杨勇身后的通信员惊叫一声，立即去搀扶他。

“这点伤算不了什么，不要说！”杨勇叫通信员拿出一个急救包，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又立即指挥战斗。这是他第3次在战斗中负伤。

战斗到下午1时，第687团攻过来了。八路军两面夹击，终于将兴庄至老爷庙之间的日军消灭。在十几里长的山沟内的公路上，日军除留下大批汽车、大车、军用物资外，还留下了1000多具尸体。

这次战斗胜利后，部队受到聂荣臻副师长的表扬。他在看望部队时说：“同志们，这一仗我们打胜了！大家打得很好，打得漂亮。同志们的浴血奋

战，对稳定华北地区的抗战局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平型关大战后，杨勇带领一些干部深入到襄垣、武乡、屯留、潞城等地做扩军工作。

布下口袋装日军

1937年12月，杨勇被任命为第686团团长兼政委。1938年3月14日下午，杨勇带领部队正在驻地和友军联欢，演出一直到黄

昏。这时突然接到师部来电：13日由临汾增援蒲县的日军先头部队五六百人已向午城开进，中午与师直属队遭遇。师部警卫连占领午城镇东北的高地抗击敌人，激战两小时，歼敌百余人。不久，日军后续部队赶到，敌人的兵力超过警卫连10倍。现警卫连撤至午城镇北侧高地与敌对峙，掩护师主力及友军进入机动位置。战至14时，日军占领午城。陈光代师长命令第686团开至义泉镇地区，打击西进的敌人。

杨勇接到命令后，立即让部队停止观看演出，并进行了战斗动员。部队连夜出发，经过一夜又大半个白天的行军，走了80多里，于第二天下午3时到达下桑峨、下寺徒一带宿营。

由于情况有变，16日晨，杨勇率部沿着山间小道，绕过丛林，向午城东侧的马路运动。经过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到蒲县与午城之间的上、下龙花一带集结，隐蔽待命。杨勇派人去路南与方国南率领的由团特务连、侦察连组成的游击支队联系，调其前来参战。

不久传来消息：杨得志率领的第685团在罗曲镇歼灭了西进的200多名日军，缴获战马100余匹，还缴获不少军用物资。

兄弟部队的胜利，激励、鼓舞着第686团指战员，大家纷纷要求参战。杨勇安慰大家说：“日军十分骄横，他们既然已深入到大宁，定有后援来，我们做好准备打敌后援！”

果然不出所料，3月17日，日军从蒲县开出60多辆装满物资的汽车，在6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护送下向大宁开来。据从大宁方向侦察得知，大宁日军也派出500多人，带着两门火炮出城接应。接应的敌人遭到第685团的有力阻击，被迫缩回；而由蒲城出动的敌车队仍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

当日军车队进入井沟以西、午城附近时，他们没有想到杨勇率领的第686团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当日军进入伏击圈后，杨勇一声令下，全团所有火力向敌人猛打，当即击毁敌军车6辆，击毙敌人200多人。余敌逃入午城。

师部立即命令第685团和第686团从东西两边夹击，将午城的日军包围，尔后歼灭该敌。

陈光旅长和萧华政委等旅领导决定，由第686团6个营和第685团的两个连，组成主攻部队，于17日夜向午城镇敌人发起攻击。

杨勇接到命令后，决定第3营为这次的主攻部队。第3营指战员听了杨勇团长的动员后，情绪很高，决心很大，表示一定打好这一仗。

第3营干部战士左臂上都系了一条白布条，作为夜间行动时的识别标志。

日军连续遭到袭击，又最怕八路军夜战，因此不敢安心睡觉。当第685团的两个连向午城发起攻击时，遭到北面山上固守的日军的猛烈抵抗，进攻

受阻。

杨勇指挥的第 686 团第 3 营进攻凶猛，很快就抢占了日军的工事，尔后穷追猛打分散在街上的敌人。日军汽车兵企图加大马力用车冲撞第 3 营战士。由于汽车有马达声和灯光，八路军战士可以及时躲闪，不仅吃不了亏，反而可以用手榴弹打汽车。敌人汽车挨了手榴弹后爆炸起火，吓得再也不敢开灯，摸黑往前乱窜。结果汽车撞汽车，自家人打自家人，许多车挤在一起，找不到出路；有些车落入杨勇设好的伏击圈，遭到沉重打击。

战斗中，八路军打得十分灵活，十分有效。日军 60 多辆装有物资的车变成一团团火球，整个战场形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热浪升腾。

临汾的日军得知驻午城的部队遭袭击后，立即派出 600 多名步兵、200 多名骑兵和一个炮兵中队驰援午城。

于是，旅部命令第 685 团控制午城镇，钳制可能从大宁西进的敌人；命令杨勇率第 686 团在拂晓前赶到井沟、张庄一带，埋伏于路北的一些沟内和丛林中；命令孙家庄的游击支队在路南设伏。八路军重新撒下一张大网，布下一个口袋，专等敌人往里钻。

日军因连续上当吃亏，学乖了许多，行动十分谨慎，也没有以前那样狂妄、骄横了。他们一面以火力搜索，一面向前运动，缓慢通过怕出事的地段。

隐蔽在山沟、丛林中的第 686 团的战士们，高兴地看到“鱼儿”要进网了，大家默默地数着日军的车辆和人数。

当日军的先头部队到达井沟、张庄之间时，这里因是前一天的战场，沟底仍遗弃着许多日军的汽车和士兵的尸体。日军指挥官一声吆喝，部队马上变成战斗队形，分 3 路搜索前进。士兵们的眼睛不时地窥伺两侧的山峦，生怕从山间、树林中突然飞出于榴弹或要他们命的什么东西。为了壮胆，指挥官命令炮兵向山梁打了几炮，尔后再警惕地观察动静。

杨勇观察了一下自己的部队，见指战员们隐蔽得很好。他知道日军是搞火力侦察，示意部队不必理睬，沉着听指挥。

日军用火力侦察，没见有什么反映，又静观了一会儿，仍未发现什么破绽，放心了，便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兵贵神速。杨勇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全团官兵和游击支队同时从两侧山腰向日军发起猛烈冲击，几十挺机枪喷出了怒火，成批的手榴弹从丛林里飞向敌阵。日军处于八路军强大的火力控制之下，顿时乱了方寸。

日军指挥官很快清醒过来，遂组织部队反击，抢占井沟、张庄以南的龙王庙阵地，进行拼死抵抗。由于日军的地形有利，且武器好，八路军进攻受阻，两军成胶着状态。日军生怕时间一长有被八路军吃掉的危险，于是不停地向上级呼救，请求增援。战至下午 1 时许，日军 6 架飞机前来轰炸，在第 686 团阵上投下了 100 多枚炸弹，日军的大炮也进行猛烈轰击。杨勇灵活地指挥部队利用山沟、岩石和丛林作掩护，以免造成大的伤亡。

一阵狂轰滥炸后，日军组织部队出击。日军士兵在其长官武士道精神驱使下，向第 686 团阵地扑了过来，妄图突出重围。

杨勇见日军来势凶猛，鼓励部队说：“同志们，敌人拼命了，我们一定要顶住！”战士们心里都清楚，到了拼意志、拼决心的关键时刻，决不能让鬼子跑了。

指战员们在团长的带领下，群威群胆，奋不顾身地冲出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展开厮杀。在战斗中，两个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罗自坚、党总支

书记肖志坚等大多数营连干部挂了彩，许多战士壮烈牺牲。在战局危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主动组织、带领战士顽强战斗，几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击毙击伤一批批的敌人。

路南的八路军伏击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组成密集的火力网压制日军，有力地支援路北的主力部队攻击敌人。哪里有日军顽抗，哪里就有八路军战士。日军两次派飞机轰炸，均未救出被围困的部队。

战至黄昏，龙王庙、井沟一带的日军终于被歼灭，500多名日本兵丧了命。张庄的200多名日本兵，大部分死在阵地上，少部分逃走。

3月19日早晨，午城与井沟的战斗结束。

在师和旅的领导下，杨勇指挥第686团与日军三次交锋，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摸了日军的底，为日后指挥一次又一次歼灭战打下了基础。

令卫立煌叹服

1938年3月间，杨勇率第686团与兄弟部队共同对日作战，连战连胜，鼓舞了抗日军民战胜日军的勇气和信心。

日军连续败在八路军手下，自然不甘心。为报午城、井沟的一箭之仇，日军又组织千余人的兵力进行反扑，正巧在大宁附近与国民党军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的部队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战斗不久，卫立煌部不敌日军的凶猛攻势，退下阵来。

日军得势不放手，穷追不舍。国民党军卫立煌部打得很艰苦，最后被日军打散，形势非常严重。

战局总是不利，原因何在？卫立煌怀疑自己内部有奸细，便与其参谋长郭寄嶠等人来到八路军第115师。其目的一方面是请求支援，另一方面是为了安全。

第115师陈光代师长热情接待了友军卫司令长官一行，了解卫的意图后，主动表示支援。于是，陈光命令杨勇派部队在白儿里阻击猖狂进攻的日军，掩护卫立煌部队东进。

杨勇接受命令后，知道这是一次特殊的任务。凭自己已几次与日军交手的经验，他对完成任务信心十足。

用兵之道，贵知地理。杨勇指挥部队迅速从白儿里山口上山向后转移；并命令团直属队教导员方国南带领特务连迅速抢占白儿里山腰上的有利地形，阻击日军，以争取时间。

特务连有完成特殊任务的本领。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很快占领了阵地，并立即利用阵地前的悬崖峭壁构筑工事。他们抱着宁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在日军猛烈进攻面前绝不后退半步。

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特务连挡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受阻。日军指挥官杀气腾腾地逼着部队进行更疯狂的攻击，但遭到的是更大的惨败。日军动用大炮轰击，也无济于事。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关口始终牢牢控制在特务连手中。

战斗一开始，杨勇便陪同卫立煌在指挥部观察战斗情况。两军拼杀时的惊心动魄场面，八路军阻击日军的战斗情景，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卫立煌一面观察着战场，一面惊诧地对杨勇说：“战斗打得这么激烈，请问杨团长，在前面打阻击的有贵军几个团的兵力？”

“只有我们 686 团的 1 个连。”杨勇回答说。

“只有 1 个连？不，杨团长，请不要开玩笑！1 个连怎么能挡得住这么多日军的连续冲击！”

“卫长官，这是真的，我只派去 1 个连。你要是不信，等他们撤下来，你查查人数就清楚了。”

“对，眼看为实，我一定要看看，看他们是怎样的 1 个连。”

战斗很快结束了。杨勇向担任阻击任务的特务连下达撤出战斗的命令。没想到卫立煌真的等在那里清点人数，要看看参加阻击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的参谋向他报告确实只是 1 个连，共 200 多人。卫立煌看到从面前经过的这些刚刚参加阻击的战士，跟普通八路军战士一样，他们身上背满了缴获的战利品。听了连长向杨勇的报告，他信服了。他十分感叹地对身边的杨勇说：“杨团长，如果我有像贵军这个连队一样的 6 个团，恐怕会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杨勇笑了笑，说：“卫将军，1 个团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我们八路军的每个部队都和我们团一样。真正的力量是民众，是千百万觉醒的劳苦大众。他们才是所向无敌的力量！”

“杨团长，多亏贵军鼎力相助，才使我卫某转危为安啊！多谢了！”

“抗日一家，不必客气嘛！”

“我准备拨 10 万发子弹给贵军，以资备用。不知杨团长意下如何？”

“这该轮到我向你道谢了！”

两人愉快地握手告别。

卫立煌后来一直与八路军团结抗日，给予八路军诸多支持和帮助，并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建立了良好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国家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

笑对日军的“挑战书”

1938 年 9 月，华南方面的日军大举进攻广州、武汉。华北方面的日军也不甘落后，向山西增兵 1 万余人，兵分两路：一路向永济、风陵渡，直奔西安，妄图从侧面配合其正面战场作战；一路朝离石、柳林进犯，企图威胁陕甘宁我党中央的安全，蹂躏我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日军气势汹汹，妄想消灭华北方面我抗日力量，解除其后顾之忧。

根据日军的动态，八路军第 115 师在罗荣桓、陈光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敌人。杨勇受命率第 686 团迅速进至汾（阳）离（石）公路东段，伺机打击西犯的日军。

杨勇接到命令后，反复思考并与干部充分讨论如何消灭变得小心谨慎的日军。对部队进行了充分动员，并研究了作战方案。

一天，天刚蒙蒙亮，杨勇便带领各营指挥员登上了西公岭，隐蔽在草丛中侦察敌情，了解地形。这里真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四周峰峦重叠，沟壑纵横，汾离公路依山蜿蜒穿过。公路在西公岭爬过一段陡坡后，进入凹地；而凹地的一段路平行排列着 4 条山沟，每条沟都长满了 1 米高的茅草和杂树林，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报告团长，日军有 20 多辆满载着武器装备和渡河器材的汽车将从汾阳开出，旅首长命令你团相机截击！”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传令兵向杨团长传

达作战命令。

杨勇受今后，正考虑如何设伏，立即有几个人建议说：“团长，就在那儿设伏。”说话的人手指公路凹地段。

好几个干部表示同意，唯有侦察队长刘善福却呆在一旁不吱声。杨勇正想听他的意见，他却不表态。杨勇知道刘善福对这一带最熟悉，在哪里设伏他最有发言权，就主动问他：“刘善福，你的意见呢？在哪儿设伏好？”

“这里的地势很好，就是那个碉堡太讨厌了！”刘善福的意见终于说出来了。

刘善福说的很有道理。日军对这段路十分警惕，早在对面的制高点修了一座碉堡，从碉堡里可以监视和控制这一段凹地及附近的路段。

刘善福一个星期前就已深入这里侦察了敌情。他补充说：“据我观察，每当敌人运输车要通过这里时，他们总要先派出巡逻队搜索山沟，尔后控制碉堡，掩护车队通过。”

情况已经很清楚，怎么办？

“干脆提前炸掉碉堡！”有人提议说。

“这不等于告诉敌人我们要在这里设伏吗？这种打草惊蛇的事做不得！”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时间紧迫，不能再犹豫了。

这时，杨勇眼睛正盯着另一个不吱声的炮兵连连长吴嘉德。吴嘉德见团长望着自己，便将心里的话倒了出来：“团长，打碉堡的任务交给我！我已计算好了，保证3炮炸掉碉堡。部队出击时，不等碉堡内的敌人有反应，我就把碉堡轰掉了。”

真是两全其美的事。杨勇高兴地点了点头，表示完全同意吴嘉德的意见。作战方案就这样定下来了。

9月14日早上7时，侦察员送来情报：驻汾阳的日军汽车队已经出城。

杨勇指挥第686团早已进入伏击阵地，正待敌人进入伏击圈。敌人汽车通过西公岭前，在离西公岭10多千米的王家池加水、加油。日军从那里派出一支巡逻队探路，占领西公岭的碉堡，以掩护其车队通过。

日军巡逻队已出现在杨勇等视线之内。只见敌人一面搜索，一面进行火力侦察，走走停停，缓慢前进。敌人未发现与往常不一样的情况，便唱起了日本歌。不知是自娱解闷，还是为了壮胆，反正那声调不好听，像凄切的哀歌。

日军巡逻队发出了“平安无事”的信号。不一会儿，日军车队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毫无戒备地开进了第686团的伏击地带。

在伏击部队发起冲击的同时，炮兵连第一发炮弹就打中了碉堡，接着又是两发。碉堡里的日军连碉堡一起报销了。此时，八路军一排排手榴弹飞向敌汽车，机枪、步枪一齐射向敌群。在几千米长的路面上，敌人的汽车陆续起火，在狭窄的路上相互挤撞，燃烧，爆炸……

车上的日军，有的跳下来同八路军搏斗，有的趴在车厢边射击。因为硝烟弥漫看不清目标，他们只能乱放枪。许多受伤的敌士兵，手捂着伤口，嘴里叽里叭啦地说着什么。

伏击的八路军战士顺势向下冲，离公路越来越近，火力也越来越猛，打得日本兵抬不起头来。最后，战士们冲上公路，与躲在汽车旁的日军格斗起来。

经过近 1 小时的战斗，第 686 团一举歼灭日军 200 多人，生俘 3 人，缴获两辆没有炸坏的汽车和一批军用物资。余下开不动的车，统统付之一炬。

与此同时，旅补充团在彭雄团长的指挥下，在油房坪伏击日军香月军团司令部无线电队的 20 辆车，歼其一半，将汾离公路切断。

由于汾离公路不能通车，驻扎在黄河边上的日军第 108 旅团的供给发生了困难。日军的 50 辆运输车损失了四分之一。山口旅团长心惊胆战，被迫沿公路向汾阳回撤。

“杨团长，西犯的日军企图撤退。你们要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迅速准备再战！”陈光代师长打电话给杨勇。他知道第 686 团连续战斗减员不少，便接着说：“我把 685 团 2 营和师部特务连临时调给你指挥！”

杨勇接受任务后，考虑了许久。他清楚这一仗不太好打，一因日军在汾离公路连吃败仗，行动更加警惕，伏击不易达成突然性；二因这次目标不同以往，过去几次都是打日军的运输队，而这次是由山口少将指挥的战斗部队，难以全歼。要使战斗取胜，设伏点必须选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段，以达到突然性。

杨勇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将设伏点放在王家池。

他把这个想法向营里干部传达后，有人提出意见说：“敌人在王家池吃过亏，已在那里安了个据点。现在要在敌据点附近设伏，困难多，风险大。”

杨勇解释说：“过去我们几次远离敌据点设伏，这似乎是我们设伏的规律。敌人已注意到我们这个规律。我们要改变这个规律。在王家池设伏，是有些冒险，但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设伏点出敌意料，就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他决心导演一出新戏。

9 月 20 日天亮前，杨勇率部悄悄地摸到王家池附近隐蔽起来。

凌晨，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出发，向汾阳撤退。对于沿途游击队的袭扰，山口少将采取“不恋战，快速前进”的策略。他怕与游击队纠缠发生不测，但万万没有想到，等待他的是杨勇布好的口袋。

山口率部完全进入杨勇设下的伏击圈后，突然被分割成几段，每一段都遭到各种火力的猛烈打击。敌人失去统一指挥，处处被动挨打，很快被第 686 团等参加伏击的部队各个歼灭。

此次战斗，共歼灭日军近千人，山口少将也被击毙，陈尸公路边。

八路军在汾离公路连战连胜，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杨勇因此威名远扬。这大大激怒了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他破口大骂山口旅团无能，给日本皇军丢了脸。

驻临汾的日军联队长更是气急败坏，在为战死的日军召开的“哀悼”大会上，由他提出，经与会的军官通过，给杨勇写了一份“挑战书”。日军找到一名送信人，还把他家人扣作人质，逼他把“挑战书”到杨勇手中，由杨勇签了字，回来才放人。

日军的“挑战书”大意是：

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

前与贵军交战，因地形不利，三战不决，遗憾千古。实为大日本皇军不宜山地作战，而善大平原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再战，以决雌雄……

杨勇看完“挑战书”忍俊不禁，对身边的人说：“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是一封蠢猪式的‘挑战书’。”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杨勇为送信人解困，给日军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除痛斥日军侵华血腥罪

行外,还讽刺了日军一顿,说日军胆小如鼠,不敢到山地较量,算不得军人……

经侦察得知,日军发出“挑战书”后,真的调集人马驻进兑九峪一带,等着与杨勇交战。他们看到八路军没有上当,就用大炮向吕梁山轰击了两天两夜。

东进讨逆作战

陈光、罗荣桓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938年11月率领第115师师直属队与第686团东进,由晋西开赴冀鲁豫平原,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这次行动跨地区较大,由国民党军的第2战区,插进其第5战区。为了不引起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非议,特将参加这次行动的八路军第115师的部队统称为东进支队,但在内部仍用原番号。

东进部队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充分做了出征前的准备工作。

第686团在杨勇的指挥下,渡过汾河后,从两渡与义棠之间越过同蒲铁路的日军封锁线,到达绵山脚下的静村、延安村一带做翻山的准备工作。

尽管作了各种准备,但由于时值严冬,山上冰天雪地,全团仍冻伤近百人。

翻过绵山,部队又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夏店镇,已是1939年的元旦。朱总司令路过这里,专门看望了部队,对第686团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和鼓励。

1月中旬,部队抵达黎城县东、西黄须村时,彭德怀副总司令也来第686团视察。因为这个团是彭总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彭总对该团的优点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对于存在的问题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这对部队后来的工作和战斗起了很大的作用。

3月1日,东进支队到达鲁西郛城以北地区。

杨勇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决定奔袭郛城西北的重镇樊坝。这里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着日伪军1个团。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杨勇说:“我们686团是主力部队。什么叫主力?就是别人攻不下的,我们能攻下;别人守不住的,我们能守住。过去我们686团在山西打出了威风,朱总司令表扬我们是模范团,是干部团。现在我们到了山东,也要打出威风,使山东的敌人一听到686团的名字就头疼,就心惊胆战!”通过动员,使干部战士认识到,到了新的地区要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良传统。

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向樊坝之敌发起攻击。经过一夜的攻城战斗,我军攻入城内,俘敌500余人。这时,有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像是当官的伪军来到团长杨勇前面。经过审问,这个俘虏是伪军的一个团长,叫刘玉胜。

杨勇叫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那边小村庄驻扎的是谁的部队?”

“那是我的1个营。”刘玉胜低着头回答。

“是你的部队?那好,你马上写信,要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我们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杨勇说话声音虽不大,但话中带有几分威严,是不可抗拒的命令。

刘玉胜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赫赫有名的杨勇,也不敢多说什么,立即

趴在桌子上写信。

杨勇看过刘玉胜写好的信，立即派人给那个营送去。然后，他对刘玉胜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劝其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刘玉胜连连点头说：“是，是！”

刘玉胜在鲁西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杀了他也不冤，是其罪有应得。但杨勇从增强抗日统一战线力量出发，认为做好他的工作对抗日有利，于是积极争取他，用党的抗日政策感化他。

经过各方面做工作，刘玉胜终于觉悟了，表示要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他还郑重地发表了“告同胞书”，其中说：“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日获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谢国人之恩……”

杨勇委任刘玉胜为东进支队的的一个团长，要他到济宁敌占区去扩军。半年后，他给杨勇写来一封信，说他已在旧部拉起一支 200 多人的队伍，并有枪 200 多支，希望八路军给他派干部加强领导。

杨勇派吕儒琦去改造刘玉胜的部队。经过吕儒琦的深入工作，这支部队在抗日斗争中表现不错，后被正式命名为鲁西独立团，扩充到 500 多人。在当地群众中，曾流传着这样一段民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

1939 年 7 月 7 日，杨勇在梁山黑虎庙村主持召开了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正式宣布成立第 115 师独立旅。上级任命杨勇为独立旅旅长兼政委，何德全任参谋长，欧阳文任政治部主任，周海宾任第 1 团团长，戴润生任第 1 团政委，匡斌任第 2 团团长，张国华任第 2 团政委。

这样，八路军不仅在鲁西站稳了脚跟，还为后来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0 年 2 月中旬，石友三部在冀南遭痛击后窜到濮阳、清乐、南乐等地，企图与高树勋、丁树本等部靠拢，在这一带固守，伺机反扑。

为了粉碎顽固派的进犯，八路军集中冀南、冀中及冀鲁豫地区的部队，组成左、右和中央三路讨逆纵队，在冀鲁豫地区进行讨逆作战。

讨逆部队成立总指挥部，宋任穷任总指挥，程子华任政委。杨勇为左路纵队指挥。

杨勇指挥左路纵队，于 2 月 29 日在寿张的张秋镇一带，歼灭石友三第 39 集团军高树勋部第 13 旅 400 余人。接着，又于 3 月 4 日攻占了濮县县城，歼灭高树勋新第 6 师一部及李树春的保安团大部。不久，左路纵队进占柳下屯、黄庄，收复了袁家老、玉泉庙、东台寺等地。杨勇指挥部队越战越勇，

又乘胜攻克清丰、南乐、濮阳等城。

这次讨逆作战，我军连战连胜，打死打伤石友三部 3600 余人，并收复一批城镇。石友三率领残部逃窜到菏泽、东明一带。讨逆作战结束后，杨勇到了刚解放的濮县。在这里，他与勇敢、开朗、活泼、朴实的从事妇救会工作的林彬结婚。

创造平原歼敌模范战例

1940 年 3 月，第 115 师独立旅与冀鲁边挺进纵队合编，恢复师属第 343 旅编制，并成立鲁西军区。杨勇任第 343 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萧华任旅政治委员兼军区政委。从此，鲁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这一时期，部队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是抓好内部建设和做好根据地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根据斗争的需要，部队必须在军事、政治、后勤方面进行统一的领导。于是，第 115 师编为 6 个教导旅和一个山东纵队。这时，鲁西军区黄河支队已南下湖西苏鲁豫皖地区，上级决定把运河支队与陈上菜支队的第 2 团合编，成立第 115 师教导第 3 旅，杨勇任旅长，苏振华任政委。

部队改编后，除抓紧战斗训练外，还深入进行了“建设铁的党军”教育，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经过精心准备，杨勇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潘溪渡全歼日军 1 个中队和伪军 1 个大队，击毙日军 160 余人，烧毁日军汽车 4 辆，缴获火炮 1 门、轻重机枪 3 挺以及各种弹药等军用物品，从而给进攻鲁西南的日军木村师团迎头一击。潘溪渡战斗，是杨勇又一次创造的在平原村落地带成功伏击日军的模范战例。

这次对日军和伪军作战后，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安宁日子。部队抓紧时间学习和训练，并开展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转眼到了 1941 年 7 月。根据上级指示，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调杨得志任司令员，杨勇任副司令员。不久，杨勇奉令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延安后，由于党的“七大”延期召开，杨勇先后入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整风运动。

1943 年夏天，杨勇把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种出来的薤菜、苋菜、丝瓜、苦瓜和大南瓜，挑了一大担，送给毛泽东尝鲜。

毛泽东主席正在散步，老远就看到杨勇挑了一担菜来，便诙谐地说：“这都是南方菜呀，你从哪里贩来的，到哪儿去赶集？”“是从何德全那里要的种子，与警卫员一起种的。丰收了，送一担给你尝尝。尽是我们湖南菜，你准爱吃。”

“爱吃家乡菜，是从小养成的习惯。这些菜，好久没有见到了。”毛泽东边说边翻看筐里的菜。

杨勇把大搞生产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赞扬说：“你呀，能当生产模范了。有人向我反映，说你在党校学习好，政治思想作风也好，还能劳动，文武双全，真是个好同志呢！”

由于前方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决定杨勇提前结束在延安的学习，返回冀鲁豫根据地，领导整风学习。不久党的“七大”就要召开，杨勇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深感遗憾。

毛泽东看出他的心意。有一天晚上，他把杨勇请到自己的窑洞里，倾心长谈。

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務后，对杨勇说：“整风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抢救运动后期则出现了若干偏向，敌我矛盾扩大化了。到了敌后，你们所处的环境不比延安，所以对延安的办法不一定完全采用，要防止出偏向！”毛泽东最后还特别嘱咐杨勇注意加强学习。

刘少奇和彭德怀也分别找杨勇布置任务，殷殷话别。

杨勇返回冀鲁豫后，担任新改编的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牢记中央领导同志和八路军总部首长对自己的期望，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从而保证了冀鲁豫军区整风运动没有发生偏差，其他工作任务也完成得很出色。

杨得志杨威冀鲁豫

纪学

吴也

杨得志（1911～199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1年1月13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市）。1928年2月参加工农革命军第7师，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任排长、连长、团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第1师副师长、第2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5团团长，后任第344旅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第2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1944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1旅旅长。1945年8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等职。1948年任华北军区第2兵团（后改为第19兵团）司令员。1950年兼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翌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参与指挥上甘岭等战役。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枚、一级自由独立勋章2枚。1954年回国后，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73年起，任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1980年起，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回忆录《横戈马上》（1984）。

* * * * *

朱德交待任务

1938年盛夏的一天，第344旅代旅长杨得志急匆匆地向八路军总部驻地故县村奔去。

早在春天，日军为继续扩大侵华战争，调集曾参加过淞沪战争的主力 and 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妄图占领徐州，打通津浦铁路，因而减少了在华北的日军。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决定在冀、鲁、豫平原开辟抗日根据地，配合支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抗日部队在徐州一带的作战；同时命令第115师第344旅的一部分和第129师的主力部队由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发展。刚刚被任命为代旅长的杨得志，奉命前往八路军总部接受具体任务。

“七七事变”发生时，杨得志正在“抗大”学习。为了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这一期学员提前在洛川结业。杨得志回到老部队，遵照聂荣臻之命，任第343旅第685团团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后，杨得志仍在第685团当团长。不久，因第344旅旅长徐海东有病，朱德就命杨得志为第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

夏天的口头火辣辣的，四周的山峦仿佛挡住了外面的来风，使人感到异常的炎热。杨得志抬手擦擦额头上的汗水，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

走进故县村，杨得志边打听边向八路军总部机关走去。沿途，他看到不少人都坐在树荫下学习，其中有的人他认识，一问才知道学的是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

杨得志被感动了。他没想到在这紧张的战争中，总部的学习抓得这么紧。

朱德坐在院子里一棵树下，戴着老花镜，也在学《论持久战》。杨得志急走几步，立正敬礼后，大声说：“报告总司令，杨得志奉命来到！”

朱德抬头看是杨得志，便让他坐下，然后扬了扬手中的书问：“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杨得志答：“我才见到毛主席的讲演稿，读是读过了，领会却很肤浅。”

朱德摘下眼镜说：“主席讲了二十几个问题。各方面都讲到了，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抗战一开始我们就要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一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杨得志凝神听着，不时点点头。

朱德拿起毛巾，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看看杨得志继续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民心所向，或者叫做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有了这一条，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杨得志熟悉朱德。十多年前，他由一个筑路民工走进红军队伍，就是在朱德的领导下参加湘南起义，奔向井冈山的。在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中，在长征路上，他不止一次听过朱德的讲话。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朱德总是先讲国内外形势，后讲红军的任务，耐心细致，循循善诱。所以人们当面叫他总司令，背后称他老妈妈。总司令和老妈妈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称谓，在朱德身上却完美地统一起来。杨得志心想，这一次他大概也是这样吧。

果然，朱德稍稍停顿后，话锋一转说：“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都带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鲁豫去了。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是个古战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很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尽管对于朱德讲到的古代战争，杨得志不完全了解，但他已经知道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尤其是朱德说的“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更是深深地震撼着他的心扉。同时，他也看到了面临的困难，并说：“我对在平原作战，特别是敌后作战，还缺乏经验。”

“困难不会少的。”朱德说，“况且你这次去，号称是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都不能马上和你一起去。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

杨得志听得出来，朱德在“开辟”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有着特别强调之意，急忙点头表示理解。

“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朱德继续说，“当年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

这些都是杨得志亲身经历过的事，如今从朱德嘴里说出来，又鼓舞了他战胜新的困难的信心。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抬手抹着脸上的汗水。

“这天气太热了！”朱德又拿起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喊了一声：

“警卫员，弄个西瓜来，为我们上抗日前线的勇士送行！”

不一会儿，切开的西瓜端了上来，红红的瓢，黑黑的子。朱德先让杨得志吃，然后自己才拿起一片，边吃边说：“你们到了那个地区，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因为据了解那里的日军主力比较少。但那里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多得很，据说司令多如牛毛。怎么办呢？毛主席说战胜日本有3个条件，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工作艰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复杂，不过我看没啥了不起的嘛！”

杨得志边听边品味朱德话中的意思。从朱德谈古论今、闲聊似的谈话中，他学到了理论，学到了实际，也学到了历史知识，不由得从心里赞叹道：“多么和蔼可敬的总司令！”

离开朱德住处，杨得志返回旅部。这时，他不但明确了任务，也有了胜利的信心。他的脑海里，细细地思考着怎样前去开辟根据地的各种问题……

挺进冀鲁豫边区

翻过太行山，越过平汉铁路，杨得志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这条铁路线是日军控制的，白天黑夜都有兵力封锁。他一直把这里看做一道关口。现在，100多人的部队终于从淇县、汤阴之间全部过来了。

已经告别大部队十多天了，可那情景还在眼前。

听过朱德的谈话和交代，杨得志回到旅部就政委黄克诚研究确定，将第687团留在晋东南，由杨得志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领100多人去河南滑县，与已到那里的第689团会合。

杨得志看着黄克诚，目光里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他心想，不能和黄克诚一起行动，自己如何带领部队单独完成任务呢？这不仅因为黄克诚的年龄比他大，更主要的是黄克诚是一位老同志，长征之前就任红3军团的政委，有着丰富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经验。他刚来到这个旅，对黄克诚有些依赖思想，便说：“你不能一起去，我的心里真没有底啊！”

黄克诚笑了，抬手在头顶上划了个圈说：“你有这些想法不奇怪。平型关战斗后上级派我来的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思想。这次朱总司令亲自找你谈了话，任务已经交代得很明确。老杨，这种时刻派你来接替海东同志的工作，担子是满重的啊！”

“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没底呀！”杨得志说。

黄克诚笑了，用兄长一样的口气说：“不过也不用害怕。关于这支部队的情况嘛，一是去了之后就会慢慢了解的；二嘛，崔田民同志是老陕北，他可以协助你；第三，大家都信任和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简明的话语，真诚的心意，使杨得志很感动。更使他感动的是分别那天，黄克诚一直把他送出安昌村老远。在他一再劝阻下，黄克诚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你们先去打前站，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都得去。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系，好在离得还不算远嘛……”

9月，豫北地区早晚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但杨得志的心里却热热的。他走在队列里，目光扫视着沿途的村庄和田野，洪涝灾害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从看到的人民群众的吃喝穿戴，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几乎村村寨寨都修有土围子，是为防范“兵匪”骚扰的。许多村庄都把围子门关得紧

紧的，大人们都躲了起来，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远远地张望着，神情紧张地瞪大好奇的眼睛。看着这些，杨得志的心里阵阵作痛。他恨不得立即到达滑县，与第 689 团会合，尽快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打击日本侵略者，清除国民党贪官污吏和地方反动势力及土匪武装，把老百姓从这些人的横征暴敛、敲榨勒索中解救出来。

这一天，他发现情景突然变了。尽管群众的衣着也很破烂，但却情绪高涨，热情地欢迎杨得志带领的 100 多人的到来。大人们忙着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

根据这欢腾的场面，杨得志判断到达第 689 团的驻地了。除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还有哪个部队能得到群众这样衷心的拥护和欢迎呢？

杨得志的判断是对的，这里的确是第 689 团的驻区。团长韩先楚、政委康子祥前来迎接他们的代旅长。在陕北西征时，杨得志曾经见过韩先楚。那时他们都是师的干部。尽管现在成了上下级，韩先楚还是非常热情。他们握在一起的手，浸透着深深的情谊。

“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真好呀！”杨得志握住韩先楚的手说，“有些什么经验给新来的同志介绍介绍嘛！”

韩先楚操着一口湖北红安话说：“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事事严守纪律，处处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这就行了！”

确实是老一套，可也是老传统。杨得志当然能够理解，因为在赣南，在闽西，甚至在长征路上，到达陕北之后，他和他的部队也都是这样做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着共同的性质，也就有着一样的做法。杨得志也懂得，说起来容易，可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韩先楚他们，也一定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住下之后，韩先楚又向杨得志详细介绍了当地的情况：中共直南特委成立以后，各地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但由于这一带反动势力比较强，党的活动还处在秘密或半公开状态。已经建立起来的几支游击队，武器装备很差，成份比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也没有跟上，所以战斗力较弱。最主要的还是党的统一领导没有完全形成，中坚力量不强……杨得志静静地听着，觉得这些情况都非常重要。

“你们来了就好啦！”韩先楚最后说。

杨得志以赞扬的口气说：“你们搞得不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看关键问题还是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就我们来说，要多打几个胜仗，煞煞敌人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情绪。”

韩先楚点点头，说：“是要这样。”

“局面已经打开，经过大家的再努力，形势会越来越好的。”杨得志说。

“我们要找准机会，再打几个胜仗。”韩先楚说。

杨得志说：“好！就看时机了。”

几天之后，杨得志收到了总部的指示，他对韩先楚说：“时机来了，有一股伪军在冀南地区受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领导的部队的打击，正向南逃窜。总部要我们进行截击。”

韩先楚高兴他说：“太好了！”

这股伪军原系国民党的军队，投降了日军，其头目叫扈全禄。杨得志和

韩先楚认真研究后，立即率领部队进行追击。他们从滑县开始，经过浚县，跨过平汉铁路，一直追到汤阴以西，终于全部歼灭了扈全禄的部队，俘虏 1400 多人，其中有两个旅长和 1 个团长，并解放了滑县县城。

一个月之后，杨得志指挥的部队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离高平，出壶关，经全涧，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不足 100 人的队伍，第二次走在前往冀鲁豫边区的路上。

去年深秋，卫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鼠疫。为了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部队的战斗力，上级党组织一面要求地方党组织安排好群众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同时指示部队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元旦过后，杨得志接到总部的命令，让他和崔田民到冀鲁豫去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他和崔田民决定带领 1 个工兵排和 1 个炮兵排前往。黄克诚说：“这两个排不足百人，太少了。你们再多带点部队吧。”

杨得志说：“我和老崔已商量过了，太行山是日军目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一把‘干柴’，一点燃就能烧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

1939 年 2 月初，杨得志率领部队顶着寒风，来到平汉铁路的一个火车站附近。放眼看去，北风凛冽，冰雪遍地，携家带口的难民们成群结伙地沿街乞讨。孩子的哭喊声，老人的呼叫声，不绝于耳。人们身上穿的是破烂的衣裳，颤抖的手上捧着破碗……一幅凄惨景象。

正是快过春节的时候，这里竟然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杨得志想起了根据地的情形。那里的人民群众，过了元旦之后就兴高采烈地筹办着过春节，欢腾而又热闹；而这里的人们，失神的眼睛里流露的是恐惧与绝望。

面对这种情景，杨得志心里很难过。他看到战士们也一个个脸色庄重，眼睛湿润，尽管他们嘴里都没有吭声，却默默地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老乡那干瘦如柴的手里。

杨得志的挑夫老谢，把身上的口粮全部送光了，而面前还站着两个孩子。他又在箱子里翻找着可送的东西。

“警卫员，把我的口粮给老谢。”杨得志说。

警卫员明白，杨得志是让把口粮给老谢，再由老谢送给群众，就说：“不，你的口粮一粒也不能动！”

杨得志理解警卫员的心情，和蔼地说：“把口粮给老谢吧，你看那两个孩子多可怜啊！”

警卫员当然也看到了，他又何尝不可怜孩子呢？可他有他的责任啊！在杨得志的催促下，他才不情愿地把口粮递给老谢。

老谢只给了孩子们很少一点说：“首长的口粮不能动。”说着，他把两块在陕北一次战斗中拣的老羊皮披在两个瑟瑟发抖的孩子身上。

部队过了平汉路继续前行。行进中谁也不说话，但那有力的脚步声，却是大家激愤心情的流露。

不久，杨得志和崔田民带领的工兵排、炮兵排从五陵集渡过卫河，在浚县、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是从第 344 旅 3 个团各抽 1 个连组成的，总共只有 1 个营的兵力。会合之后，部队进入

东明地区。

东明位于鲁西南的边缘。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已建立了两支游击队。杨得志经上级批准，将自己带的部队和这两支游击队编在一起，组建成一支统一的部队，共约 2000 多人，称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他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开始，支队下辖 3 个大队：第 1 大队长刘震，政委李雪三；第 2 大队长覃健，政委常玉清；第 3 大队长鲍后祥，政委刘汉生。不久，又增加了 4、5 两个大队，第 4 大队是由背叛地主家庭的吴大明拉起的队伍；第 5 大队是由当地一支成分复杂的部队改编的。这样，整个支队就有了 4000 多人。

这一天，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参谋长卢绍武在一起分析情况。

卢绍武说：“虽然到这里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人民群众就了解了我们。”

“是啊！”崔田民说，“确实和我们刚到来时大不一样了。”

对此，杨得志的心里也十分清楚。他们到达这里以后，就遵照总部的指示精神，着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可是，受到敌、伪、顽反动宣传影响的人民群众并不了解八路军，他们不敢接近八路军，一见到八路军就往土围子里跑，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这些土围子筑得高，墙也厚。躲在围子里的男男女女都操起大刀、梭标，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八路军靠近。

“不让靠近就不靠近，更不许攻打！”杨得志等支队领导给部队下达了命令。他们要求干部战士在围子外面做工作，一边宣传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一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命令很快变成了部队的行动。

围子里的群众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知道，八路军凭着手里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但却没有这样做。更主要的是，八路军不侵犯群众利益，还处处保护他们。最初，他们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八路军通过；后来又让八路军在围子里休息，还送开水。八路军喝了水竟然还付钱，这使他们更感到惊讶。休息的时候，八路军官兵就对群众说：“我们是来和你们一起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交钱，损坏东西赔钱，是八路军的纪律。”再后来，有的老百姓就说：“你们这支队伍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

想到这些杨得志说：“要取得群众的完全信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对！”崔田民说，“群众是希望打败日寇和汉奸，但又不那么相信我们。看来，还得靠事实说话。”

卢绍武说：“你们两个说的对。我看，咱们就先拿金乡的日军开个刀吧？”

杨得志思索了一会儿说：“我看行！”

崔田民说：“我赞成。”

不久，冀鲁豫支队便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取得了一次次胜利：他们对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进行了突然夜袭，震惊了日本侵略者；在金乡县的白浮图，他们对日军的一个汽车队发起突然猛攻，将日军赶跑，大长了群众的志气；他们连克曹县、定陶，歼灭了两个县城的反动武装……

看到八路军如此英勇顽强，对日军和汉奸、伪军敢打能胜，人民群众原来的疑虑打消了。他们不但相信了八路军，还有些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各县也都成立起游击队、民兵联防组织和妇救会等。一个抗日的新局面出现了。

对付汉奸土匪司令

怎样对待白毛集土围子的问题，摆到了杨得志的面前，等待他作出决定。

杨得志早就得到过部队的报告：有个叫白毛集的土围子，不但群众发动不起来，八路军连进都进不去。因为有几个汉奸头子盘踞在里边，打着日本的旗号威吓群众，谁要反抗，或者说八路军几句好话，便被送给日寇或在当地杀害。干部战士都要求打开这个土围子。

当时杨得志没有同意说：“先警告他们，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是不是吃中国粮食长大的，是不是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

经过一段时间后，部队又报告说：“他们仗着有武器，硬是不听我们的警告。”

怎么办？杨得志陷入了深思。对此，他是有思想准备的。早在第一次出发到冀鲁豫边区来之前，朱德就对他说过的，这里的土匪多，司令多如牛毛。来此之后，他才真正感到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些土匪司令。这些队伍的成员复杂，有一部分是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当汉奸的民族败类和坚决反共分子，更多的却是满脑子杀富济穷思想的无业游民和极端贫困的农民。前一部分亲日反共分子大多与日寇和国民党有勾结，经常给日军通风报信，不准群众和八路军接近，否则以“通共匪”论处，甚至把无辜百姓抓去送给日本人杀害。后一部分人动摇性大，反复无常，既和一些反动道会门有密切联系，又和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八路军，人民群众既害怕，又不了解，以至冀鲁豫支队刚来时，有的人竟问：“你们叫什么支队，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呀？”

杨得志认为，对于上述两种人，还是坚决执行党的一贯政策，能争取的，就把他们改造成抗日的武装；对汉奸武装和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动分子，要毫不手软地给予严惩，既警告其他的土匪司令，也能起到鼓舞群众的作用。

杨得志的想法，得到崔田民和卢绍武的赞同。于是，部队很快就作好了攻打白毛集土围子的准备。

部队就要出发，官兵们士气很高，他们早就对那些土匪司令和土围子恨之入骨了。

崔田民首先站到队伍前面说：“今天去打白毛集土围子的主要任务是抓汉奸头子，惩治那些民愤最大的反动分子，煞煞他们的威风！但对受迷惑的人，还是要争取他们抗日。”

卢绍武也说：“抓住汉奸头子决不客气，这叫杀一儆百，警告那些死心塌地跟随日本人的民族败类！既要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抗日一边来，也要爱护老百姓。”

杨得志没有说什么。他看着斗志旺盛的干部战士，嘴角流露出微微笑意。他心想，凭我们的力量，打这样的土围子还是足够的。

不出杨得志所料，部队发起攻击后，没费太大的气力，很快就攻进了白毛集土围子，将几个汉奸头子全部抓获。

为了发动群众，杨得志随即以冀鲁豫支队的名义，召开公审大会，大张旗鼓地宣布汉奸头子的罪行，并当场将他们枪决。这一来，广大群众拍手叫好，附近的顽固派分子受到很大的震慑。

此后一段时间，冀鲁豫支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对付汉奸土匪司令上。

一次，杨得志亲自和刘震一起，带领部队护送 50 多位从延安来的干部过陇海铁路到新四军去。他们从东明和曹县之间出发后，必须经过一个叫尹店集的村子，可这个村子却被一支土匪部队占据着。为了搞清情况，就派支队侦察参谋唐毅山带领侦察班前去侦察。

杨得志以为，唐毅山原是第 689 团的连长，曾跟随韩先楚到这一带活动过，对地理、民情、风俗习惯乃至帮会内幕都比较熟悉，很快就会完成任务，弄清情况，顺利回来向他报告。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唐毅山还未回来，甚至没有一点消息。杨得志有些担心，对刘震说：“会不会发生意外呢？”

“难说呀！”刘震像回答杨得志的问话，又像自语。

“让部队跟过去！”杨得志说。

刘震传达了杨得志的命令，部队警惕地向尹店集接近。刚到围子外，迎面碰到唐毅山和他带领的侦察班。看到杨得志，唐毅山跑步上前报告：“那班‘响马’解决了。”

“响马”，是当地群众对强盗的称呼。部队来到后，也学老百姓这样称土匪武装。

杨得志很高兴：“怎么这样快？”

唐毅山绘声绘色他说：“我化装成开封派来的副官，趁黑夜闯进围子。先到岗楼上捆了两个呼呼大睡的哨兵，然后走到他们的司令部，抓住那个‘司令’，缴了他和马弁的枪，用枪指着他的脑袋，逼他下了投降命令。就这样一枪没放，俘虏了 280 多人。”

“好！”杨得志的语气里充满了赞扬。

刘震问：“俘虏在什么地方？”

唐毅山答：“全关在他们司令部的大院里，一个也不少。”

杨得志说：“走，我们去看看那个‘司令’。”

当杨得志和刘震走进大院时，看到那个土匪司令正战战兢兢地坐在一个板凳上，其他人则在地上蹲着。除了土匪司令以外，所有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头发、胡子长得像刺猬。这些俘虏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你们不要怕。”杨得志大声说，“我们八路军主要是打日寇，打顽军的。只要你们不再当汉奸，不祸害老百姓，我们一不打，二不杀，还可以放你们回家去。”

俘虏们慢慢地抬起头，一双双眼睛里流露出怀疑的目光，好像在说：该不是骗我们吧？

“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凡是愿意打日本鬼子的，我们都会与他们联合起来。你们都是中国人，吃中国的粮食长大的，难道就心甘情愿跟着日本人走？”杨得志继续讲。

俘虏们默默地听着，投过来的是半信半疑的目光，仿佛在问：你们真的说到做到吗？

杨得志见一时很难打消这些俘虏们的疑虑，而且护送干部的任务也不允许在这里久呆，便让部队带上俘虏们一起走。出了尹店集不远，杨得志又让部队遣散了俘虏。那些俘虏们非常感激，有的人还流出了眼泪。那个土匪司令却趁机逃跑，被战士们开枪打死。

将延安来的干部送到新四军后，杨得志总结尹店集的经验，感到那些被称为土匪的武装力量，确实不是铁板一块，大多数人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于是，他们先对绰号“王四拐子”的土匪司令展开了政治攻势。首先，派人弄

清他的情况，知道他曾在冯玉祥的部队干过，以后自己拉起一二百人，占山为王当了上皇帝。他的心态是既怕日军打他，又怕国民党军队赶他。杨得志抓住他这个弱点，派人与他联系，然后亲自和崔田民同他谈话，鼓励他抗日。他见八路军没有吃掉他的意思，也不歧视他，就改变了态度。以后，他不但向八路军靠拢，送情报，还对日军打游击。

还有一个叫刘杰三的上匪司令，已经五六十岁了，拉起几百人的队伍。他的卫队，每人一支步枪一支驳壳枪，全部骑自行车，很是威风。杨得志多次派人做他的工作，也亲自教育他，终于把他争取到抗日的队伍之中，并且委任他为这支队伍的司令。他很满意，逢人便说：“我是八路军委任的司令，正牌的！”可是因为他有3个老婆，一些人就想不通说：“一个人3个老婆，地主老财嘛，霸占民女嘛，怎么能当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的司令？”

听到这样的反映，杨得志就做思想工作说：“你是先动员他去抗日好，还是先动员他退了3个老婆再去抗日好？我看还是先抗日好。你先动员他退老婆，他就未必能参加抗日活动了，那样不是更不好吗？”

卢绍武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一些人说：“你是打土豪劣绅出来革命的，人家刘杰三是拉队伍占山为王的。你是共产党员，党教育多年的红军战士、八路军战士，是为打日本到敌后来的；人家刘杰三在我们来之前还不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哩。3个老婆有什么要紧？带着3个老婆打日本鬼子，对刘杰三这样的人来说，我看可以，可我们这些人不行！支队长、政委、我和你们大家现在没有老婆，日后也只能一人一个老婆。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这话把人们说笑了。联想到那些被争取过来的土匪司令，大家又觉得有道理。

彭德怀拨给一万银元

马蹄踏踏，北风萧萧。

杨得志骑在马上，凛冽的寒风扑打着他那单薄的棉衣，从他的耳边掠过；但他身上却出了汗，湿湿的。他加鞭猛催，让马跑得再快一些。警卫员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见到彭老总就有办法了。”杨得志心里说。

自从对土匪司令分别采用打击和争取的政策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引起了日军的注意和气愤。他们纠集顽军卢翼之部，企图在定陶、曹县一带包围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一举歼灭之。杨得志指挥部队跳出日伪顽军的包围圈，转移到了湖西地区。入冬之后，他在微山湖边的一个小村里，组织部队筹备过冬的物资。

这天，崔田民急忙地从单县赶来，下了马就对杨得志说：“中央军委从延安发来电报，说冀鲁豫边区的战略位置重要，要我们作长期打算，在这里进一步扩大部队，发展和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

“作长期打算，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杨得志沉吟道，“这就是说，中央改变了原来交给我们的‘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的任务。”

崔田民说：“是这样的。”

杨得志说：“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但任务改变了，会带来大量新的问题，工作必须跟上去才行，尤其是部队过冬的吃饭和穿衣问题。”

杨得志的想法是非常实际的。这时的冀鲁豫支队已发展到1.7万多人。

开始，国民党直南专员丁树本和八路军搞统一战线，补给八路军一些钱、粮和其他物资。自他成了亲日派后，不但一点东西不再给八路军，还不断搞摩擦，制造更多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生活本来就够苦的，哪里还有粮食供给部队呢？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真睡不着觉。”杨得志说着，转向崔田民，问：“你看怎么办？”

崔田民一时也说不出好办法，两道浓眉紧皱，显然也在为此事发愁。听到杨得志的问话，他又沉思了一会儿，试探着说：“我听说彭老总现在在内黄，你是不是找他去？”

“这也是个办法。”杨得志说，“好。就这么办！”

就这样，杨得志踏上了去内黄的路。他要找彭德怀帮他解决面临的困难，心里当然着急。

由于长时间奔跑，马身上已浸出汗水，喷出的热气顿时化成缕缕白雾。杨得志稍稍放开缰绳，马跑得慢了一点。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这时他才想起，已经一年没有见到彭德怀了。他很尊敬这位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佩服他指挥打仗的本领，也仰慕他的为人。所以，当崔田民一说去找彭老总，他就立即答应并且很快动身了。

从部队驻地到内黄有二三百里路，杨得志紧赶慢赶到达内黄，找到了彭德怀的住处。

呈现在杨得志面前的，是一户农民的破草屋。屋内，土炕上铺着一张旧席子，炕头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床薄薄的旧被子。彭德怀盘腿坐在炕上，正同几个干部谈话。

杨得志感到不便上前打扰，就悄悄站在一边等着。他看到彭德怀没戴帽子，大概因为好长时间顾不上理发，原来的短发变得很长了，不过胡子刮得很干净，满脸红光，额头上的皱纹格外显眼。

等了一会儿，看着谈话差不多了，杨得志才走上前：“报告彭总，我来了！”

彭德怀抬起头，眼睛一亮，很快下了炕，握住杨得志的手说：“啊，是得志呀！一年不见了，大家都好吗？你们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大家都好。”杨得志顾不上多客套说，“我们那里形势发展很快，现在已有1万7千多人。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那些土匪司令，消灭了一部分，也争取了一部分，还建立了一些抗日政权和群众抗日组织。部队士气很高，信心很足。”

彭德怀高兴地赞扬说：“你们搞得不错嘛！”

“形势是不错，可也有伤脑筋发愁的事呀！”杨得志赶忙说。

“发什么愁呀？”彭德怀的话总是不多，简短而又抓住要害。

杨得志说：“1万7千多人，要吃，要穿，要用，都没有着落。冬天又来了，怎么能不发愁呢？”

彭德怀向来很严肃，脸上很少有笑容。听完杨得志的话，他绷着脸说：“噢，1万7千多人的大军，吃穿用没有着落，这是个大问题，让我也得发愁呀！”

说到这里，彭德怀停了下来，望了杨得志一眼，然后笑眯眯地说：“这么说，你是从微山湖赶来向我‘讨鱼税银子’的了？”

杨得志也笑了：“你说准了，就是找你要钱，要粮，要东西来了。你是

我们的副总司令嘛！”

彭德怀收敛了笑容，背起手，默默地来回踱着。在门口，他停住脚，两眼凝视着前方，两手插在腰间的皮带上，如同一尊魁伟的雕像。

杨得志目不转睛地看着彭德怀，心里惴惴不安：“是不该向他提困难吗？是我的要求让他为难了吗？他会怎样回答我提出的要求呢？”

过了好长时间，彭德怀才说：“困难哪，得志同志！你困难，我也困难，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我们的‘财神爷’供给部的腰包里，据我了解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挤呀！”

杨得志的心猛地一沉，心想这回大概要空手而回了。不过他相信，彭德怀说的都是实话。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对于八路军的副总司令，面临的困难当然更多更大。

突然，彭德怀转过身，笑着说：“可我也不能让你这个1万多人的支队长白跑一趟。怎么办？我批一个条子，你去找供给部的同志，让他们给你1万块银元吧。数目不多，一个人还摊不到1块。这些情况你要向各级干部讲清楚，还是要像在井冈山、在中央苏区一样，一靠自力更生，二靠从敌人那里夺取！那个歌是怎么唱的？没有吃没有穿，敌人送上前嘛！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

彭德怀说完自己先笑了，在场的人也都笑了。杨得志的笑则是若有所思……“怎么样？”杨得志一回到部队，崔田民、卢绍武就急切地问。“给了一万块银元。”杨得志说，“这可是彭老总下了很大的决心才拿出来的。他要我告诉大家，现在各个根据地几乎都相当困难。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是自力更生，二是从敌人那里夺取！”崔田民和卢绍武一齐点头。

杨得志坚定地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向上伸手了！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得去找敌人要！”

“那我们就打一次汉奸，一个民愤大、又有钱有物的汉奸。”崔田民说。

杨得志说：“打谁呢？”

卢绍武说：“打‘高二穷种’，怎么样？”

这个绰号为“高二穷种”的汉奸，实际上地多、粮多、钱多，一点也不穷。他盘踞在单县西南青堌集一带，和日寇相勾结，家里挂着两面日本旗和日本授予他的委任状、指挥刀，依靠日本的势力，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他虽然半身不遂，却霸占30多个年轻妇女做他的姨太太，群众恨透了他。

“对，就打他。”崔田民说。

杨得志说：“打这样的汉奸，既可以为民除害、解气，也可以解决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就打他！”

决心下定之后，他们进行了充分准备，然后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乘夜攻进镇子内，捉住了“高二穷种”。

第二天，部队先押着这个大汉奸游街示众，发动群众揭发他的罪行，然后通知他家里的人拿钱来赎他的命。

“要多少钱？”“高二穷种”家里人问。

部队说：“7万块银元。”

“高二穷种”家里人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呀！”

部队说：“拿不出我们就杀掉他！”

很快，“高二穷种”家里人送来了7万块银元，领回了“高二穷种”。

当一些战士和群众不理解时，崔田民解释说：“我们这次打‘高二穷种’，

一是教训教训他，煞煞他的威风；二是解决我们的经济困难。我们共产党、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他继续当汉奸，帮助日本人欺压中国人，我们随时都可以惩处他！”

有了7万块银元，部队用它买粮，买布，买棉花，发动群众赶做了1万7千多套棉衣。

看到干部战士穿上了基本一色的新军装，杨得志脸上露出喜色，心想这比伸手向上级要光彩多了。

以“挤”对“挤”

杨得志手握电话听筒，凝神地听着。他的动作很轻，连自己的喘息也极力控制，唯恐发出响声。因为他是在偷听电话，要防止被人家发现，一点声音都不能有。

“这是丁树本的口音，这是那个伪县长的口音。”杨得志边听边心里说。

丁树本是河北人，据说曾在冯玉祥的部队里当过书记官，后来被国民党任命为直南专员兼保安司令。杨得志到冀鲁豫边区后和他接触过。开始的时候，他的表现还不错，愿意抗日，对八路军的态度也好。不久他就投靠了日本人，越来越反动，最后竟挥动屠刀，杀了不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有人提出要狠狠地教训他一下。当时杨得志想，表面上他还是和我们合作的，要打就要打得有理，打痛他。可他有两万多部队，每县还有人数不等的保安队，要打痛他并不容易，所以一直没有下决心。

决心虽然没有下，但杨得志的心里却始终在考虑对策，寻找时机。前些天，他听说濮阳与东明县之间有一条电话线从这里经过，是丁树本的，就打电话兵把线搭上，直接接到他屋里的电话机上。今天听到电话铃响，他拿起听筒，听出是丁树本和东明县县长在通话，就听了起来。

简短的寒暄之后，丁树本问：“你们那里怎么样？”

东明县长说：“不好啊！日本人经常来‘扫荡’；共产党八路军建立了这个组织那个组织，他们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

丁树本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这里本来很好，八路军来后日本人才来‘扫荡’，弄得到处乱了套。”

“这还不算。”东明县长说，“丁司令，我看他们是借抗日为名，行招兵买马、扩大实力之实呀！”

“是这样的。”丁树本说。然后他一个个点着杨得志、崔田民、卢绍武的名字，破口大骂起来，什么“假抗日”、“游而不击”、“共匪”等词都用上了。从声音可以听得出来，他是十分仇恨共产党八路军的。从电话里甚至可以听得到咬牙切齿声。

杨得志心里非常气愤。他紧紧攥住听筒，眼里喷出怒火，心想：这证明他们表面说的那些“联合抗日”、“欢迎前来”的话都是假的，都是骗人的。他真想大喊一声：“住嘴，你们这些反动分子！怎么能说日本人的‘扫荡’是我们招来的呢？”但他还是努力控制住自己，心里说：“要冷静，冷静，冷静。听听他们再说些什么。”

这时，电话里传出的是东明县长的声音：“得想想办法呀，要不然，这里就不是我们的了！”

丁树本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继续下去的。我已和其他各县的县

长商量过了，联合起来，把他们挤走，一定要把他们挤走！”

“如果他们不走呢？”东明县长担心地问。

“那就挤垮他们！”丁树本愤愤地说，“各县要一条心，坚决把他们挤垮挤走……”

丁树本和东明县长结束通话好长时间，杨得志才猛地放下电话，大声喊道：“通讯员！”

3个大队的主要干部都来了，他们的目光集中在杨得志身上。他们知道，让他们一齐来，肯定有什么重大的行动。通过这段时间的实践，他们已经完全熟悉支队长的一举一动了。

杨得志扫视一遍在座的人后说：“从听丁树本的电话知道，他们想要‘挤’走、‘挤’垮我们。请大家来研究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对付？”

大家知道，过去有人提出要教训丁树本，杨得志总说要打得有理有利，但就是不说具体的。现在，虽然杨得志说话仍保持了向来的平静语气，但从他加重“挤”字的口吻，大家听得出来他胸中充满愤激之情，猜想他已经下定了要打的决心。

“打！”有人说，“他不抗日，想来对付我们，我们就不能客气了！”

“凭我们现有的兵力和群众基础，打丁树本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人说。

也有人用担忧的口气说：“他们会不会把破坏抗日的罪名加在我们的头上呢？”

一阵沉默。人们看着杨得志，等待他的最后决定。

“打是要打的，不过得讲究方法。”杨得志说，“人家是要‘挤’我们，我们就给他来个以‘挤’对‘挤’。怎么样？”

这个办法，很容易理解，可具体怎样做呢？大家仍心里无数。因此仍然看着杨得志，等着他继续往下讲。

杨得志稍稍停顿一会儿，又说：“他们现在还打着‘联合抗日’的旗子，我们也不能丢掉这个旗子。怎么办呢？那就是将计就计，用‘联合’的名义，派部队到直南的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等5个县去驻防，看准时机，各个击破。”

“这个办法好！”人们一齐说。

思想统一了，办法也有了。会后，冀鲁豫支队立即向南乐等县派出了部队，有的县1个连，有的县1个营。

很快，各个县的情况都汇集到杨得志的面前：八路军到达后，各个县的顽军头子开始时都很紧张，后来看到八路军纹丝不动，慢慢又恢复了正常。

根据这一情况，杨得志再一次强调：要沉住气，不要暴露我们的意图。一方面麻痹他们，一方面摸清楚他们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做到心中有数。

又过了一些日子，驻各县的部队又报告说：顽军麻痹了，情况也被侦察清楚了。

“看来到时候了。”杨得志心想。于是，他去找丁树本“摊牌”，揭露其妄图依靠日军挤走、挤垮八路军的计划。

丁树本当然不承认有这样的计划，说杨得志是无中生有，是制造借口破坏抗日。

杨得志严厉地说：“谁抗日，谁破坏抗日，各自的心里都很明白，老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

丁树本也不相让：“这里是我们的地方，你们根本就不该到这里来！”

“好吧，”杨得志弦外有音地说，“对于不抗日还打八路军的人，我们一定要严惩他的！”

杨得志的话，迅速变成了行动。已经作好准备的部队，在同一时间里，在几个县同时发起突然进攻。丁树本虽然有2万多人和5个县的顽军，由于没有准备，等到发现八路军的行动时，已经措手不及了。在八路军的强大攻势下，顽军少数溃散，大部分被歼灭。丁树本眼看无力抵抗，只得领着千把人逃往豫西，慌乱中连大衣和图章都未来得及带走。

战斗结束之后，杨得志心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自从春天以来，八路军已讨伐了顽军石友三、高树勋和卢翼之等部，今又将丁树本部打败，并逐出了冀鲁豫边区。现在，冀鲁豫边区已完全控制在八路军的手里。

中共中央北方局得到报告后，立即决定建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这个地区的抗日武装，任命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3个军分区。

讨顽的胜利，军区的成立，既使杨得志喜悦，又使他感到肩头担子的沉重，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在这残酷、复杂、多变的对敌斗争中，既要经得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也要经得起不断胜利的考验。军区成立之后，他在和政委崔田民交谈时，又说起了王凤鸣。

王凤鸣是一个红军干部，参加过长征，战斗中负过伤。到湖西地区后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在那里，他支持和参与大搞“肃托”运动，整了不少党政干部。罗荣桓亲自去处理此事，严厉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表面接受，可没过多久，他竟然于夜间逃跑，投降敌人当了汉奸。

谈到王凤鸣，杨得志感慨地说：“经不住考验就会这样。我从685团到344旅上任时，他还和我一路同行过呢。”

崔田民说：“所以他给你发电报呀！”

原来，王凤鸣参与大搞“肃托”时，曾打电报给杨得志说，鲁西南地委以下的不少干部是“托派”，要杨得志将其逮捕起来交他们处理。杨得志接到电报后就和崔田民商量，一致认为：一是不能怀疑自己的同志；二要记取历史教训：三是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决不能这样做。因此，他们一面向上级写报告反映情况，一面给王凤鸣回电表明自己的意见。

“连罗荣桓政委的话他都不听，还能听我们的意见！”

“是啊！”杨得志说，“我们到湖西时还当面和他谈过，指出要吸取中央苏区‘肃托’，以及陕北地区对刘志丹等同志错误处理的教训；可他就是听不进去，所以才落得后来的下场。”

崔田民非常理解杨得志此时提起王凤鸣的用意便说：“是呀，我们能够站住脚，能够对付土匪司令，挤走顽军，完全是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支持。任何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点啊！”

“对！还是要按党的政策办！”杨得志说着，抬眼望望长空。只见万里蓝天，飘着几朵白云。他心中开始筹划下一步的战斗……

反日军大“扫荡”

薄薄的春雾笼罩在冀鲁豫边区大地上。杨得志和崔田民、卢绍武几位冀鲁豫军区领导人聚在一起，研究“皖南事变”发生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杨得志等人是在豫北卫河东岸的内黄地区得到“皖南事变”的消息和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处理这一事变的命令、谈话及指示的。愤怒、悲痛的情绪在他的胸中翻腾，几天都无法平静下来。是啊，在新四军中，杨得志有许多老战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总是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但残酷的斗争磨练了这位血性男子汉，他的情绪很快平静下来。他用更努力的工作来缓解心中的悲痛，用指挥部队打胜仗来发泄对敌人的愤怒。

“最近一段时间，部队中出现了一些急躁情绪。对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同志怀有悼念之情，这是应该的；但有些同志每天都想着如何报仇，急于报仇，恨不得现在就把反动派消灭掉，这是不现实的。要有长期坚持的思想。”崔田民的话低沉而有力。

“对，应该避免这种急躁情绪，坚持长期斗争，尤其是在一些指挥员身上。”

杨得志说着，想到了一年之前的事。那是经过13天时间反日军“扫荡”之后，中央军委发电征求他们的意见，问是留在原地坚持斗争，还是到苏北地区发展根据地。他和崔田民、卢绍武一方面感到这是中央的体谅和爱护，一方面认为这块根据地是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用血汗换来的，不能离开。于是发电给中央军委，请求留下来。想到这些，他说：“一定要让同志们明白，我们应该坚决按党中央的指示办。我建议，各部队除抓紧时间向下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外，还应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要向全体指战员指出，现在形势恶化了。在抗日根据地被日、伪、顽‘蚕食’分割、封锁的情况下，要把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坚持下去，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以斗争求生存，在斗争、生存中求发展。对敌人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我们要时刻准备迎接更加残酷的考验。”

“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会助长日寇的侵略气焰。”卢绍武说，“敌人会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我们必须作好准备。”

“好，就按照我们商量定的办。”杨得志最后说，“大家分头下到各个部队，了解情况，教育部队要学习好、训练好。应当看到，敌人给了我们悲痛，也就同时给了我们力量！”

果然不出所料，1941年4月12日，日军从内黄到清丰、濮阳、浚县、滑县一带的沙区（亦称黄泛区）内，开始了极其残酷、疯狂的大“扫荡”。

杨得志得到敌人大“扫荡”的情报后，迅速赶回驻在濮阳以西的军区指挥中心。这时，国民党“剿共第一路军”李英部约2000余人，正向濮阳地区疯狂进攻。杨得志以第2纵队主力一部投入战斗。第2纵队与当地民兵紧密配合，很快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并组织部队投入反击。就在第2纵队即将打垮国民党军时，预先集结隐蔽在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等地的日军主力第35师团、独立第1混成旅团和骑兵第4旅团各一部以及伪军共约1万多步骑兵，在100多辆汽车、坦克和20余门重炮的掩护下，分五路向沙区中心地区猛扑过来。

时近傍晚，一望无际的黄泛区里，沙尘弥漫，遮天蔽日，日伪军坦克和汽车的隆隆声穿透沙尘，越来越近。

“司令员，敌人上来了。”通信员急忙跑进指挥所。

“怎么办，司令员？”身边的参谋问。

“不要慌，去看看。”杨得志拿着望远镜走出房屋，登上一处高坡。崔田民、卢绍武也和他在一起。

杨得志举起望远镜，看到四周日、伪军的坦克、汽车和骑兵蜂拥而至，远的相距五六千米，近的不到三四千米。转眼之间，敌人发起猛烈的炮击，炮弹接连不断落在部队所在周围的村庄、田野、沙岗和树林中间，弹片如雨点般四处飞溅，滚滚的浓烟遮住了天空中最后一抹余晖。

看到这种情形，杨得志回头对崔田民、卢绍武说：“从敌人的进攻队形看，他们并不知道我军机关就在这里。如今，他们是机械化，我们只有两条腿，突围是来不及的。部队和机关应该就地隐蔽，待机转移。”

“只能这样了，你快下命令吧。”崔田民说。

“好！”杨得志说，“由我在前，崔政委居中，卢参谋长在后，分别率领机关和部队在附近枣树林中隐蔽起来。”

命令一下，部队迅速集结，并利用烈火硝烟的掩护撤到沙岗中的枣树林里。

夜幕开始降临，由远而近的日伪军，边用机枪扫射，边向前推进。走在前面的伪军，因为没有日军的庇护，不敢贸然进入林中搜索，只是停在原地，等待日军大部队到来。

杨得志在林中看到这一切，迅速带领部队借助黑夜和大风的掩护，从两路敌军的中间穿插到濮阳西北地区。接着，他们又转移到内黄东北面敌人守备空虚的据点附近休息了两天。最后，部队顺利到达山东省范县西北的观城，突破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夜晚，杨得志看望部队后回到指挥部，第4团政委孙仁道正在那里等着向他汇报情况。

“老孙呀，这次第4团担负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伤亡一定很大吧？”杨得志首先关切地问道。

孙仁道还没说话已泪流满面。原来，担任掩护的第2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有第5连的部分人冲出了重围，第6、7两个连的200名官兵都没有冲出来。两天后，派去的侦察员回来说，那里全被敌人占领了，看到不少干部战士的尸体，第6、7两个连的同志一个活着的也没有找到。

“战场上我们的武器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孙仁道硬咽着说。

杨得志的眼睛也湿润了：“200多个同志啊！”

孙仁道用手抹了一把眼泪，激动地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为战友们报仇吧！”

杨得志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在许多次战斗后，看着牺牲的战友，他也是恨不得立即就去报仇。即便此时，他激动的心情也难以抑制；但他还是迅速地使自己冷静下来，说：“老孙，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6连、7连的同志们学习，要化悲痛为力量……”

说到这里，杨得志说不下去了。孙仁道似乎理解了司令员的心思和感情，一句话也没说，郑重地敬个礼，转身走了。

一直坐在屋里的崔田民，也随即站起身来，对杨得志说：“整个部队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杨得志说：“你暂时不要走，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吧。”

话音刚落，参谋长卢绍武和几个团干部一起走了进来。杨得志说：“同志们，大家研究一下，怎样把日寇赶出沙区，保住我们的根据地。”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攻他们的一路！”

“打他们的侧后！”

“多面出击，把敌人搞得顾此失彼。”好，伤亡一定很大吧？”杨得志首先关切地问道。

孙仁道还没说话已泪流满面。原来，担任掩护的第2营，在近百倍日伪军的合击中，经过反复冲杀，只有第5连的部分人冲出了重围，第6、7两个连的200名官兵都没有冲出来。两天后，派去的侦察员回来说，那里全被敌人占领了，看到不少干部战士的尸体，第6、7两个连的同志一个活着的也没有找到。

“战场上我们的武器不少，可没有一件是完整的……”孙仁道哽咽着说。

杨得志的眼睛也湿润了：“200多个同志啊！”

孙仁道用手抹了一把眼泪，激动地说：“司令员，让我们打回去为战友们报仇吧！”

杨得志非常理解这种心情，在许多次战斗后，看着牺牲的战友，他也是恨不得立即就去报仇。即便此时，他激动的心情也难以抑制；但他还是迅速地使自己冷静下来，说：“老孙，回去告诉大家，要很好地向6连、7连的同志们学习，要化悲痛为力量……”

说到这里，杨得志说不下去了。孙仁道似乎理解了司令员的心思和感情，一句话也没说，郑重地敬个礼，转身走了。

一直坐在屋里的崔田民，也随即站起身来，对杨得志说：“整个部队的情绪波动很大，我下去看看！”

杨得志说：“你暂时不要走，咱们商量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吧。”

话音刚落，参谋长卢绍武和几个团干部一起走了进来。杨得志说：“同志们，大家研究一下，怎样把日寇赶出沙区，保住我们的根据地。”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攻他们的一路！”

“打他们的侧后！”

“多面出击，把敌人搞得顾此失彼。”加严酷的斗争和光辉的未来。

煞顽军气焰

1941年的冀鲁豫军区，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由杨得志和苏振华主持，在山东观城东南的红庙村召开了第一次全区高级干部会议。这时的冀鲁豫军区，是由原来的冀鲁豫军区和鲁西军区合并而成的，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卢绍武任参谋长（后为阎揆要），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

红庙村距黄河故道不远，周围树木成荫，土岗环绕，十分隐蔽。时值夏日，天气很热，但从黄河那边吹来的微风，带着丝丝清凉，令人有说不出的舒畅。晚饭后，杨得志和苏振华漫步在沙区青纱帐里，边走边谈。

“老杨，这次全军区的高级干部会议开得不错，同志们的干劲都很足呀！”苏振华说。

“是呀！”杨得志高兴地说，“这次会议，通过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今后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

苏振华说：“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看来已经结成血肉相连不可分

割的整体了。”

爬上一个高坡，杨得志说：“不过，现在的形势也不容乐观呀！根据总部传来的情报，在欧洲，德军在主要战场上对苏军取得了一些胜利，整体战局上处于暂时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日寇的气焰。”

“对！”苏振华赞同地点点头，“尤其是一些伪、顽军队，一看到日本人气焰高了，也随着猖狂起来，近来对我根据地的侵扰也增多了。特别是那个打着‘游击日军’旗号的孙良诚更是嚣张得很，要教训教训他！”

“好！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杨得志大声说，“就拿这个孙良诚开刀，煞一煞他的气焰。”

10月上旬，杨得志带着教第3旅、教第7旅和教第4旅共5个团的兵力，由观城出发，经范县、鄆城到达山东省巨野县地区，准备同孙良诚打一仗。

已到秋天的沙区，由于天气异常干旱，并不像往年那样到处是一片丰收的景象。杨得志独自一人坐在司令部里的地图面前，静静地沉思着。

“报告！”一个宏亮的声音传来。

“进来！”杨得志说。

“报告司令员，教3旅代旅长王秉璋、政委曾思玉奉命来到。”

“好呀，你们来得好快啊！怎么样，这次准备打孙良诚的主力，同志们都怎么想呀？”杨得志开门见山地问。

“同志们都憋足了劲，准备教训教训孙良诚。”王秉璋急冲冲地说道。

“是呀，司令员，我们早就该打孙良诚这个顽固派了。”曾思玉接过王秉璋的话头说，“孙良诚居然敢侵占我们边区的土地，和他谈判要他退出边区，他竟说要退各退一半。哼，根据地是我们打出来的，他们不去打日本，却来这里抢掠人民财产，安的是什么心？这次不能让他们跑掉了！”

“是呀，你们说的对，就是不能让他们把人民的财产抢走。这一仗我们一定要打好！”杨得志停了一下，继续说，“这一次第3旅的任务很重。根据情报，孙良诚现在正进到巨野与定陶两县之间的柳林集、楚楼、黄庄、曹楼等地，处在我3个旅的中间地带。敌人虽然到了我们的包围圈里，但要一口吃掉它，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次我们采取两翼夹击、中间突破的方法，准备连续战斗几次，争取在这一地区消灭该部。打垮孙良诚的这个主力，第3旅的中间突破任务很艰巨，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请司令员放心，3旅保证完成任务！”王秉璋、曾思玉齐声说道。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看到第3旅的进攻速度没有预计的那么快，杨得志带着警卫员急匆匆来到第3旅的指挥部。这时，一发炮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机灵的警卫员迅速用身体挡在杨得志的面前。杨得志一把推开他，大声喊道：“王秉璋，部队进攻的速度太慢了，为什么还没有打下柳林集？”

王秉璋揉着发红的眼睛，懊恼地说：“敌人在镇外的沙坡和树林旁边修筑了3道工事，都很坚固，几次冲锋都没有上去。”

杨得志迅速下达命令道：“把你们的部队分成3个梯队，第一梯队正面用火火力压制敌人；第二梯队从右面绕到敌人的后面，选择攻击点打到镇子里去；第三梯队从左面绕过镇子，直接奔袭楚楼。让曾思玉和副旅长跟着去，你在这里指挥。”

说完，杨得志又回头对跟来的参谋说：“给7旅和4旅发报，让他们对所夹击之敌不要打得过紧，但要时刻注意他们的动向，不要让敌人有一兵一卒增援柳林集和楚楼。”

杨得志的部署，被一丝不苟地执行着。战场的主动权逐渐掌握到了八路军的手里。战斗开始后第5天，王秉璋率领第3旅攻下了柳林集，并按照杨得志的指示，迅速将部队挺进到楚楼一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人的指挥部及主力部队包围在楚楼。

为配合第3旅围攻在楚楼的敌主力，杨得志又命令第7旅及第4旅攻打黄庄及曹楼的敌人。经过5天的激战，敌人被迫龟缩在黄庄及曹楼镇中，不能救援楚楼镇。这时，杨得志又赶到楚楼前线，对各旅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从现在的情况看来，由于3旅一部的行动迅速，敌人的阵脚已经乱了。经过前10天的4次战斗，敌在黄庄、曹楼的部队不敢离开其所筑阵地，怕被我军在运动中歼灭；盘据在楚楼一带的敌人，由于失去外援也失去了斗志。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向敌人发起总攻。7旅和4旅各抽出一部配合3旅对楚楼进攻；对黄庄、曹楼的敌人要注意他们的动向，不要让他们跑掉，但也不能把包围圈缩得太小了，要知道困兽犹斗的道理。”

深秋的清晨，已有了寒意。晨晖还未穿透薄雾，楚楼附近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八路军战士们犹如下山的猛虎，英勇地向敌人的阵地冲去。子弹从他们的耳边穿过，有几个战士倒下了。站在指挥部里的杨得志看到这一切，心里猛地一颤，对身边的通信员吩咐道：“去告诉王秉璋，要尽量减少伤亡。”

战斗仍在继续，枪声、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杨得志站在前沿阵地上举着望远镜，密切观察着战局。

“报告司令员，经过7天的战斗，王旅长已经带着部队打进敌人的指挥部。楚楼一带的敌人已经被我军消灭了，一部分残敌正在败退。王旅长已命令部队分路追击，务必全歼。19团还俘虏了敌军的政治主任。”作战参谋向杨得志报告道。

“好，命令3旅除留一部分部队打扫战场和追击残敌外，主力部队迅速向黄庄靠拢，配合7旅夺取黄庄。告诉王旅长，要一鼓作气拿下黄庄和曹楼。”杨得志兴奋地说。

作战参谋向部队传达命令去了。杨得志在指挥部里对着摊开的地图仔细地查看着。“老苏，在金乡城北的羊山镇有敌人的自卫团总部，距离这里有40多里地。敌人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在同孙良诚部队主力激战之时，突袭这个自卫团总部。既然段海洲的主力部队已被歼灭，乘敌人还不清楚这一情况，我想让3旅派一支小部队奔袭这个总部，捣毁它。怎么样？”

苏振华对着地图沉思片刻说：“可以。但部队的行动一定要快，迟了怕敌人会有防备。你就下命令吧！”

杨得志一挥手，迅速向第3旅下达了新的命令。3天后，第7旅和第4旅分别第3旅的配合下，歼灭了躲在黄庄和曹楼的敌人；被派去捣毁敌自卫团总部的第3旅一部也胜利返回。这一仗前后打了20多天，八路军共歼敌1000余人，俘敌600余名，缴获武器450多件，迫使孙良诚向成武县以西退去。杨得志把第7旅一部分主力留在当地，自己率领大部队迅速返回南乐。

按农村时令，杨得志带部队回到南乐时，已是三秋大忙季节；可是由于天气原因，庄稼见长不见收，玉米、高粱杆子长得还可以，穗子上的粮食却没有几粒。收不到粮食，秋耕秋种又难，不仅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对部队影响也很大。“人民有，我们有；人民富，我们富。我们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啊！”杨得志想着这句话，在房间里踱着步子，思考着解决问题的方法。

“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崔田民拿着一份报告走进房间，对杨得志说：“刚接到5、6分区的报告，他们那里严重缺粮。现在不只这两个分区缺粮，其他分区包括主力部队也开始闹粮荒了。目前，我看这比日伪顽对我们的威胁还要大哩！”

坐在旁边的苏振华也说：“现在各部队都有了钱，可眼下群众自己还填不饱肚子，让大家到哪里买粮食呢？供给部的同志曾提出到敌占区去买，但我想也不那么简单。因为敌人对我们封锁很紧，要去买，就得有武装保护，难免要打仗。仗可以打胜，粮食的解决却没有多少保证。”

“要不就这样，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请来一起研究研究。”崔田民建议道。

冀鲁豫行政公署副主任段君毅被请来了。杨得志将部队严重缺粮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段君毅沉思了一下，说：“沙区今年旱灾最严重，几乎颗粒无收。咱们虽然管不着老天爷，但可以动员群众。我们已经要求其他县支援沙区，5、6分区的缺粮问题，我们一定设法解决。”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自古讲兵马未到，粮草先行，部队饿着肚子打仗总不是个事。我再和各县同志商量商量，尽量为部队多筹集些粮食，不然不但今冬的日子不好过，我这个行署副主任也得‘辞职’了。”

杨得志感激地对段君毅说：“感谢你们，只要有地方党、政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能挺过去。粮食我是得找你这‘父母官’要，但筹粮不宜太多，不能过重地增加群众负担。不然，我这个当司令员的也于心不安哪！”

段君毅笑着说：“军队是群众的命根子，这个道理，老百姓心里是透亮的。当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就是我们尽上十二分的力，也很难完全满足部队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只能给部队一点小小的支援！”

几天后，第1旅旅长朱程气喘吁吁地跑来对杨得志说：“司令员，行署给我们搞的粮食被高树勋的部队抢走了。”

“怎么回事？”杨得志着急地问。

“我们押粮刚路过清丰县的宋村，50余车粮食全被盘踞在那一带的高树勋的部队给夺走了。”朱程继续快速地说，“我们交涉了几个小时，据点里的顽军就是不交出来。”

“胡闹！”杨得志大声说道，“这粮食是人民群众勒紧裤带一粒一粒省下来支援子弟兵的，他们竟敢截留！朱程，你给我把宋村包围起来，限时要他们把粮食交出来。过时不交，就武力解决！”

夜里，朱程又急匆匆地跑到杨得志面前，激动地说：“司令员，他们就是不把粮食交出来。这样不行，还是得打。你不下命令我自己去打，打完了回来你处分我！”

杨得志略微考虑了一下，说：“这样吧，你先回去掌握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我同政委研究后再通知你。不过，你要记住一条，没有命令绝对不许开枪！”

凌晨3点，杨得志正和苏振华研究如何处理高树勋部劫粮这一问题，忽然收到情报：高树勋以八路军围困宋村驻军为由，派两个团的兵力进占了清丰东南的东北庄。

“欺人太甚！”杨得志大声说道，随即对参谋说：“命令南下支队和教3旅的7团，迅速集合！”

11月13日夜，月色朦朦，寒风阵阵。杨得志带着部队从南乐县东的陈村出发，赶到清丰县的东北庄。随着他一声令下，部队向驻在这里的高树勋的两个团迅猛地发起了攻击。经过3天的激战，毙敌600余人，俘敌200余人，给了高树勋一个沉重打击，逼其退出了根据地。八路军不但夺回被抢走的所有粮食，还使冀鲁豫边区得到了巩固。

刘少奇到冀鲁豫边区

1942年的冀鲁豫边区，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频繁“扫荡”和疯狂掠夺，再加上从春到夏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田地开裂，小河干枯，连黄河、卫河、微山湖、东平湖的水位也急剧下降。饥饿和瘟疫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蔓延开来。人民群众毫无目的地逃荒，去山西，闯关外，从这村逃到那庄，由这县奔往那县，在饥饿和瘟疫的死亡线上挣扎。

作为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时时在为眼前的困难发愁：干旱使粮食大面积减产，地方政府征粮更困难，部队只能吃些南瓜和少量的杂合面。这个难关怎么过？

“老崔，”杨得志对崔田民说，“我们要商量个对策才行，否则缺粮和12万余敌人的压力，我们会很难坚持下去的。”

“报告！”崔田民刚想开口说话，一声报告打断了他，军区供给部长傅家选走进屋里说：“司令员，我开会回来了。”

“好啊，一路辛苦啦！我们正商量后勤方面的问题。你坐下来一起说说，总部有什么指示？”崔田民让傅家选坐下，给他倒了一杯水，着急地问道。

“现在，华北各地旱情都非常严重。总部指示各区部队要和党、政、民一起自己救自己，上面拿不出更多的钱和粮食来。如今咱们的钱袋和米袋都空了，这可怎么办呀！”傅家选发愁地说。

“不要愁，党中央和毛主席不是已经有了指示，让我们自己救自己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杨得志安慰说，“老傅，你让供给部的同志想些办法，组织部队开荒种田，注意修一些水利设施，不要因为怕敌人‘扫荡’过来毁坏掉，对一些永久性的水利设施就不修了。我们还是要吃饭，吃饭就要有粮食，没有水怎么能种粮食呢？敌人毁坏了，我们就再修，这也是一种斗争。总之，一定要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办法：依靠群众，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多打胜仗，开展生产，军民自救。”

“是！”傅家选答应一声，转身走了出去。

“老杨，这一段部队的思想工作也不能放松。”崔田民对杨得志说，“我准备到各个分区和基层部队去走一走，了解一下部队的思想状况。”

“好，我们各管一摊，分工协作，团结奋斗，一起渡过这个难关！”杨得志信心十足地说。

在杨得志、崔田民的领导下，冀鲁豫边区军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日寇的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八路军收复了梁山，收复了东明、长垣、兰考地区，新建了南华、滨河两县。与此同时，他们还轮训各地抗日武装，扩大民兵联防，并配合地方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运动，使冀鲁豫根据地更加稳固，并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9月上旬的一天，一匹快马飞进冀鲁豫军区机关。通信员从马上跳下，跑进杨得志的房间，把一个急件递到杨得志手里。

杨得志迅速看了一会儿，便让警卫员把崔田民、卢绍武找来。

崔田民和卢绍武相继来到。卢绍武的性子急，一进门就问：“司令员，有什么情况？”

“刘少奇同志从苏北经山东回延安去，路过我们这里，要听取我们的汇报。”杨得志说。

崔田民说：“少奇同志能够在我们这么困难的时刻来指导工作，真是太好了！但是，据前段时间的情报，日军的12军司令官喜多诚一正在频繁调动平汉和陇海铁路沿线的部队，准备对濮县、范县、观城的中心区域发动‘扫荡’。少奇同志这时候来，是不是不够安全呀？”

“是呀！”卢绍武也说，“敌人这次‘扫荡’来势汹汹，少奇同志的安全问题确实让人放心不下呀！”

杨得志何尝不担心呢？但他又想，作为一个军区，有部队也有民兵，如果不能保证一位领导人的安全，那不是太无能了吗？

他沉思一会儿说：“这样吧，关于少奇同志来军区的消息先不要向下面传达。少奇同志来的路上，沿途要让部队作好战斗准备。这件事由卢参谋长亲自负责，要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是！”卢绍武说。

杨得志继续说：“要密切注意周围日寇、顽军、伪军的动态。他们稍有调动，都要立即报到军区来。总之一句话，我们要绝对保证少奇同志的安全。”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刘少奇在部队的护送下，安全到达冀鲁豫军区机关驻地红庙。

杨得志正在布置反“扫荡”的任务，得到刘少奇已经到来的消息，迅速将任务布置下去，快步走向村口。刚下过一个斜坡，就遇见化了装的刘少奇。他头戴黑色礼帽，身穿灰布长衫，笑容满面地和杨得志握手。

杨得志向刘少奇介绍了身边几个军区领导，以及边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刘少奇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表示慰问。

长期远离中央、坚持敌后斗争的杨得志，看到中央代表刘少奇，有满肚子话要说，恨不得立即听取他的指示。杨得志刚想开口汇报工作，猛然注意到刘少奇布满血丝的双限，以及瘦削的身材，再想到他从苏北一路充满风险的长途跋涉，肯定是很疲劳，于是连忙说：“少奇同志一路上很累，同志们都先回去，让少奇同志先休息一下。”

刘少奇却说：“你们在这里坚持斗争好几年都不累，我走了几十里地，还是在你们的‘重兵保护’之下，累什么？不累，不累，能见到同志们不容易，我们还是先谈谈吧！”

大家走进屋里，杨得志就开始向刘少奇汇报冀鲁豫边区的工作情况，包括几次反日军“扫荡”的经过以及与顽军战斗结果，边区军队的发展以及当前的状况。刘少奇一边听，一边往本上记，偶尔插上几句，多是询问边区建设的问题。

杨得志汇报完后，崔田民、卢绍武以及边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依次作了详细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杨得志请刘少奇作指示。

刘少奇说：“过去没有来过冀鲁豫，对这里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听了大家的介绍，我了解了一些情况；可要我作指示，现在还不行，还说不出的你们有用的意见。这样吧，我们晚上再谈谈，然后我再讲点个人的意见，好吗？”

吃过晚饭，刘少奇又找来几位主要领导，谈了许久，再次询问了冀鲁豫

边区几年来的创建和发展情况，根据地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夜深人静了，杨得志几次催刘少奇休息，他总是笑笑说：“你们多讲一些，把情况讲透，把你们对中央的意见和要求提完。离天亮还早，不要着急嘛！”

在杨得志的记忆中，刘少奇是抽烟的，可见面以来他连1支烟也没抽。于是惊奇地问：“少奇同志，你戒烟了吗？”

刘少奇笑着摇摇头说：“不是戒了，是没有了。”

杨得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和军区的几个同志都不吸烟，从来没有拿烟招待人的习惯。见到刘少奇断了烟，杨得志立即派警卫员找来半包。

刘少奇吸着烟，精神更足了。他继续和杨得志等人交谈了好久，才针对冀鲁豫的情况，就根据地的发展、巩固、地方政权的健全建设、统一战线工作、反“扫荡”等作了详细的指示，提出了很好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意见，同时还讲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刘少奇除了和杨得志等人交谈外，还找区党委、行署的负责人以及机关和部队的一般干部及党外爱国人士谈了话。

杨得志感到，刘少奇的到来对整个冀鲁豫边区各方面的工作是很大的促进和鼓舞，但同时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还有刘少奇的安全问题。当时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边区几次反“扫荡”的成功以及不断壮大，对周围的日寇和顽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敌人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消灭这个抗日的边区。在边区范围内，又有许多敌人派进来的密探，一些住在边区里的反动分子也不时地向敌人透露一些边区军、政情况。更让杨得志担心的是，日军这次调集了大批军队，马上就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摆出的架势就是要将边区政权消灭掉。

想到这些，杨得志几次劝刘少奇离开冀鲁豫边区。刘少奇总是笑着说：“不要紧，有你们在还怕敌人把我‘吃’了？我还想多待些日子，同你们一起反‘扫荡’哩！”

对于这些话，杨得志是非常理解的；但他想到刘少奇肩负的责任更重，还是再三劝刘少奇到安全的地方去。最后，刘少奇只得同意了他的建议。杨得志派部队护送刘少奇从安阳地区通过日寇沿平汉铁路设置的封锁线，安全到达太行山根据地。

刘少奇离开后，杨得志随即开始部署部队的反“扫荡”战斗。

攻打“蚕食”者

进入6月以后，天气格外热。在鲁西南的大片土地上，由于日军的残酷封锁，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指战员面临巨大的困难。

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顾不得天气炎热，正看着地图。这次战斗太重要了。投降日本人的伪军杜淑所部约1万人，以及奉了蒋介石之命的李仙洲所部4个师和2万人的地方部队，一东一西对冀鲁豫边区进行“蚕食”，慢慢形成了夹击之势。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先打杜淑，再打李仙洲。几位领导作了分工，由苏振华、阎揆要率军西歼杜淑，杨得志、崔田民率军东歼李仙洲，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黄敬留守军区机关。6月下旬，八路军一举收复了被杜淑占领的大部分根据地。7月下旬，杨得志和崔田民组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小前指”，率军从朝城地区出发，冒雨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很快集中了第2、5、6共3个军分区的6个主力团和游击队、民兵，在曹县

东南地区对李仙洲顽军发起攻势,以消灭其 4 个师和另 2 万多人的地方部队。

为了调动附近几个县的敌人,在运动中将其消灭,杨得志命令部队首先向李仙洲总部的所在地曹县外围村寨发动攻击。这一举动使李仙洲大为震惊,急令所属第 21 师、暂编第 30 师及保安第 7 旅等向他收缩靠拢,以便等待丰(县)北地区的侯镜如率第 92 军前来增援。

夺取曹县外围村寨的战斗异常激烈。八路军战士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李仙洲为保住自己主体工事的安全,也令部队死守。一天之内阵地几次易手。杨得志在指挥所里密切注意着战局。

这时,一个参谋走到面前说:“报告司令员,刚接到情报,敌 21 师、暂编 30 师正向曹县城运动,保安第 7 旅也正向曹县天宫庙附近收缩。县城外围的村寨,已被我军全部占领。6 分区的两个主力团也已迂回到天宫庙南面。”

“好!”杨得志对崔田民说,“敌人果然上钩了。”

说着,杨得志走到地图前,看了一会儿,然后对身后的作战参谋说:“命令 2、5 分区的部队,明天凌晨向天宫庙的北面攻击,要打得狠一点。6 分区的部队仍按原计划,从天宫庙的南面向敌人攻击。提醒他们要注意敌人的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战斗按杨得志预定的计划进行着。本来已惊慌失措的敌军,被八路军突如其来地进攻打得更加狼狈不堪。看着八路军潮水般地向城墙涌来,敌人有的丢下枪扭头就跑,有的把枪举过头顶缴械投降。

从北面进攻的第 2、5 分区的主力部队很快突破敌人的主体工事,将敌人赶出了几个固守的据点,并迫使敌人放弃天宫庙北面的全部阵地,向天宫庙南面的陈楼、陈庄两地撤退。

杨得志正伏在地图上看陈庄、陈楼两村的位置和地形,通信员跑了进来:“报告司令员,2、5 分区首长报告,敌顽常振山率部进了小范楼村,想要逃跑。他们请示司令员怎么办?”

“老杨,”崔田民对杨得志说,“可不能让常振山的保安第 7 旅跑了!消灭这股反共最积极的顽固派,对分化瓦解李仙洲的部队会有很大的作用。”

“对!”杨得志赞同地点头,扭头对送情报的通信员说:“命令 9 团,包围小范楼,消灭常振山。其余各团按原计划,迅速向陈楼、陈庄前进,务必将敌人压缩到这两个村子里。”

李仙洲所属的保安第 7 旅在旅长常振山的带领下,狼狈不堪地跑进了小范楼村,本以为安全了,万没有想到八路军会紧随其后包围过来,并发起猛烈的攻击。战斗持续到第 5 天深夜,在敌人极度疲劳时,奉命追击敌人的第 9 团团团长何光宇命令全团所有司号员吹响冲锋号,一鼓作气攻进村子,将大部分敌人消灭在睡梦中。敌人除旅长常振山带着一些警卫人员仓皇逃跑外,保安第 7 旅全部被第 9 团消灭。

此时此刻,在陈楼、陈庄两个村子里,歼灭李仙洲部的战斗正激烈地进行着。被包围的李仙洲及其第 21 师、第 30 师等部,凭借地形优势及装备精良拼死抵抗。杨得志站在陈庄外,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敌人的工事。

过了一会儿,杨得志回头对身后的参谋说:“命令各团停止攻击,把陈楼、陈庄两村的水源和粮道全部切断、卡死,对敌人围而不歼。”

“是!”参谋转身跑去。

“老杨,”崔田民说,“我看应该再给各团下个命令,让他们对敌人发动政治攻势,在前沿阵地对敌人的下级官兵喊话,在思想上瓦解他们的斗志,

涣散李仙洲的军心。你看怎么样？”

“好！就照你说的办。”杨得志高兴地说。

接连四五天，陈楼、陈庄的战场上一片平静，听不到炮声、枪声和喊杀声。八路军对李仙洲部队展开了政治宣传攻势。时值盛夏，烈日炎炎，集中在陈楼、陈庄两村的四五千敌人，被八路军切断水源，卡死粮道，每日只能杀马充饥，士气更加低落。再加上八路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不少顽军士兵弃枪逃散，一些下级军官带着整团整连的部队逃到八路军一边。

第19团团长方大鸣兴冲冲地走到杨得志面前说：“司令员，我想了一个好主意。”

“什么好主意？快说来听听！”杨得志饶有兴趣地问。

吴大鸣说：“现在敌人在村子里固守待援，经过我们这几天围困，缺水少粮，肯定急着想突围。我们不如利用他们的这种心情，来一个虚留生路，纵敌出逃，然后打他的伏击。”

“好！你这个吴大鸣，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呀！”杨得志赞赏地看着他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团了，再派20团配合你们。”

“是，保证完成任务！”吴大鸣说完转身走了。

第二天，杨得志刚走进第19团的团部，吴大鸣就高兴地向他汇报：“司令员，昨晚这一仗，我们和20团并肩战斗，一下子就吃掉了聂松溪21师的千把人。”

“好，你们打得很好！”杨得志说，“应该利用这场‘引蛇出洞’伏击战给敌人造成的巨大压力，加强对敌人的攻势。”

“司令员！”通信员急冲冲地跑到杨得志身边，“请你马上回指挥所去。”

杨得志刚走进指挥所，崔田民就说：“刚接到新情况，侯镜如带着92军军部及56师、142师各一部，已进到单县以西地区，正向我军逼近。”

“形势看来变复杂了。”杨得志来回走了几圈，毅然说道，“不能放弃消灭李仙洲的机会。命令2、5分区的部队继续围攻陈楼、陈庄，6分区的部队抽出来阻击侯镜如部。”

在第6分区部队的阻击下，侯镜如部虽然伤亡较大，但还是凭借着优势的兵力和装备，与被围的李仙洲部会合了。杨得志得到这个情报，迅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军事会议。

连续十几天的战斗，使各级指挥员都脸色憔悴。杨得志看着部下，心中感慨万千，但形势却不允许他多想。他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现在的形势很严峻。”杨得志又指着地图说：“侯镜如部和李仙洲部会合之后，对我军歼灭李仙洲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军区党委认为，即使不能在冀鲁豫全歼李仙洲的部队，也要利用我军善于打运动战、敌人的机械化装备在山地不宜发挥作用以及现在顽军内部的士气低落这些有利因素，尽量消耗李仙洲的实力。”“对！说简单点，就是敌人边跑，我们边打，尽量去围住它。如果围不住，也要将它打散、打垮。否则会给苏北的新四军增加压力。”崔田民接着杨得志的话补充道。

杨得志果断地说：“所以我决定，9团、19团、20团在李仙洲的东路追击，其余3个团在李仙洲的西路追击。预计李仙洲因为近日来消耗过多，士气低落，会迅速向在单县的侯镜如部靠拢。东、西两路部队一定要迅速行进，争取在单县附近歼灭敌顽一部。”8月中旬，在杨得志的指挥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单县南面同李仙洲打了一仗，将其最得力的爱将曹班亭指挥的暂编

第30师消灭了大半,迫使李仙洲带着4000多人分3路向陇海铁路以南移动。根据杨得志的指示,东、西两路部队沿途又追又打又堵,经过十几日的长途追击,终于在丰县以南的刘庄包围了侯镜如的2000多人,战场的主动权又一次回到八路军的手里。

8月的风雨说来就来。杨得志冒着雨走过泥泞的土堤,到达前沿指挥所。担任主攻任务的第7团和第10团的指挥员正在这里等着他。杨得志浑身湿透,走进屋里向两位团长说:“天公不作美,这么大的雨,会给我们的进攻带来一些困难;但敌人的困难更大,他们2000多人在雨里,走不动,守不住。你们回去告诉全体指战员,战斗会很激烈,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迅速歼灭这股敌人。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保证完成任务,请军区首长等我们的好消息吧!”两位团长大声说。

“好!”杨得志说,“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口号就是打进刘庄去,活捉侯镜如!”

很快,围攻刘庄的决战在枪炮声、风雨声和军号声中展开了。担任突击任务的第7团和第10团的指战员们,高喊着“打进刘庄去,活捉侯镜如”的口号,冒着大雨,踩着泥水,勇猛地向敌人冲去。经过激烈的巷战,到第二天拂晓,八路军全歼侯镜如的2000多人。军长侯镜如在风雨掩护下,只身逃出了刘庄。

至此,历时1个月零两天的粉碎李仙洲等“蚕食”抗日根据地阴谋的战斗,胜利结束。

八公桥“演戏”

历时43天的日军“秋季大扫荡”终于被粉碎了,杨得志十分高兴。想起开始反“扫荡”时,形势是多么严峻啊!日本侵略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由津浦、陇海、平汉铁路沿线调集了3万多兵力,采取陆、空配合,步、骑、车、坦克、炮协同作战,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扑来。但是,敌人的目的并没有得逞……

像过去每一次战斗胜利后一样,杨得志的心里并不轻松。他的信条是:军人永远没有最后的胜利。何况,目前日伪军的兵力还很强大。已经投降日寇、充当伪第2方面军总指挥的孙良诚,仰仗日军的庇护,乘冀鲁豫军区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机,从东明县重整旗鼓,以步步压缩、大筑据点的战术,蚕食濮阳与濮县之间方圆数十里的地区,并且亲率总部坐镇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企图威逼八路军退出根据地中心区。

微带凉意的秋风,轻轻地吹拂着面颊。一个念头掠过杨得志的脑海:袭击八公桥,捣毁敌人的首脑机关。

杨得志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政委黄敬和苏振华的赞同。在军区干部会议上,多数人说着棋走得对,可以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也有人担心,说八公桥位于敌人纵深,防守极其严密,周围群敌环列拱卫,袭击它过于冒险。

杨得志静静地听着各种意见,尤其是那些不同的意见。他知道,每个同志的战斗激情都是高涨的,都是为了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即使不赞成的话,也包含一些合理的成分,一些人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时,黄敬说:“兵不厌诈,以奇制胜,古来有之。用孙大圣钻进铁扇

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可以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嘛！”

“是呀！”苏振华站起来，指着地图说：“前几天，我们乘敌人立足未稳，派第2军分区部队把范县东面的侯庙、莲花池和北面的虞铺这3处敌人全部歼灭，孙良诚会以为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东北方向，暂不可能攻击他的总部。再说，现在‘扫荡’的日寇已经各回原防，伪军失去了庇护，心里发虚，时机对我十分有利。要打敌人指挥中心是得冒点风险，但总的看来，利多弊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胜的条件还是不少的。”

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目光都投向杨得志。他们信任自己的司令员，这是从战斗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有许多次战斗，就是在他的决断和指挥下，化险为夷，最终取得了胜利。

杨得志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说：“应当承认，这是一着险棋。敌人前有5军，后有4军，八公桥附近还有38师两个团和1个特务团防守，装备不错，气势很盛，所以我们轻视不得。但是也要看到，孙良诚过去吃过我们的亏，心有余悸，这是一。其二，敌军是拼凑起来的部队，兵力分散，内部不统一，便于我集中优势攻其一点。其三，八公桥既在敌人纵深，也在我根据地内，便于我秘密接近。其四，敌人觉得坐拥雄兵，防范严密，必然思想麻痹。有这4个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的努力，这一仗是可以打胜的。”

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思想认识统一了，斗志也就旺盛了，部队很快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战斗开始时，已进入冬季。冷风劲吹，天寒地冻，天空偶尔飘落片片雪花。但干部战士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非常高。

按照杨得志的部署，由第2军分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段君毅率领第7、8两团，连同分区机关，从范县转移到鄆北地区。这是杨得志使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法，目的是故意远离孙良诚的部队，摆出强攻鄆城守敌刘本功的架势，以迷惑调动八公桥的守敌。杨得志对这一着棋很重视，部队出发时，他和黄敬亲自前往送行。黄敬对曾思玉、段君毅说：“这正应着《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哩，叫做‘假作真时真亦假’”杨得志没有说什么，只是握着曾思玉和段君毅的手，而且握得很紧，一切嘱托都在不言之中了。

不几天，杨得志就接到这支部队的报告：他们刚在鄆北驻扎下来，就派出侦察员和小股部队，到鄆城附近敌人据点周围大造声势。有的找到伪保长，故意恫吓说：“我军在这一带集结，准备攻打刘本功，走漏了消息要找你们算帐！”有的把敌人哨兵抓来，详细讯问据点的设防情况，然后放他回去通风报信。有的通过内线关系，把假情报直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部。与此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练兵活动，杀声阵阵，刀光闪耀。面对此情此景，刘本功日夜不安，急忙收缩部队，增哨加岗，并拼命向孙良诚呼救。孙良诚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十分高兴，因为这样他自己就安全了，便放松了警惕。八公桥的敌人本来天天向乡长、保长要民夫赶筑工事，此时也要得不紧了。修筑围寨的敌人，也停了下来。他们以为八路军真的是攻打鄆城而不打八公桥。

看到这一招已奏效，杨得志找到黄敬、苏振华说：“这出戏的第一幕已经成功，现在开始第二幕吧。”

“对！”黄敬说，“可以侧攻两门镇了。”

两门镇，位于八公桥西侧，两地相距不远。攻打两门镇的目的，是为了调动八公桥的守敌，使其出动。担任这次任务的主角，是第4分区政委张国华。杨得志对他说：“老张，攻打两门镇是我们这出戏的重要一幕，就看你

们的了。”

张国华是杨得志“抗大”的同学，他点点头，纵身跨上马背，大声说：“放心吧，对付二鬼子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第二天下午，攻打两门镇的战斗开始了。很快，杨得志就收到张国华的报告：战斗打得很顺利，已经歼灭敌人两个连。孙良诚从八公桥东面的徐镇抽调1个团，正向两门镇增援。

“太好了！”杨得志心里想着，对在场的黄敬、苏振华说：“敌人果然听从了我们的指挥，现在该是全面拉开战幕的时候了！”

“对。是时候了！”黄敬说。

苏振华说：“快下命令吧。”

“好的。”杨得志说着，下达了攻打八公桥的命令：第5军分区司令员昌炳桂带第7、8两团，迅速进到濮阳至东明一线，阻击敌第4军；第3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政委刘星、副司令员赵健民指挥第32团、回民支队及县区民兵武装，进到濮阳一带准备牵制、袭扰敌第5军。

与此同时，鄆北、郛北、昆吾、濮阳等县的游击大队也积极行动起来。

在战斗部署就绪后，杨得志和参谋长阎揆要一起随第2军分区主攻部队经过一夜急行军，从鄆北地区到达距八公桥不远的火神庙。他们听了军分区参谋长潘焱关于敌人没有动静的报告后，又经过40多里强行军，于太阳快落山时赶到八公桥附近。

对于八公桥，杨得志并不陌生。多日来，他思考和关注的，就是敌人的这个首脑机关所在地。此时，听了部队的报告，他对此地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八公桥是豫北的一座大镇子，敌人在四周修了坚固的围墙。围墙高约1丈左右，其上密布炮楼和碉堡，外面有堑壕、铁丝网、地雷，形成十分完整的防御体系。

杨得志听说镇子里的敌人悄无声息，围子外的哨兵躲进碉堡避风，知道敌人丝毫没有察觉自己的意图。而此时天气却有了变化，北风大作，黄土翻滚，河流结冰。“不能再等了。”杨得志想着，定下了决心。他立即命令曾恩玉和潘焱指挥第7、8两个团对该镇发起攻击，同时命令助攻部队把周围的电话线切断，将镇子严密包围起来。

曾恩玉、潘焱率领部队，巧妙地越过地雷区，剪断铁丝网，跃过护城河与外壕，架起云梯，翻过围墙，打开了寨门。后续部队接着潮水般地向镇中涌去。

完全失去警惕的敌人，直到杨得志的指挥所移到镇内，才发觉八路军攻进了他们精心设防的八公桥，此时想顽抗已经晚了。碉堡、炮楼、屋子里的敌人，被严严实实地堵住。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惊醒的敌人，抱头鼠窜，四处躲藏，乱作一团。没用多长时间，八公桥就完全落在了八路军的手里。

第二天清早，伪第2方面军参谋长甄纪印被押到了杨得志等人面前。这个孙良诚的参谋长，装束严整，连风纪扣都扣得死死的。他好像还没有从炮火中清醒过来，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看到这情景，杨得志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和军区其他领导一起同甄纪印谈了话，放其回去将八路军的政策告诉孙良诚。

像往常一样，取得战斗胜利的干部战士们，开始在八公桥分头进行抗日宣传，气氛十分热烈。杨得志却沉默不语，他心中又在想下一步怎么办。

告别冀鲁豫边区

黄敬兴冲冲地找到杨得志，问：“老杨，听说上级来了指示，要你带部队到延安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真有这事吗？”

杨得志说：“真有这事。几天前我就接到命令了。因为正在开会讨论制定新的一年的斗争计划，我怕影响大家的情绪，所以没有马上宣布。”

尽管杨得志回答的语气很平静，但心里仍然非常激动。几天来，他总是在想，就要离开战斗7年多的华北了，就要离开创建5年多的冀鲁豫边区了，就要和这里的党政领导和父老乡亲告别了。他对黄敬说：“说实话，我是不愿意离开同志们的，但是你知道，我又不能不离开。”

黄敬非常理解杨得志的心情，沉默了好久才动情地说：“去吧，到了延安，把大家的心愿汇报给党中央，汇报给毛主席！”

“这次我带走冀鲁豫边区的主力部队，你们留在这里，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杨得志关切地对黄敬说，“毛主席说过，从世界大的局势看，日本帝国主义越是到了自己的末日，越是会更加疯狂地对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进行报复。这里的情况，会比过去更加严峻呀！”

“没关系，只要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挥，有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冀鲁豫边区还会是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最有力的地区。”黄敬满怀信心地说，“倒是你们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国民党反动派趁着我们的部队在各自的解放区同日寇浴血奋战，时常想偷袭我们党中央的驻地。这种行为只有卑鄙无耻的政治流氓才能够做出来。老杨，这次你们去保卫延安，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替我们好好教训国民党反动派的部队。”

“这还用你说，我第一个要教训的就是胡宗南。”杨得志说。接下来的日子，是在紧张而又有秩序中度过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冀鲁豫边区的第3团、第11团、第16团、第19团、第32团和回民支队随杨得志开赴延安。为了确保部队的稳定，保证部队长距离行军的安全，杨得志每天都深入到部队中，布置各部队的行进路线，提出同敌遭遇后的各项措施，派出人员侦察边区附近敌人及沿路敌人的行动。他要求政工干部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这些部队在冀鲁豫边区已经坚持斗争5年多，谁对这片土地没有感情？谁又忍心和几十万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告别呢？有些战士是当地人，不想远离自己的家乡，杨得志就要干部给这些战士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给他们讲今天离开就是为了将来更好、更快地回来的道理。有的干部在冀鲁豫边区成了家，部队要边走边打仗，不能带家属，他们有很多后顾之忧。为了把部队顺利带到延安，杨得志废寝忘食，连续几个晚上找各级干部谈话，人也消瘦了许多。尽管十分忙碌，杨得志听说马本斋病重，还是立即赶去看望。杨得志与马本斋相识是在1942年。当时，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发动了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马本斋带着回民支队从冀中经冀鲁边区转战到冀鲁豫边区。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杨得志了解到马本斋朴实、豪放、办事认真、关心群众、爱护士兵以及军事指挥上重视深入实际的品格。当得知马本斋的母亲白老太太在1941年秋季被日寇捕去，以68岁的高龄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最后壮烈殉难的事迹时，心中愤怒难平，对马本斋一家更是钦佩不已。杨得志这次带部队去延安，其中就有马本斋的回民支队。

前些日子，马本斋脖子后边生了个小疮，开始时他并没有在意。几天后却高烧不退，病情急剧恶化，可能波及到脑髓。杨得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立

即派军区卫生部长专程全力抢救，并特地赶到马本斋的住处去探望。

由于较长时间的高烧，马本斋的神志已不太清醒。他看到杨得志走进房间，艰难地睁开眼，嘴唇蠕动着，却发不出声音来。

“本斋同志，你的病好些了吗？”杨得志关切地问道。

马本斋缓缓地点头轻声说：“司令员这么忙，还来看我。”

“本斋同志，你一定要好好养病呀！”杨得志停了一下，继续说道，“中央决定我带部分部队去陕北，执行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回民支队也要同行。”

马本斋点点头，吃力地说：“我是应该和部队一块儿走的。”

“不要急，”杨得志安慰说，“等病好了，你赶上来嘛！”

马本斋摇摇头，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和你们一块儿去延安……”

“没关系，”杨得志说，“我在延安等着你。”

马本斋吃力地笑笑，没有说什么。杨得志看到马本斋虚弱的身体，不忍心影响他休息，就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好照顾他，转身走出了病房。

1月31日，杨得志和黄敬、苏振华、阎揆要等人依依话别后，率领部队从濮县杨集出发，向延安方向进发。走出好远了，杨得志回头一看，送行的群众和军区的领导人还在挥动着手臂。此时，杨得志想到在创建冀鲁豫根据地战斗中的挑夫老谢，水东军分区司令员唐克威，第5军分区司令员朱程等人，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杨得志带领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行军75天，行程2583华里，翻过急流深沟、高山峻岭，冲过日寇在于汉、同蒲等铁路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胜利地到达延安。

刚到延安，就有人告诉杨得志，说马本斋在他们离开冀鲁豫边区没几天就去世了。延安的《解放日报》报道说：“八路军国民支队领导者兼第3军分区司令员马本斋同志因公积劳成疾，终于在2月7日晨病逝于军区后方医院，享年43岁。”延安还为马本斋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等人参加追悼会并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送了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周恩来的挽词是：“民族英雄，吾党战士。”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林伯渠和李富春的挽词是：“率太军，抗日寇，远近播英名，冀鲁豫山河增色；奉教义，承母志，生死矢忠诚，伊斯兰健儿典型！”叶剑英在讲话中说：“值得注意的是，马本斋同志在旧军队里混得很久，深深体验到那种官和兵、军和民分开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中华民族的。因此，他坚决率领他组织起来的部队与八路军合作，并进入党内为党奋斗，一直到死。数年来，他那种坚持性，那种联系群众、官兵一致的精神是极宝贵的。他实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杨得志的心里很难过，想起和马本斋一起战斗的情景，想起离开冀鲁豫时前去看望马本斋的情景，心里说：“他去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那身材魁伟、朴实庄重的形象了！他和许多先逝者一样，把胜利留给了我们，也把重任留给了我们。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

毛泽东的接见

春末的一天，杨得志接到通知，毛泽东要接见他。

这一次，杨得志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急急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枣园。这里原是西北军师长高双成的住房，院子很大，长满了繁杂的花草树木，还有不少很老的梨树。此时，正是绿草如茵春意盎然的景象。

杨得志走向毛泽东住的窑洞，远远就看到一个石亭。花园里有一棵丁香树，紫色的花朵散发出香气。还有一小块菜园，菜的长势很好。

这时，只见毛泽东大步走过来。杨得志赶快走上前，敬了个礼。报告还未喊出来，毛泽东就拉住他的手，亲切、诙谐地说：“欢迎你，杨得志同志。你现在是哪里人呀？是冀鲁豫的，还是我们陕甘宁的呀？噢！对了，你是湖南人氏嘛！”

杨得志看着随便和他拉家常的毛泽东，笑着说：“主席说得对，我是湖南人。”

二人走进窑洞后，警卫员端来了水。毛泽东让杨得志坐下，转头对警卫员说：“我要留这位客人吃饭，给我们加个菜吧。此人是我的家乡人，多搞些辣子就可以了。”

杨得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及在那里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边听边详细地作着笔记。

毛泽东始终听得很认真，不时地点头，却不说话。等杨得志汇报完后，他仍然没说什么，而是关切地问：“长征过后，你有没有专门去学习过呀？”

“东渡黄河后，我曾经到第二期的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杨得志说，“37年初到‘抗大’学习过。都因为要打仗没学完便到前线去了。但您的几次讲演我是听过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打仗创造了经验，我来讲演，如此而已！不过，我是建议你有机会到‘抗大’或者党校去住一段时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嘛！”

杨得志凝神静听，不住地点头。

毛泽东指了指堆在办公桌上的书报文件说：“你看，我也在学。”

“我也非常想到学校里去学习一段时间。”杨得志说，“在冀鲁豫工作的时候，总感到自己的水平不够高，工作起来很吃力。”

毛泽东笑了笑说：“你们在冀鲁豫干得还是不错的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开辟并保住了一片解放区，你干的很不错呀！”

谈着谈着，到了吃饭时间。杨得志跟着毛泽东走进餐厅。刚在饭桌前坐好，毛泽东又说：“部队到陕北后，生活还习惯吗？这里可是黄土高坡，比不得你们的华北大平原呀！”

“没有不习惯的。同志们一听说是来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大家都争着要来呢。”杨得志说，“只是从前方到后方，从打仗到生产，一开始有些同志不太想得通，现在好些了。”

“是呀。”毛泽东说，“胡宗南在我们周围集结了那么多队伍，我们不能没有准备，所以把你请来了。你们是归贺龙同志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指挥的吧？”

“是的。”杨得志道，“我们部队刚到陕北，贺龙同志就和我谈过，一方面随时准备战斗，一方面要搞好开荒生产。您说过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泽东点点头，一边让杨得志吃菜，一边接着说：“总归是要这样的。军队嘛，当然最主要的是准备打仗，没有仗打，就要练兵，也要搞些生产。

不靠自己生产，吃什么穿什么？总是要穿衣吃饭的。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还很困难哟！”

杨得志听着毛泽东说的话，看着饭桌上为招待他专门加的4样蔬菜和一盘辣椒，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不禁说道：“主席，您的生活还是要改善得好一些呀！”

毛泽东听到这里笑了，指了指桌上的酒说：“你是吃过红米饭南瓜汤的，现在比井冈山时期好得多了。”

你看，有酒有菜，暂时还听不到枪炮声呢！比起你请我吃的辣椒拌梨要好吧！”

杨得志笑了。那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后不久，红1团到达哈达铺镇后又一路北上，不久到达通渭城。通渭离六盘山很近，虽是县城，但并不太大，人口也不多。杨得志带着部队刚到县城里，毛泽东骑着马，带着两个警卫员就赶来了。听说毛泽东来到的消息，杨得志和红1团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从长征以来，红1团大部分时间作前卫，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很少。团政委肖华问：“毛主席来了，搞点什么欢迎他呀？”

因为事先没有通知，身为团长的杨得志也着急了，搔搔头说：“我也不知该怎样接待。这样吧，刚才进城时我在街上看到有卖梨的，还不错，赶快让人去买一些来。”

过了一会儿，杨得志再走进屋里时，看买来的梨已洗好，放在铁盆里，摆到一张直摇晃的桌子上。他不时地察看着桌子旁边的几把椅子和板凳说：“怎么直摇晃？”

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参谋说：“这样的桌椅还是跑了好多人家才借到的呢！”

毛泽东见到杨得志、肖华、耿飚、冯文彬等人，热情地一一握手。杨得志说：“主席瘦多了，身体还好吧？”

毛泽东拍拍身上的灰尘，笑着说：“瘦一点好，瘦一点负担轻嘛！”

杨得志请毛泽东坐下后，指着放在桌上的梨说：“主席吃点梨子吧，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您！”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看着铁盆里的梨子说：“梨子呀，好东西。你们有辣椒粉吗？”“有。”杨得志很奇怪：毛泽东怎么看着梨子想起辣椒粉来了？通信员把辣椒粉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望着杨得志说：“杨得志同志，你这个湖南人吃没吃过辣椒粉拌梨子呀？”“我没吃过。”杨得志不解地摇摇头。

“喂，好吃得很呀！”毛泽东说着，把辣椒粉撒到削去皮的梨子上说，“不是说有酸甜苦辣四大味吗？我这一拌，是酸甜辣，没有苦了。来，你们尝尝看。”

毛泽东说完，很有兴致地吃起来。杨得志他们也一起吃了起来。

想到这里，杨得志笑着对毛泽东说：“当时条件太艰苦，主席来看望我们，只能让主席吃梨子。”

“所以我说比起那时强多啦。”毛泽东边吃边说，“以后不管条件怎样好，我们都不应该忘记过去呀！”

吃完饭后，杨得志告别毛泽东回到驻地，心里却还想着毛泽东的那句话，想着辣椒拌梨子。

宋任穷在冀南抗战的日子里

宋文立

宋任穷（190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南浏阳人。1909年生。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930年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团、师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入红军大学学习。长征中任红军干部团政治委员。1936年任红28军政治委员、军长，率部参加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8年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后任冀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署主任。1944年起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3副政治委员，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组织工作。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后历任第三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77年后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日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 * * * *

宋任穷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奔赶井冈山，直到建国后，长期担任党政军各级领导职务。他忠于党和军队的事业，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克尽职守，无私奉献。他坚持原则，从严治军，沉着冷静，善于机动灵活地指挥作战。他思维敏捷，胸怀坦荡，作风扎实，经验丰富，为我军的建设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此文只记述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率领冀南军民坚持抗战的事迹。

出师冀南

“七七”事变后，冀南平原沿铁路线的城市很快沦陷日寇之手。国民党一撤再撤，政府官员畏乱潜逃，冀南一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广大人民生活在腥风血雨之中。

在此形势下，一些汉奸趁机四处活动，组织维持会、伪政府。也有些人目睹日军的暴行，深感国家民族危亡的严重性，自发组织武装抗日救国。还有些人利用群众积极要求抗日的心理，打着抗日旗号拉队伍。

一时间，各色各样的杂牌武装组织以及民团、土匪蜂拥而起。当时冀南一带的武装组织，除我地方党领导的以外不下百余股。人数多者达数千，少者10多人，有人形容当时是“司令如毛，土匪遍地”。这些武装组织各据一方，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进而互相火併。他们横征暴敛，鱼肉乡里，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还有些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一些封建迷信思想，趁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如六离会、二坎会、大刀会、白极会、黄沙会、红枪会、天门会等。参加会道门的许多群众是为防匪自卫、保家护村，但其中有些头头暗中通敌，名为会首，实为汉奸。

为改变冀南外侮内乱极度混乱的局面，八路军第129师于1937年12月中旬与1938年1月中旬，先后派出挺进支队和由陈再道任司令员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简称东进纵队）进驻冀南。

1938年3月，根据冀南抗战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冀南地区我党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第129师首长派宋任穷带1个骑兵团、1个独立支队和1个机枪连开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宋任穷接替李菁玉任东进纵队政治委员。

从此，宋任穷开始在冀南地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度过了他永远难忘的八年抗战的日日夜夜。

智取环水村

东进纵队进驻巨鹿县时，已将土匪刘国栋（即刘磨头）部收编。他表面上接受改编，暗中却与日军勾结，仍干坏事。他率领的土匪盘踞在任县地区。任县东北10余里的环水村，是刘磨头的老巢。

该村有百余户人家，四周被水环绕，水面宽处有10余里，窄处也有三四里，水深不能徒涉，像一个小小的“梁山泊”，易守难攻。刘磨头在这里已盘踞了20多年。抗战前，任县保安团曾联合巨鹿县保安团数次对其进剿，均遭失败。国民党29军曾派部队围攻该股土匪，亦被击退。我军要彻底消灭该匪，必须首先捣毁刘磨头的巢穴——环水村。

陈再道和宋任穷召集有关人员，仔细研究了如何消灭刘磨头的问题，认为最好智取，不宜强攻，决定由骑兵团、东纵一部和地方武装于4月初进剿刘磨头。

地方党的同志听说要打环水村，端刘磨头的老窝，高兴极了。地方党的负责同志说，刘磨头手下一个小头头刘富子为探听虚实，由环水村出来，想与我地方党建立联系，这次可以利用他乘船带路，直捣环水村。

4月4日晚，大雾弥漫，东纵骑兵团一部，用几挺机枪首先封锁了环水村通滏阳河的水面，以防止土匪乘船逃跑。同时，以一个排为突击部队，乘船在刘富子的引导下向环水村疾进。

临近村口时敌哨兵问话，刘富子回答：“我是刘富子，外出回来了。”哨兵一听是刘富子的声音，再没吭气。

突击部队一举登岸，抓住了哨兵。后续部队随即赶到，发起攻击。经过激战和政治瓦解，将土匪全歼，毙伤百余人，俘200多人。

与此同时，骑兵团也将驻在永福庄、郑家庄一带的刘磨头匪部歼灭，歼匪500多人。但是在俘虏和击毙的匪徒中却不见刘磨头。原来早在3天前，刘磨头就带着他的姘头逃跑了。

环水村的解放，打击了土匪民团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激发了当地人民的抗战热情。被刘磨头关押的一些群众见到八路军，抱着战士痛哭不止。他们控诉土匪的暴行，称八路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为人民除了一大祸害。

在消灭刘磨头土匪部队的同时，八路军对冀南其他地区一些坚持与人民

为敌的土匪、伪军也进行了打击，先后消灭了邱庆福、赵山峰、肖耀成、张义等土匪部队。还有不少小股土匪，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威力，有的投降，有的销声匿迹。于是，社会秩序大为安定，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

平息“六离会”叛乱

1938年5月11日，汉奸李耀庭操纵六离会，在南宫县张马、小屯枪杀八路军津浦支队政治委员王育民等24人，并抢走电台一部。时称“小屯、张马事件”。

六离会是一个封建迷信的会道门组织。其名出自八卦。八卦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8个方位，离字居第6位，故叫“六离会”。在当时混乱局面下，反动地主利用群众要求社会安定的心理，在“参加六离会可以刀枪不入，过太平日子”的口号下，发展会徒达五六万人之多。日寇乘机派人从中操纵。汉奸李耀庭便是其头面人物。

为了争取李耀庭和由他操纵的六离会，东进纵队和地方党的同志对其做了大量的工作。宋任穷等同志多次召见六离会的头头谈话，晓以抗日大义，阐明我党的政策。但李耀庭等把我军的耐心争取视为软弱可欺，并以抄家、不出公差等威逼利诱手段强迫群众参加六离会，不准参加抗日自卫队，以致发生杀害我军人员并抢走电台的严重事件。

事件发生后，在冀南抗日根据地指导平原游击战争的129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宋任穷、陈再道多次研究对策，决定尽可能和平解决，必要时动用武力。他们几次以东进纵队的名义写信给李耀庭，提出与其商谈；但李耀庭既不来人，也不回信。

后来，宋任穷和陈再道陪同徐向前亲赴六离会集中的张马村，召集附近一些村庄的村长开会，进行教育争取，并严正要求立即交回电台和我方人员，交出枪杀我方人员的幕后指挥人和凶手，解散六离会。

但是，李耀庭等死不省悟，并扬言“与八路军决一死战”，要“进攻南宫城”，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

为镇压顽固不化的汉奸，以利于对其他地区会道门的争取和瓦解，利于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八路军决定用武力解决。

5月16日，六离会集结会众万余人，准备向八路军驻张马一带的部队进攻。八路军第769团和骑兵团等部队将其包围后，首先进行武装宣传，散发传单，揭露李耀庭等勾结日寇充当汉奸，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破坏抗日的罪行。一些会徒认为自己吞了符，披了法，刀枪不入，在几个坏头头的指挥下，不仅不离散，竟向我军冲杀过来。

这时，我军开枪射击，但枪只向天上打，以免造成受蒙蔽会徒的伤亡。

有的会徒误以为他们真的刀枪不入，继续向我部队冲击，挑死我战士数人、战马数匹。在这危急时刻，部队才受命开枪还击。

六离会本是乌合之众，在我军打击下，披法、念咒都不灵了，死的死，伤的伤，纷纷逃散。李耀庭等几个坏头头被我军生俘。

我军随即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宣布取缔六离会，并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当众处决了汉奸李耀庭和几个坏头头。受蒙蔽的广大会员纷纷交出红缨枪、红包裹，表示回家安心种地，积极参加抗日工作。

李耀庭操纵的六离会的瓦解，给冀南地区的汉奸和反动地主势力以沉重

打击。此后，冀南各地的会道门大都自动解散或销声匿迹，以南宫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收编各类武装

冀南地区在抗战初期出现的各种旗号的武装组织的特点是政治目标多样，组织成份复杂，内外关系混乱。除个别为汉奸坏人操纵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某些抗日要求。他们既有被我争取、改造的可能，又有被敌人收买、利用的可能，是敌我双方都在争取的力量。对此，中央军委曾给邓小平、徐向前和宋任穷发过电报，指示要“对冀南各县保安队及其所属的零散部队迅速设法去改造或收编，以免被他人利用”。

段海洲的“青年抗敌义勇军团”，是接受我军改编的比较大的武装。

段海洲于“七七”事变后，在家乡一带联络了一些亲朋好友和热血青年知识分子，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青年抗敌义勇军团”，由他任司令，到1938年初已有4000余人。

当时，河北民军张荫梧派人来收编段部。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曾派人送信要段海洲接受他的领导，并委任他为“军委会行动总队第15支队”司令。我军也派人到段部做工作。段部以陈元龙为代表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极力劝段尽快接受八路军的改编。段海洲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派陈元龙赴南宫转达他的意向。

1938年4月底，段海洲亲赴南宫和我军研究改编事宜。徐向前亲自同他谈话。宋任穷和陈再道等设宴招待他，对他参加八路军表示热烈欢迎。同时，由宋任穷宣布了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将段部改编为“八路军青年抗日游击纵队”（简称青纵），任命段海洲为司令员、李聚奎为政治委员的命令。对此，段海洲深为感动，激动地说：“职等矢志效忠祖国，驱除日寇出中国。”

段海洲在南宫住了10多天，便同李聚奎等返回武强县驻地。在李聚奎的主持下，部队召开各种会议进行了动员教育。之后，指战员们都穿上了新军装，带上了“八路”臂章。

9月初，根据第129师指示，将独立旅（徐深吉任旅长）和青纵合编，仍称青年抗日游击纵队，段海洲仍为司令员，徐深吉为副司令员。整编后，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进行过多次战斗。

威县伪警备旅是破日军清水部队收编的原威县城北的民团。经过冀南地方党做争取工作，加之我军声望和胜利形势的影响，该旅毅然弃暗投明，被我军收编为“冀南抗日游击独立第2师”，并在威县七级一带进行了整训。

整训期间，宋任穷到七级镇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向他们宣讲抗战形势以及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支部队是土生土长的游击武装，成员大多是威县子弟，地域观念较强，愿意在本乡本土抗日。宋任穷有针对性地向他们讲了抗日与爱乡的关系，指出爱家乡首先要救国家，抗日不能只在本地抗，抗日不能“自扫门前雪”。为改变这支部队的复杂成份，他还派去了一些党员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加强党的工作。

这支部队经过几次整编，后来编为新第4旅第11团，转战南北，屡建战功，成为冀南主力部队之一。

收编土匪武装比收编其他一般武装更为艰巨，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因为土匪容易失去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最容易被敌人拉过去当伪军。

收编土匪，一般都与其订立条约，内容包括：坚持抗战到底，遵守政府法令，保护人民利益，服从指挥等。土匪一般重视所谓江湖义气，因此除在政治上要加强与其团结外，还要注意私人感情的培养，遇事与他们多商量，多照顾他们。这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辅助方法。对民族觉悟不高的土匪，如他不愿加入八路军，可将其编为外围军。对最坏的土匪，收编为外围军都不可能，只有坚决予以消灭。

从1938年1月东进纵队到冀南，至8月底半年多时间，我军共争取、收编、改造各类武装近万人。这不仅充实壮大了我军的力量，而且对安定社会秩序、加速根据地的创建都有重要作用。

“人山”的威力

1938年秋，八路军为进一步加强冀南武装建设，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王宏坤任副司令员。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

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

10月下旬，为迎击和粉碎敌人可能发起的“扫荡”，冀南部队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反“扫荡”准备工作。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在会上作了动员讲话。会议具体研究了反“扫荡”作战的措施。

在部队开赴冀南平原前，第129师首长们就已考虑到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山怎么办的问题。最后大家认为，办法就是在平原建立人造山。平原没有山，要造“人山”。这山就是群众，有群众就有山。

冀南抗日根据地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已把冀南广大人民动员到抗日战线上来，造成了我军赖以依托的坚不可摧的“人山”。这不仅使我军在平原地区站住了脚，而且开创了新的局面。

11月中旬，日军向冀南地区发动了“扫荡”。冀南党政军机关先后撤出南宫等县城，到南宫、威县、广宗交界的一带沙地多林地区活动。东纵和青纵部分人员分散到广大农村，结合地方武装进行分散游击。

冀南行署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战，颁发了《战争动员紧急命令》，要求各地群众挖沟破路，空室清野，积极配合部队的反“扫荡”斗争，打击“扫荡”之敌。

我军避实击虚与敌周旋，采取伏击、截击、袭扰、围困等战术战法，不断打击、消耗敌人。敌人在我抗日军民打击下，疲于奔命，在伤亡600多人之后，于11月下旬被迫退出所占之南宫等县城。我军取得了反“扫荡”的初步胜利。

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等到冀南领导对敌斗争，邓小平政委在参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也来到冀南。在干部会上，邓小平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会议期间，刘伯承听取了宋任穷、陈再道等人的汇报。宋任穷在汇报时说，冀南人民抗日情绪很高，对敌仇恨根深，并举了两个例子：

其一，某些天主教徒在教堂作礼拜时祷告：“保佑抗日军，保佑八路军，抗日军打胜仗，八路军打胜仗……”

其二，一些老太太也祷告我军打胜仗。有人用白面捏成小人，放在锅里煮，她们把小面人当成鬼子说：“这么一煮，日本鬼子就不得好死。”这些虽然带有一些迷信色彩，但却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爱和憎。

刘伯承听后说：“这里群众真不错嘛，连老太太、小娃娃都发动起来了。坚持冀南抗战，军队是骨干，但孤军作战不行。还有两件关键的事：一是改造地形挖道沟。我看你们挖的道沟已构成网，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二是党政军与人民相结合，正如向前同志说的，造成‘人山’。这是最重要的。军队要成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

平原的“马奇诺”

1938年11月中下旬我军反“扫荡”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但我军也伤亡几百人。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平原的地形对我军不利。“扫荡”的敌人多是乘汽车出动，他们的汽车和骑兵在广阔的原野上横冲直撞；而我军只能利用村落、坟头、土丘打击敌人。另外，冀南地区除各县城都筑有城墙外，不少较大的村镇都有围寨。这些城镇如被敌占领，我军在无重武器的情况下，很难将其攻克，战斗中也会有很大伤亡。在反“扫荡”中，有的部队和群众利用天然的沟坑作战，避免了很多损失。

战争教育了抗日军民。宋任穷、陈再道等心想，为什么不能把所有大道都挖成沟，隐蔽自己，迟滞和阻止敌人的快速部队呢？于是召集党政军民领导同志专门进行研究，决定在冀南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挖道沟、拆城墙和围寨、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为此，冀南行署又发布“训令”，要求凡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村民都参加作业，将所有通行的大车路一律挖成深3尺、宽5尺的沟。把挖出的土堆在沟沿两旁，修成高1.5尺、宽2尺的边墙，作为人行小道。沟以通过大车为标准，每隔数十丈再挖约四五丈长的一条复道，以便走碰了头的大车错开。

由于广大群众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性，挖沟的积极性非常高。一场空前规模的群众性挖路沟运动，很快形成高潮。

时值隆冬，地冻得像石块一样坚硬。但冀南大地到处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齐上阵，日以继夜地挖沟。有的村庄为了加快挖沟的速度，在漆黑的夜里打着灯笼，举着火把，昼夜不停地轮班挖，场面令人感动。

冀南全区先后共挖路沟5万余里。当时有人把这一工程称作平原的“马奇诺”。这些纵横交错的道沟，在平原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军进攻时可以隐蔽接敌；转移时可以隐蔽分散，迅速脱离敌人的火力射击。而敌人的装甲车、汽车和重武器，面对这些沟沟坎坎，却很难有用武之地。

反摩擦斗争

1939年1月，国民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建立了“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即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制造流血事件。

冀南八路军的反摩擦斗争，始于鹿钟麟主政河北来到冀南之后。

鹿钟麟为扩大反动势力，四处搜罗反共武装，并和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

鸿烈结成“冀鲁联防”，与共产党、八路军相对抗。

1938年9月30日，鹿钟麟派收编的胡和道部，勾结反动封建会道门白极会、黄沙会，进攻我驻姚屯的东纵独立团一部，杀害我战士13名，抢走步枪17支，制造了“姚屯流血事件”。我军以团结抗战的大局为重，没有还击。

宋任穷和徐向前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向鹿钟麟提出抗议。各抗日群众团体联合组织成千上万群众到冀县北漳淮村鹿的住处请愿，要求惩办胡和道。在强大舆论压力下，鹿表示要严厉申斥胡和道，令其解散收编的会道门，交还抢走的枪支，抚恤我伤亡的战士和家属。

姚屯事件之后，河北民军赵云祥又策动白极会围攻枣强县城，高喊“撤换县长、驱逐八路军”的反动口号，并趁机进占枣强县城西关。

宋任穷派区党委民运部长张策和青纵政委李聚奎为代表去谈判，鹿钟麟态度暧昧。谈判无效，只好以武对武。军区遂调骑兵团、青纵第3团等准备反击。赵云祥闻讯后唯恐被歼，悄悄溜之大吉。我军遂平息了白极会叛乱。

12月初，鹿钟麟被蒋介石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之后，他更加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极力争夺地盘。他在各县设县政府和税务局，在地方派公粮、设村长。在我军基础好的地方，他搞不成。在我军基础不太好的地方，则一切建制都是双的。于是，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个税务局长，一个村有两个村长，甚至一个小学校也有两个校长。因此，摩擦不断升级，袭击、杀害我军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及抗日军人家属事件层出不穷。

我方从合作抗战的大局出发，多次对鹿做争取团结工作。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去找鹿钟麟商谈，鹿十分傲慢，避而不见。后来宋任穷又去找鹿钟麟，谈了两个小时，也没取得什么结果。鹿钟麟摆出省主席和战区总司令的架子，向宋任穷表示愿意同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商量解决冀南问题的具体办法。

12月底前后，徐向前得了一场大病。幸好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来到冀南直接领导这里的工作，并分工刘伯承和宋任穷重点做鹿钟麟的工作。

有一次，宋任穷随刘伯承去鹿钟麟那里。鹿请吃饭，并请来个戏班子，演了一出“黄天霸拜山”，含沙射影地进行挖苦。宋任穷先后随刘伯承同鹿钟麟谈了3次，重申我党我军与其合作抗日的诚意；严正指出抗日是当务之急，高于一切的任务，任何人如有损抗战、阻挠抗战、破坏抗战的行为，都将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

鹿钟麟视我方真诚合作的愿望和顾全大局的态度为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以武力向我军进攻。他指使赵云祥部进占枣强县城，将我方战委会赶出县城。王子耀部公然阻拦我军袭击日军，打死我排长、战士8人。

同时，鹿钟麟在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强迫群众实行保甲制、摊派制，不许实行我党制定的公平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不许群众成立抗日组织。

后来，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鹿钟麟谈了一次，但鹿仍顽固坚持取消我党设立的冀南和冀中两个行政主任公署，坚持执行保甲制、摊派制等，并要将我方组织的游击队改为“保安队”。

不久，鹿钟麟即指使冀南的王子耀、赵云祥等不断向我军进攻。为了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我军奋起反击，将王部大部歼灭。王子耀逃到尧山投降了日军。

鹿钟麟主政河北一年多时间，蒋介石认为其政绩不佳，未能完成向他密

授的“收复失地、掌握河北”的使命，有负厚望。于是他不得不辞去河北省主席一职，虽保留冀察战区总司令职务，但搞摩擦的积极性不那样高了。

“倒戈将军”的下场

1939年春，日军对冀南大“扫荡”后，鹿钟麟逃到冀西。此后，石友三成了在冀南大搞摩擦的急先锋。

石友三原是冯玉祥的部下，善于投机钻营，有一套媚上压下的手段，所以官运亨通，连连提升至西北军第5军军长。他本来是冯玉祥将军一手提拔起来的，按说应该对冯玉祥忠心不二，可是他曾3次背叛冯玉祥。他投靠过张学良，也打过张学良；投靠过蒋介石，也反过蒋介石。因此，人们称他为“倒戈将军”。

石友三被蒋介石提升为第10军团司令后，于1938年底应鹿钟麟请求，由鲁南调至冀南，率有第181师等部队1万余人。石友三到冀南后，自知没有站稳脚跟，表示愿意和我军合作抗战，曾派人与我方联系，向我方“请教”对日军作战的经验，并请我方派政工干部帮助其做教育和巩固部队的工作。

为了调动一切可能抗战的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为了分化国民党顽固势力，我军区当时采取团结争取石友三的方针，通过各种渠道对石做争取工作，以便共同抗日。宋任穷、杨秀峰、刘志坚多次到南宫县乔村看望他，耐心地对其做工作，希望他真诚抗日，不搞摩擦。邓小平和刘志坚先后几次与石会谈，表明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劝其与我坦诚合作，共同抗日，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和民族的事情。

为了争取石友三共同抗战，我方除在政治上对石部积极争取外，还在军事上支援其作战，帮其扩兵，在物质上也尽力相助，帮助石军解决棉衣等困难。由于对石军做了实实在在的争取工作，石友三部到冀南后近半年的时间，没有和我方搞大的摩擦。

不久，蒋介石任命石友三为国民党军第39集团军总司令、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并将河北游击总指挥孙良诚部以及赵云祥、胡和道等部划归石指挥，还发给步枪800支、机枪30挺和子弹100万发。同时，一次发给石部半年的军饷。蒋介石密令石友三：“在万难中拿住冀局，以对付八路军。”还告诉石：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遗患未来。必须与鹿钟麟同心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石友三为此受宠若惊，开始胆大妄为。他感到现在人多了，枪多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时机已到。于是，反复无常的本性开始发作，逐渐撕下了愿意和我军“团结抗战”的面纱，拼命鼓吹他们“正统”、“合法”，并排挤走了张友渔等一批同志。之后，石友三在冀南取代了鹿钟麟的权势，变本加厉地制造摩擦，犯下了累累罪行。

为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石友三不断向各地委派他们的县长、税务局长、区长和村长，强制推行“保甲制”，束缚、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们依仗武力，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石部经常假冒八路军，四出抢劫、绑票、奸淫妇女等，蓄意败坏我军的声誉。为了从经济上搞垮我方，石友三用日军送给他们的印刷机印国民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假钞票，强迫群众使用；焚毁我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毒打使用冀南钞票的群众。

石友三还不断制造军事摩擦，任意捕杀、活埋我抗日干部和家属，袭击

我抗日军队。仅清河一县，他们就捕杀我县游击大队长和抗日人员家属 50 余人，并击伤我东纵第 3 团及游击队战士 57 人。石友三派其弟石友信等到北平、天津、济南与日军勾结，从天津聘来日军军官吉田为顾问。1940 年初，石部公开配合日军 500 余人，“扫荡”我广宗地区。

正当石友三加紧制造摩擦，不断袭击进攻我部队之际，八路军总部决定集中冀中、冀南和冀鲁豫部队，由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宋任穷统一指挥，发起讨石战役。

宋任穷和程子华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从作战方针、兵力配备、作战部署到分化瓦解敌军的策略和俘虏政策等，都作了认真的研究。临战前，还分别给石所辖各部头头写信或派人去谈，做争取和瓦解工作。

讨伐石友三的战役有 3 次。

第一次战役从 1940 年 2 月 9 日至 18 日，称冀南反顽战役。此役，我军共歼灭顽军 7000 余人，虽没有将石友三部全歼，但将其赶出了冀南。我方摆脱了“前门拒虎，后门拒狼”的严重局面，冀南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

第二次战役于同年 3 月 4 日至 11 日进行，称卫（河）东战役。这次战役前，为了贯彻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分化瓦解顽军的方针，宋任穷曾给国民党军丁树本写一封亲笔信，规劝他不要跟石友三跑。但丁树本不听规劝，最后被我军击溃，落荒而逃。作战中，部队认真贯彻争取顽军下层官兵抗日、孤立反动头头的指示，以及不准杀害、辱骂、殴打被俘官兵，禁止搜腰包，被俘官兵实行分屋，连以上军官酌情给予物质优待等具体规定，效果很好。石部许多士兵盼望我军去打，以便他们趁机逃跑回家。每次战斗，石部下层官兵都有不少趁机逃跑，有的团每连平均只剩下 40 人。此役，我军先后共歼灭顽军 6000 余人，并将其赶到我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卫东战役后，程子华率领刘子奇支队返回冀中。

第三次战役称直南反顽战役，始于同年 7 月，至 11 月结束。石友三连遭我方两次打击后，不甘心失败，进一步勾结日军，于 6 月中旬纠集 2.5 万余人的兵力，向我军反扑。7 月 2 日，朱德和彭德怀命令宋任穷和鲁西军区政治委员肖华共同担任指挥，组成的中央纵队、左纵队和右纵队，发起直南讨顽作战。7 月 12 日，宋任穷和徐深吉率中央纵队东渡卫河，奔赴直南参战，先后歼敌 3000 余人。

石友三等部遭打击后，开始凭深沟高垒采取守势，并指使封建会道门对我方进行骚扰。根据顽军此时的特点，八路军总部于 8 月中旬下达指示，要求各部队对顽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在军事上，我主力部队紧逼顽军，压缩其占领区，打击其外出部队；在政治上，采取召开群众大会和开明绅士座谈会，以及散发传单、释放俘虏等办法，揭露石友三等勾结日军、破坏抗战的罪行，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还空舍清野，截断敌粮源，动摇敌军心。这些办法，使顽军内部十分不稳，下层官兵大量逃亡。

石友三与我方几次较量中，不仅没有完成蒋介石交给他的使命，反而被我方打得落花流水。尤其是其勾结日军的大量事实被我方揭露后，更加声名狼藉。蒋介石认为石友三已无利用价值，即密令卫立煌、高树勋于 1940 年 11 月 4 日将其杀掉。至此，直南反顽战役结束。

斩“蛇”除害

1941 年秋，冀南军区部队和各分区武装对日军连续进行了 3 次大规模破击战，打得最出色的是破袭王高路作战。

王高路南起清河县的王官庄，北到南宫县的大高村，全长 70 多里。这条公路恰恰穿过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将根据地分成东西两片，严重地限制着我抗日军民的活动。敌人沿公路两旁修建大小据点、碉堡 10 多处，每隔二里即有一个炮楼；还在公路两侧挖了根深的封锁沟，以阻止我抗日军民通过。在每个据点周围，都挖有壕沟。壕沟外侧设置鹿砦，内侧筑起七八尺高的土围墙。围墙上建有岗楼，其上有日伪军日夜巡逻。

敌人从当年年初就开始修筑王高路，为了修这条路，他们大肆向附近各村庄派粮、派款、派夫，给当地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灾难。我军一直不断对该公路进行破击，阻其修建。敌人白天修，我方晚间破，形成修了破、破了修的僵持局面。敌人用了半年时间才把公路修成，由伪治安军和部分日军沿途驻防。日伪军依托这条公路，不断向两旁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

冀南军区决心大破王高路，为民除害。

1941 年 8 月 27 日，陈再道、宋任穷等军区领导同志专门开会，研究破击王高路问题。会上，大家仔细分析了王高路各段的敌人据点、碉堡和驻守兵力等情况，研究了破击王高路的作战方案。

陈再道说：“王高路是卧在我们冀南腹心地带的一条‘毒蛇’，必须把它彻底干掉。怎么干法？我们商量一下。”

宋任穷说：“不铲除王高路，我们这一带就不得安宁。再也不能让这条‘毒蛇’横行了。我看斩‘蛇’要分段斩，让它身首异地，彻底完蛋。”

“宋政委讲得对，我们要分段斩‘蛇’，一段一段地打它个稀巴烂，让它头尾不能相接。”陈再道完全赞同宋任穷的意见。接着，他们具体研究了如何分段打，如何集中兵力等部署。马固据点位于王高路中段，是这条公路上的中心据点。军区决定由 7 旅旅长易良品率部首先破袭该据点，以从中间斩断公路，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其他各段我方行动则便于得手。

易良品表示：“他什么时候修，我就什么时候破。敌修我破，随修随破。咱们来一个你修你的，我破我的。”

陈再道、宋任穷几个人听了都表示同意。

作战任务明确后，各部队分别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work。军区组织了爆破队，制作了几十斤重的大地雷，准备让敌人坐“土飞机”。

冀南区党委、行署向有关县、区布置了配合部队破袭王高路的任务后，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破路和战勤工作。沿途各县组织了上万名青年参加破路队、担架队，配合部队打击敌人。各县、区划分了地段，由县委书记、县长亲自带领群众上阵破路。

8 月 30 日晚 10 时，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广大民兵同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公路上敌人的各据点被我军团团包围。龟缩在据点里的敌人吓得不敢露面，等待援兵。广大参战群众，肩扛大镐，手握铁锹，潮水般地涌上公路，刨的刨，铲的铲，挖沟破路割电线，把公路破坏得千疮百孔。

第 2 天中午，从南宫城开出 3 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增援被围困的据点。结果，头两辆车被我爆破队埋设的大地雷炸毁，第 3 辆车上的日军吓得乱成一片，急忙调转车头，把伤员、尸体拖上汽车，逃回南宫城内。

进攻马固据点的我军，经一夜战斗，扫清了据点周围的掩体工事。敌人

集中在据点和炮楼内负隅顽抗。我军把缴获的 88 式野炮扛到前沿阵地，向敌人轰击，将敌据点的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炮楼内的敌人顿时乱成一团，我部队趁势冲进据点。敌人死伤大半，伪军第 102 团副团长率残部投降。马固据点被彻底摧毁。

接着，我军推着大炮，带着被俘的伪军副团长，到王高路沿线的其他据点和碉堡喊话，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据点，这个副团长就对伪军喊：“兄弟们，我是 102 团副团长。我们马固据点被八路军大炮轰平了，现在大炮正对准你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八路军优待俘虏，你们不信就出来看看。”许多伪军认识这个副团长，看到真的受到优待，于是纷纷放下武器投降。个别顽抗者被我军消灭。

经过 3 昼夜激战，我军共攻克敌据点、碉堡 16 个，歼伪治安军两个团，毙伤敌 500 余人，俘敌 450 余人。各县参战民兵和数万群众，将日伪军苦心经营的王高路彻底摧毁。

这次破击战，大灭了日伪、汉奸的威风，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当时，北平伪《新民晚报》曾惊呼：“南宫城东南 25 公里处，发现八路军之重炮活动……”

冒险下太行

1942 年 5 月下旬，日军合围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共北方局以及第 129 师等党政军领导机关。此时，冀南军区政治委员、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因病正在太行山休养。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与合围，师部决定转移到外线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对宋任穷的身体情况很关心。他们问宋任穷：“你怎么办？还是跟我们走吧！”

当时，宋任穷的身体已基本恢复。他心里很惦念冀南的情况，特别是遭受大合围后的情况，更惦念战斗在冀南的广大指战员。他想，这个时候自己更应该赶快回冀南去。于是，他怀着急切的心情说：“还是回冀南。平汉路上的日军大部调出打太行了，那里日军的力量比较空虚。另外，我已习惯在平原，在山区打游击有点不习惯。”

“你身体行吗？”刘、邓首长担心地问。

“没问题，这些日子身体恢复得很好。”宋任穷说。

师首长点头，同意宋任穷回冀南。

临行前，宋任穷和总部左权副参谋长通了电话。左权对宋任穷说：“你去平原行不行？敌人正在‘扫荡’，现在回去不冒险吗？”

“没问题。”宋任穷很有信心地说，“不过铁路（平汉路）我没办法，只要过了铁路就有办法了。”

冀南军区的艰苦情况，宋任穷是知道的。经过几年的斗争实践，他已摸索出一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方法，学会了如何在平原与敌人周旋。所以，他对此去冀南很有信心。

当时有 200 多名干部学员也要到冀南去。宋任穷只有 1 个警卫班、1 挺轻机枪和 1 个掷弹筒。因师部抽不出部队给他，就给干部学员发些枪和子弹。

宋任穷带着这 200 多名干部学员下了太行山，向冀南平原行进。夜晚，他们从磁县北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成安县商城地区。

大家走了一夜很疲劳，便在一个村庄住下，煮点饭吃。他们刚要吃饭，当地我方情报人员和老百姓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敌人来了，你们赶快走，不然就来不及了！”宋任穷随即指挥干部队向西铁路方向走，走了一二十里路再折回来向东，以迷惑敌人。然后，他们在敌军据点商城底下通过。

干部学员手里枪不多，子弹也很少。由孔庆德带着警卫班在后面掩护。到了夜晚，他们继续朝根据地走。

因为没有向导，夜又黑，辨不清方向。幸好宋任穷带着一个指北针。他手拿指北针走在前面，有路走路，没有路便走庄稼地，按指北针指的方向走。

当时，第3分区对驻地附近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我方对敌人每个据点、碉堡的情况都比较清楚，平时双方都有些联系，宋任穷带着队伍没有爬路沟，而是从碉堡旁边通过。他们悄悄走，伪军不管。宋任穷告诉大家：“从碉堡底下过，伪军若是打枪也不要怕，那是朝天打的。”当他们通过碉堡面前时，伪军有时朝天开枪，掩护他们。当时有一个战士掉了队，被伪军抓进据点，但很快又被恭恭敬敬地送了回来。

几天后，他们与驻冀南的第8旅机关会合。事后得知，敌人知道宋任穷到了第3分区，出动12路日伪军“围剿”，企图抓住宋任穷，但宋任穷这时已离开第3分区了。

苦渡难关

华北日军对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加紧“围剿”、“扫荡”，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文化上也发起了全面进攻。

日军的政治进攻基本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他们组织伪军、伪组织，建立伪政权，加强统治力量；还搞特务活动，组织土匪、会道门，破坏我抗日政权。在经济方面，日军实行“以战养战”政策。在文化上，他们大肆灌输亡国思想。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先后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称之为“总力战”的“治安强化”运动，妄图隔绝我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打击与消灭我抗日力量，进而摧毁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

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冀南区受到严重损失。

首先是根据地被分割、“蚕食”，面积日益缩小。敌人的据点、碉堡星罗棋布，公路沟墙纵横交错，抗日军民的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日住碉堡下，夜观炮楼灯；行军必过路，天天闹敌情。”

其次是根据地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敌人推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抓走大批壮丁，摊派劳役，强征民夫，使冀南区的劳动力受到极大的破坏。同时，因敌人大修据点、碉堡和公路沟墙，使冀南平原耕地也遭到严重破坏。

与此同时，1942年至1943年，冀南遭到罕见的自然灾害。1943年灾情最为严重，自春到秋长达8个月久旱无雨；入秋后，又连遭暴雨，洪水泛滥，淹没了大片土地。除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蝗）虫灾。许多县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继灾害而来的还有瘟疫，当时不少人患痢疾和浮肿，有些地区还流行霍乱，严重威胁着冀南军民的生存。

那时部队吃饭也限量。吃饭时司务长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管了不管饱”。枣南县长王录饿得昏倒在地，村支书给他找了两个糠窝窝吃了才站起来。有一次，宋任穷到曲周县一个村庄，正遇到一家妇女生孩子，家里什

么吃的也没有，大人孩子危在旦夕。他心中极为难过，送给这家人 30 斤小米，救活了母子俩。宋任穷的二女儿出生后，被寄养在邱县南辛店老百姓家中。按照规定，每月留给奶妈 30 斤小米，不仅养活了小孩，也接济了房东一家 3 口人。房东家离我部队地下医院很近，宋任穷的二女儿常拿个饭碗到医院，人们见了就给她一勺饭吃。她就是这样经常饿着肚子长大的。宋任穷的三女儿宋适荒被寄养在天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就死了。当时，冀南饿死、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为躲避灾荒离开冀南，逃往他乡。

八路军坚持冀南抗战，在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的同时，燃眉之急是解决好生产自救，渡过饥荒，安定人心。

为此，宋任穷多次召集冀南军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部署生产救灾工作。行署和各级政府建立了救灾委员会，领导各地区开展赈灾活动，设法发放货款，调剂粮食，救济灾民，组织部队抗灾救灾，发动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由于冀南的斗争十分艰苦，我党牺牲了很多干部。刘伯承和邓小平为了保存干部，曾打电报征求宋任穷、陈再道的意见，拟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办公。

宋任穷等几位领导同志开会研究是撤还是不撤。大家因师首长的关心而心里热乎乎的。讨论结果，都表示不能撤到路西去，仍留在原地咬紧牙关坚持斗争。大家认为，群众对我们很熟悉，如果我们走了，就会影响干部和群众的情绪。只要我们留在冀南，留在群众之中，就是对群众的鼓舞，就能坚定群众生产自救的信心。我们要和根据地的民众同生死，共患难。最后，刘、邓同意了宋任穷、陈再道不西撤的意见。

为了减轻冀南人民的负担，八路军于 1943 年将骑兵团等 5 个

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我党又抽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刘志坚等去了延安。

我党在冀南留下的少数领导干部，被人们称为“咬牙干部”。冀南区留下宋任穷和行署副主任王任重、军区参谋长王蕴瑞、军区政治部主任朱光 4 位领导同志。宋任穷身兼 4 职。机关和直属队的人数不足 200 人。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

困难时期军区部队都穿便衣，每到一个地方，干部、战士睡在一起，吃在一起，不管是官还是兵都打地铺。发现敌情就分成两股，分别由宋任穷和王蕴瑞指挥。

为了渡过难关，军区部队不但帮助群众搞生产自救，自己也组织生产。宋任穷、王任重、王蕴瑞和朱光都在邱（县）北拉过犁，种过地。当时没有牲口（无粮食喂养），只好组织人拉犁。他们 4 人加上警卫员 8 个人拉一张犁，每天种 3 亩地。因为吃不饱，体力不支，还未到天黑收工，就简直一步也走不动了。警卫员和宋任穷开玩笑说：“政委，你把绳子拉弯了。”

1943 年，冀南部队除帮助群众生产自救外，还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这一年，冀南部队共进行大小战斗 4091 次。其中，我军主动向敌发动攻击 1800 多次，反“扫荡”、反袭击和反抢粮等作战近 2000 次。我军共毙伤日伪军 8000 余人，从而使冀南军区抗日军民的生产救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抗战期间，在冀南最困难的时期，宋任穷等人就是这样咬紧牙关，与天斗，与地斗，与敌人斗，没有被日军残酷的“扫荡”所吓倒，没有被持续的

灾荒饿死。他们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始终坚持在冀南这块抗战的阵地上。

成功抢救刘志坚

瓦解敌军工作是进行武装斗争重要的一环。宋任穷从1938年到冀南后，一直十分重视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他说：“最初确是被逼出来的，不做不行，非做好不可。后来经过斗争实践，才逐渐运用自如。”

抗战时期，冀南军区专职敌军工作人员有1000多人，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当时的主要做法是：摸清敌人的活动情况，有针对性地搞好对敌宣传，实行攻心战；掌握敌人行动规律，抓住有利时机，消灭敌人；利用敌伪关系，有效地保存自己。

冀南军区瓦解敌军工作进行得有声有色，灵活多样，很有成效。

一种是开展政治宣传攻势。“传条”、“传话”是当时效果很好的一种宣传方式。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动员小学生抄好成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上、伪县公署、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宣传条内容简单明了，针对性很强，指名道姓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除这种手抄的“传条”外，还印刷一些内容较多的传单向伪军散发，向他们讲解抗日道理，指明出路。有的传单上还印着关云长的画像，并向伪军、伪职人员指出要像关云长那样“身在曹营心在汉”。

还有一种叫武装宣传，也叫“给伪军上夜课”。即组成武装宣传队，于夜晚到敌人炮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表现好的，痛斥顽固不化的坏分子。

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运动，是冀南军区在对敌斗争中的一种创造性活动。他们对伪军和伪职人员宣传时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在上面画上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上个“红点”。“红点”多的就可以得到宽大处理，“黑点”多的则要受到严厉惩罚。在宣传中，还结合形势提出：“眼看德国就完蛋，日本人明年就滚蛋，他们逃到东京去，留下你们怎么办？”搞得伪军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明里暗里与我方拉关系，让八路军给他画“红点”。他们有的外出“扫荡”时对空射击；有的见到我方工作人员就说：“快跑吧，日本人在后面哪！记着给我点‘红点’。”

记“黑红点”运动对伪军和伪职人员震动很大，他们怕自己“黑点”多了被八路军算总账，或被点名（枪毙）。同时，军区还进一步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检举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向伪军指出要有中国人的良心，给自己留条后路。

当时，军区差不多同所有伪组织进行了谈判，对可能做工作的伪军都进行了工作。敌人各个据点内几乎都有我方的关系，伪军中给我方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在工作基础好的地区，我方的基层干部晚上可以进入伪军碉堡所在的村落，待日军“扫荡”返回后再离开。

从敌人手中成功地抢救出刘志坚和李定灼等同志，是说明冀南的敌军工作做得好的很好例证。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作了《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

宋任穷等几位领导分头到各分区、地委传达贯彻决议。10月16日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到了枣强县恩察东大师友村。次日天刚亮，突然一阵枪声，日军进了村。刘志坚骑着马向外冲杀时，因右腿中弹从马上摔了下来，被敌人俘虏，后被关押在大营据点。

当时军区几位领导都在下面。宋任穷得知刘志坚被俘后，立即用电报同陈再道、王宏坤商量抢救办法。同时，向第129师首长作了报告。刘伯承、邓小平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刘志坚抢救出来。

宋任穷等几位领导研究后确定：由第20团副团长楚大明执行武装抢救，由军区敌工部长张茂林（当时他与刘志坚一起行动）就地指挥情报联络工作。

大营据点内的维持会、伪军内都有我方的关系。他们已经掌握那里的伪军、伪组织的情况。因驻大营据点的日军是新换防的，对大营及其周围的情况及我军的活动都不了解。

刘志坚被关押后，每天都有人将有关他的消息从据点里面送出来。向外传递消息的主要是赵鼎新。他是在这之前不久被敌人俘虏的，一直未暴露身份。他在监狱给组织写信，说日本人答应，只要他同意给敌人“报平安”（即给敌人报告消息）就放他。区党委根据“革命的两面派”政策，经研究同意他给敌人“报平安”。在刘志坚被俘的前一天，赵鼎新已获得自由。他看到刘志坚负伤被俘，决定留下来照顾。敌人见刘志坚伤势很重，需要人照顾，同时也想让赵“拉拢”他，获得一些情况，就同意赵暂时留下来。刘志坚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说是个参谋。而有些伪军虽知道刘志坚的真实身份，却不告诉日本人。

军区通过内线关系获悉敌人将于10月20日押送刘志坚去枣强县城，并摸清了敌人行动路线及押送的日伪军人数等情况。于是，决定在敌人押送途中实施抢救。

押送的敌人中，有日军30多人，伪军几十人。楚大明率第4、6两个连埋伏在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命令第6连向押送的日军攻击，切断日伪军联系；第4连负责抢救任务。第4连连长即令第4班班长纪志明（因他认识刘主任）率全班负责抢救刘主任。

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第6连的步枪、机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日军被打得都卧倒在地。刘志坚坐的是最后一辆牛车，听到前面的枪声，立即叫赶车人急忙调头往回跑。与此同时，第4连冲向伪军。他们不敢开枪射击，怕误伤刘志坚。伪军里有我们的关系，只向天空放枪，目的是给日本人看。纪志明率全班冲到大车旁，几个战士迅速将刘志坚从车上抬下来。然后，纪志明背起刘志坚就向指挥所跑。就这样，终于将刘志坚抢救出来。

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为治好负伤的刘志坚还得去找伪军帮忙医治。军区将刘志坚放在永年县南沿村伪军大队长韩荫亭家里养伤。同去韩家的还有刘志坚的夫人和一名医生、一名警卫员。韩家对他们照顾得很好。韩荫亭当伪军前曾是共产党员，当过煤矿工人。他一直同我地方党保持着联系。刘志坚在韩家治疗休养了半年，还是不能走路。他离开韩家时，宋任穷和陈再道一起看望了韩荫亭，并向韩表示感谢。日本投降后，韩荫亭卒部反正加入我军。

冀南第2军分区副政委李定的和敌工科长宋之光，也是通过内线关系从日本宪兵队监狱中抢救出来的。

1943年春节期间，李定灼和宋之光由于汉奸告密，于南宫县大马村被敌

人抓去，关押在南宫县城日本宪兵队监狱。军区研究决定，由第11团团长吕琛、南宫县大队长李地山等负责组织营救。营救人员在内线关系配合下，于夜间进入南宫县城，悄悄摸进宪兵队监狱，砸开牢房救出李定灼、宋之光以及被关押的40多人。他们还击毙日军4人，俘虏伪军40多人。我军无一伤亡，内线关系也未暴露。

为配合部队反“围剿”斗争，我敌军工作人员还多次通过内线关系端掉敌军的炮楼。南宫县臧家庄敌炮楼先后被我军利用关系打过3次，共击毙日军12人，俘伪军20多人。有的地方敌军工作人员做好了伪军中炊事员的工作，使其成为我方的内线。他们从内线得知，伪军吃饭时总是把枪放在炮楼里边，然后到外边来吃饭。于是，在拂晓或黄昏时，我方部队隐蔽在敌据点附近，派人伪装给伪军送东西进去，然后在内线配合下，乘伪军在外边吃饭时把炮楼的门关上。这样我方部队很容易就把据点里的伪军俘虏了，然后再开门收枪。那时，我敌军工作人员曾策动伪军整班、整队，几十人乃至上百人反正，多次协助部队攻打日伪城镇据点，使敌人大伤脑筋。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春，冀南区共瓦解伪军9000余人，利用伪军关系作战177次，攻克敌据点、碉堡110处，摧毁伪组织600多个。

“秋山良照部队”

冀南军区在瓦解、打击伪军的同时，对日军也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开始时，因受语言文字不通的限制，对日军开展宣传的方法比较简单，内容的针对性也不强。宣传品主要靠上级发，部队拿着到处撒，效果不大。后来改进了宣传的内容和方法，各单位组织敌工宣传员，由军区敌工部派人教日语和日本歌曲等。根据不同据点日军的情况，采取写信、寄日文传单、送诗歌等方法对日军进行宣传。针对日军士兵思亲想家的心理，每逢佳节特别是樱花节，大力开展宣传攻势，以助长日军士兵思乡厌战情绪。

在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中，被俘的日军士兵于1941年下半年在枣强地区组成的“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后改称日本士兵反战同盟）起了很大作用。

俘虏日军士兵很不容易。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很深，很难抓到活的，即使抓到活的，也是受了重伤。1940年，在堂邑地区的一次战斗中，我军俘虏了10多个负重伤的日军士兵。在医务人员精心治疗下，只救活了一个叫秋山良照的士兵。敌工部决心教育好他，让他转变立场，现身说法，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在我方政策感召下，秋山良照终于转变了立场。他在战斗中表现很勇敢。一次遭日军合围，他和战友们躲过敌人，背着负伤的八路军战士又回到部队。

“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刚成立时只有秋山良照等3名被俘日军士兵，后来发展到16人。他们经常向日军据点散发传单，喊话，或打电话，号召日军士兵不要为侵略者卖命。他们还组织出版了《日本士兵之友》和《战友》等刊物，向日军开展宣传工作，他们教八路军战士学唱日本歌曲，在向日军炮楼喊话时唱，以唤起日军思乡厌战情绪。

后来，秋山良照成为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冀南支部的负责人。在对日军开展宣传活动中，他最积极，出的主意也最多。比如，对日军喊话作宣传，有时遭到枪击，太危险，他就提出用电话讲。他编写了许多宣传品，画了许多

宣传画。有些宣传品还署上他的名字，对日军影响很大。日本侵略者十分害怕，竟说八路军中有个“秋山良照部队”。

冀南军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1942年的一个月内，日军由于反战思乡自杀者达22人。1943年春季，我军在作战中俘日军24人，日军向我投诚者两人，自杀者9人。另外，我军还和一些日军据点建立和平关系，商定双方互不攻击。有一个据点，是日伪军合守的据点，驻日军一个小队，小队长金津学生出身，作战不太积极。我军敌工科的同志通过日本翻译和维持会长，反复向金津进行宣传，做工作，最后达成“我不打他，他不打我”的口头协议。一次，这个据点的敌人抓住我方3个带枪的游击队员，后来通过翻译进行说服工作，很快被释放回来。之后，反战同盟准备召开日本士兵代表会议，动员金津来参加会议。他说，不能去，去了回来就没命了。

“反战同盟”的同志在冀南艰苦的斗争中是立了功的。军区、分区的领导同志经常看望他们，关怀他们。宋任穷和陈再道专门会见过秋山良照等日本朋友。1943年4月3日，刘伯承在太行《新华日报》上发表的《勉国际友人》一文中赞扬了秋山良照：“……冀南部队的秋山良照同志，也是多次在枪林弹雨之中，亲自拿机关枪去协助我们作战。”

为了保证“反战同盟”同志们的安全，1943年后，军区把秋山良照等人先送到太行山，后又送到延安。他们到延安后，被分到“日本工农学校”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作。

抗战胜利后，秋山良照和他的战友都回到了日本国。回国后，他写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反战士兵》等书，记述了抗战时期他在冀南等地的战斗经历。1981年，秋山良照来中国旅游，宋任穷会见了他们，一起愉快地回顾了他们在冀南那段难忘的战斗生活。

在海南岛战役中的韩先楚

何念选

韩先楚（1913～198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13 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二程区一个农民家庭。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红军游击队，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1933 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35 年在第 15 军团任团长、副师长、师长。参加过长征和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 115 师第 344 旅副团长、团长、副旅长、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 3 军分区司令员。1941 年春，赴延安入军政学院学习，后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4 年任抗日军政大学第 1 大队大队长。解放战争初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 4 纵队副司令员。在辽沈战役中，任第 3 纵队司令员。平津战役后，任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兼军长、湖南军区副司令员。1950 年参与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中，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第 19 兵团司令员，参与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3 年从朝鲜回国后，任中南军区参谋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1955 年入军事学院学习，同年 9 月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7 年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1973 年任兰州军区司令员。曾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6 年 10 月 3 日于北京病逝。

* * * * *

韩先楚是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的勇冠三军的骁将。他身经百战，组织指挥了许多令人赞叹的硬仗、恶仗。长征途中，他浴血奋战，勇往直前；在东北战场，主动请缨，率部冒着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在四保临江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歼敌第 89 师、第 116 师大部和新 5 军军部，接着攻克义县，攻打锦州，追歼敌西进兵团，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旋风部队”；在朝鲜战场，他负责前线指挥，与美军作战，连战连胜，攻克汉城，大灭敌威。此文记述的是在海南岛战役中，他把“陆上雄师”变为“水上蛟龙”，用木船战军舰，一举攻克琼岛，创造了战争史上奇迹的事迹。

受命攻琼

1949 年 12 月，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兼第 40 军军长韩先楚和第 40 军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军长解方等人，在雷州半岛接受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回来后，立即将部队开往海康、徐闻、北海等地训练。军部驻海康。

几天来，韩先楚席不暇暖，一馈十起。白天，他带领参谋和有关师的领导到海边找训练场地；晚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夜深了，他仍在思考问题，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过去，从南打到北，再从北打到南，都是在陆地作战。攻山头，打城市，战平原，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可渡海作战这还是头一回。几天来，韩先楚找来许多有关海南岛的资料，手不释卷，边看边将重点画上红杠，特别重要的则记在一个本子上。看得出，他是在争分夺秒地工作，考虑解放海南岛的最佳作战方案，最有利的行动时机，以及如何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交给的任务。

小时候，韩先楚因家里贫穷，父母含辛茹苦，经常是凶年饥岁，度日如

年，没有钱上学。在他再三要求下，父母勉强送他上了一年多学，才认识几个字。但韩先楚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而且记忆力强，过目难忘。经过长期刻苦学习，他的知识日益丰富。他知道，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是世界上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有指南针、火药、造纸术、活字印刷等名扬海外的四大发明，有力数众多的文化古迹。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对人类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解放，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现在，台湾、西藏、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党和人民把解放海南岛的任务交给自己。要圆满完成任务，必须对海南岛的情况进行认真研究。他看资料、讲话、想问题，都离不开海南岛，心里想的是如何打入海南岛，满脑子装的是海南岛的地形、海南岛的敌情……

过去，由于南征北战，在枪林弹雨中生活，韩先楚考虑最多的是军事谋略，是如何带兵打胜仗。在攻打某地之前，才有针对性地对某地进行研究。因而对海南岛了解不多，只知道海南岛仅次于台湾岛，是祖国第二大宝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最近他看了不少资料，才对海南岛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海南岛北隔琼州海峡与广东相望。除本岛外，行政区还包括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的岛礁及其领海。陆地面积 3.4 万平方千米，其中主岛海南岛面积 3.39 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 1500 多千米。人口 300 多万，有汉、黎、苗、回等民族。山地多为海拔 500~800 米的花岗岩丘陵和低山，多系东北—西南走向，泛称五指山地。主峰五指山，因从东南方向望去五峰耸立略似五指而得名。海南岛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封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下，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农民逃往南洋谋生。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至，在海口、嘉积、文城、那大、三亚等地开办洋行，倾销洋货，设立教堂、学校、医院等，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海南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海南人民不断地掀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下，海南岛人民举行过多次武装起义，开辟了著名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游击战争。

韩先楚对坚持领导海南岛革命斗争的冯白驹同志的情况进一步作了了解。冯白驹是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他 1903 年生于琼山县，1926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兼琼山工农讨逆军第 6 路军党代表，组织农民武装参加琼崖武装起义。1929 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遭敌破坏后，他发起重建琼崖特委。第二年任特委书记，领导建立琼崖工农红军第 2 独立师。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革命，还成立了娘子军连。1932 年，在反国民党军“围剿”中，部队遭受严重挫折，被围困于母瑞山区。在与中共中央、广东省委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他仍顽强地坚持斗争。次年，他率 20 余人突围下山，恢复了党组织，重建红军游击队，继续开展武装斗争。1939 年 2 月，日军侵入海南岛后，他将部队扩编为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亲自任总队长，进行游击战争，开辟了琼文、美合、白沙等根据地，挫败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和蚕食。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军民进行反国民党军“清剿”作战，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根据地，部队发展到万余人，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他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 1948 年秋起，他率部队对国民党军连续发动 3 次攻势，解放了海南岛大部分地区。1949 年秋，国民党军一部从大陆退据海南岛，他率部转入保卫根据地的反“清剿”斗争。

韩先楚指挥作战，一向重视研究敌情，以谋制人。

国民党自 1949 年 12 月 7 日宣布，国民党“政府”由成都迁往台湾。蒋介石逃窜台湾后，派其尚存的有生力量占据东南沿海的诸岛屿，妄想利用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以及台湾、澎湖列岛、金门岛、马祖列岛，直到南边的万山群岛、海南岛等几乎大陆沿海的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岛屿，以组成对大陆进行海上封锁的锁链。蒋介石对他的军政要员说：“凭海据险，可以长期固守。将海南岛与万山、金门、舟山等岛形成犄角，进可以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守可以作为防卫台湾的海上屏障。”

韩先楚认为，沿海岛屿被国民党军占领，不仅军事上对我不利，对国家经济建设也极为不利。新中国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打破国民党对大陆的封锁。国民党对大陆的封锁，不仅仅是军事封锁，更重要的是经济封锁。如能打下海南岛，就能打破敌人的封锁……

解放海南岛的关键是渡海登陆。韩先楚对岛上的国民党军很了解。在两广战役中，漏网之敌逃窜到海南岛，与原岛上守敌陈济棠部合并，共计有约 10 万人，另有舰艇 50 多艘、各种飞机 40 余架。蒋介石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国民党军海南防卫参谋长率扬敬为了向薛岳谄媚，提议海南岛防线以薛岳的字“伯陵”命名为“伯陵防线”。对于从战火中打出来的韩先楚来说，没有攻不破的防线。在红军西征途中，彭德怀说：“袭击定边，恐难奏效。”韩先楚想：打定边，违背彭总指示；不打，错过战机，对全局不利。从全局和可能性上看，还是打下定边有利。于是，他主动率部打下定边。彭总发电报赞扬说：“机动灵活，庆祝胜利！”1938 年，韩先楚任第 689 团团长。在长乐村战斗中，刘伯承师长向朱总司令报告：韩先楚率 689 团打了一个漂亮仗！在四保临江战役中，韩先楚率部一举全歼国民党军第 89 师。1947 年，韩先楚任第 3 纵队司令员时，率部奇袭威远堡，敌人称他的纵队为“旋风部队”。打锦州，韩先楚指挥挖暗道，秘密运来山炮，指挥部队攻下被敌人称为“第二个凡尔登”的配水池阵地……现在，敌人提出什么“伯陵防线”，这对于韩先楚和他的英雄部队来说，恐怕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问题是第一次渡海，没有船只，没有渡海的经验。

部队指战员绝大部分没有渡海作战经验，有的甚至连大海都没有见过。在陆地上，部队经常翻山越岭，山再高也高不过战士的两只脚。他们可以用两条腿成为“旋风部队”，却不能用急行军渡海。再说，敌人有军舰、飞机，我军连帆船都没有。

韩先楚和解方以及参谋人员，几次来到海边。他们不仅没有看到一只民船的影子，连一个渔民都没有看到。显然，国民党军逃走时，把渔船烧了或拖走了，也把渔民赶走了。

韩先楚和解方沿着海滩往前走。海浪有规律地冲击着悬崖，发出阵阵涛声。韩先楚突然停住脚步，问在后面比他大三四岁的解方副军长：“老解，你家吉林东丰离日本海还有好几百里吧？你对海熟悉吗？不过，你去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对海一定有所了解。”

解方快步走近韩副司令员身边，因海浪声太大，便贴近韩的耳边说：“小时候没有到过海边。到日本，那是坐大船去的，对海也不甚了解。”

他们来到一片较开阔的海滩。大海掀起层层巨浪，越过光滑的岩石，向海岸猛烈冲击，气势是那么雄伟。随着海浪吹来一股股海藻的腥味。

“首长，天气凉了，这海腥味也太难闻了，快回去吧，等会儿你胃疼又

受不了……”跟韩先楚一起出来的警卫员和参谋，不断地催促着。

最近几天来，韩先楚一直犯着胃病，有时疼得一边用手捂着胃部，一边坚持工作。可是，他只要一工作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大家催着他返回，但他好像没有听到似的。他在期待发现什么？只见他两眼盯着大海。海在狂舞，海浪一道接着一道咆哮着向岸边滚来，发出轰鸣。

“你们看，这海潮跟我们前两天看到的不一样，早上看到的与晚上看到的也不一样。”韩先楚停住脚步，用手指着海浪对大家说。

这时，大家全明白了。难怪韩副司令员看得这么认真，观察得这么细致，原来他是在认识海，寻找海潮与时间、风力、风向的关系，他是在摸海潮的规律啊！

韩先楚进一步将自己观察到的情况告诉大家说：“你们回想一下，前几次我们看到的情况，跟今天看到的有什么不一样？”他看了一眼大家，进一步解释说：“低潮的时候，海面平静，简直像小溪一样；可是，潮水一涨，海面就激荡起来。半潮时，海浪拼命咆哮，好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野牛狂吼；但到了满潮时，海面又恢复了平静。潮涨潮落是有规律的。我们要渡海作战，必须了解和掌握大海的规律。”

等他讲完，大家才发现已随着韩副司令员不知不觉地住回走了好远。

这次跟韩副司令员出来观海，大家学到了不少知识，还选好了几处海礁作为部队训练的场地。大家决心进一步认识和掌握大海的规律，胜利渡过琼州海峡，完成解放海南岛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1949年12月30日，中共第40军党委召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渡海作战的指示：渡海作战与我军过去所有的战役、战斗不同，必须注意潮汐和风向，必须充分准备船只，求得一次能运载足够的兵力。前敌登陆的部队，要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要能独立进攻，不依后援，要研究作战经验……

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和军政治委员袁升平，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分别讲话，强调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是渡海登陆作战成功的根本。

会议还传达了林彪及上级有关指示，分析了渡海登陆作战的特点，研究了加强渡海作战必须采取的措施。

韩先楚在会上再次强调抓紧做好准备工作，立足于早打的重要意义。他说：“毛主席提出及早解决海南岛问题是非常英明的。早日发起海南战役，乘敌立足未稳，打乱敌人‘反攻大陆’的海上部署，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给敌人以喘息之机，我们将失去战机，招致无穷后患。”

他没有拿讲稿，没有高谈阔论，但非常严肃，比以往任何一次讲话都严肃。他的讲话言简意赅，一言九鼎。

也许由于问题太重要，也许由于韩副司令员态度太严肃，也许由于会议气氛太紧张，会场上大家正襟危坐，鸦雀无声。

袁升平政委就如何做好渡海作战的政治工作作了布置。

会后，军党委下发了《海南岛作战的准备工作指示》。指示中强调，要抓紧渡海的准备工作，集中力量征集船只。

韩先楚为什么十分严肃地强调早日发起海南战役，为什么强调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因为他认真研究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电报强调“在春夏之交解决海南岛的问题”。毛泽东已通过气象专家了解到，琼州海峡每年从农历正月到清明前多刮东风、北风、东北风，此时南渡海峡最为有利。

过了清明，风向变化无常。一过谷雨则转为南风期，是南渡的顶头风，对渡海作战十分不利。如果遇上台风期，更是十分危险。

韩先楚看了有关资料，过目难忘：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这支强悍的大军被台风吞噬，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有名战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些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

韩先楚认为，历史的教训必须汲取，否则就会吃亏。他知道，前不久第10兵团第28军在攻打金门岛时就因对潮汐情况掌握不准而损失惨重。韩先楚强调早日发起海南岛战役，其原因除了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外，恐怕就是气候了。这一问题，有一部分人还没有真正理解，他又不好将一些教训摆出来，怕影响下面的情绪，只能从正面强调，正面教育。

至于毛主席要求必须研究三野叶飞兵团攻打金门的教训，韩先楚认为这一指示非常重要，绝不能让金门失利的教训重演。善于汲取经验教训，这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标志。清朝郑绩有句名言：“善学者取长舍短。”韩先楚不仅是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而且是一位善学者，他的丰富知识无不是善学而得来的。

对于金门失利的教训，韩先楚不让向下面传达；但他要求军、师主要领导必须了解、研究，以严防教训重演。

战前准备

对韩先楚来说，解放海南岛是他第一次指挥海上作战，因此心里没有底。工作千头万绪，都是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真是火烧眉毛。作为一军之长，他自己始终注意抓主要问题，如指挥作战、部队训练、船只筹措等；其他事，则分工让大家去做。

韩先楚深知兵不娴习，不可以挡敌。他专门成立一个筹措船只工作队，让其负责做渔民的工作，寻找船只。他自己则主要抓部队海上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自解放战争以来，韩先楚身体一直不好。他休息、睡眠时间很少，经常一天一两顿饭也顾不上吃，加上饮食也不好，因此胃病常犯，有时用手捂着、用桌子顶着胃部工作。晚上，他不是开会，就是和其他军领导商量研究问题，或是下部队，或是找人谈话，经常工作到深夜。白天，他深入到营、连训练场，了解情况，指导训练。他一工作起来，胃疼、饥饿就全顾不上了。才三十七八岁的人，看得出已积劳成疾。如没有战事，早该送他去疗养休息了。虽然如此，他工作起来却劲头十足。有人跟他开玩笑说：“老韩呀！你真正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战争完了，送你到医学院进行科研，有研究价值啊！”

韩先楚听罢，哈哈一笑：“这么多的事没落实，放不下心啊！党交给的任务要完成好，就得忙一点。”

几天来，韩先楚早出晚归，深入各训练场，发现问题不少。陆上训练与海水中训练大不一样。开始，战士们看到大海辽阔无际，海水颜色各种各样，变化无穷，温柔恬静，觉得新奇有趣。面对微波细浪的海面，许多战士认为这大海跟家乡那绿波荡漾、碧水茫茫的湖差不多。可是没有多久，大海发起了脾气，巨浪滚滚，浊波排空，许多战士开始发慌、晕船、呕吐，吐完了食

物吐黄水，个个面色苍白，全身无力，站立不稳。于是，许多人对渡海作战产生了疑虑和恐惧。

“韩副司令员，怎么办，战士们连船都坐不了，哪还能打仗？”许多师、团领导见到韩先楚，几乎都提出这同样的问题。

“坚持练，多练练就会适应。”韩先楚坚持从严要求部队，强调说，“干部要带头坚持练，在练中体会如何适应海上风浪。”

韩先楚想不起谁说过：“练兵之法，当先练心。人心齐一，则百万之众，即一人之身。”他觉得此话有道理，必须练兵之胆气，解决战士对海的恐惧心理。

韩先楚解决战士们的思想问题，还是用我军的老办法：从思想教育入手。他回到军部，和政委袁升平、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商量，最后决定：要求各师、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一些老同志，给战士们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让大家学习老红军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讲部队刚到东北时，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奇寒气候条件下，团结一致，不断战胜敌人的英雄事迹；讲部队一路南下作战，不怕苦不怕累的好人好事；讲克服困难，解放海南岛的重大意义……

韩先楚又一次到了训练场，跟战士们一起练。船向海中驶去。没过多久，波浪排排凶猛地向着船扑来。船颠簸着，似乎要被掀翻。韩先楚本来胃病没有好，此时开始呕吐了。参谋、警卫员搀扶他去休息，他不同意，坚持训练。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

“首长，我家在黄河边上，河水泛滥时，滚滚洪流，浩浩荡荡，如万马奔腾，一泻千里。”一位战士向韩先楚谈起他看到洪水暴发时的情景。看得出，这位聪明的战士是想分散一下首长的注意力。“你家乡是什么地方？”韩军长问。

“山东滨州。”战士笑着回答。看来，他好像还能对付大海。“首长，我家后面十几里处，有一处瀑布，飞泻而下，似白龙出山，惊雷远震；似玉如银，五彩缤纷。”听这位战士说话口音，像东北人。

“你是什么地方人？”韩先楚想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力，便亲切地问。

“长白山下的。”战士回话。

“喔，吃高粱米长大的。”韩军长的话，引得大家直笑。“我家前面有一条小溪，如悠悠银链，水质清凉，遇岩而下，丁冬声声，如歌如诉。我常在她旁边流连忘返。”

韩副司令员猜想这位战士说得这么轻松、动听，一定是为了引开大伙注意力，让大家放松，也就没有再问他是何处人。他觉得，不管家是什么地方的战士，都是十分可爱的。他打心眼里喜欢这些战士。

战士们看到军长也这般坚持跟大家一起训练，更增强了战胜风浪的信心。大家说说笑笑，情绪放松了，不再紧张了，晕船、呕吐也渐渐减轻了。一天的训练结束后，大家感到很有收获。经过多次思想动员和教育，部队畏惧大海的思想得到很大程度的克服。大部分人表示，要下定决心，吃大苦，耐大劳，克服困难，练好海上杀敌本领。

海上练兵的决心有了，胆子大了，但有些人又产生了盲动行为，在没有掌握风向、潮汐等常识的情况下，就冒失驾船进入大海，结果遇上了台风。有的船迷失了航向，随浪漂泊，几天后免难返回；有的船被大风刮得桅杆折断，帆篷破烂，船翻人亡；有的船被刮到越南，被占领越南的法军抓走；有

的船却不知不觉到了海南岛，没有攻岛就被人俘获了……真是损失不小，教训惨重。一些人恐惧大海的思想又重新抬头，对于用木船渡海作战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韩先楚了解这些情况后，立即和其他军领导研究，他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渡海知识教育，让广大干部战士掌握渡海的主要知识和技术。俗话说，艺高人胆大。

“善练兵之胆气者，必练兵之武艺。”“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习艺为先。”韩先楚说了两条兵家名言。这也许是在延安军事学院哪本兵书上看到的。大家知道，他幼年时只上过一年学，但记忆力好。

部分干部战士认为，陆军在海上无用武之地，对乘木船渡海作战信心不足，期望上级派飞机、军舰参战；个别人还怕革命到“底”（海底）。吃饭时，有人用筷子夹着一块鱼说：“哦！今天我吃鱼，也许明天鱼要吃我。”一些人听了这种议论不做工作，却附和说：“打了几年仗，从北打到南，最后到了这海上，搞不好要葬身鱼腹了。”“听说，有种什么鲨鱼大得很，连咱们的船都能吞下。”“哦！这么吓人哇！”……大家言来语去，说的多是一些消极话，很容易影响部队的练兵情绪，影响战前的准备，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夜已深了，空气潮湿，寒气袭人。军领导韩先楚、袁升平、解方等在海边草棚里开会，听政治部主任李伯秋汇报部队思想情况。李主任反映了上述部队思想问题后，韩先楚等军首长很焦急，当即做了认真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不断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特别是干部的思想工作，才能做好海上练兵和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

为了统一领导干部的思想，中共第40军党委于1950年1月6日在海康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全军团以上干部出席。

会上组织大家学习了上级关于解决海南岛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及作战方针，并听取各师汇报战前准备情况及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研究了亟待抓的工作。

韩先楚根据一些人的思想认识和反映出来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作了发言。他除再一次强调执行好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解放海南岛指示的意义外，还针对一些人提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有人提出要去香港购买登陆艇，我觉得这办法行不通。蒋介石打内战靠的是美帝国主义，美国和英帝国主义是串通一气的，他们怎么会卖登陆艇给我们呢？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是我们的传统。还是充分发扬我们的传统吧！发扬传统靠得住。我们要用木船去解放海南。”

韩先楚还给人家讲了个战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海南岛时，第一次用军舰没有攻上去，因为那里沿海浅水滩多；第二次改用木船才打上去。”韩先楚坚定地提出：“要把我们善打硬仗的陆军变成海军陆战队，把我们东北的旱老虎变成海里蛟龙！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参加会议的人齐声回答。

韩先楚讲的话不多，却直言不讳，开宗明义，倾心吐胆，以理服人，因而打消了一些人幻想靠飞机、军舰打海南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坚定了大家依靠现有条件，发扬敢打敢胜的传统和战斗作风，积极做好战前准备的决心，调动了大家海上训练的积极性。

担任攻打海南岛任务的是人民解放军第12兵团第40军和第15兵团第43军。第40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兼任，军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军下辖3个师：第118师，师长邓岳，政治委员张玉华，参谋长苟在松，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第119师，师长徐国夫，政治委员刘光涛，副师长何耀海，参谋长夏克，政治部主任程克廉；第120师，师长罗春生，政治委员张海棠，副师长黄国忠，参谋长郑志士，政治部主任张继之。第43军军长为李作鹏，政治委员为张池明。

在第四野战军设在汉口的司令部的作战室里，司令员林彪叫参谋人员挂上了海南岛和中南沿海的作战地图。他在地图上作了许多只有自己才能看懂的标记。他常在地图前踱来踱去，不断地思索、筹谋并熟记，苦心孤诣，常常坐以待旦。警卫和参谋人员发现他近一个时期食不甘味，饭量锐减。失眠、低烧、烦躁、疲倦以及枪伤脊髓神经的后遗症在折磨他。尽管这样，他还是不断地向参谋人员面授机宜，向沿海各作战部队发出一份份指令电。

第40军和第43军，为了切实贯彻落实上级的部署，都在有条不紊、快马加鞭地进行着进攻海南岛的准备工作。

为了加强渡海作战的指挥，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已组成：由中共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统一领导，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任总指挥，指挥部领导成员中有第15兵团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和第1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等。

参战部队确定以第40军和第43军为主力，另配属1个加农炮兵团、1个高射炮兵团及工兵、通信、后勤部队等，共计10万大军。这次渡海作战，与攻打金门不同的是可以得到岛上冯白驹纵队积极有力的支持。

通过各方面的情报了解到，薛岳守岛部队的防御部署是：以海空军封锁海面，破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准备，拦截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船队；当人民解放军进至滩头时，以陆海空军同人民解放军决战。同时加强对冯白驹领导的琼崖纵队的“清剿”。

美国陆海空军的一些高级军官和陈诚等曾到海南岛考察岛上防御情况。薛岳举行了一次事先经过充分准备和安排、貌似力量很强大的军事演习。薛岳心里清楚，他手下人也知道，这种演习是完全做给美国人看的，以便得到美国的援助。当然，也可以骗骗蒋介石，让蒋高兴，多给一些款子和东西。

为了达到自己设想的目的，薛岳精心挑选了几门炮，并挑选了有10年军龄以上的炮兵油子，在测好距离和方位的海面上设置了一排排木船，各炮射击目标作了明确分工，并进行过试射。当然，这些是严格保密的，绝对不能让美国人和台湾派去的人知道。

薛岳故意选择在天黑后能见度差的条件下演习。只见薛岳陪着美军高级军官团来到设在海岸边的岸炮阵地。观察了一会儿后，他接过参谋人员递给的信号枪，对着天空连发3枪。发光的信号弹将海空照得通亮，几千米远海面上的数十艘木船能看得一清二楚。

美军军官举着望远镜惊叫：“共军船只！”

“开炮！”薛岳一声令下。

随着几声轰隆轰隆的巨响，只见木船上升起一团团火焰，周围掀起一个个冲天水柱，船的碎片在火光中四处飞溅……

美军领队的军官向薛岳举起了拇指，连连说：“OK！”

薛岳则打肿脸充胖子，阿其所好，摇尾乞怜。

对于薛岳的底细及其心态，我军的情报人员了如指掌。他自广州退至湛江不久，湛江就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他又从湛江逃窜到海南岛，被追赶得惶惶不安，如一条丧家之犬。他的部队内部派系林立，貌合神离。

蒋介石给薛岳的约 10 万人，是由盘踞在海南岛和由大陆逃到该岛的国民党军组成的，并配以作战飞机 25 架、运输机 20 架、海军舰艇 50 余艘。这些兵力虽然统一列入他的司令部战斗序列，但这些部队却分为三大派系，向来互相勾心斗角，一个薛岳怎么能统一指挥这样一些人呢？

薛岳指挥的第 4 军属蒋介石嫡系内陈诚一系。这个军在近 3 年中屡遭人民解放军全歼或歼灭性打击，因而在国民党军中声名狼籍。不过，被歼灭得快，被蒋介石和陈诚重编得也快。眼下该军只有 8000 余人，不过号称 1 个军而已。

其他 3 个军是第 62 军、第 63 军和第 64 军，共计 5 万余人，均属粤系陈济棠和余汉谋的亲信部队，也是屡被打垮又屡被重编的。

余下的一些杂牌部队和地方武装。

韩先楚对余汉谋是很了解的。他看资料时，在余汉谋的名字下重重地画了一杠。不过此时的余汉谋已辞掉了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之职，只挂一个警总副司令的空名，实际上已成了衣架饭囊。韩先楚画的一杠，意思很清楚：没有把余汉谋放在眼里。

国民党军守海南岛的主力是谁呢？

韩先楚从敌情资料分析，认为守海南的主力是刘安棋指挥的国民党军第 23 兵团，因为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该兵团下辖的第 32 军和第 50 军，是全副美械装备的精锐之师。

过去，韩先楚和国民党精锐部队没有少打交道。1946 年 10 月，在新开岭战役中，他率部歼灭了国民党军嫡系第 25 师；在四保临江战役中，歼敌第 195 师和第 21 师各一部；在辽沈战役中，歼敌“西进兵团”。韩先楚对于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特点非常了解：他们对上级是百般奉承，投其所好；对别人是笑里藏刀，心怀叵测；对同级是巧言令色，虚情假意；对下级是故弄玄虚，佛口蛇心；对非嫡系部队经常是耀武扬威，倚势凌人；对老百姓则随心所欲，草菅人命。这种部队很难说能听薛岳的指挥。不过，海南岛对于国民党来说太重要了。人民解放军已把他们赶进死胡同，共同的利益把他们捆绑在一起。他们不会甘心灭亡，定作垂死挣扎。这一点，韩先楚早已预料到了。所以，他夜以继日地、扎扎实实地抓战前准备工作。

韩先楚是一位工作没落实就吃不好饭、睡不稳觉的人。他非常清楚，摆在全军面前的困难重重：没有船只，没有经验，没有器材，不懂海洋气象，不熟悉海情，一切都得从头做起。而且，这么多的准备工作，必须争取在 3 个月内完成。在短短的 3 个月内，要使一支对大海完全陌生的陆军熟悉海洋，学会航海作战的本领，又要筹备到足够的船只和物资，恐怕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才能做到。韩先楚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自己的部队一定能解决渡海作战这一新课题。

为了迎接海南的解放，1950 年初，全琼各族人民超额完成了认购琼崖临时人民政府发行的 40 万元公债的任务，筹集了 5 万多担粮食，组织起了 6 万多人的民工运输队，积极做好内应工作。

第 40 军党委扩大会议后，各师、团对排以上干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集训，统一了广大干部的思想，增强了胜利信心，大家把思想集中到早打、靠

木帆船打的准备工作上，决心在3个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韩先楚为了掌握部队情况，指导部队扎扎实实地做好战前准备工作，遂把军指挥所从海康县城搬到海边靠近部队训练场的草棚子里。他把常年生活在海上的老渔民、老船工请到指挥所里当“顾问”，提出不过元旦、不过春节的口号，指导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练兵活动。

为了让大家学习和掌握渡海作战知识，韩先楚指示各师派人广泛收集海洋知识和海战资料。大家把书店里、旧书摊上无人问津的清朝海军提督的《航海手册》、《潮汐表》统统买了回来，认识字的战士争着看，不认识字的战士听别人讲，掀起了一股学习海洋知识的热潮。

一天，韩先楚登上部队在海上训练的木船检查工作。有关干部在汇报工作时，大谈战士如何研究救生，还拿出战士们用竹子等做的各种救生器材。有人夸耀说：“这是战士们的发明创造！”

韩先楚看后紧锁眉头，没有表态。下船后，他对该部队的师领导说：“要保护和表扬战士练兵热情，但也要积极引导，不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救生上，要多鼓励战士敢于用木船打敌人兵舰，树立敢打、敢拼、敢胜的思想。”

韩先楚了解到，有的部队把缴获敌人的汽车上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在木帆船上，改装成机械动力的帆船；有的部队把战防炮和其他一些小炮安在机帆船上，装成“土炮艇”，以加强对敌人的杀伤力。他认为这是积极进攻的表现，于是对这种做法大加赞扬，并向其他部队介绍、推广。在韩先楚的肯定和支持下，不久部队中出现了一支由战士自己改装成的土炮艇编成的“土舰队”。这些装备，后来竟成了攻打海南岛的有力武器。

正当部队争分夺秒进行战前准备时，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潜渡到雷州半岛，以协助渡海作战部队制订作战计划。符振中带来了一份海南岛敌我分布态势图以及一些资料和琼崖纵队的电台密码。这样，渡海作战指挥部可以和琼崖纵队用电台直接联系了。

不久，琼崖纵队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郭壮强、琼崖临时人民政府符英华等20多名干部也分批潜渡到了雷州半岛，向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报告了琼崖国民党军设防和各港口、海岸线的水文、气象等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制订渡海作战计划很有用处。

1950年2月，韩先楚和袁升平带着琼纵参谋长去广州参加研究渡海作战会议。叶剑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和两个军的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听取了两个军关于战前准备情况的汇报，传达了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指示。会上，符振中转达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的两点建议：一是希望乘敌人海防还没有部署好，防守还不甚严，先派小批兵力偷渡过海，以增强岛上我军的力量；二是如果部队偷渡不行，就派一批干部带上一些枪支、弹药偷渡过海，以充实琼纵的战斗力。

叶剑英听了符振中汇报后，问他是如何从琼州海峡偷渡到雷州半岛的。

符振中作了详细汇报……

此前，毛泽东主席曾指示：进攻海南岛，要依靠改装的机器船，从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台大海船的机器。

会议讨论这一指示时，意见不一致。一些人以毛主席指示“依靠改装的机器船”为由，过分强调机器，主张到香港去购买登陆艇。多数人则认为，

能搞到登陆艇，对渡海作战当然有利；但当前的形势是，根本不可能买到登陆艇，期求登陆艇是不现实的。

这时，韩先楚发了言。他认为：应趁敌人立足未稳，尽早发起海南战役，越拖越不利。能买到登陆艇作战，当然很好，可是短时间内根本解决不了。要拿出很长时间做准备，夜长梦多，变化频仍，对我不利。改装机帆船也有困难，一般的汽车发动机马力小，用不上；美国产十轮大卡车发动机虽然马力可以，但这种汽车我们不多。这些都费时费力，是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唯一想办法可以解决的是木帆船。他说：我们的立足点应放在木帆船上。据我调查了解，用木帆船，只要掌握好时机，充分利用好风向、风力，是有把握渡过琼州海峡的。至于改装机器船，我们也要抓紧时间，想尽办法，能改装多少算多少，以保证有一部分机器船作为指挥船，一部分装上火炮作为护航船。我们要用木帆船打败敌军舰，用木帆船渡过琼州海峡，最后解放海南岛……

“敌人有飞机和军舰，我们靠木船渡海作战，这真是战争史上的奇迹！”会场上，不知是谁，在韩先楚讲话时插了这么一句。

韩先楚语气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积极努力，把握战机，一定会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

大家听后，热烈鼓掌。

经过讨论，大家进一步统一了思想。会议最后确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同时决定5月底准备完毕，6月份发起渡海登陆作战。

韩先楚和袁升平经过研究，对作战发起时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作战时间推迟到6月份，不仅延长了备战时间，容易使部队出现松懈情绪，而且也可能错过顺风期而贻误战机。

会议已作出决议，怎么办？韩先楚和袁升平研究后，立即给军里发电报，要求积极准备，准备工作要提前完成；抓紧改装机帆船，收集风帆船，自己派人购买机器，不依赖上面拨给。

韩先楚和袁升平从广州回到军部后，立即召开了军党委会。在会上，韩先楚提出要求说：“关于去香港购买登陆艇和6月份登陆时间问题，不向上传达。对部队要强调，渡海时间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3月份前完成。”

党委成员同意韩先楚的意见，并作出了决议。

目标已经确定。实现目标的秘诀有两条：一是不屈不挠，坚持到底；二是靠正确的方法。

时间太紧，要处理的事太多。如何做到有条不紊？韩先楚除督促部队抓好训练、派专人落实筹集帆船外，自己又亲自召集人员在徐闻县迈陈圩建立机帆船修造厂，命第118师政委张玉华兼任厂政治委员，徐锐兼任厂长，张凤山为总工程师。

这个以军部武器车辆修理所和工兵营为主体组成的机帆船修造厂，经过大家的努力，很快就将70余只风帆船改装成机帆两用的快速船，并将其中15只大马力快速船装上了战防炮等火炮和机关枪，作为护航炮艇队。

在修造机帆船过程中，韩军长不仅是指挥员，而且亲自和战士、船工一起锯木头，翻砂铸造螺旋桨。韩先楚对正在训练的船机手风趣地说：“你们在陆上开车用轮子跑路是英雄，在海上开船也要当英雄，可不能当狗熊啊！”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期间，为了加强快速船的炮火，曾在延安炮校学习过的军炮兵主任黄宇，把懂铁匠活和木工技术的战士召到一起，经过反复研究、试验，在船上修建了火炮工事，将战防炮固定在船上，当“舰炮”使用。

韩先楚和解方观看这种“舰炮”试射成功后，非常高兴，指示军司令部立即组织各师炮兵营长参观学习，要求各师都要建造土炮艇。

不久，各师的土炮艇也先后造成。这样，渡海部队虽然没有钢铁军舰，却诞生了一支土炮艇“舰队”。

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及征集船只人员的努力，经过广泛宣传教育，采取动员、雇用、征用等办法，两个多月时间内共收集到大小帆船 1058 只，动员船工 1417 人，基本上解决了渡海的船只和船工问题。

部队训练也掀起了新高潮，海边和海上到处都是刻苦训练、做战前准备的繁忙景象。

为了克服晕船，大家在岸上荡秋千，走浪桥，转“迷罗”。为了熟悉水性，学会驾船，大家在海里练游泳，在船上练摇橹，学撑帆、掌舵。干部战士不怕苦不怕累，歇人不歇船，昼夜轮番苦练，决心要把陆军练成“海军”，把“旱老虎”练成水中“蛟龙”。韩先楚看到这种情形，非常高兴。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要适应海上生活，学会渡海作战本领；二要边摸索，边试验，边积累经验；三要虚心向当地群众学习；四要以实兵实船，采取先易后难、先近后远、先单船后多船的循序渐进方法进行演练。第 119 师师长徐国夫对韩军长说：“军长，请你放心。部队训练情绪非常高，大家只有一个决心，就是跟着军长拼死拼活也要打到海南去，解放那里的 300 万人民。”

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刻苦训练，绝大部分干部战士消除了晕船现象，习惯了海上生活，学会了识别海情、潮汐、风向，基本上掌握了操使帆船的技术。军里还集中培训出 2470 多名水手和机帆船驾驶人员。渡海作战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自 1 月底以来，驻守在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为阻止破坏人民解放军登陆作战，一方面以海空军封锁海峡，破坏解放军登陆准备；另一方面，以 5 个师的兵力加强对冯白驹琼崖纵队的“清剿”。

在这期间，国民党上将、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曾给台湾发电，向蒋介石汇报他制订的“海南防卫作战计划”。此计划，是国民党原海南特区警备司令陈济棠制订的“防海必先守雷”（即要确保海南，必先确保雷州半岛）的防卫计划已成一张废纸之后重新制订的。计划一作成，他立即以急电呈蒋介石审阅核准。

蒋介石向来对其手下上送的纸上谈兵的东西半信半疑。

当薛岳再一次致电蒋介石，吹嘘得到陈诚首肯的“伯陵防线”“固若金汤，共军难越雷池半步”时，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计划早已落入雷州半岛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机关，现已摆在林彪的案头。

薛岳更不会想到，这份绝密防卫计划，竟是他亲自指定的防卫计划制订人之一、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林苔材送给琼崖纵队的。

敌情日益明了，战前准备日益成熟。渡海作战前敌指挥部遂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方针呈报给林彪司令员。

林彪不仅了解敌情，而且对部队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也了如指掌，此时又看到前敌指挥部作出的与他的决策相一致的作战方针，于是立即

提笔签上“同意”二字，并批示速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很快回了电，称“此种方法有效，即可提前解放海南岛”。

韩先楚看到正符合自己想法的上级指示电，心中无比高兴，立即找政委袁升平和副军长解方，研究偷渡的兵力部署。

试虚探实

在战前准备期间，渡海部队已派侦察人员携带电台潜渡到海南岛上，进一步沟通了渡海作战指挥部与琼崖纵队的联系。琼崖纵队派出的领航人员，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雷州半岛。

一切准备工作，正紧张地进行。

首次偷渡的方案也早送给了林彪。林彪批准首次偷渡方案时指示：应由两个军各以1个加强营的兵力，乘敌“围剿”岛上我军，两侧海防有所削弱的有利时机，分别向海南岛东西两侧实施偷渡。要多安桨橹，增加速度，务求拂晓和雾散前上陆。

首次偷渡营由第118师确定。师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研究，确定第352团第1营为“渡海先锋营”。这个营是师里的主力营，在辽沈战役突破锦州的战斗曾担任尖刀营，最大特点是既顽强，又机智灵活，善于打恶仗、硬仗，敢打敢拼，能攻善守。在海上练兵中，该营成绩突出，绝大多数同志克服了晕船，军事技术过硬，能在船上进行有效射击。

韩先楚知道邓岳确定第352团第1营为“渡海先锋营”后，心里非常高兴，这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韩先楚一向重视初战，因为初战不利，会影响三军士气。他的工作作风及对问题的处理原则是：急则独断，缓则合议；小则自决，大则广听。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士气，认为一支部队胜在得威，败在失气。

韩先楚再次来到第118师设在海边的临时指挥所，检查第352团第1营最后的准备情况。他看到部队群威群胆、勇猛顽强的气势，看到战士们在浩瀚无际、碧波滔天的大海里纵横驰骋，驾船，摇橹，升帆，起锚，胆大心细，得心应手……这一切使他十分放心。

正当第1营加紧渡海准备时，韩先楚接到第119师师长徐国夫、师政委刘光涛的报告。他们请求动用1个团的兵力去攻打离他们10多海里的涠洲岛，以夺取船只。涠洲岛面积25平方千米，是海南岛守敌的前哨据点。据部队侦察及岛上潜回的渔民报告证实，岛上有从大陆逃窜去的残敌、还乡团、土匪武装六七百人；其中有国民党军海军陆战队的“海硕”号、“海狗”号两艘军舰，共150余人，是守岛的主力。该岛守敌妄图凭险据守，以作为海南岛守敌的前哨耳目。他们控制着从大陆掠去的400多只双篷双桅杆大船，近来经常袭扰我海练部队。第119师要求派兵夺取该岛，以清除其对我军的破坏和威胁。

韩先楚对徐国夫、刘光涛主动请战歼敌的指导思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认为，攻下涠洲岛不仅可以解决船只问题，更重要的是消灭海南岛守敌的耳目，对于解放海南岛和保卫海南岛均十分有利。于是，他召集军领导举行作战会议。会上，大家同意偷渡和攻打涠洲岛同时进行，由韩先楚去海边亲自指挥潜渡，由解方到第119师协助组织指挥攻打涠洲岛。报告上送后，很快得到上级的批准。

3月5日黄昏时分，“渡海先锋营”按时抵达徐闻县以西灯楼角集结。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的队伍，在高大挺拔的椰树林里一排排整齐地站立着，等待军、师首长讲话。

绣着“渡海先锋营”5个金黄色字的一面红旗，由一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在队伍前擎着，旗在强劲的东北风中猎猎飘舞。战士们精神抖擞，心情激动，他们将带着全军的祝福，带着亿万人民的期望，披荆斩棘，降龙伏虎，越过浩淼的琼州海峡，给300万海南人民带去光明和希望！

韩先楚和师领导作了简短有力的动员讲话后，“渡海先锋营”的800名壮士在潜渡指挥员第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紧握铁拳，庄严宣誓：“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渡海作战任务！”

口号声震天动地，在椰林里回荡，淹没了海涛声，表现出这支英雄部队勇往直前的气概。

随着师参谋长苟在松一声令下，14只帆船同时扬帆起航。船队由琼崖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郭壮强领航，以第1连第3排基准船为前导，组成箭头状队形，向预定目标疾速进发。

船队如群马脱缰，顺风远去。韩先楚和所有送行的人一样，心绪如大海的波浪，难以平静。他站在一处高高的沙丘上，引颈而望。

土坡上，岩石上，送行的人们翘足引颈，眺望载潜渡部队远去的帆船，直到看不见船上的红色信号灯。大家心中在暗暗祝愿：祝潜渡部队乘风破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尽管当晚的天气经过反复预测，但韩先楚仍放心不下，担心天有不测风云。归途中，他几次停车观察天空，用手绢测试风向和风力。这毕竟是他的部队第一次渡海，第一次登陆作战啊！

回到军部，韩先楚不是去看参谋人员插在阳台上的小旗，就是打电话给海边的邓岳师长，询问那里的情况。他觉得风向还不错，心里好像踏实多了。“为什么没有来电报！为什么没有消息？”他几次跑到电台处去询问消息。

此夜，军指挥部里韩军长和大家都没有睡，也睡不着，都在等消息。

突然，报务员报告收到渡海营发来的电报。电报说：“风向好，船速快。”大家如释重负，喜出望外。

不多一会儿，又收到苟在松的一份电报：“各船联络很好，前进顺利，已前进20来海里。”

得到消息后，大家奔走相告，指挥部里人们欢声笑语。只见作战参谋在忙着量海图，计算着航程，并大声报告说：“报告首长，先锋营还有三分之一的航程，如果按现在的速度进发，拂晓前可以登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又收到潜渡营发来的一份电报：“风停，船速很慢……”

俗话说：有风行一天，无风行一年。“没有风怎么办？”不少人焦急地在自问。韩先楚的心情比大家更急，因为他想得更多，想得更深：还有三分之一的航程，如果光靠人力划桨，拂晓前达不到登陆地点，天亮以后，敌人在岸上，视线好，火力控制范围广，这样困难就大了。他想起兄弟部队攻打金门岛的教训，更加坐立不安，于是请教指挥部请来的老渔民。被人称为“活气象台”的老渔民对着天空观看了许久，然后说：“这后半夜的风，被五指山挡住了，再起风要明天晚上了。”

大家仍半信半疑，不断地跑去看杆子上插的旗帜。刚开始旗还有些飘动，

此时却完全停止了。也就是说，一丝风也没有了。

这一切，预示着事态的严重性。几位军首长默默不语，守候在地图和电台旁。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好不容易等到天亮，又传来一个使大家更加担心的消息：海上前哨观察所报告，在西南方向发现有几架敌机活动。

情况越来越令人感到严峻。紧接着潜渡营也发来电报：“发现敌机、敌船！”

韩先楚急得几次催作战参谋要报务员主动跟潜渡营联系。参谋每次都回答说：电台一直开机呼叫，对方没有回话。

指挥所和潜渡营的电信联络已完全中断了。大家对潜渡营官兵安危更加担忧。

韩先楚指示与琼崖纵队联系，得到的答复总是“情况不明”。

他急得实在无计可施，只好守在收音机旁，希望从敌人惯于颠倒黑白的广播中了解一点潜渡营的情况。可是左等右等，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过去了，有关的消息一点也没有。大家坐立不安，眼都熬红了。

兵团和野战军首长也一次次催问。从上级机关到部队，所有的人都在关心着潜渡营的消息，挂念着他们的安危。

潜渡营的成败，不仅关系着 800 名官兵的生命安危，而且关系到整个海南战役的行动和全军渡海作战的信心。

从准备偷渡到现在，韩先楚已经 3 天 3 夜没有上床休息了，饭也吃不下，胃病还一直折磨他。看到他这样坚持，同志们怕他把身体累垮了，就硬把他推到床边，强迫他休息一会儿。

韩先楚虽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心事像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从脑海里闪过：

渡海先锋营，这支英雄部队，历次战斗英勇顽强，屡立战功。师参谋长苟在松，是经过爬雪山、过草地考验的很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团长罗绍福、营长陈永康、教导员张仲先和全营干部、战士，都是经过战火考验、英勇善战的好汉。琼纵派来的领航人员是久经考验、深谙水性、富有渡海经验的老同志。

他分析，潜渡营船上配备的火力能独立作战，是有一定攻击力的。他们只要攻上岛，有琼纵接应，有岛上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是一定能闯过龙潭虎穴，夺取胜利的。

韩先楚想到此，充满了信心。大概心里有了底，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实在太累了。

当指挥部的人们都在为潜渡营担心之时，该营已经驶抵 20 多海里以外的海域。但谁也没有想到风会逐渐变小，后来竟变得风平浪静。在水平如镜的海面上，船全靠人力划行。已是午夜，天空月明星稀。

据领航员说，海上太阳升起得早，从现在的情况看，明天是个能见度很好的晴天。

苟参谋长心想，若不能赶在拂晓前登陆，明天也许会成为灾难性的一天。他面不改色，肩上的重担和指挥员的责任感，令他迎难而上。

其实，谁都在担心：这样下去，任务能不能完成，后果不堪设想。但他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打出来的革命战士，没有一个人考虑自己的安全。带队的基准船上的排长、舵手傅世俊问张仲先：“教导员，快想办法呀！还有 20

多海里！”

指挥船上，大家的眼睛都盯着苟在松参谋长，看他有什么办法。苟在松当机立断：下令挂起红灯信号。

各船上的指挥人员见指挥船上挂起了红灯信号，立即命令船上的战士们用备用的划桨、铁锹、补船用的木板、饼干箱板、竹竿等各种能划水的东西，分成两班，轮流划水，奋力前进。

在这先到一步就可能胜利，晚到一步就可能失败的关键时刻。战士们争分夺秒，奋不顾身。许多人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累肿了，仍争先恐后地划。

6日天明，突然天空出现4架敌机。敌机一架接一架飞过船队的上空。

指挥人员判断敌机在执行侦察任务，立即命令各船指战员全部脱下军装，并将武器遮盖好，伪装成渔船。

敌机继续盘旋，并在船队周围投下几颗炸弹，但没有炸中船队。显然，敌机是在进行火力侦察。

船队以静制动，以弱胜强。结果敌人并没有发现我军潜渡。指挥部干脆来了个瞒天过海，不还击，继续前进。

韩先楚是一位遇事总要深思熟虑的指挥员，战事在心哪里睡得踏实。他打了个盹儿，一睁眼就问有什么情况。作战参谋告诉他，船队仍杳无音信。

实际上，这时潜渡营已快接近海岸了，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已清晰可辨。当大家正在高兴时，突然，从岸上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了船队前面几百米处，掀起了一排水柱。

精明的指挥员判断这只是敌人的小口径短射程小炮。船队不在其射程之内，敌人就开炮，一定是在火力侦察。

苟在松和罗绍福等人迅速作出判断后，决定仍不还击，不暴露目标，继续向预定登陆点奋力前进。

由于我船队没有减速，继续开进，引起敌人怀疑，敌人又出动了飞机，并派出船只。

潜渡营各船上的指挥员，几乎同时发现前面海平面出现十几个黑点，上空出现盘旋的敌机。

在双方对进中，指挥员很快判明那些黑点原来是11艘敌帆船，正分成三路向潜渡营包抄开进。

潜渡营的14只船处于敌人海空和岸上炮火三面夹击之中，处境十分危险。但这些经过战火考验浑身是胆的指战员，临危不惧，仍勇敢地向敌靠近。

船队指挥员决定，在自己没有暴露前不先开火硬拼，而与敌斗智斗勇。遂命令：所有船只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绝对听从统一指挥，大胆勇敢地向敌船靠拢，与敌船混在一起，使敌机无法空袭。一旦被敌人识破，暴露了自己，要集中火力猛攻敌中路，杀出一条血路，强行登陆。

指挥员随机应变，指挥基准船接近敌船，然后迅速从敌船右舷驶过。由于大家神色自若，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并未开火。

不一会儿，潜渡营14艘船一艘接一艘地靠近敌船而过。敌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这是些什么船，于是掉转头，尾随潜渡营的船开进。

此时，潜渡营的船出敌不意地直向国民党军防备不甚严的白马井一带海岸开去。

快接近海岸时，船队展开了战斗队形，奋力冲向滩头。第1连第3排冲

上海滩后，迅速占领西边的一个村子。第3连第3排面向东架好机枪，警戒可能出现的敌人。第3连第2排迅猛向纵深前进，任务是与琼纵接应部队联络。

我军部分部队登上岸后，被守备该处的敌人发现。顿时，战壕里，树丛后，岩石和沙丘后，出现了敌散兵。他们向海滩冲来，向登陆战士和船队射击。登陆部队立刻还击，以猛烈的火力压住了敌人。

这时，岸上又出现了一股敌人。潜渡营利用船上的饱和轻重机枪猛轰猛扫，打得敌人血肉横飞，死伤一大片。

尾追的敌船本来已经离远，这时有两艘船上的敌人大概听到了枪炮声，又紧追而来，出现在潜渡营船队后面六七百米处。

敌机可能也发现有大批人登陆，再次飞到潜渡营船队的上空，投下几颗炸弹。

潜渡营再次处在敌人三面火力合击下。形势十分严峻，危局随时可能出现。但指战员们都很沉着冷静，勇猛顽强。

潜渡营一艘配备两门迫击炮、载有1个排兵力的船，突然被敌人机关炮击中，船被炸开好几处洞，伤亡10多人。战士们在船大量进水、快要沉下的情况下，边还击敌人，边冲向滩头，占领了阵地。

基准船的舵手傅世俊胸部中弹，鲜血浸透了衣服，但他仍紧紧把着舵，让船直奔海滩。他忍着剧痛，喊出了生命的最后一次强音：“快登上岸去！”话音刚落，就牺牲在舵位上了。

第1连第3排共产党员宋如金，被敌人射中3枪。他从昏迷中苏醒后，用尽全力爬到1米多外，想拿桨划船，但刚拿到桨就断气了。

潜渡营的干部战士，舍死忘生，前仆后继，边浴血奋战，边驾着船通过敌人火力网，冲向海滩，锐不可当。指挥人员身先士卒，战士们紧紧跟上，始终保持战斗队形，扑向滩头阵地。

敌人的火力更加猛烈，我军受伤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海水，染红了沙滩。

司号员受命吹冲锋号，刚把号放在嘴边就身中敌弹。他拼命地爬起来，半仰着身子，吹响了冲锋号。

战士们在冲锋号声中，越过浅水，冲过沙滩，杀向敌阵，占领了有利地形。

“渡海先锋营”的红旗，插在了海南岛陆地上。这时正是3月6日下午1时40分。这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将永远记载在共和国的史册上！

潜渡营全部登上岸，正要向预定目标冲击，突然发现一大批敌人沿着壕沟、洼地冲来，海滩两侧也发现敌人在运动。敌人企图很明显，要切断潜渡营的退路，全歼我登陆部队。

潜渡营又陷入险境。这时，指挥员迅速组成了以轻重机枪为中心的火力网，战士们枪上刺刀，手榴弹握在手中，只等敌人逼近后拼杀。

正当潜渡营准备与敌血战到底的关键时刻，敌侧后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和喊杀声。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猛烈枪声，琼纵的领航员就知道是他们的接应部队来了。琼纵接应部队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潜渡营官兵的战斗情绪，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指挥员一声令下，部队一齐杀向敌阵。

敌人发现后方突然杀出一支凶猛的部队，一时不知是怎么回事。在我军前后夹击下，敌人惊恐万状，死伤惨重，惊慌退逃。

潜渡营与琼纵第1总队接应部队胜利会合，相互握手问候。

两支部队立即整理好队伍，迅速向白沙根据地转移。

“渡海先锋营”的大旗在疾速行进的队伍中飘扬，在阳光照耀下分外夺目。

潜渡营胜利登上海南岛的消息，传到了雷州半岛。全军沸腾了，雷州半岛沸腾了。

韩先楚以埋怨的口气问作战参谋：“我们都等得快要急死了，如此重要的消息，怎么这么晚才知道？”

作战参谋解释说：“经了解，是渡海部队的电台掉到了水里，修好后才联络上的。”

韩先楚脸上露出了微笑。

潜渡营登陆成功的消息，很快呈报到了兵团，呈报到了汉口野战军司令部。各级首长得知后，如释重负，无比欣慰。

使韩先楚感到非常高兴的还有解副军长指挥攻打涠洲岛的胜利消息。

3月5日，第119师第356团在解方副军长和师领导率领下，于高德圩乘船出发。船队出发不久被敌人发觉，为了迷惑敌人，佯作海练，当日转向白虎头隐蔽待机。

我军确定攻打涠洲岛的战术手段是奇袭，所以一切行动要放在“奇”字上。

6日19时，船队又从白虎头启航，向涠洲岛进发。经过7个小时的夜航，尖兵船发现前方隐隐约约出现一座小岛。经领航的老渔民确认，肯定前方岛屿就是涠洲岛。

解方在月光下看了一下表，已是7日凌晨2时10分。

船队继续开进，岛屿越来越近，敌人仍无动静。当船队开至涠洲岛梓桐木至西角海岸只有100米处时，驶在最前面的第5连第2排接到攻击命令。班长王学林带着全班迅速跳入齐腰深的水中，伴着海浪冲向滩头。两分钟后，他们向敌营地发起攻击。正在睡觉的敌人，一个个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登上岸的部队，立即分成数路，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

第5连官兵一鼓作气，穿过泥泞沼泽地，冲过遍布丛林荆棘的山坡，直奔全岛的制高点万顶山头敌军指挥所。很快，他们就制服了指挥所内的敌人。

登陆部队占领了所有的制高点，火力控制了整个岛屿要道和重要地段。

在部队登陆的同时，第356团的3艘土炮艇驶入涠洲湾，封住了港口通道。勇士们逼近比自己船大六七倍的敌舰，用山炮、机枪、步枪、手榴弹猛烈地攻击敌舰。

敌人的机帆船在慌乱中升起了帆篷，企图在两艘军舰掩护下冲出重围，但为时已晚，航道被堵住。

石龙生连长指挥土炮艇，主动攻击敌“海硕”号军舰。

“海硕”号见是只木壳船，便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土炮艇和钢铁军舰在全速对进，1000米，800米……当两者相距五六百米时，土炮艇上的战防炮和重机枪先敌突然猛烈开火，两发炮弹击中敌军舰。顿时，敌舰腾起滚滚浓烟，燃起大火。敌人一边以机关炮还击，一边加速逃遁。

敌“海狗”号见“海硕”号受到重创，急忙掉转舰身，向石龙生的土炮艇开来。石连长见敌舰来势凶猛，火力也强，心想要避实击虚，不能跟敌人

硬拼，便转舵避开。

敌人见状，恼羞成怒，只得横过舰身，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企图压住我军登陆部队的火力。“海狗”号敌指挥官见“海硕”号已带伤逃走，怕自己也挨炮击，很快也紧跟着朝东南方向逃去。

敌人停泊在湾内的 300 余艘大帆船，全部被第 356 团缴获。

岛上枪声渐渐稀落，第 356 团控制了全部阵地。天大亮后，清查战场时，发现有 100 余敌人隐藏在一处坚固工事内，经过一阵喊话，他们还不出来。最后只召用炮轰，这股敌人才打着用床单做的白旗出来投降。夺取涠洲岛的战斗胜利结束，我军俘虏“广东省民众反共救国军南路指挥所”上校参谋长甘宗正以下 436 人，缴获各种能使用的船 300 余艘、炮 7 门以及大批枪支弹药。

韩先楚听了解方、徐国夫关于奇袭涠洲岛经过的汇报后，高兴他说：“你们的行动，为我军大举渡海作战，积累了重要的可贵的实战经验，必将进一步鼓舞和坚定大家渡海作战的信心和决心。”

第一次潜渡和奇袭成功，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不几天，又传来了第 43 军第 128 师第 383 团 1 个加强营共计 1000 人，在团长徐芳春和团政治处主任刘庆祥及琼崖纵队林栋等指挥下，分乘 21 艘船，由湛江东南的硇州岛出发，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航行，于 3 月 12 日早晨在龙马镇附近一个小村里与琼东北独立团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的消息。事实再一次告诉大家，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这时，韩先楚正在积极抓第 40 军第二次潜渡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因为第二次潜渡拟用 1 个团的兵力，所以准备工作更为慎重。

这时，从琼纵传来的情报说，解放军两次潜渡登上岛后，薛岳慌了手脚。他大概意识到“伯陵防线”靠不住，再这样等下去，蒋介石要责怪他了，不信任他了。于是，他急忙采取措施，挖东墙补西墙，把“围剿”琼纵的部队调下山，加强岛上北部和东西两侧的防御力量。

琼纵的情报，对潜渡部队及时了解和掌握岛上的敌情十分重要。

第二次潜渡汲取了首渡的经验，每只船上都装了足够的橹和桨，以备随时更换。为便于海上指挥和通信联络，还配备了两只机帆船。

出征的前一天晚上，先派军侦察科长郑需凡带人潜入临高角附近，对登陆地点的水位潮情和风向作了调查。

正当研究潜渡的具体组织指挥和实施时，恰逢琼纵副司令员马白山从北京开会返回，便确定这次潜渡由马白山和第 118 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共同负责指挥。

潜渡部队由第 352 团第 2 营、第 3 营和第 353 团第 2 营及临时组建的炮兵大队组成，共 2991 人，计划分乘 81 艘木帆船前往。

3 月 26 日晚 7 时，潜渡团整装待发。

开航后，海上东风劲吹，船速似箭。但是到了下半夜，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还升起了漫天大雾。

这无风，事先已预见到，可是逆风逆流，加上大雾，却没有考虑到。这种天气打乱了部队整齐有序的战斗队形，联络信号亦失灵。

正当各级指挥员为此担心之时，一艘敌炮舰正悄悄地向船队袭来，突然向我船队开炮。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有几艘船被敌击中，数十名指战员落入海里。

遇敌两分钟后，潜渡团在浓雾中捕捉到敌人目标，炮兵立即向敌炮艇开火，敌舰中弹起火。在我军炮火猛烈轰击下，敌人害怕了，迅速掉头逃跑，隐入雾中不见了。

打退敌舰后，各船立即组织抢救伤员和落水的指战员。因雾太大，波涛汹涌，多数落水者失踪，或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由于雾越来越浓，船与船之间无法联络，有 43 只船失去联系。剩下不足二分之一的船，在指挥船的统一指挥下，继续向目的地开进。天拂晓时，船队已接近海岸线。指挥员用望远镜寻找接应部队，但见不到一点动静。

船队沿着海岸线继续寻找。这时，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雾已散尽，人们心里更加焦急。突然，船队正面右海岸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马白山判断，这是接应部队在临高角预定登陆点与敌人打响了。因船队偏离预定登陆点几十里远，接应部队一定是向这边来接应时受阻。

在敌人海岸炮的猛烈轰击下，随潜渡团指挥船行动的船此时只剩 20 几艘。指挥员果断决定，不能再沿海岸线行动，要强行登陆。于是下令在玉包港登陆。

分散行动的各船指挥员，都抱定决心，哪怕剩下自己一条船，也要登上海南岛。结果，这些船分别在玉包港两侧登了陆。

这一带正是国民党军正面防御地段，距接应部队有八九十里，情况非常险恶。但潜渡团的战士们都有坚定的决心：登上岸，打到五指山去！他们以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强行登陆。

由于是多地段多地点登陆，战士们就以枪声为号令，听到哪里有枪声，就主动奔向哪里。上岸后，大家边战斗边迅速编成新的连排组织，没有指挥员的，共产党员主动站出来代理。

船队正在玉包港地段登陆时，敌人两艘军舰扑了过来。第 2 营第 4 连两艘船上的指战员，以不怕强敌、不怕牺牲、敢打敢拼的大无畏精神，全力向敌舰冲去。他们将子弹、手榴弹全部打光了，终于掩护其余 20 只船上的战友胜利地登上了岸，而他们却全部光荣牺牲了。

虽然潜渡部队因没有在预定地区登陆而失去接应，但沿海许多村庄的地下党员和大批群众，听到枪炮声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潜渡部队抢救伤员，或当向导。他们在发生战斗的地区反复搜寻，发现有戴红五星帽徽、佩带有“人民解放军”符号的伤员，立即救出战场。有的人将伤病员藏在自己家里用土方土法治疗，有的将伤病员转送到琼纵医院。有一名战士腿部负伤，一个老大娘扶着战士通过两道封锁线，经过几个昼夜，最后找到琼崖游击队。

潜渡部队一路击溃岛上国民党守军 10 多个营兵力的层层阻击，毙伤敌 600 多人，俘虏敌 200 多人，重创敌舰一艘，打落敌机一架，终于到达预定的集结地区。

经过几次成功的潜渡，我军了解了敌人正面防御的兵力部署。韩先楚认为，解放海南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强渡猛攻

几次潜渡成功，敌情明了，部队战前准备已按预定计划完成。眼看要进入 4 月，谷雨来临，对渡海有利的季节风将要结束。时不我待，摆在领导者面前的是两着“棋”：一是一声令下，万船齐发，大举登陆作战；一是小打

小闹，继续组织小规模潜渡。

韩先楚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认为前一着“棋”是可走的，是最有利的。其理由是：首先，我军已先后4次潜渡，敌我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岛上已潜伏着相当大的内应力量；而目前国民党军的兵力部署主要是针对我小规模潜渡，非常有利于我军出其不意，突然大举进攻。其次，形势不等人，季节不等人，必须乘谷雨前的季节风行动；如错过时机，不仅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将长期拖延，就连日后小规模潜渡也将失去可能。第三，潜渡的船只有去无回，长此下去，船只问题亦无法解决。第四，几次潜渡和攻涠洲岛夺船的行动说明，不管是岛的侧翼、正面，不管是1个营、1个团或1只单船，都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冲上敌岛。实施大规模登陆，兵力多，火力强，登陆突破更有把握，前面的部队先开辟登陆通道，后续部队就可以登上去。第五，我们已经取得了渡海登陆作战的一些经验，部队有针对性海练取得了成效，全军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抓住这些有利因素，一举解放海南岛是完全有把握的。

韩先楚认为，后一着“棋”不可走。因为岛上尚有国民党10万守军，且有海空优势，一旦我坐失良机，敌人形成立体防御，不仅有坚固工事，而且可以动用其机动兵力对我琼崖纵队及已登陆部队进行“围剿”，给岛上部队造成严重困难，那时我军将由主动变为被动。

战场上竞争的实质，就是竞争时间，竞争机遇。

韩先楚在军党委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得到与会者的理解和支持。意见报到兵团，经过反复推敲，兵团作出了两军主力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决定。很快，四野和中央军委也批准了兵团的意见。

兵团统一制订了第40军和第43军作战计划。具体部署是：第40军出动6个团（118师353团、354团；119师355团、356团、357团；120师358团），第43军出动2个团（128师382团和383团两个营及384团1个营），共计8个团为渡海作战第一梯队，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待机行动。徐闻西南的鲤鱼港为两军起渡的分界线。第40军预定在临高县马袅岛以西登陆，第43军在以东登陆。部队登陆后，迅速占领并巩固滩头阵地，消灭敢于反扑和增援的敌人，以保障后续部队登陆。

第43军其余部队为第二梯队，任务是待第一梯队登陆后，迅速起渡登陆，协同第一梯队围歼守岛敌人。

岛上琼崖纵队接应部队，由两军直接指挥。

两军登陆后，乘敌混乱或增援时，迅速歼灭敌主力，力求开辟一条通道，以保证后续部队通过。第40军主力向加来市疾进，包围敌第64军，另1个团向那大（今儋县）前进；第43军向澄迈疾进，包围敌第62军，吸引援敌，求得在运动中歼敌。上述目的达到后，再视情况，拟由第40军1个团与琼纵主力断敌退路，第43军主力向海口攻击前进。

韩先楚在作战地图上从灯楼角至海南岛的博铺港划了一条红线。这条线东北—西南走向，是第40军的起渡点和预定登陆点之间的连线。战役发起后，无论东风、东北风、北风，船队都可以航渡。

大学登陆前夕，海南岛琼纵、潜渡在岛上的部队及海南地方党和临时政府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以迎接主力登陆。韩先楚建议野战军机要处编了专用密码，由军部派人偷渡过海送给冯白驹。这样，第40军和琼纵随时可以联系，互通情报，对登陆作战极为有利。韩先楚再次派侦察科长郑需凡带

领侦察人员，化装成渔民，偷渡到登陆点海边侦察敌情，测量水深、流速、风向等，为渡海作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经过多次核对气象资料，访问有经验的渔民，又反复研究，确定4月16日为发起总攻时间。

16日下午，大小数百只战船在灯楼角海边排开，一列列全副武装的出征队伍威风凛凛。

“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跨过琼峡，解放海南岛！”

宣誓声、口号声此起彼落，慷慨激昂，扣人心弦，令人振奋。

西沉的太阳，发出耀眼的余晖。辽阔的大海，碧彼轻荡。上船的命令一下达，一只只小驳船、木板船来往如穿梭般把集结在海滩上的部队运到大帆船上。心急的战士，干脆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头上顶着背包，手举着武器，自己涉水上船。

在韩先楚等军首长指挥下，第118师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和第119师师长徐国夫等，分别率领自己的部队登上300多只帆船。

正待起航时，指挥船上不知谁喊了一声：“不好，要变天！”

韩先楚和大家不约而同地引颈而望，只见从西南天空涌来大片黑云，西南风骤起，海上掀起一排排巨浪，猛击船身。许多人心里纳闷，气象资料 and 老渔民都认为今天是东风，怎么会变了呢？这海上的气候，确实难以预测，不一会儿就由顺风变成了顶头风。

俗话说，船行八面风，逆风船难行。西南风的出现，使大伙心里特别焦急。

指挥部和海南接应部队联系，得知接应部队已开始向预定地区运动了。

韩先楚耐不住地向身旁老船工询问：“天黑以后，西南风能不能停止？”这涉及军事行动的大事，没有绝对把握，谁也不敢轻易回答。

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呀等，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船上一位白发银须的老艄工全神贯注地观察天象。他知道指战员的心情十分焦急，便很有把握地说：“天黑以后不起东风，拿我问罪！”

这不完全是出于对子弟兵的感情安慰，也是凭他几十年海上生活的丰富经验，没有绝对可靠的把握，他是不敢这样说的。他知道军中无戏言。大家深信这位艄工老伯的话，对他十分尊重。

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个活气象台，18时30分后，海上果然刮起了东风。

东风一起，大伙兴奋地活跃起来，只等起航令下。

“快拉起风篷，准备起航！”随着指挥员的号令，各船迅速拉起风帆，场面十分壮观。

起航的命令一下，千船竞发。那威严的阵势，正像战士们在一首歌中唱的：“千万只战船，千万把尖刀。千万个英雄，怒火在燃烧。千万挺机枪，千万门大炮。千万条蛟龙，直奔海南岛……”

当渡海大军前进八九海里时，突见空中闪亮一串照明弹。渡海行动被敌人发现了。

全船队，在耀眼的白光照耀下，冷静沉着地继续前进。

敌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不断轰炸和扫射。敌人的炮舰也不停地炮击和扫射。海面上弹如雨下。

解放军战士一面向敌机、敌舰还击，一面迅速灭掉船上的灯火。炮弹炸

起的水柱在船的周围翻腾，颠簸的船使一些战士站立不稳。一些人负了伤，也顾不得包扎。船队仍然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破浪前进。

韩先楚下令航行在两翼的护航大队开足马力，展开战斗队形，猛烈地攻击敌舰。

护航大队由改装的 20 艘土炮艇组成，由军炮兵主任黄宇指挥。

黄宇接到军长下达的“坚决向敌舰还击”的命令后，立即率领护航大队向敌舰冲去。几艘土炮艇同时向敌舰开火，形成交叉火力，打得敌舰狼狈后退。敌军舰此前曾几次与我潜渡部队发生小规模较量，均因靠近我军木船吃过亏。他们说：“共军船上有钩子、梯子、手雷、炸药包。船一靠近军舰，就不管死活地钩住军舰，人跳上来就不得了。他们扔手雷，点燃炸药包，人与舰同归于尽。可怕！太可怕了！”国民党军海南岛舰队司令王恩华听了部下反映后，也觉得太可怕，下令军舰不准靠近解放军木船。难怪，眼下敌舰只在远距离开炮。

黄宇率土炮艇采取陆上勇猛穿插的战术，尽量逼近敌舰，插到敌舰背后，利用敌舰火力死角，打击其要害部位。敌舰不甘心眼看着解放军千百只战船安稳地向南开进，又掉转舰首，其中一艘大型军舰依仗其速度快、火力强，气势汹汹地闯进第 40 军左翼船队里猛烈开炮，企图把我军船队的队形打乱。

韩先楚站在指挥船的甲板上，沉着地指挥船队与敌激战。炮弹不断地落在指挥船周围。警卫营营长丛福滋看到军长站在外面太危险，就大声叫着要他到船舱里去。

韩先楚哪里肯，不高兴他说：“在船舱里，看不见情况，怎么指挥？”

丛营长说：“我们向你报告外面的情况。”没等韩先楚说话，他上前一把将军长搂在怀里，往船舱里推。

“放开我，你放开我！”韩先楚连声叫喊。

丛营长身负保护首长的责任，不管军长怎么喊，怎么发脾气，仍一个劲儿地将军长往船舱里推，并命令下属：“看住韩军长，不准他离开！”

这样，韩先楚也没有办法，他了解干部、战士的心情。

黄宇率领土炮艇冲到离敌舰只有五六十米远时，突然向敌舰猛烈炮击。敌舰指挥塔被击中，顿时燃起大火，升起滚滚浓烟。

敌大型军舰被击中后，再也不敢使用照明弹，以免暴露目标。其余军舰怕成为第二个被攻击的目标，窜到远方海面，盲目射击。敌飞机大概因辨不清海上目标，怕炸到了自己的军舰，也飞走了。

第 40 军的船队冲破敌舰的阻拦，相互呼应着前进。战船通过主流后没多久，航速慢了下来。一看风标旗，原来东风停了。各船都请示怎么办？

作战参谋急忙跑进船舱向军长报告：“首长，东风停了，怎么办？”

韩先楚下令：“通知各师，命令各船摇橹前进，不得耽搁！”

军令如山。各船指战员轮番摇橹、划桨，船队前进速度没有减慢。

一弯新月高高地挂在天空，在海面上投下淡淡的银光。这是战士们从来没有经过的夜晚。大家虽然没有说话，心里却有各种遐想：俺爹妈也许正在做梦，梦见我立了大功；兵团、野战军首长也许还在作战地图旁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也许正在注视台湾国民党的动向……明天也许是一场恶仗，自己不能当熊包！要争取第一个登上岸，第一个冲入敌阵，和战友们一起杀敌立功，庆祝胜利！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家思想明确，行动果敢坚定，百折不挠，团结一

致，奋勇前进，忘记了极度疲劳，忘记了饥饿，忘记了危险。终于见到远处的海岸线了，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声呼叫：“海南岛！”“啊，海南岛！祖国的宝岛。为了你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为了让岛上百姓翻身得解放，我们甘愿勇敢战斗，贡献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战士们见到海南岛时的心情，这就是战士们对岛上人民的感情，这就是战士们登岛时的决心！

韩先楚率领全军全力向滩头阵地冲击。

守岛的国民党军全面出动，从岸上、海上、空中组织各种火力猛烈阻击，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登陆。

当整个船队驶入敌人密集的火力网时，韩先楚意识到成功与否在此一举，遂命令所有的船队一面猛烈向敌人射击，一面疾速前进。

韩先楚熟悉他的部队，相信他的部队。这支能攻善守的英雄部队，在这关键时刻一定能顶住敌人，战胜敌人。果然，战士们在敌人猛烈火力下，无所畏惧，勇往直前，锐不可当。当船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时，战士们纷纷跳下齐胸深的水里，向海滩冲去。

战士们两脚踏上海滩后，英雄更有用武之地了。

这时，作战科长向韩先楚报告：“119 师先锋连已经登上岸，正在夺取滩头阵地。”

接着又有人报告：“118 师也已登陆。”

韩先楚要到船甲板上观察部队登陆，以便准确指挥部队行动。警卫营长和警卫员怕首长在枪林弹雨中出意外，不让韩先楚移动一步。

韩先楚生气了，但也没有办法。

侦察科长郑需凡报告：“发现临高山上空升起 3 颗红色信号弹。”

“3 颗红色信号弹。”韩先楚重复了一句，脸露悦色说，“好！接应部队已经攻下了临高山。”当指挥船离岸四五十米时，韩先楚再也忍不住了，他要和解方下船。

“为了首长安全，现在还不能下船！”警卫营长仍阻止军首长下船。

“安全！安全！哪里安全？登上陆最安全！”韩先楚生气了，发火了。这时，谁也阻拦不了他。

第 355 团政委夏其昌见韩军长、解副军长已登上岸，担心地问：“首长，现在太危险了，你们怎么在这里？”

“我们怎么不能来？”韩先楚顺口答了一句，只顾向前走。“首长，滩头阵地还没有完全打下来，太危险，快隐蔽一下！”夏其昌边说，边把韩军长按倒在一块岩石后面。

“没有拿下滩头阵地，我们一起来拿下！”韩先楚挣扎着要站起来。

夏其昌转身对第 3 营副营长杨立明命令道：“杨立明！给你一个任务，你们派人把韩司令看起来，不让他再往前去。滩头阵地还没有完全打下来，一定要保护军首长安全！”说完，就去指挥部队冲击敌人了。

杨副营长立即叫来一伙人，把韩先楚严严实实地围在一块大岩石后面。

韩先楚想走却动不了。他又感动，又生气，但无可奈何。趴在韩先楚身边的一名战士，看到韩先楚不情愿的样子，幽默地安慰说：“首长莫着急，等拿下滩头阵地，我们就‘解放’你。”“好吧！我就等你们快一点‘解放’。”韩先楚口气缓和下来了，把战士也逗乐了。

登上岸的部队，攻势犹如猛虎。左侧先锋部队在连长戴成宝带领下，不到 20 分钟就杀进纵深 5 里多远，插到敌滩头阵地背后，夺取了敌重炮阵地，

并立刻掉转炮口向纵深敌人轰击，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韩先楚了解主力部队已全部登上岸后，立即命令护航大队掩护空船返航，接应第 43 军后续部队渡海。

黄宇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领护航大队掉转船头向北岸驶去。这时只剩下 5 只土炮艇，其余已被敌人击伤，不能再用了。

返航时，大家听到海南岛方向枪声四起，战斗相当激烈。

当返回的船队行至海峡中流时，一艘敌舰从船队侧面疯狂地进行阻拦射击，有的船被击中起火，情况危急。黄宇命令 5 只土炮艇冲向敌舰猛攻。敌舰见势不妙，向东逃去。

为了把敌舰赶远一些，以免其再对我船造成威胁，黄宇率领船队继续追击敌舰。当追出一段距离后，指挥船的一台发动机熄火，另一台发动机本来就不太好，船航速减慢，成了孤船。这时，突然又有一艘敌舰凶狠地扑来，企图将我指挥船撞碎。

黄宇用望远镜判明袭来的是一艘大型军舰。如果硬拼，我方定会吃亏。于是，他和干部战士们商量，决定以智取胜。他们将火炮和各种武器用篷布遮盖好，并在篷布上开一个口子作为继续瞄准之用；将另一台发动机关闭，大部分人员隐蔽起来。他们将船伪装成运货商船，只等敌舰开来，再相机而行。

敌舰果然中计，毫无戒备地开过来。

黄宇密切注视敌舰，原来这是敌人第二舰队的大型护航驱逐舰。

敌舰根本没有把黄宇的指挥船放在眼里，看到木船上堆满了“货物”，以为有利可图，于是有恃无恐地继续往前开。

指挥船篷布下盖着的可不是什么“货物”，而是实实在在的美国造 57 式战防炮。操这门炮的是在解放战争中经过多次大战考验、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炮兵。他们机智勇敢，立过许多战功。这时，炮长赵钻珠亲自担任瞄准手，正准确地瞄准、跟踪敌舰，并不断地小声将敌情报告给指挥员。

指挥船以篷帆为动力向敌舰方向正常驶去。黄宇倚在桅杆后，若无其事地观察海面，准备随时下令攻击敌人。

当指挥船接近敌舰至 200 多米时，敌舰前后主炮对指挥船已成死角。这正是发起进攻的最佳时机。黄宇一声令下，指挥船连发几炮打中敌舰。为了狠狠打击敌人，他们一连打出 30 多发炮弹。敌舰起火，指挥塔被摧毁。此时，战防炮卡了壳，战士们就用机枪扫射敌舰。

敌舰用机关炮还击。黄宇右臂被击伤，赵钻珠不幸中弹牺牲，还有一些干部、战士也负了伤。

在关键时刻，另 4 艘土炮艇赶来围攻敌舰。敌舰见势不妙，遂夺路逃去。

黄宇见已达到目的，命令各船返回，追赶自己的船队。

后来有关方面查明，被击伤的敌舰为“太平”号，是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的旗舰。该舰队司令王恩华在指挥塔上被击成重伤，送到海门治疗，不久就死了。

韩先楚十分关心在右翼的第 119 师的战斗情况。

右翼部队登陆后，向纵深插入时，突然被敌人设置的壕沟、铁丝网、地堡挡住了。

“快点扫除地雷，斩断铁丝网！”连长下达命令。已 3 次负伤仍冲在前面的独胆英雄万守叶，立即指挥 1 个班用手榴弹扫除了地雷，接着又将铁丝

网炸开道道口子，突破了敌人第一道防线。

部队在前进时，突然从敌人的大型母堡中射出猛烈的火力，部队前进受阻。

“排长，你组织火力掩护，我带人去解决！”

说着，万守叶迅速带领几个战士向敌碉堡冲去，很快把敌碉堡炸毁了。

部队向敌纵深突进时，又遭到敌人暗堡的火力阻击。部队伤亡不断增多，情况十分危急。

“连长，我去干掉它！”万守叶再一次请战。他的要求容不得连长考虑。只见他带着几枚手榴弹向暗堡扑去，刚接近枪眼，敌人的机枪又喷出了火舌，他用自己的躯体堵住了敌人的机枪……这一惊天动地的壮举，吓破了敌胆。万守叶身上的手榴弹在暗堡旁爆炸了。

第3班副班长陈明栋趁机登上暗堡顶。敌人被吓得停止了射击，纷纷举手投降。

登陆部队的冲锋号吹响了。部队如海潮，似风暴，向敌纵深扑去。

登陆部队激战半小时后，琼崖纵队 and 此前潜渡来的部队已从西南方向七八里处的敌人背后杀了过来，占领了这一带敌人纵深防御的枢纽阵地临高山，控制了此处唯一的高地。

在登陆部队和接应部队的欢呼声中，宣告薛岳苦心经营几个月的“伯陵防线”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突破了。

在琼西迎接第40军登陆的是琼崖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青山率领的第1总队。陈青山受琼纵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之命，经过5天的跋涉赶到新民县第1总队，向总队长陈求光、副总队长辜汉东、副政委林明、政治部主任黄岐山等传达了冯白驹司令员的指示。大家异常兴奋，立即积极进行各种准备，并与潜渡部队取得了联系，研究了接应方案。第1总队曾接应过几次潜渡部队登陆，已取得了一些经验，这次又和潜渡部队一起接应大部队登陆，更加信心十足。

4月17日凌晨4时，第1总队偷袭了高山岭守敌。高山岭是临高角一带海岸的制高点，对我渡海部队抢滩登陆构成很大威胁。接应部队从小道攀上高山岭，爬到离敌地堡几十米时，以迅猛的动作发起攻击，打得敌人碎不及防。经过半小时短兵相接，他们消灭了敌人，立即发射了3颗红色信号弹。

这时，第40军登陆部队正在抢占滩头阵地，与海岸上的守敌展开激战。

随加强团先期潜渡的1个野炮连立即赶到高山岭，用刚刚缴获的野炮向正与渡海部队交战的敌军舰猛轰。敌人被打懵了，以为是自己的炮误打了自己，骂炮兵瞎了眼，最后只好狼狈逃窜。接着，野炮连又瞄准岸上的敌人据点，将其一个个敲掉。

高山岭战斗打响不久，我军插向临高角海边的部队也很快扫清了敌人在海边的防御工事，歼灭了美夏、昌拱、东英等据点里的守敌，开辟了登陆场地和通道。

在我渡海部队大举登陆时，敌人两个团的兵力从美台开来增援，遭到琼纵第1总队第7团的坚决阻击，始终前进不得。

这时，由副军长龙书金和第128师师长黄荣海、政委相炜率领的第43军两个团，从雷州半岛东场港起渡，经过一路苦战，已在林诗湾的雷公岛、才芳岭一带登陆成功。他们迅速插至桥头圩，歼灭了驻守桥头圩的国民党第64军1个团，并包围歼灭了花场圩的守敌，与前去接应的部队在福山圩一带

胜利会师，尔后将福山圩的守敌合围歼灭。

薛岳大肆吹嘘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了。

我军渡海部队进展迅速，到 17 日下午 4 时，已向纵深推进了 10 多千米。

黄昏，韩先楚、解方等领导进入多贤村。韩先楚面带笑容地对陈青山等接应部队领导说：“你们打得好！辛苦了！”尔后，他询问敌情和接应部队的情况，同接应部队领导一起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最后，韩先楚对陈青山等人说：“我们还要往前赶，消灭逃到美台和加来的敌人，然后和 43 军消灭澄迈的敌人，解放海口市。临高县和附近的敌人，由你们负责扫除！”

稍事休息后，韩先楚率领浩浩荡荡的大军，继续向美台、加来地区挺进。

第四野战军首长得知第 40 军、第 43 军主力部队胜利登上海南岛后，特发来了贺电。电文说：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在海南岛成功地登陆了，这说明我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大陆上是无敌的，而且在海洋上也是无敌的。你们英勇地征服了波浪滔天的大海，战胜了敌人飞机、军舰的阻拦，为渡海登陆作战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英雄奇迹。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全军的光荣。由于你们的胜利登陆，海南岛上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现在岛上的残敌已是惊恐万状。望你们更加奋勇作战，再接再厉，以使中南全境的解放早日实现！

贺电是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赵尔陆、陶铸于 4 月 18 日联名签发的。

中南军政委员会以主席林彪、副主席邓子恢和叶剑英等人的名义也向海南前线全体指战员发来了贺电。电文说：你们胜利登陆海南岛的捷报传来，全中南广大人民欢腾若狂。解放海南岛是他们殷切的期望，也是全国人民殷切的期望。这期望，终于经你们发挥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实现了……你们以无比的英勇，征服了惊涛骇浪的大海，战胜了敌人海陆空军的疯狂顽抗，击败了敌人濒死前的狂妄挣扎，捣毁了敌人在我南国边缘的最后巢穴。我们相信，你们从黑龙江带到镇南关的革命胜利旗帜，在琼崖纵队与琼崖人民的密切配合之下，一定会迅速插遍岛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及中南地区 13600 余万民众，除以无限欣快的热情向伟大的革命英雄们致以崇高的祝贺外，一定倍加努力生产，大力支援前线，愿与你们为胜利完成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而共同奋斗！

上级的贺电和全国各方面的祝贺电、慰问信，使前线官兵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无穷的力量。这力量是摧毁岛上国民党军的最有效的武器。这种武器是敌人看不见也估计不到的。

分兵追歼

韩先楚、解方等率领第 40 军日夜兼程，连续作战，于午夜 12 时将守卫临高城的国民党军紧紧围住。但是，令韩先楚感到纳闷的是，原驻临高守敌是 1 个整师，现在却只剩师部和 1 个团了，敌人主力哪里去了？这不能不引起韩先楚的深思。

韩先楚从眼前的情况联想到登陆一天后进军的情况，觉得敌人有些异常。部队强行登陆之后，向纵深挺进了十数里，虽然遇到敌人抵抗，但却未见敌人的援兵，未见敌人反扑，也未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难道薛岳会甘心于他苦心经营起来的“伯陵防线”被攻破吗？

韩先楚召集几位领导在一个竹棚里，对敌情进行认真分析。大家谈了一些情况，并听取了琼崖纵队侦察人员和先期潜渡部队指挥员的汇报。然后，韩先楚说：“根据敌人的部署和我军突然强攻的情况，薛岳很可能以为我军又是小部队潜渡。他定集中机动部队主力在东线，企图阻止和围攻第43军于登陆滩头。薛岳是只老狐狸，一旦发觉我大军登陆后，将会从海上逃走。为了把华南最后这股敌人消灭在海南岛上，不使其逃往台湾而增加以后解放台湾的困难，我们的主力不能被敌人1个团和1座小城陷住。因此，我的意见：临高城由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争取敌人投降或相机歼敌。我们立刻甩开临高，挺进美亭、海口以南地区。这样，既可会合兄弟部队歼敌主力，又可断敌后路，直捣薛岳老巢——海口！”尽管连日来大家非常疲劳，但会议开得非常认真。大家听了韩副司令的发言，认为他对形势的分析合情合理。

果然如韩先楚所料，薛岳得知解放军登陆后，仍以为是小规模偷渡，只增派了一些兵力阻击，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是，向他告急求援的电报一封封飞来。他从这些电报中得知，临高、澄迈一线的防线已被突破，有大批解放军登陆，而且部署在西部的主力第64军已被击溃，这才感到惊恐不安。他急了，把负责西部地区的指挥官臭骂了一顿，并迅速采取措施：一面给台湾的蒋介石发电，要求派飞机运兵增援；一面从岛上现有部队中调兵遣将。他的目的是趁解放军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之际，在澄迈东北地区围歼登陆部队；或将登陆部队压入海里，再利用海军和空军的优势加以消灭。

薛岳的具体部署是：急令李玉堂指挥的第32军用500多辆汽车将第252师主力运至美亭地区，堵住正向美亭、黄竹挺进的解放军第43军登陆部队；命令李宏达指挥的第62军第151师主力从屯昌向澄迈靠拢，第153师在老城、白莲地区集结待命；命令莫福如指挥的第63军第152师、暂编第13师、教导师作为机动兵力，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命令空军4个大队进入一级战备，随时参战。

这时，侦察人员向韩先楚报告：敌人已倾巢出动，海澄公路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韩先楚判断，薛岳将其主力集中在美亭地区，已摆出一副在那里决战的架势。他决定，趁敌人兵力集结的有利时机，进行大规模围歼战，消灭敌人主力，以加速全岛的解放。于是，他要求部队上下动员，讲清敌情，克服连日作战的疲劳，迅速向澄迈挺进，歼灭那里的敌人，尔后进军美亭。此时，第43军已在美亭、黄竹地区吸引住了大批敌人援军。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韩先楚率部连夜出发。自16日渡海以来，已经3天3夜了，战士们还没打开背包休息过，没有吃过一餐热饭，经常连水都喝不上，只是不停地走，不停地打。这时，许多人最大的奢望是能坐下歇一下脚，喝一口水。在这霞光消退、夜幕低垂之时，本应休息一两个小时，可是他们不能啊！党和祖国的重托，300万海南岛人民的期望，促使他们为了消灭敌人而不顾自己的一切。多么可爱的干部，多么可爱的战士！他们忍受着疲劳和饥渴，继续向前挺进，挺进！

为了抄近路，部队经过坑坑洼洼的山林小径，穿过怪石嶙峋的山谷，翻越险峻的山岭，向东挺进。

部队夜以继日地赶路。尽管白天有敌机扫射和轰炸，但阻止不了部队前进的步伐。

19日，部队赶到临高东面的美台后，立即投入战斗，消灭了国民党军两个师部及两个团部。战斗一结束，又马不停蹄地向南开拔，赶到澄迈。守澄

迈的敌军害怕被歼，早已逃往美亭地区。

部队连续几天作战，已筋疲力尽，肚肠空空，到了澄迈又没有仗打，韩先楚想让部队在此稍作休息。部队刚要做饭，突然听到从澄迈北面10多里远的美亭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原来，20日晨，第43军第128师进至黄竹，与敌1个增援团遭遇。第383团在琼纵第3总队第1团配合下迅速将该敌包围于黄竹地区，其余部队包围了美亭守敌，并分别发起强攻。因敌人得到飞机增援，拼死抵抗，我军一时难以取胜。薛岳趁机急令黄竹、美亭守敌不惜一切代价死守，令第62军派出1个师对第43军施行反包围，同时命令第153师、步兵教导师和从福山溃逃来的暂编第13师共6个团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增援黄竹、美亭地区。薛岳投入美亭地区的总兵力共6个师，5万多人。他自恃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又有空中支援，可以稳操胜券。美亭方向的枪炮声告诉韩先楚，第43军正在与敌人浴血奋战。

他考虑兄弟部队腹背受敌，处境一定很危险。

战况确实对第43军不利，他们遭到数倍于己之敌的夹击。敌人穷凶极恶，杀气腾腾，叫嚷要把第43军致于死地。薛岳得意忘形，利用海口一切宣传工具，恬不知耻地造谣说：“共军第128师师长已被打死，指日可歼共军。”他还利令智昏地准备了“祝捷会”。

第43军登陆后，因连续奔袭转战，部队非常疲劳，加之天气闷热，饮水奇缺，此时突遭敌人夹击，处境危急。但这毕竟是一支久经考验的英雄部队。他们决心克服一切困难，阻住援敌，夺取黄竹、美亭地区。

韩先楚想：澄迈离美亭不到30公里，只要兄弟部队挡住援敌，坚守阵地，自己率部赶到，定能歼灭敌人。他坚信第43军能守住阵地，争取到最后歼敌时间。

决定胜败的关键，是第43军在凤美岭的部队能否挡住敌人6个团援兵的攻击。敌人这6个团如果通过凤美岭抵达美亭，后果不堪设想。担任第128师前卫的是第3营。第3营通过一整夜急行军赶到了黄竹、美亭一带，发现了敌人。随后由营长李庶华带领1个半连包围了黄竹敌1个加强团，由教导员刘梅村带领的1个半连包围了敌人1个师部和1个团部。被围之敌企图突围，利用炮火猛轰第3营阵地。第3营虽顽强坚守，但伤亡惨重。这时，团长张实杰率部赶来，夺下了对控制战局至关重要的加岭山高地。第128师大部队赶到美亭、黄竹后，把敌人1个师部、两个团和前来增援的两个团包围起来。薛岳急令其第62军主力、第32军主力及教导师两个团，由东西两面火速向美亭、黄竹地区增援，并形成对第43军第128师反包围的态势。

形势十分严峻，第43军第127师第381团进入美仁地区的茅草山、凤美岭一带阻击敌人的增援。一场大战、恶战即将在此展开，部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巩固阵地。

韩先楚、解方、李伯秋召开了碰头会，要求各级领导向指战员讲清情况，做好动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沿澄（迈）琼（山）公路向美亭急援兄弟部队。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惨重。

凤美岭是海（口）澄（迈）公路线上的一个咽喉要地，是敌进入美亭、黄竹地区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旦外线敌人突破这个关口，整个第43军就会腹背受敌。凤美岭高地东西长300米，南北长约500米。高地上长满杂树和茅草，构成天然隐蔽物。战士们靠地形之利，英勇阻击敌人。

凤美岭周围的大莲村和前亭村均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妄图以这几个小村

为支撑点，包抄、围歼凤美岭上的解放军。

凤美岭高地的北坡筑有机枪掩体，控制着进入高地的一片开阔地。掩体两旁长满了小树丛，极有利于发扬火力，杀伤敌人。机枪掩体后面有环绕整个高地的战壕，战壕有无数的单兵掩体，极利于发扬火力。高地的顶上有暗堡，随时可以用火力支援各处阵地。守凤美岭高地的最初是第43军第127师第381团警卫连，后由该团第1连接替。

敌人发动一次次攻击，均被击退。薛岳得知凤美岭始终被解放军控制，援兵无法前进，大骂部下无能，遂命令他的亲信要不惜一切代价攻下凤美岭高地。

20日晨，薛岳的亲信李宏达亲自督战，指挥第62军主力、第32军一部、教导师两个团及1个山炮连、3个迫击炮连，还出动了几架飞机，向凤美岭发起总攻击。敌军轮番攻击到下午7时许，始终没有攻下凤美岭。守凤美岭的英雄1连，顽强地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13次进攻。在开阔地和高地的坡下，敌人死伤无数。

第1连伤亡也很大。连长上午负了伤，仍指挥战斗，下午又负伤，仍不下火线，最后壮烈牺牲在战壕里。副连长也光荣牺牲。指导员负重伤，仍坚持和战士们在一起阻击敌人。当我增援部队赶到时，阵地上仅存活13名勇士。他们也个个身负重伤，血肉模糊；但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手不离武器，狠狠打击敌人。

在坚守凤美岭的战斗中，解放军得到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民兵李科进、王成球和一些游击队员等十多人，冒着枪林弹雨，送弹药，送水送饭，抢救伤员。王玉燕在抢救伤员时，遭敌机轰炸，不幸牺牲。

军民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凤美岭阵地，成了敌人难以通过的钢铁堡垒。

“快！再快一点！”韩先楚一面率领第40军主力向美亭方向疾速前进，一面不停地催促着。

这时，从凤美岭传来消息：阵地稳如泰山，高地坚如磐石。由于部队有效地阻止住了敌人，为我军决战争取了主动。

在第40军没有赶到美亭以前，因担心敌人突破凤美岭而对我军形成两面夹击，兵团电令第43军加紧对黄竹、美亭地区的进攻，争取早一点解决被包围的敌人。为此，第43军对兵力进行了调整：由第382团担任主攻，第383团调一部兵力配合，向内紧压，以歼灭被围的敌人；第383团一部向外攻，对敌形成反包围；第384团一部配合第127师的4个营打增援；第383团渡海先锋营由福山插至加岭地区反击敌人。

第43军第128师师长黄荣海、政委相炜、参谋长孙干卿立即组织部队对黄竹、美亭的敌人发起进攻。经过激战，把黄竹和美亭两处敌人切断，两个村子的敌人成了孤立之敌。

第382团第1营攻打美亭，第3营攻打黄竹，第2营为预备队。第3营打得最为激烈。经过两天的激战，第3营已伤亡150多人。营长李庶华负重伤，被抬下阵地；副营长宋金水随后也负了重伤。指挥全营战斗的任务落在了战斗英雄、营教导员刘梅村肩上。

天黑时，刘梅村接到上级命令：拂晓前，一定要攻下黄竹！

刘梅村召集各连干部进行研究，决定由第7连和第8连担任主攻。随后对全营进行了动员。他沉着坚定地鼓励全营，要发扬能攻善守的光荣传统，不怕流血牺牲，在天亮前攻下黄竹，为美亭决战的胜利创造条件。

刘梅村通过向老乡了解和侦察人员侦察得知，敌人利用圆木、沙袋、门板等在村前道路上设置了一层层障碍，妄图阻止解放军进村。针对敌人的火力部署，刘梅村决定从村后摸进，在接近村内时发挥炸药和手榴弹的威力。

当晚，夜色昏沉。夜幕下的小沟旁，隐蔽着即将对敌驻守村庄发动进攻的第382团第3营的战士们。

敌人驻守的村子透出点点微弱的灯光，巡夜的哨兵黑影在村子周围游荡。第3营的战士们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连续摧毁敌人多处火力点。这时，整个村庄枪声四起，爆炸声震耳欲聋。

第3营第7连的爆破英雄刘万成，用炸药连续炸毁敌人几个地堡和房屋，为攻克黄竹敌人阵地立了大功。

韩先楚率第40军日夜兼程，终于在21日17时进至美亭东西两侧。部队迅速展开，包围侧击敌人，使敌人两面受击。这时，战场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我双方展开包围与反包围作战。在内线和外线，在村内和村外，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硝烟弥漫着村庄，炮火映红了山野，鲜血浸红了大地。两军犬牙交错，沸反盈天。韩先楚坚定沉着地指挥部队攻敌要害，以智勇取胜。

与此同时，我第118师第353团向国民党军第62军指挥所和薛岳的警卫团发起猛攻。经过反复激战，敌人伤亡惨重。第353团1个营的排以上干部大部分伤亡。

这时，凤美岭关口仍牢牢地控制在第43军阻击部队手里。敌援军无法通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队被消灭。22日，第40军、第43军主力全线出击，在美亭、白莲地区彻底打垮了国民党第62军第151师大部及第32军第252师，并将前来增援的敌人迂回包围起来。

敌援军见美亭地区的守军已全军覆灭，自己反被围困，便拼命夺路逃窜。

我第119师师长徐国夫率领主力于25日7时追敌至黄竹附近，占据有利地形，控制周围制高点，向黄竹墟的敌人发起进攻。

黄竹墟是一座只有三四十户人家的小镇，一条道路从镇中通过。敌人利用街道两边的房屋及镇外自然地形地物作掩护，负隅顽抗。

第119师第357团及第43军的1个营，向敌发起攻势，迅速收缩包围圈，将敌人压缩在街区民房内。为保护老百姓，我军攻而不打，用政治喊话迫使敌人缴械投降。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我军俘敌中将副军长兼第151师师长罗懋勋以下800余人。

第40军和第43军两支英雄部队会师后，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直捣薛岳防卫司令部驻地海口。

我先头部队在海口附近击溃了由琼山县出动增援的国民党第64军，攻占琼山县城，继续向海口挺进。

自大部队登陆后，琼崖纵队积极配合行动，全线出击敌人，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当我主力部队向海口进军时，琼总独立团主动在琼文地区破坏了三江以北的罗牛桥、三江以南的美敏桥，切断了敌人后路，并歼灭了由海口东逃之敌。

薛岳的主力被歼后，他自知败局已定，不得不于23日下午发出总撤退的命令，昔日那种趾高气扬的架势早已荡然无存。此前，他虽然几次给蒋介石发急电求救，但均无回音。他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和陈济棠坐飞机由海口逃跑了。

薛岳一走，海南岛国民党守军四分五裂，全线溃逃，土崩瓦解，成了丧家之犬。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43军和琼崖纵队转入全面追击作战。

23日晨，国民党驻三亚的空军飞机飞抵海口，轰炸了机场和秀英港口，并袭击人民解放军向海口的追击部队。

韩先楚得知敌机轰炸，分析这是敌人撤离海口前在进行丧心病狂的大破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减少海口的损失，他要求部队吃大苦、耐大劳，争分夺秒地向海口挺进。

部队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于23日下午8时抵达海口附近。韩先楚命令兵分两路：一路直奔秀英码头，迅速歼灭码头上的残敌，尔后进入得胜路；一路直指大英山，控制机场，尔后进入新华路。

先头部队第354团攻进市内后，见到国民党军丢下不少汽车、弹药和大批物资。在薛岳指挥部里，还留下不少没有来得及处理的资料 and 文件，一片狼藉。

与此同时，第43军一部也由府城突入海口，占领了南门一带和中山路。

海口宣告解放。各族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手持彩旗，呼喊口号，鸣放鞭炮，欢庆解放。

23日19时30分，邓华等兵团领导率领第43军军部和5个团的兵力，作为第二梯队，分别由三塘、四塘、新地一带起渡。他们在琼州海峡没有遇到敌舰阻击，于24日晨在天尾、秀英一带海岸登陆。

25日，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率领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进入海口、府城地区。

邓华和冯白驹这两位往日隔海相望、密切协同作战的战友，今

日胜利见面，脸上充满了兴奋和喜悦，相互热烈握手、问候，眼里涌出了热泪。他们立即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事项，讨论了政权建设、维护社会治安、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生产、组织物资供给、安定人民生活等措施。

攻克海口后，兵团命令除留下第127师主力驻守海口外，其余部队兵分三路追击、围堵、歼灭残余敌人。以第40军第119师、第43军第128师和琼纵独立团组成东路军，于23日出发，向加积、乐会、万宁、陵水、崖县方向追击；以第43军第129师及第127师第380团组成中路军，由美亭地区出发，向北黎一线追击；以第40军第118师第352团加强营为西路军，沿岛公路疾进，向北黎、八所追击逃敌，此外，还组织了15只机帆船，由海上驶向北黎，以争取歼敌时间。

时值4月下旬，海南岛已骄阳似火，没有一丝风。行军追敌的战士们汗流浹背，透不过气来。为了赶时间，战士们强忍着各种困难。有些北方籍的战士，不适应这种酷暑天气，中暑昏倒了，被人扶起来喝口水再坚持前进。许多人肩肿了，仍坚持扛枪、背炮。不少人脚底板水泡连着血泡，不叫苦，不喊累。

韩先楚考虑，东线的万宁、西线的北黎、最南端的榆林等海岸港口，军舰、海轮进出方便，便于敌人多路撤退；而我军没有海空军在海上拦阻，海拔千米以上的五指山又阻碍了我军多路平行追击。怎么办？不能眼看着敌人跑了。他要求干部战士想办法，出主意。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有人提议组织快速部队，赶到敌人前面去，堵住敌人。韩先楚采纳了这条意见。他要求第118师用缴获敌人的汽车和调集的一

部分民车，组成快速部队追击敌人。战士们得意地称这支部队为“快速纵队”。

第118师很快便找到了30部汽车，由第354团第3营乘车追击敌人。开车的司机大部分是刚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兵。他们受到解放军战士的尊重和生活上的照顾，十分感动，决心努力工作。

有了陆上的快速部队，韩先楚又想到了海上。他立即命令土炮艇大队组织一支海上快速部队，乘船赶往北黎港堵击敌人。

从海口开出的车辆汽车，扬起滚滚尘土。路上，小股国民党军逃兵和伤员见汽车开来，以为是自己的部队，远远地就站在路旁招手，或用枪拦住，要求爬上车一起逃命。为了赶时间，邓岳师长命令对这些人一律不理睬，汽车不减速地前进。

汽车开过乐会的一座小山岭，发现前面公路上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徒步逃退的敌人。敌人拥挤不堪，行进无序，完全失去了组织指挥。我军汽车的喇叭声催着这股敌人往公路两边闪，挤出一条道往前开去。十几辆车过去以后，一名敌军军官发现车上的人不是自己的部队，惊叫一声：“啊！共军！”随即向汽车开了枪。枪声一响，整个公路顿时一片混乱，许多敌人也跟着胡乱放枪。

遭到敌人射击的车辆上的解放军立即还击，敌人死伤一大片。“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战士们在车上不断地向敌人喊话。敌人更加惊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少数敌人丢下武器后向公路两侧逃跑。顿时，公路上到处都是背包、枪支和弹药，汽车受阻。汽车上一部分战士用机枪、冲锋枪打击顽抗的敌人；一部分战士下车，组织已投降的敌人排成一列列长队。不到半个小时，集合了1500多名俘虏。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第62军和第63军的，少数是教导师的。在俘虏中，有敌团长4人。

在这期间，韩先楚接到第119师报告：第357团迫到黄竹地区，遇到敌人的抵抗，发生激战。这股敌人是国民党军第62军的第151师师部及两个团。他们得知解放军追击，就在黄竹地区选择了有利地形，构筑了临时工事，准备作垂死挣扎。敌人占领了附近村庄，将老百姓家中能吃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作为给养。第357团猛打猛冲，突破了敌人封锁的通道，尔后采取迂回包围，一个村庄一个村庄解决，终于打垮了敌人，俘敌800多人，缴获汽车3辆。第357团也有21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第119师第355团顺利攻占加积，俘敌200余人，缴获炮4门、汽车两辆和一批物资。

东路第128师和琼纵独立团追敌至塔市，迫使国民党第163师第489团团长李荣等指挥的1000多人投降。接着又攻克文昌县城，警保第4团团团长林荟材率部起义。第128师与第119师在加积胜利会师后，继续执行追敌任务。

我快速部队在沿途遇到几大批敌人，他们将大批俘虏妥当处理后继续挺进，于26日下午抵达万宁港。这时，其他步行部队也已赶到。只见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军正蜂拥着向军舰逃去。追击部队的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已登上舰的敌人有的被打伤、打死，许多人掉入海中。

在万宁县东山岭，担任掩护国民党军由乌场港登船去台湾的第266师，突然听到隆隆的炮声，被吓得失魂落魄，赶紧连滚带爬地从山上退下来。这股敌人经过码头道路时，你推我挤，互不相让，争相逃命，道路拥挤混乱不堪。

解放军主力赶到后，有3艘敌舰见势不妙，带伤逃走，其余敌舰也起锚

要逃。慌乱之中，敌军落水淹死者就有 2000 多人。来不及登上军舰的 1000 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其中，有警保第 1 师第 2 团团董伯然和第 3 团团团长徐毅民等军官。我军打扫战场时，收集的枪支、弹药、行李、金条、公文等物品不计其数。

28 日夜，东路第 128 师追敌至陵水县，得知国民党逃军正在新村港集结登船。于是，部队立即向新村攻击前进。

新村港位于海湾内，沿岸水浅。敌军舰靠不了港，只能停在港湾外海，用民船一船船把部队运到军舰上。渔船少，速度慢，而要上船逃命的人又大多，大家拼命往船上挤。有几只船因负荷过量，没等靠近军舰就沉了船，敌人淹死无数。

当第 382 团赶到时，敌人来不及抵抗就一个个当了俘虏。我军从敌人俘虏中了解到，国民党大部队已逃到三亚、榆林，要在那里登船逃跑。于是，部队又向榆林方向追去。

第 119 师在徐国夫师长等带领下，于 30 日追至榆林。国民党第 63 军等残部，为了苟延残喘，争取逃往台湾的时间，进行严密设防。第 119 师第 355 团和第 356 团等部队，勇猛攻击，快速推进。敌人节节败退，望风而逃。第 355 团迅速攻占了敌指挥中心——榆林要塞司令部。没有来得及逃跑的敌人全部当了俘虏。

我军紧接着进攻榆林港，缴获两艘军舰。

第 119 师第 356 团翻过狗岭南侧山地，向三亚进击，很快占领了三亚飞机场。三亚木桥侧边制高点的敌人，发现自己被包围，遂向三亚湾逃窜。第 356 团第 2 营追敌直到三亚湾。

逃往三亚湾的敌人太多，船只全已挤满，而岸上还有大批逃兵要上船。一些人强行登船，而船上的人怕船承受不了不让再登船。船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争执起来，双方用枪炮互相射击。国民党军在相互残杀中，死伤上千人。

30 日下午 4 时，第 119 师攻占三亚湾，第 128 师也同时进抵三亚。

人民解放军第 40 军、第 43 军在榆林港胜利会师，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5600 多人，俘敌 23800 多人，收容溃敌 1.8 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400 多门，各种枪 17200 余支，飞机 4 架；击落飞机 2 架，击毁军舰 3 艘，击伤军舰 5 艘；缴获坦克 10 辆，装甲车 3 辆，汽车 140 多辆，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部分敌人从海上逃走。

渡海作战部队阵亡 820 余人，负伤 4614 人，溺水 416 人，被敌抓走 285 人（后又被我军解救回来），失踪 74 人。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宝岛，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海南岛的解放，对于保卫新生的共和国，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解放海南岛后不久，韩先楚奉命率第 40 军北调，待命执行新的任务。

